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二卷

1853年3月—1853年12月

著 作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设计:尹凤阁 王师韵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王 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
ISBN 7-01-002369-7

I. 马…
II. 中…
III. 马恩著作-全集
IV. A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4191 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十二卷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3 月第 2 版 199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1.375 插页 7
字数:788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01-002369-7/A·223 定价:58.00 元

ISBN 7-01-002369-7



9 787010 023694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
局编译的。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 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 《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前 言

本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3 年 3 月至 12 月所写的政治论著和时事评论。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欧洲重新进入反动时期,工人运动陷入低潮。共产主义者同盟也于 1852 年 11 月解散。当时,革命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和公开阐述工人运动在反动时期的战略策略,在思想上教育和团结国际无产阶级,积蓄力量,以迎接未来的新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从事的政论活动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欧洲大陆的革命民主主义报刊几乎全遭取缔,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利用美国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以下简称《论坛报》)约请马克思担任该报驻伦敦通讯员的机会,在《论坛报》上发表大量文章。此外,马克思还为左翼宪章派的报纸《人民报》和美国的工人报纸《改革报》撰稿,并把为《论坛报》写的一些重要文章交由《人民报》转载。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利用这些合法途径影响群众和社会舆论,宣传革命思想。

这一时期,马克思一方面继续潜心于以经济学为中心的广泛的理论研究,一方面与恩格斯一起继续为《论坛报》撰写时评和政论文章。与过去相比,为《论坛报》撰稿的工作在 1853 年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为从 1853 年 1 月起马克思开始自己用英文写作,不再需要恩格斯为他翻译,从而使他和恩格斯为《论坛报》写稿的数量大为增加,

在 1853 年一年中，他们在该报发表的文章共达 70 余篇。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政论文章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涉及欧洲各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对欧洲和亚洲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及时进行报道和评论，并作出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结论。关于这些文章，1892 年恩格斯在《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一文中曾作过如下的评价：“这不是一些普通的通讯，它们是根据认真的研究写出的，而且往往是包含一系列对于欧洲某一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详尽评论的文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和他们的理论研究有密切的联系。例如，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12 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中，就使用了他在本卷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的某些资料和结论，并据此作出了进一步的理论概括。同时，这些文章又始终紧紧围绕着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个中心。它们从各个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以及列强之间争夺和瓜分势力范围的对抗和勾结。

这一时期的文章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欧洲资本主义列强特别是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工人革命运动的前景；列强首先是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国际关系，主要是列强在近东和巴尔干地区的矛盾，以及沙皇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军事冲突。

随着 1848 年革命风暴的平息以及反动政权统治的相对稳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出现了经济上趋于繁荣的势头。于是资产阶级政论家们，纷纷著文赞颂几年来英国的经济繁荣，并说英国经济的发展给劳动者带来空前的福利等等。英国统治阶级的喉舌《泰

晤士报》甚至说“世界成了劳动者的真正天堂”。马克思在《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出租马车。——爱尔兰。——俄国问题》、《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繁荣。——工人问题》、《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宪章运动》等一系列文章中，以无可否认的事实和科学的分析，驳斥了上述言论，指出繁荣没有减轻广大群众的贫困状况，没有消除他们在工厂中遭受的摧残。在英国这个当时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劳动者背井离乡，流亡国外。同时，马克思还揭穿了自由贸易派散布的贸易自由可以避免经济危机的幻想。“自由贸易的幻想的魅力正在消失，勇敢的工业冒险家开始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经济震荡、商业危机和新的生产过剩，并不像他们所梦想的那样完全不可能在一个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里发生。生产过剩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还会存在，因为‘商品积压’这种《曼彻斯特卫报》心目中的可怕怪物继续存在，而且有增无减。商品的需求正在明显地下降，而供给却一天天增加。”（见本卷第 379 页）1857 年在英美等国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证实了马克思的观点。

马克思结合经济学的研究，在《内阁的成就》、《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便士》、《菲格斯·奥康瑞尔。——内阁的失败。——预算》、《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等文中，对英国内阁的税收和财政政策进行了抨击，揭露了这些政策的阶级性质，指出它们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对劳动者加强掠夺的一种手段。50 年代以来英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不但没有使工人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反而使贫富悬殊更加严重，这迫使工人走上斗争的道路。从 1853 年起，很多地方都发生了罢工。罢工浪潮声势浩大，此起彼伏。工人运动、宪章运动又开始活跃起来。马克思在写给《论坛报》的一系列通讯中，热情洋溢地报道了工人们到处奋起进行罢工斗

争的消息。当时,对于工人的罢工,不仅一些资产阶级报纸暴跳如雷,极尽诬蔑咒骂之能事,公开要求政府当局进行干涉和压制,就是一些社会主义者也认为罢工有损于工人本身的利益。针对这一切,马克思在《英国的繁荣。——罢工。——土耳其问题。——印度》、《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宪章运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恐慌。——罢工》等文章中阐述了罢工的性质和意义。马克思指出,罢工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战争,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战争。在当前,这种经常不断的冲突,“乃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它可以激发劳动阶级斗志,把他们团结到一个用来抵御统治阶级侵害的统一的大的联盟中,使他们不致变成一些冷漠的、没有思想的、可以马马虎虎吃饱肚子的生产工具。……为了对罢工和联合作正确的评价,我们不能被它们经济成果不大这一表面现象所迷惑,而要首先看到它们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成果”。(见本卷第18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些文章中,根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矛盾以及国际关系的恶化等情况,曾推测有可能出现新的革命高潮。这和他们当时对经济危机以及经济危机与社会革命的联系的观点有关。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现实情况进一步总结了新的经验和认识。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895年,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回首审视和总结40年代末和50年代斗争的历史经验时,进一步明确指出:“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

185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继续同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去的奥古斯特·维利希等人进行了论战。马克思在美国出版的小册子《高尚意识的骑士》就是为了批判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而写的。这篇著作在内容上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写作的《流亡中的大人物》和《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相联系的。在这篇论战著作中，马克思辛辣地嘲笑了维利希这类“革命”空谈家。马克思用事实驳斥了维利希散布的对他和恩格斯的种种诽谤，再次阐述了导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真正原因，并批驳了这些所谓的“革命家”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

有关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的文章，在本卷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从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论和通讯可以看出，他们对殖民地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命运和斗争表现了深切的关注。马克思联系欧洲革命的前景考察殖民主义问题，反复指出亚洲特别是印度和中国发生的革命运动和深刻的社会变化，对欧洲革命有重要的影响。

1851年在中国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强烈地震动了英国和整个欧洲。马克思一向关注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无情地揭露和谴责英国殖民主义者用武力在中国销售鸦片以掠夺和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高度评价中国的革命运动对欧洲未来革命的影响和意义。马克思指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见本卷第118页）马克思意味深长地说：“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见本卷第

118—119 页)

马克思在谴责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无耻掠夺和暴行的同时,也指出英国大炮的轰击打破了中国封建王朝的“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马克思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本卷中论述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的统治的文章中,得到更加透彻和精辟的发挥。

由于英国议会辩论改革对印度的治理问题,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撰写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一系列论述印度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实际上远远超出评论英国政府改革对印度治理问题的范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首先严厉地谴责了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揭露了几个世纪以来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印度进行的野蛮的征服和残酷的掠夺给印度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揭穿了资产阶级文明的真面目。马克思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见本卷第 250 页)

其次,马克思指出,英国人在征服、统治和掠夺印度的同时,又不得不通过在印度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报等等而在印度播下现代化生产的种子。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说过,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马克思在本卷论述印度问题的文章中,深刻地揭示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主义统治的两重性。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提出了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这一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著名论断。马克思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

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见本卷第246页）马克思说，英国殖民者摧毁了印度旧的经济基础，“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见本卷第142页）。马克思指出：“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见本卷第142页）马克思以一个高瞻远瞩的伟大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地指出，英国在印度造成的社会革命，无疑完全是受其卑鄙的私利驱使，但是，“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见本卷第143页）。

在论述印度状况的文章中，马克思以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为例，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进步的矛盾性质。资产阶级发展了生产力，但这种发达的生产力是建筑在劳动群众的巨大苦难和牺牲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史是用血与火写成的。马克思强调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见本卷第250页）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见本卷第251—252

页)

本卷中有大量文章涉及国际问题,在这些文章中,工人阶级的利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一切国际问题的出发点。在分析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始终要回答哪一方得胜更有利于各国的民主运动,特别是有利于国际工人运动这样一个问题。本卷收入的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内容比较集中于当时日趋尖锐的“东方问题”,即土耳其帝国及其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地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欧洲列强产生了激烈的利益摩擦,每个国家都希望从摇摇欲坠的土耳其帝国捞到尽可能多的好处,在这一地区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影响。沙皇俄国当时企图趁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夺取它觊觎多年的黑海海峡并向巴尔干半岛进行扩张。这就和力图加紧侵入中近东地区以扩大商品销售市场的英法两国发生越来越紧张的矛盾和对抗。马克思指出:“不坚定的、畏缩而又互相猜忌的西方列强,起初由于害怕俄国侵略而鼓励苏丹反抗沙皇,而最后却由于害怕一场大战会引起一次大革命而强迫苏丹让步。……它们的全部目的就是保持现状,即保持使苏丹不能摆脱沙皇、斯拉夫人也不能摆脱苏丹的腐败状态。”(见本卷第 239—240 页)

在收入本卷的文章中,有许多篇涉及“东方问题”,其中如《土耳其问题的真正症结》、《土耳其问题》、《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等文,都明确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揭示了欧洲列强在东方问题上互相摩擦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原因,论证了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和民主派在这方面应持的立场。当时西欧的许多外交家和政客都竭力鼓吹“保持现状”,以此掩盖他们反对巴尔干地区各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运动的态度的态度。恩格斯揭露了这种论调的虚伪性。他写道:“推动俄国向君士坦丁堡迅速挺进的强大动力,正是原来想借

以阻止它这样做的那个办法,即空幻的、从来没有实现过的维持现状的理论。这种现状是什么呢?对于土耳其政府管辖下的基督教臣民来说,这无非是意味着使他们永远受土耳其的压迫。”(见本卷第 38 页)恩格斯说,保持现状不能解决土耳其问题和东方问题,而只会鼓励沙皇俄国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进行扩张和侵略。恩格斯深刻地指出:“不,按老办法行事的外交界和各国政府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土耳其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一起,都要留待欧洲革命来解决。”(见本卷第 40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沙皇俄国是欧洲大陆上最大的反动堡垒,是欧洲革命的主要敌人。在收入本卷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沙皇俄国专制政府对外政策中表现出的“狂妄的野心、狡猾的伎俩和十足的野蛮”(见本卷第 183 页),揭穿了沙皇政府冒充巴尔干各民族的“朋友”和“保护人”的伪装,谴责了西欧政界人物对沙皇政府的姑息纵容态度。马克思指出,俄国为了获得通向地中海的出海口从而在欧洲保持它的强权地位,侵略中近东和巴尔干半岛是它自古以来一贯奉行的传统政策,而“俄国用来追求这些目的的传统手法,根本不值得欧洲的政治家们那样赞扬。它的传统政策的成功证明了西方列强的软弱,而这一政策的手法的一成不变则证明了俄国本身固有的野蛮”(见本卷第 262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少文章都揭露了西方列强首先是英法两国统治集团在东方问题上奉行的谋求私利的政策。这方面的文章有:《乌尔卡尔特。——贝姆。——土耳其问题在上院》、《土耳其问题在下院》、《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等。这些文章批评了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英国统治集团非常害怕在东方问题上与沙皇俄国发生冲突,因为他们担心这种冲突会转变为

整个欧洲的革命,从而威胁他们自己在英国的统治。在这方面,马克思为《人民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连载文章《帕麦斯顿勋爵》,在本卷中占有不小的篇幅。这组文章的发表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得到广泛的传播,其中有几篇还在英国以单行本形式出版。

当时,由于帕麦斯顿善于耍弄各种阴谋诡计,也由于欧陆各国自由派把他吹捧为民主自由的朋友,帕麦斯顿的言行在英国国内外具有相当大的欺骗性。为了在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公众面前揭露帕麦斯顿的真面目,马克思在研究大量外交文献、议会辩论记录和报刊报道的基础上写成了这部出色的抨击性著作。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以鲜明生动的语言和辛辣嘲讽的笔法,刻画出了英国统治阶级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英国多年来对外政策决策人之一帕麦斯顿的形象,并通过帕麦斯顿这个口是心非、两面三刀、背信弃义、反复无常的典型,无情地揭露了整个英国统治集团外交政策圆滑狡诈的传统特色。马克思写道:“他出卖别的民族,但是他做得非常有礼貌,因为礼貌是魔鬼用来换取被愚弄者的鲜血的小钱。压迫者永远可以指望得到他的实际帮助,被压迫者从他那里则总会得到大量慷慨的辞令。……谁要是把他当作对手,那多半不会错,谁要是把他当作朋友,那肯定会倒霉。”(见本卷第400页)

西方列强的动摇不定的外交政策,使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和军事对抗日益尖锐,并终于在1853年10月导致一场全面的战争,即克里木战争(英法两国于1854年正式对俄宣战)。俄土战争的进程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切注意。本卷收入了恩格斯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一系列军事评论文章。在《神圣的战争》、《土耳其战争的进程》、《多瑙河战争》等文中,恩格斯分析评论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战场上的态势、两军最初几次战役的胜败和得失等等。这些文章以

及恩格斯此后至 1856 年为止继续写作的评论克里木战争的许多文章,在恩格斯的军事理论著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文章包含了有关军事艺术和战略战术问题的重要结论,对于军事学和军事历史学具有重要的价值,特别是提供了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高度考察军事和战争问题的杰出范例。

本卷附录收入了厄·琼斯、约·魏德迈、威·皮佩尔、约·格·埃卡留斯、阿·克路斯所写的文章共 13 篇。这些文章都是作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参与、帮助或影响下写成的,它们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

本卷收入的文献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相应时期卷次收入的增加 14 篇,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 2 篇:《科苏特和皮尔斯将军。——流亡者和伦敦警察当局》、《有关俄土战争的几个情况》;附录 12 篇:《一本“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欧洲的繁荣。——工人的工资斗争。——波拿巴主义。——普奥商约》、《英镑、先令、便士,或阶级的预算,和此预算为谁减轻负担》、《在英国的流亡者中的派别》、《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议会。——〈泰晤士报〉。——“工人们”》、《沙皇的胜利》、《法国的情况》、《“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国民经济学家》、《瑟美烈和匈牙利王权象征物》、《俄国的失败。——阿伯丁的和平布道。——英国的工人运动》、《戴维·乌尔卡尔特》、《俄国工具之诡计,“我们的”内阁在东方之丑行》。原收入第 1 版的《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一文,经考证作者不是马克思,而是威·皮佩尔,现收入附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2 卷翻译或重新作了校订。

参加本卷译文校订工作的有：

张放荣 周秀凤 李成毅 张念东 胡尧之
王锡君 蔡长缨 沈红文 闫月梅 籍维立
杨彦君 詹汝琮

参加本卷军事著作部分译校工作的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刘善继 潘嘉玢

参加编辑资料工作的有：

蒋仁祥 耿睿勤 章丽莉 白玉琴 胡永钦
孙家衡

全卷译文由张放荣审定

目 录

前言	1—1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	3—13
卡·马克思 科苏特和皮尔斯将军。——*流亡者和伦敦警察当局.....	14—15
弗·恩格斯 土耳其问题的真正症结	16—21
卡·马克思 伦敦的报刊。——拿破仑在土耳其问题上的政策	22—26
弗·恩格斯 土耳其问题	27—33
卡·马克思 柏林密谋	34—37
弗·恩格斯 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	38—43
卡·马克思 柏林密谋。——伦敦警察当局。——马志尼。——拉德茨基	44—47
卡·马克思 希尔施的自供	48—52
卡·马克思 内阁的成就	53—61
卡·马克思 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便士	62—68
卡·马克思 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失	

败。——预算.....	69—76
卡·马克思 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 魂术。——预算	77—86
弗·恩格斯 * 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	87—9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火箭事件。——瑞士的 暴动	95—99
卡·马克思 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颠国 债的兑换。——印度、土耳其和俄国	100—106
卡·马克思 马志尼。——瑞士和奥地利。——土 耳其问题	107—112
卡·马克思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113—120
卡·马克思 土耳其问题。——《泰晤士报》。—— 俄国的扩张	121—124
卡·马克思 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 ——查理·伍德爵士的东印度改革	125—136
卡·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137—144
卡·马克思 英国的繁荣。——罢工。——土耳其 问题。——印度	145—153
卡·马克思 土耳其和俄国。——阿伯丁内阁对俄 国的纵容。——预算。——报纸增刊税。—— 议会的舞弊	154—160
卡·马克思 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	161—170
卡·马克思 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者 权利	171—177
卡·马克思 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 * 宪章	

运动	178—190
卡·马克思 土耳其战争问题。——《纽约论坛报》 在下院。——印度的管理	191—204
卡·马克思 * 莱亚德的提案。——围绕十小时工 作日法案的斗争	205—213
卡·马克思 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诡计和 诡辩。——涅谢尔罗德最近的照会。——东印度 问题	214—224
卡·马克思 缅甸战争。——俄国问题。——外交 官的有趣信件	225—234
卡·马克思 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	235—244
卡·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245—252
卡·马克思 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出租马车。 ——爱尔兰。——俄国问题	253—264
卡·马克思 * 在下院。——报刊论东方问题。 ——沙皇宣言。——丹麦	265—272
卡·马克思 广告税。——俄国的行动。——丹麦。 ——合众国在欧洲	273—280
卡·马克思 战争问题。——不列颠的人口和贸易 报告书。——议会动态	281—294
卡·马克思 乌尔卡尔特。——贝姆。——土耳其 问题在上院	295—303
卡·马克思 土耳其问题在下院	304—318
卡·马克思 大陆和英国的情况	319—326

卡·马克思 米哈伊尔·巴枯宁	327—329
卡·马克思 粮价上涨。——霍乱。——罢工。 ——海员中的运动	330—332
卡·马克思 致《人民报》编辑	333—335
卡·马克思 * 维也纳照会。——合众国与欧洲。 ——舒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	336—346
卡·马克思 政治动态。——欧洲缺粮	347—356
卡·马克思 * 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日益迫近 的经济危机。——印度的铁路建设	357—36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西方列强和土耳其。 ——经济危机的征兆	368—38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恐 慌。——罢工	381—387
弗·恩格斯 俄军在土耳其	388—394
卡·马克思 帕麦斯顿勋爵	395—478
第一篇	397
第二篇	407
第三篇	415
第四篇	430
第五篇	442
第六篇	451
第七篇	458
第八篇	467
卡·马克思 战争问题。——金融状况。 ——罢工	479—488

卡·马克思	* 土耳其宣言。——法国经济状况	489—494
弗·恩格斯	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	495—500
卡·马克思	* 德勒克吕兹被捕。——丹麦。—— 奥地利。——《泰晤士报》谈对俄战争的前景	501—503
弗·恩格斯	神圣的战争	504—508
卡·马克思	战争。——罢工。——缺粮	509—519
卡·马克思	* 波斯进军阿富汗和俄国进军中亚。 ——丹麦。——多瑙河和亚洲的军事 行动。——威根的矿工	520—525
弗·恩格斯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	526—533
弗·恩格斯	俄军的失败	534—536
卡·马克思	工人问题	537—540
卡·马克思	繁荣。——工人问题	541—549
弗·恩格斯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	550—556
卡·马克思	高尚意识的骑士	557—591
卡·马克思	* 曼托伊费尔的演说。——普鲁士 的宗教运动。——马志尼的宣言。——伦敦 市政厅。——罗素的改革。——工人议会	592—600
弗·恩格斯	* 有关俄土战争的几个情况	601—602
弗·恩格斯	多瑙河战争	605—612
卡·马克思	土耳其战争。——工业的灾难	613—617
卡·马克思	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	618—628
卡·马克思	俄国的胜利。——英国和法国的 地位	629—635
卡·马克思	帕麦斯顿辞职	636—640

弗·恩格斯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	641—647
----------------------	---------

附 录

厄内斯特·琼斯 * 一本“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的小册子	651
约瑟夫·魏德迈 * 欧洲的繁荣。——工人的工资斗争。 ——波拿巴主义。——普奥商约	652—655
威廉·皮佩尔 * 英镑、先令、便士, 或阶级的预算, 和此预算为谁减轻负担	656—660
威廉·皮佩尔 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 ——联合内阁的预算	661—669
约瑟夫·魏德迈 在英国的流亡者中的派别	670—676
威廉·皮佩尔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议会。—— 《泰晤士报》。——“工人们”	677—681
威廉·皮佩尔 沙皇的胜利	682—686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法国的情况	687—706
一、农民的所有制和债务	687
二、农民的负担	695
三、小田庄制度的穷途末路	700
阿道夫·克路斯 “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 “最优秀人物”和国民经济学家	707—720
阿道夫·克路斯 * 瑟美列和匈牙利王权象征物	721—722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 俄国的失败。—— 阿伯丁的和平布道。——英国的工人运动	723—726
阿道夫·克路斯 戴维·乌尔卡尔特	727—729

厄内斯特·琼斯 俄国工具之诡计,“我们的”内阁 在东方之丑行.....	730—734
注释	737—818
人名索引	819—882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883—886
文献索引	887—946
报刊索引	947—959
地名索引	960—975

插 图

马克思使用过的土耳其帝国地图(1853年伦敦版)	20—21
1926—1934年分别刊载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 中译文的上海新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 革命论》、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的《民族革命原理》和北京 《政治生活》1926年5月第76期(红色五月特刊)、中央苏 区《斗争》1934年7月21日第68期的封面和部分译文	114—115
载有卡·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的《纽约每日 论坛报》原版的一部分	142—143
燕妮·马克思的记事簿的一页,上面记有发送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文章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日期	371—372
载有卡·马克思的《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文章的第一篇的 《人民报》原版的一部分	396—397
卡·马克思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第1版的扉页	559—560
弗·恩格斯的《有关俄土战争的几个情况》一文带有地图 的手稿	603—604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53年3月—12月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
——流亡者。——马志尼在
伦敦。——土耳其'

1853年3月22日星期二于伦敦

迪斯累里被免去了少数派“大保守党”的领袖职位，这在当代政党史中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事件。² 据悉，迪斯累里在托利党³ 内阁解散八九个星期之前，曾准备抛弃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只是由于德比勋爵再三要求才放弃了这个决定。而现在，迪斯累里自己倒被免职了，他的职位已正式由约翰·帕金顿爵士接替。帕金顿是一个稳健谨慎的人，有一些领导能力，但他又是一个性格阴郁的人物，是英国旧土地贵族的腐朽偏见和陈旧感情的十足化身。这次更换领导，意味着托利党的彻底的、也可能是最终转变。迪斯累里可以庆幸自己摆脱了那些伪善的地主。不管我们对这个据说是鄙视贵族、仇视资产阶级和不喜欢人民的人物有什么看法，他毫无疑问是本届议会中最有才干的议员，而他灵活的性格又使他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要求。

关于流亡者的问题，我在上一篇通讯^①中报道过：奥地利一些报纸在帕麦斯顿勋爵于下院发表演说后断言，要求被帕麦斯顿影响所腐蚀的内阁改弦易辙是徒劳的。但是，阿伯丁在上院的讲话通过电报一传到维也纳后，情况立刻又变了。⁴ 这些报纸现在又宣称，“奥地利认为英国内阁是信得过的”，半官方的《奥地利通讯》还刊载了该报巴黎通讯员所写的如下的报道：

“考莱勋爵在返回巴黎后马上向法国皇帝表明，英国驻北方各国宫廷的外交代表均接到训令，要尽一切努力劝阻北方列强向不列颠政府提出联合照会。劝阻的理由是，不列颠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上越能在英国所有人的心目中保持自主自愿的样子，它就越好地满足这些强国的要求……

不列颠大使考莱勋爵极力说服法国皇帝，要他完全信赖不列颠内阁，而且，如果这种信赖被辜负，皇帝尽可随时采取他认为适当的任何步骤…… 法国皇帝同意考验一下不列颠内阁的诚意，但同时保留了将来采取行动的完全自由；他现在正力图说服其他强国也照他这样做。”

读者可以看出，人家希望从“好人阿伯丁”（路易-菲力浦常常这样称呼他）那里得到什么，以及阿伯丁大概许下了什么诺言。实际上，诺言之后已见行动。上星期，英国警察当局开列了居住在伦敦的大陆流亡者的名单。几名便衣侦探挨街挨户地记下流亡者的个人资料；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向附近的酒馆老板作调查，有时则装作追捕罪犯而闯入某些流亡者的住处，搜查他们的文件。

大陆上的警察当局正在徒劳无功地追捕马志尼，纽伦堡当局下令关上城门捉拿他（德国有句老话：“要想把人绞死，先得把他捉

^① 《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普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67—674页。——编者注

住。”)，英国报刊大量报道他的可能的行踪，而马志尼这几天却安然无恙地住在伦敦。

缅施科夫公爵检阅了驻多瑙河两公国的俄军和驻塞瓦斯托波尔的陆军和舰队(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亲自观看了军队的登船和登陆演习)，然后，于2月28日前呼后拥地进入君士坦丁堡。他的随员共12人，包括俄国黑海舰队司令①、一位师长②、几位参谋官和作为使团秘书的小涅谢尔罗德先生。缅施科夫受到希腊族居民和俄罗斯族居民的热烈欢迎，好像他就是正教沙皇亲临沙皇格勒来恢复这里的真宗真教一般。伦敦和巴黎，都为如下的消息所轰动：缅施科夫公爵对傅阿德埃芬蒂的免职并不满足，他要求苏丹向俄国皇帝不但让出对土耳其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护权，而且让出任命希腊牧首的权力；苏丹向英法请求保护；不列颠代办罗斯上校急忙把黄蜂号蒸汽舰派往马耳他岛，要求英国舰队立即开到爱琴海，同时俄国舰船已到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的基利亚停泊。据巴黎的《通报》报道，在土伦的法国舰队已接到命令开进希腊领水③。不过，海军将领邓达斯目前仍在马耳他岛。从这一切看来很清楚，东方问题又一次提到欧洲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一事实对于熟悉历史的人们来说是不值得惊奇的。

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个老是反复出现的问题必定要冒出来，这就是永远解决不了的“东方问题”。例如，当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暴风雨过去，拿破仑和俄皇亚历山大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⁵，

① 弗·阿·科尔尼洛夫。——编者注

② 阿·阿·涅波科伊奇茨基。——编者注

③ 1853年3月21日《泰晤士报》第21381号。——编者注

瓜分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时候，亚历山大利用了暂时平静的时机，把军队开进土耳其，向那些正在从内部摧毁这个衰败中的帝国的势力“伸出援助之手”。再如，西欧革命运动刚被莱巴赫会议和维罗纳会议⁶镇压下去，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尼古拉就又给了土耳其一个打击。几年以后，当七月革命以及随之发生的波兰、意大利和比利时的起义已经过去，于1831年经过改造的欧洲看来已经摆脱了内部风暴的时候，东方问题于1840年又几乎把“列强”卷入一场大战⁷。现在，正当目光短浅的当权侏儒们因成功地使欧洲摆脱了无政府状态和革命的危险而自鸣得意之时，这个永恒的题目，这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又来了：对土耳其怎么办？

土耳其是欧洲正统主义国家⁸的一大痛处。从第一次法国革命以来，正统主义君主政权的软弱无力就表现为这样一条格言：维持现状。这种一致同意坚决维持偶然形成的状况的原则，是列强在能力上的赤贫证明书，证明它们完全没有能力为进步或文明做任何事情。拿破仑能够在顷刻之间解决掉整个大陆，是的，而且解决得既高明，又果断。维也纳会议⁹上的欧洲正统主义的代表们，用他们全部“集体智慧”，花了一两年功夫去做同样的事，却争吵不休，简直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并且对它感到极端厌烦，以致从那时以来再不想去碰它，而且再没有伸手去瓜分欧洲。这些平庸的米尔米东人¹⁰（贝朗瑞这样称呼他们）既不懂历史，不了解事实，也没有自己的主张和主动精神，他们只是膜拜他们自己拼凑起来的现状，尽管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这件作品是多么粗糙和拙劣。

但是，土耳其和其余世界一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恰好当反动派在文明欧洲恢复了他们所认为的原状的时候，却发现在这个时期土耳其的现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问题、新的关系、新的

利益,因而可怜的外交家们不得不从十来年前被大动荡打断的地方重新开始。要维持土耳其的现状!是啊,还可以把一匹死马的尸体的腐烂过程维持在一定阶段上,以防止它完全腐烂。土耳其正在继续腐烂,而且,只要目前的“均势”和维持“现状”的体系继续存在下去,它还会继续腐烂下去。因此,不管有多少会议、议定书和最后通牒,它还是每年都要惹出一定数量的外交难题和国际纠纷,就像任何其他腐烂物体向周围不断放出沼气和其他“芬芳的”气体那样。

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土耳其由以下三个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非洲藩属国(埃及和突尼斯)、亚洲土耳其和欧洲土耳其。非洲属地(其中只有埃及可以算是真正隶属于苏丹)可以暂时不谈。埃及在更大程度上属于英国人,将来只要瓜分土耳其,它必定是被英国人分去。亚洲土耳其才真正是帝国现时拥有的全部力量之所在。400年来土耳其人的主要居住地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是补充土耳其军队的后备基地,从兵临维也纳城下的土耳其军队,到库列夫察战役¹¹中被吉比奇并不很高明的战术打得四散奔逃的土耳其军队都来自那里。亚洲土耳其尽管人口稀少,却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土耳其族的狂热的穆斯林群体,目前谁也休想去征服它。实际上每当“东方问题”提出的时候,在这个地区中所考虑的只是巴勒斯坦和基督徒聚居的黎巴嫩谷地。

问题的真正焦点永远是欧洲土耳其,即萨瓦河和多瑙河以南的大半岛。这个好地方不幸聚居着各不相同的种族和民族,很难说它们当中哪一个最缺少走向进步和文明的素质。1200万斯拉夫人、希腊人、瓦拉几亚人、阿尔珞特人^①都处于100万土耳其人的统治之

^① 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编者注

下,而直到不久以前还很难说,在所有这些不同种族当中土耳其人不是最有能力掌握统治权的,同时在居民这样混杂的情况下,统治权又不能不属于其中的一个民族。但是,我们看到,土耳其当局走上文明道路的一切尝试遭到了怎样可悲的失败——以几个大城市中的土耳其暴民为主要支柱的伊斯兰教狂热势力,总是在奥地利和俄国援助之下卷土重来并消灭任何可能取得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央即土耳其当局由于基督徒聚居省份的起义(由于土耳其政府的衰弱和邻邦的干涉,这些起义没有一次是毫无所获的)而一年年地削弱下去;我们看到,希腊取得独立,俄国占领部分亚美尼亚,而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相继归于俄国的保护之下,——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土耳其人在欧洲的存在是开发色雷斯—伊利里亚半岛的一切潜力的真正障碍。

很难称土耳其人是土耳其的**统治阶级**,因为那里社会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像各个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一样混乱。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情况下,土耳其人中有工人、农民、小自由农、商人、处于封建主义最低和最野蛮阶段的封建地主、官吏或军人;但是,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土耳其人都属于有特权的宗教和民族——只有他们才有携带武器的权利,而且即使是地位最高的基督徒,在遇见地位最低的穆斯林时也必须让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斯拉夫血统的贵族改宗了伊斯兰教,而一般群众仍然是莱雅^①,即基督徒。因此,在这一省份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吻合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和他们的土耳其血统教友的地位自然也是同等的。

① 莱雅是历史上奥斯曼帝国中的非穆斯林臣民,主要是信基督教的农民。——编者注

欧洲土耳其的居民(不算随时可以从亚洲吸收的后备)的主要支柱是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暴民。他们基本上是土耳其人,同时,尽管他们主要是靠给信基督教的资本家干活为生,但是他们仍然拼命维护自己想象中的优越地位和实际上的胡作非为不受惩罚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伊斯兰教特权赋予他们的,而基督徒是不能享有的。谁都知道,任何一次重要的政变,都必须用收买和恭维的手段来争取这些暴民。正是这些暴民构成了欧洲的一个坚不可摧的庞大的土耳其居民群(某些殖民区除外)。肯定迟早有这样一天,把欧洲大陆上最好地区之一从一群这样的暴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成为绝对无法避免之事,——同这些暴民相比,罗马帝国时代的暴民应该算是圣贤和英雄了。

至于其他民族,我们可以用三言两语就把阿尔璊特人谈完。阿尔璊特人是强悍的土著山民,他们居住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山坡地区,使用自己的语言,不过这种语言看来似乎属于大印欧语系。他们一部分是信希腊正教的基督徒,一部分是穆斯林;据我们所了解的各种情况来判断,他们对于进入文明还远远没有准备。他们的盗匪恶习会使任何一个毗邻地区的政府都不得不以军事手段对他们严加控制,除非他们将来由于周围地区工业的发展而能够当上伐木工和汲水工。西班牙的加列戈人¹²以及一般山区居民就是这样。

瓦拉几亚人,或称达科-罗马人,是多瑙河下游和德涅斯特河之间地区的主要居民,其成分非常复杂。他们都属于希腊正教教会,他们的语言源自拉丁语,在很多方面与意大利语不无相似之处。他们之中,特兰西瓦尼亚和布科维纳的居民是奥地利帝国的臣民,比萨拉比亚的居民则是俄罗斯帝国的臣民;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是达科-罗马种族取得政治存在的仅有的两个公国,都有自己的君主,他们名

义上是土耳其政府的藩臣，实际上受俄国的统辖。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我们在匈牙利战争时期已多有所闻。¹³瓦拉几亚人迄今一直受匈牙利地主的封建压迫，而匈牙利地主同时又按照奥地利制度充当政府进行各种勒索的工具；这些变得野蛮残暴的瓦拉几亚人，如同 1846 年加利西亚的卢西族¹⁴农奴一样，被奥地利人的种种许诺和小恩小惠收买，发动了一场焦土战争，把特兰西瓦尼亚变成一片荒漠。土耳其两个公国的达科-罗马人至少还有本族的贵族和政治机构；尽管俄国极力加以防范，革命精神还是渗透到他们中间，1848 年的起义¹⁵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从 1848 年以来在俄国占领下所遭受的种种勒索和痛苦，无疑会使这种革命精神更为增长，尽管共同的宗教和他们对沙皇—教皇制度的迷信使他们至今还把戴皇冠的希腊正教教主当作天然的保护人。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么瓦拉几亚民族在决定这些地区的最终命运方面，还可以起重要的作用。

土耳其境内的希腊人大部分是斯拉夫人后裔，但已改操现代希腊语。现在普遍认为，事实上，除了君士坦丁堡和特拉佩宗特的少数名门望族以外，甚至在希腊本土，纯血统的希腊人都已经很少见了。希腊人，和犹太人一起，在沿海口岸和许多内地城镇构成商人的大多数。在有些地区他们也种地。不管怎么说，除在帖萨利亚——也许还有伊庇鲁斯——以外，无论从人数和密集程度来看，还是从民族意识来看，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在政治上都是完全无足轻重的。君士坦丁堡的少数希腊名门望族由于当通事（译员）而具有的影响，在迅速下降，因为有土耳其人在欧洲受过教育，而欧洲各国使馆也都配备了能讲土耳其语的随员。

我们现在来谈谈在人口中占绝大部分并且凡是在种族混杂的地

方其血统都占优势的一个种族。这个种族实际上可以说构成了从摩里亚半岛到多瑙河、从黑海到阿尔瑞特山脉这一地带的基督教居民的主体。这个种族就是斯拉夫族,更确切说,是其中名为伊利里亚人或南方斯拉夫人的一个分支。继西方斯拉夫人(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和东方斯拉夫人(俄罗斯人)之后,它构成了1200年来居住在欧洲东部的人数众多的斯拉夫族的第三个分支。这些南方斯拉夫人不仅居住在土耳其大部分土地上,并且居住在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和南匈牙利。他们都讲同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同俄语非常相近,在西方人听来无疑是所有斯拉夫语言中最悦耳的一种。克罗地亚人和部分达尔马提亚人信奉罗马天主教;其余的都信奉希腊正教。罗马天主教徒使用拉丁字母,希腊正教徒书写时则使用俄语、古斯拉夫语或者说教会斯拉夫语也使用的基里尔字母¹⁶。这种与宗教信仰差异有关的情况,也妨碍着整个南方斯拉夫地区朝民族统一的方向发展。一个贝尔格莱德人也许不能阅读在阿格拉姆或贝奇^①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的书,他甚至可能拒绝把它拿在手里,因为那里面使用的是“异教的”字母和正字法。另一方面,他却可以毫不困难地阅读和理解在莫斯科用俄语出版的书,因为两种语言非常相似,特别是在古斯拉夫语语源的正字法方面;此外,还因为这种书是用“正统的”(正教的)字母排印的。大多数信希腊正教的斯拉夫人甚至不愿在本国印刷他们的圣经、祈祷文和祈祷书,因为他们深信凡是在神圣的莫斯科或在圣彼得堡的皇家印刷机构印刷的东西都特别正确、正统和圣洁。尽管阿格拉姆和布拉格的狂热分子¹⁷作了种种泛斯拉夫主义的努力,可是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的莱雅、

① 塞尔维亚人对维也纳的叫法。——编者注

马其顿和色雷斯的斯拉夫族农民，对俄罗斯人要比对讲同一种语言的信罗马天主教的南方斯拉夫人抱有更大的民族同情心，同他们有更多的接触点和更多的思想交往手段。不论发生什么事，他们总是指望从圣彼得堡来个救世主把他们从所有灾祸中解救出来，如果说他们把君士坦丁堡叫作他们的沙皇格勒或者说沙皇城，那么这既意味着他们期待正教沙皇从北方降临该城以恢复真宗真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怀念在土耳其人侵占这个地区以前统治该城的正教沙皇。

斯拉夫种族在土耳其大部分地区处于土耳其人的直接统治之下，但是由于地方政权是由他们自己选举的，而且他们部分地（在波斯尼亚）皈依了征服者的宗教，所以斯拉夫种族在这个地区有两个地方保持了或者说赢得了政治地位。其中之一就是塞尔维亚，即摩拉瓦河谷，这是一个有着极明显的天然边界的省份，600年前曾在这些地带起过重要的作用。1806年的俄土战争¹⁸使一度处于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塞尔维亚获得独立存在的机会，虽然最高权力仍然属于土耳其。从那个时候起，塞尔维亚就一直受俄国的直接保护。但是，同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一样，政治存在产生了新的需要，迫使塞尔维亚增加和西欧的交往。文明开始生根，贸易获得增长，新的思想产生，于是，在受俄国影响最大的中心堡垒，在斯拉夫的和正教的塞尔维亚，出现了一个由前财政大臣加腊沙宁领导的反俄的进步党派¹⁹（当然，它的改革要求是很低的）。

如果信希腊正教的斯拉夫居民一旦在他们居住并占总人口四分之三（700万人）的土地上成为主宰者，毫无疑问，同样的需要很快也会产生一个反俄的进步党派；这样的党派的存在，一直都是这些居民的任何一部分获得对土耳其的半独立地位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

黑山则不是拥有较大城市的肥沃的河谷，而是一个贫瘠的、交通

不便的山区。境内盗匪盘踞，他们到平原去抢劫，把抢来的东西藏在自己的山寨里。这些浪漫然而相当粗野的先生们很久以来一直是欧洲的一个祸害，而俄国和奥地利却维护黑山人焚毁村庄、杀戮居民和抢掠牲畜的权利，其实这和它们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3年3月11日—22日之间

载于1853年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36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卡·马克思

科苏特和皮尔斯将军。
——*流亡者和伦敦警察当局²⁰

特 约 通 讯

现在的“伯爵”普尔斯基由瓦斯伯爵和阿什博特先生(科苏特从前的秘书)陪同,已经抵达华盛顿,他们是科苏特派到总统皮尔斯将军那里去的使节。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揭发俄国在土耳其的秘密计划,同时要求皮尔斯使科苏特所期望的事情得到实现。作为总统喉舌的《纽约先驱报》已经说了:普尔斯基先生呆在家里也许更好。总统的就职演说²¹表明,科苏特所期望的事情是多么不现实。该使团的另一项秘密使命是要把费特尔将军争取回来,因为他在美国每到一处都表现出对科苏特深恶痛绝的态度。

流亡者和伦敦警察当局。——最近几天,警察当局逐街逐巷地搜集流亡者的资料——主要是向附近酒馆老板们打听。他们有时也在一些虚假借口之下闯入私人住宅,进行搜查。奥地利官方报纸《通讯》说,“好人阿伯丁”请求北方列强照顾面子,不要在流亡者问题上

公开施加压力,这样他就能照他们的意愿办事。针对诸如此类的表示,拿破仑说:“他会给英国以时间,让它表明它的诚意。”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3 月
22 日—24 日之间

载于 1853 年 3 月 26 日《人民
报》第 47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土耳其问题的真正症结²²

在目前东方问题的讨论中,英国报纸没有更大胆地阐明促使大不列颠认真地并坚决地反对俄国的兼并和扩张计划的根本利害关系之所在,对此我们感到吃惊。英国无法同意俄国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和波斯普鲁斯海峡。俄国如果占领这两个海峡,无论在贸易方面和政治方面,对英国实力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如果不是致命打击的话。这一点,只要概述一下英国和土耳其之间的贸易实况就清楚了。

在没有发现通往印度的直接通路以前,君士坦丁堡是广泛贸易的中心。就是现在,尽管印度的产品由陆路经波斯、图兰^①和土耳其运往欧洲,土耳其的港口仍然承担着同欧洲和亚洲内陆地区进行的十分重要的、迅速增长的贸易往来。只要看看地图就明白这一点了。从黑林山脉起,到大诺夫哥罗德的沙丘地带止的整个内陆地区,河流纵横,都汇入黑海或里海。多瑙河和伏尔加河这两条欧洲大河,以及德涅斯特河、第聂伯河和顿河,都是从内陆地区把产品运往黑海的天然渠道。我们说运往黑海,因为黑海也是通往里海的必由之路。三分之二的欧洲,即德国和波兰的部分地区、整个匈牙利、俄国最肥沃

① 突厥斯坦低地的旧称。——编者注

的地区以及整个欧洲土耳其,在出口和产品交换方面都自然同攸克辛海息息相关,尤为重要,这些国家主要是农业国,大量产品的运输必然以水运为主。匈牙利、波兰和南俄的粮食、羊毛和皮革在我们西方市场上数量与年俱增,这些产品全部都是在加拉茨、敖德萨、塔甘罗格和攸克辛海其他港口装船运来的。此外,在黑海上还有一种重要的贸易。君士坦丁堡,特别是在亚洲土耳其的特拉佩宗特,是同亚洲内地,同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同波斯和突厥斯坦进行商队贸易的主要中心。这种贸易也在迅速增长。希腊和亚美尼亚的商人从上述两个城市运进大量的英国工业品,这些工业品价格低廉,因此迅速地排挤着亚洲妇女的家庭手工业品。特拉佩宗特由于地理关系,比其他地方更适于进行这种贸易。它的后方接连着亚美尼亚高地,这里较之叙利亚的沙漠好走多了,而且距巴格达、设拉子和德黑兰相当近;德黑兰则是来自希瓦和布哈拉的商队的贸易地点。这一种贸易和整个黑海贸易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可以在曼彻斯特的交易所里耳闻目睹,在那里,皮肤黝黑的希腊进货商人越来越多,他们开始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那里,希腊语、南方斯拉夫语和德语、英语的讲话声交织在一起。

特拉佩宗特的贸易也正成为极其重大的政治性问题,因为它是俄国和英国在亚洲内地的新的利害冲突之源。在1840年以前,俄国人在这个地区几乎一手垄断了外国工业品的贸易。俄国商品已在远至印度河流域的地区打开了销路,有时甚至比英国商品还受欢迎。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在阿富汗战争以及信德和旁遮普被征服²³以前,英国同亚洲内地的贸易几乎等于零。现在情况不同了。不断扩大贸易的极端必然性这个注定的命运像幽灵一样追逼着现代的英国,如果不能马上使它追逼得缓和一点的话,那么它就会从纽约到广州、从

圣彼得堡到悉尼引起可怕的震荡。这种无法改变的必要性，逼着英国的贸易从印度河和黑海这两个方面同时打进亚洲内地。我们虽然对于俄国向这个地区的出口额知道得很少，但仍然可以从英国向这些地区的输出增加这一事实中有把握地断定，俄国在那里的贸易恐怕是大大缩减了。英国和俄国之间的贸易战场从印度河流域转移到了特拉佩宗特；先前曾经直抵东方英帝国边界的俄国贸易，现在已退居守势，收缩到它本国的海关线的边沿地带。这一情况对东方问题将来的解决，以及英国和俄国对待此事的态度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两个国家在东方势必永远是死对头。

现在让我们更具体地来看看黑海的贸易。据伦敦杂志《经济学家》统计，不列颠向土耳其领地，包括埃及和多瑙河两公国的出口总值如下①：

1840年	1 440 592 英镑
1842年	2 068 842 英镑
1844年	3 271 333 英镑
1846年	2 707 571 英镑
1848年	3 626 241 英镑
1850年	3 762 480 英镑
1851年	3 548 959 英镑

在这些总额中，黑海各港口，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至少要占三分之二。而整个不断迅速增长的贸易，都决定于控制着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两个黑海咽喉的国家是否可靠。谁掌握着这两个海峡，谁就可以随意开放和封锁通向地中海的这个遥远角落的

① 1853年3月12日《经济学家》第498期。——编者注

通道。如果俄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谁还能指望它会敞开这些大门，让英国像过去一样闯入俄国的贸易范围呢？

这就是土耳其特别是达达尼尔海峡在贸易上的意义。很明显，货物经过这些黑海的大门是否完全自由，不仅决定着十分广泛的贸易的命运，而且决定着欧洲和中亚之间的基本联系的命运，从而也就决定着在这个广大地区恢复文明的基本手段的命运。

现在让我们从军事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在贸易上的重要性使它们同时也成为头等的军事要地，成为在任何战争中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重地，其地位同直布罗陀和松德海峡的赫尔辛格类似。但是达达尼尔海峡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甚至更为重要。直布罗陀或赫尔辛格的炮火不能控制所在海峡的全部地区；要完全封锁海峡，还要借助于舰队。而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却很狭窄，只要在适当的地方构筑若干设备完善的堡垒（俄国一旦占领海峡，马上就会这样做），就可能挡住企图通过海峡的全世界联合舰队。这样一来，黑海就会成为俄国的内湖，甚至位于俄国腹地的拉多加湖也比不上它；高加索人的反抗也马上就会因饥饿而中止；特拉佩宗特就成了俄国的港口，而多瑙河就成了俄国的河流。此外，土耳其帝国丧失君士坦丁堡之后就会被分成两部分：亚洲土耳其和欧洲土耳其，这两部分将无法彼此沟通或相互支援，而被迫退到亚洲的土耳其军队的主力将完全不起作用。征服者就可以毫不困难地征服马其顿、帖萨利亚、阿尔巴尼亚，因为这些地区已被包围，与主力隔绝，它们除了求饶和请求派兵维持国内秩序之外，别无他路可走。

然而，这个如此庞大、如此大事扩张的国家，为了实现它成为世界帝国的野心已经走了这样远，难道会在半路上止步吗？即使它愿

意这样做,形势也是不允许的。兼并了土耳其和希腊,它就可以获得优良的海港,而且还可以从希腊人当中获得海军所需要的能干的水兵。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它就站到了地中海的门槛上;控制了都拉斯和从安蒂瓦里到阿尔塔的阿尔巴尼亚沿海地区,它就可以进入亚得里亚海的腹地,窥伺着不列颠的伊奥尼亚群岛,并且只须 36 小时的航程即可到达马耳他岛。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奥地利领地,俄国就可以把哈布斯堡王朝视为自己的藩属了。这样,另一个问题也可能产生,甚至很可能产生。这个帝国的西部边界线将变得犬牙交错,弯弯曲曲,同自然边界不一致,这样就要修改边界,于是俄国的自然边界就将从但泽或者斯德丁走向的里雅斯特了。一次征服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征服,一次兼并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兼并,所以俄国征服土耳其只不过是兼并匈牙利、普鲁士、加利西亚和最终建立某些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哲学家所梦寐以求的斯拉夫帝国的序幕而已。

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一百年来就是这样,直到 1789 年的伟大运动才给它产生了一个充满强大生命力的严峻敌人。我们指的是欧洲革命、民主思想的爆炸力量以及人生来就有的自由要求。从这个时候起,欧洲大陆实际上只存在着两种势力:一种是俄国和专制,一种是革命和民主。现在,革命似乎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活着,人们还非常怕它,就像过去一直非常怕它一样。不久前的米兰起义²⁴使反动派惊慌万分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俄国如果占领了土耳其,它的力量几乎会增加一半,它就会比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还要强大。如果事态这样发展,对革命事业将是一种莫大的灾难。维护土耳其的独立或在奥斯曼帝国可能解体之际粉碎俄国的兼并计划,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民主派和英国的利益是相符的,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能让沙皇

把君士坦丁堡变成自己的一个首府。所以我们将看到,如果被逼得无路可走的话,这两种势力将给沙皇以同样坚决的抵抗。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3 月
23—24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4 月 1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4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伦敦的报刊。——拿破仑在土耳其问题上的政策²²

1853年3月25日于伦敦

直至今晨尚未得到来自土耳其的任何新的可靠消息。《先驱晨报》驻巴黎通讯员在今天的报上报道，他从权威方面获悉，俄军已经进入布加勒斯特。在本月20日的《马赛信使报》上我们读到：

“我们可以向读者报道一下，莱宁根伯爵刚离开以后和缅施科夫公爵粗暴无礼地‘大闹’土耳其帝国国务会议以前，奥泽罗夫先生向土耳其政府递交的照会有些什么重要内容。这项外交照会涉及的主要之点如下：涅谢尔罗德伯爵以无比激烈的言词指责土耳其政府违背其不侵犯黑山人的正式诺言，对他们进行流血战争，并称此事已引起圣彼得堡当局的极大不满。现在，为了保证黑山人得到应有的保护并使他们免于新的灾难，俄国愿提请土耳其政府承认黑山的独立²⁵。照会中还抗议对阿尔巴尼亚海岸的封锁，照会在结尾部分强烈要求苏丹①把那些做事总是使两国政府之间产生误会的大臣免职。据称，土耳其接到这一照会后，对其中一点表现出让步之意，尽管很勉强。这一点就是把几名大

①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臣,其中包括苏丹的姻亲傅阿德埃芬蒂免职,他的职务现已由亲俄的利法特帕沙^①接替。然而土耳其政府拒绝承认黑山的独立。于是缅施科夫公爵没有按通常礼仪事先拜会外交大臣,而违反一切外交惯例,径直闯到国务会议上去,气势汹汹地要会议接受他的要求。结果,土耳其政府就向英国和法国请求保护。”

在古希腊,如果一个演说家被人用钱收买而不说话了,人们就说他舌头上有了牛。这里要说明一下,牛就是指来自埃及的银币²⁶。对于《泰晤士报》,我们可以说,在东方问题重新产生以来的整个这个时期,它的舌头上也有了牛,——如果说这不是为了迫使它不说话,那至少是为了迫使它说话。起初,这家善于发明创造的报纸借口问题涉及基督教而为奥地利干涉黑山事务的行为辩护。但是后来俄国进行干涉时,这家报纸就抛弃了这个论据,说全部问题只是希腊正教和罗马天主教教会之争,与英国国教“教民”毫不相干。然后,它大谈同土耳其的贸易对大不列颠的重要意义,并且正是由这种重要意义推论说,如果舍弃同土耳其的自由贸易去换取俄国的禁止性关税和奥地利的保护关税,这对大不列颠只会有利。接着,《泰晤士报》极力证明,英国的食品靠俄国供应,因此英国应当默认沙皇^②的地理观念。这对《泰晤士报》所颂扬的贸易体系来说,是多么动听的赞美!为了减轻英国对俄国的依赖,黑海应当成为俄国的内湖,多瑙河应当成为俄国的内河,——这是多么入耳的论据啊!当《泰晤士报》这种站不住脚的论点被驳倒之后,它又退回到那种笼统的说法,即土耳其帝国的崩溃已经不可挽回,而这一点,在《泰晤士报》看来,就是俄国不久必将成为这个帝国的遗嘱执行人和继承人的决定性的论据。接

① 帕沙是苏丹土耳其帝国军政大员的称号。——编者注

②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着《泰晤士报》要土耳其的居民接受俄国和奥地利的“绝无恶意的支配”和文明的影响，它记得智慧来自东方这句古语，而忘了它自己不久前说过的话：“奥地利在其本帝国境内各省和各王国所维持的局面就是：独断专行，滥施暴政，完全不受法律约束。”最后，《泰晤士报》竟然无耻之极地为自己发表的有关东方问题的“见识高超”的社论^①而自我祝贺一番！

伦敦的整个报界，晨报和晚报，日报和周报，对这家“头号大报”异口同声地群起而攻之。《晨报》讥笑它的《泰晤士报》同行们的才智，指责他们传播蓄意伪造的荒谬新闻。《先驱晨报》把《泰晤士报》叫作“当代犹太—奥地利—俄罗斯名报”。《每日新闻》则更简单地把它叫作“布伦诺夫的喉舌”^②。《泰晤士报》的孪生兄弟《纪事晨报》给了它如下的一击：

“这些为了十来家英国希腊合资公司生意兴隆而提议把土耳其帝国拱手让给俄国的报界人士，完全有理由独享见识高超之美誉。”^③

《晨报》写道：

“《泰晤士报》说它在维护俄国的利益方面受到孤立，这说对了…… 这家报纸是用英文刊印的。但是只有这一点是英国的东西。只要问题涉及俄国，它就是彻头彻尾的俄国报纸了。”^④

毫无疑问，俄国熊不会缩回自己的爪子，除非它确信英国和法国

① 1853年3月25日《泰晤士报》第21385号社论。——编者注

② 1853年3月25日《先驱晨报》第22115号和1853年3月23日《每日新闻》第2133号。——编者注

③ 1853年3月24日《纪事晨报》第26910号。——编者注

④ 1853年3月24日《晨报》第19267号。——编者注

之间有了暂时的友好协约²⁷。现在请注意下面这件绝妙的巧合。就在《泰晤士报》试图使阿伯丁阁下和克拉伦登阁下相信土耳其事件纯粹是法俄之间的争吵的当天，常被基佐称作“丑角大王”的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先生也在《立宪主义者报》上碰巧发现：整个这件事不过是帕麦斯顿勋爵和沙皇之间的争吵。^①的确，读了这些报纸，我们也就能够认识狄摩西尼发表痛斥非力浦的演说的时代那些舌头上有马其顿“牛”的希腊演说家们的面貌了。

至于以联合内阁为代表的²⁸不列颠贵族，只要他们觉得需要，就会牺牲英国的民族利益来满足他们特殊的阶级利益，让东方羽毛未丰的专制制度得到加强，以期为他们在西方的虚弱的寡头政治赢得支持。路易-拿破仑则摇摆不定，他对那位专制君主十分偏爱，并把他的政体引进法国；他对英国十分反感，并在法国废除了它的议会制度。而且，他如果容许沙皇在东方掠夺，沙皇就可能容许他在西方掠夺。另一方面，他也很清楚神圣同盟对他这个“暴发户可汗”所抱的感情。因此，他采取模棱两可的政策，力图像他过去愚弄法国国民议会的各党派一样来愚弄欧洲列强。他一面同英国驻土耳其大使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做出非常亲热的样子，同时又虚伪地向俄国的利文公爵夫人大献殷勤，大许其愿，并把狂热鼓吹奥法同盟而反对英法同盟的德拉库尔先生派到苏丹宫廷去。他命令土伦舰队开入希腊领水，而第二天却在《通报》上宣布这一举动事先并没有同英国交换过任何意见。他一面要他的喉舌之一《国家报》把东方问题当作对法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一面又允许他的另一喉舌《立宪主义者报》发表这样的言论，即东方问题对俄国、奥国和英国是利害攸关

^① 阿·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东方事件》。——编者注

的,而同法国的利益却干系很少,因此法国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地位。俄国和英国哪一家会出价更高?他将待价而沽。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3月
25日

载于1853年4月11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3739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弗·恩格斯

土耳其问题²⁸

西欧和美国的公众只是最近才能够多少正确地判断土耳其的事情。土耳其在希腊起义²⁹以前,实际上是一个“未被认识的领域”,通常在公众当中流行的那些观念,多半是根据《一千零一夜》式的故事,而不是根据历史事实。一些到过土耳其的外交官员吹嘘自己对该地有比较确切的了解,但是这种了解也几乎等于零,因为这些官员谁也没有下功夫学习一下土耳其语、南方斯拉夫语或现代希腊语,他们全都是希腊译员和西欧商人的偏颇报道为凭。而且,这些无所事事的外交家们总是把时间花费在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上面。他们当中只有德国研究土耳其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冯·哈麦尔是一个可嘉的例外。这些先生对该国的人民、制度和社会状况不感兴趣,只同宫廷、特别是同法纳尔的希腊人³⁰往来,这些希腊人是双方之间的狡猾的中介人,而双方都同样不了解对方的实际情况、力量和潜力。从这样一些没有价值的情报中得出的传统观念和见解,长期以来都是西方外交界对土耳其采取的一切行动的依据,而且,说也奇怪,直到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这样。

但是,当英国和法国(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还有奥地利)还在黑暗中摸索、设法确定自己的东方政策的时候,另一个强国却狡猾地把

它们全都胜过了。在本身具有半亚洲式的条件、风俗、传统和制度的俄国,有相当多的人能够了解土耳其的真实情况和特性。俄国人和十分之九的欧洲土耳其居民信奉同一宗教;俄国人的语言同 700 万土耳其国民的语言几乎完全一样;而且大家都知道,俄国人是善于学习外国语的(尽管也许没有完全掌握它),这就使报酬优厚的俄国代理人能够毫不困难地完全通晓土耳其的事务。而俄国政府也老早就利用了自己在东南欧极其有利的地位。数以百计的俄国代理人周游土耳其各地,向信希腊正教的基督徒指出,正教皇帝是被压迫的东正教教会的首领、天然的保护人和最终解放者;他们特别向南方斯拉夫人指出,这位正教皇帝,这位全能的沙皇,迟早会把大斯拉夫族的所有分支统一在一个王权之下,并且使它们成为欧洲的统治种族。希腊正教教会的教士很快就拟定了散布这种思想的大阴谋。俄国的金钱和俄国的影响或多或少直接促成了 1804 年塞尔维亚的起义³¹和 1821 年的希腊起义。无论在哪里,只要土耳其的帕沙举起反对中央政府的反叛的旗帜,从来都少不了俄国人在背后出谋划策和给予资助。这样,当土耳其国内问题把那些对土耳其的真实情况了解得并不比对月球上的人了解得更多的西方外交家搞得晕头转向、茫然不解的时候,战争已经宣布,俄国军队已经向巴尔干挺进,奥斯曼帝国已经被一块一块地瓜分了。

不错,近 30 年来在普遍介绍土耳其状况方面作了许多努力。德国的语文学家 and 评论家向我们介绍了土耳其的历史和文学,英国侨民和英国商人也收集了许多有关这个帝国的社会状况的资料。但是,外交界那些自作聪明的人看来对这一切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顽固透顶地死抱住传统见解不放,这些见解是从研读东方神话故事得来的,并且是经世界上最腐败的一小撮被雇用的希腊人用同样荒

诞的无稽之谈加过工的。

自然的结果如何呢？结果是：由于西方各国政府的愚昧无知、迟钝呆笨以及因此而表现出的自相矛盾和畏首畏尾，俄国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相继地一一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纳瓦里诺会战³²起，到现在的东方危机止，西方列强的行动不是被他们相互间的争吵所瓦解（发生这些争吵大半是由于它们都对东方情况茫然无知，也由于那种对东方人来说完全不可理解的无谓的猜忌），就是全然为俄国的直接利益服务。于是，不仅希腊人（住在希腊和住在土耳其的都包括在内）和斯拉夫人都认为俄国是他们的天然保护人；而且，连君士坦丁堡的政府，这个因无法使西方各国使节——他们以根本不能用自己的眼睛判断土耳其事务为荣——了解它的真正需要和实际情况而一次又一次感到失望的土耳其政府，也不得不一再向俄国乞怜，请求这个强国保护，虽然这个强国公然宣称它决心要把所有土耳其人赶出博斯普鲁斯海峡，并把圣安德烈十字架竖立在圣索菲娅清真寺的尖塔上。

尽管西方外交界恪守传统，俄国的这些连连得手的侵略行为终于使西欧各国当局模模糊糊地感到了正在迫近的危险。这种感觉产生了一种伟大的外交上的万应灵药：让土耳其维持现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句格言最明显不过地暴露了某些夸夸其谈掩饰自己无能的当代政界人物的愚昧无知和束手无策。维持现状这句话虽然一直是有名无实，在短短的20年间却被传统奉为神圣，就像约翰王的大宪章³³那样备受崇敬和不容争辩。维持现状！噢！就是为了维持现状，俄国才挑起了塞尔维亚的起义，使希腊独立，攫取了对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保护权并把亚美尼亚的一部分把持在自己手里！对发生的这一切，英国和法国都熟视无睹。它们仅有的

一次行动,是在1849年保护了匈牙利流亡者,而不是保护土耳其。³⁴在欧洲外交界看来,甚至在欧洲的报界看来,整个东方问题的结局,只能是二者择一:不是俄国人坐镇君士坦丁堡,就是维持现状。除此以外,他们脑子里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我们不妨拿伦敦的报刊来说明。我们看到,《泰晤士报》主张瓜分土耳其,并且宣布土耳其种族已不宜再统治欧洲的这一块好地方了。《泰晤士报》以它一贯的熟练技巧,大胆抨击维持现状这种旧的外交传统,宣称继续维持现状是不可能的。这家报纸使出了它的全部才能,从各方面证明这种不可能,并且极力敦促英国人赞同对萨拉森人^①的末代后裔进行新的十字军征讨。不可否认,《泰晤士报》对它两个月前还奉为神圣的一句长期备受尊崇的空话进行这样肆无忌惮的攻击是有功的。但是了解这家报纸的人也都知道,这种异乎寻常的大胆行为是直接为俄国和奥地利的利益效劳的。《泰晤士报》提出的完全不可能维持土耳其现状的正确论据,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英国公众和全世界作好思想准备,等候彼得大帝遗嘱³⁵中最重要的一点——征服波斯普鲁斯海峡——成为事实的那一天到来。

自由派的机关报《每日新闻》则代表相反的观点。《泰晤士报》至少抓住了问题的新的正确的一面,尽管目的是为了接着把它加以歪曲,以达到自私的目的。而在自由派的报纸上占主导地位的则是一种最浅显的观念,但也只是一种家常的观念。确实,它的眼光超不出它自己的家门。它知道得很清楚,在现在的情况下瓜分土耳其肯定会使俄国人进入君士坦丁堡,这将是英国莫大的不幸,世界和平将受到威胁,黑海的贸易将被破坏,地中海的不列颠基地和舰队势必要进

① 阿拉伯人的古称。——编者注

一步加强战备。因此,《每日新闻》极力要激起英国公众的愤慨和恐惧。瓜分土耳其的罪行不是同瓜分波兰³⁶一样吗?基督徒在土耳其不是比在奥地利和俄国享受到更多的宗教自由吗?土耳其政府难道不是一个允许不同的民族、教派和地方机构自己治理自己事务的温和的、慈父般的政府吗?土耳其比起奥地利和俄国来不是天堂吗?生命和财产在那里不是很安全吗?不列颠同土耳其的贸易不是比同俄国和奥地利的贸易加在一起还多,而且这个贸易不是每年都在增长吗?接下去就以狂热赞美的语调(以《每日新闻》能达到的最狂热的程度)颂扬土耳其、土耳其人和土耳其的一切,把它的大多数读者都弄得莫名其妙。

对土耳其人为什么要表示这样出奇的热情,这可以从下院议员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著作^①中找到答案。这位出生于苏格兰的绅士,受过他家乡中世纪宗法思想的熏陶,又受到现代英国的文明教育,他在希腊同土耳其人打过三年仗以后到了土耳其,一变而为土耳其的最狂热的崇拜者。这位浪漫的苏格兰高地人生活在品都斯山脉和巴尔干山脉的峡谷之中,感到好像重回家乡一样。他的有关土耳其的著作(虽然里面也有许多宝贵的资料)可以归纳成三点奇谈怪论,下面几乎就是他的原话:如果乌尔卡尔特先生不是不列颠的臣民,他会毅然决然地选择当个土耳其人;如果他不是长老会加尔文派教徒,他就只会信伊斯兰教;第三,英国和土耳其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可以享有自治以及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国家。正是这位乌尔卡尔特从此就成为所有反对帕麦斯顿的英国自由派心目中的东方问题

① 此处显然是指戴·乌尔卡尔特的《土耳其及其资源》1833年版和《东方的精神》1838年版。——编者注

大权威。《每日新闻》上那些颂扬土耳其的材料就是他提供的。

这样对待问题的论据,只有一条值得注意一下,这个论据是:“有人说,土耳其正在衰落。但衰落表现在哪里呢?难道在土耳其文明不是在迅速传播,贸易不是在扩大吗?在你们只看到衰落的地方,我们的统计资料却恰恰证明了进步。”但是,如果把黑海贸易的蒸蒸日上只归功于土耳其,那就大错特错了,然而这里人们正是这样做的。这无异于用荷兰这个作为通向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的通道的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其中十分之九不过是过境贸易)来衡量它的工业和贸易的发展能力。如果这样看荷兰,任何一个统计学家都会马上认为这是一种拙劣的杜撰,而所有英国的自由派报刊,包括学术刊物《经济学家》在内,却企图要轻信的公众这样看土耳其。再者,谁在土耳其进行贸易呢?当然不是土耳其人。当他们还处于原始的游牧状态时,他们发展贸易的方法就是抢劫商队,而现在,当他们稍许文明一点的时候,则是各种各样的横征暴敛。在一些大海港立足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斯拉夫人和西欧人掌握了全部贸易,他们当然没有理由因为能从事贸易而感谢土耳其的贝伊^①和帕沙。把所有土耳其人赶出欧洲,贸易也决不会受到损害。至于谈到一般的文明进步,那么在欧洲土耳其的所有地区实现这种文明进步的是谁呢?不是土耳其人,因为他们人数很少;除了在君士坦丁堡和两三个不大的农业地区之外,恐怕很难说他们还有哪些定居地点。各城市和商埠的希腊和斯拉夫中等阶级才是有效地输入这个国家的任何一种文明的真正支柱。这部分居民越来越富,影响越来越大,土耳其人则越来越被排挤到后面去。假如土耳其人不是垄断了军政权力,他们很快就会不复存在。

^① 贝伊是土耳其旧时小藩臣的称号。——编者注

但是这种垄断在将来就不可能有了,土耳其人将由强变弱,只能成为进步的绊脚石。事实说明,必须摆脱土耳其人。说什么要摆脱他们就只有让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取代他们的位置,那就等于说,欧洲现在的政治格局将永远保持下去。可是谁能够这样断言呢?

弗·恩格斯写于1853年3月
25日—31日之间

作为社论载于1853年4月1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4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卡·马克思

柏林密谋²⁸

1853年4月1日星期五于伦敦

第五“大国”普鲁士终于有机会荣幸地为奥地利警察当局对革命者“蛊惑阴谋”的大揭发³⁷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普鲁士的官方报纸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政府在得到民主派领袖经常参与革命宣传的证明后，下令于3月29日在柏林进行住宅搜查，并且逮捕了40人，其中有施特雷克富斯和普鲁士国民议会前议员贝伦兹、瓦尔德克等人。对80个涉嫌参加密谋的人的家进行了搜查，查获了武器和弹药。”^①

普鲁士政府不可以在自己的官方报纸上公布这些“令人震惊的事实”为满足，它认为还应该把这些事实电告英国外交部。

为了揭穿警察当局这出新的闹剧的秘密，有必要追溯一下前些时候的事情。在波拿巴政变两个月之后，柏林警察总监欣克尔代先生和他的下属警务顾问施梯伯先生两人在一起秘密商定：一个当普鲁士的莫帕，另一个当普鲁士的皮埃特里。看来，法国警察当局的辉煌的无上权力使他们艳羡不止。欣克尔代去找内务大臣冯·威斯特

① 1853年3月31日《晨邮报》第24734号。——编者注

华伦先生,向这位愚蠢而又狂热的反动分子(冯·威斯特华伦先生是我的内兄,所以我有机会充分了解此人的智力)提出了一个无理的主张,即必须由这位柏林警察总监掌握普鲁士国家的全部警察权力。他说,为了使警察当局的行动更加快速灵敏,应该使它不受内务大臣的管辖而完全交给他掌管。内务大臣冯·威斯特华伦代表极端的普鲁士贵族,而首相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则代表旧官僚;他们两人是政敌。所以尽管欣克尔代的建议显然会缩小冯·威斯特华伦先生的部门的活动范围,后者却认为这样做可以打击自己的政敌(因为他的政敌的弟弟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在内务部当内务副大臣,专门负责掌管整个警察事务)。因此,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就把欣克尔代的建议呈交由国王^①亲自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

争论异常激烈。得到普鲁士亲王支持的曼托伊费尔,反对成立一个独立的警务部的计划。国王则倾向于冯·威斯特华伦先生的建议。最后,国王作出了一个所罗门式的判决,说“如果种种事实向他证明采取这个步骤是必要的”,他就效法波拿巴成立一个警务部。于是,科隆共产党人案件³⁸就被欣克尔代和施梯伯选来作为一个这样的事实。他们在科隆案件中的英雄业绩,读者都已知道了。科隆案件结束后,普鲁士政府曾决定把这位在科隆街上一露面就挨嘘的、公然作伪证的施梯伯提升为科隆警察局长。但是,贝特曼-霍尔韦格先生和莱茵普鲁士的其他好心的保守派议员进行了干涉,他们警告大臣们说,当波拿巴正在极力要求法国天然边界³⁹的时候,这种公然触犯这个省的社会舆论的做法会产生极危险的后果。政府作了让步,任命施梯伯为柏林警察局长,以奖励他在科隆的作伪证行为和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伦敦的盗窃勾当。而事情也就到此告一段落。以科隆案件为理由来实现欣克尔代先生的愿望,即为他建立一个独立的警务部,已经不可能了。欣克尔代和施梯伯在等待时机。这时,幸好发生了米兰起义²⁴。施梯伯马上在柏林进行了20起逮捕。但是,这件事做得太滑稽了,无法开庭审判。然而接着又发生了李贝尼事件³⁷,这样一来,国王终于下了决心。胆战心惊的国王马上认为必须成立一个独立的警务部,欣克尔代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国王一纸令下,使他成了普鲁士的莫帕,而冯·曼托伊费尔先生的弟弟也就提出了辞呈。但是,这场滑稽剧的最惊人的一幕还在后头。欣克尔代先生刚一走马上任,立即又揭露出一个“柏林大密谋”。可见,这个密谋是专为证明欣克尔代先生的必要而安排的。这是欣克尔代先生用以交换自己刚刚到手的警察大权而献给昏庸的国王的谢礼。欣克尔代的助手,善于动脑筋的施梯伯,过去在科隆就曾经发现,凡是结尾有“敬礼”和“兄弟情谊”字样的信,毫无疑问都证明存在共产主义密谋,现在他又发现,一个时期以来在柏林出现了多得可怕的“卡拉布里亚帽”,这种卡拉布里亚帽毫无疑问是革命者的“暗号”。根据这个重要发现,施梯伯在3月18日逮捕了一些人,主要是工人和外国人,其罪名就是戴了卡拉布里亚帽。同月23日又搜查了马格德堡的一个商人卡尔·德利乌斯(下议院一个议员的兄弟)的住宅;这个人对于卡拉布里亚帽也有一种倒霉的爱好。最后,正如我在这篇通讯的开头向你们报道的,上月29日在柏林举行了反对卡拉布里亚帽的伟大政变。凡是多少知道一点瓦尔德克、贝伦兹等这些软弱无力的反对派的人,都会为在这些不侵害任何人的布鲁士斯的家里搜出“武器和弹药”而大笑不止。

但是,不管警察当局的这场可以说是由欣克尔代和施梯伯两位先生出于纯粹的个人动机而排演的滑稽剧看起来是多么无聊,它却

不是没有意义的。普鲁士政府由于处处碰到消极反抗而大为恼火。它在表面上冷漠的气氛中嗅到了革命的气息。它由于捉摸不到这个幽灵的实在形状而感到失望,因此每当警察当局给它找到这个无所不在而又看不见的敌人的化身时,它就感到好像摆脱了一场恶梦。政府正在进攻,它今后还要继续进攻,它将成功地把人民的消极反抗变为积极反抗。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4 月 1
日

载于 1853 年 4 月 18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374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弗·恩格斯

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⁴⁰

我们看到，欧洲的政界要人们由于不可救药的愚昧无知、相沿成习的因循守旧和世代相承的思想懒惰，都根本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阿伯丁和帕麦斯顿，梅特涅和基佐，都对解决这个问题不抱任何希望，至于 1848—1852 年时期他们的那些永远不会被后世提起的共和派和立宪派后继者就更不用说了。

而与此同时，俄国却在一步一步地、慢慢地然而不可阻挡地向君士坦丁堡进逼，全然不把法国和英国的一切外交照会、一切计谋和手腕放在眼里。

欧洲所有国家的所有党派虽然都承认俄国节节挺进的事实，官方的政界要人们却从来没有对此加以解释。他们看到它的影响，他们甚至看到它的最终后果，但是其原因何在，他们却不知道，尽管事情再也简单不过。

推动俄国向君士坦丁堡迅速挺进的强大动力，正是原来想借以阻止它这样做的那个办法，即空幻的、从来没有实现过的维持现状的理论。

这种现状是什么呢？对于土耳其政府管辖下的基督教臣民来说，这无非是意味着使他们永远受土耳其的压迫。而他们只要仍然

处在土耳其统治的压迫下，希腊正教教会的首领，6 000 万信希腊正教的基督徒的统治者（不管他在其他方面怎样）就是他们的**天然的解放者和保护者**。这样一来，原先为了防止俄国侵略而发明的外交体制，反而迫使欧洲土耳其的 1 000 万信希腊正教的基督徒向俄国求援。

我们且来看看历史事实。早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以前，俄国就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来取得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特惠。这些优惠最后在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 年）⁴¹中得到了极为详尽的规定，以致上述两个公国目前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制于俄国，而不是土耳其。当 1804 年爆发塞尔维亚革命³¹的时候，俄国马上出来保护起义的莱雅，在两次战争中支持他们，然后又在两个条约中保障了他们国家的内政独立⁴²。当希腊人举行起义的时候，是谁决定了斗争的结局呢？不是亚尼纳的阿里帕沙的阴谋和叛乱⁴³，不是纳瓦里诺会战³²，不是在摩里亚登陆的法国军队⁴⁴，不是伦敦的那些会议和议定书，而是吉比奇率领的越过巴尔干山脉进入马里查河谷地的俄国军队。⁴⁵而当俄国如此无所顾忌地动手肢解土耳其的时候，西方的外交家们却仍然在维护现状和奥斯曼帝国领土的不可侵犯，把它们奉为神圣！

只要西方外交界仍然把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和维持土耳其目前状态下的独立这一传统当作他们的指导原则，欧洲土耳其十分之九的居民就始终会把俄国看作他们唯一的靠山，他们的解放者，他们的救世主。

现在暂且假定，土耳其在讲希腊语的斯拉夫人的半岛上的统治结束，那里出现一个比较符合人民需要的政府，那么，俄国的地位会怎样呢？以下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在土耳其境内出现的每一个取

得完全独立或部分独立的国家，都组成了强大的反俄党派。如果说，在俄国的援助是他们挣脱土耳其压迫的唯一靠山的时候情况尚且如此，那么对土耳其压迫的恐惧一旦消失，又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可是，如果把土耳其的统治排挤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东，如果让巴尔干半岛上的各个不同的教派和民族获得自由，如果让欧洲列强的各种计划和阴谋、各种互相冲突的愿望和利益都畅行无阻，难道不会引起一场大战么？——胆小怕事和因循守旧的外交界这样问道。

当然，不能指望帕麦斯顿们、阿伯丁们、克拉伦登们和大陆上的外交大臣们会做这样的事。他们一想到这种事就不寒而栗。但是，每一个人，只要他用心研究历史，体味到人间事物的永不停息的变迁，懂得除不固定本身外万事皆不固定，除变化本身外万物皆变幻无常；每一个人，只要他追踪历史的不可阻挡的进程，看到历史的车轮怎样无情地驰过一个个帝国的废墟，毫不怜惜地把一代代人整个碾为齑粉；简言之，每一个人，只要他不是闭眼不看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蛊惑的号召和谋叛的宣言都不能像平凡而简单的人类史料那样起着革命作用；每一个人，只要他知道如何认识我们时代的异常革命的性质，——在这个时代，蒸汽和风力、电力和印刷机、大炮和金矿的开发合在一起在一年当中引起的变化和革命要多过以往整整一个世纪，——每一个这样的人，都一定不会由于考虑到一个历史性问题的正当解决可能引起一场欧洲战争而不敢正视这个问题。

不，按老办法行事的外交界和各国政府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土耳其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一起，都要留待欧洲革命来解决。把这个乍看起来好像是不太相干的问题也归入这个伟大运动的领域决不是一种武断。从1789年起，革命的界标就一直在向前移动。革命的前哨最后已经到了华沙、德布勒森、布加勒斯特；下一次革命的

前哨必将是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俄国反革命的庞然大物必将在这两个薄弱之点受到攻击。

要拟定一个分割欧洲土耳其领土的详尽的规划，那是徒劳的幻想。这样的规划可以想出 20 种，每一种看来都同其他 19 种一样可行。但我们要做的，不是制定空幻的计划，而是从无可辩驳的事实中寻求普遍的结论。从这一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

首先，这个通常叫作欧洲土耳其的半岛是南方斯拉夫种族的天然继承物，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这个种族在欧洲土耳其 1 200 万居民中占 700 万人。它占有这块土地已有 12 个世纪之久。如果我们把讲希腊语而实际上是斯拉夫族后裔的极少数居民除外，只有土耳其或阿尔璁特族的蛮人是斯拉夫人的竞争对手。这些蛮人早就被斥为仇视一切进步的死敌。相反，南斯拉沃尼亚人是该国内陆地区文明的唯一代表者。他们还没有形成为民族，但是他们在塞尔维亚已经有一个强大的和比较开明的民族核心。塞尔维亚人有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文献。他们同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进行了 11 年英勇的斗争，方才获得了今天的内政自主。近 20 年来，他们在文化和文明手段方面取得了迅速的进展。他们被保加利亚、色雷斯、马其顿和波斯尼亚的基督徒看作自己在将来争取独立和民族生存的斗争中必须在其周围团结起来的中心。实际上可以说，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民族自身越加强，俄国对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的直接影响就越被排除；因为塞尔维亚为了保持一个基督教国家的独特地位，曾经不得不以西欧为借鉴来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自己的学校，形成自己的科学、自己的工业组织。由此也就可以解释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塞尔维亚尽管受俄国的保护，但它从一解放就建立了立宪君主制度。

尽管俄国的斯拉夫人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相同的血缘关系和宗

教信仰会使他们联结起来，但一旦后者获得解放，他们的利益就将截然对立。由两国的地理位置而产生的贸易需求说明了这一点。俄国是一个密实的内陆国家，基本上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也可能有一天将以工业生产为主。讲希腊语的斯拉夫人的半岛，版图不大而海岸线很长，面临三海，其中有一个海归它控制，它在目前基本上是一个过境贸易国家，虽然它也具有发展独立生产的雄厚潜力。俄国要垄断，南方斯拉夫则要扩张。此外，他们在中亚也是竞争对手；同时，俄国迫切要求排除自己的产品以外的任何其他产品，南斯拉沃尼亚则目前就已经迫切要求把西欧的产品引进东方市场。在这种条件下，这两个国家怎么可能合得来呢？实际上，土耳其的南方斯拉夫人和希腊人甚至现在同西欧就比同俄国有更多的共同利益。而一旦现在从奥斯坦德、勒阿弗尔和汉堡通到佩斯的铁路线继续延伸到贝尔格莱德和君士坦丁堡（目前正在拟议之中），西方文明和西方贸易对东南欧的影响就要成为永久的了。

另一方面，土耳其的斯拉夫人深受由他们供养的穆斯林军事占领者阶级的统治之苦。这些军事占领者包揽了一切军事、民政和司法的大权。而俄国的统治制度在它还没有同封建机构混合起来的所有地方，不也是一种按军事方式来组织等级制的民政和司法并且要人民担负全部费用的军事占领吗？谁要是认为这种制度会使南方斯拉夫人向往，那就请他看看 1804 年以来的塞尔维亚历史吧。塞尔维亚独立的缔造者卡拉乔治之所以遭到人民的唾弃，重新恢复了塞尔维亚独立的米洛什·奥布廉诺维奇之所以被可耻地驱逐出国，都是因为他们企图推行俄国的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必然带来贪污腐败、半军事的官僚政治和帕沙式的敲诈勒索。

总之，使这个问题得到简单而彻底的解决的途径就在这里。历

史和当前的事实都指明，必须在欧洲穆斯林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基督教国家。下一步的革命一定会使这样的事成为不可避免，因为它一定会引发俄国专制和欧洲民主之间久已成熟的冲突。英国势必卷入这个冲突，不管那时碰上什么人执政。它永远不会容许俄国占有君士坦丁堡。它势必会站在沙皇的敌人一方，竭力在虚弱衰败的、被推翻的土耳其政府的遗址上促使建立一个独立的斯拉夫人的政府。⁴⁶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4 月 1
日以后—最迟 7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4 月 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4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柏林密谋。——伦敦警察当局。
——马志尼。——拉德茨基⁴⁰

1853年4月8日星期五于伦敦

当我写关于施梯伯先生所揭发的大密谋的上一篇通讯^①时，我没有料想到，我对这件事的看法会被柏林的两家保守派报纸或多或少地证实。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先生所领导的保守派机关报《普鲁士周刊》4月2日这一天的报纸被没收了，因为它劝告自己的读者“不要过于匆忙地相信警察当局对最近的逮捕所说的瞎话”^②。而普鲁士内阁中以冯·曼托伊费尔先生为首的一派的半官方报纸《时代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更加重要得多。《时代报》被迫承认：

“凡是眼睛没有失明的人都不会不看到，欧洲整个局势中的无数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迟早会引起猛烈的爆炸。欧洲列强的真诚努力可以暂时延缓这

① 见本卷第34—37页。——编者注

② 1853年4月2日《普鲁士政治时事问题周刊》第25期。——编者注

种爆炸，但它们决不能永久防止这种爆炸，即使是竭尽全力……我们的职责是不要再掩盖不满情绪的日益扩大，而且越发危险和越发值得严重注重的是，这种不满情绪不是流露在外面，而是越来越深地隐藏在人们心中。我们应该直言不讳地说，这种不满是由最近表现得肆无忌惮的种种力图在普鲁士实现反革命的做法引起的。”^①

《时代报》只是最后一句话说错了。普鲁士的反革命决非始于今日，它已接近完成了。这不是新近发生的事情，而是早在1848年3月20日已经开始，并且从那一天起就一直在变本加厉。⁴⁷此时此刻普鲁士政府正在策划两个极端危险的方案。一个是限制不动产再分割的自由，另一个是把国民教育交归教会管辖。很难再选择两项更能使政府得罪莱茵普鲁士的农民和整个王国的中等阶级的措施了。还有一桩稀奇事：由于“大揭发”，柏林卫生协会（病人互济会）竟被强迫解散了。这个协会有近1万名会员，都属于劳动阶级。看来政府确信，现行的普鲁士邦的宪法是同“卫生”不相容的。

过去一直不了解伦敦警察当局的所作所为的伦敦报界，看到维也纳的《新闻报》和比利时的最大的反动报纸《解放报》的报道^②都吃了一惊，这些报道说伦敦警察当局编制了一份所有在伦敦的政治流亡者的名单，并附有他们的私人生活和行动的详情细节。

《晨报》叫道：“既然可以容许对外国人实行这种办法，那么只要政府或政府的任何一个成员认为必要，也就会采取这种办法来详细调查我们自己同胞的私生活了……想到伦敦警察当局将被指派扮演他们大陆上的同事们所担任的

^① 1853年4月3日《时代报》第77号。——编者注

^② 1853年4月4日《比利时解放报》第94号。——编者注

不光彩角色,这岂不令人痛心?”

除了比利时报纸及其他报纸的上述报道外,伦敦的报刊今天还登载了这样一条来自维也纳的电讯:

“流亡者问题已经解决:不列颠政府答应严密监视流亡者,一旦证明他们参加革命阴谋活动,必将依法予以严惩。”^①

《晨报》就此发表评论说:“英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丢脸,竟拜倒在奥地利的脚下。再没有比这更卑贱的了。只有联合内阁能做出这种事。”^②

我听到非常可靠的消息说,只要马志尼旅居伦敦的消息一经证实,王国的法官们就打算对他进行起诉。另一方面,我又听说下院将向大臣们就他们同奥地利的可耻交易和他们在流亡者问题上的整个意图提出质询。

我在以前的一篇通讯中说过,拉德茨基很乐意用米兰起义²⁴作口实“捏造一些借口来捞一笔钱”^③。这个看法不久就为一个毫不含糊的行动所证实。拉德茨基在最近的一个告示中宣布,自1847年起以伦巴第流亡者的被扣押的财产为凭的一切债据和典契均属无效。这种没收财产的做法,唯一可能的理由是奥地利国库害怕空虚。崇尚温情的资产阶级曾经到处为了他们的名叫财产的上帝而牺牲革命。现在,反革命背弃了这个上帝。

今天的海底电讯报道的消息说,缅施科夫公爵同土耳其政府签订了协定,俄国军队接到了撤离土耳其边境的命令,东方问题又一次

① 1853年4月6日《泰晤士报》第21395号,其他一些报纸于4月7日加以转载。——编者注

② 1853年4月7日《晨报》第19279号。——编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41页。——编者注

得到了解决。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4 月 8
日

载于 1853 年 4 月 21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374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希尔施的自供⁴⁸

希尔施的“自供”^①在我看来仅仅在有旁证的情况下多少有点价值,因为这些供状前后矛盾。希尔施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从科隆回来后,曾在一次公开的工人集会上说,维利希是他的同谋。自然,这个虚假的供状被人蔑视,并未记录下来。曾有各种人向我暗示(不知道他们是受了希尔施的委托还是自动这样做的),说希尔施表示愿意向我彻底坦白。我拒绝了。后来我知道,希尔施正处于极端贫困之中。所以我毫不怀疑,他的“最后的”供状是为了目前付给他津贴的那个派别的利益而写的。奇怪的是,竟然有人认为非要藏在一个叫希尔施的人的背后寻求庇护不可。

现在我只谈几点意见。我们都握有其他一些密探如维多克、谢努、德拉奥德等人的自供⁴⁹。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所有这些密探都不是普通的密探,而是高级密探,是“库珀密探”⁵⁰的嫡系子孙。同样,他们的自供必然也是高级的自我辩护。

例如,希尔施企图暗示说,关于我的党内同志集会的日期,不是他而是班迪亚上校向格赖夫告的密,而后者又通知了弗略里。希尔

^① 指威·希尔施(间谍活动的受害者)。——编者注

施参加过的我们的那几次会议，都是星期四举行的。但是在希尔施被赶走以后，我们的会议便改为星期三举行了。在伪造的会议记录⁵¹上，无论是在希尔施参加之前，还是在他被赶走之后，会议的日期都标明是星期四。除了希尔施之外，又有谁能搞出这样的“误会”呢！

在另一点上，希尔施就比较走运了。希尔施一口咬定，班迪亚曾多次提供了关于我和德国通信的情报。既然科隆案件中一切与此有关的材料都是伪造的，那么，当然很难确定这些材料究竟是谁捏造的了。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班迪亚。

班迪亚是密探也罢，不是密探也罢，他对我或者对我的党内同志从来都不构成什么危险。因为我从来没有和他谈过我的党内的事务，而且班迪亚本人也竭力避免谈到这些，正如他在自己的一封申辩书中向我表白的那样。因此，不管他是不是密探，他都不可能告发什么，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科隆案件的材料证实了这一点。这些材料证明，除了在德国就地制造的那些供词和在那里查获的文件以外，普鲁士警察当局对于我所属的那个党的事情便一无所知了。因此，它才不得不编造出最荒诞无稽的东西来。

可是，班迪亚不是把马克思的“关于流亡者”的小册子^①出卖给警察当局了吗？

当着其他一些人的面，班迪亚曾经从我这儿打听到，恩斯特·德朗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我打算分册出版一部关于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的书。班迪亚满有把握地说，他能够在柏林物色到出版商。

^① 《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77—407页。——编者注

我请他马上就去打听。过了8—10天，他通知说，柏林有一个名叫艾泽曼的出版商，愿意出第一册，条件是作者不能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不然他怕书被没收。我表示同意，同时我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在手稿交出之后立即付清稿费（我想避免再发生我在办《新莱茵报评论》时期发生过的事情），手稿送到之后立即付印。我到曼彻斯特找恩格斯，在那里我们写了那本小册子。在此期间，班迪亚交给我妻子一封柏林来信，在这封信中，艾泽曼接受了我的条件，附带说明，是否出第二册要看第一册的销路如何。我回来以后，班迪亚收到手稿，而我则拿到稿费。

然而，付印的事情在种种堂皇的借口下一直拖延着，我就有点怀疑起来。倒不是疑心手稿被转呈警察当局，由他们来出。即使是俄国皇帝，只要他同意明天就付印，我也情愿今天就把我的手稿交给他；相反，我只是担心他们把手稿束之高阁。

在手稿中，我们抨击了时髦的空谈家，我们抨击这些人，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是危害国家的革命者，而是因为他们是反革命败类。

我的怀疑被证实了。格奥尔格·维尔特（我曾请他在柏林打听一下艾泽曼其人）写信告诉我说，他根本找不到什么艾泽曼。于是我便同德朗克一起到班迪亚那里去。这时才发现艾泽曼原来只是雅科布·柯尔曼的经理人。既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得到班迪亚的书面说明，所以我坚决要求班迪亚当着我的面写信给曼彻斯特的恩格斯，把他的陈述重复一遍，并且把柯尔曼的地址告诉他。与此同时，我写了一封短信给布鲁诺·鲍威尔，请他打听一下，在班迪亚对我说的那所柯尔曼的房子里住的是什么人。但是我没有收到回信。而那位所谓的出版商对我催问信的答复是：并未用合同规定付印的确切日期。他知道什么时候出版最为适宜。在随后的一封信中，他就扮演起受

委屈的角色来了。最后，班迪亚向我声明，出版商拒绝付印，并将退回手稿。班迪亚本人则跑到巴黎躲了起来。

有关全部交涉的柏林来信和班迪亚的信件(其中还包括班迪亚企图替自己申辩的信件)，都存在我的手中。

但是，为什么德国流亡者所散布的对班迪亚为人的怀疑没有使我产生错觉呢？这是因为我知道其中的“历史背景”。这种背景目前我理应秘而不宣。

因为我知道，在匈牙利战争期间，作为革命军官的班迪亚历史上也有过光荣的一页。因为他和我所尊敬的瑟美列有过通信关系，他和佩尔采尔将军的关系也很好。因为我亲眼见过科苏特任命班迪亚为自己有名无实的警察总监的证件，证件上还有科苏特的亲信、曾跟班迪亚同住一所房子的西尔莫伊伯爵的签字。班迪亚在科苏特那里担任的这个职务也同样说明，班迪亚同警察必有来往。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班迪亚现在也还是科苏特在巴黎的代理人。

匈牙利的领袖们肯定知道此人的厉害。同他们相比，我算冒什么险呢？除了手稿副本被扣以外，什么危险也没有。而原稿仍在我的手里。

后来，我向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出版商利齐乌斯和德国的其他一些出版商探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出版上面提到的那部手稿。他们声称，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可能。最近则有希望在德语地域以外的某国付印。

我的这些说明自然不是讲给希尔施先生听的，而是讲给我在美国的同胞们的。经过这番说明之后，关于普鲁士警察当局为什么要扣发抨击金克尔、维利希等等“流亡中的大人物”的小册子这个问题，就不会仍是“悬案”了吧？

啊！埃林杜尔，告诉我，
这种两重性格是怎么回事！^①

1853年4月9日于伦敦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4月9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3年5月5日《美文学
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8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① 阿·缪尔纳《罪》第2幕第5场。——编者注

卡·马克思

内阁的成就⁵²

1853年4月12日星期二于伦敦

也许,可以算是联合内阁最大的优点的,就是它表现了过渡时期的政权的软弱无能,在这个时期,能够存在的不是真正的政府,而仅仅是表面的政府,这时旧的党派已经消失,新的党派还没有结合起来。

“群贤政府”在它头三个月的试用期中取得了哪些成就呢?废除对犹太人的法律限制的法案⁵³举行了二读,加拿大教会后备基金法案⁵⁴举行了三读。后一法案将使加拿大立法机关能够掌握一部分出卖土地的收入。这种收入迄今一直是由享有特权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教会独占的。这个法案在约翰·罗素勋爵第一次向议院提出的时候,一共有三项条款。第三条要求废除这样一条规定:在任何一年出卖加拿大土地的进款如不足9285英镑,其差额应以公债利息基金弥补。这一法案在二读时已经通过。但是在3月18日议院作为全院委员会⁵⁵讨论这一法案的时候,约翰勋爵却突然要求收回他自己提出的第三条。因而,如果加拿大立法机关收回教会后备基金的话,那么,不列颠人民就不得不每年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大约1万英镑来

维持数千英里以外的一个教派。反对给宗教界任何补助的激进派大臣威·莫尔斯沃思爵士,看来已经成为约翰勋爵的这样一种理论的信徒,即“不列颠的殖民地只有靠不列颠本土人民付出代价才能摆脱国教会这种沉重负担”。

在内阁的头三个月的试用期中,提出了三个激进的决议案。柯立尔先生提议取消教会法庭,威廉斯先生提议把遗产税和遗嘱检验税推广到不动产上,休谟先生则提议废除一切“纯粹保护性的”关税。不言而喻,内阁对所有这些“彻底的”改革都表示反对。不过,联合内阁反对改革的方式与托利党人³完全不同。托利党人是断然宣称他们坚决抵制“对民主的侵犯”。联合内阁实际上也是一样,只不过借口实行改革措施要更加慎重。它是靠改革吃饭的,就像过去历届内阁靠舞弊过日子一样。它装出非常热心于改革的样子,而实际上却想出一整套办法来拖延改革。它一会儿说,“最好等眼下的调查有了结果再说”;一会儿说,“刚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在它作出决定以前什么也不能做”;一会儿说,“政府恰巧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它希望不要打断它的紧张的思想;接下去又说,“问题值得议院注意,将会有适当的时机提出讨论”,“适当的时节还没有到来”,“不要很久,就要采取某种措施”。局部措施应当缓行,以便重新调整整个安排,或者是整个安排应当保持不变,以便实行局部措施。在东方问题上所宣布的“节制政策”,同样也是内阁的对内政策。

当约翰·罗素勋爵第一次宣读联合内阁纲领的时候^①,当这个纲领引起普遍慌乱的时候,罗素的拥护者曾大喊大叫道:“我们应当有一种能够激发热情的东西。国民教育就应当是这样的东西。我们的

^① 1853年2月10日。——编者注

罗素正在酝酿一个非常好的教育计划。你们很快就会听到。”

现在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计划。4月4日罗素大体上说明了他打算进行的教育改革。这个改革的要点就是：授权地方自治议会征收一项地方税来资助现有的必须讲授英国国教教义的学校。至于大学——国教会的宠儿，任何改革的主要反对者——约翰勋爵希望“各大学自行改革”^①。滥用兴办教育的资助款项的现象是尽人皆知的。从以下材料可以推测到它们的数量：

“每年2 000英镑到3 000英镑的有24笔，3 000英镑到4 000英镑的有10笔，4 000英镑到5 000英镑的有4笔，5 000英镑到6 000英镑的有2笔，8 000英镑到9 000英镑的有3笔，每年1万英镑、15 000英镑、2万英镑、29 000英镑、3万英镑和35 000英镑的各1笔。”^②

不需要特别敏锐的目光就可以猜想到，靠滥用这些款项为生的寡头们在处理这些款项的问题时为什么要非常小心了。罗素建议：

“每年30英镑以下的资助款项由郡的法庭审查，超过这个数目则由大法官法庭的案卷保管官审查。但是，如果没有地方议会为此目的而设的专门委员会的许可，上述法庭均不得提起诉讼。”^②

为了在皇家法庭上提出诉讼，要求赔偿被抢夺的本来规定用于国民教育的资助款项，必须得到专门委员会的许可。许可！但是，罗素甚至在提出这个保留条件之后，还没有完全放心。他补充说：

“如果发现某一学校的行政部门营私舞弊，除了地方议会的专门委员会外任何人都不得过问。”^②

① 1853年4月5日《泰晤士报》第21394号。——编者注

② 1853年4月9日《人民报》第49期。——编者注

这是地道的旧的英国式的改革。这种改革既不创立任何新东西,也不破除任何旧东西。其目的是要保存旧的制度,而办法是使它具有一个更明智的形式,也可以说是让它学会采取新的面貌。这就是英国的寡头立法的“传统智慧”的秘密。干脆点说,这实质上就是使舞弊行为代代相传,办法是——不妨这样说——不时地使这种行为有所更新,给它们加点新鲜血液。

如果说任何人都不能不同意这样的意见:即废除对犹太人的法律限制的法案是确立宗教宽容的微小尝试,加拿大后备基金法案是承认殖民地自治的微小尝试,教育法案是回避国民教育问题的微小尝试,那么,格莱斯顿的财政计划无疑就是对付大不列颠国债这个巨大怪物的最微小尝试了。

4月8日,在预算公布之前,格莱斯顿先生就向下院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出了好几项关于国债的决议案,而在这个报告发表以前,《纪事晨报》就发表了一篇专门的报道说,有几项极为重要的决议案即将被提出,“据传这些决议案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重要性”^①。由于这种谣传,国债债券的行市上涨了。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格莱斯顿打算清偿国债。但是,当4月8日全院委员会举行会议来审查这些决议案的时候,格莱斯顿先生突然作了修改,而且修改得使它们的“重要性和吸引力”全都化为乌有。现在,我们也要像迪斯累里先生一样提出这样的问题:“嚷嚷这一阵是为了什么呢?”^②

格莱斯顿先生的提议的最终目的,正如他本人所说,是要把公债券的利息降低到2.5%的标准利率。在1822—1823年,1824—

① 1853年4月7日《纪事晨报》第26922号。——编者注

② 本·迪斯累里1853年4月8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1825年,1830—1831年,1844—1845年,利息曾经分别从5%降低到4.5%,从4.5%降低到4%,从4%降低到3.5%,从3.5%降低到3%。那么为什么不能再从3%降低到2.5%呢?格莱斯顿先生的提议如下:

第一,用一个共同的名称把主要同过去那个南海泡沫公司⁵⁶有关的总额为950万英镑的各种证券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利息从3%强行降低到2.75%。这样,每年都能节省将近25 000英镑。为各种不同的证券发明一个新的共同的名称,在每年支出3 000万英镑的情况下节省25 000英镑,这一点儿也不值得骄傲。

第二,他提议发行一种新的名叫**国库债券**的金融证券,总额不超过3 000万英镑。这些债券可以通过不收任何费用的简单转手进行转让,1864年9月1日以前按2.75%计息,自此以后到1894年9月1日则按2.5%计息。这样做无非是创立一个为有钱阶级和商业阶级所需要的新的金融手段。但是,格莱斯顿如何能够在保持总额为1 800万英镑、利息为1.5%的国库票流通的同时又发行利息为2.5%的国库债券呢?按照比国库票大1%的利率来偿付国库债券的利息,对国家说来不是要亏一笔钱吗?不管怎么说,这第二项建议对减轻国债至少是毫无帮助。

最后,第三,让我们谈谈格莱斯顿的决议案的最主要和唯一重要的一点,即三厘统一公债券和三厘跌息证券,这两者合计本金总额将近5亿英镑。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⁵⁷由于议会有一个规定,即不在12个月以前预先通知不得强行降低这些证券的利息,格莱斯顿先生选择了自愿兑换的办法,并提出不同的方案,使三厘证券的持有者把三厘证券兑换成根据他的决议案将要发行的他种证券时可以选择。每100英镑的三厘证券有以下几种兑换方法,三厘证券

的持有者可以任选一种：

1. 他们可以把每 100 英镑的三厘证券兑换成同等价值的国库债券，后者的利率在 1864 年以前是 2.75%，自此以后至 1894 年的利率是 2.5%。如果用利率二厘五的 3 000 万英镑的国库债券取代 3 000 万英镑的三厘证券，那么在头 10 年内就可节省 75 000 英镑，而在以后的时期内可节省 15 万英镑，总共节省 225 000 英镑。但是这样一来，政府就得把 3 000 万英镑的债款全部偿还。总之，这个提议并不能使国债减轻多少。

2. 第二个提议是：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把每 100 英镑的三厘证券换成 82 英镑 10 先令的新的三厘五证券，后者在 1894 年 1 月 5 日以前将按 3.5% 的利率计息。这样做的结果是，同意接受三厘五证券的人，现在每 100 英镑得到的收入不是 3 英镑，而是 2 英镑 17 先令 9 便士。这就是说，每年每 100 英镑得到的收入将会减少 2 先令 3 便士。如果 5 亿英镑全都按这个提议的办法来兑换的话，那么国家每年只须偿付 14 437 500 英镑，而不是现在的 1 500 万英镑。这就是说，每年可节省 562 500 英镑。但是，为了节省这区区 562 500 英镑，议会就要在半个世纪中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并在未来的标准利率极难确定的变动时期保证利息超过 2.8%。然而，另一方面，格莱斯顿先生至少会赢得一点好处：到 40 年期满之前，他用不着再为目前由 12 个月以前预先通知的规定加以保障的三厘证券操心了。他只须同议会可以按票面价值兑现的三厘五证券打交道。格莱斯顿提议不要给他的三厘五证券规定任何限额。

3. 第三个提议是：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把每 100 英镑的三厘证券换成新的 110 英镑的二厘五证券，利息支付到 1894 年。当格莱斯顿先生在 4 月 8 日向下院提出自己的方案的时候，他没有限定将

要发行的(二厘五证券的)数量。但是,迪斯累里先生指出,把这个提议和前面提出的另外两个提议比较一下,每一个明白人都宁愿用100英镑的三厘证券来兑换110英镑的二厘五证券。如果5亿英镑的三厘证券全都换成新的证券,那么,国家一方面固然每年可以节省125万英镑,然而另一方面,国债的本金总额却会增加5000万英镑。于是格莱斯顿先生第二天修改了这个提议,他提议把这个新的二厘五证券的发行量限定为3000万英镑。由于作了这样的修改,整个第三个提议对国债来说便失去了意义。其结果是使国债的本金总额只增加300万英镑。

现在读者已经看到,所谓“历来提出过的财政提案中最重要的和最宏伟的提案之一”^①究竟是什么东西了。恐怕世上没有什么比所谓财政更带欺骗性了。擅长这门神秘科学的术士们把有关预算和国债的最简单的业务蒙上一层难懂术语的外衣,掩盖着种种浅薄的花招:发行名目繁多的证券,旧证券兑换新证券,降低利息而增加本金的票面总额,提高利息而减少本金总额,设立奖金、补贴和优惠股票,把年度债券分为可兑换的和不可兑换的,把各种证券的转换人为地区分等级。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生意经和一大堆不胜枚举的烦琐规定,把公众完全弄糊涂了;而每一种这样的新的计划,却为高利贷者提供一次求之不得的加紧进行害人的掠夺活动的机会。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从所有这些乍一看来使人眼花缭乱的兑换、交换、折合当中所看到的,与其说是财政政策方面的东西,还不如说是简单算术的问题,或者说是纯粹的玩弄词句。

① 这句话是考文垂议员爱·埃利斯讲的。马克思引自本·迪斯累里1853年4月8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格莱斯顿先生的确是玩弄这种财政炼金术的能手，而把他的计划的特点描绘得最清楚的，莫过于迪斯累里先生的话了：

“在我看来，哪怕是最机灵的诡辩家的聪明才智，也不可能为了取得如此微不足道的结果而想出更复杂和更奥妙的安排。在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①中，有一章研究了在一个针尖上能有多少安琪儿跳舞的问题。这是人类天才最稀有的成果之一，我发现，在这些决议案中就有某种和这种卓越的智慧类似的东西。”

读者都记得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格莱斯顿先生的方案的目的是要推行“标准的”二厘五证券。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要发行数量非常有限的二厘五证券和数量不限的三厘五证券。为了发行他的少量的二厘五证券，他把利息降低了0.5%，另一方面则规定10%的补贴，以求实现降低利率0.5%的目的。为了摆脱那种由12个月以前预先通知的规定加以“保障”的三厘五证券造成的困难，他宁愿制订一项今后40年内适用的法律。总而言之，如果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就会使两代人丧失任何可能改善自己财政状况的机会。

联合内阁在议院中的处境，可以从表决的统计数字中清楚地看出。在全院委员会表决梅努斯问题⁵⁸时，内阁只获得了30票的微弱多数。在表决废除对犹太人的法律限制的法案时（这个法案还没有举行三读），出席议院的议员共有439人，它获得的多数甚至还不到30票。在讨论加拿大后备基金法案时，在罗素收回他自己提出的第三条之后，内阁是靠托利党人的票而得救的，它本身的支持者则投票反对。它获得的多数票几乎全是来自保守党人。

我不想谈内阁的内部分歧了，这些分歧表现在关于加拿大法案

^① 指《神学大全》。——编者注

的辩论中,表现在支持政府的报纸关于所得税问题、首先是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热烈争论中。没有一个问题联合内阁不能像吉查那样给以回答。吉查是马扎尔人的国王,他在改信基督教之后,还是继续奉行他原先那古老的迷信仪式。当人们问他,这两种教他究竟信奉哪一种时,吉查回答说:“我很富有,可以有两种信仰。”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4 月
12 日

载于 1853 年 4 月 27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3753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THE **People's Paper**

THE CHAMPION OF
POLITICAL JUSTICE AND UNIVERSAL RIGHT.

591

LONDON, SATURDAY, APRIL 16, 1853.

(Price Fourpence.)

卡·马克思

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便士⁵⁹

我们的读者根据自身的痛苦经验知道,并且在感到自己钱袋空虚的时候体会到,老一套的财政把戏已经把 8 亿英镑的国债强加在人民肩上。这些国债主要是为了阻止美洲殖民地的解放和反对上个世纪的法国革命而发行的。国债的增加对国家支出的增加所起的影响,可以从下面的统计表⁶⁰中看出:

1. 国 债

	英 镑
威廉去世后女王安即位时(1702)	16 394 702
乔治一世即位时(1714)	54 145 363
乔治二世在位初期(1727)	52 092 235
乔治三世执政初期(1760)	146 682 844
美洲战争之后(1784)	257 213 043
反雅各宾战争末期(1801)	579 931 447
1810 年 1 月(拿破仑战争时期)	811 898 082
1815 年以后	约 1 000 000 000

2. 国家支出

包括国债利息在内的一切支出共计：	英 镑
威廉去世后女王安即位时(1702)·····	5 610 987
乔治一世即位时(1714)·····	6 633 581
乔治二世在位初期(1727)·····	5 441 248
乔治三世执政初期(1760)·····	24 456 940
反雅各宾战争末期(1801)·····	61 278 018

3. 国 税

	英 镑
女王安时期(1702)·····	4 212 358
乔治一世时期(1714)·····	6 762 643
乔治二世时期(1727)·····	6 522 540
乔治三世时期(1760)·····	8 744 682
美洲战争之后(1784)·····	13 300 921
反雅各宾战争之后(1801)·····	36 728 971
1809年·····	70 240 226
1815年以后·····	约 82 000 000

人民根据自己钱袋的情况知道得很清楚,因国债而来的税捐是怎样的一种负担,然而许多人还不知道国债在发行时和在现实中所具有的各种特殊形式。“国家”,这是土地贵族和金融巨头联合统治的化身,它需要金钱来实现对国内和国外的压迫。它向资本家和高利贷者借钱,而付给他们一纸凭据,并且保证每100英镑借款付给一定数量的利息。国家用课税的办法向劳动阶级榨取金钱来支付这些款项,这样,人民便给自己的压迫者做了保人,使贷款给这些压迫者的人放心地借钱给他们,让他们扼杀人民。这些构成国债的款项名目繁多,有的按三厘付息,有的按三厘五或四厘付息不等。根据利率以及其他不同情况,国债债券有种种不同的名称,如三厘证券等等。

这些利息,不仅仅劳动阶级,工厂主和地主也都不得不担负一部分,而且都希望尽量少担负一些,因此,每一任财政大臣,只要他不是辉格党人⁶¹,都企图用某种方法来减轻这种沉重负担。

4月8日,在本届内阁的预算提出之前,格莱斯顿先生就向议院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出了好几项关于国债的决议案,而在这个报告发表以前,《纪事晨报》就曾报道说,有几项极为重要的决议案将被提出,“据传这些决议案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重要性”^①。由于这些谣传,国债债券的行市上涨了。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格莱斯顿打算清偿国债。现在,我们要问:“嚷嚷这一阵是为了什么呢?”^②

格莱斯顿先生的提议的最终目的,正如他本人所说,是要把各种公债券的利息降低到2.5%,在1822—1823年,1824—1825年,1830—1831年,1844—1845年,利息曾经分别从5%降低到4.5%,从4.5%降低到4%,从4%降低到3.5%,从3.5%降低到3%。那么为什么不能再从3%降低到2.5%呢?

现在我们看一看,格莱斯顿先生提议采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

第一,他提议用一个共同的名称把主要同过去那个南海泡沫公司⁵⁶有关的总额为950万英镑的某些证券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利息从3%强行降低到2.75%。这样,每年都能节省将近25 000英镑。为各种不同的证券发明一个新的共同的名称,在每年支出3 000万英镑的情况下节省25 000英镑,这并不值得特别赞美。

第二,他提议发行一种新的名叫国库债券的金融证券,总额不超

① 本·迪斯累里 1853 年 4 月 8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威·格莱斯顿 1853 年 4 月 8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过3 000万英镑。这些债券可以通过不收任何费用的简单转手进行转让,1864年9月1日以前按2.75%计息,自此以后到1894年9月1日则按2.5%计息。这样做无非是创立一个对有钱阶级和商业阶级有利的新的金融手段。他所说的“不收费”,就是说,伦敦城的商人们用不着什么破费。目前存在的是总额为1 800万英镑、利息为1.5%的国库票。按照比国库票大1%的利率来偿付国库债券的利息,对国家说来不是要亏一笔钱吗?无论怎么说,这第二项提议对减轻国债毫无帮助。国库票只能在大不列颠流通,而国库债券则可以作为普通期票进行转让,因此,这一措施只对伦敦城的商人们有利,而人民则要为其付出昂贵的代价。

最后,现在让我们谈谈唯一重要的一点,即三厘统一公债券和“三厘跌息证券”,这两者合计本金总额将近5亿英镑。由于议会会有一个规定,即不在12个月以前预先通知不得强行降低这些证券的利息,格莱斯顿先生选择了自愿兑换的办法,并提出不同的方案,使三厘证券的持有者把三厘证券兑换成根据他的决议案将要发行的他种证券时可以选择。每100英镑的三厘证券有以下三种兑换方式,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任选一种:

1. 部分兑换:每100英镑的三厘证券兑换成同等价值的国库债券,后者的利率在1864年以前是2英镑15先令,自此以后至1894年的利率是2英镑10先令。如果用利率二厘五的3 000万英镑的国库债券取代3 000万英镑的三厘证券,那么在头10年内就可节省75 000英镑,而在以后的时期内可节省15万英镑,总共节省225 000英镑。但是这样一来,在40年期满时政府就得把3 000万英镑的债款全部偿还。总而言之,这个提议并不能使国债减轻多少,甚至根本谈不上有所减轻。在年支出达到3 000万英

镑的情况下,节省 225 000 英镑又有多大意义呢?

2. 第二个提议是: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把每 100 英镑的三厘证券换成 82 英镑 10 先令的新的三厘五证券,后者在 1894 年 1 月 5 日以前将按 3 英镑 10 先令的利率计息。这样做的结果是,同意接受三厘五证券的人,现在每 100 英镑得到的利息收入不是 3 英镑,而是 2 英镑 17 先令 9 便士,也就是说减少了 2 先令 3 便士。如果 5 亿英镑全都按这个提议的办法来兑换的话,那么国家每年只须偿付 14 437 500 英镑,而不是现在的 1 500 万英镑。这就是说,每年可节省 562 500 英镑。但是为了节省这 562 500 英镑,议会就要在半个世纪中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并在任何利率都极不确定的变动时期准许利息超过 2.8%! 然而,格莱斯顿也会赢得一点好处:到 40 年期满之前,存在的不是目前由 12 个月以前预先通知的规定加以保障的三厘证券,而是议会可以按票面价值兑现的三厘五证券。格莱斯顿提议不要给这种三厘五证券规定任何限额。

3. 第三个提议是: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把每 100 英镑的三厘证券换成新的 110 英镑的二厘五证券,利息支付到 1894 年。当格莱斯顿先生在 4 月 8 日第一次向下院提出自己的方案的时候,他有限定将要发行的新的二厘五证券的数量。但是,迪斯累里先生指出,把这个提议和另外两个提议比较一下,每一个明白人都宁愿用 100 英镑的三厘证券来兑换 110 英镑的二厘五证券。如果 5 亿英镑的三厘证券都换成新的证券,那么,国家一方面固然每年可以节省 125 万英镑,然而另一方面,国债却会增加 5 000 万英镑。于是格莱斯顿先生第二天修改了他的提议,他提议把新的二厘五证券的发行量限定为 3 000 万英镑。由于规定了这个限额,他的提议对庞大的国债几乎失去了任何作用;它使其本金总额只增加 300 万英镑。

现在读者已经了解,所谓“历来提出过的财政提案中最重要的和最宏伟的提案之一”^①究竟是什么东西了。恐怕世上没有什么比所谓财政更带欺骗性了。擅长这门“神秘科学”的术士们把有关预算和国债的最简单的业务蒙上一层难懂术语的外衣,掩盖着种种浅薄的花招:发行名目繁多的证券,旧证券换新证券,降低利息而增加本金的票面总额,提高利息而减少本金总额,设立奖金、补贴和优惠股票,把年度债券分为可兑换的和不可兑换的,把各种证券的转换人为地区分等级。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生意经和一大堆不胜枚举的烦琐规定,把公众完全弄糊涂了;而每一种这样的新的财政把戏,却为高利贷者提供一次求之不得的加紧进行害人的掠夺活动的机会。格莱斯顿先生无疑是玩弄这种财政炼金术的能手,而把这个提议的特点描绘得最清楚的,莫过于迪斯累里先生的话了:

“在我看来,哪怕是最机灵的诡辩家的聪明才智,也不可能为了取得如此微不足道的结果而想出更复杂和更奥妙的安排。在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②中,有一章研究了在一个针尖上能有多少个安琪儿跳舞的问题。这是人类天才最稀有的成果之一,我发现,在这些决议案中就有某种和这种卓越的智慧类似的东西。”

读者都记得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格莱斯顿方案的最终目的是要推行“标准的”二厘五的国债债券。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要发行数量非常有限的二厘五债券和数量不限的三厘五证券。为了发行他的数量有限的二厘五证券,他把利息降低了0.5%,并用补贴10%

① 这句话是考文垂议员爱·埃利斯讲的。马克思引自本·迪斯累里 1853 年 4 月 8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指《神学大全》。——编者注

的办法来增加本金总额。为了摆脱三厘证券的整个立法保障(12个月以前预先通知)造成的困难,他宁愿制订一项今后半个世纪内适用的法律。总而言之,如果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就会使不列颠人民在未来半个世纪内丧失任何摆脱财政压迫的机会。

任何人都会同意这样的意见:如果说废除对犹太人的法律限制的法案是确立宗教宽容的微小尝试,加拿大后备基金法案⁵⁴是承认殖民地自治的微小尝试,教育决议案^①是回避国民教育问题的微小尝试,那么,格莱斯顿的财政计划就是对付不列颠国债这个巨大怪物的最微小尝试了。

卡·马·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4月
13日前后

作为社论载于1853年4月16
日《人民报》第50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54—56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
失败。——预算⁶²

1853年4月19日星期二于伦敦

上星期为诊断诺丁汉前任下院议员菲格斯·奥康瑙尔的精神状态而召开的委员会,作出了如下的结论:

“我们认为,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从1852年6月10日以来就患有精神病,并且没有任何恢复常态的迹象。”^①

奥康瑙尔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生涯已在1848年完结。他的力量已被摧毁,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他已经无力去领导自己所组织的无产阶级运动,反而几乎成了这个运动的障碍。如果说,对历史的公正态度要求我不要掩盖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它也责成我公正地评价这位倒下的战士,责成我把厄内斯特·琼斯发表在《人民报》上的对奥康瑙尔评论同时介绍给读者:

“当年的他,曾经放弃官职、财富和社会地位,抛弃有收入、有成就的事业;

① 1853年4月16日《人民报》第50期。——编者注

他耗费巨额资财不是出于个人的自甘清苦，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自我牺牲；尽管他在国内拥有大量土地，并且是一个最大的郡的代表，他却宁愿去国离乡，终身流亡异邦；他曾经由于热爱人类而遭到家人的怨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献身；在一生从事无比光辉的劳动之后，他现在几乎沦于赤贫……这就是他的一生。现在请看他的工作成果。在极端沮丧的时期，在纷乱、困惑和痛苦的时期，他使这个国家的千百万人空前地团结在一起。奥康奈尔曾把爱尔兰人联合起来，但那是在牧师们的协助下做到的；马志尼唤醒了意大利人，但站在他那方面的有贵族和商人；科苏特团结了匈牙利人，但站在他背后的有参议会和军队；而无论匈牙利人还是意大利人，胸中都燃烧着反对外国征服者的火焰。但是，奥康瑞尔独自——不靠贵族、牧师和商人——联合和发动了被压迫的阶级反对上述所有这些人！为了把这个阶级联合起来，他甚至没有利用民族感情这样的手段！跟着拉斐德走的是商人，跟着拉马丁走的是店主，跟着奥康瑞尔走的是人民！但在19世纪的立宪制的英国，人民是最没有力量的。奥康瑞尔教会了他们如何成为最强大的力量。”^①

上一周是联合内阁连遭失败的一周。它第一次碰到一个联合反对派。在星期二，即本月12日，巴特先生建议把基尔梅赫姆疗养院保留下来，作为爱尔兰士兵的收容所。军务大臣^②反对这项建议。但是，尽管政府反对，这项建议仍然以198票对131票通过了。政府这次是由于爱尔兰旅⁶³和保守派反对党联合而被击败的。此后在星期四，政府又由于保守党人和曼彻斯特学派⁶⁴联合而再遭失败。在米尔纳·吉布森先生提出了年年都提的关于废除“知识税”⁶⁵的建议之后，废除广告税的建议交付表决，尽管格莱斯顿、罗素和悉尼等人对此表示反对。他们以169票对200票遭到失败。布莱特、吉布森和麦格雷戈在投票时同迪斯累里、帕金顿等人站到了一起，而科

① 厄·琼斯《人民之友》，见1853年4月16日《人民报》第50期。——编者注

② 悉·赫伯特。——编者注

布顿先生则正式声明：“他衷心接受迪斯累里和他的朋友们的帮助。”^①但是，使政府遭到最大失败的还不是议院里的表决，而是政府自己的行为。

关于科苏特火箭事件^②的详情，大概《论坛报》的读者已经知道了。为了证明整个这次事件是事先在帕麦斯顿和外国列强之间策划好的，只须引证帕麦斯顿自己的官方日报《晨邮报》就这件事情发表的意见就够了：

“政府所表现的敏捷和机警，必将取得外国列强的信任，而这些国家原来是怀疑我国的法律是否能够制止在我国的那些好闹事的客人的恶意行动的。”^③

这件事对联合内阁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它已经（这一点有很大意义）剥掉了老帕麦斯顿那华丽的革命时装。甚至他的最轻信的、然而正直的崇拜者《晨报》也公开和他断绝关系了。从帕麦斯顿向十二月二日的英雄、萨托里练兵场的英雄大加赞许的时候起，这颗明星就开始暗淡，而当他公开充当“奥地利的大臣”的时候，这颗明星就完全消失了。⁶⁶不过联合内阁的使命正在于使现在的群贤和旧时寡头政治的名流一齐垮台。联合内阁正以一种令人敬佩的顽强精神执行着这一任务。如果帕麦斯顿所参加的内阁竟能渡过这场灾难，那它肯定可以把弗朗索瓦一世的话稍加改变，用玩笑的方式宣布：“除了名誉以外，什么都没有丢”⁶⁷。

现在我来谈谈当前的大事，即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这个预算

① 理·科布顿 1853 年 4 月 14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95—98 页。——编者注

③ 1853 年 4 月 18 日《晨邮报》第 24749 号。——编者注

昨天他已经在长达5小时之久的演说^①中向下院会议提出了。这是一个按百科全书的要求编制的“联合”式的预算，完全可以当作一大条目收到埃尔施和格鲁伯所编纂的卷帙浩繁的科艺全书^②中去。大家知道，每当百科全书编纂者的纪元到来之日，也就是事实大量堆积而思想相对落后之时。

每一个预算的基本问题是收支之间的关系，是编制或者有所结余、或者出现赤字的平衡表，以确定或者减少或者增加国家税收的基本条件。迪斯累里先生曾估计1852—1853年度的收入为52 325 000英镑，支出为51 163 000英镑。现在格莱斯顿先生告诉我们说，实际收入为53 089 000英镑，实际支出只有50 782 000英镑。这些数字表明，收入比支出实际超过246万英镑。因此，同迪斯累里先生相比，看来好像格莱斯顿先生改善了财政状况。迪斯累里只能夸耀自己结余160万英镑，而格莱斯顿却节省了246万英镑。不幸的是，和迪斯累里的结余不同，格莱斯顿先生的结余经过进一步的检查就缩减到了70万英镑这样一个不大的数字。下院的各种决定以及其他各项特别支出已经从他的钱袋里拿走了成百万英镑。此外，格莱斯顿先生还预先声明一句：

“应当记住，70万英镑中有215 000英镑属于临时进项，而不是固定进项。”

这样一来，格莱斯顿先生就只剩下485 000英镑的结余这样一个活动余地了。因而，任何关于减少旧的税收的建议如果超过这个数字，就要施行新的税收来平衡。

① 威·格莱斯顿1853年4月18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指约·赛·埃尔施和约·哥·格鲁伯《科艺全书》（共167卷）1818—1890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格莱斯顿先生是从所得税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开始自己的演说的。他说，本来现在就可以放弃所得税了，但是，政府还没有准备就绪，不能建议立即废除它。他要求人们注意的第一件事是，“我们从这个税中得到 550 万英镑的收入”。接着，他企图为所得税的作用进行一次“精彩的”辩护，为此他费了不少口舌来阐述所得税的历史。

他指出：“所得税在我们争生存时期已经发挥过作用，它使我们得以增加国家的收入，弥补用于战争和民政管理的支出…… 只要我们不破坏这种手段的效能，那么，一旦不幸重启战端，它就能使我们立即把陆军扩大到 30 万人，把海军扩大到 10 万人，并相应地强化我们的其他一切设施。”

接下去，格莱斯顿先生又指出，所得税不仅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有用，而且对于实施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自由贸易政策也有用。在发表了这种辩护性的引论之后，他突然使我们大吃一惊地说：“所得税充满缺陷。”格莱斯顿先生实际上承认，要保存这种税，就必须对它进行改造，以便避免它目前的不平等状态。但是，为了消除这种种不平等就必须打破整个制度。于是他就陷入了惊人的自相矛盾之中，又来煞费苦心证明这种不平等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想象出来的。至于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的问题，他归结为“土地和商业”的问题，企图用一些笨拙的计算使人们相信，对土地征税实际上是每英镑征收 9 便士，而对商业是每英镑仅征收 7 便士。然后他又补充说：

“对土地和房屋的征税评估不依它们的所有者收入多少而定，而在商业方面，收入的多少是由占有者自己申报的，他们往往谎报。”

对于公债持有者，格莱斯顿先生肯定地说：如果对他们收入中

的那部分资本化的价值课税，就是一种粗暴的破坏社会信任的行为。简言之，格莱斯顿先生断然拒绝迪斯累里先生的提议，不同意把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作任何区别。另一方面，他又要把所得税扩大到爱尔兰，并且把起征点改为 100 英镑，而在此以前，起征的界线是每年 150 英镑。但是，他违反自己刚刚宣布过的原则——“不可能把智力、劳力和财产的各自的价值区分开来，并用数字值来表达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建议把每年 100 英镑至 150 英镑的收入的征税限定为每英镑只征 5 便士。最后，格莱斯顿先生为了调和一下他对所得税的赞扬态度和他公开承认必须废除所得税的论调，建议：

“延长征税时间，从 1853 年 4 月起的两年每英镑征税 7 便士，从 1855 年 4 月起的两年每英镑征税 6 便士，从 1857 年 4 月起的三年每英镑征税 5 便士。依照这个建议，从 1860 年 4 月 5 日起，所得税就将完全终止。”

格莱斯顿先生觉得，这样一来，由于他拒绝承认区别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的原则，他就给了土地贵族和公债持有者好处；另一方面，他还考虑到给曼彻斯特学派一个同样的诱饵，即调整遗产税，使之适用于一切种类的财产，同时却拒绝考虑遗嘱检验税的问题。

他说：“我毫不怀疑，遗产税（如议院加以调整的话），将使我们的固定资金在 1853—1854 年度增加 50 万英镑，在 1854—1855 年度增加 70 万英镑，在 1855—1856 年度增加 40 万英镑，在 1856—1857 年度增加 40 万英镑，总共将使国家的固定资金增加 200 万英镑。”

对于苏格兰，格莱斯顿先生建议把现行的 3 先令 8 便士的酒类税增加 1 先令（这将提供 318 000 英镑的收入）。此外，他建议增

加茶商、啤酒厂主、制麵厂主、烟草厂主、烟草商和肥皂制造厂主的执照税。

因此，1853—1854 年度由增加税收而得的进项总数将是：

所得税	295 000 英镑
遗产税	500 000
酒类税	436 000
执照税	113 000
共计	1 344 000 英镑
加上结余	805 000
使我们可以用来减轻税收的总数	2 149 000 英镑

然而，格莱斯顿先生关于减轻旧税的建议是什么呢？当然，我不准备让自己过深地陷入这个迷宫。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了解清楚的。因此，我只想提一下它的一些要点：

- (1) 废除肥皂税，这项税收目前的总额是 1 397 000 英镑。
 - (2) 在大约三年内逐步降低茶叶税，使茶叶税从 2 先令 $2\frac{1}{4}$ 便士降低到 1 先令。
 - (3) 降低大量小商品的税。
 - (4) 缩减爱尔兰以统一公债券形式借的 400 万英镑债款。
 - (5) 根据罗·格罗夫纳勋爵完全废除律师执照税的建议，把这项税降低一半。
 - (6) 根据吉布森先生的建议，把广告税降低到 6 便士（但议院已经通过完全废除这项税收的决定）。
- 最后：
- (7) 废除对报纸增刊的印花税（这对唯一的一家出增刊的报纸《泰晤士报》来说是件莫大的喜事）。

简单说来，这就是格莱斯顿先生在四个多月中苦心制定的预算的要点。下院预定在下星期一举行的辩论，将使我有机会就联合内

阁的这一创作继续发表意见。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4 月
19 日

载于 1853 年 5 月 3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375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
招魂术。——预算⁶⁸

1853年4月22日星期五于伦敦

据电讯，本月12日在君士坦丁堡及其附近发生了大规模骚乱，有15名基督教徒被一群狂热的土耳其暴民打死或打伤。

“在武装力量的帮助下，秩序很快就恢复了。”

另一条来自哥本哈根的电讯说，议院或者说下院否决了关于新提出的丹麦王位继承制度的内阁咨文。我们可以把这一举动看作是俄国外交的重大挫折，因为咨文是根据伦敦议定书⁶⁹的精神维护俄国利益的，该议定书承认，俄国是丹麦王国的基本继承人。

来自海牙的消息告诉我们，类似两年前在英国由于“罗马天主教的侵犯”⁷⁰而引起的那种激愤情绪，现在在尼德兰已经开始出现，并导致极端新教派内阁的组成。至于德国，或者更确切些说，在它的先前名叫帝国的那一部分，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法兰克福报》编者4月20日的声明更能表明目前中等阶级有教养人士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心态了。为了使贵报读者增长见识，现在我把这个声明的译

文转录如下：

“每一班邮件都给我们送来关于招魂术①的消息，消息之多，是从尼·贝克尔的不朽的《莱茵河之歌》出现以来，以及从1848年三月革命的最初日子以来所未有的。这些消息比任何政治评论都更好地说明，我们重新生活在一个多么无风波和无恶念的时代。但是，不管这些消息多么令人欣慰，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今后不能再给以很多注意，因为我们担心，这些消息完全有可能使我们的读者以及我们自己负担过重，并且最终占满本报的所有篇幅。”

“一个英国人”②就不久前发生的科苏特事件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他在信的结尾写道：

“当联合内阁行将谢世去见它的父亲们，或叔伯们，或老祖宗们的时候，我们要婉转地向勋爵阁下提醒一下约·密勒再世还魂的问题。当然，我们认为，我们不会再听到‘约·’这个名字。‘帕麦斯顿’将取而代之。这个名字长了一点，这是个缺点！然而，我们相信，它已经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的方式加以改进——改称帕姆（Pam）了。它无论在散文中或是诗歌、韵文中，都可以同‘sham（虚伪）、flam（谎言）、cram（欺骗）等字’押韵。”③

我在上星期二写的那篇通讯④中，向你们粗略地评述了一下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现在在我面前已经有了·一本共计50页的对开的官方出版物，标题是：《财政大臣将提出的决议案》和《决议案的说明》。但是，我只打算谈谈这些决议案果真成为大不列颠的法律以后可能引起外国读者兴趣的细节。

① 指当时在一些德国人中间相当流行的让死者亡魂与活者通信息的巫术。——编者注

② 阿·理查兹的笔名。——编者注

③ 阿·理查兹的匿名文章《〈泰晤士报〉和新的火药阴谋》。——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69—76页。——编者注

最重要的是有关关税的决议案。决议案建议取消 123 种小商品的关税,这些关税每年的收入约为 55 000 英镑;这里包括各种制作家具的木料(四种除外)以及室内固定装置、框架和砖瓦。拟降低关税的项目有:第一,茶叶税,1854 年 4 月 5 日以前从 2 先令 $2\frac{1}{4}$ 便士降低到 1 先令 10 便士。第二,12 种食品。现行的杏仁税拟降低到每英担 2 先令 2 便士;干酪从每英担 5 先令降低到 2 先令 6 便士;可从每磅 2 便士降低到 1 便士;坚果从每蒲式耳 2 先令降低到 1 先令;蛋类从每百枚 10 便士降低到 4 便士;桔子和柠檬每蒲式耳降低到 8 便士;黄油从每英担 10 先令降低到 5 先令;葡萄干从每英担 15 先令 9 便士降低到 10 先令;苹果从每蒲式耳 2 先令降低到 3 便士。所有这些商品的税收目前共计 262 000 英镑。第三,降低 133 种食品的关税,这些食品的税收共计 7 万英镑。此外,要简化许多商品的课税方法,以从量税代替从价税。

在消费税方面,我已经说过,建议取消肥皂税,提高啤酒厂主、茶商、咖啡商、烟草商和肥皂制造厂主的执照税税率。

在印花税方面,除了降低律师执照税和广告税以外,还要降低人寿保险税、收据印花税、学徒合同税和出租马车税。

在直接税方面,要降低男仆税、私人马车税、马税、小马税和犬税,并降低抵偿土地税的费用 17.5%。

在邮政方面,要降低寄往各殖民地的邮件的邮资,施行 6 便士的单一税率。

预算值得注意的一个总的特点是,它的大部分措施都是联合内阁在议会本次会议过程中曾极力加以反对,而后才被迫接受的。

格莱斯顿先生现在建议把遗产税扩大到不动产上;然而,就在 3 月 1 日,他还曾经反对威廉斯先生所提出的关于不动产也应当“像动

产一样征收同样的遗嘱检验税和遗产税”的提案！格莱斯顿先生当时曾经宣称——就像托利党³的报纸目前所做的——，那只是表面上的豁免，它已被纯粹由不动产担负的其他税抵销了。同样无可置疑的是，就在3月1日那天，威廉斯先生曾经威胁格莱斯顿先生说：“如果他在这个问题上不让步的话，他将被迪斯累里先生取代。”

格莱斯顿先生现在建议取消或降低大约268种小商品的保护性关税。然而，就在3月3日他还曾经反对休谟先生所提出的“关于立即废除大约285种商品的纯粹保护关税”的建议。同样无可置疑的是，迪斯累里先生曾经在当天断言：

“我们不能死抱住保护关税制度的破衣烂衫不放。”

格莱斯顿先生现在建议把广告税削减一半。然而，就在他提出自己的预算的四天之前，他还曾经反对米尔纳·吉布森先生关于取消这种税的建议。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他在议院的表决中遭到了失败。

我们还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联合内阁向曼彻斯特学派⁶⁴所作的这些让步一一列举下去。这些让步究竟证明什么呢？这些让步证明：工业资产阶级，尽管它目前在议院中的力量微弱，仍然是左右局势的真正主人；任何政府，辉格党⁶¹政府也好，托利党政府也好，联合政府也好，只有为资产阶级做好准备工作，才能保持住政权，而不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纵观1825年以来的不列颠立法，大家就会发现，只是以在财政方面对资产阶级不断让步为代价，才在政治方面抗住了资产阶级。而寡头政治却不能理解下面这一简单的事实：政治权力只不过是经济权力的产物；迫使寡头政治让出经济权力的那个阶级，将来总有一天也会夺得政治权力。当路易十四在柯尔培尔帮助之下

亲自制定对工厂主有利的法律的时候，他恰恰是准备了 1789 年的革命，而在 1789 年革命中，回答他的“朕即国家”这句名言的，是西哀士的名言：“第三等级就是一切”⁷¹。

预算的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它一丝不差地采用了迪斯累里先生“这位轻举妄动的冒险家”的政策。迪斯累里在议院里大胆断言：商业自由贸易的必然结果是一场财政革命，也就是说，用直接税来逐步代替间接税。格莱斯顿先生究竟提出了些什么建议呢？他要加强和扩大直接税制度，以便削弱和缩小间接税制度。

一方面，他建议，所得税在七年内保持不变。他把这种税扩大到整个民族，扩大到爱尔兰人身上。他仿照迪斯累里先生的做法，把这种税扩大到整个阶级，扩大到收入为 100—150 英镑的人身上。他部分地采纳了迪斯累里先生所提议的增加房屋税的主张，其方式则是采用改变了的执照税的名义，根据房屋面积的大小按比例地增加执照税税率。最后，他把直接税增加了 200 万英镑，办法是对不动产也征收遗产税，这也是迪斯累里先生曾经允诺过的。

另一方面，他也对间接税的两种形式——关税和消费税开刀，在关税方面，采纳了迪斯累里的降低茶叶税的建议，或取消、降低或简化 268 种商品的关税。在消费税方面，完全取消了肥皂税。

格莱斯顿的预算和他的前任的预算之间的唯一差别是，一个是原作者，另一个是抄袭者；迪斯累里取消消费税是为了乡里人的利益，格莱斯顿取消这些税则是为了城里人的利益；迪斯累里虽然宣布了原则，但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不得不在实践上加以窜改，而格莱斯顿虽然反对这项原则，但由于他所参加的那个内阁

的联合性质，却能通过一系列的妥协办法，把这个原则的细节一一付诸实施。

联合内阁的预算可能会有怎样的前途呢？各有关党派会对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一般说来，只有三个问题可能引起剧烈的斗争，这就是所得税问题、遗产税问题和爱尔兰问题。

曼彻斯特学派曾经发誓要反对任何延长目前的征收所得税的“令人反感的不公平”做法。印刷所广场^①的预言家《泰晤士报》，十年来也一直大声疾呼地反对这种“可恶的现象”，大不列颠的舆论一般也都指责现行的不管收入多么不同而划一收税的制度。但是，正是在这个唯一的问题上格莱斯顿先生拒绝作任何妥协。因为迪斯累里先生在他当财政大臣的时候，曾建议修改所得税，把非固定收入和固定收入区别开来，前者每英镑征 5 便士税，后者每英镑征 7 便士税，所以所得税好像成为使保守党人、曼彻斯特学派和《泰晤士报》所代表的“社会舆论”结成共同反对派的一个焦点。

但是，曼彻斯特派是否会履行他们的誓言呢？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他们一向遵循把原则放在一边而大捞眼前利益的商业习惯。而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所提供的眼前利益也决非区区之数。曼彻斯特派的报刊在所得税问题上的语调已经变得非常温和、非常调和了。他们开始用格莱斯顿先生所许诺的“整个所得税将在七年之内终止”^②的前景来安慰自己，而恰恰在这时忘记了，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在 1842 年施行这种税的时候就曾经答应在 1845 年把它取消；

① 《泰晤士报》的所在地。——编者注

② 威·格莱斯顿 1853 年 4 月 18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他们也忘记了，把一种税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对于将来取消这种税是一个大成问题的办法。

至于《泰晤士报》，它将是从小莱斯顿先生关于取消报纸增刊印花税的建议中获得好处的唯一一家报纸。《泰晤士报》每天都出两个增刊，这样每星期就要付4万便士或166英镑13先令的增刊税。由于小莱斯顿先生免收这种税，所有4万便士将全部装入《泰晤士报》的钱柜。因此，我们可以设想，用不着让小莱斯顿先生变成海格立斯，塞卜洛士就将被驯服成为羔羊。在大不列颠的整个议会史上，恐怕很难找到比小莱斯顿先生这种为了换取一家报纸的支持而在预算中为它专门列入一条的做法更不光彩的举动了。本来，废除知识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粉碎报界中的利维坦的垄断。“爱献殷勤的”小莱斯顿先生采取这项措施却恰恰有助于《泰晤士报》的垄断变本加厉。

在原则上，我们坚决认为：小莱斯顿先生否定各种收入来源之间有任何差别，这是对的。如果要区分各种收入之间的质的差别，那就一定要区分它们之间的量的差别，因为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正是收入的量构成收入的质。如果要区分它们之间的量的差别，那么，就必然要采取累进税，而从累进税就会直接跌入某种激烈的社会主义，它无疑是小莱斯顿先生的反对者所憎恶的。按照曼彻斯特学派对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之间的差别所作的狭隘的和利己的解释，我们会得出一个可笑的结论：英国最富的阶级即工商业阶级的收入，只是非固定收入。曼彻斯特学派打着行善的幌子，不过是力图把一部分社会负担从他们自己的肩上转移到土地占有者和公债持有者的肩上罢了。

至于说把遗产税扩大到不动产上，那么，毫无疑问，土地占有者

方面将会坚决加以抵制。他们自然希望还像过去那样不用缴税而获得遗产。但是,迪斯累里先生在担任财政大臣的时候就已经承认这种例外是不公平的,曼彻斯特派将在表决中和大臣们完全一致。《晨报》在昨天^①已经警告土地占有者方面:如果他们在遗产税问题上这么轻率地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么他们就别指望得到自由派的支持。在英国恐怕没有什么别的特权会招致不列颠中等阶级更强烈的反对,也没有什么别的寡头立法的实例会更加引人注目了。1796年皮特曾提出两个法案,一个法案规定对动产征收遗嘱检验税和遗产税,另一个法案规定对不动产也征收这两种税。这两个议案是分别提出的,因为皮特担心,两院议员都会对于对他们的财产征收这些税进行有效的反对。第一个法案在议院中通过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对。只进行了一次表决,只有16个议员投票反对;第二个法案经历了所有的阶段,一直到进行三读的时候被否决,表决结果是30票对30票。皮特眼看没有可能使法案在两院都获得通过,只好把它撤销。如果从1796年起就对不动产征收遗嘱检验税和遗产税的话,国债的绝大部分也许早已得到清偿。土地占有者方面现在能够提出的唯一有力的反对意见,就是公债持有者也得到同样的豁免。但是,它当然不会用这样一些论据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因为这会使天生爱好财政特权的公债持有者起来反对它。

于是,只剩下一个可能有效地反对联合内阁预算的机会了。这就是土地占有者方面和爱尔兰旅⁶³结成联盟。诚然,格莱斯顿先生力图劝爱尔兰人同意把实行所得税的范围扩大到爱尔兰,为此,他赠给他们450万统一公债作为礼物。但是,爱尔兰人坚持认为,这450

^① 1853年4月21日。——编者注

万中有 300 万同 1846—1847 年间的饥荒有关,从来没有被算作国债,而且爱尔兰人民也从来没有承认它是国债。

内阁本身看来是没有获得成功的十分把握的,因为它威胁说,如果预算不能全部通过,那就建议提前解散议院。这对大多数议员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提醒,因为他们“为筹措最近一次竞选的合法费用是支付了一大笔钱的”。这对那些激进派也是一个可怕的提醒,因为他们是恪守反对派的旧定义的,也就是说,反对派在政府机器中执行着安全阀在蒸汽机中所执行的任务。安全阀并不停止机器的运转,而是保证机器的安全,把不放掉就可能使整个设备爆炸的那部分力以蒸汽的形式释放出去。激进派也要把人民的要求像蒸汽一样释放出去。他们提出建议看来仅仅是为了随后再把它们撤销,同时也是为了给自己过剩的滔滔雄辩找到用武之地。

议院的解散只能表明旧政党的瓦解。从联合内阁成立时起,爱尔兰就分裂成两派:政府派和独立派。土地占有者方面也分裂为两个阵营:一个以迪斯累里先生为首;另一个以约·帕金顿爵士为首,尽管目前,在危急的时刻,两个阵营又重新团结在迪斯累里的周围。激进派本身分裂成两派:梅费尔派⁷²和曼彻斯特派。旧政党内部不再有任何凝聚力了,但同时也没有出现真正对抗的力量。新的大选不会改善而只会巩固这种现状。

由于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被揭穿,下院的威信已下降到最低点。但同时,它也日复一日地暴露了它的基础的腐朽,暴露了各选区本身贿赂成风。在这一切都被揭露出来之后,内阁是否还敢冒险诉诸这些打上耻辱烙印的选区——诉诸国民的公断呢?内阁已经无法向国民拿出任何东西,因为它一只手拿着拒绝实行议会改革的决定,另一只手则拿着奥地利提升它担任大陆警察当局首席告密人的

证书⁷³。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4 月
22 日

载于 1853 年 5 月 6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3761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弗·恩格斯

*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⁷⁴

1853年5月1日于伦敦

从前的皇族通常都雇养代鞭童,这些代鞭童享有一种光荣的使命:每逢王孙公子违犯了某种规矩,他们就要用自己低贱的脊背代为挨打受罚。欧洲现今的政治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它建立了一批小的缓冲国,这些小国在任何可能破坏和谐的“均势”的内部纠纷中,都必须扮演替罪羊的角色。为了使这些小国能够相当体面地担任这种值得羡慕的角色,它们在“参加会议的”欧洲列强的一致同意下,被十分隆重地宣布为“中立国”⁷⁵。希腊就是这样的替罪羊,或者说代鞭童,比利时和瑞士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唯一不同的是,这些现代的政治替罪羊,由于它们生存条件的异于寻常而很少受到完全不应该赏赐给他们的鞭打。

在这一类国家中,近来最引人注目的要数瑞士,

每逢君主们胡作非为,遭殃的总是……^①

^① 套用贺拉斯《书信集》第2册第2封信中的一句话:“每逢君主们胡作非为,遭殃的总是亚该亚人。”——编者注

瑞士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人民同他们的统治者发生冲突，瑞士人肯定也少不了麻烦；就这样一直弄到瑞士这个无端招来革命政党鄙视的国家在今年年初又被欧洲大陆的统治者视为异端。瑞士在流亡者问题上同波拿巴皇帝发生纠纷，为此一度几乎导致战争；⁷⁶在纳沙泰尔问题上同普鲁士发生纠纷⁷⁷；在泰辛人和米兰起义²⁴问题上同奥地利发生纠纷⁷⁸；在一些没有什么人关心的问题上同一些德国小邦发生纠纷；和四面八方的纠纷、威胁性的照会、驱逐令、在护照上做手脚、进行封锁——凡此种种，就像冰雹一样落在可怜的瑞士的头上。可是——这也是人的天性——瑞士人仍然自感幸福、满足和骄傲；他们感到面对这种倾盆而下的咒骂和侮辱，要比在政治地平线上万里无云的时候更自在。

对于瑞士的这种光荣的政治地位，欧洲舆论界有一种比较含糊而粗俗的流行说法：欧洲的统治者为了使共和政体丢脸，就创造了一个瑞士；的确，梅特涅或基佐这样的人也许会不止一次地这样说：如果没有瑞士，我们就应当造出一个来。对他们来说，瑞士这样的邻邦实在是一个天赐的宝物。

不要期待我们会重复真革命派或假革命派最近对瑞士和它的制度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责难。早在1848年运动以前，德国革命的共产党的报刊就已经分析了这个问题，指明了为什么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瑞士偏偏总是跟不上欧洲进步的脚步，为什么这个表面上一片共和主义气象的国家实质上总是反动的^①。由于发表了这样的看法，这些报刊当时甚至遭到各种民主派的饶舌者和秘密演说炮制者的猛

① 恩格斯《瑞士的内战》，见1847年11月14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91号。——编者注

烈攻击，他们把瑞士捧作他们的“模范共和国”，直到他们自己终于尝到这种模范制度的滋味为止。现在，这一点已经成了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没有人会来怀疑这个事实，所以只要用几句话就可以把真实的情况说清楚了。

大部分瑞士居民非牧即农，他们在高山地区都经营畜牧业，在适合耕种的地方都经营农业。牧民部落——我们可以称之为部落——属于文明程度最低的欧洲人之列。即使他们在举行审判会时不像土耳其人和黑山人那样采取砍脑袋和割耳朵的办法，但其行为的野蛮程度毫不逊色。在那不勒斯和其他地方的瑞士雇佣兵⁷⁹就充分证明瑞士人能干出怎样残暴凶狠的事情来。农民完全像牧民一样守旧，他们同美国西部地区的农民毫无共同之处；对于后者来说，只有变动，生活才有来源，这些农民每年都开垦出面积超过瑞士整个领土很多的耕地。瑞士农民耕种的还是从前他父亲和祖父耕种的那一小块土地，他们像父辈祖辈一样耕种得马马虎虎，收获的东西也差不了多少；他们的生活同父辈祖辈差不多，因此他们的想法也几乎完全一样。如果不是一部分由贵族世家、一部分由市镇的贵族行会加在他们头上的封建义务和捐税，瑞士农民就其政治存在而言，直到现在还会完全像他们的牧民邻居一样守旧。瑞士人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工业居民，尽管他们自然要比上述两个阶级文明得多，但是由于他们生存的条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受到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对西欧产生的那种巨大的进步影响。在瑞士，很多人还不知蒸汽机为何物；大工厂仅仅在少数地方才有；人力便宜，人口稀少，适合修建磨坊的山地小河比比皆是，——由于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条件，在瑞士产生一种与农业错综结合的小型分散的工业，一种对瑞士最适合的工业生产方式。例如，有几个州发展了钟表业、绦带编织业以及草编

制品和刺绣品等等的生产,但是从来没有因此而兴起一座新的城市,甚至没有使已有的城市有所发展。日内瓦和巴塞尔这两个最富裕、工业最发达(在这方面还要加上苏黎世)的城市,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扩展。因此,如果说瑞士的工业生产几乎还完全保持着蒸汽机发明以前全欧洲普遍采用的那种方式,那又怎么能指望生产者的头脑中,除了与此相适应的思想以外还会有其他思想呢?如果说蒸汽机还没有使瑞士的生产和交通方式革命化,它又怎么能够推翻瑞士人的传统的思想方式呢?

匈牙利宪法和大不列颠宪法有某些相似之处,一些马扎尔人的政界人物就利用这种情况作为根据,企图让我们匆忙作出匈牙利民族几乎和英国人一样先进的结论。然而布达的小商人和兰开夏郡的棉纺大王之间的距离,或者说普斯陶的流动补锅匠和英国工业中心的宪章派⁸⁰工人之间的距离,不仅是千百里,而且是千百年。同样,瑞士也很想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小美国。但是,如果撇开政治制度上表面的相似之处,恐怕没有比美国和瑞士这两个国家更不相同的了。美国在不断变动,不断变化,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之巨大,大西洋两岸的人们现在不过才开始有所认识;而瑞士却停滞不变,如果不是邻邦的工业发展违反它的本意硬把它朝前推动的话,它那些无休止的细小纷争也许会使它永远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转。

对此有怀疑的人,只要仔细看看瑞士铁路的历史就会相信了。如果不是因为有从两侧纵贯瑞士南北的过境运输,在这个国家里根本就不会修起一条铁路来。事实上,现有的铁路也是晚了20年才修建起来的。

1789年的法国入侵和1830年的法国革命,使瑞士农民得以摆

脱封建义务,使工商业居民得以摆脱贵族和行会控制的中世纪枷锁。这一进步标志着州政方面的革命的完成。较先进的州都获得了符合自己利益的宪法。州的这一革命又影响了中央的代表会议^①和行政机关。在州里被击败的政党,在中央仍然很有势力,因而斗争又起。1840—1847年普遍的政治运动,在欧洲各地都引起了初步的斗争。或者说,为决定性的冲突作了准备。由于列强之间的竞争,这个运动在所有二等和三等国家里都使可以称为中等阶级政党的反对派得到了好处。当时瑞士的情况也是这样;英国的道义上的支持,基佐的迟疑不决,梅特涅在意大利陷于困境,这一切使瑞士人顺利地结束了宗得崩德战争⁸¹。1830年在各个自由派的州里取得胜利的政党,这时夺得了中央政权。1848年的革命使瑞士人得以改革他们的封建宪法,使宪法同大多数州的新的政治组织一致起来;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瑞士已经达到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所能取得的政治发展的顶点。瑞士联邦的新宪法是完全适合国家需要的;在币制和通讯传播手段方面不断进行的改革,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工业的立法措施,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可惜得很!换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会对这样的改革感到羞愧,因为传统的丑恶东西是那样多,社会状态是那样古老原始,这些直到现在还在改革中暴露出来。

能够说成是1848年瑞士宪法的成就的,顶多不过是比较文明的那部分瑞士人通过宪法的制定,宣告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由中世纪过渡到现代社会的愿望。但是他们能不能在任何时候都抛弃享有特权的手工业公会、行会以及诸如此类的中世纪的宝贝呢?对于这一点,任何人只要对这个国家有最起码的了解,只要看一看那些可敬的“既

^① 联邦议会。——编者注

得利益集团”怎样竭力反对甚至最必要的改革,就必定会深表怀疑。

因此,当瑞士人周围的欧洲大陆的稳定局面整个都被 1848 年革命连根摧毁的时候,我行我素的瑞士人却仍然安静地生活在他们自家的小圈子里。巴黎、维也纳、柏林、米兰的革命,全都被他们当成进行州际阴谋活动的手段。对于欧洲发生的地震,连瑞士的激进派也无动于衷,觉得它只不过会使保守的邻居因震碎了坛坛罐罐而烦恼罢了。在争取意大利独立的时候,撒丁曾经请求同瑞士结盟,如果当时瑞士能出 2 万或 3 万人加入撒丁军队,那么无疑很快就会把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当 15 000 名瑞士人在那不勒斯为反对意大利自由而作战时,人们无疑会期望瑞士为了维持它所标榜的“中立”总该派出同样多的人去为意大利人而战;但是结盟的建议被拒绝了,这样,在断送意大利的独立事业方面,瑞士人和奥地利的刺刀起了同样的作用。此后,革命派连遭失败,大批的流亡者从意大利、法国、德国涌入了中立的瑞士。但是那里中立已经终止,瑞士的激进派对于既有的成就已经心满意足,而那些起义者,那些使瑞士的监护人和天然尊长——大陆各国的专制政府——的力量受到牵制并使瑞士人得以顺利进行国内改革的起义者,现在在瑞士却遭到了百般欺侮,并且只要追捕者一提出要求,就被驱逐出境。于是,瑞士的邻国政府就一个接着一个对它大加凌辱和欺侮;如果瑞士的民族地位还有点根基的话,如果瑞士的独立不是自吹自擂和空有其名的话,那么每个瑞士人的热血都会因此而沸腾起来的。

从来还没有一个民族像瑞士这样遭到法国、奥地利、普鲁士以及德意志小邦的如此待遇。从来还没有一个国家面对着即使是减半的侮辱性要求而不忿起作决死抗争的。邻邦政府竟敢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在瑞士领土上行使警察权力,它们不仅对流亡者,而且对瑞士警方

人员也行使这种权力。它们不满意自己的下级代理人,要求把他们撤职;它们甚至到了暗示瑞士必须修改某些州的宪法的地步。至于瑞士政府,越是遇到蛮横无礼的要求,它就越是报以低声下气的回答。如果说有时它在言词上带点反抗味道,那么它在行动上必然用更多的逢迎来弥补。屈辱一个接着一个忍受,命令一个接着一个照办,直到瑞士被欧洲鄙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直到它所受的鄙视甚至超过了它的两个“中立”对手——比利时和希腊。而现在,在它的主要敌人奥地利向它提出的要求已经蛮横到甚至使得像德律埃先生这样脾气的政治活动家不表示抗议都难以忍受的时候,瑞士在它给维也纳的最近的也是最勇敢的照会中也只不过表演了一下它是何等卑躬屈节。

瑞士在照会中痛斥争取意大利独立的战士们,其实这些人不仅根本没有表现过任何大逆不道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倾向,甚至没有奢望意大利有像瑞士现行的这样的宪法;这些人甚至也不指望获得像马志尼这样的蛊惑家的名声,而他们在照会中竟然被说成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和一切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当然,对马志尼使用的言词就更凶狠得多了;然而大家都知道,马志尼尽管搞密谋和起义,仍然和德律埃先生本人一样,是一个现存社会秩序的拥护者。因此,交换这些照会的结果只能表明:在原则上瑞士人已经向奥地利人屈服。既然如此,又怎能指望他们在实践中不会向奥地利人屈服呢?

事实是:任何一个蛮横和强硬的政府都能从瑞士人那里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大多数瑞士人过的孤立的生活,使他们根本意识不到共同的民族利益。当然,同一村庄、或同一谷地、或同一州的居民还是可以同心协力的。但是他们从来也不想作为一个民族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不管是什么样的目标)而和衷共济。每一次外国入侵时,

情况只要一严重,例如像在 1798 年那样,一个瑞士人就会出卖另一个瑞士人,一个州就会抛弃另一个州。奥地利人毫无理由地从伦巴第赶走了 18 000 名泰辛人。瑞士人为这件事而大声疾呼,并且为自己不幸的同胞发起募捐。但是,只要奥地利坚持自己的做法,继续禁止那些泰辛人回去,那么你们很快就会看到,瑞士的舆论就会有一个惊人的转变。他们会对募捐表示厌倦,他们会说泰辛人总是干涉意大利的政治,现在这样是咎由自取;还会说泰辛人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瑞士联邦同胞(Keine guten Eidgenossen)。接着还会说,被驱逐的泰辛人会移居瑞士其他州,“夺走当地人的工作”。因为住在瑞士的人并不算是瑞士人,而算是这个州或那个州的当地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会看到我们的这些勇敢的联邦同胞怎样义愤填膺,你们就会看到怎样用各种阴谋诡计来对待奥地利专制统治的受害者,你们就会看到这些泰辛州的瑞士人怎样同逃到瑞士的外国流亡者一样被仇视、被迫害和被诽谤的。这样,奥地利就会得到它所要的一切,而且如果它不辞辛苦去索要的话,它得到的还会多得多。

当欧洲各国恢复自由而正常活动的的能力时,它们就要考虑怎样对待这些在反革命占上风时对它曲意逢迎,对任何革命运动都采取中立甚至敌对态度,同时还冒充自由独立国家的小小的“中立”国。不过,也许到那个时候,病体上的这些赘瘤已经荡然无存了。

卡尔·马克思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4 月
24 日—26 日之间

载于 1853 年 5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7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火箭事件。——瑞士的暴动⁷⁴

1853年4月29日星期五于伦敦

几天前,臭名昭著的警察局长施梯伯在警尉戈尔德海姆和刑法参事讷尔纳的陪同下从柏林来到这里。他们到这里来的特殊使命,就是把罗瑟海特“火药阴谋”同柏林“卡拉布里亚帽”密谋^①联系起来。我从私人方面获悉,这些人曾在肯辛顿的弗略里家里聚会,当时前商店职员希尔施也在场。第二天,这个希尔施又秘密会晤了俄国领事克雷默先生。如果贵报读者还记得我写的关于科隆案件的通讯^②,就一定会发现,制造那一阴谋的同一些人又在进行活动了。

星期六,本月23日,诉讼开始,弯街的治安法官亨利先生出庭审讯黑尔先生,即被政府查封的罗瑟海特火箭工厂的厂主。在这一天,法庭辩论只围绕着一个问题:被查封的爆炸物是不是火药。拖到昨天才作出决定的亨利先生不顾著名化学家尤尔先生的意见,当时宣

① 见本卷第34—37页。——编者注

② 《最近的科隆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63—570页。——编者注

布：这些东西就是火药。因此，他对黑尔先生处以罚款，超过法定额的每一磅火药罚 2 先令，而在他工厂中查出的超过法定额的火药数量是 57 磅。接着，威·黑尔和他的儿子罗·黑尔以及詹·博伊林又被控从 1852 年 9 月 13 日至 1853 年 4 月 13 日断断续续地制造火箭或接受制造大宗火箭订货而到庭受审。政府检察长博德金先生宣布，威·黑尔先生曾数次请求英国政府购买他的火箭而没有成功；他从 1852 年 10 月起雇用了大批工人，其中一部分是外国流亡者；全部生产过程严守秘密；海关的货运报告也驳斥了黑尔先生的火箭经海关运出的说法。博德金先生最后说：

“在黑尔先生那里查出的火箭估计价值 1 000—2 000 英镑。他哪来的这些钱呢？黑尔先生不久以前还是个破产户，后来用每磅债款只还 3 先令的办法才免于破产。”^①

侦缉警官约·桑德斯报告，他查获了

“1 543 枚装有火药的火箭、3 629 颗火箭头、2 489 个火箭底座、1 955 枚未装火药的火箭、22 颗铁弹、2 副火箭发射装置”。

随后一个被传的证人乌泽纳先生说：他当过 15 年的普鲁士炮兵军官，在匈牙利战争期间是少校参谋。他曾在罗瑟海特受黑尔先生父子雇用生产火箭。进厂以前，他因偷窃（据他说是迫于极度贫困）在梅德斯通坐过五六个月的牢。下面就是他的证词的最重要部分的原话：

“我同黑尔父子认识是由科苏特先生介绍的。我因这件事同科苏特先生初

^① 这里和以下两处引文均引自《军用火箭工厂和政府》一文，见 1853 年 4 月 29 日《泰晤士报》第 21415 号。——编者注

次见面是在去年夏天他从美国回来以后。大约在9月中旬,我在科苏特先生陪同下在他家里见到老黑尔先生,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匈牙利人,是科苏特先生的助手。科苏特先生向黑尔先生介绍我说:“这个人在匈牙利军队中服务过,当过普鲁士炮兵军官。我愿介绍他给您参加制造我们的火箭,或者说你们的火箭”——我记不清他究竟说“我们的”还是“你们的”了。科苏特先生对我说,我每周工资18先令,并嘱咐我对这一切严守秘密。他说,黑尔先生会告诉我做什么事。科苏特先生有时说匈牙利语,有时说英语。我觉得黑尔先生大概不懂德语。“秘密”这个词是用德语对我说的。后来罗·黑尔派我到品利科去同科苏特先生见面。我在皮克林街见到了他。威·黑尔和另外一个匈牙利人也在那里。我们当时是要试验一个火箭发射器。当我们大家到齐以后,安装好了机器,对火箭做了试验。我们的谈话一部分是用英语,谈的主要是有关火箭质量等事。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个半小时,当全部工作结束时,科苏特先生和黑尔先生要我们小心地、一个一个地走出去;黑尔先生在街道的一个角落同我们走到一起。科苏特先生在这次会面时再三嘱咐我们要对他同火箭的关系保守秘密。”

接着是通过翻译审问另一名德国人威·格拉赫。他曾在黑尔先生的工厂受雇制造火箭。除了他以外,还有三个匈牙利人。他是由科苏特先生介绍给黑尔先生的,但是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在一起。

亨利先生当时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对被告进行即决裁判,处以五镑的罚款,或者把案件移交陪审法庭。他选择了后者,但是同意黑尔父子二人取保候审。威·黑尔先生说,他拒绝请任何一个朋友作他本人或他儿子的保释人,因此他两人被押往马贩子巷监狱。

很明显,上面所引用的证词显然同小黑尔先生的信(内容我已经向你们报道过^①)完全矛盾,也同科苏特先生给梅恩·里德上尉和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的信^②完全矛盾,科苏特先生在信里证明,他根

① 这句话可能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② 见1853年4月26日《泰晤士报》第21412号。——编者注

本不知道黑尔先生以及他的火箭的事情。而在科苏特先生作出进一步解释以前就从这里作出什么推断是不公正的。至于乌泽纳先生这样一个流亡异国的有才干的同胞,这样一个渴望劳动的人(他愿意每周拿 18 先令的工资当个普通雇工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竟落到迫于极度贫困而偷窃的地步,而一些声名狼藉的游手好闲的德国流亡者却有权胡乱挥霍贴补革命者的为数不多的金钱,作假借名义的传教旅行,进行荒唐可笑的密谋,举行各种小酒馆聚会,相形之下,难道不感到可耻吗?

星期五,本月 22 日,在瑞士的弗赖堡又发生了暴动,这已经是不久以前宗得崩德战争⁸¹以来第五次暴动了。暴动本来要在整个州同时发动,但大多数共谋者在指定时刻都没有出动。三个答应协同行动的“纵队”没有露面。真正进了城的暴动者主要来自法尔瓦尼区和欧提尼、普雷、托尔尼[大托尔尼]、米德等乡镇以及其他邻近地区。早晨 4 点半,一支由 400 名农民组成的队伍,每个人都佩戴了宗得崩德的标志,旗帜上绣着圣母像,沿着通洛桑的大道向弗赖堡挺进。他们的首领是佩里埃上校和领导过 1851 年暴动、而后来得到大会议特赦的大名鼎鼎的农民卡拉德。5 点钟左右,暴动者从“池塘门”进入城市,占据了学院和军火库,在军火库夺取了 150 支枪。报警钟敲响后,市议会立即宣布戒严。热尔贝少校担任了召集起来的国民警卫队的指挥。他命令在学院背后的街道上架起大炮,同时指挥步兵队从正面进攻暴动者。步兵队攻下了通向学院的两段阶梯,迅速地击溃了把守在窗口的农民。战斗继续了一小时左右,进攻者已经有 8 人死亡,18 人受伤;在这个时候,暴动者试图从后面的街道上逃走而没有成功,他们在那里遭到了霰弹的射击,于是就派了一个神父打着白旗出来,宣布愿意投降。

国民警卫队委员会立即成立了军事法庭,判处佩里埃上校 30 年徒刑。审判仍在进行。被捕者约 200 人,其中有维耶雷先生、韦克先生和绍莱先生。有人在罗蒙门附近看到了著名的波雪委员会的主席沙尔先生,但是他没有被捕。除了大托尔尼的神父以外,在被捕者当中还有另外两名神父。至于这一事件造成的物质损失,弗赖堡州在这方面看来不用担心,因为贵族韦克先生财产的一半就足够用来补偿了。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4 月 24 日—29 日之间

载于 1853 年 5 月 14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376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荷兰情况。——丹麦。
——不列颠国债的兑换。
——印度、土耳其和俄国⁸²

1853年5月24日星期二于伦敦

荷兰由于不久以前国会解散而举行的大选，现在已经结束了。选举结果，极端新教派和保皇派的内阁以 12 票取得了多数。

丹麦现在反政府的小册子到处都是，其中最重要的是格伦特维先生写的《向丹麦人民说明议会解散的原因》，以及一本匿名作者的小册子，标题为《关于丹麦王位继承问题的争论，或欧洲列强应当做些什么》。这两本小册子的目的都是要证明，如果按照内阁的要求，执行伦敦议定书⁶⁹的规定，废除自古以来的王位继承法，国家就会灭亡，先变成荷尔斯泰因公国的一个省份，然后沦为俄国的藩属。

由此可见，丹麦人民大概终于认识到，他们盲目反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 1848 年提出的独立要求，给他们自己带来了怎样的后果。丹麦人民曾经坚持要保持丹麦和荷尔斯泰因的永久联合，为此还对德国革命宣战；他们赢得了这场战争，保住了荷尔斯泰因。

但是现在,丹麦人民对这个战果却不得不付出祖国沦亡的代价了。在1848—1849年间,《新莱茵报》曾不断警告丹麦民主派注意他们对德国革命抱敌对态度会招致什么样的最终结果。⁸³《新莱茵报》曾毫不含糊地预言,丹麦在国外帮助别人解除革命的武装,就是把自己永远同这样一个王朝拴在一起,这个王朝当它的王位继承制度经丹麦人自己同意而获得批准和法律效力的时候,就会把丹麦人的民族独立交给俄国沙皇“随意处置”。丹麦民主派拒不听从这一劝告,他们这种目光短浅的愚蠢行为现在正招来波希米亚的斯拉夫人所遭到过的恶果,后者为了“保持自己对德国人的民族独立”,曾经匆忙地投入对维也纳革命派的讨伐,反对了唯一有可能使他们摆脱他们所仇视的德国专制统治的人。这对这两个受反革命唆使而投入自杀性战争来反对革命事业的民族来说,难道不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吗?

现在,当格莱斯顿提出的缩减国债的方案已在议会通过,正在受实践检验的时候,他的辩护师们(伦敦的所有报刊好像都曾经极为欣赏这个出色的方案)却一下子全都沉默了下来。格莱斯顿提出的5亿英镑三厘证券的三种自愿兑换办法,结果都成了天真的愿望,到目前为止,接受其中任何一个办法的人都少得不值一提。至于南海公司⁵⁶证券的兑换,截至5月19日晚为止,总数1000万英镑的证券兑换成新的证券的一共只有10万英镑。根据一般的规律,像这样的业务如果不在头几个星期内完成,以后就越来越没有可能实现。此外,利率在缓慢然而不断地上涨。因此,认为总数1000万英镑的旧证券会在规定时期内兑换成新的证券,恐怕估计得过高了一些。但是,即使情况如此,格莱斯顿先生也得向不愿意兑换他的新证券的南海公司债券持有者偿还至少800万英镑。格莱斯顿先生所掌握的应付这种情况的唯一的一笔资金,是英格兰银行⁸⁴中的总数约八九百

万英镑的国家预算余额。但是,这笔余额不是收入超过支出所产生的结余,而仅仅是在支出以前的几个月暂时存入银行里的一笔国家收入。因此,格莱斯顿先生将来早晚有一天会遇到很大的财政困难,这种困难同时会在银行金融业务中和整个金融市场上引起极为严重的混乱。由于粮食收成可能很坏,还会促使相当多的黄金外流,这将使上述情况更加严重。

东印度公司⁸⁵特许状的有效期到1854年就要满了。约翰·罗素勋爵在下院宣称,政府将在6月3日由查理·伍德爵士出面,宣布政府对今后印度的治理问题的打算。某些支持政府的报纸已经发出一种暗示,而这也就证实了一种广泛传播的传闻,即甚至偌大一个印度问题,也已经被联合内阁几乎缩小到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的地步。《观察家报》正在使英国人民对一次新的失望作思想准备。

在这家不公开的阿伯丁的机关报上,我们读到:

“在重新组织对我们的东方帝国的治理方面,要做的事比通常预料的要少得多。”^①

罗素阁下和阿伯丁阁下要做的事甚至比预料的还要少得多。

在打算进行的改革当中,看来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两项无关重要的小事情:第一,董事会将通过补充几名由王国政府直接任命的新董事而加以“革新”,但即使这些新鲜血液,“在一开始也只能很节省地”注入。这就是说,他们治疗旧董事制度的办法,就是使现在“极其谨慎地”注入的这份新鲜血液在完全停滞之后再注入第二份。第二,将取消法官和税务官的职务由一人兼任的做法,并且只有受过教育

^① 1853年5月23日《观察家报》。——编者注

的人才许担任法官。大家听到这类主张的时候,是否感到回到了中世纪初期呢?在封建贵族担任的法官职务刚开始由熟谙法律的人代替的时候,不也是要求这些人至少要会读会写吗?

将要以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的身分提出这样一个模范改革计划的“查理·伍德爵士”不是别人,他就是在上届辉格党政府时期表现出非凡的智力,以致联合内阁十分为难,不知道怎样安插他,幸而最后灵机一动,把他派到印度去的那位木头^①先生。理查三世曾经要用王国换一匹马^②,而联合内阁却要用一头驴子来换一个王国。的确,如果这种寡头政府的官僚的愚昧无知表明了英国现在的能力,那就意味着英国统治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曾不止一次看到,无论什么措施,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措施,联合内阁也总能找出某种适当的借口拖延下去。而现在,在印度问题上,他们的这种一贯的拖延作风却得到两个世界的社会舆论的支持。英国和印度的人民同时要求联合内阁在印度问题上延期采取任何立法措施,直到听取了当地居民的意见,搜集了一切必要的材料,业已开始的调查工作完成。印度三大管区⁸⁶反对匆忙颁布新法律的请愿书已经送到了唐宁街^③。曼彻斯特学派成立了“印度协会”⁸⁷,协会要立即在首都和全国各地组织群众集会,反对在本届议会会议期间颁布任何有关印度问题的法律。此外,议会中现在还有两个专门委员会正在准备关于印度治理情况的报告。但是联合内阁这一次却铁面无情,它不愿等到任何委员会发表意见的时候。它想

① “伍德”这个姓氏的英文是“wood”,原意为“木头”。——编者注

②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5幕第4场。——编者注

③ 唐宁街是伦敦市中心的一条街,英国政府机构的所在地。——编者注

立即直接地颁布用于 15 000 万人的法律,并且这些法律一下子就管 20 年。查理·伍德爵士一心渴望享有现代摩奴的声誉。我们的这些“谨慎的”政界老朽究竟为什么突然这样匆忙起来,突然表现出这样的立法热情呢?

他们想在更换旧的印度特许状时再延期 20 年。他们老是以改革作借口。为什么呢?因为英国的寡头们已预感到他们的光荣统治的末日即将到来,他们有一种很可以理解的愿望,即想同英国的立法机关订一项合同,有了这项合同,即使不久以后英国摆脱了他们无力然而贪婪的手掌,他们和他们的同伙对印度进行掠夺的特权也可以再保持 20 年之久。

上星期六从布鲁塞尔和巴黎拍来了几份报道君士坦丁堡到 5 月 13 日为止的消息的电讯。接到电讯后,在外交部立即举行了历时三个半钟头的内阁会议。当天,就向朴次茅斯海军部发去电报,命令派 90 式伦敦号和 71 式圣斯帕赖号两艘蒸汽巡航舰从斯皮特黑德开赴地中海。21 式海弗拉尔号和 16 式奥丁号两艘蒸汽巡航舰也同时接到了开赴地中海的命令。

这些使大臣们如此突然地积极起来,并打破了英国一向昏沉沉的安静状态的电讯,其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关于圣地问题⁸⁸已经作了使俄国满意的解决;俄国驻巴黎和伦敦的大使都保证,俄国除要求承认它在这些圣地的优先地位之外,并没有更多的企图。俄国外交目的的侠义性质并不亚于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和狮心理查。至少《泰晤士报》是这样说的。

《辩论日报》说:“但是,5 月 5 日俄国蒸汽巡航舰比萨拉比亚号从敖德萨开来,乘坐该舰的一名俄国上校给缅甸施科夫公爵送来了一份电讯;在本月 7 日星期六那天,公爵就向土耳其政府的大臣们递交了一份协定或者说专门条约的草

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和企图。这一文件可称之为最后通牒,因为它还附有一份很简短的照会,照会指出土耳其帝国国务会议接受或拒绝这一文件的最后期限是5月10日即星期二。照会最后几句话大致是这样:‘如果土耳其政府觉得应当复照拒绝,皇帝将不得不认为这一行动是对他本人和对俄国完全缺乏尊敬的表示,并且将对这一消息深表遗憾’。”^①

这一条约的主要目的,是要求保证俄皇对土耳其政府治下的所有信希腊正教的基督徒的保护权。根据18世纪末签订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³⁹,在君士坦丁堡应该建造一座希腊正教教堂,而且俄国使馆有权干预希腊正教教堂的神父同土耳其人的争端。阿德里安堡条约⁴¹又重申了这项特权。但现在缅施科夫公爵却想把这项不平等的特权变成对土耳其整个希腊正教教会的普遍保护权,即对欧洲土耳其的大多数居民的普遍保护权。此外,他还要求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的牧首和都主教一样享有常任权,只有当他们被证实犯有叛国罪(反对俄国人)时才能被免职,而且必须得到沙皇的同意。换句话说,缅施科夫公爵是要苏丹^②放弃自己的主权,听命于俄国。

星期六的电讯是这样:一、缅施科夫公爵同意把答复他的最后通牒的期限延长到本月14日;二、土耳其内阁成员有变动,俄国的对头路西德帕沙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傅阿德埃芬蒂也复任大臣之职;三、俄国的最后通牒已被拒绝。

在获得一系列辉煌的胜利之后,俄国已不可能向土耳其提出比这更过份的要求了。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俄国是如何顽固地坚持

① 引自X.雷蒙所写的社论,见1853年5月23日《辩论日报》。——编者注

②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着它的已经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欧洲每个反革命的王位虚悬时期都给予它向奥斯曼帝国勒索让步的权利。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从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时候起，欧洲大陆上的倒退总是意味着俄国在东方的扩张。但是现在俄国弄错了，它把欧洲在目前状况同莱巴赫会议和维罗那会议⁶以后的欧洲局势，甚至同蒂尔西特和约⁵以后的欧洲局势混淆了起来。现在，俄国本身害怕革命（在欧洲大陆发生任何大战都必定会引起革命）要比苏丹害怕沙皇^①的侵略厉害得多。如果其他强国抱坚定的态度，俄国就会后退，以保持面子。然而，尽管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俄国最近所耍的手段，无论如何是给了那些从内部瓦解土耳其的分子一个有力的推动。唯一的问题是：俄国现在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行动呢，或者只不过是新的天命——革命——的不自觉的、身不由己的奴隶？我相信后一种可能。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5 月
24 日

载于 1853 年 6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9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卡·马克思

马志尼。——瑞士和奥地利。
——土耳其问题⁹⁰

1853年5月27日星期五于伦敦

马志尼先生正在英国居留这件事，现在终于被一家同他有联系的伦敦报纸发表的一个准官方消息证实。

对黑尔先生父子的“火药阴谋”审讯^①，将不提交本届陪审法庭，而将在8月进行，这是因为联合政府渴望在它作了“揭发”以后，在举行法庭辩论判明这些“揭发”的价值之前尽量拖延时日，使这些“揭发”被人淡忘。

奥地利驻伯尔尼代办卡尔尼茨基伯爵于本月21日接到本国政府命令，要他向瑞士联邦总统^②宣布断绝奥地利和瑞士的外交关系，然后立即离职回维也纳。但是5月23日的《联邦报》却说，奥地利的使节早就获准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随时离开瑞士。也是这家报纸把卡尔尼茨基伯爵的最后通牒说成是奥地利对联邦议会5月4日照会

① 见本卷第95—98页。——编者注

② 威·纳夫。——编者注

的答复。最后通牒包含的内容超出了纯粹的答复,这一点可以从以下的事实中看出来,即联邦议会近日曾要求弗赖堡州政府就它最近对被击败的反叛分子采取的“极端”措施作出解释。英国各报都刊登了5月23日发自伯尔尼的这样一条消息:

“由于奥地利代办向瑞士联邦总统宣布了断绝奥地利和瑞士的外交关系,联邦议会决定立即停止瑞士驻维也纳的使节的工作。”

但是,《瑞士》发表的一篇写于5月23日的文章则对这条消息的主要内容作了纠正:

“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大致和皮埃蒙特一样⁹¹。两国的谈判中断了……奥地利外交使团还留在伯尔尼处理日常事务。《联邦报》说,召回瑞士驻维也纳代办的做法是适宜的,因为他以办理公务为借口在那里公然干他自己的私事,专门做丝绸生意。施泰格尔先生只不过是一个二等外交官,而据我们所知,他对养蚕倒比对他的公务熟悉得多。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从未被授权而如今在维也纳只是办理自己的私事的外交官,没有召回的必要。”^①

所以,希望谁也不要以为瑞士人会记起1789年路斯达洛用来装饰他的《巴黎革命》版面的著名题词:

有些东西之所以显得伟大,
只是因为我们在地下。
——让我们站起来吧!

瑞士人所以表现出勇敢精神,其秘密可以从热那亚公爵^②访问巴黎和比利时国王^③访问维也纳这两件事情上,或许也可以从法国

① 1853年5月24日《瑞士》第120号。——编者注

② 斐迪南多-阿尔伯托-亚马多。——编者注

③ 莱奥波德一世。——编者注

的《通报》5月25日刊载的一篇文章中，得到充分的说明。文章说：

“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应当干涉法国同瑞士的关系，一切其他的想法都必须服从于这个基本情况。”

由此可见，普鲁士国王^①收复纳沙泰尔的希望没有得到多大的鼓励。而且，现在还盛传法国正在瑞士国境线上建立监视部队。路易-拿破仑如果有机会报复一下俄皇、奥皇、普鲁士国王和比利时国王最近几个月内对他的蔑视和奚落^②，当然是非常乐意这样做的。

我在上一篇通讯中的报道，即俄国的最后通牒已被拒绝和反俄的内阁已在君士坦丁堡组成的消息^②，已经被完全证实。5月17日君士坦丁堡发来的最近消息说：

“路西德帕沙上任后，要求缅施科夫公爵延期六天。缅施科夫拒绝了，声称外交关系已断，还说他在君士坦丁堡将再停留三天，以便作好必要的回国准备；他劝土耳其政府再好好考虑一下，并且很好地利用他停留的短暂时间。”

根据5月19日君士坦丁堡发来的消息，我们进一步了解到：

“5月17日举行了土耳其帝国国务会议，结果断然决定不能接受缅施科夫公爵所建议的协定。然而缅施科夫接此通知后，却没有离开君士坦丁堡。相反，他和路西德帕沙重开谈判。俄国使团没有再规定回国的日期。”

与后面这条消息相反，法国政府的机关报《祖国报》(晚报)肯定地声称，政府已获悉缅施科夫公爵离开君士坦丁堡去放德萨，而且这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04—105页。——编者注

一事件在君士坦丁堡并没有引起很大轰动。《国家报》认为这条消息是正确的，但《新闻报》却否定了它。^①不过，日拉丹又说，即使这些消息是正确的，那也不难得到解释。

“如果缅施科夫公爵确实已离开比尤克德列⁹³去放德萨，那也只能说明一个事实：他由于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manqué son effet*)而别无选择，只好从一个港口撤到另一个港口。”

某些报纸断言，德拉修斯海军上将的舰队已经驶过达达尼尔海峡，现在正停泊在金角湾。但是，这种说法已被《晨邮报》否定。《的里雅斯特日报》极力要它的读者相信，土耳其政府在答复缅施科夫公爵以前，曾询问过雷德克利夫勋爵和德拉库尔先生，土耳其政府最后是否可以指望他们的支持。《泰晤士报》则郑重地否定了这一点。

我现在附上巴黎《世纪报》的一段文章的逐字逐句的译文，其中有一些关于从5月5日到5月12日君士坦丁堡谈判的奇妙的细节。它暴露了缅施科夫公爵的行为是如何可笑，这位公爵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极其令人厌恶地时而表现出北方的野蛮作风，时而又大耍拜占庭的两面手法，从而使俄国不折不扣地成了欧洲的笑柄。这个“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②竟想仅仅靠舞台表演去夺取对整个帝国的统治权力。俄国已经迈过了从伟大崇高到荒唐可笑的一步，而这种荒唐可笑是只有用血才能洗刷掉的。但是当今这个进行证券交易的金融寡头时代，已不是骑士竞技的时代了。《世纪报》上的那篇文章是这

① 指1853年5月26日《祖国报》第146号所载沙·席勒的报道、1853年5月26日《国家报》第146号所载J.奥日埃的文章和1853年5月27日《新闻报》所载埃·德·日拉丹的文章。——编者注

② “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意为骗子。——编者注

样说的：

“在5月5日，星期四，法国邮船开走那天，土耳其政府把关于解决圣地问题的敕令副本分别送交德拉库尔先生和缅施科夫公爵。这一天平静度过，未见缅施科夫公爵有任何声明和举动；于是各国大使都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他们根据法国轮船开走这件事，向本国政府发出关于事态已好转的报告。可是，缅施科夫公爵接到关于圣地问题的敕令后，刚到半夜就派了一个普通卡瓦斯（宪兵）给外交大臣^①送去一份最后通牒，要求签订解决圣地问题的条约，条约还要预先为希腊正教教会的特权和豁免权作出保证，也就是要求确立俄国对希腊正教教会的最广泛的保护权，这就等于要求在土耳其有两个不同的皇帝，一个是穆斯林的苏丹，另一个是基督徒的沙皇。公爵只给土耳其政府四天的期限来答复这一最后通牒，同时还要求政府官员立即出具已经收到最后通牒的证明。外交大臣派他的阿加（下级宪兵军官）给缅施科夫公爵送去了一个类似收据的东西。当天夜里，这位公爵派了一艘轮船去敖德萨。到5月6日，星期五，当苏丹^②知道了用这种不寻常的程序递来最后通牒的事情以后，就召开了帝国国务会议，并把这件事正式通知了雷德克利夫勋爵和德拉库尔先生。这两位大使立即商讨共同的对策，建议土耳其政府用最温和的语言和措词拒绝这一最后通牒。此外，据说德拉库尔先生已经非常有礼貌地声明，在圣地问题方面，法国将反对任何侵犯它根据1740年条约而得到的权利的协定。这时，缅施科夫公爵已回到比尤克德列去了（像阿基里斯回到他的营幕里去那样）。5月9日，坎宁先生请求同公爵会晤，打算促使他采取温和一些的行动。公爵拒绝了。5月10日，陆军大臣^③和外交大臣在总理大臣^④那里，总理大臣邀请缅施科夫公爵到他那里去，目的是试图达成一个合理的协议。公爵又拒绝了。不过，缅施科夫公爵还是向土耳其政府示意，他愿意把期限再延长三天。但是苏丹和他的大臣们回答说，他们已经作了决定，时间并不能改变这些决定。土耳其政府的这一否定回答于5月10日午夜送到比尤克德列；整个俄国使团都集合在那里，并在最近好几天中都做出准备离开的样子。土耳其内阁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正准备作出让

① 利法特帕沙。——编者注

②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③ 穆罕默德-穆特吉姆帕沙。——编者注

④ 穆罕默德-阿里帕沙。——编者注

步,这时苏丹解散了内阁,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府。”^①

现在,我从《立宪主义者报》摘录一段文章来结束我关于土耳其情况的报道,这段文章描述了希腊正教教士在整个谈判期间的情况:

“与这个问题有密切关系的希腊正教教士们宣布赞成维持现状,即维护土耳其政府。他们全都反对俄皇^②要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保护权。总的来说,希腊正教徒希望得到俄国的支持,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即他们不受俄国的直接统治。他们一想到东正教教会这个俄国教会之母将来有一天竟然要受俄国教会的统辖,就感到无法接受,而彼得堡当局的方案如被接受,这种局面是必定要出现的。”^③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5 月
27 日

载于 1853 年 6 月 1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91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
- ① H. 拉马谢《东方事件。——拒绝俄国的最后通牒》,见 1853 年 5 月 26 日《世纪报》。——编者注
- ②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 ③ 引自路·博尼法斯所写的社论,见 1853 年 5 月 26 日《立宪主义者报》第 146 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⁹⁴

有一位思想极其深刻但又怪诞的研究人类发展原理的思辨哲学家^①，常常把他所说的两极相联规律赞誉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在他看来，“两极相联”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

“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②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这看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荒诞的说法，然而，这决不是什么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

① 乔·威·弗·黑格尔。——编者注

② 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

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⁹⁵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起来。同时，这个帝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

在1830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可是从1833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因此皇帝^①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后果之外，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行贿受贿完全腐蚀了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可是，那些靠纵容私贩鸦片发了大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权威——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所以几乎不言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

中国过去几乎不输入英国棉织品，英国毛织品的输入也微不足道

① 道光帝。——编者注

道,但从1833年对华贸易垄断权由东印度公司⁸⁵手中转到私人商业手中之后,这两种商品的输入便迅速地增加了。从1840年其他国家特别是我国^①也开始参加和中国的通商之后,这两项输入增加得更多了。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本国工业也发生了类似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者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损害,结果社会生活也受到了相应程度的破坏。

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因此,1853年1月5日皇帝^②在北京下的一道上谕中,就责成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督抚减缓捐税,特别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准额外加征;否则,这道上谕中说,“小民其何以堪?”又说:

“……庶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不致再受迫呼迫切之累。”⁹⁶

这种措辞,这种让步,记得在1848年我们从奥地利这个日耳曼人的中国也同样听到过。

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

① 指美国。——编者注

② 咸丰帝。——编者注

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可是现在,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场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

我们时常提请读者注意英国的工业自 1850 年以来空前发展的情况。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尽管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发现,尽管人口大量地、史无前例地外流,但是,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话,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英国需要开辟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这是英国降低茶叶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英国预期,随着茶叶进口量的增加,向中国输出的工业品也一定增加。在 1833 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以前,联合王国对中国的年输出总值只有 60 万英镑,而 1836 年达到了 1 326 388 英镑,1845 年增加到 2 394 827 英镑,到 1852 年便达到了 300 万英镑左右。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数量在 1793 年还不超过 16 067 331 磅,然而在 1845 年便达到了 50 714 657 磅,1846 年是 57 584 561 磅,现在已超过 6 000 万磅。

上一季茶叶的采购量从上海的出口统计表上可以看出,至少比前一年增加 200 万磅。新增加的这一部分应归因于两种情况:一方面,1851 年底市场极不景气,剩下的大量存货被投入 1852 年的出口;另一方面,在中国,人们一听到英国修改茶叶进口的法律的消息,便把所有可供应的茶叶按提高很多的价格全部投入这个现成的市

场。可是讲到下一季的茶叶采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点可以从伦敦一家大茶叶公司的下面一段通信中看出:

“上海的恐慌据报道达到了极点。黄金因人们抢购贮藏而价格上涨 25% 以上。白银现已不见,以致英国轮船向中国交纳关税所需用的白银都根本弄不到。因此,阿礼国先生同意向中国当局担保,一俟接到东印度公司的期票或其他有信誉的有价证券,便交纳这些关税。从商业的最近未来这一角度看,金银的缺乏是一个最不利的条件,因为它恰恰是发生在最需要金银的时候。茶和丝的收购商有了金银才能够到内地去采购,因为采购要预付大量金银,以使生产者能够进行生产…… 每年在这个时候都已开始签订新茶收购合同,可是现在人们不讲别的问题,只讲如何保护生命财产,一切交易都陷于停顿…… 如不备好资金在四五月间把茶叶购妥,那么,包括红茶绿茶的精品在内的早茶,必然要像到圣诞节还未收割的小麦一样损失掉。”^①

停泊在中国领海上的英、美、法各国的舰队,肯定不能提供收购茶叶所需的资金,而它们的干涉却能够很容易地造成混乱,使产茶的内地和出口茶叶的海港之间的一切交易中断。由此看来,收购目前这一季茶叶势必要提高价格——在伦敦投机活动已经开始了,——而要收购下一季茶叶,肯定会缺少大量资金。问题还不止于此。中国人虽然也同革命震荡时期的一切人一样,愿意将他们手上全部的大批存货卖给外国人,可是,正像东方人在担心发生大变动时所做的那样,他们也会把他们的茶和丝贮存起来,非付给现金现银是不大肯卖的。因此,英国就不免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它的主要消费品之一涨价,金银外流,它的棉毛织品的一个重要市场大大缩小。甚至《经济学家》杂志,这个善于把一切使商业界人心不安的事物化忧为喜的乐观的魔术师,也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

^① 1853年5月21日《经济学家》第508期。——编者注

“我们千万不可沾沾自喜,以为给我们向中国出口的货物找到了同以前一样大的市场……更可能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要倒霉,对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产品的需求量要减少。”^①

不要忘记,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他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现在大不列颠到处都在抱怨大部分庄稼情况不好。关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说:

“在英国南部,不但会有许多田地错过各种作物的农时而未播种,而且已经播种的田地有许多看来也会是满地杂草,或者是不利于谷物生长。在准备种植小麦的阴湿贫瘠的土地上,显然预示着灾荒。现在,种饲用甜菜的时节可以说已经过去了,而种上的很少;为种植芜菁备田的季节也快要过去,然而种植这一重要作物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却一点也没有完成……雪和雨严重地阻碍了燕麦的播种。早播种下去的燕麦很少,而晚播种的燕麦是很难有好收成的……许多地区种畜损失相当大。”^②

谷物以外的农产品的价格比去年上涨20%、30%、甚至50%。欧洲大陆的谷物价格比英国涨得更高。在比利时和荷兰,黑麦价格足足涨了100%,小麦和其他谷物也跟着涨价。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

^① 1853年5月21日《经济学家》第508期。——编者注

^② 1853年5月14日《经济学家》第507期。——编者注

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这些贩卖“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族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族鞑靼人^①征服了全国以后才形成成为一种政治原则。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族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⁹⁷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

同时,从印度这方面来看还必须指出,印度的英国当局的收入,足足有 $\frac{1}{7}$ 要靠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而印度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印度的鸦片生产。不错,中国人不大可能戒吸鸦片,就像德国人不可能戒吸烟草一样。可是大家都知道,新皇帝^②颇有意在中国本国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显然,这将使印度的鸦片生产、印度的收入以及印度斯坦的商业资源同时受到致命的打击。虽然利益攸关的各方或许不会马上感觉到这种打击,但它到一定的时候会实实在在地起作用,并且使我们前面预言过的普遍的金融危机

① 西方通常将中国北方诸民族泛称为“鞑靼”。所谓“满族鞑靼人”也就是满族。——编者注

② 咸丰帝。——编者注

尖锐化和长期化。

欧洲从18世纪初以来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1848年的革命是这样,1789年的革命也是这样。不错,我们每天都看到,不仅称霸世界的列强和它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现时的列强相互之间的冲突正在一步步尖锐,乃至剑拔弩张,非由国君们来打最后的交道不可了。在欧洲各国首都,每天都传来全面大战在即的消息,第二天的消息又说和平可以维持一星期左右。但是我们可以相信,无论欧洲列强间的冲突怎样尖锐,无论外交方面的形势如何严峻,无论哪个国家的某个狂热集团企图采取什么行动,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繁荣气息,国君们的狂怒和人民的愤恨同样都会缓和下来。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

现在,英国工厂空前扩充,而官方政党都已完全衰朽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从事诈骗活动和证券交易的商行;奥地利则处于破产前夕;到处都积怨累累,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这样的时候,上述危机所必将造成的政治后果是无庸赘述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5月
31日前后

作为社论载于1853年6月14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4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卡·马克思

土耳其问题。——《泰晤士报》。
——俄国的扩张⁹⁴

1853年5月31日星期二于伦敦

在比斯开湾,发现科里海军上将的舰队正开往马耳他,去那里加强邓达斯海军将领的分舰队。关于这件事,《先驱晨报》公正地指出:

“如果在几个星期以前能够让邓达斯海军将领到萨拉米斯附近和法国舰队会合,那么,现在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①

如果俄国企图以实际的军事行动来支援缅施科夫的可笑的示威行动(哪怕仅仅是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那么,它开头的两个行动很可能就是再一次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和侵入亚美尼亚的卡尔斯省与巴统港。这些地方,俄国早在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⁴¹的时候,就曾千方百计地企图弄到自己手里。巴统港是舰船在黑海东部的唯一可以安全停泊的港口,所以,如果俄国占领了它,土耳其就会丧失自己在本都的最后一个海军基地,黑海就要变成纯粹俄国的内海。如果俄国

^① 1853年5月26日《先驱晨报》第22168号。——编者注

占领卡尔斯——亚美尼亚的最富庶、农业最发达的地方，同时再占领巴统，那么，它能够切断英国和波斯之间通过特拉佩宗特的贸易，并且还能为自己建立一个既能对付小亚细亚又能对付英国的作战基地。然而，如果英国和法国能持强硬态度，尼古拉就很难在这一地区实现自己的计划，他就要碰到当年叶卡捷琳娜女皇在同阿迦·穆罕默德斗争时碰到的命运，当时，阿迦·穆罕默德曾经命令他的奴隶们用鞭子把俄国大使沃伊诺维奇和他的随从赶到船上，离开阿斯泰拉巴德。

最近的一些消息在印刷所广场^①引起的慌乱，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泰晤士报》在可怕的打击之后，为了恢复常态，首先就来拼命抨击电报，说它是一个“最奇怪的”工具。《泰晤士报》大叫：“从这些不真实的电讯中，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它用这种办法把自己作了不正确结论的责任都推给电讯，然后就竭力用大臣们在议会里所用的辞句来摆脱和它自己先前的那些“正确”前提的干系。《泰晤士报》声称：

“不管奥斯曼帝国的最终命运怎样，更确切地说，不管统治了这个帝国已有四个世纪的伊斯兰教政权的最终命运怎样，英国和整个欧洲的所有政党有一点是意见一致的，这就是：当地的基督教居民逐步向文明、向独立治理进展，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些民族沦于俄国的桎梏之下，使俄国的巨大版图更加扩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满怀信心地希望，不仅土耳其，而且全欧洲都来抵抗俄国的这种野心；我们希望，只要俄国的这种兼并和扩张的意图真正表现出来，马上就引起普遍的反感和不可遏止的反抗，土耳其的希腊族和斯拉夫族的臣民也是准备积极参加这种反抗的。”^②

① 《泰晤士报》的所在地。——编者注

② 1853年5月28日《泰晤士报》第21440号。——编者注

那么,可怜的《泰晤士报》当初怎么就相信了俄国对土耳其抱着“善良愿望”和它对一切扩张都抱“反感”呢?俄国对土耳其竟然抱着善良的愿望!彼得一世自己早就打算在土耳其的废墟上登上统治的宝座。叶卡捷琳娜也曾一再劝说奥地利并要求法国一同来参与拟议中的肢解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个以她孙子为首的希腊帝国,而且胸有成竹地让她的孙子受了相应的教育,甚至为此还给他取了相应的名字。现在,比较稳健的尼古拉只是要求承认他是土耳其的**唯一的保护人**。但是所有的人都不会忘记,俄国做过波兰的**保护人**、克里木的**保护人**、库尔兰的**保护人**、格鲁吉亚和明格列利亚的**保护人**、切尔克西亚和高加索各部族的**保护人**。现在它又要当土耳其的保护人了!至于俄国对扩张所抱的反感,让我从俄国自彼得大帝以来大量夺取领土的现象中举出以下几个事实罢。

俄国边界向外扩展的情况是:

往柏林、德累斯顿和维也纳方向扩展… 约 700 英里
往君士坦丁堡方向 …………… 约 500 英里
往斯德哥尔摩方向 …………… 约 630 英里
往德黑兰方向 …………… 约 1 000 英里^①

俄国从瑞典手里夺取的领土比这个王国剩下的领土还大;它在波兰夺取的领土相当于整个奥地利帝国;在欧洲土耳其夺取的领土超过了普鲁士的国土面积(不包括莱茵河流域的属地);在亚洲土耳其夺取的领土有全部德国本土那样大;在波斯夺取的领土面积等于一个英国;在鞑靼区夺取的领土面积等于欧洲土耳其、希腊、意大利

^① 见约·麦克尼尔匿名出版的小册子《俄国在东方的进展和现状》1836年伦敦版第32—36页。——编者注

和西班牙的总和。俄国最近 60 年来所夺取的领土,从面积和重要性来看,等于俄罗斯帝国在此以前的整个欧洲部分。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5 月
31 日

载于 1853 年 6 月 14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379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
——查理·伍德爵士的东印度改革⁹⁸

1853年6月7日星期二于伦敦

据伯尔尼消息，联邦议会撤销了弗赖堡军事法庭对早先的暴动参加者的判决，并且指令将他们移交普通法庭，除非州议会予以赦免。于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在“瑞士和奥地利关系断绝”时采取的第一个英勇行动。关于这次关系断绝的必然后果，我在前面一篇论述这个欧洲的“模范共和国”的通讯①中已谈过了。

我在报道关于普鲁士政府命令在国外休假的一些炮兵军官速返职守的消息时，误写了他们在俄国军队中任教官，而我本来是想说，他们在土耳其炮兵部队中任教官，指导野战训练。

住在巴黎的所有俄国将军和其他俄国人，都接到了速返俄国的命令。俄国驻巴黎公使基谢廖夫先生所用的措辞颇带威胁意味，并且耀武扬威地出示了来自彼得堡的信件，这些信件在谈论土耳其问

① 见本卷第107—112页。——编者注

题时语气非常骄横。从这同一个来源还传出一种谣言，说俄国要求波斯让出里海东南端的阿斯泰拉巴德地区。同时，俄国商人正向他们驻伦敦的代理人发出——或者，据报道说已经发出了——指示：“在目前这个时刻，谷物不要急于求售，因为战争迫在眉睫，谷物价格看涨。”最后，所有报纸都得到秘密的暗示：俄国军队正开赴边境；雅西居民在筹备欢迎；俄国驻加拉茨领事^①采购了大批木料，以备在多瑙河上架设桥梁之用；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由《奥格斯堡报》^②和其他亲奥、亲俄的报刊煞费苦心地编造出来的谣言。

这些消息以及一大堆类似的通讯、报道等等，都不过是俄国代理人的可笑企图，他们想使西方世界产生一种能对俄国有利的恐惧心理，迫使西方世界继续执行拖延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掩护下，俄国就可以像过去一样实现它在东方的计划。这一幕骗局是怎样系统地演出的，可以从以下报道看到：

上星期，几家以接受俄国津贴而出名的法国报纸发现：

“真正的争执与其说是在俄土之间，倒不如说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即沙皇和旧俄派之间；对专制君主来说，战争的危险性比遭到坚决要求攻城略地的党派的报复要小得多，这个党派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它会如何对待让它不高兴的那些君主。”^③

缅施科夫公爵自然是“这一党派的首领”。《泰晤士报》和多数其他英国报纸马上就跟着传播这一荒谬的论断，它们当中有的完全意

① M. 科拉。——编者注

② 即《总汇报》或称《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者注

③ 见 1853 年 6 月 4 日《泰晤士报》第 21446 号，文字稍有变动。——编者注

认识到了这种说法的含义，有的则可能是无意识的受骗者。那么公众从这个新发现中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或者是，尼古拉在众口嘲笑之下后退，放弃他对土耳其的好战的态度，那么，他就是战胜了本国好战的旧俄派；或者是，尼古拉真的开战，那么，他这样做只不过是必须向这个（神话故事中的）党派让步罢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只是莫斯科战胜彼得堡或彼得堡战胜莫斯科的问题”，因而决不会是欧洲战胜俄国的问题。

关于这个著名的旧俄派，我曾碰巧从在巴黎与我有许多交往的几位消息灵通的俄国贵族那里得知，这个党派早就完全消失了，只是当沙皇要找一个鬼怪来恐吓西欧，迫使西欧容忍他的傲慢无礼的要求时，才偶尔把这个党派的阴魂招回来给人看。正因为如此，才把缅甸施科夫这样的人挖掘出来，给他相应地穿上神话故事中的旧俄式样的服装。在俄国贵族中，沙皇真正害怕的只有一个党派，这个党派的目的要按照英国模式建立贵族立宪制度。

为了欺骗英国和法国，俄国外交除了召来这些形形色色的鬼怪之外，最近又采取了出于同样的目的的另一措施：出版了博蒙-瓦西子爵的一部著作，书名是《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俄罗斯帝国》。要介绍这本小册子，只须从里面引这样一段就够了：

“大家都知道，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地下室内藏有硬币和金银锭。截至1850年1月1日，这一秘密金库据官方估计价值为99 763 361银卢布。”^①

有谁冒昧地谈论过英格兰银行⁸⁴的秘密金库呢？俄国的“秘密金库”不过是用来担保三倍于此数的可兑银行券流通的黄金储备，还

^① 爱·博蒙-瓦西《维也纳会议以来的欧洲各国历史·俄罗斯帝国》1853年巴黎版第6卷第346—347页。——编者注

不包括那些由帝国财政部发行的不可兑纸币的秘密数额。不过，也许这个金库确实可以称之为“秘密的”，因为除沙皇政府挑选出来每年检查储藏这些财宝的钱袋的少数几个彼得堡商人之外，至今还没有人看见过。

但是，俄国在这方面的主要表演，还是在《辩论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由老奥尔良派贤人圣马尔克-日拉丹先生署名的文章。现在我引证一段：

“我们认为，欧洲有两大危险，一个是威胁它独立的俄国，一个是威胁它的社会制度的革命。现在欧洲只有使自己完全面临一个危险，才能避免另一个危险。如果欧洲认为，它的独立，特别是欧洲大陆的独立的关键在君士坦丁堡，问题只有在君士坦丁堡才会得到果断的解决，那么，这就意味着跟俄国开战。在这个战争中法国和英国会为保障欧洲的独立而战。德国将如何行动呢？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当前的欧洲形势下，战争就意味着社会革命。”①

当然，圣马尔克-日拉丹先生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求得和平而反对社会革命。但是他忘了，俄国皇帝对革命的“恐惧”，至少同他本人及其东家贝尔坦先生一样。

尽管俄国外交部门给英国报界和英国人送上了上述种种麻醉药，但“老顽固”阿伯丁仍然不得不命令海军将领邓达斯到土耳其沿海与法国舰队会合。甚至最近几个月来只会说俄国话的《泰晤士报》，看来也获得了更多的英国灵感。它现在说话也趾高气扬，神气活现了。

自从英国报界终于也发现丹麦问题(过去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牵涉到俄国的扩张意图(它也就是造成东方纠纷的原

① 引自 1853 年 6 月 1 日《晨报》第 19326 号。——编者注

因)之后,这个问题在英国开始引起很大的关注。土耳其和东方制度的著名崇拜者,下院议员乌尔卡尔特先生出版了一本论述丹麦王位继承的小册子^①,这本小册子我将在今后的一篇通讯中加以评论^②。这本书提出的主要论点是:俄国打算让松德海峡为它在北方起达达尼尔海峡在南方所起的作用,就是说,利用松德海峡来保障它在波罗的海的海上霸权,就像占领达达尼尔海峡来保障它在攸克辛海的海上霸权一样。

不久前我曾经告诉你们,英国的利率会上升,这种情况对格莱斯顿先生的财政方案将起不良的影响。^③果然,英格兰银行上星期就把最低贴现率从3%提到3.5%。我曾预言格莱斯顿先生的国债兑换方案必遭失败,现在这已成为事实,这一点从下面的材料就可看出来:

英 格 兰 银 行

1853年6月2日星期四

截至今天为止已承兑的新证券的价值:

	英镑	先令	便士
三厘五证券	138 082	0	3
二厘五证券	1 537 100	5	10
国库债券	4 200	0	0
共 计	1 679 382	16	1

① 指戴·乌尔卡尔特的册子《俄国在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中的《丹麦王位继承》部分。——编者注

② 马克思没能实现这篇文章的写作计划。——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01—102页。——编者注

南海公司⁵⁶

1853年6月2日星期四

截至今天为止可兑的有年收入的证券的价值：

	英镑	先令	便士
三厘五证券	67 504	12	8
二厘五证券	986 528	5	7
国库债券	5 270	18	4
共 计	1 059 303	16	7

这样，在要兑换的南海公司有年收入的证券总额中，只换了八分之一，而在格莱斯顿先生所发行的为数2 000万的新证券中，总共只承兑了十二分之一。因此，格莱斯顿先生将不得不在利率已经上升，而且很可能还将继续上升的时候借债，而且这笔借款的数额将达8 157 811英镑。格莱斯顿先生失败了！预期通过这次兑换而节省的并且已经记入预算收入部分的10万英镑，也因此成为泡影。在国债的大部分即5亿英镑的三厘证券方面，格莱斯顿先生通过自己的财政实验所取得的唯一结果是：到1853年10月10日又是一年了，在此期间他不可能实行任何兑换。而最糟的是，几天以后就要付给国库票持有者现金3 116 000英镑，因为这些人拒绝根据格莱斯顿先生所提出的条件更换新的国库票。这就是“群贤”政府的财政成就。

在就爱尔兰教会收入问题进行辩论时(下院，上月31日)，约翰·罗素勋爵声称：

“从罗马天主教教士在英国的行为来看,从天主教会在其首脑①——他本人是外国的君主——指使下的行动来看,近几年来已经很明显:罗马天主教教士力图取得政治权力(喊声:“对!对!”),在我看来,这是与对王国的不二忠诚不相容的(喊声:“对!对!”),也是与对普遍自由事业的不二忠诚,对国家的每一个臣民所肩负的义务的不二忠诚不相容的。我想和在我以前发言的那位受尊敬的绅士②同样地直吐肺腑,所以希望议院不要对我误解。我决不否认,许多议员,许多罗马天主教人士,无论是在我们国家或是在爱尔兰,都是忠于王权,忠于我们国家的自由的;我要说的,而且我深信不疑的是,如果罗马天主教教士扩大了授予他们的权力,如果他们作为教士获得比他们现在具有的更大的控制权和更大的政治影响和控制,那么,他们就不会按照在我们国家中大放异彩的普遍自由来使用这种权力(喊声:“说得好!”),他们在政治权力以及在其他问题上,都不会做出有益于辩论的普遍自由,有益于人类智慧的活力和生机,即有益于构成我们国家宪法的精髓的事来。(掌声如雷!)我认为,在这方面,不可以把罗马天主教教士同苏格兰长老会教徒相提并论(口哨声!),同我们国家的卫斯理宗教徒⁹⁹,同我们国家的国教会相提并论(全场欢动。)……所以,我必须作这样一个结论,——虽然完全出于无奈,却又非常坚决地作这样一个结论:由国家支持爱尔兰的罗马天主教会,而不是支持这个国家的新教教会,这不是我们国家的议会应当采纳或批准的事情。”③

在约翰勋爵发表这个千万遍地力图用狂热崇拜某些偏执的新教教派的态度来表示自己“对普遍自由”的热爱的演说后两天,萨德勒先生、基奥先生和蒙塞尔先生向联合内阁递交了辞呈,辞呈是以蒙塞尔先生致阿伯丁阁下的一封信的方式提出的。阿伯丁阁下在6月3日的答复中向这些绅士保证:

“我和我的许多同僚,对于约翰·罗素勋爵的那些使你们不满的意见和感情的流露也都不以为然……约翰·罗素勋爵希望我转告你们,他并不是责备罗

① 庇护九世。——编者注

② 弗·卢卡斯。——编者注

③ 约·罗素 1853 年 6 月 3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马天主教徒不忠诚。”

于是，萨德勒、基奥和蒙塞尔等先生收回了他们的辞呈。昨天晚上议会作出了使大家重归于好的安排，令“约翰·罗素勋爵非常满意”^①。

1783年的上一个印度法案曾经成为福克斯先生和诺思勋爵的联合内阁的致命伤。1853年的新印度法案很可能成为格莱斯顿先生和约翰·罗素勋爵的联合内阁的致命伤。但是如果说前者的垮台是由于他们企图取缔董事会和股东会，那么后者可能遭到类似的命运却是由于相反的原因。6月3日，查理·伍德爵士请求准许他宣读一项印度管理法案。查理爵士一开头先为他要发表特别长的演说请求原谅，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牵涉到15 000万生灵”^②。查理爵士说他可以为了这些同属英国臣民的同胞每3 000万人牺牲至少一小时时间。可是为什么在为这个“重大问题”立法时如此仓促行事，而在处理“甚至是最细小的事务”时却如此拖沓呢？因为东印度公司⁸⁵特许状到1854年4月30日就要满期了。可是为什么不通过一个暂时延长期限的法案，留些时间以备将来讨论较长期性的立法措施呢？因为不能期望将来再找到“这样一个机会来从容不迫地讨论这个重大问题”，也就是说，找到机会来把它扣压在议会里。此外，我们还获得了有关这件事的全部材料，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也认为必须在本届议会会议上立法，而印度总督达尔豪西勋爵也来了紧急信，要求政府无论如何要立即制定法律。然而，查理爵士用来论证他的立即制定法律的提案的一个最惊人的论据却是：尽管他看起来已

① 约·罗素 1853年6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查·伍德 1853年6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经准备好要谈许多“他所提出的法案中没有包含的”问题,但是,

“就法律所涉及的而言,他不得不将提交审查的措施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①。

查理爵士在这一番开场白之后,便为近20年来印度的管理作辩护。“我们应该多少用印度人的眼睛来看印度”,印度人的眼睛有一种特殊的天性:看英国事事光明,看印度则处处黑暗。

“印度人是这样一个民族,它因循守旧,它受着宗教偏见和古老风俗的束缚。在那里实际上存在着种种阻挠迅速进步的障碍。”^①

(也许在印度存在着一个辉格⁶¹联合党。)

查理·伍德爵士说:“最受到强调并且作为提交给委员会的申诉书的主要内容各点,涉及司法权的行使、公共工程的缺乏和土地的使用。”^①

关于公共工程,政府打算兴办一些“规模和意义最大的”工程。关于土地的使用,查理爵士十分成功地证明:现有的三种土地使用形式——柴明达尔制度¹⁰⁰、莱特瓦尔制度¹⁰¹和村社制度——只不过是公司手中经营财政的三种形式^②,其中任何一种都无法普遍推广,而且也不值得普遍推广。至于建立另一种形式即性质上截然相反的形式问题,查理爵士的脑子里根本没有想到过。

他继续说:“关于司法权的行使,申诉所涉及的,主要是由于英国法律的程序问题而产生的困难以及据说英籍法官不称职,土著官吏和法官贪污腐败。”^①

于是,为了证明在印度要保证司法权的行使是多么困难,查理爵

① 查·伍德 1853年6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41—244页。——编者注

士说,早在 1833 年就已经在印度任命了一个专门的法律委员会。但是,根据查理·伍德爵士本人的陈述,这个委员会是怎么工作的呢?该委员会的全部工作成果就是:在麦考莱先生的主持下制订了一部刑法典。这部法典曾分发给印度各地方当局,各地方当局又把它送回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又送往英国,以便再从英国返回印度。在印度,比顿先生代替麦考莱先生任法律顾问之后,法典作了彻底修改。那时总督并不认为“拖延就是软弱和危险的根源”,他以已作彻底修改为借口,把法典送回了英国,之后法典再从英国送回给总督,同时授权总督按照他认为是最好的样子批准法典。但是比顿先生死了,总督认为最好是把法典交给第三个英国法学家^①——一个对印度人的风俗习惯一无所知的法学家去裁夺,这样他就为自己保留了等这位完全不称职的官员拼凑好一部法典后再来加以否定的权利。这部至今尚未问世的法典的奇异经历就是如此。至于说到印度法律程序荒谬的问题,查理爵士在这里作为根据的英国法律程序本身也是同样荒谬的;他肯定英国法官在印度是绝对廉洁奉公的,但是他仍然甘愿牺牲他们,改变对他们的任命办法。查理爵士把德里目前的状况同库利汗入侵时期的状况作了比较,用这种办法来证明印度已普遍进步。用来为盐税作辩护的,是从最有名望的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引来的论据,他们都曾经主张对某些生活必需品课税。但是,查理爵士没有补充说明这些经济学家在知道近两年的情况以后会说些什么。在 1849—1850 年度和 1851—1852 年度的两年里,盐的消费量缩减了 6 万桶,这就使总数为 200 万英镑的盐税收入减少了 415 000 英镑。查理爵士提出的“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的”措施是:

^① 巴·皮科克。——编者注

1. 董事会应由 24 人减至 18 人, 其中 12 人由股东选出, 6 人由王国政府任命。

2. 董事的薪金由一年 300 英镑增至 500 英镑, 董事长领取 1 000 英镑。

3. 印度的民政机关的所有普通职务以及军事机构的所有技术职务都通过公开的竞争来任命, 董事只任命正规军骑兵的低级军官。

4. 总督一职和孟加拉省督一职分开; 授权最高权力机关在印度河区域设置一个新的管区。

5. 最后, 上述各项措施只在议会没有作出新规定之前有效。

查理·伍德爵士的讲话和他所提出的措施, 遭到布莱特先生的非常强烈而尖刻的批评; 但是, 布莱特所描绘的印度由于公司和政府的财政勒索而被破坏的情景, 当然不包括印度被曼彻斯特和自由贸易破坏的情形。至于—位东印度公司的老手, 公司的董事或者说前任董事詹·霍格爵士昨天晚上的讲话, 我确实感到我早在 1701、1730、1743、1769、1772、1781、1783、1784、1793、1813 和其他年份的报告中就拜读过了。为了回答他的董事颂词, 我只从据我记得是在他亲自监督下出版的关于印度的年度报告书中引用一些材料:

印度纯收入总额

1849—50	20 275 831 英镑	} 3年内收入减少 348 792 英镑
1850—51	20 249 932 英镑	
1851—52	19 927 039 英镑	

支出总额

1849—50	16 687 382 英镑	} 3年内支出增加 1 214 284 英镑
1850—51	17 170 707 英镑	
1851—52	17 901 666 英镑	

土地税

过去4年中土地税总额：

孟加拉	摇摆于 3 500 000 英镑到 3 560 000 英镑之间
西北区	摇摆于 4 870 000 英镑到 4 990 000 英镑之间
马德拉斯	摇摆于 3 640 000 英镑到 3 470 000 英镑之间
孟买	摇摆于 2 240 000 英镑到 2 300 000 英镑之间

	1851—52 年的	1851—52 年的
	总收入	公共工程支出
孟加拉	10 000 000 英镑	87 800 英镑
马德拉斯	5 000 000 英镑	20 000 英镑
孟买	<u>4 300 000 英镑</u>	<u>58 590 英镑</u>
在	19 300 000 英镑中只有 166 390 英镑	

用于修建道路、水渠、桥梁及其他必需的公共工程。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6 月 3
和 7 日

载于 1853 年 6 月 22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3801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¹⁰²

1853年6月10日星期五于伦敦

来自维也纳的电讯报道,那里都认为土耳其问题、撒丁问题和瑞士问题肯定会得到和平解决。

昨晚上院继续辩论印度问题,辩论情况同往日一样平淡无味。布莱克特先生责备查理·伍德爵士和詹·霍格爵士,说他们的发言带有假装乐观的味道。内阁和董事会^①的一批辩护士对这个责难极力加以反驳,而无所不在的休谟先生则在结论中要大臣们把他们的法案收回。辩论决定暂停。

印度斯坦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喜马拉雅山相当于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伦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锡兰岛相当于西西里岛。在土地出产方面是同样地富庶繁多,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被征服者的刀剑压缩为各种大大小小的国家,印度斯坦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它不处于伊斯兰教徒、莫卧儿人¹⁰³或不列颠人的压迫之下时,它就分解成像它的城镇

① 当指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编者注

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和互相敌对的邦。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印度斯坦却不是东方的意大利,而是东方的爱尔兰。意大利和爱尔兰——一个淫乐世界和一个悲苦世界——的这种奇怪的结合,早在印度斯坦宗教的古老传统里已经显示出来了。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崇拜林伽¹⁰⁴的宗教,又是崇拜札格纳特¹⁰⁵的宗教;既是僧侣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

我不同意那些相信印度斯坦有过黄金时代的人的意见,不过为了证实我的看法也不必搬出库利汗统治时期,像查理·伍德爵士那样^①。但是,作为例子大家可以举出奥朗则布时期;或者莫卧儿人出现在北方而葡萄牙人出现在南方的时代;或者伊斯兰教徒入侵和南印度七国争雄¹⁰⁶的年代;或者,如果大家愿意,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古代去,举出婆罗门¹⁰⁷本身的神话纪年,它把印度灾难的开端推到了甚至比基督教的世界创始时期更久远的年代。

但是,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我在这里所指的还不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⁸⁵在亚洲式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¹⁰⁸里任何狰狞的神像都更为可怕。这并不是不列颠殖民统治独有的特征,它只不过是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模仿,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所以为了说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所作所为,只要把英国的爪哇总督斯坦福·拉弗尔斯爵士谈到旧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¹⁰⁹时说过的这段话一字不改地引过来就够了:

① 见本卷第134页。——编者注

“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心只想赚钱，它对它的臣民还不如过去的西印度种植场主对那些在他们的种植场干活的奴隶那样关心，因为这些种植场主买人的时候是付了钱的，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却没有花过钱，它开动全部现有的专制机器压榨它的臣民，迫使他们献出最后一点东西，付出最后一点劳力，从而加重了恣意妄为的半野蛮政府所造成的祸害，因为它把政客的全部实际技巧和商人的全部独占一切的利己心肠全都结合在一起。”^①

内战、外侮、革命、征服、饥荒——尽管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地对印度斯坦造成的影响显得异常复杂、剧烈和具有破坏性，它们却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

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

^① 托·斯·拉弗尔斯《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151页。——编者注

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荒废，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佩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现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财政部门 and 战争部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自由放任¹¹⁰原则——行事的农业便衰败下来。但是我们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因此，假如没有同时发生一种重要得多的、在整个亚洲的历史上都算是一种新事物的情况，那么无论对农业的抑制和忽视多么严重，都不能认为这是不列颠入侵者给予印度社会的致命打击。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曾经造就无数训练有素的纺工和织工的手织机和手纺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欧洲从远古的时候起就得到印度制作的绝妙的纺织品，同时运送它的贵金属去进行交换，这样就给当地的金匠提供了材料，而金匠是印度社会必不可少的成员，因为印度人极其爱好装饰品，甚至社会最下层中的那些几乎是衣不蔽体的人们通常都戴着一副金耳环，脖子上套着某种金饰品。手指和脚趾上戴环戒也很普遍。妇女和孩子常常戴着沉甸甸的金银手镯

和脚镗，而金银的小神像在很多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从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颠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的比例是1:5 200。在1824年，输入印度的不列颠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 400万码。但是在同一时期，达卡的人口却从15万人减少到2万人。然而，曾以纺织品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的这种衰败决不是不列颠统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

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也像所有东方人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通过农业和制造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中心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从过去英国下院关于印度事务的一份官方报告的下面一段描写中，可以看出这个制度的特殊性质：

“从地理上看，一个村社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和荒地的地方；从政治上看，它很像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镇自治区。它固有的管理机构包括以下各种官员和职员：**帕特尔**，即居民首脑，一般总管村社事务，调解居民纠纷，行使警察权力，执行村社里的收税职务——这个职务由他担任最合适，因为他有个人影响，并且对居民的状况和营生十分熟悉。**卡尔纳姆**负责督察耕种情况，登记一切与耕种有关的事情。还有**塔利厄尔**和**托蒂**，前者的职务是搜集关于犯罪和过失的情况，护送从一个村社到另一个村社去的行人；后者的职务范围似乎更直接地限于本村社，主要是保护庄稼和帮助计算收成。**边界守卫员**负责保

护村社边界,在发生边界争议时提供证据。蓄水池和水道管理员主管分配农业用水。婆罗门¹⁰⁷主持村社的祭祀事宜。教师教村社的儿童在沙上读写,另外还有管历法的婆罗门或占星师等等。村社的管理机构通常都是由这些官员和职员组成;可是在国内某些地方,这个机构的人数较少,上述的某些职务有的由一人兼任;反之,也有些地方超过上述人数。从远古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在这种简单的自治制的管理形式下生活。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或疫病的严重损害,甚至变得一片荒凉,可是同一个村名、同一条村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转归哪一个政权管辖,或者改由哪一个君主统治,反正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始终没有改变。帕特尔仍然是居民的首脑,仍然充当着全村社的小法官或地方法官,全村社的收税官或收租官。”^①

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归于消失,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收税官和不列颠兵士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由于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的作用。这些家庭式公社本来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

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

^① 托·斯·拉弗尔斯《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285页。——编者注

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¹¹¹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总之,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
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

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
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①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6 月 7

日—10 日之间

载于 1853 年 6 月 25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380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① 歌德《致祖莱卡》。——编者注

卡·马克思

英国的繁荣。——罢工。
——土耳其问题。——印度¹¹²

1853年6月17日星期五于伦敦

根据官方公布的材料,不列颠的出口值如下:

1853年4月为	7 578 910 英镑
而1852年4月为	5 268 915 英镑
1853年头4个月为	27 970 633 英镑
而1852年头4个月为	21 844 663 英镑

这表明,在第一种情况下,增长额为2 309 995 英镑,即增长40%以上;在第二种情况下,增长额为6 125 970 英镑,即增长将近28%。如果今后继续这样增长,那么到1853年底,大不列颠的出口总值将超过1亿英镑。

《泰晤士报》在向自己的读者报道这些惊人数字时大唱赞歌,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举国幸福,和谐!”^①但是,该报刚刚大声报告了这

① 1853年6月8日《泰晤士报》第21449号。——编者注

个可喜的发现,在英国全国,特别是在它的北方工业区,就几乎到处都爆发了一系列的罢工,成了《泰晤士报》歌颂和谐的赞歌的一个奇怪的回声。这些罢工,是剩余劳动力相对减少而同时生活必需品价格普遍上涨的必然结果。利物浦罢工的有5 000人,斯托克波特有35 000人,等等。罢工热甚至把警察也传染上了,在曼彻斯特就有250名警察提出辞呈。这种情况使中等阶级报纸(例如《地球报》)完全失去了自制,抛掉了它平时那种慈善家的腔调。它诬蔑、中伤、威胁,并且大喊大叫地要求地方法官只要能找到一点点法律借口就进行干涉(在利物浦实际上已经这么做了)。这些地方官即使本身不是工厂主或商人,像兰开夏郡和约克郡两地通常的情况那样,他们至少也都同商界利益密切相关,并且奉命唯谨。他们允许工厂主逃避执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¹¹³,规避禁止实物工资的法令¹¹⁴,让工厂主不受惩罚地违反其他一切为制止工厂主的“露骨的”贪欲而专门通过的法令;而对结社法¹¹⁵他们总是作最偏颇和最不利于工人的解释。上述的“富有骑士精神的”、以坚持不懈地反对政府干涉而闻名的自由贸易论者⁶⁴,这些宣扬资产阶级“自由放任”¹¹⁰学说、主张让每件事和每个人都置于为个人利益的斗争中的使徒们,一当工人的个人利益同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发生冲突时,总是第一个起来要求政府进行干涉。一遇到这种冲突,他们就以公开艳羡的目光注视着大陆国家,这些国家里的专制政府尽管确实不让资产阶级执政,但至少也不容许工人进行反抗。至于革命政党准备怎样利用厂主和工人之间的这场大冲突的问题,要说明这一点,最好还是向你们转述一下宪章派⁸⁰领袖厄内斯特·琼斯在他动身去即将发生一场运动的兰开夏郡前夕写给我的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马克思：

……明天我要去黑石山脊，那里将举行一个约克郡和兰开夏郡两地宪章派的野营集会。同时，我很高兴地告诉您：北方也正在为举行同样的集会积极进行准备。自从在这个具有宪章运动传统的地区举行真正称得上是全国的大会¹¹⁶以来，已经7年过去了。当前这次大会的目的如下：1848年的叛变和分裂，当时的组织由于它的500个领导人被关进监狱和流放而瓦解，宪章派的队伍由于流亡国外而削弱，政治热情因受工商业繁荣的影响而低落，——这一切使得全国的宪章运动变成孤立的行动，而宪章运动的组织恰恰在社会知识广泛传播的时候却显得虚弱无力。但是，由初步地盲目探索社会知识而产生的工人运动，在纯政治运动的废墟上成长了起来。这一工人运动起先表现为进行分散的合作尝试；后来当发现这样做不成功时，就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争取限制机器开动的的时间，废除克扣工资的制度，对结社法案作新的解释。工人阶级把全副精力和注意力都放到了这些本身是好的措施上。争取使这些措施获得立法保障的尝试遭到失败以后，在不列颠工人思想中产生了更加革命的倾向。这就为把群众团结在真正社会改革的旗帜下提供了机会，因为大概所有的人都明白：不管从满足目前的迫切要求来看上述的措施怎样好，但是它们对未来不能提供任何保证，并且不能体现社会权利的任何根本原则。目前的情况是：人民对现状不满，而与此同时，由于同工商业的繁荣相比劳动力相对不足，人民力量有所增长，这种情况也给运动提供了机会，使运动具有顺利发展的力量。现在到处发生罢工，并且大体上都取得成功。但遗憾的是：本来可以用于治本的力量却耗费在暂时性的治标办法上。因此我正试图同许多朋友一起，利用这种大好机会把零散的宪章运动队伍在社会革命这个健康的原则下联合起来。为此我已经改组了无所作为和不起作用的地方组织，并安排一次我相信将遍及全英国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新的运动将从黑石山脊的野营集会开始，接着就在所有工业郡举行群众集会；同时，我们的代表也正在农业地区进行活动，使农业劳动者同其余的工业社会联合起来——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运动中一直是被忽视的。第一步是要求接受这些人民群众大会所提出的宪章¹¹⁷，并且竭力迫使我们的腐败的议会接受关于实行宪章的建议，公开明确地承认宪章是进行社会改革的唯一工具——宪章问题还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在议院提出过。如果工人阶级支持这个运动（我的呼吁所得到的反映使我有根据指望这一点），后果就很可能；因为，如果议会拒绝，虚伪的自由派和伪善的托利党人³的信誓旦旦的空话将被揭穿，他们指望人民轻易相信他们的最后一着

也将失败。如果议会同意考虑并讨论这些建议,滚滚的激流就将汹涌奔腾,那时临时应付的权宜之计将无法阻挡。凭你对英国政治生活的深入研究,你一定会知道:我们的贵族或金融寡头已没有任何精力或任何实力来和任何真正的人民运动相对抗。统治集团只是一些陈腐的派系的大杂烩,它们集结在一起,就像都要为拯救一条漏了水的航船而围在抽水机旁争吵不休的船员一样。他们是没有力量的,即使他们能把底舱中的污水向民主的大海里泼出几滴,也丝毫不能平息大海的汹涌的怒涛。我的朋友,这就是我在目前看到的大好机会,这就是我希望这个机会得到利用所凭借的力量,这就是这些力量要追求的首要的最近目的。关于第一次示威的结果,我将再写信告诉你。

你的忠实的

厄内斯特·琼斯”

根本不能指望议会会考虑拟议中的宪章派请愿书,这一点是无庸论证的。无论过去在这方面有过怎样的幻想,现在面对以下这样的事实,这些幻想也该破灭了:议会刚刚以 60 票的多数否决了由贝克莱先生提出并得到菲利莫尔先生、科布顿先生、布莱特先生、罗伯特·皮尔爵士等支持的采用无记名投票的建议。做这样的事的,也就是那个曾经竭力反对在本身的选举中出现的恫吓和贿赂现象的议会,它好几个月丢开正经事不问,整天热中于对选举的情况进行调查,想借此削减十分之一以上的议员。纯洁的约翰尼^①至今所找到的反对贿赂、恫吓和腐败的唯一手段是剥夺选举议员的权利,或者更精确地说,缩小选民的范围。毫无疑问,如果他能使选民范围缩到他自己身材那样小,政治寡头就可以不用费事,不用花钱买而得到选票了。贝克莱先生的决议案所以被联合起来的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⁶¹否决,是因为他们的共同利益——保持他们在地方上对临时租佃者、小店主和土地占有者的其他仆从的影响——受到了严重威胁。

^① 对约·罗素的戏称。——编者注

“交租金者交选票”——这就是光荣的不列颠宪法中的一句古老格言。

上星期六,《新闻报》(以迪斯累里先生为后台的一家新周报)向英国公众揭发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早在春天,布伦诺夫男爵就把俄皇①准备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的要求通知了克拉伦登勋爵,同时声明他通知的目的是要弄清楚英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克拉伦登勋爵没有表示任何反对,也丝毫没有加以劝阻。俄国外交官向他的皇上报告:对于他对金角湾所抱的意图,英国方面并无反感。”②

为了回答迪斯累里先生提出的这个严重的指责,昨天《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来自外交部的周密考虑的官方文章,但是依我看,这篇文章与其说是能驳倒这个指责,不如说是会加重这个指责。《泰晤士报》肯定:早在春天,在缅施科夫公爵到君士坦丁堡之前,布伦诺夫男爵曾向约翰·罗素勋爵抱怨土耳其政府取消了希腊正教教士根据条约得到的特权,约翰·罗素勋爵由于认为这个问题仅仅牵涉到圣地,便同意了沙皇的计划。但是《泰晤士报》同时不得不承认:在缅施科夫公爵到君士坦丁堡和克拉伦登勋爵接替约翰·罗素勋爵担任外交大臣以后,布伦诺夫男爵向克拉伦登勋爵传达了进一步的信息,“其目的是说明他所得到的某些指示以及缅施科夫公爵代表俄皇向苏丹③递交的国书中所用的某些说法的含意”。《泰晤士报》同时还承认:“克拉伦登勋爵同意了布伦诺夫男爵传达给他的要求。”显然这第二次传达包含的内容,要比向约翰·罗素勋爵传达的更多一些。因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② 1853年6月11日《新闻报》第6期。——编者注

③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此,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声明并没有使问题就此了结。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布伦诺夫男爵玩弄了一个外交骗局,或者克拉伦登阁下和阿伯丁阁下是卖国贼。真相如何我们且等着瞧。

伦敦的一家报纸不久前发表了下面一个有关东方问题的文件,贵报读者对此或许感到兴趣。这就是现在住在伦敦的亚美尼亚大公发布的并在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中散发的一项公告:

“受命于天的至高无上的亚美尼亚大公……莱奥告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

亲爱的兄弟们和忠实的同胞们! 我们的意愿和热切的希望就是,你们要为保卫你们的国家和苏丹、反对北方的暴君而流尽最后一滴血。要记住,我的兄弟们,土耳其没有鞭子,土耳其人不割你们的鼻子,不鞭打你们的妻子,无论是私下还是当众。在苏丹治下,以仁爱为本,而在北方暴君治下,只有残忍暴虐。因此,你们要听从神的指示,勇敢地为你们国家的自由和你们现在的国君而战。你们要拆除房屋来修筑街垒;如果没有武器,那就拆掉家具当作武器来自卫吧。愿上天把你们引向光荣。我唯一的幸福,就是在你们的队伍中为反对你们国家和你们的信仰的压迫者而战。愿神保佑苏丹赞同我的号召,因为我们的宗教在他的治下保持着纯洁,而在北方暴君的统治下就将变样。无论如何要记住,兄弟们,在向你们发出呼吁的人的血管中流着的血是20位国王的血,是我们的信仰的保卫者卢西尼扬族英雄的血。因此我们对你们说:让我们保卫我们的宗教及其纯洁直到流尽我们最后一滴血。”^①

本月13日斯坦利勋爵通知下院,说在印度法案二读时(本月23日),他将提出下述决议案:

“议院认为,议会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才能采取有利于印度长治久安的立法措施。因此在本届会议最后阶段,不宜采取任何打乱现有制度而又不能认为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措施。”^②

① 列·卢西尼扬《亚美尼亚大公的公告》。——编者注

② 爱·亨·斯坦利1853年6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但是到1854年4月,东印度公司特许状就要满期了,因此,总要采取一些措施。政府原想采取长期性的立法措施,即在更换特许状时再延期20年。曼彻斯特学派⁶⁴则想暂缓采取任何立法措施而把特许状最多延期1年。而政府说:为了“造福”印度,必须采取长期性的立法措施。曼彻斯特派回答说:不了解情况是不能这样做的。“造福”印度也好,不了解情况也好,都是虚假的借口。当权的寡头希望在改革了的议院召开会议以前,靠牺牲印度来取得为他们自己今后20年“造福”的保证。曼彻斯特派则希望在未经改革的议会中不要采取任何立法措施,因为他们在这个议会里没有机会贯彻自己的主张。于是联合内阁就由查理·伍德爵士出面,违反它先前的种种声明(不过同它惯用的回避困难的手法相一致),提出了一种类似法律草案的东西。不过,另一方面,它不敢提议在更换特许状时规定任何明确的期限,而是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即让议会去重新加以解决,如果议会什么时候决定这样做的话。内阁的提案如被通过,东印度公司得到的将不是更换,而只是暂时延长一下生存的时间罢了。在所有其他方面,内阁的方案只是在表面上改变管理印度的方式;它采取的唯一重要的新措施就是增加几个新的省督,虽然长期的经验证明:在东印度,单纯由特派专员管理的地区的情况,要比那些有幸由奢侈无度的省督及参事会管理的地区好得多。辉格党发明的改善那些被榨取一空的国家的办法,就是在那里为破落贵族增设一些领干薪的职务来加重它们的负担,这使人不禁想起前届罗素政府时期的一件事,那时,辉格党人突然发现东方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精神上的贫困,于是决定增派几个新的主教去解救他们,而托利党人在其执政的鼎盛时期也从未想到需要派一个以上。这个决议案一经通过,当时的督察委员会主席辉格党人约翰·霍布豪斯爵士马上就发

现,他有一个亲戚极其适合担任主教职务。于是这位亲戚立刻就被任命为几个新的主教中的一个。正如一位英国作家所说:“当鞋子完全合脚的时候,你就很难说,究竟是鞋子为脚而设,还是脚为鞋子而设。”同样,对于查理·伍德的发明,也很难说,究竟是新的省督为印度各省而设,还是印度各省为新的省督而设。

不管怎样,联合内阁认为把随时可以更改它所提出的法案的权利交给议会以后,就足以应付一切不满的叫嚷了。不幸的是,托利党人斯坦利勋爵插手进来,他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一宣布就得到“激进的”反对派的大声喝采。然而,斯坦利勋爵的决议案却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反对内阁的提案的理由是:议院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才能采取长期性的立法措施。另一方面,他反对的理由又是:这个提案不是长期性的立法措施,而只是改变一下现状,不想彻底解决问题。保守派当然是反对法案的,因为法案总归会牵涉一些改变。激进派也反对它,因为它不牵涉任何真正的改变。斯坦利勋爵在这个联合时期找到了一个把反对内阁观点的两种观点结合在一起的公式。联合内阁对这种策略装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它的机关报——《纪事报》大叫大嚷:

“作为党派性的行动,所提出的关于延期讨论的动议,是极端派系性的和有损名声的……这个动议之所以提出,只是因为内阁的某些拥护者曾经保证,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他们要同那些他们经常与之合作的人分手。”^①

看来大臣们确实是非常焦急了。今天的《纪事报》再次提起这个问题,它说:

^① 1853年6月15日《纪事晨报》第26981号。——编者注

“对斯坦利勋爵的动议的投票或许将决定印度法案的命运；因此，最最重要的是那些感到及早立法的重要性的人应该竭尽全力来加强政府。”^①

另一方面，今天的《泰晤士报》写道：

“政府的印度法案的命运已经可以看出眉目……政府所面临的危险在于：斯坦利勋爵的反对意见同社会舆论的结论完全一致。这个修正案的每一个字都是坚决反对内阁的。”^②

在随后的一篇通讯^③中，我将说明大不列颠不同党派在印度问题上的态度，说明不幸的印度人从英国的贵族、金融寡头和工业巨头关于改善他们的处境问题的争吵中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6 月
17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7 月 1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3809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① 1853 年 6 月 17 日《纪事晨报》第 26983 号。——编者注

② 1853 年 6 月 17 日《泰晤士报》第 21457 号。——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 161—170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土耳其和俄国。——阿伯丁内阁对
俄国的纵容。——预算。——报纸
增刊税。——议会的舞弊¹¹⁸

1853年6月21日星期二于伦敦

1828年,俄国曾得到机会向土耳其发动了战争,结果缔结了阿德里安堡条约⁴¹,该条约把整个黑海东岸地区北起阿纳帕南至波季(切尔克西亚除外)割让给俄国,并且把多瑙河河口诸岛屿划归俄国所有,使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实际上也脱离了土耳其,转归俄国统辖,当时大不列颠的外交大臣是阿伯丁勋爵。1853年,我们看到,同一位阿伯丁成了这同一个国家的“混合内阁”的首脑。只要指出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俄国目前在它同土耳其和同欧洲的冲突中表现得那样咄咄逼人了。

我在我的上一篇通讯里曾说过:《泰晤士报》在星期四^①提出的那种强词夺理的、拐弯抹角的和不真诚的辩护理由,恐怕平息不了由

^① 1853年6月16日。——编者注

于《新闻报》揭露阿伯丁、克拉伦登和布伦诺夫男爵之间的秘密协议引起的风波^①。甚至《泰晤士报》后来也不不得不在一篇半官方的文章中承认，克拉伦登勋爵确实同意了俄国打算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但是，它又说，俄国人在伦敦表示的要求与在君士坦丁堡实际上提出的要求，二者的要旨完全不同。尽管布伦诺夫男爵送交不列颠大臣的文件就是从缅施科夫公爵得到的指示中“摘录下来的原文”。但是，《泰晤士报》在星期六又收回了自己的断语（毫无疑问是由于俄国使团的抗议），并且为布伦诺夫男爵作证，说他是极其“坦率和真诚的”。^②《先驱晨报》昨天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俄国向布伦诺夫男爵本人发了一个虚假的指示，为的是欺哄不列颠大臣呢？”^③与此同时，人们又看到了一些新揭发出来的、原先被一家卖身投靠的日报千方百计向公众隐瞒起来的材料，它们完全排除了上述的解释，说明全部责任都在“混合内阁”身上；而且根据这些材料足以对阿伯丁勋爵和克拉伦登勋爵提出指控，换上其他任何一个议会都会这样做，只有本届议会除外，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个用空前的行贿和恫吓手段硬拉起来的选举僵尸生下的瘫痪产儿而已。

据说，克拉伦登勋爵曾收到一个通知，通知告诉他关于圣地的**问题不是俄国公爵^④所关心的唯一问题**。这个通知还谈到一个主要问题，这就是关于土耳其的信希腊正教的基督徒和某些条约所规定的俄皇在同他们的关系中的地位问题。所有这些都经过了详尽的讨

① 见本卷第149—150页。——编者注

② 巴尔塔利曼尼协定的条款及有关评论，引自1853年6月18日《泰晤士报》第21458号。——编者注

③ 1853年6月20日《先驱晨报》第22189号。——编者注

④ 亚·谢·缅施科夫。——编者注

论,俄国准备采取的方针也得到了清楚的说明,这就是5月6日的协定草案¹¹⁹详尽阐述的那个方针。克拉伦登勋爵征得阿伯丁勋爵的同意,对这一方针丝毫没有表示反对,或者加以阻止。在伦敦处于这种情况的同时,波拿巴把他的舰队开到了萨拉米斯岛,公众舆论从外面施加了压力,大臣们在两院中都受到了质询,罗素郑重许诺要维护土耳其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缅施科夫公爵则在君士坦丁堡撕下了自己的假面具。阿伯丁和克拉伦登两位勋爵这时不能不向其他大臣说明事情的原委,于是联合内阁面临瓦解的危险,因为帕麦斯顿勋爵极力主张完全相反的政策(他的过去使他不能不这样做)。阿伯丁勋爵为了防止他的内阁瓦解,终于向帕麦斯顿作了让步,同意英法两国舰队在达达尼尔海峡联合行动。但是就在这同时,阿伯丁勋爵为了履行自己对俄国的承诺,私下电告圣彼得堡说,他将不把俄军占领多瑙河两公国看作开战的理由,而《泰晤士报》也接到了指示,要它为接受对国际条约的这个新解释制造舆论。这里,不能不为这家报纸说句公道话:它为了把黑的说成白的,确实卖了很大的力气。这家报纸过去一直争辩说,俄国对土耳其的信希腊正教的基督徒的保护权根本不会有任何政治意义,而现在这同一家报纸却突然断言: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从属于两个宗主国,它们实际上已不是土耳其帝国的完整的一部分了;“严格地说来”,占领它们并不是对土耳其帝国的侵犯,因为,按照布加勒斯特条约¹²⁰和阿德里安堡条约的规定,沙皇对他在多瑙河两岸的教友们有保护权。1849年5月1日签订的巴尔塔利曼尼协定¹²¹明确规定:

“1. 对这些省份的占领一旦发生,只能是由俄国和土耳其的武装部队联合执行;

2. 进行占领的唯一理由只能是两公国发生了严重事件。”

现在,这两个公国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件,而且俄国也没有打算和土耳其一起去占领这些地方,恰恰相反,正好是为了反对土耳其,于是《泰晤士报》就认为,土耳其应当对俄国的单独占领平静地加以容忍,然后再同俄国进行谈判。但是如果土耳其不够冷静,认为占领就是开战的理由,那么,《泰晤士报》认为,英法两国也决不应该这样做。而即使英法两国要这样做,那么,《泰晤士报》建议,它们也要采取温和的态度,决不要作为交战国的一方来反对俄国,而只是作为帮助土耳其进行防御的盟国。

我觉得,对《泰晤士报》的这种怯懦而不诚实的行为加以痛斥的最好方法,莫过于从它今天的社论中引证下面一段话。这篇社论简直是集阿伯丁勋爵政策中一切自相矛盾、支吾搪塞和卑鄙怯懦之大成。

“在采取最后的极端措施之前,土耳其政府可以(如果它认为适当的话)对两公国被占领一事提出抗议,并在欧洲列强的支持下继续进行谈判。土耳其政府可以与四强国大使协同一致地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作出决定,特别是要确定,敌对状态是否已严重到可以根据1841年公约¹²²的规定把达达尼尔海峡向外国军舰开放。如果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决定,并且舰队得到了开进海峡的命令,还应当弄清楚:我们到那里去是作为调解国还是作为交战国。因为,即使假定土耳其和俄国已处于交战状态,外国舰队为‘履行公约义务的要求’(!)而被允许进入海峡,它们也不一定具有交战国的性质,而且它们更愿意以调解国的身份出现,因为它们被派往那里不是去进行战争,而是去制止战争。这种措施不应当使我们一定要成为斗争的主角。”^①

《泰晤士报》的所有的社论都白费力气。别的报纸没有一家跟着它跑,也没有一家上它的圈套,甚至《纪事晨报》、《晨邮报》、《地球

^① 1853年6月21日《泰晤士报》第21460号。——编者注

报》、《观察家报》这些支持政府的报纸也完全站在另一种立场上，并且得到海峡对岸的热烈响应，——在那里，只有一家正统派的《国民议会报》没有把占领多瑙河两公国一事看作开战的理由。

这样一来，联合内阁内部的意见分歧由于各派报刊喧闹的争吵而公诸于众了。帕麦斯顿竭力劝内阁把占领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看作是宣战，并且得到了辉格党⁶¹和混合内阁的假激进派阁员的支持。阿伯丁勋爵（他仅仅由于指望俄国不在达达尼尔海峡而只在多瑙河两省采取行动才同意英法两国舰队采取共同行动）现在则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于是政府的存在又变得岌岌可危。最后，当帕麦斯顿在阿伯丁勋爵的再三坚持下，准备违心地同意俄国强行占领两公国的行为的时候，突然从巴黎拍来电报，报告拿破仑决定把这种行为视为开战的理由。于是混乱达到了极点。

如果上面这种对事情的叙述是正确的（根据我们对阿伯丁勋爵的过去的了解，可以有一切理由这样认为），那么几个月来吸引着欧洲注意的俄土悲喜剧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出来了。现在我们马上明白了，为什么阿伯丁勋爵不愿把英国舰队调离马耳他岛。我们明白了，为什么罗斯上校会由于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的坚决行动而遭到训斥¹²³，为什么缅施科夫公爵的态度那样咄咄逼人，为什么沙皇表现得那样大胆强硬。沙皇认为，英国的军事调动只不过是一场闹剧，所以，他如果能够通过这次毫无阻碍地占领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行动，使他不仅可以以“主人”的资格退场，而且可以靠苏丹臣民作牺牲品进行每年的盛大的军事演习，那他是非常乐意的。我们认为，如果战争终于爆发，那将是因为俄国走得太远而无法体面地收场。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俄国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仅仅是因为它一直指望英国的纵容。

在这方面，“一个英国人”^①最近的一篇通讯有一段谈到联合内阁的话说得很中肯：

“每当达达尼尔海峡吹来一阵微风，联合内阁都会摇摆不已。好人阿伯丁的胆小怕事和克拉伦登的庸碌无能鼓励了俄国，引起了危机。”^②

来自土耳其的最新消息说，土耳其驻巴黎大使收到了君士坦丁堡经过泽姆林发来的电报，电报通知他，土耳其政府已依据给列强的备忘录拒绝了俄国最近提出的最后通牒¹²⁴。据马赛的《信号报》报道，士麦那有消息说，俄国人在黑海截走了两艘土耳其商船，但是另有消息说，高加索各部族对俄国人发动了总攻，沙米尔取得了十分光辉的胜利，缴获大炮不下 23 门。

最近，格莱斯顿先生正式宣布了他就广告税问题提出的经过修改的建议。他先前为了取得《泰晤士报》的支持，曾建议取消只登广告的增刊的税。现在他慑于舆论的压力，又建议对所有的单增刊免税，而对每一份双重增刊征税半便士。可以想见，《泰晤士报》是多么愤怒了，因为根据这个修改了的建议，它每年得到的就不是 4 万英镑，而只有 2 万英镑，此外，还得眼看市场向它的竞争者敞开。这家一贯极力为知识税和广告税辩护的报纸，现在对任何增刊税都反对。但是使它可以得到安慰的是：如果内阁在通过大部分预算后感到没有必要再来讨好《泰晤士报》的话，那么曼彻斯特派在预算中争得了自己的一份之后也将不再需要内阁。这一点也恰好是内阁所担心的，而正是这种担心说明预算辩论为什么占了议会会议的全部时间。

① 阿·理查兹的笔名。——编者注

② 阿·理查兹《俄军占领两公国》，见 1853 年 6 月 21 日《晨报》第 19343 号。——编者注

格莱斯顿先生在把报纸广告税从1先令6便士降低到1先令3便士的同时，又建议对刊印在很多书刊杂志后面的出版物广告每份征收6便士的税，这件事最能说明他善于挖东补西，公公道道了。

今晚下院将要审查两起贿赂案件。在这次会议期间，为选举问题而召集的委员会有47个，其中有4个仍在开会，43个委员会已经结束了审查工作，并作出结论说，大部分被剥夺当选资格的议员都犯了贿赂罪。为了说明公众舆论对本届议会，对这个脱胎于舞弊而孕育出联合内阁的机构抱着怎样尊敬的态度，可以从今天的《先驱晨报》上摘引以下一段话：

“如果说，没有明确的目的和意图，而且步履蹒跚，周身震颤，是低能的症候，那么应当承认，这届议会，这个6个月的婴儿，已经成为一个老糊涂了。它现在就已经力竭才尽，并且正在分解为一些没有活力和目的的小集团。”^①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6月
21日

载于1853年7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14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① 1853年6月21日《先驱晨报》第22190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

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¹²⁵

1853年6月24日星期五于伦敦

斯坦利勋爵关于暂缓为印度立法的提案，被延期到今天晚上开始讨论。印度问题在英国成为内阁的问题，从1783年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是什么原因呢？

东印度公司⁸⁵真正的创始不早于1702年，因为在这一年，争夺东印度贸易垄断权的各个团体才联合成一个单一的公司。在此以前，原有的东印度公司的生存曾经一再陷于危殆，在克伦威尔摄政时期，它的活动曾中断多年；在威廉三世统治时期，它又因议会干涉而几乎全部解散。就在这位荷兰亲王掌权时期，——那时，辉格党人⁶¹成了不列颠帝国收入的承包人，英格兰银行⁸⁴创办了，保护关税制度在英国确立了，欧洲的均势最后确定了，——东印度公司的存在才被议会承认。这个表面上自由的时代，实际上是垄断组织的时代，这些垄断组织不是像在伊丽莎白和查理一世时代那样经国王的准许建立起来，而是由议会批准，得到法律的承认，并且被宣布为国有化的企业。英国历史上的这个时代，事实上很像法国的路易-菲力浦时代，那时，旧的土地贵族遭到失败，而资产阶级只是在金融寡头或者说

“大金融家集团”的旗帜下才占据了土地贵族的位置。在下院不准普通平民任议会代表的同时, 东印度公司也不准他们和印度通商。从这种情况以及其他一些事情, 我们看到的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初次决定性胜利, 恰恰是与对人民实行最露骨的反动相一致的。这个现象曾驱使不只一个科贝特那样的平民作家向已往而不是向未来去寻找人民的自由。

立宪君主制度与享有垄断权的金融界结成联盟, 东印度公司与 1688 年的“光荣”革命¹²⁶结成联盟, 造成这种联盟的力量, 也正是在各个时期和各个地方促使自由派势力与自由派王朝联系起来并结成一体的力量, 这个力量就是贿赂的力量——立宪君主制度的总的动力, 威廉三世的守护天使, 路易-菲力浦的要命鬼。早在 1693 年, 根据议会的调查, 东印度公司在给权贵“送礼”项下的支出每年就达到 9 万英镑, 而在革命前每年还很少超过 1 200 英镑。利兹公爵曾被控受贿 5 000 英镑, 德高望重的国王本人也被证明受贿 1 万英镑。除了这些直接行贿外, 东印度公司为了排挤同它竞争的公司, 还给政府利率极低的巨额贷款, 以及收买同它竞争的公司的董事。

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一样, 是靠着向政府行贿而获得权势的, 它也不能不像英格兰银行那样继续用行贿来保持这种权势。每当它的垄断权期满时, 它只有向政府贡献新的贷款, 奉送新的礼物, 才能更换特许状。

七年战争¹²⁷使东印度公司由一个商业势力变成了一个军事的和拥有领土的势力。现时的这个东方不列颠帝国正是在那个时候奠定了基础。那时, 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曾涨到 263 英镑, 红利高达 12.5%。但就在那时出现了东印度公司的新的敌人, 不过这一次已不再是同它竞争的公司, 而是同它竞争的大臣和同它竞争的国民了。

人们说,公司的领土是在不列颠舰队和不列颠陆军的协助下占领的,无论哪一个不列颠臣民都不能离开王国政府而拥有领土主权。在那时的大臣和国民看来,东印度公司获得如此的“巨额财富”,是新近的侵略的结果,所以就要求分享一份。只是由于1767年达成协议,规定公司须每年交国库40万英镑,它才得以存在下来。

但是,东印度公司没有履行这个协议,它遭到财政困难;它没有向英国国民纳贡,反而要求议会给予资助。其结果是公司的特许状作了重大修改。公司的事务在新的条件下仍然没有起色;与此同时,英国又失掉了在北美的殖民地,于是越来越普遍地感到必须在别处重新取得一个广大的殖民帝国。因此,大名鼎鼎的福克斯在1783年认为大好的时机来到,提出了他那著名的印度法案,其中建议取消董事会和股东会,把管辖印度的全权交给议会任命的七位特派专员。由于低能的国王^①在上院的个人势力,福克斯先生的这个法案遭到了否决,当时的福克斯和诺思勋爵的联合政府因此被推翻,大名鼎鼎的皮特因此被任命为政府的首脑。皮特于1784年在上下两院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规定成立一个由六位枢密院委员组成的督察委员会,它的职责是:

“检查、主管和监督东印度公司一切涉及领地和属地的民政、军政或收入的法令、业务和事务。”^②

历史学家穆勒对此的评论是:

^① 乔治三世。——编者注

^② 詹·穆勒《英属印度史》1858年伦敦版第4卷第5册第395页。——编者注

“通过这项法案是要追求两个目的。为了不致被人责难为含有福克斯先生法案中那种被称为可恶企图的东西,必须制造一种假象,似乎主要的权力仍归董事们掌握。但为了内阁的利益,又必须在实际上剥夺董事们的一切权力。皮特先生的法案同他的政敌的法案的表面上的区别,主要就在于一个是剥夺了董事们的权力,而另一个则几乎是完全保留了董事们的权力。按照福克斯先生的法令,大臣们的权力必须得到公开的承认;而按照皮特先生的法令,大臣们的权力是秘密地通过欺骗手段来实现。福克斯的法案把公司的权力移交给由议会任命的特派专员;而皮特先生的法案则把公司的权力移交给由国王任命的特派专员。”^①

所以,1783年和1784年这两个年头,是印度问题第一次而且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次成为内阁的问题的年头。皮特先生的法案通过了,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更换了,印度问题被搁置了20年。但是,1813年的反雅各宾战争¹²⁸,1833年时新通过的改革法案¹²⁹,盖过了所有其他政治问题。

这就是印度问题在1784年以后和以前都未能成为重大政治问题的首要原因。在此以前,东印度公司首先是要赢得自己的存在和地位;在此以后,寡头政治把它能够攫取的权利都攫为己有,同时却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以后,在1813年和1833年,即更换特许状的时候,英国人民所注意的主要是其他更迫切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东印度公司起初只是想为它的代理人建立驻外商馆,为它的货物建立堆栈。为了保护这些商馆和堆栈,公司建造了若干堡垒。尽管早在1689年公司就想要在印度占据领地,使领地上的收入成为公司的一种财源,但是一直到1744年,它只在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一带弄到几块价值不大的地区。

^① 詹·穆勒《英属印度史》1858年伦敦版第5卷第6册第60、65页。——编者注

随后在卡纳蒂克爆发的战争¹³⁰,使公司经过各种斗争成了印度的这一地区实际上的主宰。由于孟加拉战争和克莱夫的胜利,公司得到的好处就更大了,它已实际上占有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¹³¹。随后,在18世纪末和本世纪头几年,公司同提普·萨希布进行战争¹³²,结果是大大加强了势力,并且广泛推行了军费补助金制度¹³³。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终于征服了第一个适当的边境,即印度的沙漠地带。只是到这个时候,东方不列颠帝国才达到那些总是作为印度每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所在地的亚洲地区。但对帝国最为险要的地点,每逢新的征服者赶走旧的征服者时总是从那里入侵的那个地点,即作为屏障的西部边陲,还没有落到不列颠人的手里。到1838—1849年时期,在同锡克教徒的战争和同阿富汗人的战争中,不列颠人用武力并吞了旁遮普和信德²³,这样,才从人种边界、政治边界和军事边界来说把东印度大陆全境最终置于不列颠人的统治之下。这些是击退来自中亚的任何侵犯和对抗正向波斯边境进击的俄国所不可缺少的属地。在这最近的十年之中,英属印度共增加了拥有8 572 630人口的167 000平方英里的领土。至于印度内部,那么所有的土邦这时都已被不列颠属地包围,都通过各种形式隶属于不列颠的宗主权,而且除了古吉拉德和信德以外,都同沿海地区割断了。至于印度的对外关系,现在都完结了。从1849年起就只存在一个统一的庞大的英印帝国了。

这样,不列颠政府用公司的名义进行了两个世纪的战争,直到最后达到印度的天然边界。现在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在这整个时期内英国的所有党派都对这件事抱着默然纵容的态度,甚至连那些决心要在统一的印度帝国的边界完整大功告成之后假仁假义地高喊和平的人也是如此。不言而喻,他们必须先把印度拿到手里,然后才能

使印度承受他们那大肆张扬的博爱之心的恩典。从这个观点,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今年,1853年,对待印度问题与以前历次更换特许状的时候都不同了。

让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不列颠和印度之间商业往来的不同阶段,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在给印度立法方面发生的危机的特点。

在东印度公司开始经营时,即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公司得到许可,每年可以输出总值3万英镑的白银、黄金和外国钱币,以便同印度进行有利的通商。这打破了很久以来所有的成见,所以托·曼在他的《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①一书中,不得不在阐述“重商主义”原则,承认贵金属是一个国家能够拥有的唯一的真正财富的同时,又坚决主张:只要收支差额对输出贵金属的国家有利,也可以安心地容许输出贵金属。因此他争辩说,从东印度输入的货物,大部分都再输出到其他国家,从这些国家得到的金银大大超过了在印度购买这些货物所需的数量。根据同样的精神,乔赛亚·柴尔德爵士写了《论东印度贸易是所有贸易中最有利于国家的贸易》一书^②。东印度公司的坚决支持者越来越大胆了。在英国首先鼓吹自由贸易的人居然是垄断印度贸易的人,这可以说是奇怪的印度史上一桩不寻常的趣闻。

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要求议会干预东印度公司事务的呼声又起,不过发出这种呼声的已不是商业阶级,而是工

① 马克思此处指的应是托·曼的另一部著作,即《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我国对外贸易的差额是衡量我国财富的尺度》1664年伦敦版。——编者注

② 1681年在伦敦出版,署名“爱国者”。——编者注

业阶级。人们大声疾呼说,由东印度输入棉织品和丝织品会使不幸的不列颠工厂主们倾家荡产。约翰·波莱克斯芬在他的著作《英国和印度工业生产之间的矛盾》(1697年伦敦版)中提出了这个意见,这本专著的书名过了150年以后得到了奇妙的应验,不过,这种应验却同原来的涵义完全不同。于是,议会进行了干预。在威廉三世颁布的第十一和第十二号法令中,第十节规定禁止用印度、波斯和中国进口的丝绸和印染花布做衣服穿,并且规定对收藏或出售此类物品者课以200英镑罚金。后来,在乔治一世、二世和三世时期,在非常“开明的”不列颠工厂主们再三哀求之下,都曾颁布过类似的法律。这样,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印度的工业品运到英国来,一般来说都是为了在大陆出售,英国市场本身始终把这些工业品排斥在外。

除了贪婪的本国工厂主们的请求使议会对东印度的事务进行干预以外,伦敦、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的商人每逢更换特许状的时候也都要作一番努力,以求打破公司的贸易垄断,参加到这种被看作是一座真正金窖的贸易中来。经过这些努力,1793年的法令(这个法令把公司特许状的有效期延至1814年3月1日)作了一条规定,允许不列颠臣民私人从英国办货去印度,允许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办货去英国,货物种类几乎没有限制。但是这种特许附上了种种条件,使私商办货去英属印度的规定变得毫无意义。到了1813年,公司已无力继续抵挡广大商业界的压力,结果,除了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保留以外,同印度的贸易在一定条件下向私人竞争开放。到1833年更换特许状的时候,这些最后的限制也终于被取消,公司什么生意都不许做了,它的商业性不存在了,它的禁止不列颠臣民在印度居留的特权也被取消了。

同时,同东印度的贸易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完全改变了英

国各阶级对这种贸易的利害关系。在整个 18 世纪期间,由印度流入英国的财富,已经主要不是通过比较次要的贸易,而是通过对印度的直接剥削,通过在那里掠夺巨额财富然后转运英国的办法弄到手的。1813 年开放贸易以后,同印度的贸易额在很短的时期内增加了两倍以上。不仅如此。贸易的整个性质也变了。1813 年前,印度主要是一个出口国;然而这时它成了一个进口国。而且这种发展又是这样快,以致到 1823 年,原来的一个卢比通常换 2 先令 6 便士的汇率已经下落到了一个卢比只换 2 先令。自远古的时候起就是向全世界供应棉织品的大工场的印度,这时到处充斥着英国的棉纱和棉织品。印度本身的产品不能进入英国,或者只是在最苛刻的条件下才允许输入英国,而英国工业品却倾销印度,关税负担很小,有名无实,这样就毁灭了一度十分闻名的印度棉织业。1780 年,输入印度的英国农产品和工业品价值只有 386 152 英镑,同一年输出的金银的价值为 15 041 英镑,而 1780 年不列颠的输出总值为 12 648 616 英镑,这就是说,对印度的贸易额在对外贸易总额中只占 $\frac{1}{32}$ 。到 1850 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对印度的输出总值是 8 024 000 英镑,其中仅棉织品一项的输出即达 522 万英镑,占出口总值的 $\frac{1}{8}$ 强,占对外棉织品贸易总值的 $\frac{1}{4}$ 强。但是现在从事棉纺织业的人已经达到不列颠人口的 $\frac{1}{8}$,国民收入的 $\frac{1}{12}$ 来自棉纺织业。在每一次商业危机之后,不列颠棉纺织厂主们都更加感到同东印度的贸易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东印度大陆实际上成了他们最好的市场。随着棉纺织业越来越成为大不列颠整个社会结构的命脉,东印度也越来越成为不列颠棉纺织业的命脉了。

金融寡头把印度变成自己的领地,寡头政治用武力征服印度,工业巨头使自己的纺织品充斥印度,他们的利益在此以前是一致

的。但是,英国工业界越是依靠印度市场,他们就越是感到在他们摧毁了印度本国的工业之后必须在印度造成新的生产力。一味向某个国家倾销自己的工业品,而不让它也能够向你销售一些它的产品,那是不行的。英国工业界发现,他们的生意没有增加,反而衰退了。到1846年为止的4年中,印度由大不列颠进口产品的总值是26 100万卢比;而到1850年为止的4年中,只有25 300万卢比。另一方面,印度出口的总值也由前面这一时期的27 400万卢比减至后面这一时期的25 400万卢比。工业界发现,印度对他们的商品的消费力已降到最低点;他们看到,在英属西印度群岛,每人每年消费他们的工业品的价值为14先令左右;在智利为9先令3便士;在巴西为6先令5便士;在古巴为6先令2便士;在秘鲁为5先令7便士;在中美洲为10便士,而在印度只有9便士左右。接着是美国棉花歉收,使英国工业界在1850年损失了1 100万英镑。他们恼恨自己依赖美国而不从东印度获得足够数量的原棉。此外,他们还看到,他们对印度投资的一切企图都遭到印度当局的阻挠和暗中破坏。于是,印度就成了工业界同金融寡头和寡头政治作斗争的战场。工厂主们意识到自己在英国的权势,现在正要求消灭在印度的这些敌对势力,铲除在印度的全部古老的管理机构,彻底消除东印度公司的权势。

现在让我们再从第四个即最后一个角度来考察一下印度问题。从1784年起,印度的财政状况越来越深地陷入困境。目前国债已达5 000万英镑,收入的来源越来越少,而支出则相应地不断增加;鸦片税这一笔冒险性的收入已很难弥补日益增加的支出,因为中国人已经开始自种罂粟,鸦片税现在已面临完全枯竭的威胁。此外,为进行毫无意义的缅甸战争¹³⁴而必将增加的开支,还会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狄金逊先生说：“情况就是这样：失掉英国在印度的帝国会使英国破产，但要维持这个帝国又会使我们本身的财政有破产的危险。”^①

这样，我便说明了，印度问题怎样从 1783 年以来第一次成为英国的问题和内阁的问题。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6 月
24 日

载于 1853 年 7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1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① 约·狄金逊《官僚制度下的印度管理》1853 年伦敦—曼彻斯特版第 50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印度问题。——爱尔兰的 租佃者权利¹³⁵

1853年6月28日于伦敦

就斯坦利勋爵关于印度的提案进行的辩论是23日开始的,24日继续进行,后来休会到本月27日,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当这些辩论最后结束以后,我打算就印度问题归纳一下自己的看法。

因为联合内阁依靠爱尔兰旅⁶³的支持,又因为下院的所有其他党派彼此势均力敌,爱尔兰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使天平按自己的意愿倾斜,所以,现在终于准备向爱尔兰租佃者作出某些让步了。上星期五提交下院通过的(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¹³⁶有一条规定:租佃者在租种期满时应当得到补偿金,以偿付他在土地上和在土地之外所进行的改良;新的租佃者在估价时有权决定是否接受这些改良;至于改良土壤的补偿,则应在地主和租佃者所立的合同中加以规定。

在租佃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土地,因而改良了土壤以后(这种改良或者是直接的,如灌溉、排水、施肥,或者是间接的,如农用建筑),地主就插足进来,要求增加租金。如果租佃者让

步,那他只好把自己花了钱所得的好处送给地主。如果他不肯,他就会被毫不客气地赶走,被新的租佃者取代,新的租佃者由于前一个租佃者已经投入的那笔费用,能够付出更高的租金,直到他自己也改良土地,然后也照样被别人代替,或者是被置于更恶劣的条件之下。这个在外的地主阶级就依靠这种简便的方法,不仅把一代又一代农民的劳动,而且把他们的资本攫为己有;爱尔兰的每一代农民都为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状况而作了种种努力和牺牲,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恰恰使他们每一代人都在社会阶梯上下降一级。如果租佃者勤劳肯干,那么他们正是由于这种勤劳肯干而被加上一层苛捐;如果相反,租佃者变得懒惰懈怠,他们又会受到责难,说他们表现了“凯尔特族的劣根性”。总之,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沦为贫民——不是由于勤劳而贫困,就是由于懈怠而受穷。为了反对这种状况,爱尔兰宣布了“租佃者权利”——不是租佃者对土地的权利,而是他自己出钱改良土地的权利。现在让我们看看《泰晤士报》在星期六的社论^①中是怎样企图驳倒这个爱尔兰“租佃者权利”的。

“土地租佃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租佃者在一定的年限内租种土地,另一种是随时经过预告停止他的租佃。在第一种情况下十分清楚:租佃者可以调整和分配自己的资金,使自己在租佃期满以前得到全部或几乎全部收益。在第二种情况下也很清楚:租佃者不会在没有正常的收入保证的情况下去冒险地进行投资。”

当然,在地主同可以随意把资金投入商业、工业或农业的大资本家阶级打交道的地方,不管是长期租种,还是根本没有规定租种期限,这些资本家农场主无疑都知道该怎样保证自己的资金取得“正常

^① 1853年6月25日《泰晤士报》第21464号。——编者注

的”收入。但是,对爱尔兰的情况来说,这种假设是完全虚构的。爱尔兰的情况是:一方面是人数很少的土地垄断者阶级,另一方面是人数众多的、只有极少量资金的租佃者阶级,他们没有可能为这点儿资金选择各种不同的投资途径,除了把它投在土地上之外,不可能投向别的生产领域。因此,他们不得不成为临时租佃者¹³⁷。而身为这样的租佃者,如果他们不把他们微薄的资本投进去,他们自然有得不到收入的危险。如果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收入而把这些资本投进去,他们又会冒蚀去资本的危险。

《泰晤士报》继续写道:“也许有人会说,租佃满期时地块上无论如何不会什么都没有留下,留下的东西就是租佃者的某种形式的财产,因此,租佃者应当得到补偿。这个意见有点道理,但是,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这种要求可以在地主和租佃者之间很容易地得到解决,因为这无论如何是在最初的合同中加以规定的。我们说,这些关系应当由社会条件来调节,因为在我们看来,任何议会法令都不能有效地代替这种办法。”

的确,如果是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我们根本不需要议会来干预爱尔兰的土地租佃问题,正如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用不着士兵、警察和刽子手的干预一样。立法机关、司法机构和武装力量——这一切都是不正常的社会条件的产物,这种不正常的社会条件阻碍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无需作为最高势力的第三者进行强制性干预的关系。也许,《泰晤士报》已经变成了社会革命家吧?它是不是不再需要“议会法令”而需要社会革命来改组“社会条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关系”呢?英国已经颠覆了爱尔兰的社会条件。它先是没收了土地,然后通过“议会法令”压制了工业¹³⁸,最后用武装力量摧残了爱尔兰的积极的活力。这样一来,英国就建立起这样一种丑恶的“社会条件”,使一个小小的特殊等级——贪婪的小贵族可以对爱尔兰人民

为所欲为，任意规定他们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使用土地和靠土地生活。人民的力量还太弱，不能对这些“社会条件”进行革命，他们只好诉诸议会，要求至少把这些条件缓和和调整一下。但是，《泰晤士报》说：“不”，如果你们不是生活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议会就不可能改善这种状况。而如果爱尔兰人民按照《泰晤士报》的劝告，试图明天改善他们的社会条件，那么这个《泰晤士报》又会第一个求助于刺刀，痛斥和责骂“克尔特族的劣根性”，说他们缺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种对于和平进步和合法改良的爱好。

《泰晤士报》说：“如果一个地主有意使一个租佃者受损害，那么他就会感到很难再找另一个租佃者；既然他的职业就是出租土地，他就会感到他的土地越来越难于出租。”

爱尔兰的情况完全不同，一个地主越是使一个租佃者受损害，他就会感到他越容易去压迫另一个租佃者。新来的租佃者就是损害被赶走的租佃者的工具，而被赶走的租佃者又是控制新的租佃者的工具。至于说到一定时期以后，地主在使租佃者受损害的同时，也损害自己和毁灭自己，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爱尔兰已经成为事实，不过，这个事实也很难成为对破产的租佃者的一种安慰。

《泰晤士报》说：“地主和租佃者之间的关系，是两个商人之间的关系。”

这正是贯穿在《泰晤士报》整个社论之中的本身尚待证明的论据¹³⁹。贫穷的爱尔兰租佃者属于土地，而土地是属于英国地主的。同样，你也可以把掏出手枪的强盗和掏出钱包的旅客之间的关系称为两个商人之间的关系。

《泰晤士报》说：“但是，实际上爱尔兰的地主和租佃者之间的关系不久就将被一种比立法更有力的因素所改造。爱尔兰的土地所有权正在迅速易手，而如

果人口外流照现在这样的规模继续下去，那么，爱尔兰土地的耕种也将同样易手。”

在这里，《泰晤士报》至少算是明白了一点真理。不列颠议会在旧的过时的制度行将使双方——富有的地主和贫穷的租佃者——都归于毁灭的时候没有进行干预。富有的地主正被在典地产管理委员会的铁锤击倒，贫穷的租佃者则被逐出土地，不得不外流。这使我们想起了摩洛哥的老苏丹。每当遇到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他就把双方都处死以解决他们的争端，此外别无其他更“有力的办法”。

《泰晤士报》在结束自己的评述租佃者权利的文章时写道：“再没有比这种共产主义的所有权分配更能造成混乱了。唯一对土地享有某种权利的人就是地主。”

看来，《泰晤士报》像睡眠老人埃皮门尼德斯一样，一觉睡了整整半个世纪，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一时期就地主的要求而进行的热烈争论；这种争论不是在社会改革派和共产党人中进行，而是在不列颠中等阶级本身的政治经济学家中进行。李嘉图，这位大不列颠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并没有反驳地主的“权利”，因为他深信地主的要求所根据的是事实而不是权利，而政治经济学是根本不研究权利问题的。但是他以更朴实、然而更科学、因而也更危险的方式攻击了土地垄断。他证明，土地的私人所有不同于农业工人及土地租佃者的相应的要求，它在整个现代生产结构中是一种完全多余的、同这个结构不相容的关系；地租，作为这种关系的经济表现，可以由国家占有，并获得很大利益；最后，地主的利益是同现代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如果把李嘉图学派从反对土地垄断的这些前提中得出的所有结论一一列举出来，恐怕会令人厌烦。从我的目的来说，只要

引证大不列颠的三个最近的经济权威的话就够了。

伦敦的《经济学家》(它的主编詹·威尔逊先生不仅是自由贸易派⁶⁴的圣哲,而且是辉格党⁶¹的圣哲,不仅是一个辉格党人,而且是历届辉格党内阁或混合内阁都离不了的理财助手)在不同的文章中一直都一直坚决认为:确切地说,不能允许任何个人或某些个人有要求独自占有国家土地的权利。

纽曼先生在他 1851 年在伦敦出版的据称专为驳斥社会主义而作的《政治经济学讲演集》中告诉我们:

“任何个人,对土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天然的权利,除非他本人亲自经营土地。他的权利是使用土地,而且仅仅是使用。任何其他权利都是人为的法律(或者,用《泰晤士报》的话来说,就是议会法令)的产物…… 如果到某个时候,土地不够人们谋生之用,那时私人占有者控制土地的权利也就告终。”

爱尔兰的情况正是这样,纽曼先生也毫不含糊地证明了爱尔兰租佃者的要求是有根据的,尽管他的讲演是讲给最卓越的不列颠贵族听的。

最后让我从赫伯特·斯宾塞先生的著作《社会静力学》一书(1851 年伦敦版)中引用几句话,这本书也是声称要完全驳倒共产主义的,并且被公认为对现代英国的自由贸易学说作了最详尽的阐发。

“任何人都不能只许自己使用土地而不许其他人同样使用土地。因此,公平不允许占有土地,否则其他人就只有靠别人容忍才能活在世上。不拥有土地的人可能被公平地从世上排除出去…… 绝对不能认为,现有的这种占有是合法的。如果谁要这样想,那就让他看一看历史。最初的契约是用剑,而不是用笔写成的。财产转移的公证人不是律师,而是兵士;拳头棍棒就是用来支付的钱币;印记不是用蜡,而是用血。这样产生的要求能正当吗?大概不可能。如果不是正当的,那么后来拥有用这种方式取得的地产的人又有什么权利可言呢?难道在先前没有权利的地方通过售卖和遗赠就能生出一种权利来吗?

…… 既然一次转让行为不能产生权利,多次就能产生吗?…… 不正当的要求根据什么准则每年都变成正当的呢?…… 整个人类对地球表面享有权利仍然是正当的,不管各种各样的契约、习俗和法律如何。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种方式能使土地成为私有财产…… 我们的立法每天都在否认地主所有制。要开凿水道,铺设铁路或公路吗?我们无需顾忌,需要多少亩土地就占有多少。我们无需等待别人同意…… 需要改变的不过是土地占有者…… 土地不应当属于个人,而应当属于大团体——社会。农民不应当向单个的所有者租种地块,而应当向国家租种。农民不应当向约翰爵士或某某大人的代理人交地租,而应当向社会的代理人或下级代理人交地租。地产管理人不应当是私人的而应当是公众的办事人员,而租佃则应当成为唯一的土地使用形式…… 已经发展到极端程度的独占土地的要求,造成了土地占有的专制。”

由此可见,就从现代英国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对本国的土地享有权利的也只有爱尔兰的租佃者和农业工人,而不是霸占土地的不列颠地主;所以,《泰晤士报》反对爱尔兰人民的要求,也就把自己置于同不列颠中等阶级的科学直接对抗的地位了。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6 月
28 日

载于 1853 年 7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1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
* 宪章运动¹⁴⁰

1853年7月1日星期五于伦敦

从1815年起,欧洲列强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现状遭到破坏。但是列强中的任何两国发生任何战争都意味着打破现状。因此,西方列强才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俄国在东方进行的侵略,而且从来不向它要求任何代价,只要求它找出某种借口,哪怕是荒谬绝伦的借口,好使它们能够保持中立,不至于非去干预俄国的侵略不可。俄国一直受到夸奖,都说它的“神圣君主”宽宏大量,不仅仁慈地愿意掩盖西方各国当局的那种不加掩饰的、可耻的卑屈行为,而且对土耳其也很宽大,没有把它一口吞掉,而是一块一块地蚕食。这样一来,俄国外交就有了西方政治家们的胆怯心理作为依靠,而它的外交术也逐渐成了一种公式,以至于对照着过去的记录就可以几乎丝毫不差地察知当前的交涉的经过。

俄国的新借口是毫无根据的,这一点,在苏丹^①最近向君士坦丁

①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堡牧首^①发出了一项敕令,对有关宗教的一切都作了比沙皇本人所要求的还要多的让步以后,已经很清楚了。但是,“绥靖希腊”¹⁴¹也许是一个更有力的借口吧?当年,德·维莱尔先生为了消除苏丹^②的顾虑并证明列强的善意,曾提议“盟国首先签订一项条约,以保证奥斯曼帝国维持其实际的现状”,这个提议遭到了俄国驻巴黎大使^③最坚决的反对。俄国大使声称:

“俄国对土耳其政府是宽宏大量的,对自己的盟国的愿望是无限尊重的,但是,它不得不保留它独有的解决自己与土耳其帝国国务会议的分歧的权利;向奥斯曼帝国作出一般保证,就足以伤及圣上的感情,触犯俄国既得的权利和这些权利赖以产生的原则,更不用说这种行动非同一般和突如其来了。”^④

现在,俄国要求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并且不许土耳其政府把这个步骤看作是开战的理由。

1827年,俄国曾要求“以三强国的名义占领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

俄国在1828年4月26日的宣战书中声明:

“它的盟国会看到它时刻准备和它们同心协力地履行伦敦条约⁴⁵,会看到它始终想有助于完成它的宗教和全人类的神圣感情使它深切关怀的事业;它们会看到它时刻准备纯粹为了使7月6日的条约更快地得到履行而利用它的实际地位。”^⑤

① 杰马诺斯。——编者注

② 马茂德二世。——编者注

③ 卡·奥·波措-迪-博尔哥。——编者注

④ 《波措-迪-博尔哥伯爵的急电副本。1826年12月22日于巴黎》,见1843年《公文集》第1卷第2号第130页。——编者注

⑤ 同上,见1836年《公文集》第1卷第7号第347—350页。——编者注

俄国在公元 1829 年 10 月 1 日的宣言中宣称：

“俄国一向就没有任何侵略思想和任何扩张意图。”

同时，俄国驻巴黎大使却给涅谢尔罗德伯爵写信说：

“当帝国当局讨论以武力对付土耳其政府的时机是否来到这一问题时，大概某些人曾对这一步骤的迫切必要性有所怀疑，这些人对于奥斯曼帝国的首脑不久前用那种可怕的暴力手段推行的血腥改革的后果是考虑不够的。

皇上研究了土耳其的制度，他发现这一制度显露出一種它过去未曾有过的体力组织和精神组织的萌芽。如果说这位苏丹在他刚刚为实现新的改革和改良计划积聚力量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向我们进行更坚决更有组织的反抗，那么，如果他有时间使它更加巩固，对我们就更可怕了。既然形势如此，那我们应当引以为幸的就是在他们变得对我们更加危险以前对他们实行攻击，因为延迟只能使我们的相对处境恶化，并给我们造成比现在所遇到的更大的困难。”

现在，俄国是想先采取侵略步骤，然后才谈论它。1829 年，利文公爵给涅谢尔罗德伯爵写信时就说过：

“我们将只限于一般的提法，因为任何关于这个如此微妙的问题的详细谈论都可能造成实际的危险。如果一旦我们要同我们的盟国一道商讨同土耳其政府签订的条约的条文，那也只有让他们以为使我们作出了无可挽回的牺牲，因而使他们得到满足。和约只能在我们自己的阵营内签订，只有在和约缔结后才能让欧洲知道和约的条款。到那时，要反对已经晚了，欧洲也只好忍一口气承认它已经无法阻挠的局面。”^①

现在，俄国有几个月一直用种种借口迟迟不采取行动，以保持一种俄国可以接受而对土耳其则有致命危险的不战不和的局面。在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个时期，俄国也正是这样做的。波措-迪-博尔哥就曾这样说过：

^① 赫·利文/安·马图舍维奇〈……紧急电报〉。——编者注

“我国的政策就是要使今后四个月不发生任何新的情况，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一般说来，人们都宁可再等一等。但是第五个月将是多事之月。”^①

虽然沙皇对土耳其政府横加侮辱，而且现在还以武力威逼它作出最屈辱的让步，但是他仍然大肆宣扬他对“苏丹阿卜杜尔·麦吉德的友谊”和他对“保存奥斯曼帝国”的关怀。沙皇把“责任”推到苏丹身上，说苏丹反对他的“正当要求”，说苏丹不断“伤害他的友谊和他的感情”，拒绝他的“照会”，拒绝他的“保护权”。

1828年，查理十世曾问过波措-迪-博尔哥是什么原因使俄军在那年的战役中失利，波措-迪-博尔哥回答说，是因为俄皇不愿意在不到绝对必要的时候就进行决死战争，希望苏丹能利用他的宽大，但是这一试验未能成功。

在同土耳其政府发生目前这场争吵以前不久，俄国曾试图在流亡者问题上组成大陆各大国的大联合来反对英国；当这一试验不成功时，它又试图组成和英国的同盟来反对法国。同样，在1826—1828年期间，俄国曾经用“普鲁士的野心勃勃的计划”来吓唬奥地利，同时又尽一切可能来加强普鲁士并助长其野心，以便使普鲁士起到抗衡奥地利的的作用。俄国在它现在的周知照会¹⁴²中把波拿巴说成是贪图圣地而破坏和平的唯一祸首，而在那个时候，用波措-迪-博尔哥的话说，俄国曾把

“笼罩欧洲的惊惶不安统统归之于梅特涅公爵所起的作用，并且极力要让威灵顿公爵自己感到，他如果对维也纳当局采取顺从态度，就会损害他对所有别国的影响；还极力要让人觉得事情发生了变化，即不再是俄国谋求利用大不

① 沙·安·波措-迪-博尔哥《……密电副本》。——编者注

列颠去损害法国,而是大不列颠为同维也纳当局携手而踢开了法国”^①。

现在,俄国如果退却,就会大大贬低自己。它在1828年第一次战役失败以后的处境也正是这样。当时俄国的主要目的何在呢?我们还是用它自己的外交官的话来回答吧:

“为了取得谈判成功所必需的优势,第二次战役是绝对必要的。在进行这次谈判以前,我们必须做到能够及时地迅速地迫使对方接受我们的条件……陛下在有力量做得更多的时候,将同意要求得更少一些。在我看来,取得这种优势,应当成为我们全力追求的目标。这种优势现在已成为我们的政治存在的一个条件,我们必须在全世界心目中树立和保持这样的政治存在。”^①

但是,难道俄国不怕英国和法国的联合行动吗?当然是怕的。在路易-菲力浦在位时期公布的一份有关俄国用以瓦解法英同盟的手段的秘密回忆录中有如下一段:

“如果爆发了法国和英国携手参加的战争,俄国就丝毫没有取胜的希望,除非使这个同盟瓦解;因此,当大陆上发生冲突的时候,英国至少应该同意保持中立。”^①

问题是俄国是否相信英国和法国将联合行动?下面我们再引用波措-迪-博尔哥的报告中的一段话:

“自从那种认为土耳其帝国要灭亡的想法不再是压倒一切的想法的时候起,不列颠政府就不怎么敢冒大战的危险来使苏丹拒绝接受某种条件,特别是在下一个战役开始之前,一切尚不明确和不肯定的时候。这些情由使我们有根据相信,我们没有理由担心大不列颠会公开同我们决裂;它只会建议土耳其政府求和,并且在可能举行的谈判中尽力之所及帮土耳其政府的忙。如果苏丹拒

^① 沙·安·波措-迪-博尔哥(……密电副本)。——编者注

绝,或者我们坚持己见,大不列颠也不致采取进一步的行动。”^①

至于涅谢尔罗德对 1828 年的大臣和 1853 年的大臣“好人”阿伯丁的看法,最好是引用利文公爵的一份报告中的下面一段话来说明:

“阿伯丁勋爵在和我会晤时再一次向我担保说:英国从未打算同俄国发生争执;他担心圣彼得堡对英国内阁的立场并不完全了解;他本人的处境很微妙。公众舆论随时都准备向俄国开火。不列颠政府不能总是同舆论对抗。而且在那些与民族偏见密切关联着的问题上刺激舆论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俄国可以完全信任同这些偏见作斗争的英国内阁的友好态度。”^②

如果说在涅谢尔罗德先生 6 月 11 日的照会方面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地方,那么,值得惊奇的并不是它“蛮横无礼地混合了已为行动所驳倒的声明和用词藻掩饰的威胁”,而是欧洲对俄国外交照会第一次采取这种态度:西方世界并没有像往常那样表示敬畏和颂扬,而是为过去感到羞愧,并且轻蔑地嘲笑了这种把狂妄的野心、狡猾的伎俩和十足的野蛮傲慢无礼地堆在一起的东西。但涅谢尔罗德的周知照会和 6 月 16 日的“紧急最后通牒”仍然丝毫不亚于波措-迪-博尔哥和利文公爵的备受赞扬的杰作。而那时涅谢尔罗德伯爵也和现在一样,是俄国外交的首领。

有一个笑话,说有两位研究熊的波斯博物学家,其中一位从未见过这种动物,他问这种动物是下崽还是产蛋;另一位比较了解情况的回答说:“这种动物什么事都能做。”俄国熊确实什么事都能做,特别是当它知道它要与之打交道的另一些动物什么事都不能做的时候。

我想顺便提一提俄国最近在丹麦国王诏书以 119 票对 28 票的

^① 沙·安·波措-迪-博尔哥(……密电副本)。——编者注

^② 赫·利文/安·马图舍维奇(……紧急电报)。——编者注

多数获得通过这件事上所取得的重大胜利。请看下面一段话：

“联合议会根据 1849 年 6 月 5 日宪法第四条，同意国王陛下按照 1853 年 6 月 13 日再次提出的 1852 年 10 月 4 日关于王位继承的国王诏书，在整个丹麦王国执行王位继承。”^①

工人的罢工和联合正以飞快的速度和空前的规模发展。我现在手头有各地工厂工人罢工的报告，参加罢工的计有斯托克波特各行各业的工人，曼彻斯特的锻工、纺工、织工等等，基德明斯特的织毯工，布里斯托尔附近灵伍德各煤矿的矿工，布莱克本的织工，达温的织工，波士顿的细木工，博尔顿及其近郊的漂白工、精整工、染色工和机械织工，巴恩斯利的织工，斯皮特尔菲尔兹的阔幅丝织品织工，诺丁汉的花边编织工，整个伯明翰区各行各业的工人及许多其他地方的工人。每次邮班都带来发生新的罢工的消息。罢工带有传染性。每一次大罢工，如斯托克波特和利物浦等地的罢工，都必然引起一连串小的罢工，因为很多工人若不向王国其他各地的工人伙伴请求支援，就无法反抗厂主，而其他各地的工人为了援助他们，就要求提高工资。此外，对于每一个地区来说，拒绝屈从恶劣的条件，以免自己的工人伙伴在斗争中孤立，似乎已成为有关荣誉和共同利益的事情。这样，一个地方发生罢工，在很远的地区也会以罢工表示响应。在某些情况下，要求提高工资只不过是意味着要求清理厂主长期以来的欠债。斯托克波特的大罢工就是这样。

1848 年 1 月，斯托克波特的工厂主把各种工人的工资普遍降低 10%。工人们同意了这种降低，条件是一当企业情况好转就恢复这 10%。因此，1853 年 3 月初工人们向雇主们提醒他们所答应的 10%

^① 1853 年 6 月 26 日《科隆日报》第 175 号。——编者注

的增加额。他们同雇主们没有达成协议，于是3万多人举行了罢工。在大多数场合，工厂工人都明确地声明说，国家的繁荣，特别是他们的雇主的繁荣，他们有权享有一份。

当前罢工的明显特点是，罢工先在下层非熟练工人（非工厂工人），即现在直接受人口外流影响的工人中开始，在各种层次的手工匠中开始，然后才把大不列颠各大工业中心的工厂工人卷进来。以前的罢工则不同，总是先在工厂工人上层，即在机械工人、纺纱工人等等之中发生，然后才扩大到这个巨大的工人群的下层，最后才波及手工工匠。这个现象完全是由于人口外流而产生的。

有这样一种慈善家，甚至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罢工对“工人本身”的利益是很有害的，而自己的伟大目标就是找出一种能保证固定的平均工资的方法。由于具有各个不同阶段的工业周期的存在，就不可能有任何这类平均工资——这一点且不去说它。正好相反，我认为，工资时而提高时而降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厂主和工人间经常不断的冲突，在当前的工业组织下，乃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它可以激发劳动阶级斗志，把他们团结到一个用来抵御统治阶级侵害的统一的大联盟中，使他们不致变成一些冷漠的、没有思想的、可以马马虎虎吃饱肚子的生产工具。在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状态下，如果我们想不仅口头上，而且实际上阻止奴役，我们就必须接受战斗。为了对罢工和联合作正确的评价，我们不能被它们经济成果不大这一表面现象迷惑，而要首先看到它们精神和政治上的成果。如果现代工业不是周期性地、循环反复地经过停滞、繁荣、狂热发展、危机和灾难这样一些交替出现的大阶段，如果工资不是因此而有高有低，如果厂主和工人之间不是进行着经常的、与工资和利润的这种波动密切联系着的战争，那么，大不列颠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

萎靡、意志薄弱、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正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一样，是不可能自我解放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农奴的罢工和联合曾是中世纪乡镇的温床，而中世纪的乡镇又是现在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生命之源。

我在最近的一篇通讯中曾经指出目前的劳工危机对英国宪章运动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① 现在我看到，这个预测业已被宪章派领袖厄内斯特·琼斯再度掀起的运动头两个星期获得的成果证实。大家知道，第一次露天群众大会定在黑石山脊举行。上月19日，兰开夏郡和约克郡宪章派的地方组织的代表聚集到那里，并成立了代表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厄内斯特·琼斯提出的要求实行宪章的请愿书作为由这两个郡召开的会议提出的请愿书。会议决定委托同意呈递宪章派的一切请愿书的萨瑟克的下院议员阿普斯利·佩拉特先生呈递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请愿书。至于群众大会，当时就连最乐观的人都认为开不成了，因为天气太坏，风暴越来越大，倾盆大雨下个不停。起初只有少数一些人爬上山丘，但很快就有更多的人群出现，从高处向周围的谷地望去，在透过密密层层雨帘所能看到的地方，可以看见一条条稀疏然而源源不绝的人流沿着附近村落的大小道路伸展过来。在宣布大会开始的时候，已经有3 000多人集合在这座离开村镇很远的山丘上，而且在发言人长时间的讲话过程中，尽管大雨如注，与会者仍然一直在原地坚持到最后。

爱德华·胡森先生提出的决议案指出：“我国工人阶级所遭受的社会困苦是阶级立法的产物，接受人民宪章是矫正这种阶级立法的唯一办法。”这个决议案得到宪章派执行委员会¹⁴³的甘米奇先生以

^① 见本卷第145—149页。

及厄内斯特·琼斯先生的支持。现在让我从这两位发言人的讲话中摘录几段。^①

“提出的决议案认为人民遭遇困苦的原因在于阶级立法。我想任何一个注意事件进程的人都不会不赞同这种意见。所谓的下院,对于人民的一切申诉充耳不闻,而当人民大声申述自己的疾苦时,从那些冒充国民代表的人们那里得到的是愚弄和嘲笑;即使人民的呼声偶尔在议院得到反应,也总是被我们那些占多数的杀气腾腾的阶级立法者的起哄声湮没。(热烈鼓掌。)下院不但拒绝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甚至还拒绝调查他们的社会状况。大家一定还记得,前不久斯莱尼先生曾向议院提议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调查人民的生活情况并拟定救济办法,但是议院竟决定回避讨论这一问题,当上述提案提出时,仅有26名议员出席,由于不足法定人数,议院宣布休会。(高喊声:“真可耻,真可耻!”)当这一提案再次提出时,斯莱尼先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而且,我(甘米奇先生)记得,656名尊贵的议员中竟然只有19名议员出席来讨论这一问题。如果我给你们谈一谈人民的实际状况,我想你们会同意我的意见: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的理由是再充分不过的了。政治经济学家们说,我国每年的产值为82000万英镑。假定联合王国的工人家庭有500万户,每户的平均收入每周为15先令,其实这个平均数我相信比实际收入高得多(呼喊声:“太高了!”),但我们就算平均数是15先令,这样,工人从他们的巨额年产值中仅仅取得极少的一部分——19500万英镑(呼喊声:“真可耻!”),其余的全部都装入寄生的地主、高利贷者和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腰包……这些人就是强盗,这还用得着证明吗?最可恶的盗贼并不是那些关在我们监狱里的人;最大最狡猾的盗贼是那些借助于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来抢劫的人,这种大的抢劫才是全国各地发生的一切小抢劫的原因……甘米奇先生接下去对下院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从议院的议员们所属的阶级和所代表的阶级来看,在他们和千百万劳动者之间是不可能有任何一点点互相谅解的。发言人最后说,人民应该认清自己的社会权利。”

厄内斯特·琼斯先生说:

① 以下的两段话均引自《宪章运动的光荣复兴》,见1853年6月25日《人民报》第60期。——编者注

“今天我们声明要使我们的宪章成为法律。(热烈欢呼。)现在我号召你们回到这个伟大的运动中来,因为我知道,这样做的时机已经到来,胜利已经在望;因为我热切地希望你们不要放过这个大好时机。现在,商业复苏和人口外流使你们暂时有了力量,你们将来如何就要看你们怎样利用这种力量。如果你们利用这种力量只是为了眼前的目的,那么,现在的情况一旦中止,你们就会遭到失败。但是,如果你们不仅仅用它加强你们现在的地位,而且用来保障将来的地位,那你们就会战胜所有的敌人。商业复苏和人口外流固然使你们获得力量,但这种力量必然会随着商业复苏和人口外流的中止而消失,所以除非你们利用间歇时期加强自己,你们就会成为比过去任何时候处境更糟的奴隶。(呼喊声:“对,对!”)而且,现在使你们力量增强的那些根源,不久以后就会使你们力量削弱。使你们的劳动力缺乏的人口外流很快就会使你们的就业机会更加缺乏……商业的衰退将会开始,现在我要问,你们准备怎样应付这个局面?你们投身于争取缩短劳动时间和提高工资的崇高的工人运动,并且实际上取得了某些成果,但是请注意,这些成果你们并不是通过议会得到的!请注意,雇主们在玩这样一种把戏:用点小恩小惠叫他们高兴高兴,但法律上对他们却要寸土不让!不能让议会通过工资法,但可以在工厂里实行它的某些条款。(呼喊声:“对!”)于是雇佣奴隶会说:‘用不着靠什么政治组织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或工资法。瞧,我们不通过议会,自己已经把它弄到手了。’是的,但你们能不通过议会把它保持下去吗?是什么使你们得到这些呢?是商业复苏。是什么会使你们失掉它呢?是商业停滞。你们的雇主们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才缩短你们的工作日,或增加你们的工资,或者说把他们克扣的工资发还你们,这样做是希望你们不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来实行这些措施。(欢呼。)他们缩短工作日,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很快就要减少他们工厂的开工时间;他们增加你们的工资,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很快就要根本不给你们当中成千的人发任何工资。但与此同时,他们,中部各郡的工厂主们,也告诉你们:即使那些法律获得通过,也只不过是迫使他们寻找其他掠夺你们的手段而已,——这就是他们的话的真实含义。所以说,第一,你们不可能使法律获得通过,因为你们没有一个人民的议会。第二,即使这些法律能够通过,工厂主们也会像他们告诉你们的那样,要设法防止这些法律的实行。(高喊声:“对!”)那么我问你们,你们对将来怎么办是否已经作好了准备呢?你们对自己暂时具有的巨大力量利用得怎样呢?因为,除非你们现在就作好准备,你们会变得毫无力量,就会失去所争得的一切。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就是要向你们说明如何才能保持已

经获得的一切并扩大自己的成果。有些人误以为宪章派的组织会干扰工人运动。天晓得！正是宪章派的组织才能把工人运动引向胜利……工人要摆脱雇主，就必须自己为自己谋得工作。工人要自己为自己谋得工作，就必须掌握土地、信贷和机器等劳动资料。工人要掌握这些劳动资料，就必须消灭土地、金钱、商业等等的垄断，而工人要消灭这些，就必须掌握统治权。为什么你们要力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呢？如果不需要用政权来保障工人的自由，那又究竟为什么要进入议会呢？为什么不立即在工厂开始呢？为什么？因为你们知道，感觉到，并以自己的行动本身默默地承认：掌握政权才能取得社会解放。（热烈欢呼。）所以，我现在请你们重视政权的基础，请你们重视选举权，请你们重视宪章。（热烈鼓掌。）……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不等危机到来，千百万人自动地重新集结起来呢？’因为我们所需要的运动不是由一时的激动和危急感产生的运动，而是建筑在冷静的理智和精神力量上面的运动。我们希望你们不要为一时的激动所驱使，而要遵循理性的指引。所以我们号召你们现在重新组织起来，这样你们就可以驾驭风暴，而不受它的摆布。商业衰退会再一次引起大陆上的革命，所以我们必须让坚不可摧的宪章运动的灯塔高高矗立，让它在暴风雨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中给我们照亮道路。总之，我们今天宣布恢复我们的运动；同时，我们要通过议会使它获得正式的承认——我们不是指望议会会接受我们的请愿书，而是因为我们要用这种方式作最适当的传声筒，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复兴。是的，那些曾经宣布我们死亡的人，现在将不得不荣幸地宣布我们的复兴。我们的请愿书无非是一张洗礼登记证，它向全世界宣告了我们的再生。”（热烈欢呼。）

胡森先生的决议案和提交议会的请愿书，在这次集会以及在这个星期内举行的后几次集会上，都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获得通过。

在黑石山脊的集会上，厄内斯特·琼斯还宣布了七年前在这同一个地方召开的宪章派大会¹¹⁶的主持人——工人本杰明·拉什顿的逝世。琼斯提议把拉什顿的葬礼变成一次政治大示威，把这次葬礼同要求接受宪章的西区大会结合起来。这是对这位去世的老战士的最崇高的葬礼。在英国的民主运动史上还从未有一次示威像上星期

日^①在西区举行的恢复宪章运动大会和本杰明·拉什顿的葬礼那样声势浩大；同时，在哈里法克斯集会的人有20万以上，这个数目甚至在运动的鼎盛时期也没有达到过。我奉劝那些仅仅看到英国社会的死气沉沉、麻木瘫痪的外表而对这个社会的其他方面一无所知的人，到这样的工人集会上去深入地看一看那种将摧毁这个社会的力量如何在行动。

联合内阁在印度问题的初步交锋中取得了胜利，斯坦利勋爵关于暂缓立法的提案被184票的多数所否决。^②事务繁忙使我不得不把我对这次表决的评述先放一放。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7月
1日

载于1853年7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19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① 1853年6月26日。——编者注

② 1853年6月30日下院进行的表决。——编者注

卡·马克思

土耳其战争问题。——《纽约论坛报》
在下院。——印度的管理¹⁴⁴

1853年7月5日星期二于伦敦

上月24日,信使把路西德帕沙拒绝俄国的紧急最后通牒的通知^①送达圣彼得堡,三天以后,哥尔查科夫公爵接到了信使送来的命令:强渡普鲁特河,占领多瑙河两公国。

奥地利政府特派久洛伊伯爵去谒见沙皇;他无疑是要警告沙皇,要他注意在任何全欧洲性的战争的后面都潜伏着革命的危险。至于俄国当局在目前情况下会作怎样的答复,我们可以根据它在1829年对同一个强国的类似说法所作的答复作出推断。下面就是当时的答复的内容:

“因此,奥地利当局再一次列举了各种理由来说明动荡十分可虑,根据它的看法和它所掌握的情报,这种动荡正不止在一个国家里蔓延,同时,它还列举了革命倾向近来取得的成就。这种担心在奥皇弗兰西斯致尼古拉的信中反映得特别明显。我们决不想否认奥地利向我们指出的危险。土耳其政府在外国的

^① 路西德帕沙的通知是1853年6月16日发出的。——编者注

影响下所作的抗拒带有执拗的性质，这使目前的危机迟迟不能结束，违反了我们的意图和愿望，甚至迫使我们作出加倍的努力和新的牺牲，因此，俄国不得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关注直接关系到它的荣誉和它的臣民的福利的利益。这样，俄国本来可以用来对付欧洲其他地区的革命暴乱的手段，势必受到牵制。因此，奥地利理应比其他强国更关心缔结和约，但这个和约应维护我皇的荣耀，并有利于我皇的帝国。如果要我们签字的条约不具备这种性质，那么俄国的政治声望和影响将因此受到致命打击，俄国将丧失它作为强国的威信，它在将来发生意外事件时可能应友好盟国要求作出的道义支持也会变得没有力量，收不到效果。”（涅谢尔罗德伯爵于1829年2月12日自圣彼得堡致泰季谢夫先生的秘密信。）^①

据上星期六^②的《新闻报》报道，沙皇对英国，特别是对阿伯丁勋爵的行为异常恼怒，特指示布伦诺夫先生不要再同这个号称“好人”的老头子打交道，只同外交大臣作官方的交往。

奥地利银行巨头的机关报——维也纳的《劳埃德氏报》极力鼓吹奥地利联合英法来对付俄国的侵略政策。

你们大概还记得，联合内阁在4月14日表决废除广告税的建议时曾遭到失败^③。本月1日，联合内阁在这个问题上又遭到了两次失败。就在这一天，格莱斯顿先生建议把广告税由1先令6便士降为6便士，并扩大范围，使之适用于所有书刊和其他出版物上刊登的广告。建议取消现有一切广告税的米尔纳·吉布森先生提出的修正案以109票对99票被否决。在这以后，当格莱斯顿先生的仆从们认为已经取得胜利，纷纷离开议院去出席宴会和宫廷舞会的时候，布莱特先生起来发表了非常有力的讲话，反对征收知识税，特别是反对征

① 卡·瓦·涅谢尔罗德《……给泰季谢夫先生的电报》。——编者注

② 1853年7月2日。——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70、80页。——编者注

收印花税和广告税。我从他的这个演说中引用几段你们可能感到兴趣的话①：

“他(布莱特先生)手里拿着一份篇幅同伦敦的任何一家没有增刊的日报相同的报纸,他认为,这份报纸一点也不比伦敦出版的任何报纸差。这份报纸的铅字比伦敦的任何一家日报都讲究。纸张是上好的,完全符合报纸的一切要求。就印刷来说,没有比它更好的了,它比伦敦任何一家同样大小的日报都包容了更多的材料。第一版、第二版和第三版都是广告。在这一号上登载的文章有:一篇关于美国美术协会的研究的长文,一篇综述欧洲最近各种事件的社论,一篇关于渔场问题的辩论的社论,另外还有一篇他完全赞同的社论,这篇社论证明,社交宴会是社会的公害。(呼喊声:“对!”笑声。)他过去也曾读过一些也许写得更漂亮的文章,但是语调比这更恳切或者能更有用的文章他却从来没有看到过。此外,该报还载有以下一些文章:《欧游归来三日记》、《亚洲号轮船的到来》以及一篇欧洲新闻简述。从大不列颠寄来的一篇文章,详细分析了尊贵的绅士②提出的预算。③这篇文章的某些部分对他是公道的,但另一些地方则不公道,而涉及曼彻斯特学派的部分则当然是完全不公道的。(笑声。)此外,还有关于斯托夫人访问爱丁堡的报道。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篇关于对裁缝的不公正待遇的长文,几篇来自希腊、西班牙和其他大陆国家的通讯,还有一篇文章谈阿斯隆的选举和女王陛下的副检察长以足足189票当选议员的事情——这件事对美国读者来说是会大为惊奇的。然后还有几栏小段的普通简讯和一些详细说明商业和市场情况的表格。该报不断地反对酗酒和奴隶制度,他(布莱特)敢说:目前在伦敦没有比这更好的报纸了。这份报纸的名称就是《纽约论坛报》;每天早上,它都按时地送到每一个愿意花费1便士买它的纽约工人的饭桌上。(呼喊声:“对!对!”)他要向政府提出的问题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或者说为了什么正当的目的和出于什么财政的理由要使我们这里的一个工人付5

① 这几段话以及下面理·科布顿的演说,均引自1853年7月2日《泰晤士报》第21470号。——编者注

② 威·格莱斯顿。——编者注

③ 马克思《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见本卷第77—86页。——编者注

便士才能买一份伦敦的晨报，而他在纽约的直接竞赛者只要 1 便士就能买一份报呢？我们在全世界的面前同美国进行竞赛；但是，如果我国手工工匠被迫根本不看报，要看就得花 5 便士买一份，再不就是被迫上小酒馆里去看，而美国的每一个手工工匠只花 1 便士就能买一份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谈得上两国手工工匠之间进行平等的竞赛呢？同样，从来不看行情表的英国商人也很难像每天都能利用这种好处的商人那样顺利地经营自己的事业。（呼喊声：“对！对！”）……如果财政大臣要反对发言人所说的这些，那么他就要直截了当和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提出反对是因为他对新闻出版自由有一种潜在的恐惧；尊贵的绅士说有财政困难，发言人说，这只是一种托辞，是为了掩饰内心潜藏的恐惧，唯恐人民有新闻出版自由和更广泛的获得政治信息的手段。（呼喊声：“对！对！”）正是对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恐惧心理，使他们抓住 6 便士的广告税不放，硬说它是补充印花税所必需。”

接着克劳弗德先生提议用 0 便士这个数码代替 6 便士的数字。科布顿先生支持这个提案；并且针对格莱斯顿先生所说的广告税对于报纸以低廉价格发行没有太大影响的话，提醒格莱斯顿先生注意霍拉斯·格里利先生在接受 1851 年讨论这个问题的委员会的询问时提供的证词。

“格里利先生当时是大展览会的特派员之一，是他的尊敬的朋友布莱特先生刚才引用的那份报纸的业主。格里利曾被问到如果在美国实行广告税将会产生什么后果，他的回答是：这样做将置美国的新报纸于死地。”

于是约翰·罗素勋爵起来发言，他用相当生气的语调说，企图在很多议员缺席的情况下撤销已经通过的决定，这很难说是公正的。自然，约翰勋爵忘记了：正是在这个关于广告税的问题上，他的同僚们曾经被 40 票的多数击败，而现在只有 10 票的多数。尽管约翰勋爵就“宪制”的公正原则作了一番教导，格莱斯顿先生关于每条广告征税 6 便士的提案仍然以 68 票对 63 票被否决，克劳弗德先生的修正案则以 70 票对 61 票通过。迪斯累里先生和他朋友们在表决时同

曼彻斯特学派⁶⁴站在一起。

下院为了表示充分重视问题的巨大意义，把关于印度的辩论拖得特别长，扯得特别远，虽然这个辩论完全说不上有什么深刻和伟大的意义。表决使大臣们以 322 票对 142 票得到了多数，同辩论形成了反比。辩论对内阁来说可谓满途荆棘，查理·伍德爵士就是被特意放出来吞食这些荆棘的驴子。而表决的结果却是一束玫瑰，查理·伍德爵士则获得摩奴第二的桂冠。正是那些用自己的论据否定了内阁的草案的人，却在投票时对它加以肯定。在法案的支持者当中，没有一个人敢于为法案本身辩护；相反，他们都为自己支持法案辩护：一部分人的理由是，这个法案是方向正确的措施中的小小的一部分，另一些人的理由是，这个法案根本不是措施。前者说，他们将在全院委员会里对法案作修改；而后者说，他们将剥掉它的所有那些用来向人炫耀的假改革的装饰。

内阁所以保住了阵地，是因为托利党反对派有一半以上的人跑掉了，而很大一部分留下来的托利党人则同赫里斯和英格利斯一起投到了阿伯丁营垒里去；至于反对法案的 142 票，其中有 100 票属于迪斯累里派，42 票属于得到某些抱不满情绪的爱尔兰人和某些“野人”支持的曼彻斯特学派。反对派内的反对派又一次拯救了内阁。

东印度公司⁶⁵的官员之一哈利迪先生，在接受调查委员会的询问时说：

“在印度当地居民看来，特许状赋予东印度公司 20 年租借权这个事实，就等于把他们租出去了。”^①

① 引自理·科布顿 1853 年 6 月 27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至少，这一次更换特许状没有规定明确的期限，而可以根据议会的意愿随时予以废止。这样一来，东印度公司将从世袭承租人的体面地位下降到临时租佃者¹³⁷的不稳定的境地。这对当地居民只有好处。关于印度的管理问题，同所有其他问题一样，终于被联合内阁搁置了起来。而下院则又一次地暴露了自己的可怜相：它在同一次表决中表明了自己既没有能力制定出一项法律，又不愿意把制定法律的事情拖延下去。

从亚里士多德的时候起，世界上就充满了大量有些是出色的、有些是胡说八道的学术著作，它们一齐来研究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是进行统治的力量？但是，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一个民族——它统治着另一个拥有 15 600 万人口和 1 368 113 平方英里土地的民族——的“元老院”举行庄严和公开的会议，来商讨如何回答这样一个不平常的问题：在我们中间谁是对 15 000 万人口的异民族实际进行统治的力量？在不列颠的“元老院”中，没有能解开这个谜的奥狄浦斯。整个辩论都是专门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但是，尽管进行了表决，印度的管理问题仍然是一笔糊涂帐。

印度的财政连年亏空，军费负担过重，而公共工程的支出却等于零，苛捐杂税诛求无已，司法和法律状况同样令人不堪忍受。以上这五种情况可以说就是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五个主要之点。所有这一切，在 1853 年的辩论中都被肯定了，完全没有疑问，同 1833 年的辩论、1813 年的辩论、以及所有过去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的情况一样。唯一始终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就是：究竟哪一个政党应当对这一切负责。

不错，在印度设有掌握最高权力的总督。但是这个总督又是由设在英国的管理机关来管理的。那么，又是谁代表着这个管理机关

呢？是在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这个谦逊的头衔掩盖下的印度事务大臣呢，还是东印度公司的 24 位董事？在印度教庙宇的门口，我们可以看到神圣的三位一体，而在管理印度的庙宇的门口，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世俗的三位一体。

如果暂且不谈总督，那么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双重管理**的问题——这是英国习惯的形式。内阁和议院一个用法案一个用表决共同坚持这样的二元论。

当征服了印度来搜刮钱财的英国商人冒险家的公司开始把自己的驻外商馆扩展为一个大帝国的時候，当它同荷兰和法国的私商之间的竞争开始具有国家与国家竞争的性质的時候，不列颠政府当然就开始插手东印度公司的事务，于是，对印度的双重管理，即使还没有在名义上，也已经在事实上产生了。1784 年的皮特法令¹⁴⁵则通过同东印度公司达成妥协，通过使它受督察委员会监督，同时又使督察委员会成为英国内阁的附属物，做到不仅从事实上而且从名义上承认、规定和确立了由环境产生的双重管理。

1833 年法令加强了督察委员会，把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变成了东印度收入的单纯的抵押贷款人，命令公司卖光自己的所有存货，停止了它的商业活动，而在政治上把它变成一个纯粹的王国政府的受托管理人，——总之，对东印度公司采取了该公司对东印度王公惯用的手法，即取代他们以后，暂时仍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管理。所以，自 1833 年起，东印度公司已经只是在名义上被容许继续存在。这样，一方面，要完全取消这个公司似乎只是举手之劳，而另一方面，无论英国是以维多利亚女王个人的名义统治印度，还是用一个挂名公司的传统的招牌统治印度，是完全无所谓的。因此，全部问题似乎只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细节问题了。然而，事情并不完全这么

简单。

首先必须看到,设在坎楠路的内阁下属的督察委员会,像一般人认为设在莱登霍尔街的东印度公司一样,也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督察委员会的委员们虚有其名,最高权力属于委员会主席。主席本身虽然是帝国内阁的独立成员,但不过是二等角色。在印度,人们好像有这样的看法:什么都不会干的人最好是让他去当法官,用这种办法打发他。在大不列颠,如果一个政党在执政以后不知道怎样来安插它的某一位第十等的“政治家”的话,最好就是让他去当督察委员会的主席,当大莫卧儿的继承人,用这种办法打发他——查理·伍德就是一个例子。

根据法律条文,督察委员会——这不过是该委员会主席的别名——拥有

“全权来主管、指导和监督东印度公司一切涉及印度领地的管理或收入的法令、业务和事务”^①。

公司董事不准

“在没有得到督察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发送任何涉及印度或印度的管理的命令、指示、公文、公函或信息”。

公司董事必须

“在接到督察委员会通知之日起 14 天内,拟好一切有关问题的指示或命令,或者转发委员会的有关印度事务的命令”。

督察委员会有权检查股东会和董事会所有发往印度和来自印度

^① 此处及以下两处,均引自约·狄金逊《官僚制度下的印度管理》1853 年伦敦—曼彻斯特版第 8 页。——编者注

的信函和公文及其处理情况。最后，董事会应任命一个机密委员会，由董事会主席、副主席和一名资深的董事组成，他们必须宣誓保密，而督察委员会主席可以通过他们把他个人关于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命令转达到印度，机密委员会只起一个单纯的信息渠道的作用。关于阿富汗和缅甸战争以及占领信德的命令，就是通过这个机密委员会转达的，而董事会对这些命令所知道的并不比广大公众和议会多。因此，就这一点而言，督察委员会主席就像是一位真正的莫卧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有胡作非为的无限权力，例如，策动足以招致毁灭的战争，而且总是用毫无责任的董事会的名义作掩护。但是另一方面，董事会也不是没有实际权力。由于在行政措施方面通常是由董事会负责，由于它是一个比督察委员会更固定和稳定的机构，有传统的活动方式，对具体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一切日常的内部行政事务自然都归它处理。它还经过王国政府批准任命印度的最高权力机关——总督及其参事会，此外，它还拥有召回高级官员，甚至召回总督的无限权力，例如在罗伯特·皮尔爵士时期，董事会对埃伦伯勒勋爵就曾经这样做过。然而这还不是董事们的最大的特权。他们的年薪一共只有 300 英镑，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收入是靠卖官鬻爵，即保荐所有的低级文官和军官，印度总督和各管区的省督都必须挑选这些被保荐的人去填补禁止当地人担任的各种高级职务。在当年的任命数字确定之后，全部数字就被分成 28 等份，其中有两份给董事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两份给督察委员会的主席，其余每个董事各得一份。每份卖缺所得的收入，一般每年不下 14 000 英镑。

坎伯尔先生说：“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任命似乎都成了个人的私有财产，因为这些任命都是在董事之间进行分配的，每位董事可以自由地处理自己分得

的那一份。”^①

因此，十分清楚，整个印度的高级行政机关都要按照董事会的精神行事，这些机关的官员事实上都是经过阿迪斯库姆和黑利伯里学校的训练的，事实上都是通过董事们卖缺而被任命的。同样十分清楚，这个年年要把总值将近 40 万英镑的任命在大不列颠上层阶级中进行分配的董事会，很少会或者根本不会受到这些阶级所引导的舆论的抵制。至于董事会的精神是什么，我将在下一篇关于印度实际状况的通讯中说明。^②现在只谈一点，即在目前仍在继续进行的辩论中，麦考莱先生用一种特别的借口为董事会辩护，说董事会即使有心作恶也没有力量去做，连所有的改进办法也都是自己做事自己当的省督们不顾它的反对、违背它的意愿实施的。例如禁止撒提¹⁴⁶的风俗，废除可恶的过境税，准许东印度的出版自由等就是如此。

所以，督察委员会主席是在董事会的掩护下把印度拖入足以招致毁灭的战争，而董事会则在督察委员会的掩饰下败坏印度的行政机关。

如果我们更深入地考察一下这个畸形的管理制度的结构，就会发现，作为它的基础的，还有一种比督察委员会和董事会更强大的第三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更不承担责任，更容易躲过公众舆论的视线、避开公众舆论的监督。任期短暂的督察委员会主席靠他的这个位于坎楠路的机关中的常任官员们办事，而对这些官员们来说，印度并不

^① 见乔·坎伯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1853年伦敦版第263—264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20—224页和第240—244页。——编者注

在印度，而是在莱登霍尔街。那么，谁是莱登霍尔街的主宰呢？

2 000 位上年纪的女士和病病歪歪的绅士——他们掌握着印度的股票，他们关心印度仅仅是因为可以从印度的收入中得到红利——选出 24 名董事，这些董事唯一的资格就是持有 1 000 英镑的股票。商人、银行家和各种公司的董事都千方百计想钻进董事会，以便维护他们的私人事务的利益。

布莱特先生说：“伦敦城有一个银行家掌握着东印度公司的 300 张选票，在选举董事时，他的话几乎是绝对的法律。”^①

因此，董事会不过是英国金融寡头的从属机关。用这种方法选出来的董事会，除了上面说到的机密委员会外，还建立了三个委员会，这就是：1. 政治和军事委员会；2. 财政和内政委员会；3. 收入、司法和立法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任命每年都互相轮换，这样，某个金融家今年如果参加司法委员会，下年就参加军事委员会，任何人都不可能一直在一个部门里管事。选举方式已经使得选出的人根本不适于担负他们的职务，轮换制度又彻底毁灭了某个人可能偶然表现出来的一点点办事能力。那么究竟是谁以董事会的名义从事实际的管理呢？这就是印度大厦¹⁴⁷里的一大群不负责任的秘书、视察员和官员，在这些人当中，如坎伯尔先生在他的《印度管理方案》中所指出的，只有一个人曾经到过印度，并且是偶然去的。因此，即使把卖官鬻爵的交易撇开不说，也根本谈不上董事会的政治方向、原则和制度。真正的董事会，真正的设在英国的印度管理机关等等，就是那个位于莱登霍尔街的常设的不负责任的官僚机关——“办公桌的产儿

^① 约·布莱特 1853 年 6 月 27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和宠幸颀风的养子”^①。这就是说，治理着一个庞大帝国的，还不像过去在威尼斯那样，是由显贵组成的行会，而是一群昏庸老朽的官员和诸如此类的奇怪人物。

因此，世界上没有哪一种管理像对印度的管理这样写得多而做得少，这也就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了。当东印度公司还只是一个商业性的团体时，它当然像所有的贸易公司一样，要求它的驻印度商馆的经理人员对每个问题都作出最详细的报告。但是，当商馆发展成为一个帝国，而商业报告变成了大堆大堆公函和文件时，莱登霍尔街的官员们就出来推行他们的制度，把董事们和督察委员会都变成他们的仆从；他们把对印度的管理机构变成了一架大打字机。布罗顿勋爵在向公职人员薪俸委员会所作的证词中曾经透露，单单一份公文，所附材料竟达45 000页之多。

为了使读者多少能够想象出印度大厦在办事时是如何消耗时间的，我现在从狄金逊先生的著作中引用一段话。

“当印度来了一份公文的时候，第一步先把它交给有关的视察员办公室；然后主席们^②就同这个办公室的主任一起进行讨论，商量好复函的基本内容，再把复函草稿送交印度事务大臣^③；所有这一切用行话来说就叫作初报——初步报告。主席们在这个所谓初报的初步阶段主要是依赖手下的官员。这种依赖性如此之大，甚至在主席作了开场白之后股东会进行讨论时，还可以看到这样可怜的情景：主席经常向秘书请教，秘书坐在他的旁边，不时向他耳语，提词，打断他的发言，他好像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处在这个制度的另一端的印度事务大臣的处境同样困难，如果在这个初报阶段对草稿发生了意见分歧，那就要进行

① 这是埃·伯克的话，引自约·狄金逊的《官僚制度下的印度管理》1853年伦敦—曼彻斯特版第15—16页。——编者注

② 指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编者注

③ 指英国内阁中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编者注

讨论,而问题几乎总是通过大臣和主席友好地交换意见而得到解决;最后,大臣批回复函草稿,或者通过,或者作些修改;然后草稿连同一切有关文件送交一个负责监督有关办公室的董事委员会审查和讨论,经过该委员会通过或修改后,再送交董事会全体会议履行同样的手续。只是在这一过程之后,它才第一次作为正式报告送给大臣,“然后它经过同样的一道道手续再发回来。”^①

坎伯尔先生说:“当印度讨论某项措施的时候,如果宣布说该措施已经提交董事会,那就意味着无限期推迟。”^②

这种污浊恶劣的官僚习气,受到伯克的痛斥是完全应该的,下面是伯克的一段著名的话:

“这伙庸俗的小政客是不折不扣的人类渣滓。政府工作在他们手中变成了一种最卑鄙、机械的行业。做好事不合乎他们的性格。对于一切仅仅根据良心和人格而做的事他们都深恶痛绝。他们把开阔的、自由主义的和有远见的对国家利益的看法看作是罗曼司,把这些看法所根据的原则看作精神不正常的呓语。买卖人的算计使他们失去理智。弄臣和丑角的插科打诨使他们已不知伟大崇高为何物。目的和手段的卑鄙在他们看来倒是思想健全和头脑清醒。”^③

莱登霍尔街和坎楠路的办公机关每年只花费印度人民 16 万英镑的区区小数。政治寡头为了使自己的小儿子们有事可做,连年把印度拖入战争;金融寡头把印度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地位较低的官僚们则使它的管理陷于瘫痪,使它的多种弊端永远存在,把这当作使他们自己永远存在下去的必要条件。

① 引自约·狄金逊《官僚制度下的印度管理》1853 年伦敦—曼彻斯特版第 15—16 页。——编者注

② 见乔·坎伯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1852 年伦敦版第 215 页。——编者注

③ 引自约·狄金逊《官僚制度下的印度管理》1853 年伦敦—曼彻斯特版第 15 页。——编者注

查理·伍德爵士的法案一点也没有改变现存的制度。这个法案扩大了内阁的权力,却丝毫没有加重它的责任。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7 月
5 日

载于 1853 年 7 月 20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382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莱亚德的提案。——围绕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斗争¹⁴⁸

1853年7月8日星期五于伦敦

随着多瑙河两公国实际上的被占领，以及早在意料中的危机的日益逼近，英国报界显然放低了好战的调子。因此，《泰晤士报》在两篇社论^①中连续提出的建议才没有引起什么异议，它的建议是：“既然俄国人不能克制自己把野蛮地区文明化的爱好，那么对英国来说，最好是让他们自由行动，不要由于无益的固执而破坏和平。”

政府竭力在有待解决的土耳其问题上隐瞒情况的做法暴露了自己，它在上下两院同时上演了一出十分可笑的滑稽剧。在下院，著名的古尼尼微^②修复家莱亚德先生发表一项声明，说他要在今晚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向议院提供有关土耳其和俄国的详细情况。这项声

① 1853年7月8日《泰晤士报》第21475号。——编者注

② 尼尼微为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亚述的首都，遗址在今伊拉克北部。——编者注

明提出以后,在下院就出现了如下场面。

莱亚德先生。——本来已经声明我在明天提出议案。昨天下午我接到一份通知,要求我把议案延期到本月 11 日(星期一)提出。昨天下午我不可能作出答复,事实上在今天早晨以前作答复也办不到。使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昨天我到议院来过,因为我在同投票结果一起印发的提案简报中看到:莱亚德先生已经把他的提案从 8 日(星期五)延期至 11 日(星期一)了!用这种态度对待独立的议员,似乎有欠公道。

格莱斯顿先生。——我不知道是谁下指示和授权在议院的公报上声明延期。我只能向尊贵的议员保证一点:已经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绝对的善意。

莱亚德先生。——我想知道是谁把延期的声明弄到公报上去的。是什么原因使你们把我的提案推迟到星期一?

格莱斯顿先生。——是约·罗素勋爵的身体不舒服。

于是莱亚德先生同意推迟到星期一提出自己的提案。

迪斯累里先生。——我觉得,对于这种安排,政府需要作出解释,尤其是公报中不顾协议把印度法案的讨论也放到明天去了。①

休息以后,查·伍德爵士谦恭地承认,这两件事都是他的过错。但是他按照格莱斯顿先生的提示,宣称他对莱亚德先生是完完全全出于善意。

在上院展示的是另一面。可怜的小罗素身体不舒服这一情况,无论如何与克兰里卡德侯爵的提案没有任何关系。侯爵的提案与莱亚德先生的类似,也是在大臣们要求之下一再延期后定在星期五提出。

布鲁姆勋爵提出保证说,他没有同任何一个阁员讨论过这个问题。但他认为,把克兰里卡德勋爵的提案定在明天提出,在当前情况下是非常不恰当的。

① 关于 7 月 7 日两院辩论的报道,见 1853 年 7 月 8 日《泰晤士报》第 21475 号。——编者注

他要找外交大臣谈这个问题。

克拉伦登勋爵说，他不能肯定在目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不会产生危害，不会造成困难。谈判还在继续。但在多次延期之后，他感到他不应该再请求他高贵的朋友收回自己的提案。但是，他保留在自己的答复中只提出他的社会责任所允许的意见的权利。尽管如此，他还是想问一问他高贵的朋友，是否反对把自己的提案延至最早下星期一提出，因为在上下两院同时讨论这个问题方便些，而约·罗素勋爵现在身体很不好。

埃伦伯勒伯爵。——坐在对面的侯爵阁下如果能够把他原定明天提出的提案不仅延至星期一，而且在目前干脆不定日期，那就十分明智了。

德比勋爵。——对于高贵的侯爵提出这个问题讨论表示惊奇，并且说，他完全同意高贵的伯爵(埃伦伯勒)的意见。

格雷伯爵。——在克拉伦登勋爵声明之后，关于应该延期讨论的问题，想必每个人都清楚了。

在此以后，克兰里卡德侯爵收回了自己的提案。

菲茨威廉伯爵询问，6月26日俄国关于对土耳其进行圣战⁸⁸的宣言是否与原文无异。

克拉伦登伯爵回答说，这个文件他是从女王陛下驻圣彼得堡公使那儿收到的。

马姆兹伯里伯爵。——为了维护诸位勋爵阁下的尊严，政府应该向他们保证，政府愿尽力阻止下院在星期一举行这样的讨论。

阿伯丁伯爵说，他和他的同事将运用他们的全部影响，尽一切力量阻止举行这种讨论。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先用欺骗的方法使下院延期讨论。然后，借口下院已延期讨论，让上院也照此办理。然后，“高贵的”勋爵们决定把提案不定期推迟；最后，为了维护“世界上最高贵的会议”的尊严，要求下院也把提案不定期推迟。

在回答利德尔先生的质问时，帕麦斯顿勋爵在同一次会议上说了下面一段话：

“多瑙河的苏利纳支流不久前所以停止通航，是由于意外事故，——河水上

涨,溢出河岸,结果水流量减少,沙洲淤泥增多。我必须指出,虽然多瑙河三角洲的占有者俄国政府始终都承认,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⁴¹,它有责任保持苏利纳支流能够顺利通航,但是多年以来,我国政府却不得不一再对它的不负责任表示不满。当多瑙河口是土耳其领土的一部分的时候,在沙洲都保持着 16 英尺的深度,而现在,由于俄国当局的疏忽,已减至 11 英尺;而且这 11 英尺的深度只保持在一条很狭小的支流内,这条支流所以这样狭小,是由两岸冲下的障碍物、浅滩淤沙以及船只遇险沉没无人打捞造成的。由于这一切,船舶在此通航,如遇天气不好或缺乏熟练的领港员,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上述情况表明了敖德萨的竞争,敖德萨方面是想阻止沿多瑙河运出商品,而使商品尽量转由敖德萨运出。”

看来,英国内阁是希望到两公国成为俄国领土的时候多瑙河口重新开放,因为那时敖德萨就不会竞争了。

几个月以前,我曾经有机会指出,在各工厂区,关于十小时工作日的鼓动取得了成绩。^①从那时以来,运动就没有停止,并且终于得到立法机关的反应。本月 5 日,代表奥尔德姆的下院议员科贝特先生,请求允许他提出一项关于限制工厂劳动日的法案,规定每星期前 5 天限为 10 小时,星期六限为 7 小时半。他得到允许提出这项法案。在预先辩论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突然心血来潮,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句带有明显威胁口吻的话,他说,如果找不到别的方法保护从事工厂劳动的女工和童工,他就要提议限制机器转动的时

间。他的这句话刚一出口,就引起了一阵反对这位鲁莽的政治家的愤怒的风暴,反对他的不仅仅是工业巨头的直接代表,而且特别是他们的和帕麦斯顿勋爵本人的辉格党人⁶¹朋友,如乔治·格雷爵士、拉布谢尔先生等。约·罗素勋爵把帕麦斯顿拉到一旁,同他作了半

^① 《议会辩论。——僧侣反对社会主义。——饿死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651—657 页。——编者注

小时的私人商谈，然后花了很大力气来平息这场风暴。他向他们竭力解释说，“他认为这完全是误解了他的可敬的朋友的意思，他的朋友所谓要限制机器转动的的时间，实际上说的是反对这种限制”。这种荒唐的和稀泥的做法，乃是联合内阁每天都不可缺少的活命之物。不管怎么样，他们总是有权说的是一回事，指的是另一回事。至于说到帕麦斯顿勋爵本人，我们不要忘记，这位自由主义的老花花公子，在几年以前曾经用和萨瑟兰公爵夫人对古老的苏格兰克朗成员使用过的同样的方法^①，从自己的“领地”上驱逐了几百家爱尔兰人。

提出上述法案的科贝特先生，是有名的威廉·科贝特的儿子，是他父亲当年当过议员的那个城镇选出的议员。他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议员席位，也继承了政治信念。因此，尽管这些信念富有独立精神，却同当前各党派的状态很不合拍。威廉·科贝特当年是英国旧激进主义的最有才干的代表，或者更确切点说，是它的创始人。他曾经第一个揭露了托利党³和辉格党之间传统的党派斗争的秘密，剥下了寄生性的辉格党寡头政治虚伪的自由主义外衣，反对过各种形式的地主所有制，嘲笑过国教会的伪善贪婪，攻击过金融寡头的两个最鲜明的化身——“针线街的老夫人”（英格兰银行）和“马克沃姆先生之流”（国家债权人）¹⁴⁹。他曾经建议废除国债，没收教会地产，取消各种纸币。他探究了政治集权怎样一步步地侵害地方自治，并且谴责这种集权侵犯了英国臣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不懂得这种政治集权是工业集中的必然结果。他提出的所有政治要求后来都写进了人民

① 《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07—615页。——编者注

宪章,但是他的这些要求,实际上并不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而是小的工业中等阶级的政治宪章。他有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感受,但是在理性上却很少冲破中等阶级改良的樊篱。威廉·科贝特一直到1834年去世以前不久,在颁布了新济贫法¹⁵⁰之后,才开始感到同地主、银行主、公债债权人以及国教会牧师一样与人民为敌的工业巨头的存在。如果说,威廉·科贝特就这一方面而言是现代宪章派⁸⁰的先驱,那么在另一方面,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他又是个顽固的约翰牛。他是大不列颠的最保守而又最具破坏精神的人物;他是古老的英国最纯真的化身,同时又是年轻的英国最勇敢的倡导者。他认为英国从宗教改革时期起开始衰落,英国人民的意气从1688年所谓光荣革命¹²⁶的时候起开始消沉。因此,在他的心目中,革命不是革新,而是复旧;不是新纪元的创始,而是“美好的古老时光”的复归。他没有看到,他所想象的英国人民衰退之日,正是中等阶级地位开始提高、现代商业和工业发展之时,并且与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同步,人民的物质状况日益恶化,地方自治让位于政治集权。从18世纪起随着古老英国社会的解体而发生的重大变化引起他的注意,使他心里充满悲伤。但是,如果说,他看到了后果,他却不明白造成后果的原因,不理解正在开创自己事业的新的社会力量。他没有看到现代资产阶级,只看到一部分贵族,他们世世代代垄断着国家的官职,通过法律来批准中等阶级的新的需要和追求所要求的一切变化。他看到了机器,但没有看到使机器开动的那种背后的力量。所以,在他的心目中,1688年以来的一切变化应该完全由辉格党人负责。他们是使英国衰落,使英国人民退化的祸首。因此他对辉格党的寡头政治抱着刻骨的仇恨,不断地加以谴责。因此才出现这样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本能地代表人民群众、反对中等阶级侵犯的威廉·科贝特,

却在所有人的心目中，而且他本人也承认，成了维护工业中等阶级、反对世袭贵族的代表。作为一位作家来说，他仍然是无与伦比的。

如今的科贝特先生在变化了的形势下继续他父亲的政治生涯，于是便不由自主地陷入自由派托利党人的队伍。

《泰晤士报》力图用加倍横蛮地对待英国工人的办法来补偿自己对俄国沙皇^①的顺从，因此就科贝特先生的提案发表了一篇自以为会一鸣惊人、实际上却成了一派胡言的社论。《泰晤士报》无法否认，限制机器转动的时间是迫使工厂主们服从现有的关于工厂劳动时间的法律的唯一手段。但是它却不能理解，一个头脑健全的人，要达到某种目的，怎么会提出要采用唯一适用的手段来。现有的十小时半工作日法¹⁵¹，同所有其他工厂法一样，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对工人虚假的让步而已；工人们不满足这种表面上的让步，敢于要求把这种让步变成现实。《泰晤士报》从来就没有听到过有比这更可笑或更过头的事。如果议会阻止厂主让他的工人每天工作 12 小时、16 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那么，——《泰晤士报》说，——“英国就不再是一个让自由人生活的地方了”^②。这就像南卡罗来纳的某绅士一样，这位绅士由于当众鞭打他从大西洋彼岸带来的黑人而被告到伦敦地方法官那里并被判了罪，他不禁暴跳如雷地大叫：“这里不许人鞭打自己的黑奴，难道能说是自由的国家吗？”如果一个人到工厂当工人，同厂主签订合同，每昼夜出卖自己 16 或 18 小时，没有办法像在较好条件下的普通人那样睡眠，那么，——《泰晤士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② 1853 年 7 月 7 日《泰晤士报》第 21474 号。——编者注

报》说，——这是由于：

“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冲动，这种冲动使供与求两方面不断协调，并且引导他们去从事对他们最愉快最适当的职业。”^①

自然，法律不应该干涉这种美妙诱人的劳动。如果你们要把机器转动的时限定在一天的某一部分时间内，比方说，限定从早上6时到下午6时，那么，——《泰晤士报》说，——你们也会以同样的理由完全禁止使用机器。如果你们在日出之后立即把大街上的煤气灯熄掉，那么你们到夜里也会把它熄掉的。《泰晤士报》不许法律干涉私人事业；大概是为了这个缘故，它才坚持保留纸张税、广告税和报纸印花税，好使它的竞争者的私人事业遭受损失，而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立法机关给它自己的报社免除增刊税。《泰晤士报》对议会干涉厂主老爷们的神圣利益表示深恶痛绝，尽管这种利益威胁到整整几代人的生活和精神；同时，它又大喊大叫地要求议会对马车夫和出租马车主坚决加以干涉，虽然在这方面除了某些大腹便便的实业家们、可能还有印刷所广场^②的绅士们的舒适受些影响以外，威胁不到任何东西。迄今为止，中等阶级经济学家一直对我们说，器的主要用处是它能缩减和代替体力劳动和笨重的劳动。如今《泰晤士报》承认，在现存的阶级制度下，机器并不缩短工作时间，反而延长工作时间；机器先剥夺个体劳动的质量，然后强迫劳动者用数量来补偿质量上的损失。这样，工作日就越来越长，夜以继日。只有工业危机才使这个过程中断，那时就根本不让工人再做工了，——那时，工厂向工人紧闭大门；那时，工人就可以要么尽情休假，要么上吊，那就随他们的

① 1853年7月7日《泰晤士报》第21474号。——编者注

② 《泰晤士报》的所在地。——编者注

便了。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7 月
8 日

第一次载于 1853 年 7 月 22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2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
诡计和诡辩。——涅谢尔罗德最近
的照会。——东印度问题¹⁵²

1853年7月12日星期二于伦敦

上星期四开演的议会闹剧,在星期五即本月8日的会议上继续演出,并告结束。帕麦斯顿勋爵要求莱亚德先生不仅把自己的提案推迟到星期一再提出,而且根本不再提它。“星期一将和星期五的情况一样。”布莱特先生趁这个机会对阿伯丁勋爵的谨慎的政策表示祝贺,同时还表示自己对他的一切完全信任。

《晨报》指出:“即使和平协会¹⁵³本身是内阁,它也不可能比这位大好人阿伯丁更多地去鼓励俄国,阻难法国,使土耳其处于危险境地,破坏英国的威信。布莱特先生的话可以说是一项支持胆小怕事的阁员们的曼彻斯特派宣言。”^①

大臣们极力搁置莱亚德先生准备提出的问题,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内阁的内部分歧就不可能向公众隐瞒了。

① 1853年7月11日《晨报》第19360号。——编者注

土耳其应当分崩离析，这样才可以使联合内阁保持团结。除阿伯丁勋爵之外，极力赞许俄国的阴谋的大臣还有阿盖尔公爵、克拉伦登勋爵、格兰维尔勋爵、悉尼·赫伯特先生、卡德威尔先生和“激进派”威·莫尔斯沃思爵士。据说，阿伯丁勋爵还一度以提出辞职相威胁。显然，帕麦斯顿的“精力饱满”派（“我是罗马公民”¹⁵⁴派）正需要这么一个借口以便作出让步。他们决定向圣彼得堡宫廷和君士坦丁堡宫廷发出内容相同的声明，建议“由列强共同参加订立一项保障条约，使沙皇所要求的有关信希腊正教的基督徒的特权也适用于土耳其版图内的所有其他教派的基督徒”。不过，同样的建议在缅施科夫公爵动身离开君士坦丁堡的前夕，已经向缅施科夫公爵提出了，而大家都知道，这个建议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因此，指望重提这种建议能得到什么结果，真是太可笑了，何况，有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俄国极力寻求的正是签订一项强国即奥地利和普鲁士现在已不再反对的条约。奥地利首相布奥尔伯爵是俄国公使彼得·迈恩多夫伯爵的内弟，他的步调和俄国是完全一致的。就在联合内阁中的两派——昏昏欲睡派和“精力饱满派”通过上述决定的同一天，《祖国报》上刊登了下面的一段话：

“奥地利驻君士坦丁堡的新任使臣布鲁克先生一上任就要求土耳其政府支付500万皮阿斯特赔款，并要它答应交出克列沃克和苏托林纳两个港口。这个要求被看作是对俄国的一种支持。”^①

这并不是奥地利对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利益的唯一的一次支持。大家还记得，在1848年，当君主们需要向本国人民开枪的时候，他们总是制造出点“误会”。现在这种手法又被用在土耳其身上了。

^① 引自1853年7月11日《晨邮报》第24821号。——编者注

士麦那的奥地利领事把一个匈牙利人①从一家英国的咖啡馆绑架到奥地利的船上；为了报复这种行动，流亡者打死和打伤了奥地利军官各一名，事后布鲁克先生要求土耳其政府在24小时内惩办凶手和赔偿损失。¹⁵⁵星期六的《晨邮报》在报道这件事情的同时，还援引了奥地利人进入波斯尼亚的传闻。当联合内阁的代表们昨天在两院的会议上被问到这项传闻是否属实的时候，回答自然又是“没有接到情报”。只有罗素一人大胆地推测说②，这种传闻的唯一根据，恐怕就是奥地利人在彼得瓦尔丁集结部队这个事实。所以，泰季谢夫先生在1828年的一个预言正在应验，当时他曾经说，将来事情发展到决定性的时刻，奥地利一定会迫不及待地要求分赃。

上月26日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消息说：

“鉴于目前谣传整个俄国舰队已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开往波斯普鲁斯海峡，苏丹③询问英国大使和法国大使④：如果俄国人在波斯普鲁斯海峡示威，联合舰队是否准备开进达达尼尔海峡？两位大使作了肯定的答复。现在，一艘载有法英军官的土耳其蒸汽舰刚刚从波斯普鲁斯海峡出发到黑海进行侦察。”⑤

俄国人占领了多瑙河两公国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禁止公布苏丹确认一切教派的基督徒的特权的敕令，并封闭了一家在布加勒斯特出版的德文报纸，因为这家报纸竟敢刊登一篇关于东方问题的文章。同时，俄国人还要求土耳其政府支付他们前次(1848—1849年)占领

① 马·科斯塔。——编者注

② 约·罗素1853年7月11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③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④ 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和埃·德拉库尔。——编者注

⑤ 1853年7月11日《晨邮报》第24821号。这段话部分文字是按意思表达的。——编者注

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时规定的年贡的第一批贡款。从1828年以来，俄国的保护权已经使两公国花费了15 000万皮阿斯特，抢劫和破坏造成的巨大损失还不算在内。英国为俄国支付了它对法作战的费用，法国为它支付了对波斯作战的费用，波斯为它支付了对土耳其作战的费用，土耳其和英国为它支付了对波兰作战的费用；现在，匈牙利和两公国又要为它支付它对土耳其作战的费用了。

目前的一个最大的事件就是涅谢尔罗德伯爵于1853年6月20日发自圣彼得堡的一个新的周知照会。照会宣称，在苏丹没有同意沙皇^①的全部要求、法英舰队没有离开土耳其领水之前，俄国军队决不从两公国撤走。这个照会听起来简直就是对英法两国的侮辱。照会是这么说的：

“两个海上强国采取的立场是海上占领，因此我们有理由占领一个军事阵地，以重新建立相互间的均势。”^②

请注意，贝济克湾离君士坦丁堡有150英里。沙皇坚持它有占领土耳其领土的权利，同时却否认英国和法国有不经沙皇特许而占领中立水域的权利。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沙皇允许土耳其政府在选择放弃主权的形式上有充分的自由——“既可以签订协定、条约或其他双方承担义务的协约，甚至也可以采取签署一个普通照会的方式”。他确信“公正的欧洲”一定会理解，凯纳吉条约只给予俄国保护伊斯坦布尔的一座希腊正教教堂的权利⁸⁹，但这样一来就宣布了俄国是东方的罗马。他对于西方不了解俄国在外国行使的宗教保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② 这句话以及下面的一些话引自卡·瓦·涅谢尔罗德《东方问题》。——编者注

护权根本无害于人表示遗憾。他用历史事实,用“他在1829年利用他的阿德里安堡的胜利时所表现的那种非常温和的态度”来证明他关心土耳其帝国的完整,而他当时没法表现不温和,因为当时他的军队处境很困难,而且英国海军上将又扬言不管有没有本国政府的允许都将轰击黑海沿岸的每个口岸;他当时所能得到的一切,完全归功于西方各国当局“宽宏大量”,以及土耳其舰队在纳瓦里诺附近被背信弃义地摧毁³²。

“在1833年他是欧洲唯一挽救土耳其免遭不可避免的瓜分的人。”

1833年沙皇通过签订有名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¹⁵⁶,同土耳其结成防御同盟,根据这个条约,外国舰队禁止驶近君士坦丁堡;根据这个条约,挽救土耳其不被瓜分,完全是为了让俄国把它全部独吞。

“在1839年,他同其他列强一起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通过共同加以执行使苏丹的王位免被新的阿拉伯帝国取代。”

换句话说,在1839年,他让其他列强主动摧毁了埃及的舰队,并使那个唯一能够把土耳其变成对俄国的最大威胁、唯一能用真正的头脑代替“讲究的头巾”的人^①丧失了一切力量。

“神圣君王的政策的基本原则,向来就是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东方的现状。”

说得对。沙皇一贯处心积虑要使土耳其国家的解体过程完全在俄国的保护下进行。

应当承认,东方还从来没有人敢于面对西方扔出比这更带嘲讽

① 穆罕默德-阿里。——编者注

意味的文件。不过，它的作者是涅谢尔罗德，这个名字本身就有用荨麻抽打^①的意思。的确，这个文件证明欧洲如何在反革命的抽打下退化了。革命者只能为这样的杰作向沙皇祝贺。如果说这是欧洲的退却，那么这还不是一般的战败后的退却，而是可以说通过卡夫丁峡谷¹⁵⁷。

目前，当英国女王^②隆重款待俄国的公爵夫人们的时候，当有教养的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向野蛮的专制君主伏地求降的时候，只有英国的无产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退化。7月7日曼彻斯特学派⁶⁴在哈利法克斯的共济会堂举行和平大会。哈利法克斯的下院议员罗斯利和曼彻斯特学派的所有其他“大人物”从“城里”^③专程前来参加大会。大厅里座无虚席，好几千人还呆在门外。厄内斯特·琼斯（他在各工厂区进行的鼓动很受欢迎，这从向议会提出要求实行宪章的请愿书的数量和地方中等阶级报刊的攻击中都可以看出）这时正在达勒姆。哈利法克斯（琼斯在这里曾两度被提名为下院议员候选人，并通过举手表决¹⁵⁸当选）的宪章派⁸⁰打电报叫他回来，刚好在大会开始前他赶回来了。曼彻斯特学派的先生们完全相信他们的决议将被通过，他们能够把工业地区的支持带回家去，带给他们的好人阿伯丁，正在这时，厄内斯特·琼斯突然登上了讲台，并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它号召人民进行战争，并且宣布，在自由没有确立以前，和平就是犯罪。于是引起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但是，琼斯的修正案仍然

① “涅谢尔”的德文是“Nessel”，意为“荨麻”，“罗德”德文是“rode”，使人联想到“抽打”（rod）。连在一起使人产生“用荨麻抽打人”的联想。——编者注

② 维多利亚。——编者注

③ 伦敦。——编者注

以巨大的多数被通过。

印度法案的条款正在逐一通过，除了所谓的印度改革派的自相矛盾之外，辩论中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①例如，有一位乔斯林阁下，这是一个依靠定期揭露印度现有的弊端和东印度公司⁸⁵的弊政来为自己捞点政治资本的下院议员。你们知道他的修正案是什么内容吗？就是给东印度公司十年租借权。幸好他的主张只是损害了他自己的名誉。还有一个职业“改革家”约·休谟先生，他在自己的长期议会生活中总是能够把反对内阁变成对内阁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支持。他提议不要把东印度公司董事的数目由24人减少到18人。唯一明智的、现在已被通过的修正案是由布莱特先生提出的。他提议取消关于政府任命的董事必须持有东印度公司股票这一要求，这个要求是股东会选出的董事提出的。请看一看东印度改革协会⁸⁷出版的那些小册子，你们就会感到好像是在读正统派、奥尔良派、蓝色和红色共和派，甚至还有失望的波拿巴主义者所共同起草的反波拿巴的长篇檄文。这些小册子迄今唯一的功劳在于，它们总的来说引起了公众对印度问题的注意，而其中所反映的折衷主义的反对立场使它们不可能有更多的贡献。例如，它们一方面批评英国贵族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但同时又反对消灭当地王公的贵族统治。

自从不列颠入侵者插足印度，并且决定牢牢抓住印度不放之后，他们除了用武力或阴谋来消灭当地王公的权力以外别无选择。他们对当地王公处于古罗马人对其同盟者一样的地位，于是他们就步罗马政治的后尘。一位英国作者说：“这是一种喂肥同盟者的制度，正如我们要把牛喂肥，喂到可以把它们吃掉一样。”东印度公司用古罗

^① 1853年7月8日下院的辩论。——编者注

马的方法把他们的同盟者争取到手之后,就用交易所小街¹⁵⁹的现代的方式来处置他们。当地王公为了履行他们同东印度公司订立的协议,不得不向英国人举借大笔重利贷款。当他们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债权人就板起面孔,“拧紧螺丝”,这时王公们只好或者友好地把自己的领土让给东印度公司,或者开战。在前一种情况下,就要变成靠自己的篡夺者的赡养费过活的人,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就要被当作叛逆削去王位。现在,各土邦所占的面积为690 261平方英里,人口为52 941 263人,但是,现在它们已经不是不列颠政府的同盟者,而成为它用五花八门的条件、各式各样的军费补助金制度¹³³和保护制度束缚起来的藩臣了。这些制度的共同之处,就是要求各土邦放弃自卫的权利,放弃保持外交关系的权利,放弃不受总督干涉而解决它们相互之间的争端的权利。它们全都必须交纳贡赋,或者是现金,或者是供养英国军官指挥下的武装部队。关于彻底并吞或兼并这些土邦的问题,现在是改革派和商人之间激烈争论的问题,改革派声称实行兼并是一种犯罪行为,而商人则认为兼并是必要的。

在我看来,问题的提法本身就完全是错误的。各土邦作为邦,自从它们成为东印度公司的附庸或者说受它保护时起,实际上就不再存在了。一个国家的收入如果在两个政府中间进行分配,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损于其中一国的资源和两国的管理制度。在现行制度之下,各土邦被双重负担即自己原有的管理机构和东印度公司加诸它们的贡赋以及沉重的军需捐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允许他们在表面上保持独立的条件,同时也就是使他们不断衰落和根本不可能改善处境的条件。机体虚弱,——这是各土邦存在的基本规律,正像任何一种仅仅靠宽容才得以生存的东西一样。因此,这里问题涉及的不是保存作为邦的土邦,而是保存当地的王公和他们的宫廷。那些厉声

指责“英国王室和贵族穷奢极侈”的人，今天却因印度的纳瓦布¹⁶⁰、拉甲¹⁶¹和札吉达尔¹⁶²（他们大多数甚至还没有资格夸说自己世系远古，因为他们一般都是靠英国的阴谋而飞黄腾达的根底很浅的篡夺者）的破产而痛哭流涕，这岂不怪哉！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些《一千零一夜》中的沙宰曼和山鲁亚尔的专制更可笑、更荒谬和更幼稚的专制了。威灵顿公爵、约·马尔科姆爵士、亨利·罗素爵士、埃伦伯勒勋爵、布里格斯将军和其他的权威人士都宣称赞成维持现状。但是，根据是什么呢？这是因为需要让英国人指挥下的当地军队去同他们自己的同胞进行小型战争，以便防止他们调转枪口反对他们的欧洲主人；因为独立的邦的存在可以使英国军队不时地有事可做；因为世袭的王公是英国专制制度最驯服的工具，可以阻止大胆的军事冒险家崛起，而这种冒险家无论过去或将来在印度是很多的；因为独立的地区可以为当地的一切不满的和野心勃勃的分子提供一个庇护所。所有这些罗里罗嗦的理由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当地的王公是当前丑恶的英国统治制度的支柱，是印度进步的最大障碍。现在撇开这些理由不谈，让我来谈谈托马斯·芒罗爵士和埃尔芬斯通勋爵，这两个人至少是具有高超的天赋，并且满心同情印度人。他们认为，没有当地贵族阶级，任何一个别的社会阶级都将没有充分的生命力，摧毁这个贵族阶级不会提高而只会压低整个民族。如果考虑到在英国人的直接统治下当地人一向不许担任任何军事和民政要职这一情况，那么他们的话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凡是人们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伟大人物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人依靠出身而成为伟大人物，以便使被征服的民族保留他们自己的一点点伟大。但是这种在英国地区排斥当地人的做法，只有由于在所谓独立地区保存了世袭王公才有可能。于是这两种恩典中的一种不得不给了当地军队，这支军队

的军事实力是不列颠在印度的整个统治的依靠。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信坎伯尔先生说的话：印度的当地贵族最没有能力担任要职；为了满足新的需要，必须造成新的阶级；他还说：

“由于下层阶级具有机灵和易于接受知识的特点，这件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做不到的事，在印度却能够做到。”^①

当地王公本身由于他们的王室人丁衰微而正在迅速消失。但是从本世纪起，不列颠政府开始奉行一种政策，允许他们用收养子女的办法来实行继承，或者用英国制造的傀儡来填补他们的空位。大总督达尔豪西勋爵第一个公开反对这种制度。如果不是用人为的办法抑制了事态的自然进程，当地王公就会归于消灭，既无须打仗，也无须花钱。

至于靠赡养费过活的王公，不列颠政府从来自印度的收入中拨给他们的 2 468 969 英镑，对仅靠大米为生、没有别的生活必需品的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如果说这些王公还有些用处的话，那就是可以展示王室的极端腐败和荒唐。例如，拿帖木儿的后裔¹⁰³大莫卧儿^②来说，他每年领取 12 万英镑。他的权力不能超出宫墙的范围，而在宫墙之内，可以自行其是的白痴一般的王族子孙，像野兔一样自由自在地繁殖着。甚至德里的警察也被英国人掌握而脱离了他的控制。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面色焦黄，老态龙钟，穿着一身绣金的同印度斯坦舞女的服饰一样的戏剧服装。在国家庆典的日子里，这个满身披金挂银的傀儡便走出来使忠心的臣子们高兴一下。

① 见乔·坎伯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1852年伦敦版第64页。——编者注

② 巴哈杜尔沙赫二世。——编者注

在他的接见日,外国人见他必须付若干基尼^①的费用,就像是看任何别的丑角的表演一样,而他也回敬客人们头巾、钻石等。客人们就近一看就看出皇家的这些钻石原来是一些胡乱涂了些油漆的、仿造宝石仿造得非常粗糙的小块玻璃,而且拼接得这样粗劣,一放到手里就会像姜汁饼干一样碎裂。^②

我们必须承认,英国的放债人和英国的贵族是很懂得贬抑王权的这一套艺术的,他们使它在国内变成立宪制下的废物,在国外变成徒具礼仪外表的骷髅。而现在,激进派看到这种情景却大为不平哩!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7 月
12 日

载于 1853 年 7 月 2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2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① 旧英国金币。——编者注

② 参看阿·德·萨尔蒂科夫《印度信札》1848 年巴黎版。——编者注

卡·马克思

缅甸战争。——俄国问题。
——外交官的有趣信件¹⁶³

1853年7月15日星期五于伦敦

最近来自印度的一批陆邮传来消息说，缅甸的使节拒绝了葛德文将军提出的条约。葛德文将军给他们24小时的时间让他们再考虑一下，但这些缅甸人却在10小时之内就走掉了。没有尽头的缅甸战争¹³⁴的第三次爆发，势将不可避免。

英国在东方进行的历次征伐，哪一次也比不上征伐缅甸这样师出无名。这里的情况和印度西北边界的情况不同，在孟加拉和缅甸之间，隔着一条军队不能越过的山脉，缅甸根本不可能入侵印度。为了向缅甸开战，印度统治者不得不走海路。认为缅甸人会从海上入侵印度的说法，和那种认为缅甸的浅水帆船能够对抗东印度公司的军舰的荒谬想法一样可笑。也没有任何事实能说明，美国佬有并吞勃固的强烈意图。因此，除了要给破落贵族找些营生，像一位英国作者所说的那样，要“在东方修建一座固定的贵族收容所或汉普顿宫”¹⁶⁴以外，再也找不出任何理由。在阿美士德勋爵的吉诃德式统治的年代发动的第一次缅甸战争（1824—1826年），虽然只有两年多

一点，已使印度的债务增加1300万英镑。为保持东方的殖民地——新加坡、槟榔屿和马六甲——所花的费用，不算兵饷，每年支出超出收入达10万英镑。1826年从缅甸夺来的领土的代价更大得多。勃固这块领土的开支则更是不堪负担。那么，英国究竟为什么在欧洲要避免进行完全必要的战争，即对俄国的战争，而在亚洲却年复一年地投入完全不顾后果的战争呢？国债使英国在欧洲畏葸不前，而它在亚洲的战费却可以让印度人来负担。但是我们会看到，孟加拉的鸦片带来的收入即将停止，再加上又一次的缅甸战争的花费，必然会使印度财政发生严重危机，并将导致印度帝国的彻底的改革，其彻底程度，将超过英国议会里的改革家们在讲话里和劝化文章里所高唱的一切改革。

昨天，迪斯累里先生在下院询问大臣们：在俄国当局最近发出周知照会之后，莱亚德先生提出他的提案是否不太合适。约翰·罗素勋爵回答说，在他看来，现在最好是不听取莱亚德先生的发言，因为在这一照会公布以后，谈判比任何时候都重要。“这位尊贵的议员认为现在谈判已陷入僵局的意见是错误的。”约翰勋爵实际信奉的是阿伯丁的信条，同时他又想用下面一段话来挽回“我是罗马公民”¹⁵⁴派的面子：

“我当然认为，像涅谢尔罗德伯爵这样有经验有远见的人不会签署这样一个文件，公然向全世界宣称俄国政府要在联合舰队撤走的条件下才撤离多瑙河两公国。”^①

在接着进行的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中，布莱特先生提议修改一下第九条，把“六名王国政府选定的公司董事应由以王国政府职员或

① 1853年7月15日《泰晤士报》第21481号。——编者注

公司职员的身分在印度居满十年的人来担任”里的“以王国政府职员或公司职员的身分”这些字删去。这个修正案被通过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印度问题的整个辩论过程中，没有一个修正案曾经得到内阁的同意然后又被议院通过，只有布莱特先生的例外。和平内阁现在正尽一切努力保持同主和派即曼彻斯特学派⁶⁴的友好协约²⁷，这个主和派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它只赞成通过棉花包和行情表进行的战争。

法国外交大臣、曾在基佐先生手下做过外交部高级官员、被他的首长认为办外交条件不够的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如今正在频繁地同涅谢尔罗德伯爵互换照会和周知照会¹⁴²，昏昏然乐此不疲。昨天的《通报》刊登了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对俄国大臣的最近一次（第二次）周知照会¹⁶⁵的答复^①，答复最后的几句话是这样的：

“法国的温和态度，使它卸掉了一切责任，并且使它有权利希望：法国为保持东方的安宁所付出的一切牺牲将不致徒劳无益，俄国政府终将找到办法把自己的企求同苏丹的王权调和起来，对于一个如此众多的利害所系的问题，将想出不使用武力而得到解决的办法。”^②

我在前面有一篇通讯中曾经提到，德·维莱尔先生曾向俄国建议，由所有强国签订一项保障条约来保证奥斯曼帝国不受侵犯^③。当时波措-迪-博尔哥伯爵对这项建议的答复是这样的：

“向奥斯曼帝国作出一般保证，就足以触犯俄国既得的权利和这些权利赖

① 指 1853 年 6 月 25 日德鲁安-德路易斯的照会。——编者注

② 1853 年 7 月 15 日《晨邮报》第 24825 号。——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 179 页。——编者注

以产生的原则,更不用说这种行动非同一般和突如其来了。”①

虽然如此,在1841年,俄国却同意参加签订这个非同一般的条约¹²²,而且涅谢尔罗德本人还曾经在6月20日(7月2日)的照会¹⁶⁵中引用过这个条约。为什么俄国会一反自己的传统政策而同意这样做呢?因为这个条约并不是“向奥斯曼帝国作出的一种保证”,而是对付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穆罕默德-阿里统治的埃及——的工具;因为这个条约是一个反法同盟,至少从其最初意图来看是如此。

我刚才收到今天的巴黎《新闻报》,上面刊登了已故的法国驻伦敦大使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和路易-菲力浦之妹阿黛拉伊德女士之间未公布过的信件。这些信件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外交关系。它们确凿地证明,1841年的条约完全不是由俄国发起的,像涅谢尔罗德在他的照会中所说的那样,而恰好相反,它是法国和英国为对付俄国而发起的,只是到后来它才被俄国变成了对付法国的武器。我在时间许可的范围内从这些重要信件中译出了下面几段:

I

1836年4月21日于伦敦②

现在英国各党派一致认为必须密切注意俄国的行动。我觉得托利党在这

① 沙·安·波措-迪-博尔哥(……急电副本)。——编者注

②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这封信列为第二封,排在奥·塞巴斯蒂亚尼1838年6月12日的信(日期被误为1835年6月12日)之后。现照1853年7月15日《新闻报》改正。——编者注

方面比辉格党更坚决一些，至少是看起来更坚决，因为它无须从官方角度考虑而抱比较克制的态度。

II

1838年6月12日于伦敦

今天我和帕麦斯顿勋爵会谈了两小时。这次谈话使我对他非常满意。我曾向您保证说他是莱奥波德国王的朋友，而且首先是英法同盟的坚决拥护者，在这方面我没有弄错。帕麦斯顿勋爵关于东方问题和我谈了许多。他推测埃及帕沙已经决定了他的行动方针，他希望英法两国以出动海军为凭借，作出新的努力来威胁穆罕默德，希望我们两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同时通知苏丹^①，说他们已收到本国宫廷的命令，让他们向苏丹保证：在苏丹不首先采取敌对行动的条件下，英法将援助苏丹来抵御埃及帕沙。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方针，英法两国都应当按这个方针办事。我们必须支持土耳其政府，不让埃及、叙利亚和克列西利亚这些省份脱离土耳其。俄国现在一心等待时机来援救苏丹，但这种援助将是奥斯曼帝国的末日。

III

1838年7月6日于伦敦

英国人相信关于东方问题能够达成一个全欧协议。他们正急切地期待着巴黎的答复。我认为，我没有违背国王同我数次谈话当中所指出的行动方针。只要在原则上一达成协议，就可以根据可能发生的情况来调整每个强国的行动方式和立场。俄国发挥作用的地方自然应在海上，同英法两国一样；同时，为了防止由于舰队在黑海行动而可能产生的任何危险，必须使俄国同意从波罗的海调来分舰队加入联合舰队。

^① 马茂德二世。——编者注

IV

1839年10月3日于伦敦

英国并没有采纳俄国的建议¹⁶⁶，而且帕麦斯顿勋爵以政府的名义通知我，说英国所以拒绝这样做是由于英国要忠于英法同盟。由于同样的感情，英国还同意让穆罕默德-阿里世袭埃及和部分叙利亚的属地，叙利亚这部分的边界应划定为从圣让达克到太巴列湖。我们取得英国政府对后面这些建议的同意不是很容易的。我想法国和穆罕默德-阿里都不会拒绝这样的协议。东方问题简单化了，它将在列强的协力之下，在保障奥斯曼帝国完整的基础上得到解决。所有原则都被遵守了。欧洲的国际法也被应用于土耳其政府。俄国独享的保护权要取消。我不明白法国的共和派为什么对穆罕默德-阿里那样有好感，为什么那样热烈地维护他的利益。我只能找到一个动机，那就是革命原则，——支持和鼓励一切能够导致推翻各国现存政府的行动。我认为，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上这种圈套。

V

1839年11月30日于伦敦

我从可靠方面获悉，帕麦斯顿勋爵在最近一次内阁会议上作关于东方问题的情况和英法政策分歧的报告时，使用的语气非常温和，对两国同盟非常爱护，值得我们感谢。他甚至还向他的同僚们推荐一种与我过去提出的相类似的体系。在报告最后，他在形式问题上作了让步，而对于采取行动和必然引起纠纷的政策表示反对。

VI

1839年12月12日于伦敦

我拜会了帕麦斯顿勋爵，因为我很希望知道他是否能就不久前他向我谈起的那个问题告诉我一些什么消息。他把涅谢尔罗德先生给俄国代办的信念给

我听了,信的内容和他告诉我的完全相符。布伦诺夫先生的到来将使我们能够了解圣彼得堡当局的秘密意图。帕麦斯顿勋爵在外表上和实质上做得极为出色。他对法英两国内阁恢复友善情谊和继续结盟非常高兴。请您相信,我丝毫没有夸大。我十分坦率地告诉他,新情况完全符合法国一贯的希望。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这点。埃斯特哈济公爵给他的代办写信说,他对元帅①非常满意,又说,他现在正试图使法国内阁重新与奥地利达成协议,但他发现国王难以应付。我认为这一点完全可能。这些不现实的胡思乱想是不会使国王着迷的。这一点我只是对您一个人谈。我完全同意殿下看法:俄国将陷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VII

1839年12月18日于伦敦

今天早晨,我接到元帅发来的一封异乎寻常的信件。这是对我的信的答复,在那封信中,我向他报告了我已经把宣布布伦诺夫先生的新的任命及其目标在巴黎引起的印象告诉了帕麦斯顿勋爵。我把元帅给我的信件的有关段落逐字逐句地念给帕麦斯顿勋爵听。但是,我在先前向帕麦斯顿勋爵谈论这个问题时,用的是一些表达同样思想但和元帅的原话不一样的词句。现在,元帅亲切地向我肯定我的话和他的原话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同时又要我加倍小心,努力在我们的会谈中复述他本人信函中的原话。我只能认为这不过是所谓的“德国人的口角”即鸡毛蒜皮之争,不过是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②所特有的精细……否则我就会大错特错了。在外交上,元帅还是一位新手,因此我很担心他认为外交才能就在于灵巧。事实上他会看到外交才能仅在于真诚和直爽。

① 尼·苏尔特。——编者注

② “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意为骗子。——编者注

VIII

1840年1月13日于伦敦

昨天帕麦斯顿勋爵和整个外交使团出席了午宴……他对我说，大臣们打算请求议会增加海军拨款，但他补充说，他将建议自己的同事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要用法国已加强海军作为理由，以避免用任何一点点暗示伤害盟邦。霍兰勋爵和约翰·罗素勋爵为维持同盟所尽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

IX

1840年1月20日于伦敦

帕麦斯顿勋爵把预定提交各强国和土耳其政府的协定草案告诉了我……这不是五大强国彼此之间的协定，而是这些国家同土耳其政府之间的协定……布伦诺夫先生反对这种形式（请看一下涅谢尔罗德7月2日的照会中关于俄国倡议的那段话吧！）……这个协定包括一个序言和八项条款。序言说得十分明确，原文大致是这样：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乃维持欧洲和平所必需，因此五强国准备向它提供所要求的援助，并把它包括到欧洲国际信任的范围中。在条款中规定了援助问题……

又：我刚才获知，布伦诺夫和诺伊曼对帕麦斯顿勋爵提出的协定极为不满。

X

1840年1月21日于伦敦

我想，帕麦斯顿勋爵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将被俄奥两国谈判代表拒绝。诺伊曼先生的特点就是粗暴，我敢说，他的一些抱怨也是愚蠢的。他把本国宫廷的政策暴露无遗。力图掌握住均势的梅特涅公爵公开地承认他痛恨俄国。他自以为布伦诺夫的建议将被无保留地接受，但他和布伦诺夫都失望了，因为他们碰到帕麦斯顿勋爵这样一位真诚希望同法国结盟并努力同法国一致行动的大臣。

XI

1840年1月24日于伦敦

今天我和坚决主张同我国国王结盟的墨尔本勋爵作了一次长谈。他再三请求我给他指出能使英法两国的建议结合起来的办法。

他对俄国意图的看法和我们一样，而在一个会议上谈到维也纳当局时他还对我说，对维也纳当局是不能相信的，因为它到最后总是成为俄国的忠诚拥护者。

XII

1840年1月27日于伦敦

东方问题目前出现的转折使我很担心……毫无疑问，俄国正迈向战争，奥地利利用尽一切办法支持俄国……它们用“法国在地中海上的计划”把英国吓住了。阿尔及尔和穆罕默德-阿里是它们手中的两个工具……我尽一切努力使布伦诺夫的建议遭到拒绝，但刚要达到目的，却被它们发觉了，现在奥地利把布伦诺夫的建议当作自己的建议拿了出来。这显然是一个骗局。但这里仍然召开了内阁会议来讨论奥地利建议。会上的主张有分歧。一方是墨尔本勋爵、霍兰勋爵和拉布谢尔先生，另一方是帕麦斯顿勋爵、约·罗素勋爵和明托勋爵。其余的内阁成员在这两种观点间摇摆不定。

XIII

1840年1月28日于伦敦

内阁会议暂时只讨论了帕麦斯顿勋爵草案的一项。它决定，该协定应该在六强国之间，而不是五强国之间签订，即不应像布伦诺夫先生所建议的那样，这位先生对于维护他的特殊利益（为了关心奥斯曼帝国！）可以说不遗余力。土耳其政府不会同意它没有参加讨论和拟定的协定。如果它同五大强国签订了条约，它就置身于欧洲的国际法的范围之内了。

XIV

1840年8月15日于伦敦

难道国王的政策和利益都做了梯也尔先生和他的报纸①的任性妄为的牺牲品了吗？费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顶着一切困难持续十余年的体系注定要垮了。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7月
15日

载于1853年7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33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① 《立宪主义者报》。——编者注

卡·马克思

战争问题。——议会动态。
——印度¹⁶⁷

1853年7月19日星期二于伦敦

沙皇^①不仅开始了战争,而且已经结束了第一个战局。作战线不再是在普鲁特河的侧后,而是推到了多瑙河沿岸。与此同时,西方列强采取了什么对策呢?他们劝苏丹^②,就是说,他们强迫苏丹把战争看作和平。他们不是用大炮而是用照会来回答专制君主的行动。他们用来向俄皇进攻的不是两支舰队,而是多达四个的谈判方案。一个是英国内阁提出的,第二个是法国提出的,第三个是奥地利提出的,第四个是由波茨坦的那位“内弟”^③匆忙间草拟的。他们希望沙皇会同意,从这些财宝多得难以挑选的宝库中选择一个最符合他的目的的方案。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在对涅谢尔罗德先生的照会(第二个照会)¹⁶⁵的答复(第二次答复)中,极力证明“首先表示敌意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②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③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的不是英国和法国”^①。像把骨头扔给狗一样，俄国把许多照会扔给了西方外交家，唯一的目的是让他们作无害的消遣，而保证自己进一步赢得时间。自然，英国和法国都踊跃上钩。好像接受这种照会所受到的屈辱还嫌不够，他们还为这些照会加上最爱好和平的评语，例如，《帝国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是这样，这篇文章虽然由拉盖罗尼埃先生署名，然而秉承皇帝的旨意写的，并且是经过他修改的。这篇文章“容忍俄国不在普鲁特河的东岸而在西岸进行谈判的反复无常的要求。”文章实际上把涅谢尔罗德伯爵的第二个照会看作“谋求和解的企图”。文章关于这一点的表述如下：

“涅谢尔罗德伯爵现在谈的只是道义保证，并且宣布道义保证只应暂时由物质保证来代替；由此可见，他是直接要求举行谈判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外交途径已经无能为力了。”^②

俄国在巴黎的喉舌《国民议会报》以讥讽的口气祝贺《帝国报》作了这种为时太晚的发现，它自己只不过对于这样无故吵嚷表示遗憾。^③

英国报纸大惊失色。

“沙皇根本不能理解西方列强对他表示的礼貌……他在同其他强国进行谈判的时候在态度上做不到有礼貌。”^④

上面是《晨报》所说的话。《晨邮报》也因沙皇很少考虑对方的内

① 爱·德鲁安-德路易斯《下面是……[1853年7月15日周知照会]》。——编者注

② 1853年7月16日《帝国报》第197号。——编者注

③ 引自1853年7月18日《新闻报》。——编者注

④ 1853年7月18日《晨报》第19366号。——编者注

部困难而大发脾气。

“仅仅由于狂妄任性而提出没有什么迫切性的要求，并且在这样做时又丝毫不考虑随时都有可能燃烧起来的欧洲的状况，那就是犯了几乎难以置信的轻率的毛病。”^①

《经济学家》杂志上论述金融市场问题的文章的作者认为：

“现在人们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看到：由于世界的（即交易所的）最奥秘的利益为一个人的古怪脾气所左右，结果产生了多么大的困难啊。”^②

但是，在 1848 年和 1849 年，俄皇的半身塑像却是同金牛犊¹⁶⁸摆在一起的。

与此同时，苏丹的处境每时每刻都在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它的财政困难所以不断增长，原因就是它承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而从战争中却没有得到一点好处。人民的热情没有被用来反对沙皇，而是转过来反对苏丹自己。穆斯林的宗教狂热使他受到发生宫廷政变的威胁，而希腊正教徒的宗教狂热则有引起人民起义的危险。今天的报纸上登载了关于密谋杀害苏丹¹⁶⁹的消息，策划这个密谋的是企图扶植阿卜杜尔·阿齐兹即位的老土耳其党的穆斯林大学生。

昨天博蒙特勋爵和马姆兹伯里勋爵在上院要求克拉伦登勋爵阐明自己的意图，理由是法皇已经毫不犹豫地宣布了自己的意图。但是克拉伦登勋爵除了简短地声称，英国赞同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的照会外，他以在最短期间一定向议院报告全部消息的诺言为掩护，

① 1853 年 7 月 18 日《晨邮报》第 24827 号。——编者注

② 1853 年 7 月 16 日《经济学家》第 516 期。——编者注

回避作进一步的说明。当有人问到俄国也夺取了处在他们的军事占领下的多瑙河两公国的民政机关和邮政机关一事是否属实时,克拉伦登勋爵当然仍旧是“避不作答”!“他不能相信这一点,因为他是以哥尔查科夫公爵的告示¹⁷⁰为根据的。”对此,博蒙特勋爵回答说,他觉得克拉伦登的确是一个大乐观主义者。

约翰·罗素勋爵在回答乔·沃姆斯利爵士在下院提出的关于最近在士麦那发生的乱子^①的问题时说,他确实听到过关于奥地利领事^②绑架一个匈牙利流亡者^③的事,但是他并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奥地利要求引渡所有匈牙利流亡者和意大利流亡者的消息。约翰勋爵总是用开玩笑的口吻随自己的意来回答质问。总是说他从没有得到官方消息,也没有在报纸上读到你们需要他或期待他读到的东西。

《科隆日报》在一封7月11日的维也纳通讯中援引了下面一段关于士麦那事件¹⁵⁵的报告:

“谢吉布埃芬蒂已被派往士麦那,去着手调查这起杀害哈克尔贝格先生的乱子的罪魁祸首。谢吉布也得到了把奥地利籍或托斯卡纳籍的流亡者引渡给奥地利的命令。合众国代办布朗先生就这个问题同路西德帕沙进行了谈判,结果如何现在还不知道。我刚刚得知,刺杀哈克尔贝格男爵的凶手已从驻士麦那的美国领事那里获得了一张护照,使他可以不受土耳其当局制裁。这一事实说明:合众国打算干涉欧洲事务。另外还有一个可靠的消息:在波斯普鲁斯海峡有三艘美国军舰与土耳其舰队在一起,此外,还有一艘美国的坎伯兰号巡航舰为土耳其政府带来了8000万皮阿斯特。”^④

① 见本卷第216—217页。——编者注

② 彼·韦克贝克尔。——编者注

③ 马·科斯塔。——编者注

④ 1853年7月14日《科隆日报》第193号。——编者注

不管这一消息或其他类似的消息的真实程度如何,它们都证明了一点,这就是到处都估计美国会进行干涉,而一部分英国的公众甚至还把这看成好事。美国舰长^①和领事的行為在公众集会上得到了大声的赞同,“一个英国人”^②在昨天的《晨报》上还要求在地中海上升起星条旗,让“肮脏的旧的英国国旗”丢一下丑,以促使英国采取行动。

对东方问题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如下:沙皇的这样大的一个帝国只有一个港口作为出海口,而且这个港口又是位于半年不能通航,半年容易遭到英国人进攻的海上,这种情况使沙皇感到不满和恼火,因此,他极力想推行他的先人的计划——开辟一条通向地中海的出路。他正在把奥斯曼帝国的最边远的地区逐个地从奥斯曼帝国主体上分割下来,直到最终使这个帝国的心脏——君士坦丁堡——停止跳动为止。每当他认为土耳其政府的统治似有加强,或者发现斯拉夫夫人中有自我解放的更危险的征兆,从而威胁到他对土耳其的计划时,他就会故技重演侵入这个帝国。他利用西方列强的胆小怕事吓唬欧洲,尽可能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以便在后来得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而止步时显得宽宏大量。

另一方面,不坚定的、畏缩而又互相猜忌的西方列强,起初由于害怕俄国侵略而鼓励苏丹反抗沙皇,而最后却由于害怕一场大战会引起一次大革命而强迫苏丹让步。它们太软弱,太胆小,不敢用建立希腊帝国或建立斯拉夫国家的联邦共和国的办法来重建奥斯曼帝国,所以它们的全部目的就是保持现状,即保持使苏丹不能摆脱沙

① 邓·纳·英格拉哈姆。——编者注

② 阿·理查兹。——编者注

皇、斯拉夫人也不能摆脱苏丹的腐败状态。

对于这种情况,革命政党只能为自己庆幸。西方各国的反动政府的卑躬屈膝,以及它们在保卫欧洲文明的利益不受俄国侵犯方面明显地暴露出来的无能,不能不使 1849 年以来一直处在反革命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产生强烈的愤慨。这些半东方的纠纷也同在中国发生的纯粹东方的纠纷一样,将使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更加尖锐化和更快地到来。随着粮价的上涨和营业的普遍停滞,汇率正在变得不利于英国,黄金开始流向大陆。从 6 月 9 日到 7 月 14 日,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已减少了 222 万英镑,这个数目超过前三个月的增长总和。

印度法案是否在全院委员会通过,人们并不太关心。重要的是,联合内阁现在正在设法否决一切修正案,同托利党人一起反对自己的曼彻斯特学派⁶⁴同盟者。

印度的现状可以用以下几个事实来说明。设在英国的印度管理机关要吞掉整个印度纯收入的 3%, 每年的内债利息和股票红利占 14%, 这两项一共占 17%。除了这些每年由印度汇到英国的款项之外,在印度的支出中约有 $\frac{2}{3}$ 即它的收入的 56% 作为军事费用,而公共工程的支出则不超过总收入的 2.25%, 或者说,在孟加拉地方收入中占 1%, 在阿格拉占 7.75%, 在旁遮普占 0.125%, 在马德拉斯占 0.5%, 在孟买占 1%。这是东印度公司自己公布的官方数字。

另一方面,整个纯收入中将近 $\frac{3}{5}$ 来自土地, $\frac{1}{7}$ 左右来自鸦片, $\frac{1}{9}$ 多来自盐。这些收入来源一共占全部进项的 85%。

至于一些次要的收入和支出项目,只要谈谈在马德拉斯管区还

保留着的莫士尔法税就够了，这是一种向小店铺、织机、羊、牛、各种行业等等征收的税，每年有5万英镑左右，即约等于东印度大厦¹⁴⁷每年花在宴会上的费用。

收入的主要部分来自土地。由于近来关于印度土地使用的各种类型问题大家已经写得很多，并且也都通俗易懂，我在这个问题上只就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谈几点一般的意见。

柴明达尔制度¹⁰⁰和莱特瓦尔制度¹⁰¹是英国人用命令实现的两个性质相反的土地革命。一个是贵族性质的，另一个是民主性质的；一个是对英国地主所有制的拙劣模仿，另一个是对法国的农民所有制的拙劣模仿。但是，这两种制度都是贻害无穷的，都包含着极大的内在矛盾，都不是为了土地耕种者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是为了从土地上征税的政府的利益。

由于实行柴明达尔制度，孟加拉管区的居民立即被剥夺了自己对土地的世代相承的权利，让地方的包税人即所谓柴明达尔得了这些权利。由于在马德拉斯管区和孟买管区实行了莱特瓦尔制度，本来有土地占有权的地方贵族即米拉达尔和札吉达尔¹⁶²等等，都同老百姓一起，下降到小块土地占有者的地位，自己为东印度公司⁸⁵的收税官¹⁷¹耕种小块土地。说这些柴明达尔同英国的地主相似是十分可笑的，他们只能得到租金的十分之一，其余的十分之九都要转交给政府。说印度的莱特同法国农民相似也是很可笑的，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对土地的永久性权利，他们必须根据收成情况每年缴纳不同数量的捐税。最初的柴明达尔阶级尽管曾经严酷地和不受控制地掠夺过很多被剥夺了曾经世代相承的权利的土地占有者，在东印度公司的压力下也很快地消失，由商业投机者取而代之。现在，除了在政府直接管理下归还的地产以外，孟加拉的所有土地都由这些商业投机

者占有。这些投机者造成了一种柴明达尔制度的变种,叫作帕特尼。他们充当不列颠政府的中介人的角色并不满足,他们还造成了一种叫作帕特尼达尔的“世袭”中介人阶级,帕特尼达尔设立了副帕特尼达尔等等。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完善的中介人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的全部重担都压在不幸的农民身上。至于马德拉斯和孟买的莱特,在他们中间实行的制度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强迫耕种制度,土地失去了任何价值。

坎伯尔先生说:“在这里,土地本来可以像在孟加拉一样,因欠租而由收税官卖掉,但是通常都不这样做,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谁也不愿意买地。”^①

这样,在孟加拉我们看到的,就是英国的地主所有制、爱尔兰的中介人制度、奥地利的使地主变成包税人的制度和亚洲的使国家成为真正的土地占有者的制度的混合物。在马德拉斯和孟买我们看到的,是法国式的农民所有者,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农奴和国家的分成制佃农。印度农民的肩上压着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制度的缺陷,但是得不到这些制度的任何一点可取之处。莱特和法国农民一样,是私人高利贷者盘剥的牺牲品;但是他们又不如法国农民,他们对土地没有任何世代相承的权利,也没有任何永久性权利。他们和农奴一样被强迫耕种土地,但是他们又不如农奴,他们在匮乏时得不到糊口的保证。他们和分成制佃农一样必须把自己的产品分给国家,但是国家对待他们却不像对待分成制佃农那样负责供给资金和农具。无论是在孟加拉的柴明达尔制度下,或者是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的莱特

^① 乔·坎伯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1852年伦敦版第359页。——编者注

瓦尔制度下,占印度人口 $\frac{11}{12}$ 的莱特农民都沦于可怕的贫困境地。凭心而论,如果说他们还没有下降到爱尔兰小农那样低的水平,那应该归功于印度的气候,因为同北方人相比,南方人的需要少些,而想象力多些。

与土地税有关联的,还应当看到盐税。大家知道,东印度公司保持着对盐业的垄断,它的盐的售价高于市场价格两倍。而这种事情却是发生在一个海洋、湖泊、山岳、甚至普通的土地都能大量提供这种产品的国家。请看看阿尔比马尔伯爵关于盐业垄断权实际实行情况的描写:

“大批发商以每蒙德^①不到4卢比的价格向东印度公司买进国内需要的大部分食盐;然后主要从达卡东南数英里的地方弄来一些沙子按固定的比例掺在盐里,再以约5—6卢比的价格把这种混合物卖给第二个(如果政府算第一个,那就是第三个)专卖商。后者再在盐里掺上土或灰。再经过几道这样的手续,盐从大城市运到乡村时,价格就提高到了8—10卢比,而杂质增加到25—40%。结果,居民买一蒙德食盐要支付21英镑17先令2便士到27英镑6先令2便士,换句话说,要比大不列颠的富人付的价钱高29—35倍。”^②

我要指出,坎伯尔先生以鸦片垄断权可以防止中国人过多地服用这种药品为理由而维护鸦片垄断权,同时又以酒类垄断权可以大大增加印度的酒类消费量为理由而维护酒类垄断权(印度的酒精专卖证),这种行为堪称英国资产阶级道德的典范。

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再加上盐税,同印度的气候结合

① 印度、伊朗、土耳其等亚洲国家的重量单位,大小在各地区不一样,在印度1蒙德约等于 $82\frac{2}{7}$ 磅。——编者注

② 乔·阿尔比马尔1853年7月1日在上院的演说。——编者注

起来,就成为霍乱流行的温床,——这是印度人对西方世界的报复,这是人类的灾难和罪恶互为影响的一个惊人的严酷的事例。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7 月
19 日

载于 1853 年 8 月 5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383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¹⁷²

1853年7月22日星期五于伦敦

在这篇通讯里，我打算归纳一下我对印度问题的意见。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大莫卧儿¹⁰³的无上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摧毁，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塔人¹⁷³摧毁，马拉塔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摧毁；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他们全都征服了。这是一个不仅存在着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¹¹¹与种姓的对立的国家，这是一个建立在所有成员之间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排他思想所造成的均势上面的社会。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征服者的战利品吗？就算我们对印度斯坦过去的历史一点都不知道，那么，甚至现在英国还在用印度出钱供养的印度人军队来奴役印度，这难道不是一个重大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吗？所以，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如果还算得上是什么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入侵者的历史，他们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

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英国人是否有权征服印度,而在于我们是否宁愿让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而不愿让它被不列颠人征服。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他们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很难说还有别的什么内容。他们的重建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尽管如此,这种工作还是开始了。

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人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条件。不列颠人用刀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通过电报而巩固起来,永存下去。由不列颠的教官组织和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外国入侵者就成为战利品的必要条件。第一次被引进亚洲社会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一个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柴明达尔制度¹⁰⁰和莱特瓦尔制度¹⁰¹本身虽然十分可恶,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私人土地占有制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印度当地人中间,正在崛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级。蒸汽机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

常地、迅速地交往,把印度的主要港口同整个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了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算缩短为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

大不列颠的各个统治阶级过去只是偶尔地、暂时地和例外地对印度的发展问题表示兴趣。贵族只是想征服它,金融寡头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通过廉价销售商品来压垮它。但是现在情势改变了。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大有好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国内交往手段。现在他们正打算用铁路网覆盖整个印度。他们会这样做。其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

大家知道,由于印度极端缺乏运输和交换其各种生产品的工具,它的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尽管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缺乏交换工具而使社会非常穷困,这种情况在印度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1848年在英国下院的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曾经证明:

“在坎德什,每夸特粮食售价是6—8先令,而在普纳却高达64—70先令,那里的居民饿死在街头,粮食却无法从坎德什运来,因为道路泥泞不堪,无法通行。”^①

铁路的敷设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农业服务,例如在建筑路堤需要取土的地方修水库,给铁路沿线地区供水。这样一来,作为东方农业的必要条件的水利事业就会大大发展,常常因为缺水而造成的地区性饥荒就可以避免。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铁路有多方面的重要性

^① 约·狄金逊《官僚制度下的印度管理》第81—82页。——编者注

是很明显的,因为甚至在高止山脉附近地区,经过灌溉的土地也比面积相同而未经灌溉的土地多纳2倍的税,多用9—11倍的人,多得11—14倍的利润。

铁路可以缩减军事机构的数量和开支。圣威廉堡¹⁷⁴司令沃伦上校曾在下院的专门委员会中作过如下的说明:

“如果不是像现在这样,要用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才能从这个国家的边远地区收到情报,而是用几小时就能收到,如果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把命令连同军队和给养一起送到目的地,其意义将是不可估量的。军队可以驻扎在彼此距离比现在更远和更卫生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免得使许多人因疾病而丧生。仓库里的给养也用不着储存得像现在这样多,因而就能避免由于腐烂和天气不好而造成的损失。军队的人数也将因效率提高而相应地减少。”^①

我们知道,农村公社的自治制组织和经济基础已经被破坏了,但是,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固定不变、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却残留下来。农村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农村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既有的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农村几乎没有来往,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现在,不列颠人把农村的这种自给自足的惰性打破了,铁路将造成互相交往和来往的新的需要。此外,

“铁路系统的效果之一,就是它将把其他地方的各种发明和实际设备的知识以及如何掌握它们的手段带给它所经过的每一个村庄,这样就将使印度世代相传的、领取工薪的农村手工工匠既能够充分显示他们的才能,又能够弥补他

① 《印度的铁路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附地图和附录》1848年伦敦第3版第20—22页。——编者注

们的缺陷。”(查普曼《印度的棉花和贸易》)①

我知道,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但是,你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必要的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而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应用机器。所以,铁路系统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何况,正如英国当局自己所承认的,印度人特别有本领适应完全新的劳动并取得管理机器所必需的知识。在加尔各答造币厂操纵蒸汽机多年的本地技师们表现出来的本领和技巧,在布德万②煤区看管各种蒸汽机的本地人的情况以及其他许多实例,都充分证明了这个事实。甚至受东印度公司的偏见影响很深的坎伯尔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认:

“广大的印度人民群众具有巨大的工业活力,很善于积累资本,有清晰的数学头脑,有长于计算和从事精密科学的非凡才能。”他还说,“他们的智慧是卓越的。”③

由铁路系统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的基本障碍。

① 约·查普曼《印度的棉花和贸易及其与大不列颠的利害关系,兼评孟买管区的铁路交通》1851年伦敦版第91页。——编者注

② 《纽约每日论坛报》误为“赫尔德瓦尔”。——编者注

③ 乔·坎伯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1852年伦敦版第59—60页。——编者注

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

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比较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得到重建。这个国家的人举止文雅,用萨尔蒂科夫公爵的话来说,甚至最下层阶级里的人都“比意大利人更精细更灵巧”^①;他们的沉静的高贵品格甚至足以抵销他们所表现的驯服态度;他们虽然天生一副委靡不振的样子,但他们的勇敢却使英国军官大为吃惊;他们的国家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宗教的发源地,从他们的札提¹⁷⁵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型,从他们的婆罗门¹⁰⁷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希腊人的原型。

在结束印度这个题目时,我不能不表示一些结论性的意见。

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① 阿·德·萨尔蒂科夫《印度信札》1848年巴黎版第61页。——编者注

资产阶级是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哪个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靠贪污不能填满他们那无底的欲壑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都像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了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¹⁶¹所应得的红利吗?当他们以保护“我们的神圣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传播基督教吗?而且为了从络绎不绝的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的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他们不是把札格纳特庙¹⁷⁶里的杀生害命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的真面目!

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和欧洲一样大的、幅员 15 000 万英亩的国家,英国工业的破坏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人吃惊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作用只是整个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建立在资本的绝对统治上面。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广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

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7 月
22 日

载于 1853 年 8 月 8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384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
出租马车。——爱尔兰。——
俄国问题¹⁷⁷

1853年7月29日星期五于伦敦

在昨晚举行的下院会议上，格莱斯顿先生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规定采取建立公债利息基金的措施，以支付未按他的财政方案换回的南海公司⁵⁶股票。格莱斯顿先生提出这个决议案，就是承认他的兑换计划完全破产了。除了这个不大的失败外，内阁还在印度法案上遭到了相当惨重的失败。约翰·帕金顿爵士提出一个提案，要求加进一项内容，规定取消盐业垄断，盐的产销在印度完全自由，只征收消费税或别的某种税即可。提案以 117 票对 107 票通过，尽管查理·伍德爵士、约翰·罗素勋爵、詹·霍格爵士、赫·马多克爵士和娄先生（代表《泰晤士报》）拼命反对。政治寡头在把督察委员会主席的薪俸增加到 5 000 英镑的问题上得胜以后，现在打算把东印度公司⁸⁵的完美无瑕的董事们的薪俸从 300 英镑增加到 1 000 英镑，把董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的薪俸增加到 1 500 英镑。显然，政治寡头以为，印度具

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同印度斯坦传说中生长在喜马拉雅山顶峰上的那棵神树上的树叶一样，凡是碰到这树叶的东西都会变成黄金；差别只在于，轻信的印度人希望从树叶的浆液中取得黄金，而文明的英国人则希望从印度人的血液中取得黄金。

在《一千零一夜》中，一位中国皇帝，在一个晴朗的早晨起床以后，走到窗前准备欣赏阿拉丁的宫殿，但是除了一片空地以外什么都没有看见，他大吃一惊，便把宰相叫来问他是不是看到了宫殿。宰相什么也没看到，也跟皇帝一样吃惊。于是皇帝勃然大怒，命令卫士把阿拉丁抓起来。伦敦的公众在星期三早晨起床以后，也碰上了和那位中国皇帝的情况非常相似的情况。伦敦看来好像已经不是伦敦了。在我们已经习惯地看到某些东西的地方，竟然成了一片空地而且始终空空如也。广场上空荡荡的景象使人的眼睛感到惊奇，而死一般的沉寂使耳朵也大为惊异。伦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出租车闹革命了！马车夫和他们的马车，从街上，从他们的停车站上，从火车站的广场上，奇迹般地突然消失了。出租马车主和马车夫都起来反对新的马车法令，反对群贤内阁¹⁷⁸的这项伟大的、简直是“无与伦比”的法令。他们罢工了。

人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注意到，英国公众的道德感总是周期性地突然发作，每隔六七年，他们的德性就变得难以抑制，非同邪恶作一场争斗不可。这一次，这种道德感和爱国心发作的对象是贫穷的马车夫。据说，这些马车夫对无人保护的女士们和大腹便便的实业家们的勒索必须加以制止，车费应该从每英里 1 先令降低到 6 便士。现在 6 便士道德感已经风靡一时。内阁通过菲茨罗伊先生之口，提出了一项对付马车夫的残酷法律，这项法律规定了他们对公众应尽的义务，同时把他们的车费、他们的“双座马车”、他们的马匹和他们

的品行都置于议会的法律管制之下。看来这是要用强制的办法把马车夫变成不列颠高尚品德的标本。现在的一代人需要临时造就至少一批品德高尚、舍己为群的公民，为此就选中了马车夫。群贤内阁如此迫不及待地要实现自己的立法杰作，以致马车法令刚刚在议院通过，实施法律的必要准备一点还没有作好的时候就付诸施行了。伦敦的民事法官们手头还没有一份新的规定以及载明车费和路程的一览表的确切的副本，治安法官已经被告知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马车夫和公众之间发生的一切纠纷。于是，两个星期以来，我们亲眼看到了在地方法官面前不断发生只付6便士的汉普敦派大军¹⁷⁹和“凶恶的”马车夫之间进行战斗的种种伟大场面；一方是为德性而战，另一方是为金钱。马车夫们天天受到训诫，受到判决，被关进监牢。最后，他们确信，按照新的价目表，他们是无法向车主缴纳原来的租金的。于是车主和车夫撤退到他们的“圣山”¹⁸⁰——霍尔本的国民大厅，在那里作出了一项可怕的决定，结果使伦敦三天不见马车的影子。他们已经促成了两件事情：第一，内阁又通过菲茨罗伊先生之口修改了自己的法令，几乎等于废除它；第二，东方问题、丹麦的政变、歉收和日益迫近的霍乱，——所有这一切在坚持一英里付6便士的公德和坚持一英里要12便士的私利之间的伟大斗争面前统统都消失了。

现在摆在日程表上是“罢工”两个字。这个星期罢工的有：“北部煤区的5000名采煤工人，400—500名伦敦的软木塞切削技工，约2000名为泰晤士河上的各种码头干活的工人；赫尔的警察也罢工了，伦敦城的警察和首都的全体警察也作过这样的尝试；最后，就在议会鼻子底下，在圣斯蒂芬斯教堂里做工的泥水工人罢工了。

《泰晤士报》惊叹说：“世界成了劳动者的真正天堂，人越来越值

钱了!”在1849、1850、1851和1852这些年份,商业不断发展,工业高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利润不断增加,但工资大体上没有变动,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保持1847年危机时规定的减低了水平。自从人口外流使人数减少,生活必需品涨价使人民的生活要求更迫切之后,罢工就爆发了,工资因此才有所增加。于是,请看!在《泰晤士报》眼里,世界就成了工人的天堂。兰开夏郡的厂主老爷们为了把天堂降为尘世,便成立了一个协会,以便互相帮忙,互相支持,共同对付人民群众的要求。但是,资产阶级并不满足于用联合来对抗联合,他们还威胁说要用法律进行干涉,而这法律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这一点将怎样实现,可以从自由主义的、讨人喜爱的帕麦斯顿的机关报《晨邮报》的下面一段恶狠狠的话里得出结论。

“如果说有一项恶行特别应该用铁腕加以严惩的话,那就是罢工……必须迅速严惩这些联合行动的领导人和首脑。即使对这些人加以鞭笞,也不致侵犯劳动市场的自由……硬说这是侵犯了劳动市场的自由,那是胡说。只要供应劳动市场的人不采取危害国家利益的行动,那就可以允许他们自由地与雇主谈判。”①

在沿用一定常规的范围内,可以让劳动者认为自己是生产上的自由缔约人,认为自己与老板的合同是依照双方的协约签订的。但是,只要他们一超出这个范围,那就要公开强迫他们在议会这个统治阶级对付人民的常设联合委员会所规定的条件下劳动。帕麦斯顿的机关报的深刻的哲学头脑,昨天有一个奇特的发现,这个发现就是:“在这个国家的所有阶级中,生活最艰难的是上流社会中的穷人”,即那些不得不乘出租马车而不是乘自己的“四轮轿式马车”出行的穷贵

① 1853年7月27日《晨邮报》第24835号。——编者注

族。^①

有人要我们相信,整个世界,特别是爱尔兰,由于饥荒和大批居民背井离乡,正在成为劳动者的天堂。如果说爱尔兰的工资真的那么高,为什么爱尔兰的劳动者如此大量地成群结队地迁居英格兰,定居在“池塘”^②这一边呢?而他们从前在收获季节之后每次都是要回去的。既然爱尔兰人民生活的社会条件已大大改善,那么从1847年起,特别是从1851年起,在爱尔兰人民中间精神病发展得这样厉害又当作何解释呢?请看下列摘自《爱尔兰地方刑事犯疯人病院和私办疯人病院第六次报告》的统计数字:

1851年疯人病院收容病人总数	2 584
(男 1 301,女 1 283)	
1852年	2 722
(男 1 376,女 1 346)	
1853年3月	2 870 ^③
(男 1 447,女 1 423)	

这就是爱尔兰第一所疯人病院¹⁸¹创办人绥夫特当时还怀疑过能否找到90个疯人的那个国家!

由厄内斯特·琼斯恢复起来的宪章派⁸⁰鼓动正在大力开展;本月30日将在肯宁顿广场举行伦敦宪章派的露天大会,这正是1848年4月10日举行那次群众大会¹⁸²的地方。

科贝特先生收回了他的工厂法案,同时宣布他打算在下届议会会议开始时再把它提出来。

① 1853年7月28日《晨邮报》第24836号。——编者注

② 对爱尔兰与不列颠之间的爱尔兰海的戏称。——编者注

③ 1853年7月25日《先驱晨报》第22219号。——编者注

至于英国财政前景和整个前景，本月27日《曼彻斯特卫报》在社论中充分证实了我过去所作的预测，社论写道：

“我国商业界存在如此大量足以引起不安的变幻莫测的因素，这可以说是历来少有的现象。我们有意使用‘不安’这个温和的字眼。如果在谷物法废除以前和一般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前的任何时期，我们就会使用一个比较强烈的词——严重的惊慌。这些因素，第一是人们所担心的歉收，第二是银行地下室黄金不断被提取，第三是战争可能一触即发。”^①

1848年诸宪法中的最后一部宪法，现在由于丹麦国王^②的政变而被废除了。这个国家被授予一部俄国式的宪法，它由于王位法的废除而不可避免地要沦为俄国的一省。¹⁸³我将在随后的一篇通讯中评述这个国家的事态。^③

“我国的政策就是要使最近四个月不发生任何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一般说来，人们都想再等一等。但是第五个月将是一个多事的月份。”^④

这是1828年11月28日波措-迪-博尔哥伯爵在给涅谢尔罗德伯爵的信中所说的话，而涅谢尔罗德伯爵现在正在按照这同一准则办事。俄国继军事占领多瑙河两公国以后进而夺取了这些国家的民政管理，把军队源源开进比萨拉比亚和克里木，同时向奥地利暗示，它的调停可以接受，又向波拿巴暗示，他的建议可能受到沙皇^⑤的欢迎。对于巴黎和伦敦的大臣们，则安慰他们说，尼古拉可能会慈悲为

① 1853年7月27日《曼彻斯特卫报》第2562号。——编者注

② 弗雷德里克七世。——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70—272页。——编者注

④ 1836年《公文集》第1卷第7—9号第473页。——编者注

⑤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怀地终于接受他们的歉意。欧洲各国的宫廷变成了一群嫔妃，她们急切地等待着，不知全体虔诚信徒的这位宽宏大量的主宰会把他的手帕抛给她们当中的哪一个。尼古拉就这样使她们惴惴不安地等待了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以后突然声明，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奥地利也好，普鲁士也好，都管不着他和土耳其的争执，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和土耳其进行谈判。大概正是为了推进同土耳其的谈判，他从君士坦丁堡召回了他的大使。但是就在他声明列强不应该干涉俄国事务的时候，在另一方面，我们得悉，法、英、奥、普的代表们却在维也纳的会议⁹上消磨时间，细细斟酌解决东方问题的方案，而在这种滑稽的会议中，既没有土耳其大使也没有俄国大使参加。本月8日，苏丹^①任命了一个主战派的内阁，以便摆脱停战状态，但是，雷德克利夫勋爵却迫使他在当天晚上解散了这个内阁。他现在简直是手忙脚乱，竟打算派一位奥地利信使到圣彼得堡询问沙皇是否愿意恢复直接谈判。要等这位信使回来以后，再根据他带回的答复决定路西德帕沙本人是否作圣彼得堡之行¹⁸⁴。路西德帕沙应该把新照会草案从圣彼得堡送到君士坦丁堡；然后，这些新照会草案再送回圣彼得堡，而且在最后的答复从圣彼得堡再回到君士坦丁堡以前，将不作任何决定。那时，就会到了第五个月，任何舰队都将不能进入黑海。这样，沙皇就可以悠闲自在地呆在两公国过冬，在那里，他的开支用诺言来支付，这些诺言远从他1820年开始屡次占领这些国家以来一直在流传。

你们知道，根据俄国的坚决要求，塞尔维亚大臣加腊沙宁被解职¹⁹。在取得这第一次的胜利之后，俄国得寸进尺，现在又要求免除

①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全体反俄官员的职务。而且在此之后,还打算用米哈伊尔·奥布廉诺维奇大公这个俄国和俄国利益的驯服工具来替换在位的亚历山大大公。亚历山大大公为了避免这一灾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奥地利的压力下——出来反对苏丹,并且宣布他愿意严守中立。巴黎的《新闻报》用下面的话描写了俄国在塞尔维亚的阴谋:

“大家都知道,俄国领事馆所在地奥尔绍瓦是一个衰败的村庄,这里没有一个俄国的臣民,周围全是塞尔维亚居民,这里的俄国领事馆不过是一个非常穷困的机构,但它变成了目前俄国宣传的中心。法院已经查明,俄国既插手了1840年的伊布勒伊拉案件,1850年的若安·苏楚案件,也插手了不久前逮捕14名俄国军官的案件(这次逮捕成了加腊沙宁政府辞职的原因)。大家也都知道,缅施科夫公爵在他任职君士坦丁堡期间,曾通过他的代理人在布鲁萨和士麦那进行了类似的阴谋活动,就像在塞萨洛尼基、阿尔巴尼亚和希腊那样。”^①

俄国政治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种不仅在目的方面,而且在达到目的的方法方面的传统的守恒性。在现在的东方问题上,没有一次纠纷,没有一项交易,没有一个官方照会,不带有重复历史上某些事件的印记。

俄国目前向苏丹提出要求,只能以凯纳吉条约⁸⁹为借口,虽然这项条约并没有规定俄国对它的教友实行保护的权利,而仅仅是给予它在伊斯坦布尔建筑教堂和恳求苏丹仁慈对待他的基督教臣民的权利。路西德帕沙在他本月14日的照会中反驳沙皇的时候,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早在1774年签订这个条约的时候,俄国就有心早晚要像1853年那样解释这个条约。当时奥地利驻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使臣图古特男爵于1774年向本国宫廷上书说:

^① 引自让·帕拉迪斯的文章,见1853年7月26日《新闻报》。——编者注

“今后无论何时，俄国只要认为时机有利，事先不作很多准备就能从自己黑海的港口派兵袭击君士坦丁堡。在这种情况下，无疑就会爆发同希腊正教教会的首脑们事先共同策划好的阴谋，而苏丹就只好在一获悉俄国人逼近的消息就离开自己的皇宫，逃往亚洲腹地，把欧洲土耳其王位交给比较有经验的统治者。首都一被占领，俄国的统治在恐怖手段和信希腊正教的基督徒的狂热支持下，无疑会很容易地扩展到整个阿希佩拉哥群岛、小亚细亚沿岸和直到亚得里亚海岸的整个希腊。占有这些举世无双的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天府之国将使俄国强大无比，使历史上古代君主的丰功伟业的一切奇迹都相形见绌。”^①

同现在一样，早在1774年俄国就企图以合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前景来刺激奥地利的贪欲。关于这一点，这位图古特男爵写道：

“奥地利这种扩张疆界的行动是不会引起俄国的妒忌的。其原因在于：只要奥斯曼帝国的其余部分落入俄国之手，那么奥地利合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等地，对俄国来说是无所谓的，虽然在别的情况下这对俄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些省份中的居民几乎都是伊斯兰教徒和信希腊正教的基督徒，前者不会被容许在这里定居，而后者考虑到紧邻东方俄罗斯帝国，会毫不延迟地搬到那里去；如果他们仍留在原处，那么他们对于奥地利的不忠势将引起持续不断的纠纷。因此，扩张领土而不加强内部，决不会增强奥皇的权力，只会使它削弱。”^①

政治家们要说明俄国的整个传统政策，特别是要说明它对君士坦丁堡的意图的时候，通常都援引彼得一世遗嘱³⁵。但是他们还可以追溯更远的历史。远在八百多年以前，当时是异教徒的俄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曾召集大贵族宣布说，“由俄罗斯来统治的不仅应该有保加利亚，而且应该有欧洲的希腊帝国，以及波希米亚和匈牙利。”斯维亚托斯拉夫于公元967年占领了锡利斯特里亚并且进窥君士坦丁堡，像尼古拉在1828年所做的那样。在俄罗斯帝国建立后不

① 引自约·冯·哈麦尔《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第8卷。——编者注

久，柳里克王朝便把自己的王都从诺夫哥罗德迁到基辅，以便更靠近拜占庭。在11世纪，基辅在各方面都仿效君士坦丁堡，被称为**第二个君士坦丁堡**；这个称呼表达了俄国长期的愿望。俄国的宗教和文明起源于拜占庭，因此，俄国那时想使像现在的奥斯曼帝国一样衰微的拜占庭帝国从属于自己，比起德国皇帝们想征服罗马和意大利更加自然。所以，俄国的政策在目的方面的统一性，是由它过去的历史、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是由它必须在阿希佩拉哥群岛（像在波罗的海一样）获得出海港口以便在欧洲保持它的统治地位这一情况决定的。但是，俄国用来追求这些目的的传统手法，根本不值得欧洲的政治家们那样赞扬。它的传统政策的成功证明了西方列强的软弱，而这一政策的手法的一成不变则证明了俄国本身固有的野蛮。如果能让法国的政治按照黎塞留遗嘱或查理大帝敕令¹⁸⁵办事，那谁会不觉得可笑呢？只要研究一下俄国外交的最著名的一些文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俄国的外交善于敏锐地、聪明地、熟练地和巧妙地找到欧洲的国王、大臣和宫廷的弱点，但是，每当涉及西方各国人民自己的历史运动时，它的聪明才智就完全不中用了。利文公爵指望好人阿伯丁对沙皇的所作所为加以默许，显示出他对阿伯丁性格的判断是完全准确的，但是他在1831年改革运动的前夕预言托利党将继续执政，他对英国人民的判断就大错特错了。波措-迪-博尔哥伯爵曾经对查理十世作出完全正确的判断，但是他怂恿自己的“神圣君王”同这位国王在他被赶出法国的前夕举行瓜分欧洲的谈判，这样他在对法国人民的估计方面就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俄国的政策以其传统的诡譎、奸诈、狡猾可以让本身也是传统之物的欧洲宫廷上它的圈套，但是，它在对付革命人民时却证明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在贝鲁特，美国人从奥地利的鹰爪下又抢走了一个匈牙利流亡者。¹⁵⁵美国干涉欧洲事务正是从东方问题开始，这是令人高兴的。除了君士坦丁堡因其地理位置而具有贸易和军事意义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历史原因，使占有这个城市的问题成了东西方之间经常激烈争执的主题。而美国就是西方最年轻但最富有活力的代表。

君士坦丁堡是永恒之城，是东方的罗马。在这里，在古希腊皇帝统治时代，西方的文明和东方的野蛮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土耳其人统治时代，东方的野蛮和西方的文明又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致使这个神权帝国的中心成了欧洲进步的严重障碍。当希腊的皇帝们被伊康尼苏丹赶走的时候¹⁸⁶，古拜占庭帝国¹⁸⁷的精神却不管这种改朝换代的变化而继续存在下来，而苏丹如果被沙皇取代，东罗马帝国也将再生，那时它会产生比在古代皇帝们统治下更坏的影响，会成为比在苏丹统治下更富有侵略性的力量。沙皇将支持拜占庭文明，正像当年组成东罗马帝国皇帝们的近卫军的俄国冒险家们几世纪来支持这些皇帝们一样。西欧和俄国争夺君士坦丁堡的斗争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是拜占庭主义在西方文明面前衰落下去呢，还是它们之间的对抗将以空前可怕而粗暴的形式重演。君士坦丁堡是架设在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不通过这道桥，西方文明就不能像太阳一样绕行世界；而不同俄国进行斗争，它就不能通过这道桥。君士坦丁堡在苏丹的手里只不过是暂时归他代管留待革命来取的物品，而认为自己的“秩序”的最后堡垒是在涅瓦河畔的西欧现在的名义上的统治者们，目前则只能使问题悬而不决，一直到俄国不得不面对它真正的敌人——革命为止。将推翻西方的罗马的革命也将战胜东方的罗马的邪恶势力。

读过我在大约两年前为《论坛报》写的关于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的通讯^①并且想对它有一个直接的认识的读者们,不妨看一看现在陈列在纽约水晶宫¹⁸⁸的哈森克莱维尔先生的绘画^②,这幅画描绘了1848年工人向杜塞尔多夫市政当局递交请愿书的情景。作家只能加以分析的东西,杰出的画家则以富有戏剧性的画面生动地再现出来了。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7月
22以后—29日

载于1853年8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44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112页。这组文章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撰写的,发表时用的是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正式通讯员的卡尔·马克思的署名。——编者注
- ② 指1849年绘制的《工人与市政当局》。——编者注

卡·马克思

*在下院。——报刊论东方问题。
——沙皇宣言。——丹麦¹⁸⁹

1853年8月2日星期二于伦敦

伦敦街头又出现了出租马车。在上星期六，马车夫放弃了他们的消极反抗方式。同时，议会正在继续设法废除本届会议的伟大法令，逐步取消马车夫和下院之间的一切开战的理由^①。

在内阁提出的关于提高董事会董事、主席和副主席薪金的提案被否决以后，在把董事们的薪金减低到500英镑、把主席和副主席的薪金减低到1000英镑以后，在星期五，印度法案在最后一读中通过了。上星期五举行的东印度公司⁸⁵股东会特别会议，气氛非常低沉。沮丧的叫喊和演说，明显地暴露了可敬的股东们的忧虑心情，原来他们已经感觉到：印度帝国曾经是他们的财产的那种美好时代，看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有一位尊贵的绅士谈到他打算把一项决议案提交下院审查，该决议案反对目前的法案，并以股东和董事们的名义宣布

① 见本卷第254—255页。——编者注

他们要拒绝充当内阁的这一措施给他们指定的那种角色。尊贵的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和董事们罢工了！确实，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场面呵！英国下院取消了公司的盐业垄断，是把印度财政纳入它的直接管理的第一步。

昨天，在全院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执行岸防勤务的海军志愿兵的法案。采取这一措施的目的是：建立一支1万人的兵团，他们每年要受4个星期防卫不列颠海岸的军事训练。像在民军里服役一样，这些志愿兵将领到为数6英镑的补助金。他们的服役期限在和平时期为5年，战争危险时期为6年。在军队出动期间，他们将按二等水兵的待遇领取军饷，而在最后一年，每天还能领到两个便士的补助金。在和平时期，不得使他们离开海岸50里格^①以上，在战争危险时期，不得超过100里格。

昨天晚上，关于爱尔兰地主和租佃者的法案¹³⁶也三读通过。增加了一项有利于租佃者的重要修正条款，即禁止地主强占和出卖租佃者的青苗。

科布顿先生出版了一本论缅甸战争起因的小册子^②。

在法国，害怕歉收的情绪非常强烈，以致路易·波拿巴政府同巴黎面包店主公会已经商定：在8月上半月把面包价格稍微降低一些，尽管巴黎粮食市场上的面粉价格在不断提高。面包店主以后将会由提高价格得到补偿。

《经济学家》写道：“这是法国政府的阴谋，其目的是想用欺骗手段使人民相

① 在英国1里格约为3海里。——编者注

② 指理·科布顿《印度战争是怎样发生的。缅甸战争的起因》1853年伦敦版。——编者注

信,收成并不像实际情况那么坏。”^①

天天都有大量关于东方问题的互相矛盾的消息充斥各个报刊的版面,这些消息是在维也纳和柏林制造的,其中一部分是俄国的代理人制造出来的,其目的是迷惑法国和英国的公众,使他们对俄国的行动发生错觉;还有一部分是按照巴黎的特别定单制造出来的,其目的是有利于证券交易所的活动。可是,今天的《晨邮报》上发表的一段声明却值得注意——这里要假设这家帕麦斯顿喉舌不是像以往那样滥用这样一些头一天使用只是为了第二天收回的威胁言词。

“8月10日以前整个问题要通过和平方式得到解决,否则联合舰队就要奉命开往波斯普鲁斯海峡,也可能开往黑海。有力的行动将代替耐心的谈判,对危险的恐惧将不再妨碍采取可以维护安全的强硬手段。如果沙皇接受现在向他提出的建议,从多瑙河两公国立即撤兵将是首要的条件。”^②

接着,《晨邮报》断言: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代表已在上月24日就一份立即送往圣彼得堡的最后通牒的各点达成协议¹⁸⁴。可是,这种说法是同克拉伦登勋爵和约翰·罗素勋爵最近发表的声明相矛盾的,他们所提到的只是法国和英国的联合照会;同时,这种说法根本不为法国报刊所重视。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说法至少说明,在内阁中,帕麦斯顿派已交给好人阿伯丁一份最后通牒,他必须在8月10日作出答复。

好像是怕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的那些会议还不能使我们满足似的,我们从《国民报》获悉,现在又要在柏林举行一些会议。为了给这些会议提供必要的“材料”,俄皇骄横地发表了一项声明:他虽然非常

^① 1853年7月30日《经济学家》第518期。——编者注

^② 1853年8月2日《晨邮报》第24840号。——编者注

愿意放弃对两公国的占领，——这种占领是确保他的教友们的利益的物质保障——但是，他现在仍然不得不把两公国把持在手里，以保障他目前占领两公国的支出得到补偿。哥尔查科夫公爵在他的告示中曾宣布，俄国决不对两公国的合法当局进行任何干涉，但沙皇现在却颁布命令禁止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国君^①向土耳其政府缴纳任何贡品或同它保持任何关系。瓦拉几亚的国君接到这一指令后，就告诉俄国驻布加勒斯特的领事说，他已给苏丹^②送去了贡款，领事回答说：这钱是白扔了，也就是说，国君需要再给俄国送去这一笔钱。

昨天的《祖国报》报道说，摩尔多瓦三位最有影响的大贵族，经国君特别许可，已从雅西启程去彼得堡，就俄国士兵的行为向沙皇进行规谏，因为这些士兵违背对土耳其政府许下的庄严诺言，把多瑙河两省当作被征服的国家，在那里敲诈勒索，胡作非为。当然，谁也不能责备俄国人会为了追求某种宣传目的而在两公国争取民心。

俄国在继续备战，并且像过去一样大张旗鼓地进行。《汉堡消息报》登载了俄皇于7月23日在彼得堡颁布的下述谕旨。

“受命于天的尼古拉一世，根据我在1834年8月1日(13日)关于每年在我帝国部分地区招募新兵的谕旨，今命令如下：

1. 为了补充陆军和海军，应在帝国东部地区实行第十次局部招募，招募人数应与1852年在帝国西部地区招募的比例一样，即每1000人招募7名新兵。

2. 除此以外，还应在帝国东部各省每1000人招募3名新兵，以补足这一地区在上次招募中欠缺的名额——上次规定每1000人6个名额，只招募一半而尚缺一半。

3. 根据1845年10月31日和1846年9月26日的谕旨，因歉收而免征新兵

① 格·吉卡和巴·施梯尔贝。——编者注

②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的普斯科夫省、维切布斯克省和莫吉廖夫省,1853年应每1000人招募3名新兵。对于维切布斯克省和莫吉廖夫省的犹太人,应同其他各个省份一样,每1000人招募10名新兵。

4. 新兵招募工作,从11月1日开始,到12月1日结束。

尼古拉一世于圣彼得堡”

除谕旨外,还发布两项命令,规定了进行这次新的非常的新兵招募工作的细则。根据第二项命令的规定,除上述各省外,还将在基辅省、波多利亚省、沃伦省、明斯克省、格罗德诺省、维尔纳省和科夫诺省的独户农¹⁹⁰和城市居民中间进行招募。

《汉堡消息报》的通讯员报道说:

“帝国内部在继续不断地进行备战。第四步兵军的各个后备营集中在图拉附近。我们从当前的一项命令中获悉:近卫军和掷弹兵仍然驻扎在离加特契纳不远的红村一带和普多日附近。这两个数达10万人的军的野外演习在继续进行。”^①

7月16日的斯德哥尔摩《邮报》报道:俄皇已颁布了一项命令,要装备由20艘战列舰和15艘护航舰组成的波罗的海舰队。7月29日的《科隆日报》写道:

“丹麦瑞典联合舰队在结束演习以前就提前返航的原因是,司令官接到了一项立即把军舰开往波罗的海的命令。”^②

今天,法国各家报纸和《纪事晨报》都登载了一则维也纳7月30日的电讯,该电讯报道说,美国表示愿意给土耳其政府以金钱帮助和有效支持。

① 1853年8月2日《汉堡消息报》第178号。——编者注

② 1853年7月31日《科隆日报》第210号。——编者注

俄国的威胁性态度加上由于预计到歉收而引起的不安,在大陆人们的思想中产生的影响,在《经济学家》的下面一段话中反映得最为明显:

“沙皇惊醒了欧洲的革命精神,使它恢复了活力和希望;我们读到在奥地利、意大利以及法国发生密谋事件的消息。在这些国家里,人们害怕发生新的革命混乱更甚于害怕政府打仗。”^①

目前,霍乱病在哥本哈根闹得很厉害,已有4 000人被传染,至少有15 000人申请离开丹麦首都的护照;一位消息灵通的因害怕得霍乱病而刚刚到达伦敦的丹麦人士告诉我,关于王位继承制度的国王诏书之所以被通过,主要是由于艾德党¹⁹¹的大部分人在表决时弃权,这些人希望用自己的消极态度来防止发生危机。可是,他们所害怕的危机还是以钦赐宪法的形式强加到他们头上,该宪法的矛头特别是针对着“农民之友”¹⁹²——一个过去曾经支持丹麦国王而使他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取得胜利的政党。因为我打算专门写一篇通讯来谈这个问题^②,在这里就只指出一点:丹麦政府已把同列强就它的建议而交换的照会提交联合议会(上院会同下院)审查。

英国的照会和俄国的照会是这些文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特别是在目前。“沉默寡言的”克拉伦登不仅赞同国王诏书,而且明显地向丹麦政府暗示:它不能继续保存原来的、有普选权而没有上院的民主宪法。因此,沉默寡言的克拉伦登才积极主动地鼓励和煽动在丹麦——为了俄国的利益——实行政变。涅谢尔罗德伯爵致翁格恩-施特恩堡男爵的俄国照会,在重述了1852年5月8日签订的伦敦条

① 1853年7月30日《经济学家》第518期。——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75—277页。——编者注

约⁶⁹的条文以后,用下面的话作了结束:

“5月8日的条约并没有正式规定废除王位法¹⁸³;因为这样的规定在独立国家之间缔结的条约中恐怕是不合适的。这将违反外交惯例,尤其是不尊重丹麦国王应有的主权和尊严。可是,列强同意把领土归还以换取在必要时放弃王位法的规定,它们答应予以支持,自然要让丹麦国王陛下^①选择适当的手段来通过立法的办法实现这一目的。陛下利用国王特权,表示打算为一切归他管辖的领土建立一种王位继承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如果弗雷德里克三世的男系后裔断绝了,那么,从王位法第27条和第40条产生的权利将被认为一律无效,并应召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蒂安亲王即位,以保证由他以及他同黑森的路易莎公主结婚所生的男系后裔担任丹麦国王。这就是1852年10月4日的国王诏书中作的规定。这些规定所反映的观点,至少对帝国政府来说,已成了目前谈判的基础。在帝国当局心目中,它们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因为在我们看来,废除王位法第27条和第40条,不仅是使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蒂安亲王及其后裔被召即位的那种规定的必然结果和必要条件,而且是条约的序言中所规定的原则的必然结果和必要条件;就是说,保障丹麦王国不可侵犯的最可靠的手段,是在一切目前归丹麦管辖的领土上实行男系后裔继承王位的规定……列强在条约第II条中宣布,它们永远承认丹麦王国不可侵犯的原则……它们及时明确地宣布,它们打算协力阻止去年已不幸发生过的那种纠纷的重演……停止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蒂安亲王的男系继承,无疑就会恢复皇帝陛下在当时为维护亲王而拒绝了的那种可能的权利。可是,在这方面专门保留给丹麦国王的主动权,以及三大强国在上述情况下的合作(如果这种合作可能实现),今后将为丹麦爱国者提供一种保障,防止目前只是在他们自己的想象中存在的野心勃勃的意图和计谋^②。”

由此可见,俄国是这样示意的:5月8日的议定书所通过对王位法的暂时废除,应当解释为永久废除,而俄皇对自己权利的永久放弃只不过是暂时放弃,但丹麦的爱国者今后可以指望欧洲列强来保

① 弗雷德里克七世。——编者注

② 马克思引用的资料来源未能查明。——编者注

护本国的不可侵犯。他们难道没有亲眼看到,在缔结了 1841 年的条约以后,土耳其的不可侵犯究竟是怎样受到保护的吗?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8 月
2 日

载于 1853 年 8 月 1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47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广告税。——俄国的行动。——
丹麦。——合众国在欧洲¹⁹³

1853年8月5日星期五于伦敦

废除广告税的法令昨晚获国王批准，今日生效。几家晨报已公布降低了的各类广告价目。

伦敦的船坞工人宣布罢工。公司正努力招收新工人。新老工人之间可能发生冲突。

俄皇^①找到了把持多瑙河两公国的新借口。他今后把持两公国已经不是把它们作为他的精神要求的物质保障，也不是为了补偿占领它们的费用，——不，他现在要把持它们是由于巴尔塔利曼尼条约¹²¹中所说的“内部混乱”。由于俄国人确实在两公国闹得天翻地覆，内部混乱的存在是不能否认的。在8月2日上院会议上，克拉伦登勋爵证实了我在上一篇通讯中所写的事，即俄国人禁止公国的国君向君士坦丁堡进贡，禁止他们与土耳其继续保持关系^②。克拉伦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68页。——编者注

登勋爵表情严肃、神态庄重地声明，他将

“通过今晚离开伦敦的信使，命令议密尔顿·西摩尔爵士要求俄国当局作出英国有权要求它作出的解释。”^①

当克拉伦登派人老远地到圣彼得堡要求解释时，今天的《祖国报》^②上登载了上月20日从雅西发出的消息：俄国人正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构筑工事；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国君^③已置于由三人组成的俄国监督委员会的监视之下；正向居民征收特别军税；一些不驯服的大贵族被抓到俄国军队里去服役。这就是对哥尔查科夫公爵的通告所作的“解释”，这项通告曾说，

“神圣君主无意改变治理该国的机构，他的军队的驻扎不会使居民承担任何新的特别军税和费用。”^①

在同一天举行的下院会议上，约翰·罗素勋爵在回答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提出的问题时声称，四强国已经在维也纳商定共同向沙皇提出一项俄国和土耳其都“可以接受的”建议，这一建议已送往圣彼得堡。约翰·罗素勋爵在回答迪斯累里先生时说：

“虽然这个建议最初出自法国政府，但实际上是奥地利的建议。”^①

这个出生于法国但又入了奥地利籍的建议看来是很成问题的，《新普鲁士报》在一篇维也纳通讯中对此作了如下的解释：

① 乔·克拉伦登 1853 年 8 月 2 日在上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指 1853 年 8 月 4 日《祖国报》第 216 号所载沙·席勒的报道。——编者注

③ 格·吉卡和巴·施梯尔贝。——编者注

“俄奥两国当局已完全商定不允许英国影响在东方占优势。”^①

“一个英国人”就联合内阁的解释指出：

“他们是以屈辱显示伟大，以愚蠢显示坚强，以沉默显示雄辩。”^②

一旦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俄国化，加利西亚、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都会成为俄国的“飞地”。

我在前面的一篇通讯中谈过圣彼得堡银行的“秘密金库”，即用来保证三倍于此数的纸币流通的黄金储备。^③现在俄国陆军大臣^④申请将其一部分拨归陆军部金库。由于财政大臣^⑤反对，皇帝便亲自出马，向正教行政总署——教会财产的保管者商借6000万卢布的贷款。沙皇在钱财方面遇到了困难，他的军队则在健康方面遭到了威胁。据可靠消息说，占领两公国的士兵在进军期间饱受酷热之苦，病者极多，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许多私宅都改作病院。

昨天《泰晤士报》谴责了俄国对土耳其的野心计划，但同时又企图掩盖俄国在丹麦的阴谋。《泰晤士报》甚至在假装同它的神圣君王争吵时，也在为他效劳。

《泰晤士报》说：“我们不相信俄国当局已经控制了哥本哈根宫廷的说法，所谓丹麦政府在俄国的影响下正采取废除或删削1849年宪法的步骤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丹麦政府公布了关于对现行的宪法略事修改的法案或草案，但这一

① 1853年8月2日《新普鲁士报》第177号。——编者注

② 阿·理查兹《需要解释》，见1853年8月5日《晨报》第19382号。——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27—128页。——编者注

④ 瓦·安·多尔戈鲁科夫。——编者注

⑤ 彼·费·布罗克。——编者注

法案将在两院重新开会时提交给它们讨论和表决；它并没有经过国王的准许加以公布。”^①

把立法议会分割为四个独立的封建的省议会，废除自行决定课税数额的权利，废除普选权，取消新闻出版自由，恢复封闭的行会以代替自由竞争，剥夺所有官员即丹麦唯一有知识的阶级不经国王特许而被选入代议机关的权利，——所有这一切能够叫做“对宪法略事修改”吗？如果能够，那也可以把奴役叫作对自由稍事修改了。不错，丹麦国王^②没有敢把这一新的“根本法”作为法律颁布。他只是效法东方的苏丹们，把丝绳和勒令自缢的命令交给两院。这种建议已包含着这样的威胁：不自愿服从，就强行贯彻。“对宪法略事修改”的情况就是如此。现在谈谈“俄国的影响”。

丹麦国王和丹麦两院之间的冲突是怎样产生的呢？国王建议废除王位法¹⁸³，即现行的丹麦王位继承法。谁促使他采取了这一步骤？是俄国。这一点从我上一篇通讯^③引用的涅谢尔罗德伯爵1853年5月11日的照会中就可看出。废除王位法对谁有好处？除俄国之外，没有别人。王位法允许王族的女系后裔继承王位。随着王位法的废除，男系亲属就可以排除至今一直堵在他们道路上的所有女系亲属继承王位的要求。大家知道，丹麦王国除丹麦本土即诸岛和日德兰半岛之外，还包括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公国。丹麦本土和石勒苏益格的王位继承按同一王位法的规定，而在德国的封地荷尔斯泰因公国，根据萨利法¹⁹⁴，只能由男系亲属继承。随

① 1853年8月4日《泰晤士报》第21498号。——编者注

② 弗雷德里克七世。——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70—272页。——编者注

着王位法的废除，丹麦和石勒苏益格的王位继承也就会和德国的荷尔斯泰因公国一样。这样，作为荷尔斯泰因-哥托尔普王室的代表拥有对荷尔斯泰因的第一继承权的俄国，也就会以首席男系亲属的资格获得对丹麦王位的第一继承权了。1848—1850年，在俄国照会和俄国舰队的支持下，丹麦为维护王位法——不许石勒苏益格同荷尔斯泰因联合而脱离丹麦——而与德国进行了战争¹⁹⁵。沙皇在维护王位法的借口下击败德国革命之后，便用废除他所维护的这一法律的办法来没收民主的丹麦。因此，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德国人就有了经验：他们绝不能把各自的民族要求建立在封建的王位继承法的基础上。他们已经有了更清楚的经验：同属一个伟大种族的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如果彼此争吵而不结成同盟，那只会为自己的世仇斯拉夫人铺平道路。

目前的一件大事是美国政策在欧洲地平线上的出现。对于这一事实，虽然一部分人额手称庆，一部分人切齿痛恨，但它已为大家公认了。

“奥地利会力求瓜分土耳其帝国，以弥补它可能遭到的丧失意大利属地的损失，——这个前景，在它愚蠢地与山姆大叔发生争吵以后更有可能了。美国的分舰队驻扎在亚得里亚海，在意大利发生起义时会使情况大为复杂化，而我们将来完全可能看到这一点，因为盎格鲁撒克逊精神在西方还没有死去。”^①

这是英国贵族的老的喉舌《先驱晨报》的话。

巴黎的《新闻报》说：“科斯塔事件远未结束。我们听说，维也纳当局已向华盛顿当局要求赔偿，当然，这是不会得到的。目前科斯塔仍处于法国领事的保

① 1853年8月4日《先驱晨报》第22228号。——编者注

护之下。”^①

维也纳的《新闻报》嘟哝说：“我们应当避免跟美国佬接触，因为他们半是海上强盗，半是绿林英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绅士。”^②

德国的报纸怨声不绝，因为据说合众国和土耳其签订了秘密条约，根据该条约，后者获得金钱和海军援助，前者则取得鲁米利亚的埃内兹港，这就会使美利坚合众国在地中海得到一个既安全又方便的商业和军事基地。

布鲁塞尔的《比利时解放报》说：“因流亡者科斯塔被逮捕而引起的美奥两国政府之间的土麦那冲突，在适当的时候将被看作 1853 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多瑙河两公国的被占领，西方外交在君士坦丁堡的行动和联合舰队的演习，与这件事相比，只能算是次要的事。土麦那事件¹⁵⁵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而君士坦丁堡的事件只不过是解决一个已接近尾声的老问题而已。”^③

在意大利的报纸《议会报》上刊载了一篇标题为《美国的欧洲政策》的社论。我从这篇文章中逐字逐句地摘译了下面一段话：

《议会报》说：“大家清楚地知道，合众国早就想在地中海和意大利获得一个海军基地，特别是当东方发生纠葛的时候。例如，在 1840 年，当严重的埃及问题引起激烈争辩的时候，当圣让达克遭到攻击的时候，合众国政府曾请求双西西里国王^④把巨大的锡拉库萨港暂时转让给它而未获成功。今天，美国政策干涉欧洲事务的趋势只会比过去更加强烈而坚定不移。毫无疑问，现在的美国民主政府正在大声地对意大利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的牺牲者表示同情，它不惜同奥

① 引自奥·内夫策的报道，见 1853 年 8 月 4 日《新闻报》。——编者注

② 马克思引用的资料来源未能查明。——编者注

③ 1853 年 7 月 23 日《比利时解放报》第 204 号。——编者注

④ 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地利中断外交关系，它已经在土麦那威胁要用大炮来支持自己的政策。如果要对大西洋彼岸的大国的这种意图表示不满，或说它们不合理和荒唐可笑，这是不公正的。不言而喻，美国人并不想征服东方，也不想同俄国进行一场陆上战争。但是，既然英国和法国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海军力量，那么，美国人为什么不这样做呢，特别是当他们将在地中海获得一个基地，一个可以得到掩蔽和‘补给’的地点的时候？对他们来说，这是利害攸关的重大问题，是共和政体与哥萨克政体直接敌对的问题。商业和航运已经大大地发展了世界各民族之间正规的联系和交往，以致目前在旧大陆或新大陆的任何海洋上，或者在任何像奥斯曼帝国命运这样的大问题上，没有一个民族会认为自己是局外人。美国商界和在我们海岸上从事商业的侨民都需要星条旗的保护，而为了使这种保护经常化和常年有效，他们就需要一个港口来停泊他们的已经在世界海军强国舰队中居第三位的舰队。如果英国和法国直接干预有关巴拿马地峡的一切事务，如果这两个强国中的前一个强国走得很远，甚至捏造一个蚊子国王，以便拿领土权来对付合众国的行动；如果它们最终商定：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孔道应该对所有国家开放并由一个中立国家掌管，——那么，显而易见，合众国就要要求苏伊士地峡的自由和中立化得到同样周密的保护，同时它还要密切注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因为这种瓦解会导致埃及和叙利亚全部或部分地转归某个头等强国统治。苏伊士和巴拿马是东方的两大门户；这至今仍然关闭着的门户将来会相互竞争。保障自己在横跨大西洋的问题上拥有优势的最好办法，就是参与解决地中海问题。我们相信，离达达尼尔海峡不远的美国军舰，不会放弃在它们方便的任何时候驶入海峡的要求，而不受列强在1841年公约¹²²所签订的条款的约束，因为它们有一个无可争辩的理由，即美国政府没有参加这一公约的缔结。欧洲为这种大胆行为所震惊，因为它从1783年和约¹⁹⁶时起就已习惯于把合众国看作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¹⁹⁷以后的瑞士各州一样，也就是把合众国看作这样的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它的存在，但决不允许它进入老牌强国的贵族圈子，决不让它在一般政策问题上有发言权。但是大洋彼岸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已经高度地富强起来，有了高度的文明和力量，它不可能继续安于过去给它规定的卑微地位。美利坚联邦对至今仍裁夺着全球命运的五强国最高评议会的压力是一种新的力量，它必定要促使维也纳条约⁹所建立的封闭体系崩溃。只要合众国还没有在决定一般政治问题的会议上取得完全的权利和正式的席位，它就要无比崇高地、特别庄严地实施天赋人权和国际法的更人道的准则。它的旗帜不分党派地保护着各国内战的受害者，而且美国舰队在1848—1849年大火烧

天的时候慷慨接待避难者,从来也没有作任何有伤尊严或耻辱的让步。”^①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8 月
5 日

载于 1853 年 8 月 19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385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① 1853 年 7 月 29 日《议会报》第 178 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

战争问题。——不列颠的人口和
贸易报告书。——议会动态¹⁹⁸

1853年8月12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们从今天的《通报》^①得知：波拿巴为水兵们降低烟价，作为法国舰队在贝济克湾陷入屈辱地位的赔偿。波拿巴用腊肠争得了王位¹⁹⁹。他为什么不能试用烟草来维持他的王位呢？不管怎样，东方的纠纷都将导致路易·波拿巴的威信在法国农民和军队的心目中丧失。他们已经懂得，在国内丧失的自由是不能用在国外获得的荣誉来补偿的。“常胜帝国”堕落得甚至不如“群贤内阁”¹⁷⁸了。

我们从刚刚收到的君士坦丁堡的报纸获悉：苏丹^②在8月1日发表了告臣民书；俄国驻阿德里安堡领事从圣彼得堡接到了撤离土耳其的命令；其他俄国领事正等待类似的命令；君士坦丁堡的报纸在多瑙河两公国被禁止。在士麦那出版的《公道报》8月1日登载了下面一则关于波斯的消息：

① 1853年8月11日《总汇通报》第223号。——编者注

②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波斯沙赫^①读了根据他的要求呈交给他的、土耳其政府和俄国当局之间有关当前争端的来往信件之后正式声明,他认为土耳其政府完全有理,一旦发生战争,他将公正地站在土耳其政府一边。这一消息给俄国驻德黑兰大使以强烈的印象,据说他在准备申请护照。”

欧洲和整个报界都纷纷猜测向俄国提出并且据从彼得堡发来的密电说已被沙皇^②接受的建议的内容。帕麦斯顿的《晨邮报》断言:

“7月25日迈恩多夫先生转呈给他的皇上的也许不是正式的建议(维也纳会议通过的),而是关于24日会议所通过的决定的报告……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充满信心地肯定地说,问题会根据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完整的精神解决,这样说是不会错到哪里去的。解决的方式将是这样的:路西德帕沙给涅谢尔罗德伯爵一份照会,照会中附有给予苏丹的信希腊正教的臣民以特权的敕令,这些特权甚至比俄国为他们所要求的更为广泛。他将向沙皇讲许多恭维话,并向他保证,苏丹将以最好的感情对待他的臣民,并且列举苏丹已经赐予他们的种种权利。这份照会将由一位土耳其特使递交,从而将使问题结束……到9月10日,最后的一个俄国兵士将渡过普鲁特河!”^③

另一方面,来自维也纳的私人信件指出,俄国炮舰出现在普鲁特河和多瑙河汇合处上游,这证实了我在上一篇通讯中所发表的意见:在送往圣彼得堡的建议中根本没有提到俄国军队撤出两公国的问题;这些建议来自奥地利当局,因为在沙皇拒绝法国和英国的建议后,不列颠驻维也纳大使^④这位“酷爱和谐的人”曾吁请奥地利当局进行调停;奥地利的这些建议给俄国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它可以借此无限期地拖延谈判。据半官方的法兰克福《总邮报》的消

① 纳赛尔丁。——编者注

②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③ 1853年8月11日《晨邮报》第24848号。——编者注

④ 约·威斯特摩兰。——编者注

息,俄国只允许奥地利就其本身的利害关系向土耳其进行开导。

不久前公布的人口报告书证明,大不列颠的人口正在缓慢地然而持续不断地减少。1853年第二季度

人口死亡数	107 861 人
同期出生数	158 718 人
各调查区出生净增数	50 857 人
整个联合王国出生数超过死亡数	79 820 人
同期迁往国外的人数	115 959 人

迁往国外人数超过出生增长数

36 139 人 ^①

最近的报告书表明迁往国外人数只超过出生增长数 3 万人。

在人口外流而使人口减少的同时,生产力和资本却空前增长。马尔萨斯牧师曾否认人口外流会发生这样的影响,并且自认为已通过精细的核算证明:即使调动世界上所有的船队用于如此规模的人口外流,也决不足以影响人口的过度增长。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尔萨斯,那么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在我们面前了。这个秘密不过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一定的物质生产状况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变成永恒的、普遍的、固定的规律,即他们所说的自然规律。由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革命和进化造成的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被政治经济学家们视为纯粹的空想。他们看到某一特定时代的经济界限,但他们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失。

商业部公布的关于 1853 年上半年到 7 月 5 日止的贸易和航运的资料,与 1852 年同期的出口、进口和航运的资料相比,普遍有很大

① 引自 1853 年 8 月 4 日《泰晤士报》第 21498 号。——编者注

的增长。犍牛、公牛、母牛、牛犊、绵羊和羊羔的进口数额大大增加。

1852年上半年(至1852年7月5日止)谷物

进口总额	2 604 201 夸特
而1853年同期的进口总额	3 984 374 夸特
1852年上半年细面粉和粗面粉进口总额	1 931 363 夸特
而1853年同期的进口总额	2 577 340 夸特
1852年咖啡进口总额	19 397 185 磅
1853年咖啡进口总额	21 908 954 磅
1852年酒类进口总额	2 850 862 加仑
1853年酒类进口总额	4 581 300 加仑
1852年蛋类进口总额	64 418 591 个
1853年蛋类进口总额	67 631 380 个
1852年马铃薯进口总额	189 410 英担
1853年马铃薯进口总额	713 941 英担
1852年亚麻进口总额	410 876 英担
1853年亚麻进口总额	627 173 英担
1852年生丝进口总额	2 354 690 磅
1853年生丝进口总额	2 909 733 磅
1852年棉花进口总额	4 935 317 英担
1853年棉花进口总额	5 134 680 英担
1852年毛类(绵羊毛和羊羔毛)进口总额	26 916 002 磅
1853年毛类(绵羊毛和羊羔毛)进口总额	40 189 398 磅
1852年皮革(熟皮)进口总额	1 075 207 磅
1853年皮革(熟皮)进口总额	3 604 769 磅 ^①

可可、肥料、原糖、茶叶等的进口量减少了。至于出口,情况如下:

① 《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截至1853年7月5日为止的六个月》,见1853年8月6日《经济学家》第519期。——编者注

1852 年上半年棉织品出口总值·····	11 386 491 英镑
1853 年同期棉织品出口总值·····	13 155 679 ^①

至于棉纱也包括麻纱和蚕丝纱,出口的数量是减少了,但公布的出口的价值却大大增加:

1852 年麻织品·····	2 006 951 英镑
1853 年麻织品·····	2 251 260
1852 年丝织品·····	467 838
1853 年丝织品·····	806 419
1852 年毛织品·····	3 894 506
1853 年毛织品·····	4 941 357
1852 年陶器·····	590 663
1853 年陶器·····	627 218
1852 年玻璃制品·····	187 470
1853 年玻璃制品·····	236 797
1852 年男子服饰用品和女用头饰·····	884 324
1853 年男子服饰用品和女用头饰·····	1 806 007
1852 年五金和刀具·····	1 246 639
1853 年五金和刀具·····	1 663 302
1852 年机器·····	476 078
1853 年机器·····	760 288
1852 年铁条、螺栓和杆棒·····	1 455 952
1853 年铁条、螺栓和杆棒·····	2 730 479
1852 年熟铁·····	696 089
1853 年熟铁·····	1 187 059
1852 年金属线·····	42 979
1853 年金属线·····	106 610 ^①

① 《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截至 1853 年 7 月 5 日为止的六个月》,见 1853 年 8 月 6 日《经济学家》第 519 期。——编者注

在工业品的进口方面,鞋、靴和手套增加最多,玻璃制品、钟表、毛织品和印度丝织品减少最多。在出口方面,麻织品、丝织品、毛织品和金属制品增加最多。至于消费品的进口,如果不算谷物和牲畜,几乎所有增加了进口的项目都证明英国上等阶级和中等阶级消费增长的比例大大超过劳动阶级消费增长的比例。例如,酒类的消费增加了一倍,而可可、原糖和茶叶的消费则显著地减少。

关于联合王国小麦收成的260份报告书中,只有25份说收成良好,30份说是中等年成,有200多份宣布收成很差或很坏。燕麦、大麦和大豆的收成看来不坏,因为水分充足,有利于这些作物;但马铃薯是全国歉收。约·斯特奇先生和查·斯特奇先生的公司在他们最近关于小麦收成的通报里指出:

“大麦总收成大概是从1816年以来所有年份中最低的,而且,除非1854年的收获很早,我们就得输入甚至比1847年还要多的各种谷物和面粉,——可能不少于1500万夸特。但是,只要法国不在产粮国市场上和我们竞争,我们现在的价格足以促使进口达到如此规模。”^①

至于指望1854年的收获很早,看来是没有多大希望的,因为经验已经表明:歉收年份正如丰年一样,通常都是连续的,而从1848年起的接连丰年已经持续得非常久了。英国将从外国购买谷物以保证充足的供应,这看来是完全可以肯定了;但是自由贸易论者期待英国工业品的输出与谷物的输入相平,却是无法指望的。此外,在输入多半会超过输出的同时,国内工业品的消费也将缩减。英格兰银行⁸⁴的黄金储备现在已经在逐周减少,已降低到17 739 107英镑了。

上院在上星期五的会议上否决了下院通过的工人结社法案。这

^① 1853年8月6日《经济学家》第519期。——编者注

一法案不过是 1825 年旧结社法¹¹⁵的新解释,其目的是通过删除结社法中一些累赘的和意义含糊的词句,使工人与他们的雇主在享有合法结社权利方面处于比较平等的地位。每当工人这帮暴民要求权利而不是要求同情时,多愁善感的上院议员们就要大发雷霆,因为他们喜欢把工人当作自己的忠顺奴仆来看待。所谓的激进派报纸当然就拚命抓住这个大好机会痛斥上院议员们是无产阶级的“世仇”。我决不否认这一点。不过,让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些激进分子,看一看工人的这些“天然的朋友”吧。我在前面的一篇通讯中曾向你们报道,曼彻斯特的纺纱厂厂主和制造厂厂主组织了一个协会来抵制他们的“工人”的要求^①。这个协会叫作“制止曼彻斯特地区工人骚动救援工业协会”。它声称建立这个协会的目的如下:

“1. 根据其他棉纺织业区的工资状况,确定纺纱业和织布业各个不同部门的工资;

2. 在支付这些工资时,如遇到会员们所雇用的工人对他们进行反抗,全体会员相互保护;

3. 为了有利于工人,保证全城及郊区实行划一的工资。”^②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决定建立一个完整的组织,其办法是成立各个地方的纺纱厂厂主和制造厂厂主协会以及协会的中央委员会。

“他们将抵制工厂工人联合体的一切要求,因为对它们的任何让步都会有损雇主、工人和整个行业的利益。”^②

他们将不允许他们的工人建立类似的组织来与他们为自己建立

① 见本卷第 256 页。——编者注

② 1853 年 7 月 16 日《人民报》第 63 期。——编者注

的这种组织分庭抗礼。他们想用合作的垄断来加强资本的垄断。他们将作为一个联合体迫使工人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工人只能以个人的力量与他们抗衡。他们将成群结队地进攻，而只让对手单枪匹马地反抗。这就是曼彻斯特的激进派和模范的自由贸易论者所理解的“公平竞争”。

上院 8 月 9 日会议本来是要决定下院经过十个月讨论后通过的三个爱尔兰法案的命运。地主和租佃者法案废除了有关抵押借款的法律，这在目前就给合法出卖不适用在典地产法令²⁰⁰的小地产造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租佃者权利法案¹³⁶修改和合并了 60 多项禁止签订为期 21 年的租佃契约的议会法令，规定了租佃者根据相应的合同所作的一切改良的补偿问题，并且不许采用转租制。最后，租佃者改良设施补偿法案规定对租佃者在没有与地主签订任何合同的情况下所作的改良应予补偿，还有一个条款规定这一法规具有追溯力。当然，上院是不能反对议会在地主和租佃者之间进行干预的，因为从爱德华四世时起到现在，上院一直都把关于地主和租佃者的种种法令大量载入法令全书，而且上院本身的存在也是以有关地产的法律为基础的，地产继承法就是一例。这一次，一向在自己的诉讼案件中充当法官的各位勋爵阁下暴跳如雷，这在这个养老院中是很难遇到的。

克兰里卡德伯爵叫喊道：“据我所知，像租佃者补偿法案这样的法案，这样完全违反和藐视一切既有合同的东西，还从来没有人向议会提出过；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政府敢于提出这样一条措施，即让通过的法案中规定它具有追溯力。”^①

上院议员们竟然以撤回他们的封建效忠誓²⁰¹来威胁王室，并且

① 1853 年 8 月 10 日《泰晤士报》第 21503 号。——编者注

指出有可能在爱尔兰爆发地主的叛乱。

这位尊贵的大人还说：“问题已经差不多牵涉到爱尔兰土地所有者对本国政府保持忠诚和信任的整个问题。如果他们看到如此处理爱尔兰地产，那么，我倒想知道，什么东西能保证他们忠于王室和服从王室的最高权力？”^①

不要嚷嚷，阁下，请不要嚷嚷！什么东西能保证他们服从王室的最高权力？一名地方法官，两名警察。在大不列颠要爆发地主叛乱！有谁听说过比这更奇怪的历史错位吗？不过，可怜的上院议员们早已只靠历史错位过日子了。他们为了抵抗下院和公众舆论，当然要自我振作一番。

圣伦纳兹老勋爵说：“希望诸位勋爵阁下不要为了避免与另一院发生所谓冲突，或是为了取得名声，或是由于外来压力，而通过这样一些极不完善的措施。”罗登伯爵叫道：“我不属于任何党派，但我极其关心爱尔兰的幸福。”^①

这就是说，勋爵阁下料想爱尔兰极其关心罗登伯爵的幸福。“这不是党派的问题，而是上院全体议员的问题”——这是议院的一致呼声，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两党之间，在辉格党⁶¹议员和托利党³议员之间，在联合内阁的议员和反对派议员之间，一开始就暗中商妥不让上述法案通过，而整个激烈的争论不过是一幕为新闻记者表演的闹剧而已。

这一点，如果我们回想起以下的事实，就会十分清楚了——成为如此激烈争论的对象的这些法案当初不是由联合内阁，而是由德比内阁中的爱尔兰首席检察官纳皮尔先生提出的；同时，在爱尔兰最近一次选举中，托利党曾引证他们所提出的这些法案。下院对原由托

^① 1853年8月10日《泰晤士报》第21503号。——编者注

利党政府提出的措施所作的唯一实质性的修改,就是禁止强占青苗作为抵押。马姆兹伯里伯爵大叫:“这不是那些法案”,并问纽卡斯尔公爵是否不相信他。公爵回答说:“当然不。”“那您相信谁的话呢?”公爵回答说:“相信纳皮尔先生的话。”伯爵说:“好,这里有纳皮尔先生的一封信,它说这不是那些法案。”公爵说:“这里有纳皮尔先生的另一封信,它说这就是那些法案。”

如果托利党人仍然执政,那么现在联合内阁的议员们就会投票反对爱尔兰法案。现在是联合内阁执政,于是托利党人就担负起反对他们自己的提案的任务。联合内阁从托利党人那里继承了这些法案,并使爱尔兰派的代表参加了自己的内阁,当然不能在下院投票反对这些法案。但是,他们相信上院不会让它们通过。纽卡斯尔公爵进行了微弱的反抗,但阿伯丁勋爵声明,他同意法案在形式上经二读通过,而事实上由议会本届会议予以否决。结果正是这样。前内阁的首脑德比勋爵,本届内阁的名义上的首脑、同时又是爱尔兰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之一的兰斯唐勋爵,都很聪明地推说身体不适而没有出席。

在同一天,下院三读通过了**出租马车税法案**,恢复了17世纪的马车官价,并通过了弗·斯卡利先生提出的出租马车主组织罢工应予法办的条款。我们现在不必细述国家干涉私人事务的问题。我们只想指出,这是在自由贸易派的议院中通过的。不过,他们说,在马车出租行业中存在着垄断,而不是自由竞争。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起先他们对某一行业课以所谓的执照税,并为它制定特别的治安条例,然后又断言,正是由于加给它的这种负担,这一行业失去其自由贸易的性质,变成了国家垄断。

流放法案也在全院委员会通过。除为数不多的罪犯仍将流放西

澳大利亚之外,该法案取消了流放的刑罚。罪犯在先服一定时期的监禁之后,可在大不列颠获得假释许可证(但随时可以撤销);然后他们将被雇从事公共工程并得到政府规定的工资。后面这一条款的慈善目的,是通过把强迫劳动引来同自由劳动竞争的办法,在劳动市场上人为地造成剩余;同时,这些慈善家们却禁止习艺所¹⁵⁰的贫民从事任何生产劳动,因为他们害怕造成同私人资本的竞争。

迪斯累里先生指导下的、最熟悉内阁的一切秘密的伦敦周报《新闻报》,在上星期六——因而是在彼得堡的电报到达之前——刊登了下面一则奇妙的报道。

“我们得知,大臣们在他们保守机密的私人圈子中声称,不仅现在没有战争危险,而且这种危险(如果说它确实存在过的话)早就消除了。看来,正式送往圣彼得堡的建议是预先征得俄皇同意的;不列颠政府在公开场合唱着对国家贸易有害的调子,而在私下里却认为散布战争恐慌是对人们的愚弄,嘲笑那种以为曾有哪个强国真的要进行战争的想法,并且声言这种误会‘已在最近三周内得到澄清’。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整个这种做法的秘密何在?……现在已在圣彼得堡并在发往圣彼得堡之前就得到俄皇同意的建议,其主旨就是要土耳其完全接受俄国的要求,因为现在两国之间的战争就是由于拒绝这些要求而引起的。土耳其政府拒绝这些要求是根据英法的劝告和直接怂恿。现在,按照上述建议,它又要根据英法的劝告和直接怂恿同意这些要求。这里在形式上稍有更改,而在本质上一仍旧贯。事实上已经对欧洲土耳其的大部分居民确立了保护权的俄皇,大概会声明:他这样做并不是想对苏丹的无上权力提出异议。多么宽宏大量呵!”^①

王权在大不列颠被认为是一种徒有空名的权力,一种形同虚设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所有党派才都和它和平相处。如果你要问一位激进派,为什么他的党不去反对王室的特权,他会回答你:这种特权

^① 1853年8月6日《新闻报》第14期。——编者注

不过是装装门面,我们根本不把它当回事。他会告诉你,维多利亚女王只有一次大胆表现了自己的意志,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因御前女官而引起的冲突。当时,她坚持要把辉格党的御前女官留在身边做近侍,但后来不得不向罗伯特·皮尔爵士让步,辞退了她。不过,与东方问题有关的种种情况,——内阁政策的不可理解,外国报界的责难,俄国公爵和公爵夫人在英国似乎处于和俄国专制君主开战前夕的接踵来访——证实了下述传闻:在整个东方危机期间,英国宫廷都同俄国狼狈为奸,竭力使好人老阿伯丁得以留任首相,使摆出来给人看的与法国的同盟陷于瘫痪,并使为反对俄国侵略而采取的官样措施名存实亡。人们暗示说,英国舰队完全是为了科堡王室的利益而支持了葡萄牙的反革命²⁰²。盛传帕麦斯顿勋爵也是由于宫廷阴谋而被解除了外交部的职务。又说,维多利亚女王和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友谊是尽人皆知的。人们还记起,女王的丈夫是科堡王室的成员^①,她的叔父也是科堡王室的成员^②,后者作为比利时国王以及路易-菲力浦的女婿,非常希望波拿巴垮台,并且在他的儿子^③和一位奥地利公主^④结婚后已被正式接纳入神圣同盟。最后,人们还把俄国客人受到的接待同英国旅行者最近在俄国的被监禁和恶意刁难作了对比。

几个星期之前,巴黎的《世纪报》指责了英国宫廷。一家德国报纸也论述了科堡-奥尔良派的阴谋,说他们为了家族的利益,通过莱

① 阿尔伯特亲王。——编者注

② 莱奥波德一世。——编者注

③ 莱奥波德-路易-菲力浦-玛丽-维克多。——编者注

④ 玛丽-罕丽达。——编者注

奥波德国王和阿尔伯特亲王，迫使英国内阁实行危害西方各国、鼓励俄国阴谋的方针。布鲁塞尔的《民族报》刊登了关于在伦敦举行的内阁会议的长篇报道，说女王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声明：觊觎圣地的波拿巴是造成当前纠纷的唯一罪人；俄国皇帝想加在土耳其身上的屈辱，要少于他的法国敌手；她决不为了某个波拿巴的利益而发出同意对俄国进行任何战争的王令。

关于这些传闻，《晨报》说得非常委婉。这些传闻在公众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在一些周刊上引起了审慎的评论。

《先驱》写道：“我们不想作过于广泛的推测，只想看一看事实。奥丽珈公主携同她的丈夫①和姐姐②——俄皇的最善于外交的女儿洛伊希滕贝格公爵夫人来到英国。她受到布伦诺夫男爵的接待，并马上受到宫廷的欢迎，她被英国上等社会的代表人物所包围，其中也有阿伯丁勋爵。”③

甚至在第一流伦敦周报中首屈一指的《观察家》，也用简洁的标题《又是俄国人》发表了关于这些客人光临的报道。在这家报纸的一篇社论中有如下的话：

“目前根本没有什么理由阻碍和平协会在阿尔伯特亲王殿下下的庇护下以最受称道的姿态重新出现在世界上。”④

在《观察家》这样身分的报纸上是不允许提出更明显的暗示的。我引证的这篇文章在结束时把英吉利君主国同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作了如下的对比：

① 卡尔-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编者注

②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编者注

③ 1853年8月6日《先驱》第176期。——编者注

④ 1853年8月6日《观察家》第2375号。——编者注

“如果美国人力图在欧洲占有我们一度占有的地位,那么,这与我们无关。他们坚持实行国际法并作为扶弱抑强者而赢得尊敬,那就让他们目前从中博得荣誉并最终从中获得好处吧!只要统一公债能按票面价值计算,只要能保护本国海岸免遭外国军队的直接攻击,英国就心满意足了。”^①

在表决本年度(截至1854年3月31日止)拨款5820英镑用来支付不列颠驻巴黎大使官邸的建筑工程、修缮、家具等等费用的问题时,怀斯先生问道:最近30年来按表决通过的规定每年拨出的1100英镑用于不列颠驻巴黎大使官邸的维修费到哪里去了?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不得不承认,公款滥用掉了;他还承认,根据政府派往巴黎的建筑师阿尔巴诺的报告,不列颠大使的官邸破败不堪。房子周围的走廊坍塌,围墙残破,房子好几年没有粉刷,楼梯不稳,污水井发出恶臭,房间里满是寄生虫,甚至爬到桌子上来,家具和窗帘上蛆虫密布,地毯被猫狗弄得污秽不堪。

帕麦斯顿勋爵的煤烟治理法案通过了二读。如果这一提案能实行,首都将面目一新,除上院和下院外,伦敦将不再有一所肮脏的宅院^②了。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8月
9和12日

载于1853年8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54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① 《主和派的胜利》,见1853年8月6日《观察家》第2375号。——编者注

② 在英文中,上院和下院之“院”为大写的“House”,而作为普通名词“house”的本义是“房屋”、“宅院”。——编者注

卡·马克思

乌尔卡尔特。——贝姆。——
土耳其问题在上院²⁰³

1853年8月16日星期二于伦敦

戴维·乌尔卡尔特就东方问题发表了四篇通讯^①，目的是澄清下述四种误解：第一，认为东正教教会和俄国教会是一回事；第二，认为英俄之间存在着外交冲突；第三，认为英俄可能发生战争；第四，认为英法之间存在着同盟。这几篇通讯，我打算将来比较详细地谈谈^②，现在只向你们报道一下贝姆给路西德帕沙的信，这封信最先是由乌尔卡尔特先生发表的。

“殿下！因为我尚未得到去君士坦丁堡的命令，我认为有责任把一些意见报告给殿下，我觉得这些意见是非常要紧的。我首先要说的是，我所看到的土耳其军队——骑兵、步兵和野战炮兵是非常优良的。他们在军容、训练和士气

① 指《何谓“保护”希腊正教会？》、《外交中的时机。——欧洲的承认》、《俄国和大不列颠的力量对比》和《英法战争》，见1853年8月11、12、15和16日《晨报》。——编者注

② 马克思计划撰写的这篇文章未能完成。——编者注

方面都再好没有了。马匹胜过欧洲任何一支骑兵的马匹。而最可贵的是，全体官兵都要求同俄国人作战。带着这样的军队，我敢去进攻数量一倍于我的俄国军队，并且一定能取得胜利。奥斯曼帝国既然能够出动超过俄国所能抵挡的数量的部队，那么很明显，苏丹①会满意地看到，被莫斯科的沙皇们背信弃义地从他的祖上手里夺走的所有省份将收复归他管辖…… 贝姆”②

奥地利外交大臣③就美国巡航舰圣路易号在科斯塔事件¹⁵⁵中的行为向欧洲各国宫廷发出了照会。在照会中，他谴责美国的整个政策。奥地利坚持自己有权在一个中立强国绑架外国人，而合众国却无权动用武力去保护他们。

马姆兹伯里伯爵星期五在上院并未查询维也纳会议⁹的秘密或这个会议向沙皇④提出的建议的内容，他也没有查询目前谈判的情况。他的兴趣宁可说是回顾性和古董鉴赏性的。他所要求的只是“简单翻译一下”俄皇在5月6日给本国外交使节的两个通告（公布在《圣彼得堡报》上）；他还想了解一下“女王陛下政府对这两个文件的内容应已作出的答复”。马姆兹伯里伯爵不是古罗马人，当着元老院元老的面公开查问外国使节的罗马风俗是最使他反感的。

同时，他自己也指出，俄国的两个通告“已由俄皇用本国文字向全欧公开发表，而且在英法文的报刊上也已披露”⑤。

那么，把这两个文件从报刊作家的语言译成外交部官员的语言究竟会有什么好处呢？

①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② 戴·乌尔卡尔特《俄国和大不列颠的力量对比》。——编者注

③ 卡·布奥尔-绍恩施坦。——编者注

④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⑤ 詹·马姆兹伯里 1853年8月12日在上院的演说。——编者注

“法国政府对这两个通告立即巧妙地作了答复…… 据报道,继法国政府之后英国随即也作了答复。”^①

马姆兹伯里伯爵急于要知道,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的平淡文字译成克拉伦登伯爵的优雅文字是个什么样子。

他认为自己不得不提醒“坐在对面的高贵朋友”,约翰牛经过了30年的和平、经商、工业活动以后,对战争已经“有点神经过敏”;这种神经过敏从去年3月“由于政府长期一直对自己的行动和谈判情况严守秘密而更加厉害了”。因此,马姆兹伯里勋爵为了和平的利益而提出质询,但政府同样是为了和平的利益而保持沉默。

俄国对欧洲土耳其实行侵略的最初迹象使伯爵阁下比谁都更加生气。他从来没有猜疑过俄国对土耳其怀有什么阴谋。他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首先是“俄皇的荣誉”问题。但是,扩充帝国的权势什么时候曾经损害过一位皇帝的荣誉呢?再有就是“俄皇的保守政策,他在1848年革命时曾坚决奉行这种政策”。的确,这位专制君主同那些邪恶的革命是水火不相容的。特别是在1852年,当伯爵阁下掌管外交部的时候。

“没有一位君主这样一再保证遵守约束着欧洲的各项条约和维护这么多年来为欧洲造福的各项领土协定,没有一位国君对此表示过更多的诚意。”^①

毫无疑问,当布伦诺夫男爵怂恿马姆兹伯里伯爵签订1852年5月8日丹麦王位继承条约⁶⁹的时候,他是用一再保证他的神圣君王特别喜爱现有各种条约的说法把伯爵诱进了圈套,而当他劝说刚刚热烈祝贺了波拿巴篡夺王位成功的伯爵同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建

^① 詹·马姆兹伯里1853年8月12日在上院的演说。——编者注

立一个反对同一个波拿巴的秘密同盟的时候，他就最好不过地表示了自己维护现行各项领土协定的诚意。

为了解释俄皇的突如其来的转变，马姆兹伯里伯爵于是对“俄皇头脑中产生的新的印象”进行了心理分析。他敢肯定，“法国政府在巴勒斯坦圣地问题⁸⁸上的行为伤害了”俄皇的“感情”。诚然，波拿巴为了安慰俄皇被伤害的感情，曾经派了一个“性格非常温和非常随和的人”德拉库尔先生到君士坦丁堡去。但是伯爵说，“已经发生的事情，看来并没有从俄皇的头脑中消除”，所以俄皇对法国犹有余怒。应该承认，德拉库尔先生在缅施科夫公爵到达君士坦丁堡以前就非常彻底地和令人满意地把问题解决了。“但是，尽管这样，俄皇头脑中的印象并没有改变。”这种印象和由此产生的错误想法是这样强烈，“以致俄皇仍然怀疑土耳其政府想向俄国提出它根本无权提出的条件”。马姆兹伯里伯爵承认，“无论是什么人”，甚至连英国勋爵包括在内，“都没有本事看出人的头脑中的东西”；但是“他不能不认为，自己能够解释这些在俄皇头脑中造成的奇怪印象”。他说，俄国人世世代代习以为常地盼望的时刻，即“注定要他们占领君士坦丁堡并恢复拜占庭帝国的时代”，现在已经到来了。他还认为，“当今的俄皇”也怀有“这种感情”。起初，精明的伯爵想解释说，俄皇老是猜疑土耳其政府企图侵犯他的权利，现在伯爵则告诉我们，俄皇猜疑土耳其，是因为他认为吞并土耳其的适当时刻已经到来。到了这一步，伯爵阁下就不得不改变他的推论的方向了。现在他不再说明那些在俄皇头脑中形成的、改变了原有情况的新的印象，而是说明某些一度抑制了沙皇野心勃勃的企图和旧的传统感情，使他没有“受到诱惑”的情况。这些情况可以归结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即马姆兹伯里伯爵一个时期“任职”，而另一个时期“不任职”。

当他“任职”时，他不仅第一个承认了布斯特拉巴²⁰⁴，而且第一个为他的伪证、屠杀和篡权辩护，但在此以后，

“当时的报纸却开始不断攻击它们所说的对法皇采取的屈膝献媚的政策”^①。

联合内阁上台了，詹·格雷厄姆爵士和查理·伍德爵士也跟着出头露面，

“这些人在公开的会议上抨击法皇的政策和法皇个人，同时也抨击法国人选了这个亲王做君主”^①。

随后就发生了黑山事件²⁵，联合内阁

“允许奥地利坚决要求苏丹不对起义的黑山人再采取任何高压措施，甚至没有保障土耳其军队平平安安地撤退，结果使土耳其损失1 500—2 000人”^①。

再后，就是罗斯上校从君士坦丁堡被召回，不列颠政府拒绝和法国同时把自己的舰队派往贝济克湾或土麦那。所有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就在俄皇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印象：英国人和英国政府敌视法皇，英法两国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同盟。

马姆兹伯里伯爵以言情小说作家描写自己女主人公起伏变幻的情感时特有的细腻笔法描绘了影响俄皇敏感的头脑并诱使他离开正道的一系列情况，然后就夸耀自己如何通过同法国人民的压迫者建立亲密的联盟而破除了数世纪来使法国人民同英国人民疏远的成见和恶感。他庆贺现政府继承了他同西方沙皇建立的这个亲密联盟，庆贺它收获了托利党人播种所得的果实。他却忘记说，正是在这个

① 乔·克拉伦登1853年8月12日在上院的演说。——编者注

亲密联盟的庇护下,在法皇支持联合内阁的情况下,苏丹被献给了俄国作牺牲品,因为这个法国的苏路克急于希望能够踩着这位穆斯林的肩膀爬进某种维也纳会议,从而提高自己的身价。伯爵一方面祝贺内阁同波拿巴结成亲密的联盟,同时又马上斥责正是由这个屈就的婚姻^①所产生的政策。

我们打算继续把伯爵的所有宏论再介绍下去了,总之,他大谈土耳其领土不受侵犯的重要性,否认土耳其的衰落,不承认俄国的宗教保护权;他还责难政府没有把侵犯多瑙河两公国事件看作开战的理由,没有用出动舰队的行动来回答俄国人渡过普鲁特河的事件,这一切,我们都不再重复了。他所举出的新东西,只是下面这一封缅施科夫公爵在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夕写给路西德帕沙的“极端蛮横无理的”信。

“本大使即将离开君士坦丁堡时得知,土耳其政府宣布打算保障东正教教会的教士行使属于他的宗教权利,这实际上是表示无意保障这个教会所享有的其他特权。不管采取这一决定的动机如何,本大使认为不得不通知外交大臣殿下,任何一项宣言或其他行为,即使保障了东正教教会的单纯宗教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也会被用来剥夺自古以来就属于这个教会及其教士并且现在仍由他们享有的其他权利、特权和豁免权;因此将被帝国当局视为对俄国及其宗教的敌对行为。

顺致敬意等等

缅施科夫

5月9日(21日)于比尤克德列”^②

① “联盟”原文为“alliance”,“屈就的婚姻”原文为“mésalliance”。马克思在这里使用这两个形义相近的词,意在讥讽马姆兹伯里所夸耀的这个联盟,不过是一桩降低身分、屈尊俯就的联姻。——编者注

② 引自詹·马姆兹伯里1853年8月12日在上院的演说。——编者注

马姆兹伯里伯爵“很难相信俄皇赞同缅施科夫公爵的行为或做法”。涅谢尔罗德在缅施科夫离开之后发出的照会,以及涅谢尔罗德照会发出后俄国军队的出动,证实了这种怀疑。

“沉默寡言”的克拉伦登,仍然不得不“一再作同样的答复”,也就是说,不作任何答复,“虽然这使他感到痛苦”。他认为“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就是不说”早先没有说过的“任何一句话”,“不提供任何消息和不提出任何特别报告”。因此,这位伯爵阁下没有提供一点点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信息。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肯定,在奥俄两国当局进行侵犯的整个时期,他同它们保持着“经常的接触”。例如,当奥地利政府“为防止边界地区的本国臣民骚动”——清白无辜的克拉伦登告诉我们,至少“举出的理由”是这样——而把莱宁根公爵派到君士坦丁堡,并且陈兵边界的时候,他同奥地利政府就保持着经常接触。苏丹向奥地利作了让步并撤回自己的军队以后,精力饱满的克拉伦登“重新同奥地利建立了接触,以便保证条约的充分履行”。

惯于轻信的勋爵接着说道:“我相信条约是履行了的,因为奥地利政府向我们担保说,情况就是这样。”^①

好极了,阁下!至于同法国的友好协约²⁷,那是从1815年就存在的!在英法政府“共同派遣舰队”方面,也“没有丝毫分歧”。波拿巴已命令自己的舰队开往萨拉米斯岛,

“他认为危险很大”,因此,“虽然他(克拉伦登)告诉他危险不那么大,法国舰队暂时还没有必要离开法国港口,他仍然命令法国舰队开航;但这个情况并没有引起丝毫分歧,因为一个舰队在萨拉米斯,一个在马耳他岛,比一个在马耳他岛,一个在土伦方便和有利得多”^①。

^① 乔·克拉伦登1853年8月12日在上院的演说。——编者注

克拉伦登勋爵接着说，在缅施科夫对土耳其政府蛮横无礼地施加压力的整个期间，

“令人满意的是，舰队没有得到出海命令，这是为了让谁都不能说土耳其政府的行动是受我们指使的”^①。

在经过种种事件之后，大致上完全可以肯定：如果舰队当时得到出海命令，苏丹一定会被迫后撤。至于缅施科夫的“告别信”，克拉伦登认为它是适当的，“不过，在同各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时，使用这样的语言幸亏是少有的，并且他希望今后很长时期内也会是少有的”。关于入侵两公国的事件，英国和法国政府

“曾劝苏丹暂时放弃自己的毫无疑义的权利，不把两公国被占领看作是开战的理由”^①。

关于现在仍在进行的谈判，他要说的只有一点：

“今晨从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那里得到正式报告说，圣彼得堡将接受各国大使在维也纳协商好的建议，如果这些建议稍加修改的话。”^①

至于协议的条件，克拉伦登宁死也不愿透露一点。

博蒙特勋爵、哈德威克伯爵、克兰里卡德侯爵和埃伦伯勒伯爵回答了勋爵阁下。没有一个人表示庆贺女王陛下政府在这次谈判中所采取的方针。各方面都表示了极大的忧虑：内阁的政策是不是错误的呢？内阁是不是做了代表俄国的调停人而不是土耳其的保护人呢？如果法国和英国早先就表现了强硬态度，内阁的处境是不是会比现在好呢？老顽固阿伯丁回答了他们：“如果事情已经发生之后再

^① 乔·克拉伦登 1853 年 8 月 12 日在上院的演说。——编者注

来推测当时会怎样, 如果已经是另一种情况再来说当时可能怎样, 那是很容易的。”但最令人震惊和重要的还是他下面的话:

“各位勋爵阁下应当认识到, 他们是没有受任何条约的约束的。我否认英国受什么条约的条款的约束而必须参与任何支持土耳其帝国的战争行动。”^①

当英法第一次表示要干预当前的土耳其事态时, 俄皇曾断然否认 1841 年条约¹²²对他同土耳其政府的关系的约束力和由这个条约产生的西方各国当局进行干涉的权利。但同时他却依据同一个 1841 年条约坚持其他强国的军舰不得驶入达达尼尔海峡。现在, 阿伯丁勋爵竟然在公开的庄严的议会会议上认可了对这个条约的这种蛮横无理的解释, 而俄国专制君主是只有在把大不列颠赶出攸克辛海时才会尊重这个条约的。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8 月
16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9 月 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62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① 乔·阿伯丁 1853 年 8 月 12 日在上院的演说。——编者注

卡·马克思

土耳其问题在下院²⁰⁵

1853年8月19日星期五于伦敦

约翰·罗素勋爵一再拖延他对土耳其问题的解释,直到最后愉快地拖到了议会会议的最后一周。上星期一,他突然出来宣布,他将在星期二作出拖延已久的报告。原来,勋爵阁下确知迪斯累里先生在星期一早晨已离开伦敦。查理·伍德爵士也是用同样的方法,他在获悉约·帕金顿爵士及其支持者不出席议院会议的消息后,突然提出了他的经上院修正的印度法案,利用出席的议员人数不多,达到了一致同意恢复盐业垄断的目的。这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动作,就是辉格党的议会策略的枢纽。

下院对东方问题的讨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场面。约·罗素勋爵用一种十分适合他所要扮演的角色的声调开始了演出。这个被看作曾经盛极一时的辉格党家族的最后代表人物的小小庸人,讲话语调呆滞低沉,枯燥乏味,无精打采,不像一个大臣说话,倒像一名刑警队的报告员,用一套陈辞滥调和官样文章,冲淡了他所叙述的故事的惨象。他不是在进行“辩护”,倒像是在忏悔。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的讲话得到原谅,那就是它的直率了,好像这个小矮子力图以此来

掩盖某种内心的痛苦。甚至“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不可侵犯”这种不可避免的词句,听起来也好像是在这个帝国墓前致悼词时偶一不慎而夹杂进去的往事回忆。这篇以宣布东方纠纷已经解决为目的的讲话所产生的印象如何,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来判断:一当这个讲话的电报稿发到巴黎,巴黎的证券马上就下跌了。

约翰勋爵说得对,他说,政府不需要他来辩护,因为谁也没有攻击它;相反,议院明白表示谈判完全交由行政机关去进行。的确,没有一个议员曾经提出要求大臣们参加辩论的提案,议院外也没有举行过一次集会要求议员们提出这类提案。如果说内阁的政策充满了神秘,那是得到了议会的和公众的默许的。至于在谈判结束之前不公布文件,照约翰勋爵的说法,这是由议会的传统形成的永恒的法律。约翰勋爵罗列了一些人所共知的事件,如果我们再一一加以重述,难免令人厌烦,这些事件经过他的叙述并不是更有味道,因为他与其说是在讲述情况,还不如说是在报流水账。但是,仍然有几个重要之点,是约翰勋爵第一个正式加以证实的。

还在缅施科夫公爵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前,俄国大使^①就通知约翰勋爵,说沙皇^②打算派一个特使团到君士坦丁堡去,它的使命只限于就圣十字架问题和与此有关的希腊正教教会的豁免权问题提出建议,不列颠驻圣彼得堡大使^③和不列颠政府并没有猜疑俄国方面还有任何其他意图。只是在3月初,土耳其大臣通知斯特拉特福勋爵说,缅施科夫公爵提议签订一项同土耳其独立绝不相容的秘密条

① 菲·伊·布伦诺夫。——编者注

②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③ 乔·汉·西摩尔。——编者注

约²⁰⁶(不过,据莱亚德先生说,罗斯上校和其他许多在君士坦丁堡的人早就知道了这个秘密),并且声称,如果让法国或英国知道了这个事实,俄国将认为这是一种直接敌视俄国的行为。同时人们都已知道(不是根据谣传,而是根据可靠的报告),俄国正在向土耳其边界和敖德萨大量集结军队。

至于维也纳会议致沙皇并被沙皇接受的照会,这是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在巴黎以路西德帕沙对俄国最近一次照会的复照²⁰⁷为基础写出的。后来,奥地利在7月24日接过这个照会加以修改后作为它自己的建议,而照会的定本是在7月31日完成的。奥地利大臣^①在此之前就把照会转交俄国驻维也纳大使^②,大使则在7月24日,即照会还没有最后定稿之前就把它送往圣彼得堡了。直到8月2日,即沙皇已经同意这个照会之后,照会才发往君士坦丁堡。可见,这个照会实质上是俄国通过四强国给苏丹的照会,而不是四强国给俄国和土耳其的照会。约翰·罗素勋爵说,这个照会“在形式上同缅施科夫公爵的照会并不完全吻合”,从而承认这个照会在内容上同它是完全吻合的。为了使人在这方面不再有任何疑问,他又加了一句:

“俄皇认为他的目的将会达到。”^③

照会草案对撤出多瑙河两公国问题连提也没有提。

① 卡·布奥尔-绍恩施坦。——编者注

② 彼·卡·迈恩多夫。——编者注

③ 约·罗素等人1853年8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见1853年8月17日《泰晤士报》第21509号。——编者注

约翰勋爵说：“即使俄国和土耳其终于都接受了这个照会，从两公国撤兵这个大问题仍是悬案。”^①

同时他补充说，不列颠政府“认为这种撤兵是非常重要的”，但他又请允许他不谈用什么方式达到这个目的。不过，他相当明白地向我们示意，英国和法国的舰队也许要在哥萨克撤出两公国之前就撤离贝济克湾。

“我们不应当同意这样的安排，根据这种安排，两国舰队驶近达达尼尔海峡，将被看作无异于实际入侵土耳其领土的行动。但是不言而喻，如果问题得到解决，如果和平得到保证，贝济克湾对英国和法国将都不再是具有任何价值的基地了。”^①

既然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不会认为，法国和英国的舰队应当永远留在贝济克湾，或者法国和英国应当签订一个正式条约，禁止自己的舰队进入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公海，那么，这些模棱两可而费解的话的意思（如果说它还有点什么意思的话）只能是：苏丹一接受照会和哥萨克一答应撤出两公国，舰队即行撤离。

约翰勋爵说道：“当俄国政府占领了两公国时，奥地利声明，根据 1841 年条约的精神，绝对有必要召集各强国代表举行会议，努力通过友好途径解决已经形成的困难局面，否则，它将危及欧洲和平。”^①

阿伯丁勋爵则与此相反，他几天以前^②在上院说过，——我们从其他方面获悉，他在 6 月间给圣彼得堡当局和君士坦丁堡当局的正式照会中也说过：

① 约·罗素等人 1853 年 8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1853 年 8 月 12 日。——编者注

“1841年的条约根本没有规定各签字强国有切实援助土耳其政府的义务(却有暂时避免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的义务!),所以英国女王陛下^①政府完全有根据自己本身的利益决定是否采取行动的自由。”^②

阿伯丁勋爵否认对土耳其的一切义务,只是为了放弃反对俄国的任何权利。

约翰·罗素勋爵最后指出了谈判接近完满成功的“美好前景”。但是,在目前,当在维也纳写成的并将由土耳其转交沙皇的俄国照会还没有得到苏丹赞同的时候,当西方列强坚持的必要条件,即从两公国撤兵还根本没有向沙皇坚决提出的时候,这种看法似乎是太乐观了。

莱亚德先生第一个发言回答约翰勋爵,他的讲话毫无疑问是最好和最有力的,他的讲话勇敢无畏,简明扼要,内容充实,材料丰富;它表明,这位著名学者十分熟悉尼古拉,正如他熟悉萨尔达尼拔一样;十分了解东方现实中的勾心斗角,正如他了解东方过去的神秘传统一样。

莱亚德先生对阿伯丁勋爵“在不少场合和不少地方都宣称他的政策实质上是基于和平的政策”表示遗憾。英国如果畏缩不前,不敢用战争维护自己的荣誉和利益,那就是鼓励俄国这个无法无天的强国,它的野心迟早必然导致战争。俄国现在的行为不应当看作是一种纯粹偶然的一时的现象,而应当看作一项广泛的政策图谋的主要组成部分。

至于对法国的“让步”和拉瓦莱特先生的“诡计”,俄国甚至不能

① 维多利亚。——编者注

② 奥·亨·莱亚德 1853年8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拿它们作借口,因为

“土耳其政府在颁布作出引起俄国不满的那些让步的敕令之前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就将这个敕令草案递交季托夫先生了,而当时的内容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对”^①。

俄国对塞尔维亚、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以及土耳其基督教居民的意图,是昭然若揭的。缅施科夫公爵在大摇大摆地进入君士坦丁堡之后,立即要求免去加腊沙宁先生的塞尔维亚大臣职务。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尽管塞尔维亚宗教会议提出了抗议。加腊沙宁先生是在1842年的起义中涌现出来的活动家之一,那次反俄的民族运动赶走了当时在塞尔维亚执政的米哈伊尔大公²⁰⁸(他和他的家族都只不过是俄国的工具)。1843年,俄国政府要求有干预塞尔维亚事务的权利。任何条约都没有赋予俄国这样的权利,但是,它从当时的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那里得到了这种权利,阿伯丁勋爵当时宣布,“俄国有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自己的各项条约的权利”。

莱亚德先生说道:“俄国在这方面的成功表明,它是塞尔维亚的主人,它可以阻挠任何民族争取独立。”^①

至于多瑙河两公国,俄国首先利用了1848年这些省份的民族运动,迫使土耳其政府把一切有自由主义主张和独立主张的人从这里驱逐出去。随后它又强迫苏丹签订了巴尔塔利曼尼条约¹²¹,这个条约确定了俄国干预两公国一切内政的权利,

“它对两公国现在的占领也证明,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实际上是俄国的省份”^①。

^① 奥·亨·莱亚德 1853年8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现在剩下的还有信奉基督教的土耳其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的斯拉夫人。

“在希腊人当中兴起一种探究和独立的精神，这种精神再加上他们同欧洲自由国家的贸易往来，引起俄国政府极大的惊恐。俄国的惊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新教在东方基督教徒中的传播。在土耳其恐怕找不出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没有新教的核心，这主要是美国传教士的影响和传教的结果（这又是美国进行干涉的一个根据）。得到俄国传教团撑腰的希腊正教教士竭尽全力阻挠这个运动，但当迫害无济于事的时候，缅施科夫公爵就来到了君士坦丁堡。俄国的伟大目标就是根除近年来在土耳其政府治下的基督教臣民中开始表现出来的宗教独立和政治独立精神。”^①

至于建立一个所谓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帝国的问题，莱亚德先生指出，希腊人（这里指的当然是有别于斯拉夫人的希腊人）总共不过 175 万人；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多年来千方百计加紧抛掉同他们的任何联系，不许希腊族神父到他们那里去担任教士和主教；塞尔维亚人设置了自己的牧首来代替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如果让希腊人盘踞在君士坦丁堡，就是把整个土耳其出卖给俄国。

有些议员宣称，君士坦丁堡是否将落入俄国手中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莱亚德先生反驳他们说：如果君士坦丁堡被占领，土耳其版图内的所有大省份，如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都将陷于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夺得这些省份的强国还会建立对印度的统治。占领了君士坦丁堡的强国，东方通常视之为世界的霸主。

不过俄国知道，目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会让它占领君士坦丁堡。同时，

^① 奥·亨·莱亚德 1853 年 8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它的目的是使这个国家不可能有任何独立民族存在，力图慢慢地而又实实在在地削弱土耳其人的权力，并向所有反对它的计划的人表明，这种反对不仅无用，而且会遭到它的报复。事实上，它要使土耳其不能存在其他的统治，而只能有俄国的统治。这一次，它的这类计划已经完全成功了”^①。

莱亚德先生声称，在缅施科夫公爵要求签订秘密条约之后，在俄国在边界和敖德萨进行大规模备战活动之后，政府竟然还满足于圣彼得堡对它的解释和保证，而没有声明英国和法国将认为越过普鲁特河是开战的理由，没有禁止俄国在没有它们参加的情况下同土耳其缔结任何条约或协议。

“如果我们当时采取这个步骤，俄国绝对不敢越过普鲁特河。”^①

随后，莱亚德先生说明，两公国作为独立国，如果同比萨拉比亚联合起来，并以匈牙利为后盾，最终会成为捍卫君士坦丁堡不被俄国人侵占并把大斯拉夫种族分解为两部分的唯一手段。他认为俄国终将撤出两公国。

“俄国为了实际上已经属于它的那些省份而同欧洲列强打仗是不值得的。俄国本来已经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只有用流血牺牲和高昂代价才能取得的东西；它已经加强了自己在东方的实力；它已经使土耳其受到屈辱；它已经迫使土耳其负担全部军费，耗尽了土耳其的资源；而更重要的是，它已经贬低了英国和法国在英国本国臣民和东方人心目中的威信。”^①

维也纳会议⁹拟定的照会将有下列结果：

“如果土耳其政府拒绝照办，俄国就会把矛头完全转向我们，要我们充当同它一起反对土耳其的盟友，迫使土耳其接受一个不公正的建议。如果土耳其政府接受，就等于英国直接批准了俄国有以土耳其政府 1 200 万基督教臣民的名

^① 奥·亨·莱亚德 1853 年 8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义进行干预的权利……我们对这个问题无论采取什么态度,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处于二等强国的地位,而让俄国一家充当头等强国……我们错过了正确解决这个东方大问题的也许是永不再来的机会……俄国已经把土耳其打击得再也恢复不了元气……我国政策所造成的后果还不仅仅限于这一点。瑞典、丹麦以及指靠我国的声望的一切欧洲弱国都会认为,从今以后,再反抗俄国的侵犯是毫无用处的。”^①

接下去,约翰·帕金顿爵士提出了几点重要的意见,其所以重要,因为这些意见表明了托利党反对派的观点。他对约翰·罗素勋爵不能向议院和全国提供比较令人满意的说明表示遗憾。他向政府保证说,如果政府决定把撤出两公国当作必要条件,这“不仅会得到议院的支持,而且会得到英国人民差不多完全一致的支持”。在文件没有公布之前,他对已采取的政策——劝土耳其不要把占领两公国看作开战的理由;在早期不采取比较坚决果断的行动;把谈判拖延6个月之久,造成疑虑不安的气氛,从而使土耳其和大不列颠的利益和贸易遭到损失——将不作评论。

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又发了一通他常发的那种温和宽厚的民主派宏论,这种宏论肯定能让讲的人比听的人得到更大的满足。如果把这些轻气球似的虚夸词句抓在手里挤一下,那就会一无所有,甚至原来使它们膨胀起来像个什么东西的空气也没有。达德利·斯图亚特再一次重复他经常重复的论调,说土耳其正在实行改革,说苏丹的统治不论在宗教方面或是在贸易方面都比俄国沙皇的统治更大度。他公正地指出,当多瑙河两公国的不幸居民实际上正遭受着战争恐怖的时候,吹嘘和平是没有用处的。他要求欧洲保护这些省份的居民免受他们现在遭受的残酷压迫。他从议会史中引用一些事

^① 奥·亨·莱亚德 1853年8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实,证明议员甚至在谈判尚未结束时也有权发表言论。总之,《每日新闻》的每一位忠实的长期读者所熟知的事情他恐怕一件也没有忽略。在他的讲话中有两个“要点”:

“虽然勋爵阁下(约·罗素)的解释不很充分(因为他告诉议院的全是议院已经知道的事情),但是,从他所闭口不谈的东西中恐怕他们仍然可以得出结论:勋爵阁下干出了他应引以为耻的事情。”^①

至于阿伯丁伯爵,

“他曾告诉我们,和平已有30年的保证,这对欧洲的繁荣和自由大有好处,但是我(达德利·斯图亚特)否认和平对欧洲的自由产生了什么好处。我要问,波兰、意大利、匈牙利、还有德国现在处在什么状况?”^②

这位民主派勋爵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这是这种第三流演说家的致命的才干),从大陆的暴君一直扯到“本国臣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女王方才罢休。

蒙·米尔恩斯先生,内阁的仆从之一,在他的额头上写着:

“不要讲起他,除非把他当作一件道具看待。”^②

他不敢完全按照内阁的旨意讲话。他讲了一通模棱两可的话。他一方面认为,大臣们没有把文件告诉议院是“做得非常谨慎和明智”的,但另一方面又向大臣们示意,如果他们采取别的做法,他们的行动会“更有力和坚定”。他一方面认为政府屈从俄国的要求可能是对的,另一方面又表示怀疑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等于英国政府鼓励土耳其采取某种政策而又不准备支持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

^① 约·帕金顿 1853 年 8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莎士比亚《尤利乌斯·凯撒》第 4 幕第 1 场。——编者注

他要说明，“这些问题他越想越感到非常难办”，而他越是不理解这些问题，就越是理解政府的观望政策。

听了蒙克顿·米尔恩斯先生这番支支吾吾、躲躲闪闪、思想混乱的话以后，芒茨先生的有点粗鲁的直率使我们有一种清新的感觉。芒茨先生是伯明翰的议员，争取1831年议院改革的斗牛士之一。

“当年荷兰大使曾向查理二世提出一个令人很不愉快的建议，查理回答道：‘呵，上帝！您从来没有向奥利弗·克伦威尔提出过这类建议。’大使说：‘是的，但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和奥利弗·克伦威尔不一样。’如果我国现在有一个像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人，我们就会有另外一位大臣和完全另外一个政府，俄国就绝不会侵入多瑙河两省了。俄皇知道，没有任何东西能促使英国进行战争，波兰和匈牙利的例子就证明这一点。英国现在不过是收获它对这些国家的行为的果实而已。就英国的对外政策而言，我认为，英国的状况是完全不能令人愉快和满意的。我还认为，英国人民感觉到，国家的声望降低了，政府丧失了一切荣誉感，只注意几个英镑、几个先令和几个便士。政府目前所争论的唯一问题，就是开支多少，战争是否能为本国各种商人所接受。”^①

伯明翰是军火生产和滑膛枪销售的中心，因此，这个城市的人对于爱好和平、博爱为怀的经营棉织业的曼彻斯特派⁶⁴自然要抱讥笑态度了。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议员布莱克特先生不相信俄国人会撤出两公国。他警告政府，

“不要受任何从王朝观点出发的爱和憎的支配”。^②

大臣们受到各派意见的四面围攻，坐在那里面色阴沉，神情委

^① 乔·芒茨 1853年8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约·布莱克特 1853年8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靡,无精打采,垂头丧气。正在这个时候,理查·科布顿突然站了起来,他以偏执狂的异想天开和坚定不移,以空想家的矛盾百出,以小店主的精于算计的怯懦,对大臣们大加赞扬,说他们接受了他的和平学说,并且在目前这个场合加以运用。他宣扬内阁公开实施的、议会默许的东西,宣扬统治阶级要求内阁实行和议会接受的东西。对战争的恐惧心理使他第一次产生了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味的思想。他泄露了中等阶级政策的秘密,因此被当作叛徒抛弃。他迫使英国中等阶级好像在一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而由于这镜子里的容貌很不雅观,他遭到了羞辱的嘘声。他反复无常,但是他的这种反复无常本身则是始终如一的。从过去的贵族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的凶狠的辞令,同现在的证券交易人的胆小怕事的事实是不和谐的,但这难道是他的过错吗?

他一开始就宣称,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存在什么意见分歧。

“但是,很明显,土耳其问题仍然引起了极大的不安。”^①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欧洲土耳其人是侵入欧洲的外来民族;他们并不是欧洲的土著居民;他们的老家在亚洲;在文明国家里不可能存在伊斯兰教;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护自己的独立,我们也就不能维护它的独立;现在人所周知,在欧洲土耳其,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的人数是1对3。

“我们应当奉行的方针是:只有在绝大多数居民都同我们一样希望阻止另一强国占领土耳其的情况下,才能保障欧洲土耳其对俄国的独立地位……至于派遣我们的舰队到贝济克湾,阻止俄国人前进,无疑我们是能够做到这

^① 理·科布顿 1853年8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一点的，因为俄国不想同一个海上强国冲突；但是我们这样做就得保持巨大的军备，而仍然解决不了东方问题……问题在于土耳其和它的基督教居民前途如何。伊斯兰教不可能保存，而我们是不愿看到我国去为欧洲的伊斯兰教而战的。”^①

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谈到为贸易的利益而维护土耳其的问题。他(科布顿)绝不会为关税率而战。他太相信自由贸易的原则了，认为无须为这些原则而进行战争。对于向土耳其的出口，许多人都估计得过高。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各国所消费的只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我们在黑海进行的全部贸易，都要归功于俄国侵入土耳其的沿海地区。我们现在得到的粮食和亚麻，不是来自土耳其，而是来自俄国。不管俄国将来怎样侵略土耳其，俄国不是会照样乐于给我们送来它的油脂、大麻和粮食吗？我们在波罗的海也在同俄国进行贸易……而同土耳其的贸易的前景又如何呢？这是一个没有道路的国家。而俄国人的经商条件更好一些。不妨看看圣彼得堡，看看它的码头和货栈……我们同土耳其这样的国家能有什么国家联盟呢？……人们谈到力量的均势。这是从政治方面看问题……关于俄国的实力，关于一旦俄国占领波斯普鲁斯海峡地区对英国产生的危险，人们谈得很多。但是认为俄国会入侵英国是非常荒谬的！俄国不向西欧借债，就不能派遣自己的军队走出国门一步……这个国家如此贫穷，同英国相比，只不过是大大乡村而已，它既缺资本，又无资源，永远不可能来加害于我国或美国、法国这样的国家……英国现在比以往强十倍，有多得多的力量来对抗像俄国这样的国家的侵略。”^①

接着，科布顿谈到，目前，对英国来说，战争危险比以往要大得多。英国工业人口增加了很多。他们对他们的产品的输出和原料输入的依赖性大大增加。他们已不再拥有工业垄断权。航海条例²⁰⁹的废

^① 理·科布顿 1853年8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除，已迫使英国不仅在其他一切部门，而且在海运方面经受世界竞争。

“我恳请布莱克特先生想一想，受害最大的恐怕会是他在这里所代表的港口。政府不理睬不明事理的人们的喊叫是明智的…… 我不想谴责他们维护土耳其帝国的完整的立场，因为这是他们继承下来的传统政策…… 现政府应当受到信任，因为它在人民允许的范围以内表现了对和平的爱好。”

理查·科布顿是这出戏剧中的真正的英雄，他也遭到和一切真正的英雄一样的命运——悲剧的命运。而接着出场的，是一个假英雄，一切骗局的培养人，制造精美的谎言和恭顺的诺言的好汉，一面讲着豪言壮语一面溜之乎也的人物。这就是帕麦斯顿勋爵。这个老奸巨滑、诡计多端的辩士一眼就看出，罪犯只有背弃自己的辩护律师，才能逃避判决。他看出，现在四面受敌的内阁，只有激烈抨击唯一敢于替它辩护的人，只有驳倒唯一也许能够替自己政策辩护的理由，才能根本扭转局面。再没有比揭露科布顿先生的矛盾更容易的事情了。科布顿先生先是表示完全同意前面各位发言者的意见，而末了却每一点都同他们的意见背道而驰。他主张维护土耳其的完整，后来却竭力证明，土耳其不应受到任何保护。他，和平的传教士，却替俄国的侵略辩护。他说，俄国是弱国，但同俄国打仗必然使英国毁灭。俄国只不过是个大乡村，但既然圣彼得堡是一个比君士坦丁堡更漂亮的城市，俄国就有权把这两个城市都占有。科布顿先生虽然是一个自由贸易论者，他却不喜欢土耳其的自由贸易制度而喜欢俄国的保护关税制度。不管土耳其是自己消费运到它那里去的消费品，或者它只是一条把这些消费品运往亚洲其他地方的渠道，——保持它作为一条自由的通道，这对英国难道是无所谓的吗？科布顿先生曾经是不干涉原则的大力鼓吹者，现在却想用议会的法令来支配伊斯兰

教徒、希腊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居住在土耳其帝国内的民族的命运。接着，帕麦斯顿勋爵高度赞扬土耳其取得的进步和它现在拥有的实力。“的确，土耳其没有波兰和西伯利亚”。既然土耳其如此强大，帕麦斯顿勋爵当然可以迫使土耳其容忍俄国侵占它的一些省份。一个强大的帝国能够经受得住一切。帕麦斯顿勋爵向理查·科布顿证明，根本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要采取帕麦斯顿勋爵及其同僚所采取的政策。这位老演员的每一句话都被热烈的喝彩声打断，而当他最后要回到自己的席位坐下的时候，却说出这么一些厚颜无耻的同全篇讲话相矛盾的话：

“使我感到满意的是，土耳其具有生存和繁荣的因素，因此我认为，女王陛下政府所奉行的政策是健全的政策，应当受到全国的赞许；遵循这一政策，也应当是今后每一届英国政府的职责。”①（欢呼。）

帕麦斯顿善于装出一副莎士比亚所说的“汹汹之势”②。他表现了悉尼所说的“可怕的勇气，敢于去做明明知道他不知道怎样做的事”。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8 月
19 日

载于 1853 年 9 月 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6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① 亨·帕麦斯顿 1853 年 8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莎士比亚《尤利乌斯·凯撒》第 5 幕第 1 场。——编者注

卡·马克思

大陆和英国的情况²¹⁰

1853年8月23日星期二于伦敦

德国和比利时的报纸根据本月13日君士坦丁堡电讯，断言土耳其政府已同意维也纳会议的建议。法国报纸也收到了当天发自君士坦丁堡的电讯，可是它们只报道说，土耳其帝国国务会议表示了接受这些建议的意向。维也纳收到最后答复大概不会早于本月20日。所以，土耳其政府是否会在俄国军队撤出多瑙河两公国以前或以后派专使到圣彼得堡去这个问题，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据黑海地区的最近报道，东北风已经开始破坏正常的航行。停泊在赫拉克利亚—本都卡和沿海其他地点的一些船只，为了不被刮到岸上搁浅，已不得不驶离自己的停泊地。

读者都已知道，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事件之后，苏丹^①已命令这两位国君^②离开两公国前往君士坦丁堡，但是两位国君拒绝执

①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② 格·吉卡和巴·施梯尔贝。——编者注

行他们的宗主国君主的要求。此后,苏丹便以瓦拉几亚国君接待俄国军队并给以支持为由把他革职了。革职敕令于本月9日在贵族会议上宣读,会议决定要求瓦拉几亚国君在目前的紧急关头不要放弃政权,撒手不管。这位君主照办了。国务大臣曼努和内务部官员伊万迪斯也被召赴君士坦丁堡,但是他们也借口可能引起社会秩序混乱而拒绝前往。因此法国和不列颠的领事都立即断绝了与叛乱政府的一切联系。

塞尔维亚的事态转趋复杂化。巴黎《立宪主义者报》在上星期五登载了君士坦丁堡的一条消息^①说,奥地利利用苏丹的困难处境向他提出了一些要求。

不久前视察了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奥地利总领事向塞尔维亚大公亚历山大声称,奥地利准备出兵占领塞尔维亚,以镇压居民中的一切危险活动。大公拒绝了总领事的建议,并且立即派一名专门信使把关于奥地利这一建议的消息通知了君士坦丁堡。路西德帕沙要求布鲁克男爵解释这件事情。后者回答说,总领事曾经与大公预先商谈过奥地利所害怕的事情,即担心居住在与塞尔维亚接壤的边境上的奥地利臣民卷入这个省爆发的暴乱。路西德帕沙的回答大意是说,奥地利军队对塞尔维亚的任何占领都将被土耳其政府视为敌对行动,因为土耳其政府自己负责这个省的安宁;此外,帕沙答应马上派专员赴塞尔维亚考察当地事态并提出报告。

一天以后,几家伦敦报纸发表了奥地利军队进入塞尔维亚的消息。可是这些消息已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昨天,也是这些报纸报道,塞尔维亚爆发了反革命暴动。可是这些消息同样不可靠,因为它

^① 指 1853 年 8 月 19 日《立宪主义者报》第 231 号的报道。——编者注

们根据的是德文 Auflauf^①一词的误译；事实是只不过发生了一次小规模骚乱。德国报纸今天发表了本月9日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消息。据称，已召开了几次土耳其帝国国务会议讨论塞尔维亚局势。亚历山大大公的行动大受称赞并且通过了下述决定：如果奥地利军队企图占领塞尔维亚，那么在必要时将用武力把他们从那里赶走。一个师的军队已被派往波斯尼亚边境。从本月8日在君士坦丁堡收到的私人信函中获悉，亚历山大大公由于与奥地利领事发生冲突，已呼吁法国领事和英国领事表态，他并且暂时离开了贝尔格莱德。据说他是前往尼什，在那里等待土耳其政府的命令。

戴·乌尔卡尔特先生在他今天发表于《晨报》上的通讯中谈到塞尔维亚的复杂情况时写道：

“俄国目前不想同土耳其作战，因为它如果与奥地利一致行动，便会失去自己的希腊正教盟友；可是它正在使奥地利卷入一场酝酿中的冲突，这场冲突将使塞尔维亚处于与两公国相似的境地。这将会引发一场天主教徒与希腊正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俄国可以利用背景的突然变换使它对两公国的占领为土耳其所接受，看作是保护塞尔维亚免遭奥地利占领的措施，这样一来，它可以把奥地利和土耳其双方都拖进瓜分的计划，并且在这方面支持它们。”^②

为了支付被占领的特别费用，摩尔多瓦国君打算向俄国的银行家借债。

保加利亚各要塞粮食奇缺，因此正在厉行节约，各卫戍部队的生活极为困苦。

《君士坦丁堡报》登载了来自阿勒颇的下面一段报道：

① 暴乱、骚动。——编者注

② 戴·乌尔卡尔特《皇帝和沙皇》，见1853年8月23日《晨报》第19397号。——编者注

“不久以前破获了一个由图谋不轨的土耳其人组成的匪帮，这个匪帮准备像 1850 年那样，袭击城市的基督教居民。可是，由于地方长官帕沙^①和阿勒颇驻军总司令阿里·阿斯米帕沙十分警惕，这一企图被镇压下去了，社会秩序得到保持。因此希腊正教派牧首德米特里和亚美尼亚派牧首巴西利乌斯代表自己的教区联名写信给路西德帕沙，感谢苏丹政府对基督徒的保护。”^②

德文的《圣彼得堡报》在一篇关于东方问题的社论中写道：

“和平之友在 7 月初只能当作一种希望的东西，近来已成为确定无疑的事。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调停工作现在已完全掌握在奥地利手中。维也纳将拟定出一个解决东方问题的方案，这个问题最近引起了从黑海至大西洋整个地区的不安，它也是妨碍欧洲外交官们欢度常规假日的唯一原因。”^③

应当注意，这里故意强调调停者不是四强国而只是奥地利一国，并且以地道的俄国风格把各国的不安同外交官们停止休假相提并论。

柏林《国民报》^④发表了一封 7 月 15 日的格鲁吉亚来信，信中说俄国打算在本月月底对高加索人发动一次新战役。亚速海上的舰队已进入战备状态，以支援陆军的行动。

1853 年的议会会议已于上星期六结束（议会休会到 10 月 27 日）。委员会宣读了一篇极其平庸和内容贫乏的讲话，宣称是女王^⑤的诏书。在回答米尔恩斯先生时，帕麦斯顿勋爵向议会担保说，议会对从两公国撤兵的问题不用担心，但是他除了说“信任俄皇的人格和品德”会使俄国皇帝自愿地把他的军队撤出两公国^⑥以外，没有作任

① 奥斯曼帕沙。——编者注

② 引自 1853 年 8 月 22 日《晨报》第 19396 号。——编者注

③ 引自 1853 年 8 月 23 日《新闻报》。——编者注

④ 1853 年 8 月 19 日《国民报》第 384 号。——编者注

⑤ 维多利亚。——编者注

⑥ 引自 1853 年 8 月 22 日《泰晤士报》第 21513 号。——编者注

何别的保证。这样一来,由于帕麦斯顿发表演说反对科布顿先生^①,联合内阁便自作自受,不得不迫使帕麦斯顿郑重声明他“信任”沙皇的“人格和品德”了。同一个帕麦斯顿在同一天接见了流亡巴黎的波兰贵族团体及其伦敦分支的代表团²¹¹,代表团向勋爵阁下呈交了一封感谢信,赠送了有亚当·查尔托雷斯基公爵肖像的金质、银质、铜质勋章,这是为了表示感激 1846 年勋爵同意把克拉科夫没收²¹²以及他在其他场合对波兰的事业所表示的同情。这个巴黎团体的伦敦分支的保护人、不可缺少的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是当然的典礼官。帕麦斯顿勋爵告诉这些晋见他的头脑简单的人说,“他对波兰的历史深表关切,这是一部充满苦难的历史。”^②同时,勋爵阁下也没有忘记提醒他们:他不是以内阁阁员的身份说话,而只是以私人的身份接见他们的。

这次拖得很长的 1853 年议会会议的前半期,被德比内阁的垂死挣扎、联合内阁的形成和最后取得胜利以及议会的复活节假日所填满。至于议会会议的实际内容,其最突出的特点便是所有旧政党的解体、议员们的腐败以及所有享有选举特权的人们的麻木不仁。这一切都表现在政府的非常奇妙的活动中,这个政府包容了形形色色的各种意见,包容了官场的所有贤人;它宣布拖延一切问题的解决;它用各种治标办法来应付困难;它许下种种诺言,同时它宣称,“所谓执行,就等于某种遗嘱或遗言,表明立遗嘱的人十分缺乏判断力”;它匆忙地提出自己的法案,然后又匆忙地把它收回、更改、推翻;它靠着曾经被它严加斥责的前任的遗产过日子;它把实行自己的各种措施

① 见本卷第 317—318 页。——编者注

② 1853 年 8 月 22 日《泰晤士报》第 21513 号。——编者注

的主动权交给据说是受它领导的议院；不多的几个无疑是由它拟定的法令也遭到了必然的失败。这样，议会改革、国民教育改革和法律改革（一些小的改革不算）都被拖延下去。流放法案、航海法案等等，是从德比内阁那里继承下来的。而加拿大教会后备基金法案⁵⁴提出几天以后便被政府自己改得面目全非。至于预算，那么，遗产税法令在财政大臣提出以前，他本人就曾经投票反对过这种税。广告税法令也是在财政大臣的反对两次被推翻以后他才勉强接受下来。特许证制度的新条例经过一再修改最后被束之高阁。这个被格莱斯顿先生雄心勃勃地作为一个庞大计划提出来的、与整个预算相称的条例，被议院通过时已成为一件可怜的补丁累累的百衲衣，已不过是各种不相干的、毫无联系的、彼此矛盾的琐碎条款的大杂烩了。印度法案唯一重要的特征——不更换东印度公司⁸⁵的特许状，是在内阁宣布在更换特许状时再延期20年以后才由内阁提出来的。两项的确完全是由“群贤内阁”¹⁷⁸一手拟就的法令，即马车法令和国债兑换法令，还没有来得及迈出议院的门坎就被公众嗤之以鼻，视为失败了。“英国历史上最有力的政府”的对外政策，连这种政策的拥护者都承认是极端没有办法、动摇不定和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国外形势严峻、国内民众不满的征象更加明显的情况下（这种不满的表现就是空前剧烈和普遍的罢工运动以及宪章派⁸⁰鼓动的复活），皮尔派官僚、辉格党寡头以及假激进派缔结的切舍姆街协议²¹³更加巩固了。在估计统治阶级和内阁的对外政策时，我们不应该忽视一点，即同俄国的战争会在大陆上酿成普遍的革命大火，而这一次它很可能在大不列颠的群众中得到难以避免的响应。

至于上院，它的活动可以很简单地加以总结。它否决了解放犹太人法案⁵³，暴露了它的顽固不化；它扣压了工人结社法案¹¹⁵，暴露

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敌视；它把爱尔兰土地法案¹³⁶搁置起来，暴露了它由自私自利产生的对爱尔兰人民的仇恨；最后，它恢复了盐业垄断，暴露了它愚蠢地袒护印度的陋习积弊。上院始终同政府之间有秘密的谅解：不管有什么进步措施意外地在下院获得通过，都要由开明的上院议员们把它取消。

在议会休会前提交议会的文件中，有英俄政府之间关于多瑙河苏利纳河口航行阻塞问题的大量来往函件。这批函件是从1849年2月9日开始到1853年7月为止，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甚至奥地利政府被迫宣布，多瑙河口已不能通航，它寄往君士坦丁堡的邮件今后将取道的里雅斯特。所有这一切困难，都是不列颠对俄国的侵略采取纵容姑息态度的结果。1836年英国政府默认了俄国强占多瑙河口的行为，虽然在承认以前它曾指示一个商行抵抗俄国政府官员的干涉。

同缅甸签订的所谓和约（这个和约1853年6月30日由印度总督^①的文告宣布，女王还就这个和约向议会祝贺），实际上只是一种休战。阿瓦国王^②为饥饿所迫只好屈服，表示愿意停止军事行动，他释放了英国俘虏，请求解除河道封锁，并且禁止他的军队进攻不列颠政府卫戍部队占领的密卡岱和东吁这两个地区，正像土耳其政府禁止它的军队进攻驻两公国的俄国军队一样。可是阿瓦国王拒绝了英国对勃固或缅甸帝国的任何别的地区的领土要求。英国在这场斗争中所获得的唯一的东面，就是建立了一条危机四伏的和存在争议的边界，而不是可靠的和得到承认的边界。英国不由自主地冲破它的

① 詹·达尔豪西。——编者注

② 门登。——编者注

印度领地的人种、地理和政治边界,现在连天朝帝国也已经不再是英国侵略军的天然障碍了。英国在亚洲已经失去了重心,它的欲望已经没有止境。它再也无法控制自身的行动,不到天涯海角它是不会止步了。因此,英国看来注定要打开最远的东方同西方的交往,尽管它并不能享有这些国家,也不能掌握它们。

南威尔士煤矿工人大罢工不仅在继续进行,而且由此引发了铁矿工人的新罢工。预料在商务航海法案生效之际不列颠的海员也将实行总罢工,因为这一法案允许招收外国水手,正如海员们所说,这纯粹是为了降低他们的工资。我曾不止一次地提醒读者注意目前的罢工的意义,现在,连伦敦的中等阶级报刊也开始了解这种意义了。例如,《泰晤士周报》上星期六指出:

“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已被彻底打乱。劳动正在全国的四面八方公然地反对资本,并且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由此引起的纠纷还只是刚刚开始。工人阶级在坚决考验自己的力量。目前运动暂时还只限于一系列分散的小战斗,可是,从某些迹象来看,这些分散的战斗转变成系统的、普遍的反反对资本的联合行动已为时不远了。”^①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8 月
23 日

载于 1853 年 9 月 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6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① 1853 年 8 月 21 日《泰晤士周报》第 345 期。——编者注

卡·马克思
米哈伊尔·巴枯宁²¹⁴

致《晨报》编辑

阁下!

赫尔岑和戈洛文先生想把我在 1848 年和 1849 年编辑的《新莱茵报》卷入他们和“弗·马·”^①之间关于巴枯宁的论战。他们向英国公众宣称,对巴枯宁的诬蔑发端于这样一家报纸,该报甚至敢于举乔治·桑的话作证。对于赫尔岑和戈洛文先生的影射,我毫不在意。但是,为了有助于解决因米哈伊尔·巴枯宁引起的问题,请允许我说明事情的实际情况。

1848 年 7 月 5 日,《新莱茵报》收到了两篇来自巴黎的通讯:一篇是哈瓦斯通讯社的通讯原稿,另一篇是与这个通讯社完全没有联系的一位波兰流亡者^②的私人通讯。两篇通讯都说,乔治·桑掌握了一些足以使巴枯宁声名扫地的书面材料,这些材料说明巴枯宁最近和俄国政府建立了联系。

① 弗·马克思。——编者注

② 海·艾韦贝克,即下文所说的巴黎通讯员。——编者注

7月6日,《新莱茵报》发表了驻巴黎通讯员的通讯。

巴枯宁本人则在《新奥得报》(在布雷斯劳出版的报纸)上声明,在《新莱茵报》发表这篇巴黎通讯之前,类似的谣传就在布雷斯劳秘密地散布;这些谣传来自某些俄国使馆;他将写信给乔治·桑,这是他对这些谣传的最好回答。巴枯宁给乔治·桑的信与他的声明同时发表了。声明和信都马上在《新莱茵报》上转载了(见1848年7月16日《新莱茵报》)。1848年8月3日,《新莱茵报》接到巴枯宁通过弗·科斯策尔斯基先生转来的乔治·桑给《新莱茵报》编辑的一封信。这封信当天就发表了,并加有下面的按语:

“本报第36号曾报道巴黎谣传乔治·桑掌握了一些材料,根据这些材料,俄国流亡者巴枯宁被说成是皇帝尼古拉的间谍。我们所以公布这个报道,是因为两位彼此完全没有联系的通讯员同时向我们送来了这个消息。我们这样做只不过是尽一个公众报刊的义务,一个公众报刊对社会活动家是应该严格监督的。在这同时,我们也给了巴枯宁先生机会,让他来消除某些巴黎人士对他提出的怀疑。同样,我们没有等到巴枯宁先生提出要求,就从《新奥得报》转载了他的声明和他给乔治·桑的信。现在我们将乔治·桑给《新莱茵报》编辑的信逐字译出发表如下,这封信彻底澄清了这件事。”(见1848年8月3日《新莱茵报》)①

1848年8月下半月我途经柏林,在那里见了巴枯宁,恢复了我们在二月革命爆发以前建立起来的亲密友谊。

1848年10月13日,《新莱茵报》谴责了普鲁士内阁驱逐巴枯宁出境,谴责了它所发出的如果巴枯宁敢于再进入普鲁士国境就把他

① 见马克思《巴枯宁》。——编者注

引渡给俄国的威胁。

1849年2月15日,《新莱茵报》就巴枯宁的小册子《致斯拉夫人的呼吁》发表了社论,开头两句话是:“巴枯宁是我们的朋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小册子进行严格的批评。”^①

在我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论述“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那些通讯中,就我所知,我是第一个对巴枯宁参加我们的运动特别是参加德累斯顿起义²¹⁵给予应有的称赞的德国著作者^②,同时也指责了德国报刊和德国人,指责他们极度怯懦地把巴枯宁交给他的和他们的敌人。

至于说到“弗·马·”,既然他顽固地认为大陆的革命都有利于俄国的秘密阴谋,那么,如果他想多少合乎逻辑的话,他就不仅应该谴责巴枯宁,而且应该谴责每一个大陆的革命者都是俄国的间谍。在他看来,革命本身就是给俄国作间谍,巴枯宁又怎能不是呢?

卡尔·马克思

1853年8月30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8月
30日
载于1853年9月2日《晨报》第
19406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① 见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编者注

② 这组文章是恩格斯撰写的,但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署的是该报正式通讯员马克思的名字。文章中有关巴枯宁的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04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粮价上涨。——霍乱。——
罢工。——海员中的运动²¹⁶

1853年8月30日星期二于伦敦

据《布雷斯劳日报》报道，瓦拉几亚的粮食出口已被完全禁止。

现在，迫在眉睫的是一个在一定意义上比东方问题更大的问题，这就是吃饭问题。在柯尼斯堡、斯德丁、但泽、罗斯托克、科隆、汉堡、鹿特丹和安特卫普，粮价都已上涨；不言而喻，在所有进口市场上情况也都是这样。在英格兰一些主要的外省市场上，小麦价格由每夸特4先令涨到6先令。比利时和法国小麦和黑麦价格不断上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面包价格腾贵，已引起严重不安。法国政府正在英格兰、敖德萨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采购粮食。关于英格兰收获情况的最后报告最早要到下星期才能得到。在英格兰，马铃薯病害比爱尔兰更加普遍。意大利各地政府，其中包括伦巴第当局，都已禁止粮食出口。

上星期在伦敦发现了一些肯定是亚洲霍乱的病例。我们还听说，霍乱已蔓延到柏林。

劳动与资本之间，工资与利润之间的战斗在继续。伦敦的运煤

工人、理发师、裁缝、女靴鞋制鞋工、雨伞阳伞工、衬衣内衣制作工以及受雇于服装商店和出口批发商行的工人，都举行了新的罢工。昨天，一些泥瓦工以及在泰晤士河上从事码头与大船之间的货物搬运的驳船船工也宣布罢工。南威尔士煤矿工人和冶金工人的罢工还在继续。除上述一系列的罢工之外，里索文煤矿工人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工人也举行了新的罢工。

如果我把每个星期得到的各种罢工的消息在每一篇通讯中一一列举，一定会令人感到厌烦。因此我今后将只是间或地报道其中一些具有特别值得注意的特点的罢工。从这方面来看，值得提出的是警察和他们的局长理查·梅恩爵士之间未能得到解决的冲突，虽然这还不完全算是罢工。理查·梅恩爵士在给首都一些警察分局的指令中禁止警察集会和结社，同时声称他愿意亲自审理个人的申诉。警察回答他说，他们认为集会的权利是英国人不可剥夺的权利。梅恩爵士提醒他们：他们的薪水是在食品比现在贵得多的时候确定的。他们回答说，“他们提出要求的根据不仅是食品价格，而是他们确信，人的血肉之躯现在已不像先前那样不值钱了”。

在这一系列罢工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发表了“海员联谊会”的宣言^①，它被他们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海员权利法案。宣言牵涉到商务航海法案，因为这个法案废除了航海条例²⁰⁹中的关于不列颠船主必须使本船人员至少有四分之三是不列颠臣民的条款。新法案使外国海员甚至可以在那些不允许外国船只通行的地方从事口岸贸易。船员们宣布，这不是海员的法案，而是船主的法案。这一法案除了船

① 这个宣言后来全文发表在1853年11月12日《人民报》第80期。——编者注

主以外,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原先关于招收船员的条款曾经在对待船员方面对船主起了约束作用。新法律则会使船员受任何一个坏船长的摆布。新法律所根据的原则是:“17 000 个船主全是慈悲为怀、宽宏大量、乐善好施、和蔼可亲的人,而海员全是桀骜不驯、蛮不讲理、天性乖戾的人。”海员们说,船主可以把他的船开往任何他们愿意去的地方,而海员的劳动却只能限制在本国范围内,因为政府废除了航海条例,却没有事先设法为他们取得相应地受雇于外国船只的权利。

“既然议会把海员献给船主作牺牲品,我们作为一个阶级不能不联合起来,采取自卫措施。”^①

这些措施主要是海员们打算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坚持关于招收船员的条款。同时他们又宣布:

“美利坚合众国的海员应当被看作不列颠人,我们将吁请他们支持我们的联合组织。鉴于在 10 月 1 日上述法律被通过后以英国人的身份航行不再有任何优待,而以外国人的身份于平时在不列颠船上服务反而可以保证在战争时期不应征到女王陛下的海军中服役,又鉴于在平时享有美国的自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海员们将在到达这个共和国的任何港口以后设法取得合众国的公民证书。”^①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8 月
30 日

载于 1853 年 9 月 1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73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① 1853 年 8 月 30 日《先驱晨报》第 22250 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
致《人民报》编辑²¹⁴

阁下!

本月3日《晨报》发表了附在本信之后的《应该怎样写历史(一个外国通讯员作)》一文,同时却拒绝刊登我对这位“外国通讯员”的答复。阁下如能把这两篇文章——俄国人的文章和我对它的答复一并刊登在《人民报》上,我将不胜感激。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9月7日于伦敦

“应该怎样写历史(一个外国通讯员作)”

巴枯宁是俄国间谍,——巴枯宁不是俄国间谍。巴枯宁在施吕瑟尔堡监狱备受虐待,已经死在那里了,——巴枯宁没有死,他还活着。巴枯宁已被充军,流放到高加索去了,——不,他没有被充军,他仍然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里。这就是轮流在报刊上出现的关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相互矛盾的消息。

在一切都可以被广泛宣扬的今日,我们只有确定了假的东西才能得到真的东西。然而,是否至少已经证实巴枯宁没有领俄国军方的津贴呢?

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不知道,人性要求人们互相负责;他们不知道,我们使德国摆脱俄国现时对它的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影响俄国,使俄国重新陷入专制制度,直到它容易被革命攻破为止。对于这些人,要他们相信巴枯宁是进步的

世界主义的最纯洁最宽厚的代表之一，那是白费气力。

法国有句谚语：‘诽谤，诽谤，总会留点影响。’巴枯宁的一位朋友在 1848 年所支持的对他的诽谤，在 1853 年又被一位姓氏不明的人加以散布。

还有一句谚语：‘只有自己人才出卖自己人，宁可和聪明的敌人打交道，不愿和愚蠢的朋友来往。’不是那些保守派报纸散布对巴枯宁的诽谤，而是一家朋友的报纸表示了这种关怀。

谁能够哪怕是在一刹那间忘记——就像马克思先生那样忘记——巴枯宁并不是生就的一副警察局密探的骨头，这样的人的革命感情显然是非常淡薄的。为什么他至少像英国报纸通常那样做，为什么他不直接发表那位波兰流亡者告发巴枯宁的信呢？看到他的名字与诬告联系在一起，他只能是留下永久的遗憾了！”

关于在星期六《晨报》上发表文章的 一个外国通讯员

“宁可和聪明的敌人打交道，不愿和愚蠢的朋友来往。”完全正确。

如果有人不知道争论必然包含相反的意见，历史的真实只有从相互矛盾的论断中才能得出，却为发现这一点而大惊小怪，他不正是“愚蠢的朋友”吗？

如果有人认为有必要在 1853 年对巴枯宁本人在 1848 年已表示满意的解释吹毛求疵，“使俄国重新陷入”它从未摆脱过的“专制制度”，另外还把一个日常惯用的拉丁谚语叫作法国谚语，他不正是“愚蠢的朋友”吗？

如果有人断言，一家报纸刊登了它的外国通讯员写的一篇报道而编辑未作任何评价就是“支持”这个报道，他不正是“愚蠢的朋友”吗？

如果有人把“保守派报纸”当作极端的“革命感情”的典范——这种感情曾经发明了嫌疑犯处治法²¹⁷，甚至怀疑丹东、卡米耶·德穆兰、阿那卡西斯·克洛茨这样的人就一副卖国贼的“骨头”——，如果有人敢用巴枯宁的名义去攻击第三者，却不敢用自己本人的名义为巴枯宁辩护，他不正是“愚蠢的朋友”吗？

最后请让我对日常惯用的谚语的爱好者声明，我同他以及巴枯宁的诸如此类的朋友的争论到此为止。

卡尔·马克思

1853年9月4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9月

4日

载于1853年9月10日《人民报》第71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卡·马克思

*维也纳照会。——合众国与欧洲。
——舒姆拉来信。——
皮尔的银行法令²¹⁸

1853年9月9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在8月30日的通讯中曾向读者报道^①，维也纳照会¹⁸⁴已被土耳其政府“拒绝”，因为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见和立即先行撤退^②的要求无异是拒绝满足俄国的贪欲。当时我的这个看法与整个报界都不一致，它们都断言那些修正意见根本无足轻重，不值一提，并且说可以认为整个问题已经解决。几天以后，《纪事晨报》^③就使轻信的证券交易人大吃一惊，它宣称，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见十

①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 1853年8月30日所写的文章（见本卷第330—332页）中，没有本文所提到的报道。可能是该报编辑部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删掉了这一部分。——编者注

② 指要求俄国军队从多瑙河两公国撤退。——编者注

③ 1853年9月3日《纪事晨报》第27050号。——编者注

分严重，很难对付。现在只有一种意见了，即认为整个东方问题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虽然昨天各报都全文发表了路西德帕沙 1853 年 8 月 19 日致奥地利、法国、大不列颠和普鲁士代表的正式照会，这种印象也丝毫没有减弱。

俄皇一定会拒绝土耳其的“修正意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俄皇在巴黎的喉舌《国民议会报》就已经向我们报道：

“据今天巴黎收到的消息称，圣彼得堡当局的第一印象是完全不利于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见的。不管圣彼得堡当局将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必须准备对此采取冷静态度，消除我们的不安。我们应当考虑到，即使俄国当局不同意接受对照会提出的修改，那还会有在君士坦丁堡重开谈判的变通办法。”^①

这最后一句话暗示俄国将企图再一次拖延解决争端，柏林的《石印通讯》也证实了这一点：

“奥地利政府向尼古拉皇帝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对修正意见一事有新的建议，它现在着手用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一切尝试的方式来消除危机。”

维也纳的《漫游者》刊登了一封 8 月 26 日敖德萨的通讯，其中说，东方问题的解决“还不会像某些人所料想的那样快。战备活动一日也没有停止，在两公国的驻军不断得到增援”^②。喀琅施塔得的《卫星报》则断然肯定，两公国的俄国驻军将进入冬季营地。

① 引自 1853 年 9 月 9 日《新闻报》。——编者注

② 1853 年 9 月 4 日《漫游者》第 408 号。——编者注

贵报编辑部关于英格拉哈姆舰长的评论^①甚至比华盛顿发来的照会还要轰动欧洲。伦敦几乎每一家周报、法国的许多报纸、布鲁塞尔的《民族报》、都灵的《议会报》、《巴塞尔日报》和德国所有的自由派报纸都加以转载，有的加了评论，有的未加评论。由于一些德国报纸同时也转载了贵报关于瑞士美国同盟的文章，你们可以认为，柏林《石印通讯》报上一篇文章中的下面一段话部分地是针对贵报而发的：

“一个时期以前，报界曾借各种机会表示了自己对合众国的干涉论的看法。最近，由于士麦那的科斯塔事件¹⁵⁵，争论又起。这一事件还没有了结，外国报纸和本地报纸已经在研究瑞士一旦遭到侵略威胁，合众国站在瑞士方面进行干涉的可能性了。今天我们得到消息说，某几个强国打算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抗议合众国提出的国际法理论；还说，这些国家的当局可望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美国的干涉论如果不是坚决地予以否定，在欧洲根绝革命精神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此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法国是准备签署这一抗议声明的强国之一。”^②

星期二的《立宪主义者报》不辞辛苦地竭力使最后这一点不留下任何疑问，它说：

“必须坦率地把一切谈清楚。美利坚共和国的代表们不是把科斯塔当作合众国的公民，而是把他当作革命者来保护，不许奥地利逮捕的。但是没有一个是欧洲强国会把合众国政府有权在欧洲用武力保护革命的说法当作国际法的一个原则来接受。当某个国家的政府行使它的司法权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容许用罪犯已改变国籍这个可笑的借口（而真正的原因是这个罪犯反对本国政治制度）加以阻挠。美利坚联邦的舰队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如此轻易地取得胜利的，而像圣路易号舰长那样的横蛮行为在另一场合可能造成灾难性

① 1853年8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39号。——编者注

② 引自1853年9月9日《新闻报》。——编者注

的后果。”①

在今天收到的士麦那出版的《公道报》上，发表了几封很有意思的寄自舒姆拉的通讯：

“总司令奥美尔帕沙把军队配置得很好，一有必要他就能在24小时内把65 000名步兵和骑兵及180门火炮集中到多瑙河的任何地点。据我收到的瓦拉几亚来信说，斑疹伤寒正在使俄国军队大量减员，战事开始以来已损失不下13 000人。死尸都尽量在夜间埋葬。马匹也大批倒毙。而我们的军队什么病都没有。在多瑙河的对岸，时时出现穿着摩尔多瓦制服的俄国兵，30—60人一群。他们的一切行动我们的将军都知道。昨天来了1 000名阿尔巴尼亚罗马天主教徒。他们是一支13 000人队伍的先头部队，这支队伍将在日内开到。他们全是优秀射手。昨天还来了3 000骑兵，全是久经战场的，武器和装备都很精良。我们军队的人数正在一天天增加。艾哈迈德帕沙昨天动身到瓦尔纳去了，他将在那里等候埃及军队的到来，以便把他们派到预定的地点去。

1853年8月8日于舒姆拉”

“本月9日，苏丹近卫军的两个步兵团和一个轻炮兵连已开向腊兹格勒。本月10日我们得到消息说，5 600名俄军已在多瑙河岸图尔图凯港附近扎营，这样一来双方军队的前哨彼此相距仅在步枪射程之内。英勇的上校伊斯肯德贝伊已带军官数人去此处。奥美尔帕沙已建立电讯联系，多瑙河任何一个地区发生的事情无论在白天和黑夜随时都能报告给司令部。

最近几天不停地下雨。虽然如此，防御工事仍在大力构筑。每天两次在黎明和黄昏鸣放礼炮。对岸完全没有这种声势。”

“埃及军队在君士坦丁堡经过防疫检查以后，就将乘船前往瓦尔纳，从那里再开往巴巴达格。准将伊塞特帕沙在那里等着他们。在多布罗加-奥瓦西地区已集结两万名鞑靼人，准备参加对俄战争。他们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俄国占领克里木时从克里木出走的老流亡者。由于陆续开来新的部队（包括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奥斯曼军队的人数正一天天增加，他们对无所事事感到厌倦，

① 博尼法斯的文章，见1853年9月5日《立宪主义者报》。——编者注

求战欲望异常迫切。恐怕近日不待上级下令就会强渡多瑙河，特别是当前俄军不时在对岸出现，使我军情绪更为激昂。几天前有一批医生，有穆斯林也有基督教徒，前往普列文、腊兹格勒、维丁和锡利斯特里亚等地去建立欧式战地医院。11日从瓦尔纳来了两位英国高级军官。他们与奥美尔帕沙作了长时间的会晤，并在几个土耳其军官的陪同下参观了工事。他们认为防御工事构筑良好，有足够数量的军火库、面包房和清水库等等。所有防御工事修筑得极为牢固。我军军纪十分严明。

1853年8月12日星期五于舒姆拉”①

“英国将军奥当奈尔于13日从君士坦丁堡来此。他与奥美尔帕沙作了两小时的谈话，第二天在总司令副官陪同下参观了工事。昨天从瓦尔纳开到三个炮兵连，另外还运来大量军火弹药。明天有一个炮兵连、两个步兵营和1000名骑兵去增援赫尔绍瓦港。在赫尔绍瓦，工兵部队正大力修复1828年被俄军破坏的工事。土耳其可以绝对信任自己的军队。

1853年8月15日星期一于舒姆拉”①

本星期四，菲茨威廉伯爵曾写信给设菲尔德的刀具工人大会，他在这封信中表示反对英勇的帕麦斯顿在议会会议闭幕时所提出的“应该信任俄皇的人格和品德”的荒诞主张。

迪斯累里先生决定本月14日在艾尔斯伯里会见他的选民。昨天的《每日新闻》刊登了一篇冗长而乏味的文章，企图驳斥该报推测迪斯累里先生要向他的选民所说的话。我以为，《每日新闻》如果能让它的老前辈伦敦《笨拙》周刊去从事这场演出，恐怕合适得多。

现在，英格兰银行⁸⁴从一月份以来第四次提高了利率。9月4日规定利率为4%。伦敦的《太阳报》对此大嚷：

① 1853年9月9日《新闻报》。——编者注

“这是又一次试图缩减国家流通手段，又一次力图阻碍国民福利的发展。”^①

另一方面，这家报纸又用这样一种设想来安慰自己，即认为英格兰银行在皮尔的 1844 年法令²¹⁹之后已丧失了它很大一部分有害的权力。

《太阳报》所担心的和它所希望的都错了。英格兰银行像其他任何银行一样，既没有权力来增加，也没有权力来减少国家的货币量。皮尔的 1844 年法令根本没有削弱它所拥有的真正有害的权力，反而加强了这种权力。

由于一般人对 1844 年银行法令理解得不正确，同时这个法令的影响在危机日益逼近的情况下不仅对英国，而且对整个商业世界都将至关重要，所以我想简单地说明一下这个法令的实质。

皮尔的 1844 年银行法令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些假定：金属货币流通是唯一正常的货币流通；货币量可以调节价格；在纯粹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如果外汇行情有利，黄金内流，货币量就要扩大，如果行情不利，黄金流失，货币量就要减少；银行券的流通应当与金属货币的流通完全一样；因此，英格兰银行地下室里的黄金储备数量的变动应当与在公众中流通的它的银行券数量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相符合；在外汇行情有利时，银行券的发行量应该增加，不利时则减少；最后，英格兰银行对流通中的它的银行券的数量实行监督。

但所有这些前提，没有一个不是完全错误和违背事实的。即使假定存在着纯粹金属货币流通，货币量也不能决定价格，正像它不能决定商业和工业交易的数量一样；相反，价格将决定流通中的货币量。外汇行情不利和黄金流失不会造成甚至纯粹金属货币流通量的

^① 1853 年 9 月 3 日《太阳报》第 19014 号。——编者注

减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影响的不是流通中的货币量,而是储备的、即作为银行存款或者以私人储藏的形式存在的货币量。另一方面,外汇行情有利以及随之而来的黄金内流所增加的也不是流通中的货币量,而是银行里储存的和私人储藏的货币量。因此,以纯粹金属货币流通的错误观念为出发点的皮尔法令,很自然地就导致在纸币流通中错误地套用这个法令。要发行银行对它所发行的银行券数量实行监督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银行发行可兑银行券,或者一般凭商业担保预付银行券,并不能使自然流通额增加或减少哪怕是一张银行券。当然,银行可以发行任何数量的银行券,只要它的顾主接受,但是,如果流通不需要,这些银行券也只能或者以存入银行的方式,或者以偿付债务的方式,或者以兑成金属货币的方式回到银行里来。另一方面,如果银行要强制减少发行数量,那么为填补流通中形成的真空所必需的数量的存款就将被提回去。所以,不论银行有怎样的权力去滥用别人的资本,它对流通中的货币量都没有任何支配权力。在苏格兰,虽然银行业在 1845 年以前实际上没有受到限制,而且从 1825 年起银行的数目大大增加,但货币流通量却减少了,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只有 1 英镑(纸币),而英格兰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是 2 英镑,尽管英格兰 5 英镑以下的整个流通是金属货币流通,而苏格兰则是纸币。

认为流通中的货币量必须与黄金储备量相符合,这种想法是十分虚妄的。如果银行地下室里的黄金储备增加,这个银行就将竭尽全力扩大它的货币流通量,但是,经验教导我们,这是徒劳无益的。英格兰银行在 1841 年至 1843 年这一时期内的黄金储备从 3 965 000 英镑增加到 11 054 000 英镑,可是它的货币流通总量却从 3 566 万英镑减少到 34 049 000 英镑。法兰西银行截至 1845 年

3月25日发行的银行券的流通量25 600万法郎,黄金储备是23 400万法郎,而到了1846年3月25日,它的流通量为249 404 000法郎,但黄金储备只有9 535 000法郎。

认为在黄金流失时国内货币流通量就要减少的假定也同样是错误的。例如目前黄金在继续外流,但300万美元又交到了造币厂,加入了国家的货币流通。

但是,最主要的错误是这样一种假定,即认为对贷款即借贷资金的需要必定和追加流通手段的需要同步,而不知道通过期票、支票、信用证券、票据交换所和其他一些同货币流通完全无关的信用形式可以进行更多的商业交易。检验银行贷款能力的最好方式是通过市场利率,而确定实际由银行进行的业务量的最有效手段是看贴现期票的周转额。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双重衡量尺度。在1845年3—9月,虚拟资本随着投机热曾经增长到最高峰,各种各样的大型企业充斥全国,利率将近2.5%,而银行券的流通量几乎没有任何变动;但是稍后在1847年时期,当利率达到4.5%,股票价格极度下跌,到处都发生信贷不足现象的时候,银行券的流通量却达到了最大数字。

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流通量截至1847年4月17日为21 152 853英镑,5月15日为19 998 227英镑,8月21日为18 943 079英镑。但是,在流通量这样减少的同时,市场利率却从7%和8%下降到5%。从1847年8月21日至10月23日,银行券的流通量从18 943 079英镑增加到21 265 188英镑,而在同一时期市场利率从5%提高到8%。到8月30日,银行券的流通量共计21 764 085英镑,而在伦巴特街支付的利息却上升到10%。现在让我们再看看另一个例子。

英 格 兰 银 行

	贴现期票	流通中的银行券
1846年9月18日 ……	12 321 816 英镑	20 922 232 英镑
1847年4月5日 ……	18 627 116 英镑	20 815 234 英镑 ^①

这就是说,1847年4月的银行贷款比1846年9月多600万英镑,但这是在流通中的银行券更少的情况下发生的。

说明了皮尔的银行法令的一般原则以后,现在让我来谈谈它实际方面的细节。这个法令假定,流通的最低必要数量是1400万英镑银行券。英格兰银行所发行的超过这个数量的全部银行券,都应该有相应的黄金储备。罗伯特·皮尔爵士自以为他发现了一个自动起作用的发行银行券的原则,能够以机械的准确性确定货币流通量,使流通量的增减完全与黄金储备的增减成比例。为了实际推行这个原则,该银行分成两个部门——发行部和银行部,前者不过是一个银行券工厂,后者才是真正的银行,它接受国家和公众的存款,支付股息,贴现期票,发放贷款并根据所有其他任何银行机构进行活动的原则办理对公众的一般业务。发行部把它所发行的、总数等于1400万英镑加银行地下室中现有黄金储备总值的银行券移交给银行部。银行部把这些银行券向公众发行。为弥补已发行的超过1400万英镑的银行券所必需的黄金储备留在发行部,其余部分则归银行部。如果黄金储备减少到不够弥补流通中的超过1400万英镑的银行券的程度,那么作为偿还银行贷款或以存款形式回到银行部的银行券便不再发行和转换,而予以注销。假如流通中的银行券有2000万英镑,而黄金储备为700万英镑,那么,只要再有100万英镑黄金外流,

① 1847年5月8日《经济学家》第193期。——编者注

则全部黄金储备均为发行部所必需，一英镑金币也不会留在银行部。

从这里每个人都会明白，这一整套算计，一方面是虚妄的，另一方面是极为有害的。

可以拿英格兰银行在上星期五的“公报”^①上发表的报告作一个例子。在报告的“发行部”一栏中可以看到：流通中的银行券为30 531 650英镑，或者说是1 400万英镑 + 16 531 650英镑——后一个数字相当于上星期的黄金储备数字。但是再看“银行部”一栏，可以在资产项下看到有7 755 345英镑的银行券。这是总数30 531 650英镑中没有被公众接受的部分。可见，自动起作用的原则所管的只限于30 531 650英镑的银行券从发行部移交给银行部这一件事。但 these 银行券也就停留在那里。而银行部只要一与公众接触，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的便不是皮尔法令，而是业务的需求了。因此，自动起作用的原则的影响不会超出银行地下室的范围。

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由于它的特殊地位，有时不仅对英国贸易，而且对世界贸易发生实际的影响。在普遍信贷不足的时刻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这样的时刻，如果根据皮尔法令，随着黄金外流相应地提高最低利率并拒绝贷款，银行就可以使公债券贬值，使一切商品的价格降低，并在极大程度上加重商业危机的破坏性。为了阻止黄金外流并改变汇率，银行就可能使任何商业停滞变为金融风险。英格兰银行在1847年就曾这样做过，而这是被皮尔法令逼迫着做的。

可是这还不是全部。在任何银行企业中，最重的负债并不是流

^① 见1853年9月3日《经济学家》第523期。“公报”即“银行家公报”，《经济学家》的一个固定栏目。——编者注

通中的银行券数量,而是作为存款的银行券和金属货币数量。例如荷兰的银行,据安德森先生在下院的一个委员会上说,在1845年以前有存款3 000万英镑,而在流通中的只有300万英镑。

亚·贝林先生说:“在历次商业危机时期,例如在1825年危机时期,最可怕的不是银行券持有者的兑款要求,而是存款人的提款要求。”

现在,由于皮尔法令规定了调节为兑换银行券所需的黄金储备的数量,银行经理们便有充分的可能随心所欲地处置存款了。不仅如此。上面我已经说过,正是这个法令所作的规定,银行部可能被迫停止兑付存款和股息,而同时某种数量的黄金储备却可以存放在发行部的地下室里。在1847年就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当时,只是由于政府进行干预,负责于1847年10月25日使皮尔法令暂停生效,银行部才免遭破产,而在这同时,发行部却拥有6 100万英镑的黄金储备。

所以,实行皮尔法令的后果,就是英格兰银行在1847年危机期间13次改变了利率,而在1825年危机时期只改变了两次;其次,就是这个法令在危机最深的时候引起了一系列的金融恐慌(在1847年4月和10月);最后就是:如果不是使法令本身停止生效,银行部就只得被迫停业。因此,皮尔法令将加深日益逼近的危机的灾难性和严重性,这是毫无疑问的。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53年
9月7—9日

载于1853年9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81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卡·马克思

政治动态。——欧洲缺粮²²⁰

1853年9月13日星期二于伦敦

最近一号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公布了克拉伦登勋爵给汉·西摩尔爵士的一封电报，作为对涅谢尔罗德伯爵6月20日的照会的答复。发电日期注明是7月16日。这封电报只不过是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的答复的“复制本”^①。在上星期六的《先驱》上有一篇通讯，作者以无所顾忌的方式对阿伯丁和帕麦斯顿两位勋爵之间的“对抗”发表了以下的看法。

“阿伯丁勋爵从来都不能理解帕麦斯顿勋爵的假惺惺姿态；他看不到，多亏采取了这种假惺惺的姿态，帕麦斯顿勋爵才能够总是平平安安地执行亲俄政策，甚至比阿伯丁勋爵本人执行得更好……帕麦斯顿勋爵用和解的假面具掩盖他的不顾羞耻……阿伯丁勋爵则和帕麦斯顿勋爵相反，他公开地表明自己的信念……帕麦斯顿勋爵懂得大谈干涉而实际上不干涉的好处，而阿伯丁勋爵则不懂得这种好处……阿伯丁勋爵由于和统治阶级极为亲近，知道如何谋取席位，如何买到选票，他不把不列颠宪法看作人类的种种法规中最完善的法规；阿伯丁勋爵认为，欧洲大陆的居民并不比大不列颠的居民更和善、更诚实，

^① 见本卷第227—234页。——编者注

所以他不准备敦促大陆各国政府废除家长式专制制度以实行统治阶级的自治……阿伯丁勋爵知道，大不列颠是以征服其他民族为基础的强国，所以他鄙视那种假惺惺地对进行斗争的民族表示同情的对外政策。阿伯丁勋爵看不出，曾经征服和掠夺印度、而且现在还为了印度本身的福利而压迫着印度的英国，有什么理由要痛恨沙皇尼古拉，后者对俄国来说是一个好的专制君主，他完全是为了波兰本身的福利而压迫着波兰。阿伯丁勋爵看不出，曾经多次扼杀了爱尔兰起义的英国有什么理由要极端痛恨压迫匈牙利的奥地利；同时，由于他知道英国强迫爱尔兰接受异教，他很能理解教皇^①想把红衣主教怀斯曼安置在威斯敏斯特的迫切愿望。他知道我们进行过卡弗尔战争，所以他并不把为讨伐高加索人而损兵折将的尼古拉看作一个恶棍；他知道我们经常把造反的米切尔和奥勃莱恩这样的人发配到范迪门地去，所以他对于路易-拿破仑在卡宴建立苦役区并不感到震惊。每当他迫于必要给那不勒斯政府写信谈论西西里岛事务的时候，他都不会陷入狂热的自由主义，因为他没有忘记大不列颠在科孚岛上也有总督……这确实是个联合政府，既有采取亲俄行动的阿伯丁勋爵，又有以百蒙德西政策精神发表言论的帕麦斯顿勋爵，真可谓珠联璧合。”^②

为了证明我并没有过分低估瑞士的勇敢精神^③，我可以引证瑞士联邦议会给泰辛州政府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写道：

“嘉布遣会会士的问题²²¹纯粹是州的问题，因而泰辛州应当考虑怎样做对自己最好：是进行反抗并继续受奥地利的严厉措施的打击，还是向政府提出重开谈判的要求。”^②

这就意味着，瑞士联邦议会企图把它和奥地利的争端归结到单纯一州的范围中去。联邦议会最近还颁布了一项把意大利人克莱门蒂、卡索拉和格里伦佐尼驱逐出境的命令，虽然库尔的陪审团已经宣布他们无罪，承认他们并没有穿越泰辛州的边境运送武器去帮助米

① 庇护九世。——编者注

② 1853年9月10日《先驱》第181期。——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08—109页。——编者注

兰起义²⁴。

英国人给予札格纳特的援助,看来还没有完全停止。董事会在1852年5月5日曾经给印度总督发出下面一封电报:

“我们仍然认为,应当使不列颠政府完全断绝与神庙的任何联系,所以,我们全权委托您采取措施,在不继续给神庙以任何定期的资助的情况下达到这个目的;作为替代,可以赔偿方式进行结算,凡是根据过去的约定或协定(按广泛的解释)有此项权利的人,都应得到赔偿。”^①

但是,直到1853年4月11日,印度政府在这方面还什么都没有做,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政府已经花了整整一星期的时间来调查伯明翰监狱中的犯人遭到残酷虐待的事情,这种虐待已经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自杀,另一些人也企图自尽。一方面,在那里发现的与奥地利或那不勒斯的刑讯室里的任何凶残行为相比毫不逊色的暴行使我们感到震惊,另一方面,视察监狱的地方官员们对当事者的陈述百听百信而对受害者却极其冷漠的态度不能不使我们大为惊异。他们对野蛮的狱吏无比关怀,在视察之前总是预先通知他们。暴行的主犯奥斯丁中尉,就是卡莱尔在他所写的小册子《模范监狱》²²²中叫作流浪汉和罪犯的当之无愧的领袖的那号人。

铁道部门的道德问题是当前的热门话题之一。约克郡—兰开夏郡铁路管理局在它们的火车票上特别印着这样一个告白:

“本管理局对于因其本身或其职员的疏忽而发生的一切不幸事件或损失概不负任何法律责任。”^②

① 1853年9月10日《伦敦泰利斯氏周报》第70期。——编者注

② 1853年9月5日《泰晤士报》第21525号。——编者注

同时，伯明翰—什鲁斯伯里铁路管理局在星期六以欺骗股东罪在副大法官法庭受审。西方大铁路和西北铁路都想并吞上述的伯明翰—什鲁斯伯里铁路。这条铁路的大多数股东主张同西北铁路合并，而管理局的委员们则主张加入西方大铁路，于是他们就决定利用委托给他们作公司结算之用的一部分股票来取得虚假的票数。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把股票转到一些名义上的股票持有者的名下。这样做有时看来并没有得到名字被使用的当事人的同意；这些当事人有一个竟然是9岁的小孩。这些人根本无须考虑股票的价值，只须把它们再转到管理局委员们手中，同时以名义股东的资格给这些委员们开具一定数量的投票代理委托书以保证他们取得多数，好与西方大铁路合并。博学的法官已经指出，“很难设想有比这更可恶更无耻的行为，而达到预定目标的方法尤为可耻。”他作了这样一番谴责以后，就释放了被告，像通常对待资产阶级那样，而可怜的无产者如果偷了5英镑以上的钱就非被流放不可。

看一看英国的公众怎样时而对厂主老爷、时而对矿场主、时而对贩卖假药的小商人、时而又对代替了已经过时的拦路强盗的铁路主的道德，总之是对每一类资本家的道德表示愤慨，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从整个阶级来说，资本显然有它自己的特殊的道德，一种借口国家利益而规定的最高法律，至于普通的道德，那是仅仅适用于穷人的东西。

曼彻斯特派⁶⁴中的议会改革者看来陷入了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在最近一届议会会议期间揭发出来的选举舞弊行为所牵涉的几乎都是城镇选区，而且是赫尔、利物浦、剑桥和坎特伯雷这样的大城市。自由派的选举事务经纪人柯波克先生一时坦率，竟承认了“圣奥尔本斯怎样，其余所有的城镇选区也就怎样”。现在，政治寡头打算

利用这些被揭发的事件来实行一种削弱城镇选区而加强各郡的改革。而曼彻斯特派的改革者并不是要普遍扩大选举权,他们只不过要在城镇选区扩大选举权,如今面对着这样一个主张,他们当然哑口无言了。他们的机关报《每日新闻》正竭力企图摆脱这种困境,看样子怪可怜的。

1846年1月14日英格兰银行的利率曾提高到3.5%,1846年1月21日提高到4%,直到1847年4月才达到5%。但是,大家知道,在1847年4月的后三个星期中,几乎一切信贷业务都停顿了。1853年英格兰银行的利率提高得快得多。它在1852年4月24日为2%,到1853年1月8日就提高到2.5%,同月22日达到了3%,到6月4日达到了3.5%,9月1日达到了4%,而现在全城到处谣传很快就要达到5%。1846年11月,小麦平均价格是每夸特56先令9便士;1853年8月后两个星期已涨到65—66先令。大约在去年这个时候,英格兰银行

地下室的储备是	21 852 000 英镑
而现在仅有	16 500 068 英镑

差额

5 351 932 英镑^①

上上星期黄金储备减少208 875英镑,上星期又减少462 850英镑。这种情况马上对证券交易所的牌价发生了影响,每种证券都下跌了。在上星期三《泰晤士报》的金融评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尽管证券市场不景气,国库票继续保持2厘的贴现率外加1厘奖金,但现在有一种印象是:财政大臣为了保持国库票的价格,已安排由政府出钱加以收

^① 1853年9月3日《经济学家》第523期。——编者注

购,同时抛售由储蓄银行担负损失的三厘证券,因为现在手头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实现上述目的的其他证券。”^①

这真不愧是格莱斯顿先生的杰作! 低价抛售统一公债,高价收购国库票,宁愿失掉三厘证券的一半收入,把它们换成利息略高于一厘五的国库票。

外贸收支不利,黄金储备流失,但是不列颠的出口却空前增加,到年底甚至将超过 1852 年的出口 1 600 万英镑,这两方面是怎么协调一致的呢?

“因为我国在出口时是给全世界信贷,进口时支付现金,所以大大扩大我国的贸易有一天必然给我国的收支差额造成相当不利的情况。但是,当偿付我国出口的信贷期满,贷款汇给我们的时候,我国外贸收支的差额都会返回。”^②

这是《经济学家》的话。按照这种理论,如果 1854 年的出口再超过 1853 年,那么外贸收支一定会继续对英国不利,于是商业危机就将作为唯一的调节手段了。《经济学家》认为谈不上会发生 1847 年那样的灾难,因为目前没有把很大一部分资本像当时那样固定于铁路等部门。它忘记资本正在投入制造厂、机器设备、轮船等部门。另一方面,《观察家报》则悲叹

“不该愚蠢地投资于外国铁路及其他很成问题和不能令人相信的企业”^③。

《经济学家》认为,业已扩大的贸易活动,在欧洲范围内,由于粮

① 1853 年 9 月 7 日《泰晤士报》第 21527 号。——编者注

② 1853 年 9 月 10 日《经济学家》第 524 期。——编者注

③ 1853 年 9 月 11 日《观察家报》。——编者注

价很高,会得到有益的遏制,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是稳定的。与此同时,《泰晤士报》则肯定地说,纽约金融市场上银根的吃紧将导致美国贸易活动以有益的遏制。

《先驱》则大嚷:“我们不应该指望能从合众国得到以前那么多的订货。”^①

现在只剩下澳大利亚了。《观察家报》写道:

“出口的扩大已经达到欠考虑的地步。关于目前已运到伦敦准备发往南方殖民地的 74 000 吨海运货物,我们从阿德莱德、墨尔本以及其他地方得来的不利的消息正在得到证实。不能否认,现时的前景并不令人鼓舞。”^②

至于中国市场,所有的报告书都一致指出,那里急于出售,不愿买进,金银都被窖藏起来;而且,在这个巨大帝国的革命运动实现自己的目标以前,这种状况决不会有任何改变。

那么国内市场怎样呢?

“在曼彻斯特及其近郊,大批机械织工仿效斯托克波特的榜样举行了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10%……工厂的工人们大概不到冬末就会发现,问题不是同意或不同意增加 10%,而是工厂主是否同意在保持现在的工资水平的条件下重新开工的问题。”^③

《纪事晨报》就这样毫不含糊地暗示国内市场即将缩小。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报道过关于大规模扩建旧工厂和空前迅速地兴建新工厂的情况。我也曾向你们报道过某些新建成的工厂,这些工厂现在可以说已经形成一个工业城市了。我曾指出,以前从来

① 1853 年 9 月 3 日《先驱》第 180 期。——编者注

② 1853 年 9 月 4 日《观察家报》。——编者注

③ 1853 年 9 月 7 日《纪事晨报》第 27053 号。——编者注

没有过这么多的、在繁荣时期积累起来的游资直接投入工业生产^①。现在,要把这些事实同国内外市场上货物过剩的征兆这两个方面对照起来看,同时不要忘记,不利的外汇行情是使国外市场上的出口商品过剩的最可靠手段。

但是,推动巨大的商业和工业危机(这种危机的因素早就在积累)爆发的首先将是歉收。对于其他各种产品来说,涨价使本身需求下降;但是,粮价上涨却只能使对粮食的需求更大,并且使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下跌。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开化的野蛮人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考虑去获取别的东西;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普遍歉收本身就会导致内外市场普遍缩小。欧洲南部——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莱茵普鲁士今年的收成至少也像 1846—1847 年那样不好;在欧洲西北部和东北部也根本不会有什么好收成。至于英国的情况,八天前的《马克巷快报》——伦敦粮食交易所的官方机关报有这么一段话:

“没有疑问,今年联合王国的小麦收获量将是许多年来最少的。王国几乎所有地区的平均收成都将大大低于往年;此外还要看到,今年的播种面积由于播种期间天气不好而比往年至少要少 $\frac{1}{4}$ 。”^②

这种情况是无法靠所谓自由贸易能一举消除商业紊乱、工业生产过剩和歉收这种幻想来改善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① 《贫困和自由贸易。——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和《政局展望。——商业繁荣。——饿死人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446—453 页和第 596—606 页。——编者注

② 1853 年 9 月 5 日《马克巷快报和农业报》第 1132 号。——编者注

上述那家《马克巷快报》还指出，“农场主还不能够接受在自由贸易制度下会缺粮食的看法。因此只有不多的人想到要大量储备。如果今后我们被迫大量进口粮食，我们恐怕要付出很高的价钱。”

昨天的《马克巷快报》又补充说：

“地里还有这么多的庄稼尚未收割，所以今后几周的天气情况会对贸易发生巨大影响。暴露在地里的谷物的质量已经受到近日连续的阴雨的损害，如果潮湿的天气再继续一个时候，就可能造成很大的损失……最后的收获量可能比一两周前所能想象的还糟……我们最近几天得到的关于马铃薯情况的消息，比前些日子更不好……尽管上星期从国外得到大量供应(88 883 夸特)，但对粮食价格的影响很小，每夸特粮价与最高点相比降低不到 1—2 先令……波罗的海各国的收成估计也普遍不好……根据最近的消息，小麦的离岸价格在但泽是 60 先令，在柯尼斯堡是 56 先令 3 便士，在斯德丁是 54 先令，在罗斯托克是 58 先令。”^①

缺粮的后果也像 1847 年那样，已经开始影响到政治方面。在那不勒斯，市政当局没有经费雇用工人为公共工程做工，国库里没有钱支付官吏的薪俸。在教皇国的托伦蒂诺、特尔尼、拉韦纳和特拉斯泰韦雷，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抢粮风潮，前此不久的逮捕、奥地利人的入侵和棒打脚底刑罚的威胁都未能平息这些风潮。在伦巴第，施特拉索尔多伯爵虽然实行了加税办法，要所有的直接税纳税人到今年 9 月 20 日至 10 月 10 日每一弗洛林金币多缴 6 个半克劳泽铜币(包括所得税和薪俸税)，但是他也防止不了缺粮和工业停滞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在奥地利，又想方设法发行了新的公债，发行时像往常一样地宣称，国家需要钱完全是为了裁减军队，而这一情况正说明了奥地利陷于全面的困难境地。法国政府则伪造关于收成的报告，在巴黎实

^① 1853 年 9 月 12 日《马克巷快报和农业报》第 1133 号。——编者注

行人为了的粮食定价,在各个市场上大量收购粮食,从这里可以看出它是如何焦急。外省不满意波拿巴拿它们的粮食来养活巴黎;资产阶级不满意波拿巴假借无产者的名义来干预商业;无产者不满意波拿巴在农民和工人行将断炊的时候给士兵白面包而不是黑面包吃;最后,士兵们也不满意法国在东方问题上采取卑躬屈膝的反民族的态度。在比利时,已经爆发了几次抢粮风潮,这是对科堡王室为奥地利公主^①举行的豪华而荒唐的庆典的回答。在普鲁士,政府是那么恐慌,表面上不得不逮捕了几个粮商,另一些粮商则被警察总监传去“要求”他们按“公道”价格卖粮食。

最后,我还要重申一下我的看法:无论是煽动家的激昂慷慨的演说,还是外交家的愚蠢的废话,都不会造成危机,只有日益迫近的经济灾难和社会动荡才是欧洲革命的可靠预兆。从1849年以来,商业和工业的繁荣为反革命铺了一张舒适的卧榻,它躺在上面一直高枕无忧。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9月
13日

载于1853年9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86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① 玛丽-罕丽达。——编者注

卡·马克思

*西方列强和土耳其。
——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
印度的铁路建设²²³

1853年9月20日星期二于伦敦

我在7月19日的通讯中说过：

“西方列强起初由于害怕俄国侵略而鼓励苏丹①反抗沙皇，而最后却由于害怕一场大战会引起一次大革命而强迫苏丹让步。”②

现在有人正打算利用联合舰队的力量来为俄国对付土耳其。英法舰队即使开进达达尼尔海峡，那也不是为了要炮轰塞瓦斯托波尔，而是为了要制服那些能够阻止苏丹无条件接受维也纳照会¹⁸⁴的穆斯林。

①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39页。——编者注

戴·乌尔卡尔特说：“9月13日，四位外交大臣^①平心静气地在唐宁街开了会，决定向君士坦丁堡发出命令，要强迫土耳其政府收回欧洲会议先前已经接受的修改意见。这还不够，他们还命令舰队开往波斯普鲁斯海峡，准备在苏丹顶不住他的人民的愤怒情绪时支援苏丹对付他的臣民。这仍然不够，他们还向奥美尔帕沙发出命令，不准他在本国国君的领地上从这一个省份向另一个省份走动。

他们从而预料到，他们发出的命令有可能引起叛乱，所以他们也准备好了镇压叛乱所必需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联军舰队。”^②

英国公众是从星期日的《辩论日报》上知道这个消息的。据《辩论日报》报道，里夫先生于本月13日带着一封给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的信函从伦敦动身，14日早晨到了巴黎，他把所携带的指示的主要内容通知法国政府之后，当天晚上就离开了那里。这项指示命令英国大使要求土耳其政府完全同意维也纳建议，放弃它8月19日所提的修改意见；要向土耳其政府发出威胁，说如果由于它拒绝让步而发生战争，四强国就会撤回对它的支持；此外，要表示愿意用英法舰队来帮助它镇压君士坦丁堡因土耳其政府服从维也纳照会而可能爆发的起义，以及用来对付奥美尔帕沙，假若他敢于违背土耳其政府的命令的话。在接到星期日的《辩论日报》以前我们就已经知道，维也纳会议在得知俄皇^③的否定答复以后，便建议苏丹收回自己的话，签署他从前拒绝签署的照会，并且满足于下面的保证：会议将对照会作出苏丹本人所能接受的解释。《泰晤士报》避而不谈

① 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以及以前担任过外交大臣的阿伯丁、帕麦斯顿和罗素。——编者注

② 戴·乌尔卡尔特《政治罪犯》，见1853年9月20日《晨报》第19421号。——编者注

③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辩论日报》揭发出来的这些丢脸的事情。《纪事晨报》、《晨邮报》和所有伦敦的政府报纸也都是这样。与此同时，《晨邮报》却斥责君士坦丁堡暴民的狂热。《纪事晨报》用浪漫的笔调描绘在欧洲土耳其怎样到处都是凶暴残忍和毫无纪律的亚洲匪帮，奥美尔帕沙的军队怎样靠这些匪帮来补充，以此来煽动它的头脑迟钝的读者；英勇的《地球报》则逐日从投和平之机的曼彻斯特学派⁶⁴的报纸上精心摘录一些文章来发表。这样，英国的各个高贵的阶级就会被训练成熟，到必要的时候能够去“铲除异教”，并且同哥尔查科夫公爵一起高呼“沙皇万岁！俄罗斯人的神万岁！”了。

今天的《泰晤士报》有一个发现：“土耳其问题已纯粹成为一个词句问题。”从这个前提应得出的结论就是，仅仅为了词句而不惜损害世界和平的苏丹，应该由头脑比较清醒的帕麦斯顿们和阿伯丁们用强制的手段来开导开导。《泰晤士报》告诉我们，沙皇向苏丹提出了不公正的要求，苏丹拒绝了；于是沙皇就侵占了多瑙河两公国；英国和法国就把自己的舰队派到贝济克湾去，这两个强国的代表在维也纳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代表举行了会晤。

他们在维也纳会晤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土耳其的利益，——《泰晤士报》回答说。

“他们不仅没有任何强迫奥斯曼政府的愿望，而且也没有如此行事的任何理由。”^①

可见，如果说四强国现在有了强迫奥斯曼政府的愿望，“那仅仅是由于现在有了如此行事”的一个理由。如果说维也纳会议以及帕

^① 1853年9月20日《泰晤士报》第21538号。——编者注

麦斯顿和阿伯丁的干涉的唯一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制造这样一个理由,如果说他们对俄国仅仅虚张声势地反抗一下,以便有借口强迫土耳其服从俄国的要求,这种假设想必不算是错误吧?

《泰晤士报》继续写道:“俄国的要求被其他的强国认为是不公正的,是和苏丹的主权不相容的”,因此,四大强国才拟定了一个照会,要苏丹把这个照会送交沙皇,这个照会答应沙皇的一切要求,甚至有些超过。

《泰晤士报》写道:“这份文件的措词是容易引起误解的,但有两点十分清楚:第一,四强国愿意维护土耳其政府的领土权和行政权;第二,一旦发生冲突它们将受这种愿望的约束。”^①

既然苏丹可以感到他将得到四强国的善良“愿望”的支持,四强国在一旦发生冲突时将受这种含而不露的“善良愿望”的约束,那么他有什么理由不签署这份损害他的主权并把对他的1200万臣民的保护权拱手让给俄国专制君主的照会呢?苏丹已经有幸体会到,四强国认为自己既不受国际法的约束,也不受那些明文规定一旦苏丹同俄国冲突他们必须保卫苏丹的条约的约束,那么一旦这个赋予俄国明确的权利而赋予土耳其“含而不露的愿望”的照会引起冲突,苏丹有什么理由不依靠四强国的无畏精神呢?

《泰晤士报》说:“我们就举个极端的情况来说吧。假定在无条件地接受了最初的维也纳照会之后,沙皇利用了一般人所设想的这份照会给他的那些机会。”^①

这时会怎样呢?

^① 1853年9月20日《泰晤士报》第21538号。——编者注

“苏丹就会提出抗议，于是争执就会因执行 1853 年的协定而起。”^①

好像执行 1840 年公约⁷和 1841 年公约¹²²以及巴尔塔利曼尼条约¹²¹就没有引起过任何争执似的！好像那种被克拉伦登勋爵本人称之为“海盗行为”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就未曾引起任何争执似的！

《泰晤士报》说：“含糊只会使俄皇产生误解。”^①

完全像 1841 年的条约使他“产生误解”那样，他援引这项条约，不许联合舰队开进达达尼尔海峡，同时自己却进入两公国。

但是，苏丹的态度十分强硬。他拒绝同意照会，因为照会只是以出卖土耳其给俄国的行为来表达其对土耳其的善良愿望。苏丹建议对这项照会作某些修改。《泰晤士报》说，“四强国接受土耳其提出的这些修改意见，这就表明它们认为这些修改是和它们自己的建议一致的。”但是，由于俄皇持相反的意见，由于《泰晤士报》认为可以完全肯定沙皇“在这次冲突中的行为**丝毫不值得考虑**”，《泰晤士报》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俄国不同意土耳其提出的合理的条件，那么，土耳其就必须同意俄国提出的不合理的条件，而且

“一个还十分无力而每逢外侵或内乱就不得不寻求欧洲保护的国家，至少要为自己的贫弱付出这样的代价，即它要在保护国负担最轻的条件下接受它生存所必需的援助”^①。

因为土耳其显然需要四强国帮助它来反对俄国，所以四强国自然要站在俄国一边对付土耳其；既然土耳其根据各项条约的规定要向四大强国请求援助，那它就必须“为自己的贫弱付出代价”。

^① 1853 年 9 月 20 日《泰晤士报》第 21538 号。——编者注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根据英国法律严厉惩办四个卖国贼（阿伯丁、克拉伦登、帕麦斯顿和罗素），或者是让俄国沙皇统治全世界。”^①

这是戴·乌尔卡尔特在《晨报》上发表的言论，这一类慷慨陈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当由谁来审判四个卖国贼呢？议会。这个议会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是由证券交易人、工业巨头和贵族的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所主张的对外政策是什么政策呢？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和平的政策。而谁来贯彻他们的对外政策思想呢？也就是头脑简单的《晨报》认为要由他们当作卖国贼来加以审讯的那四个人。不过至少有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即政治寡头在政府中所代表的证券交易人和投和平之机的资产阶级正在把欧洲出卖给俄国，因此，为了反抗沙皇的侵略，首先必须推翻这些卑鄙无耻、奴颜婢膝和声名狼藉的金牛犊¹⁶⁸崇拜者的可耻的统治。

奥斯曼帝国政府在维也纳照会送到君士坦丁堡之后，马上就征召了8万名列季弗^②入伍。根据9月5日从君士坦丁堡发来的电讯，土耳其内阁在总理大臣^③官邸召开了会议之后，决定不顾战争危险，坚持自己最近的照会。穆斯林居民的狂热达到了极点。苏丹在检阅埃及部队的时候受到了震耳欲聋的欢呼，而在检阅完毕以后，人群把他从马背上举起来，像庆祝凯旋似地抬着他走过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他重新给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国君^④发出了命令，要他们维持两公国的安定。路西德帕沙就君士坦丁堡的俄侨被宣判犯有进

① 戴·乌尔卡尔特《政治罪犯》，见1853年9月20日《晨报》第19421号。——编者注

② 奥斯曼帝国的后备兵。——编者注

③ 穆斯塔法帕沙。——编者注

④ 格·吉卡和巴·施梯尔贝。——编者注

行反土耳其政府的阴谋活动罪行一事，向俄国领事提出了警告。据君士坦丁堡的一家报纸报道，君士坦丁堡的一个犹太人团体献给苏丹100万皮阿斯特，以弥补帝国的备战开支。据报道，士麦那的犹太人也作了类似的决定。从登载在维也纳《新闻报》的一篇通讯中我们知道，在加拉茨逮捕了几名俄国大贵族，因为他们与奥美尔帕沙秘密通信，极其详尽地把俄国部队在两公国的情况告诉了奥美尔帕沙。还发现了奥美尔帕沙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里建议这些俄国大贵族尽量多征募些外国人担任军职。

本月13日，缅施科夫公爵在他的秘书陪同下来到维也纳，他带来了尼古拉皇帝致欧洲列强的一项新的声明，这项声明说明了他拒绝土耳其的修改意见的理由。俄皇本人也将在本月21日由涅谢尔罗德伯爵和迈恩多夫男爵陪同到奥尔米茨来。他通过利文男爵邀请普鲁士国王^①参加奥尔米茨会议，但普鲁士国王拒绝出席，理由是在目前局势下他这样做会引起太多的喧嚷。俄国的一个数达3万人的兵团目前已在保加利亚边境上的克拉约瓦集结待命。在此以前，俄罗斯帝国境内只有8个军需站。现在在布加勒斯特建立了第九个常设的军需站，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说明俄国人根本不想撤出两公国。

9月15日，英格兰银行⁸⁴把利率提高到4.5%。今天的《泰晤士报》刊登的一篇金融评论告诉我们，“这项措施博得了普遍的满意”。但是这篇文章又说：

“下午2时左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实际上几乎完全停止了，而不久之后，当宣布利率提高到4.5%时，证券对现金的行情就跌到95%，对10月13日到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期的证券跌到 95.125—95.25%。普遍的意见是,如果利率不是提高到 4.5%,而是提高到 5%,那么,市场大概还不会受到这样不好的影响,因为这时公众将认为类似的措施今后已不可能再有了……在铁路股票市场上,在银行董事会会议结束后出现了暴跌,而其他各种股票的行情在收盘时也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中。”^①

《泰晤士报》上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向银行的经理祝贺,说他们遵循了皮尔法令²¹⁹的政策。

“经理们根据黄金流失使流通中的货币量减少的情况,要求提高剩余黄金的卖价,这样一来就保证了罗·皮尔爵士关于英格兰银行特许法令的自由实行,而只有得到自由实行,才能证明这项法令的正确性,而在 1847 年,由于受到经理们不明智的行为的阻挠,这一点就没有能够做到。”^①

在以前的一篇通讯中我曾经说明,经理们在 1847 年的不明智行为恰巧在于他们过分奉行皮尔法令,而政府为了挽救银行部不致停止支付,不得不中止了这项法令的“自由实行”^②。在《地球报》上我们看到:

“造成我国现时繁荣局面的那些原因,很有可能不会继续起同样的作用了。消极的后果在曼彻斯特已经表现出来,那里的一些大公司已被迫限制自己的产量……证券交易所的所有部门都继续处于十分萧条的境地。铁路股票市场笼罩着一片惊惶不安气氛……黄金继续向大陆外流,最近一两天内差不多有 50 万将要由轮船运往圣彼得堡……它(银行)节约自己的金属货币储备的一个目的大概是它想给财政大臣为数七八百万的援助,因为财政大臣要给南海公司⁵⁶的股东以及其他持异议者分配盈利,需要这一笔钱。”^③

① 1853 年 9 月 16 日《泰晤士报》第 21535 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346 页。——编者注

③ 1853 年 9 月 13 日《地球和旅行家》第 17215 号。——编者注

本月 14 日《晨邮报》从曼彻斯特报道：

“布匹和棉纱市场呆滞，各种工业品的价格都很难保持住先前的水平。所有国外市场差不多都没有需求，国内面临财政困难，这两个主要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局面，它和到处传播的繁荣消息相对比是极不正常的。”^①

同一家报纸在本月 15 日用下面的一段话结束了它的一篇论述日益迫近的危机的因素越积越多的社论：

“我们要警告商界人士：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在企业的观念和行为中都要经常仔细小心的阶段。此外，在我们看来，我们的财政状况充满着比我们的商业状况更为严重和更难于避免的危险。”^②

从上面举出的《地球报》和《晨邮报》的互为补充的言论中应该得出一个结论：一方面，需求不断减少，另一方面，供应却有剩余。工厂主势必要依靠他们和工人之间的争吵来掩盖自己的退却。一位工商业问题采访员从曼彻斯特写来一篇通讯，发表在昨天的《纪事晨报》上，通讯说：

“工厂主们已开始对达成协议一事抱着十分冷淡的态度，因为他们确信，很多工厂，甚至所有的工厂，在工资问题得到解决以前，都将不得不停工。最近几日来，在各个工厂区的不同地方，都就这个问题召开了雇主的会议。很明显，工人们提出的过分要求以及他们激烈地硬要对方接受自己的要求的企图，正迫使工厂主普遍联合起来以求自卫。”^③

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金融评论中我们看到：

① 1853 年 9 月 14 日《晨邮报》第 24876 号。——编者注

② 1853 年 9 月 15 日《晨邮报》第 24877 号。——编者注

③ 马克思此处所引的资料来源未能查明，而这期间的《纪事晨报》上也没有与此相关的内容。——编者注

“厂主正在各个工厂区组织自卫同盟：仅仅在最近几天内，在阿什顿、斯泰利布里奇、海德和格洛瑟普，差不多就有 100 家公司在建立这种同盟的协定上签了字。在普雷斯顿，工厂主已经签署一项重大的协议：以关闭工厂三个月的办法对工人进行反抗。”①

根据从马赛发来的电讯，小麦价格每百升又提高 2 法郎 25 生丁。②

《通报》所宣布的提高国库债券利息的决定，在交易所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印象，普遍认为这项措施是政府缺钱的迹象。人们在谈论政府将不得不负债的问题。财政大臣③已向许多土地所有者发出了通告，要求他们提前半年缴税，以表示感谢现政府曾经施予他们的大恩德，另外还感谢政府提高了他们的地产价格。《观察家报》指出：

“这是一种预示不良结果的先兆。”④

我在以前的一篇通讯中曾经谈过铁路对于印度的重大意义⑤。现在我认为有必要报道一些各报发表的有关曾经筹划的铁路网的进展情况和发展前景的最新消息。印度第一条铁路是现在已经通车的孟买—塔纳线。另一条铁路线将从加尔各答铺设到恒河畔的鲁斯内海尔，全长 180 英里，然后沿着恒河右岸通到巴特那、贝拿勒斯和安拉阿巴德，再从安拉阿巴德经过恒河到阿格拉，从这里再通到德里。这样，这条铁路线将全长 1 100 英里。预定要在索安河和图诺拿河

① 1853 年 9 月 19 日《泰晤士报》第 21537 号。——编者注

② 1853 年 9 月 17 日《经济学家》第 525 期。——编者注

③ 让·马·比诺。——编者注

④ 1853 年 9 月 19 日《观察家报》。——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 247—249 页。——编者注

上设轮渡,以便最后把加尔各答这条线从德里通到拉合尔。最近就要开始建筑从马德拉斯向西直伸 70 英里的铁路线,然后再分两条支线,一条沿着高止山脉,以卡利卡特为终点,另一条经过贝拉里和普纳到孟买。这个铁路网框架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孟买—巴罗达—印度中部铁路,这条铁路现在已经由董事会批准进行初步勘测。这条铁路将从孟买经过巴罗达到阿格拉,在这里同加尔各答—德里铁路干线接轨。这样一来,印度西部的首府和全印度斯坦同欧洲交往的最好港口孟买,一方面同加尔各答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同旁遮普和西北各省相连接。这个计划的发起人还想铺设一些支线通往内地的各个大产棉区。与此同时,正在采取措施发展整个印度半岛的电报网。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9 月
19—20 日

载于 1853 年 10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8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西方列强和土耳其。——
经济危机的征兆²²⁴

1853年9月23日星期五于伦敦

9月20日的《地球报》否认《辩论日报》上关于里夫先生的使命的报道,说它是不确实的,《泰晤士报》则在星期三以《傻子才相信》为标题转载了《地球报》的文章,指责法国报纸散布谣言。但是,我在上次写的那篇通讯里所分析的《泰晤士报》社论^①不是完全证实了《辩论日报》的报道吗?难道巴黎的《通报》上刊出了什么辟谣吗?在《地球报》说《辩论日报》造谣的同一天,《国民议会报》不是又一次说了下面这样的话吗?——

“雷德克利夫勋爵应当告诉苏丹,如果他不收回他所提出的修改意见,英国舰队就要开进达达尼尔海峡,法国舰队也会紧跟着英国舰队开来。”^②

《泰晤士报》在转载《地球报》的辟谣文章的同一天,不是直截了

① 见本卷第358—361页。——编者注

② 引自1853年9月22日《晨报》第19423号。——编者注

当地讲过下面这样的话吗？——

“英国和法国只能根据同盟国四强国提出的并且已经被俄国接受的条件来干涉俄土冲突，不管这些条件高傲的土耳其是否接受得了。”①

《晨邮报》不是在伦敦能看到《辩论日报》以前就向我们作了如下的报道吗？——

“列强代表在接到俄皇②对维也纳照会的修改意见的答复以后，立即举行了会议，并在本月4日派信使去君士坦丁堡，给土耳其帝国国务会议带去了一些信息，其目的是希望能劝说土耳其政府接受维也纳照会。”③

最后，我们还从今天的一份晨报上看到：

“里夫先生已被派去君士坦丁堡；他随身携带了克拉伦登勋爵给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的信函；里夫与外交部关系极为密切，他已成为唐宁街和印刷所广场④之间的联络渠道。”⑤

事实上，自从法国报纸最近揭露了一些事情以来，东方问题又一次来了一个完全新的转折，情况的变化可能违背英国内阁的一切打算和愿望，推翻它的那些可耻的决定。

奥地利已经拒绝了和它的假同盟国共同行动。维也纳会议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是开不起来了。俄国感到假面具已没有用处，因此把它撕了下来，于是英国内阁就从它的最后一个防御工事里被赶出

① 1853年9月21日《泰晤士报》第21539号。——编者注

②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③ 1853年9月19日《晨邮报》第24881号。——编者注

④ 唐宁街10号是英国首相官邸，印刷所广场是《泰晤士报》的所在地。——编者注

⑤ 1853年9月23日《晨报》第19424号。——编者注

来了。

《利物浦信使报》公正地指出：“阿伯丁勋爵建议苏丹①采取露骨而无耻的欺骗手段；维也纳会议的参加国在照会里面作一个沉默的保留；苏丹要在非正常的意义上理解这个照会（因为照会的条文是清楚而明确的）；在俄皇坚决拒绝同意苏丹提出的修改意见的情况下，列强要准备好像这些修改意见已被接受那样行事。”②

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建议维也纳会议给土耳其政府送去一份同样虚伪的解释性照会，但是布奥尔伯爵反对这个建议，他说这个建议

“对土耳其政府友好得过分了；共同行动的时机已经过去了，现在每个强国可以各行其是”。

这样一来，英国内阁就失去利用欧洲最高裁判所的共同仲裁来作掩护的可能了——这个最高裁判所是一个合股公司，它是由奥地利大臣用魔法变出来的，现在他念了一句咒语就又不见了。当初，俄国军队越过普鲁特河以前，奥地利根本不需要开任何会议。在俄国进抵多瑙河以后，奥地利也就不再需要开什么会议，至少不需要在先前的条件下召开会议了。另一方面，涅谢尔罗德伯爵也发表了两个通告，由于这两个通告，再想用那种含而不露的“善良愿望”为最初的维也纳照会作辩护，或者不按其字面的意思来解释照会，已根本不可能了。

所有支持政府的报纸都曾大叫大嚷地说：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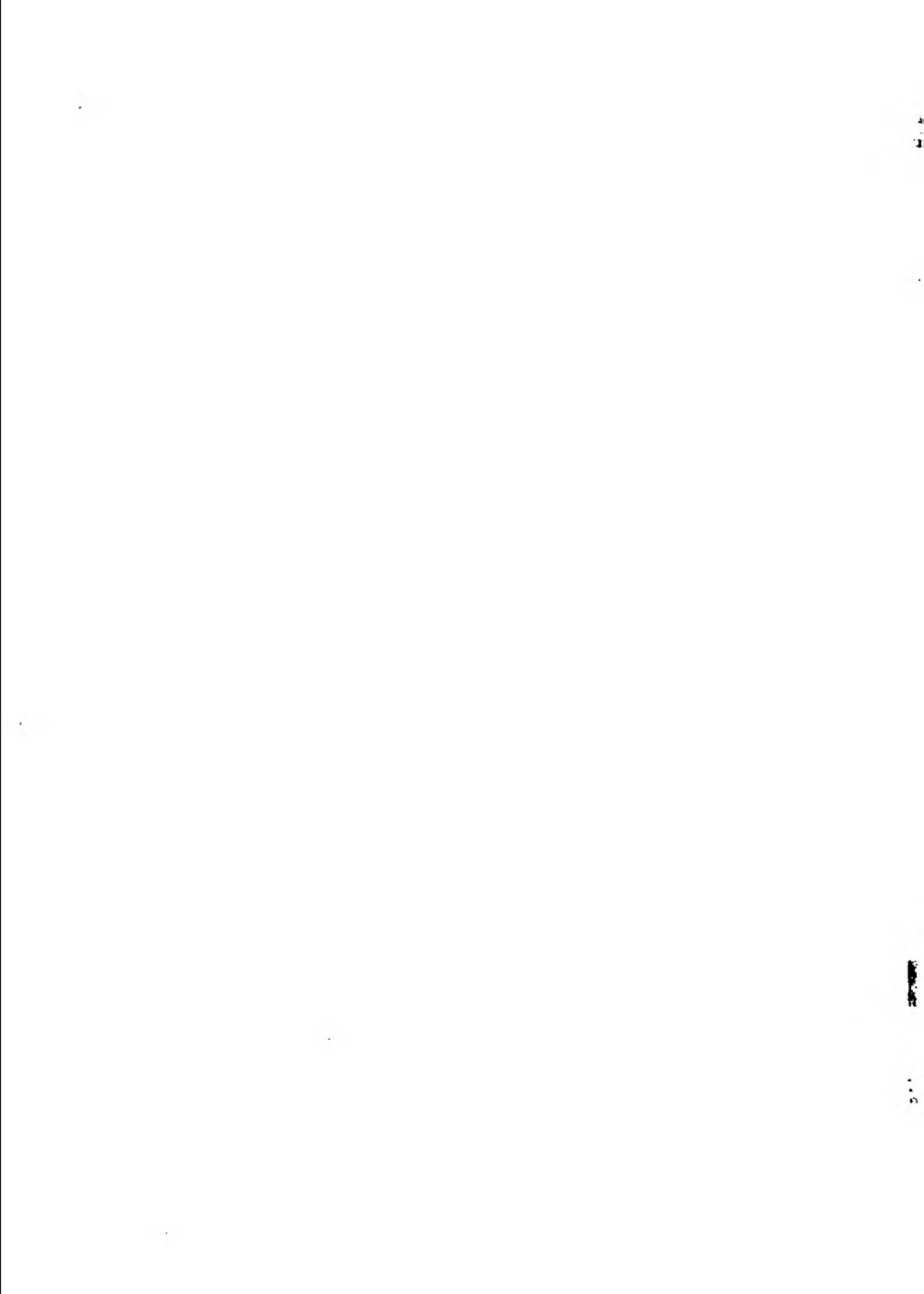
①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② 1853年9月21日《利物浦信使报》。——编者注

Name Index

- 16 August
 1 Sunday House of Commons
 2 Sunday House of Commons
 (Palmerston
 Wilson)
 3 Sunday 23 August
 4 Sunday 30 August
 5 Sunday 6 September
 6 Sunday 13 September
 7 Sunday 20 September
 8 Sunday 23 September
 9 Sunday 27 September
 10 Sunday 30 September
 11 Sunday 4 October
 12 Sunday 7 October
 13 Sunday 14 October

燕妮·馬克思的記事簿的一頁，上面記有發送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庫給“紐約每日論壇報”的日期
 (部分日期為卡·馬克思所記)



改意见使全部问题成了“一个纯粹的词句问题”^①。

涅谢尔罗德说，完全不对，沙皇对最初的照会原文的解释和苏丹是一样的。最初的照会并没有别的意思，也不想有别的意思，它就是缅施科夫照会的再版，我们所要坚持的就是原文，全部原文，而且仅仅就是这个原文。政府的《地球报》当然感到吃惊，因为它发现沙皇和苏丹都同样认为最初的照会“意思就是承认由俄国提出的、被土耳其拒绝的、而四强国也不(?)打算支持的那些要求”；“俄国坚持要无条件地满足它最先提出来的要求”^②。为什么俄国不坚持呢？既然它在四个月以前就有勇气提出这些要求，那么为什么现在在已经赢了第一个战役以后，要放弃这些要求呢？

同一家《地球报》在几天以前还说土耳其提出的修改意见是烦琐的吹毛求疵，多余的咬文嚼字，现在却不得不承认，“俄国的解释证明这些修改是必要的”。

涅谢尔罗德的第一份文件还没有公布，但是《晨邮报》已肯定地告诉我们，这份文件宣布“维也纳照会和缅施科夫公爵的照会具有完全相等的价值”。《地球报》(晚刊)又补充说，这份文件的意思是：

“俄皇认为，维也纳照会向他保证了承认他向土耳其提出的要求，承认他对土耳其政府的影响，这是土耳其政府在四强国支持下一直都拒绝的，而且是为了阻止这些，它才去请求四强国仲裁；我们还获悉，俄皇从来不想放弃他不要仲裁国而直接同土耳其打交道的权利，他只不过表面上承认仲裁国而已。”^②

俄皇即使表面上也从来没有承认过四强国是仲裁国。他只允许

① 1853年9月20日《泰晤士报》第21538号。——编者注

② 1853年9月22日《地球和旅行家》第17223号。——编者注

其中的三个国家跟着奥地利跑,而让奥地利以一个低声下气的求情者的身份自己找上门来。

第二份文件9月7日从圣彼得堡发出,9月18日公布在柏林的《时代报》上,它是寄给维也纳的迈恩多夫男爵的。涅谢尔罗德在文件中完全正确地指出,最初的照会由奥地利公使交给他时被说成是“最后通牒”,在土耳其政府不加任何修改地接受照会这个明确的条件下俄国必须对它表示同意。“有谁能够否认这表明了皇帝的光明正大呢?”^①诚然,他对多瑙河两公国有过一点点“海盗行为”。他侵略了它们,占领了它们,压榨了它们,统治了它们,掠夺了它们,霸占了它们,吞并了它们,尽管哥尔查科夫出了告示。但是这没什么关系。他另一方面不是“在接到照会的第一个草案之后,不等得到伦敦或巴黎是否予以批准的消息,马上就通电表示同意了吗?”他已经通电表示,由俄国大臣在维也纳口授的照会决不会被圣彼得堡的俄国大臣拒绝,难道还能要求他做得比这更多吗?他甚至不等巴黎和伦敦批准就同意,难道他能为巴黎和伦敦做得比这更多吗?然而他确实做了更多的事。他宽宏大量地通电表示接受的照会草案,在巴黎和伦敦被“修改”了。即使如此,“他收回了自己的同意吗?他制造了哪怕是一点点困难吗?”不错,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项照会从它“最后的模样”看来和“缅施科夫公爵的照会具有完全相等的价值”;但是具有相等价值的这一份照会毕竟与原本“有所不同”。难道他“没有坚持过不作任何修改地接受缅施科夫的照会这个条件”吗?难道他本来不是可以“仅仅根据这一个理由就拒绝考虑新的照会”吗?但是

^① 卡·瓦·涅谢尔罗德《……修改意见》,见1853年9月22日《晨报》第19423号,文字以该报所载为根据。——编者注

他没有这样做。“这不是表现了最大的和解精神吗？”维也纳会议⁹的最后通牒同他毫不相干，这是维也纳会议本身的事情。“他们的事情是考虑”由于苏丹拒绝屈服“而造成的拖延”。从他这方面来说，他一点也不在乎在两公国多停留几个月，他的军队在那里穿衣吃饭都不用花钱。

敖德萨并没有因为多瑙河口被封锁而蒙受损失；如果由于两公国被占领而使伦敦马克巷^①的小麦涨价，那么这只会促使渎神的帝俄金币更快地回到神圣的俄罗斯去。因此奥地利和其他强国应当

“坦率而强硬地向土耳其政府声明，它们既然尽力为土耳其政府开辟使它能够立即恢复和我们的关系的唯一道路，结果却白费了气力，今后他们只好撒手不管这件事了”^②。

它们为苏丹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它们为沙皇开辟了进入多瑙河的道路，封闭了联军舰队进入黑海的道路。涅谢尔罗德伯爵的“神圣君王”接着就痛斥“好战的意图，这种意图看起来目前正影响着苏丹和他的大多数大臣”。从他这方面来说，他当然希望苏丹保持冷静，用和平建议来对付炮舰，用赞美之词来对付哥萨克。“他已经作了一切可能的让步，而土耳其政府却寸步不让。沙皇陛下不能再往前走了。”决不能，他决不能再往前走了，除非是越过多瑙河。涅谢尔罗德把他的全部论据总括为一种巧妙的二难推理，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这个范围。或者是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改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是它们具有某种意义。如果这些修改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土耳其政府还要坚持它们？如果这些修改具有某种意义，那么“我们完全有

① 粮食交易所所在地。——编者注

② 1853年9月22日《晨报》第19423号。——编者注

理由拒绝接受”。

克拉伦登勋爵说：“撤出两公国是订立任何协定的先决的必要条件。”^①涅谢尔罗德回答说，恰恰相反。“订立协定”，即让土耳其大使前来递交没有作任何修改的奥地利照会，“是撤出两公国的先决的必要条件”。

总而言之，宽宏大量的沙皇准备和维也纳会议的骗局分手了，因为维也纳会议对他结束第一战役已经再没有用处；但是他将更紧地把两公国抓在自己手里，因为它们是开始第二战役所必需的条件。

我们今天从一个电讯得知，维也纳会议⁹已恢复活动，如果这是确实的话，那么列强将把下面一首巴黎暴民曾用来颂扬亚历山大的歌献给尼古拉：

万岁！亚历山大王，
万岁！王中之王，
你恩赐我们法律，
却不要一点报偿。

可是，沙皇对于东方纠纷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控制了。苏丹已经被迫去唤起旧时的狂热，鼓动粗野好战的亚洲部落重新入侵欧洲，这些部落不是外交照会或老一套的谎言所能安抚的；甚至在俄国人的蛮不讲理的照会中好像也透露出对于弥漫在伊斯坦布尔的“好战精神”的某种担心。苏丹向他的穆斯林发布的诏书已拒绝对俄国再作任何让步。据说，乌列玛²²⁵代表团要求苏丹要么退位，要么立即宣战。土耳其帝国国务会议里的意见分歧已经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

^① 乔·克拉伦登 1853 年 8 月 8 日在上院的演说，见 1853 年 8 月 9 日《泰晤士报》第 21502 号。——编者注

度,主和的路西德帕沙和穆斯塔法帕沙这派势力已开始向陆军大臣穆罕默德-阿里一派让步。

伦敦的一家所谓激进派的报纸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糊涂。《晨报》在几天以前还声称要“根据英国法律严厉惩办四个卖国贼”^①(阿伯丁、克拉伦登、帕麦斯顿和罗素),而在昨天的一篇社论里最后却说了这么一段话:

“阿伯丁勋爵因此应当让位于他的继任者。谁应当是继任者还要说吗?现在全国都认为在这个严重关头只有一个人配执掌政权。这个人就是帕麦斯顿勋爵。”

如果说《晨报》没有能力观察事件和事实的话,那么它至少也应当看看自己报上天天刊登的乌尔卡尔特先生的文章。

星期二晚上,根据向市长提出的请求,召开了一个设菲尔德居民大会,“讨论目前得不到解决和令人不满的东方问题的状况,并考虑就这个问题向政府递交请愿书的问题”。在斯塔福德也要举行这样的大会。此外,还在进行许多准备来组织反对俄国和“群贤”内阁¹⁷⁸的公众示威。但是公众的注意力基本上还是集中在贴现率、粮价、罢工和商业前景不妙等问题上,而更使人关心的是霍乱,这种疫病已在纽卡斯尔逞凶肆虐,伦敦卫生部正在用解释性指示来对付它。内阁会议已发布命令,指示今后六个月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防疫法²²⁶的各项规定;伦敦和其他大城市正急忙准备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对付即将来临的灾难。如果我同意乌尔卡尔特先生的看法的话,我就要说,霍

^① 戴·乌尔卡尔特《政治罪犯》,见1853年9月20日《晨报》第19421号。这番话马克思在他1853年9月20日的文章中引用得更全一些(见本卷第362页)。——编者注

乱是被沙皇派到英国来执行一项“秘密使命”，即彻底摧毁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精神。

最近四个星期里，工业区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7月和8月初，所能看到的全是一片光明的繁荣景象，只不过被远远的一小块乌云——“东方问题”稍微蒙上了阴影，除此之外，恐怕更使人担心的倒是缺少劳动力会妨碍我们的棉纺大王们充分挖掘他们所看到的好生意的无穷财源。东方冲突似乎已经解决；收成当然可能不够好，但是另一方面却有自由贸易，可以靠美国的、黑海的和波罗的海的取之不尽的粮食供应来把价格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对工业品的需求一天天增加。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把他们的大量黄金投入不列颠的工业。这时《泰晤士报》就把马尔萨斯忘了，把它自己前不久关于人口过剩的狂言也忘了，认真地讨论起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大陆不给我们送来大批工人，那么，劳动力供应不足以及由此而来的工资提高是否会使英国工业品的生产费用按比例增加，从而使繁荣的贸易发生停顿。按照雇主的说法，工人阶级生活好得太过分了，以致他们的要求毫无节制，他们的“厚脸皮”一天比一天更令人无法容忍。但是这样的情况本身就说明国家正经历着空前的大繁荣；而除了自由贸易以外，还有什么可以成为这种繁荣的原因呢？而且最可宝贵的是人们相信这种巨大的贸易活动是健康的，没有商品的积存，没有野蛮的投机。工厂主都异口同声这样说，并且根据这种看法办事。他们兴建成百个工厂，订购成千匹马力的蒸汽机、成千架动力织机和几十万支纱锭。机器和机床制造行业在1853年比任何一年都更有利可图。那些由于1851年的大罢工²²⁷而在内部各个环节都遭到重大损失的企业，这时也恢复了起来，甚至情况更好了。如果没有这番空前兴隆的经营活动，有些头等的、名声很大的机器制造公司就永远不可能从

机械工人在大罢工期间使它们遭到的打击下恢复过来，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不止一个。

但事实上，在繁荣的晴空中目前已出现了浓重的乌云。这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由东方冲突的转折造成的，但是这种转折对国内贸易以及同美国和殖民地的贸易的影响是很小的。贴现率的提高不是“丹麦王国里出了坏事”^①的原因，而是它的征兆。至于歉收和食品涨价，那么毫无疑问，在受到这些因素影响的市场上，首先是在作为不列颠工业支柱的国内市场上，是使工业品需求量减少而且还将进一步减少的原因。然而，食品价格的提高目前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大多数地区暂时还由于工资增加而全部或者几乎全部得到补偿，因此恐怕还不能说消费者的购买力已经大为降低。工资的增加使那些以手工劳动为主的部门的生产费用增加了；但是由于需求量很大，所以到8月份为止，几乎所有工业品价格的增长都大大超过了生产费用的增长。上述种种原因合在一起造成了经营活动的呆滞，但是，光是这些原因，毕竟还不足以解释各个制造业地区的商业阶级中普遍存在的那种惶惶不安的心理。

事实上，自由贸易的幻想的魅力正在消失，勇敢的工业冒险家开始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经济震荡、商业危机和新的生产过剩，并不像他们所梦想的那样完全不可能在一个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里发生。生产过剩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还会存在，因为“商品积压”这种《曼彻斯特卫报》心目中的可怕怪物继续存在，而且有增无减。商品的需求正在明显地下降，而供给却一天天增加。在新建的工业企业中，规模最大和工人最多的企业只是现在才逐渐开工。劳动力的不

^①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1幕第4场。——编者注

足、建筑行业的罢工以及大量定购的机器设备没有可能得到供应,给很多企业的开工造成先前未能料到的耽搁,本来应该更早表现出来的工业产品过剩的征兆因此而推迟了一个时期。例如,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布拉德福德附近的泰·索尔特先生的工厂一直到这个星期才能开工,还要过一些时候该厂的全部生产力才能在市场上充分显露出来。在兰开夏郡的新的企业中,有许多到冬季才能开工,而生产力的这种新的巨大增长的后果,只能在春天,也许更迟一些才能在市场上充分感觉出来。据来自墨尔本和悉尼的最新消息,进口贸易正在显著减少,许多货物的装运将无限期推迟,至于无限制的投机,不久以后,到发表决算报告的时候我们还会听到。投机行为已经扩大到那么多项目的商品,因此现在表现得不如过去那样引人注目,虽然事实上还是十分猖獗。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3年9月19—23日

载于1853年10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92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恐慌。
——罢工²²⁸

1853年9月27日星期二于伦敦

联合舰队通过了达达尼尔海峡的消息,同内阁的人事变动和商业困难的传闻合在一起,星期六在证券交易所引起了一场真正的恐慌。

“要描写英国有价证券现在的情况或那些在证券交易所里普遍发生的场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样紧张的情景是罕见的,这种情况不常有是值得庆幸的……如果说压低行情的活动现在差不多达到了法国革命时期发生过的那种规模,大概也不是过甚其词……本周有价证券的行情是91.5%;自1849年以来还不曾这样低过……在铁路股票市场,出现了不断的下跌。”^①

这是内阁的报纸《观察家报》上的话。所有最主要的铁路股票的价格比上周低68—80先令。股票突然充斥市场,本身并不说明任何了不起的问题,因为这只是投机者的活动,他们随时可以在市场上制造混乱,恫吓老实的股票持有人。但是,有价证券的剧烈波动,即

^① 1853年9月25日《观察家报》。——编者注

使带有纯粹投机的性质,如果像现在这样同商业危机的普遍征兆结合在一起,就会造成非常有害的后果了。至少,金融市场上的这种恐慌一定会使一切预定要发行的国家公债失败,特别是奥地利的国家公债。而且,资本家们都还记得,1811年奥地利对他们发行的期票每一英镑仅付1先令 $7\frac{1}{4}$ 便士的股息;他们还记得,尽管奥地利在1849年以后,通过大大加重匈牙利和伦巴第的税负的办法,人为地增加了收入,从1200万英镑增加到1800万英镑,但是它每年的平均赤字仍然大于它的总收入的 $\frac{1}{4}$;此外,从1846年起,奥地利的国债增加了约5000万英镑;只是由于以色列子孙们从私利出发宽限债务偿还期,奥地利才免于陷入新的破产,而他们现在仍然希望把自己装满了大堆奥地利钞票的钱柜腾出来。

《观察家报》写道:“商业在某种程度上越出了它应有的限度,我们的商业债务部分地超过了我们的资金。”^①

《晨邮报》惊呼:“现在用不着再回避这个问题了,因为尽管面临的危机具有1847年所不曾有过的某些有利特点,但是每个注意事件进程的深思熟虑的观察家一定会觉察到,现在至少可以说,一种很难应付的局面已经到来。”^②

英格兰银行⁵⁴的黄金储备又减少338954英镑,而它的银行券储备,即预定用于贴现业务的有价证券,也总共才700万英镑,换句话说,只够财政大臣^③用来支付那些持异议的南海公司⁵⁶股东。关于粮食市场的状况,我们从昨天的《马克巷快报》了解到下面的情况:

“多年来在中等收成的情况下,我们每年都消费几百万夸特的外国小麦。

① 1853年9月25日《观察家报》。——编者注

② 1853年9月26日《晨邮报》第24887号。——编者注

③ 威·格莱斯頓。——编者注

那么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多少呢？今年小麦的收获量至多也超过中等收成的 $\frac{3}{4}$ ，而且其他任何一种作物都提供不出余额。马铃薯遭到了严重的病害；由于它不适于储藏，不得不赶快消费掉，这样很快就会感到这种食品不足。我们的小麦消费量是这样大，尽管截至本月5日为止的8个月内已进口3 304 025夸特小麦和3 337 206英担面粉，但是仓库中的储备仍很有限……我们丝毫不打算夸大我国可能遭到的困难，但是，**否认这些困难的存在，是愚蠢的……**各地的报告都说明小麦收成非常不能令人满意；许多已经打了场的地方收获量都刚刚超过估产的一半。”^①

在工商业繁荣的晴空中出现了浓重乌云，与此同时，罢工现在仍然是，而且将在一个时期中始终是我们工业状况的一个重要特点；不过，罢工的性质正开始随着国家现在总的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贝里的纺工又要求每1 000束增加2便士工资。由于厂主们拒绝了他们的这一要求，他们便停工了；织工一俟织完他们手上现有的纱，也将罢工。普雷斯顿的织工，在临近地区的工人的支持下，继续要求增加10%的工资，现在有6家厂主已经关闭了自己的工厂，其余的大概也要仿效他们。这样一来，2 000工人就失业了。在布莱克本，狄金逊先生的铸铁厂的机械工人仍在罢工。在威根的一家工厂里，缫丝工人罢工，要求每20磅增加1便士工资；在另外一家工厂里，精纺工决定在工资增加以前拒绝上工。这两家工厂都关闭了。在同一个地方，约有5 000名采煤工人参加的罢工在继续。星期三晚上，克劳福德伯爵和附近地区的其他大矿主解雇了自己的工人。此事，采煤工人在斯凯尔斯奥查德举行了人数众多的群众大会。在曼彻斯特，5 000台织布机已停止不动，此外，染布工、染纱工、毡帽制作工等等举行的一些小罢工在继续。博尔顿的棉纺工开大会要求

^① 1853年9月26日《马克巷快报和农业报》第1135号。——编者注

提高工资。在特伦顿和布里奇沃特以及其他城市有制鞋工人罢工，在格拉斯哥有马车夫罢工，在基尔马诺克有泥瓦工人罢工，在奥尔德姆警察声言要罢工等等。伯明翰的制钉工人要求增加10%的工资；伍尔弗汉普顿的木工要求每天增加6便士工资，伦敦的木工也同样要求增加这样多的工资，等等。兰开夏郡、柴郡、德比郡和其他各郡的主要工业城市的工人们纷纷公开集会，决定采取援助他们受苦的兄弟们的措施。与此同时，厂主们则决定把自己的企业不定期关闭，以使用饥饿迫使工人们屈服。

《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我们看到，一般说来工人要求的工资增加额不超过每天6便士；看看现在的食品价格，那就很难说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我们知道，有人说，现在的罢工者所抱定的目的之一，是想从工厂主的实际利润或预期利润中取得某种共产主义份额，但是把所要求的工资的增加同日用必需品价格的提高这两者对比一下，就完全驳倒了这种指责。”^①

当工人们要求比“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多一点的时候，当他们企图从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利润中得到“份额”的时候，他们就被斥为有共产主义意图。食品的价格与“永恒的和至高无上的供求规律”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在1839、1840、1841和1842年，即在食品价格不断上涨的年份，工资却不断下降，一直下降到挨饿的水平。当时就是这些工厂主们说：“工资不取决于食品的价格，而取决于永恒的供求规律。”

《星期日泰晤士报》说：“工人们的要求只有用恭敬的方式提出的时候，才能得到满足。”^①

恭敬与“永恒的供求规律”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有谁听说过，明

^① 1853年9月25日《星期日泰晤士报》第1616号。——编者注

辛街^①的咖啡价格是由于它是“用恭敬的方式提出”才上涨的呢？买卖人的血肉之躯的方式，也同买卖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就是说，至少也要给它和别的任何商品同样的机会。

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已经持续六个月了。我们且来用厂主们自己所承认的标准——“永恒的供求规律”衡量一下这个运动。或者说，我们也许应当明白，对政治经济学的永恒的规律应该像对俄国同土耳其签订的永恒的和约那样去解释吧？

六个月以前，工人们即使还没有认识到，由于对他们的劳动大量需求，由于人口向金矿和美洲不断大量外流，他们的地位得到加强，他们仅仅根据狂热地颂扬自由贸易的中等阶级报刊普遍宣扬繁荣这种现象，就已经可以猜测到，工业的利润是增加了。很自然，工人们要求从这种被鼓吹得如此响亮的繁荣中得到自己的份额，但是厂主们给予他们的却是无情的反击。于是工人们便结成团体，声言罢工，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坚持自己的要求。凡是发生罢工的地方，厂主和他们在宗教界、政界和报界的喉舌，一齐破口大骂那些“用这种方式企图迫使别人听命于自己”的人“厚颜无耻和无理取闹”。但是罢工证明了什么呢？不是证明了工人们宁愿用自己的方法来检验供求关系，而不愿轻信雇主们的偏私的担保吗？在某种情况下，对工人说来，唯一能验证他是否真正取得了他的劳动的市场价值²²⁹的方法，就是举行罢工或声言要举行罢工。1852年原料成本与成品价格之间的差额，例如，原棉成本与棉纱成本之间的差额，棉纱价格与棉制品价格之间的差额，大于1853年，因而纱厂主和工厂主的利润，无疑多于1853年。无论棉纱价格或成品价格直到最近都没有赶上棉花

① 伦敦街名，香料及从殖民地进口的其他货物的贸易中心。——编者注

价格的上涨。那么为什么工厂主在 1852 年不马上提高工资呢？他们说，供求关系没有证明 1852 年有必要提高工资。是这样吗？一年前，工人的确没有像现在这样缺少，但是这个差距同工厂主们从那时起由于供求规律（它的意义已经由罢工向他们阐明了）的作用而被迫进行的突然的、不止一次的提高工资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当然，现在开工的工厂比去年的多，并且有许多有专门技能的工人在过去一年内外流了；但是与此同时，工厂劳动从来还没有像最近 12 个月来这样获得大量的供应，人们从农业和其他部门源源不断地涌入我们的“工业蜂房”。

实际上，“工人”像往常一样，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才发现他们的劳动价值在好几个月以前已经增加了 30%，而只是在那时，在今年夏季，他们才开始罢工，先要求增加 10% 的工资，后来又要求再增加 10%，等等，当然，要求的数量是他们能够得到的。这些罢工总是成功的，这一方面促使罢工遍及全国，另一方面也再好不过地证明了罢工是符合规律的；而在同一个企业部门里接二连三地罢工，同一些“工人”一次又一次要求再增加工资充分说明，按照供求状况，工人们早已有权得到更高的工资，他们之所以没有得到更高的工资，只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劳动市场状况罢了。一旦工人们终于弄清了这种状况，一直宣扬“永恒的供求规律”的工厂主们就回到了“开明专制”论，要求有随便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他们用恶狠狠的**最后通牒**的形式宣称，工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是好。

总的商业前景的改变，也要引起工人和雇主相互关系的改变。这种变化的突然到来，正是许多罢工已经开始、更多的罢工正在酝酿的时候。毫无疑问，即使是经济萧条，也将有更多的罢工，并且同样会要求提高工资，因为，工厂主会说，他没有能力增加工资，而工人们

将回答说,食品价格上涨了;这两个理由都是同样有力的。但是,如果像我所推测的那样,萧条持续下去,工人们不久将因此而大吃苦头,并且将不得不毫无成功希望地为反对降低工资而斗争。但是,那时他们的活动将迅速转到政治领域,而在罢工中得以建立起来的新的工联组织,对他们将有重大的价值。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3年9月19和27日

载于1853年10月17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3900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弗·恩格斯

俄军在土耳其²³⁰

因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来自欧洲的每艘轮船都能带来一些有关军队机动和交战结果的消息,所以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准确地了解敌对双方的态势、兵力对比以及决定战争进程的其他各种情况。这种需要,促使我们对双方的攻防能力以及可能影响交战双方指挥员决心的主要战略问题作一简略分析。

占领多瑙河两公国的俄军,最初有2个步兵军和通常数量的预备队骑兵和炮兵。一个俄国步兵军有3个步兵师,即6个步兵旅,几个轻骑兵团和一个炮兵旅,一共约有55 000人和将近100门火炮。每2个步兵军有“一个预备队骑兵军”和一定数量的预备队炮兵,包括重攻城炮兵。因此,按编制定额,占领军最初约有125 000人。现在第3个步兵军已开始渡越普鲁特河。所以,除去一切必要的削减,可以确定,俄军集中在多瑙河上的兵力为14—15万人。至于其中究竟有多少人在特定时间投入战斗,这决定于当地的卫生状况、俄军军需部门的工作效率,以及其他一些不在当地就无法正确估计的类似情况。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全部材料,在多瑙河上与俄军对峙的土军,最多不超过11—12万人。在埃及部队未开到以前,土军的总数据一

般估计不超过9万人。因此,就我们所能判断的,土军在数量上,显然弱于俄军。至于双方军队的内在的价值和素质,那么必须承认,就是在这方面,优势也同样在俄军方面。诚然,由优秀的法国和普鲁士军官建立的土耳其炮兵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俄国炮手则以射击不大准确而闻名。但是,土耳其的步兵,尽管近来有了各种改进,却仍不能与俄军的掷弹兵相比;同时,土耳其的骑兵还缺乏在第一次冲锋受挫后再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冲锋所必须具备的那种严守纪律和顽强战斗的精神。

双方的将领都是比较新的人物。关于俄军司令哥尔查科夫公爵在军事上的功绩以及俄皇任命他担任这一要职的原因,我们已经和读者谈过^①。他为人忠实,热心维护俄国的“命定扩张论”。然而,他是否善于进行像现在所开始的这种规模的战争,尚须拭目以待。土军总司令奥美尔帕沙是一位更有名的人物。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情况,一般来说是好的。他向库尔德斯坦的出征²³¹,尽管条件困难,仍然获得了胜利;而向黑山的出征²⁵,也计划得非常周密,如果没有外交上的干涉,肯定几乎可以不战而胜。因此,土军的主要优势,可能在于军事指挥方面。在其他一切方面,都是俄军占优势。

尽管战争是土耳其人宣布的,而且他们可能比俄军更加强烈地渴望首先发起进攻,但是对较弱一方的土军来说,采取防御的行动显然更为有利,而俄军则以进攻更为有利。当然,这里没有把由于一方将领犯严重错误而可能出现的获胜机会估计在内。假如土军有力量采取进攻,那么他们的战术就很简单。土军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在

^① 指1853年9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社论《俄军在土耳其的计划》。——编者注

多瑙河上游以佯动迷惑俄军，在锡利斯特里亚和赫尔绍瓦之间迅速集中兵力，在多瑙河下游强渡，并在敌人阵地最薄弱的地方，即在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交界的狭窄地带采取进攻；然后，把这两个公国的俄军都分割成两部分，以集中的攻击驱逐在摩尔多瓦的一个军，歼灭在瓦拉几亚陷于孤立和被分割的另一个军。但是，由于土军在进攻中毫无获胜的希望，所以他们只有在俄军将领严重失策的情况下，才可适当地采取这种行动。

如果俄军想要利用进攻的机会，那么在深入土耳其帝国的中心以前，必须克服两个天然的障碍：首先是多瑙河，尔后是巴尔干山脉。强渡大河，甚至在敌前强渡，这是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期常建的战功，以致现在任何一个尉官都能说出，应当如何强渡大河。采取几次佯动，备有齐全的舟桥纵列，拥有几个掩护桥梁的炮队，缜密计划保障退却的措施，并派出勇敢的前卫，——大概这就是强渡大河所必需的一切条件。但是要越过高山，尤其是要越过山口有限、能通行的道路也不多的巴尔干山脉，却是艰巨得多的行动。而当山脉又与河流平行，其间隔不超过40—60英里——巴尔干山脉与多瑙河的情况就正是这样——时，行动就变得更为艰巨了，因为在山地被击败的军队，可能由于敌人的坚决追击而被切断通往自己的桥梁的道路，并在援军开到以前就被赶下河去。在大规模会战中遭到这样失败的军队，不可避免地要全军覆没。土耳其的天然军事力量，就在于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相距这样近，而且又是平行的。从马其顿—塞尔维亚边界到黑海的巴尔干山脉，即巴尔干山主脉，有五个山口，其中有两个位于大路（在土耳其就是这么叫的）上。这就是伊什蒂曼山隘和多勃洛尔山口。伊什蒂曼山隘位于由贝尔格莱德经索非亚、菲利普波利斯、阿德里安堡到君士坦丁堡的道路

上，而多勃洛尔山口则位于锡利斯特里亚到舒姆拉的道路上。至于其他的三个山口，有两个位于上述两个山口之间，有一个靠近黑海。这三个山口，大的部队和辎重队都不能通行，只有较小的部队，顶多还有轻型野炮部队可以通行，因而不能作为入侵军队主力的作战线和交通线。

俄军于1828和1829年曾在锡利斯特里亚—多勃洛尔山口—阿德里安堡一线作战。这是从俄国边境到土耳其首都最近最直的一条道路，它是来自北方的、可以得到一支绝对控制黑海的舰队支援的并且是以胜利进军君士坦丁堡迅速结束战争为目的的任何一支俄国军队自然要选择的道路。要通过这条道路，俄军强渡多瑙河后，应攻占有两个要塞（舒姆拉和瓦尔纳）从翼侧进行掩护的坚固阵地，应封锁或攻占这两个要塞，尔后再越过巴尔干山脉。土军于1828年曾以主力在这一阵地上冒险，结果在库列夫察附近被击溃；瓦尔纳和舒姆拉均告陷落，巴尔干山脉的防御力量薄弱，因而俄军到达了阿德里安堡。尽管俄军已疲惫不堪，但并未遇到抵抗，因为土军已完全瓦解，他们甚至没有一个旅的兵力来防守君士坦丁堡。土军当时犯了极大的错误。每个军官都应当清楚地知道：防守山脉时，不应当把防御阵地设在山脉的前面，也不应当分兵封锁所有的山口，而应当在山脉的后面占住中央阵地，对各山口进行监视，在敌人的意图清楚地暴露后，就在他们的先头纵队从山脉的各个狭谷中走出时，以集中的兵力向其攻击。土军本应集中更多的兵力，在敌人必然因疾病和某些部队掉队而削弱的情况下，只该在阿德里安堡平原进行决定性的防御战，而他们却由于在瓦尔纳和舒姆拉之间的俄军作战线对面有坚固阵地，便决定在那里进行这一决战。

因此可以看出，在锡利斯特里亚—阿德里安堡一线进行防御时，

应防守多瑙河渡口,而不应冒险决战。在这以后,应在舒姆拉和瓦尔纳的后面进行抵抗,而不应在舒姆拉和瓦尔纳之间进行抵抗,除非获得胜利的可能性非常大,否则不冒险进行决战。尔后,则应退到巴尔干山脉以南,同时必须留下一些部队防守山口,留下的部队必须尽可能进行抵抗而不进行决战。这样,俄军将把自己的兵力消耗在围攻要塞上,而且,如果他们还像以前那样行动的话,他们还要以强攻夺取要塞,也就是说,将因此遭受重大伤亡,因为可以说明俄军特点的,有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俄军迄今从未在无支援的情况下顺利地进行过正规的围攻。缺乏有经验的工程师和炮兵专家,在野蛮的国家里不可能筹备大量军用物资和围攻器材,甚至现有的物资也因路途遥远而不可能运来,——所有这一切都经常使俄军不得不在进行短时间的、猛烈的、但是很少充分产生效果的炮击后,用强攻夺取据点。苏沃洛夫曾采用这种方法攻占伊兹梅尔和奥恰科夫,1828和1829年俄军又用同样方法强攻过土耳其在欧洲和亚洲的要塞,1831年攻占华沙时也是用这种方法。不管怎样,俄军到达巴尔干山口时兵力总要受到削弱,而土耳其则有足够的时间从各方面调集自己的军队。如果土军用全力还未能击退企图越过巴尔干山脉的入侵军队,那么就可能在阿德里安堡城下进行决战;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土军仍遭失败,那么至少他们已尽其所能了。

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俄军在阿德里安堡的胜利不可能具有任何决定的意义。不列颠和法国的舰队正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在这样的兵力面前,任何一个俄国将领都将无法向这个首都进军。在阿德里安堡受阻并无法依靠舰队(舰队本身也可能受到威胁)支援的俄军,很快就会遭受重大牺牲,会因疾病而损失成千的人员,并被迫退到巴尔干山脉以北。因此,俄军即使获胜,也不可能达到其战争的主

要目的。但是还有一条作战线可供俄军选择,而且可能对他们更为有利。这条作战线就是从维丁和尼科波尔经索非亚到阿德里安堡的道路。除政治原因外,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俄国将领也不会想起走这条路。但是,只要俄国还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奥地利身上,只要俄军向塞尔维亚边境接近,加上俄国在塞尔维亚的阴谋活动,就能够在这个国家,在黑山,在占波斯尼亚、马其顿和保加利亚人口大多数的信希腊正教的斯拉夫居民中激起暴动,只要纯军事作战的最后行动——夺取君士坦丁堡因须面对欧洲舰队而不可能实施,那么这个作战计划就是俄军可能采取的、有很大可能获得成功的唯一的计划,采取这一计划,他们可以避免英法因俄军过于直接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而采取坚决的敌对行动。

从俄军目前的部署的确可以看出,是有类似这样的计划的。俄军的右翼一直延伸到瓦拉几亚西部边境附近的克拉约瓦,而且俄军的部队全都沿多瑙河向上游地区展开。由于这样的机动完全脱离开通过锡利斯特里亚和舒姆拉的作战线,这种机动的目的只能是使俄军与塞尔维亚——土耳其的斯拉夫民族和希腊正教的中心建立联系。如果得到奥地利的支持,如果土耳其的斯拉夫人能与此同时开展民族独立运动,那么多瑙河下游扼守防御阵地,配合渡过多瑙河上游向索非亚进攻,就是完全有把握的事;而俄军向土耳其斯拉夫人居住地区的中心进军,必然会最有力地引起土耳其的斯拉夫居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沙皇^①采取这种方法,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比较温和地实现他在整个冲突中所企求的目的——把土耳其所有的斯拉夫人都组成如现在的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那样的单独的公国。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如果苏丹^①在保加利亚、黑山和马其顿仅有名义上的主权,而实际上这些地方受沙皇的保护,那么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地就会局限于君士坦丁堡的郊区,而且可能失去其兵源地——阿尔巴尼亚。对俄国来说,这个结果比在阿德里安堡取得决定性胜利要强得多,因为在那个胜利之后它的军队就可能无法前进了。各种现象说明,俄国正是企图取得这个结果。至于俄国把希望寄托在土耳其的斯拉夫人身上是否犯了错误,这很难说,不过如果他们都表示反对俄国,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9 月
28—29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10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0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①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卡·马克思
帕麦斯顿勋爵²³²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0 月
1 日—大约 12 月 22 日之间

载于 1853 年 10 月 22 和 29 日，
11 月 5、12 和 19 日、12 月 10、
17 和 24 日《人民报》第 77、78、
79、80、81、84、85 和 86 号，署
名：马克思博士；一部分作为社
论发表于 1853 年 10 月 19 日、
11 月 4 和 21 日及 1854 年 1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02、3916、3930 和 3973 号，并
以单行本形式于 1853—1854
年在伦敦出版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第 一 篇^①

鲁杰罗一次又一次地被阿耳契娜的假风姿迷住，其实他也知道在这种假风姿掩盖之下是一个老巫婆——

“没有眼睛，没有牙齿，没有味觉，没有一切。”^②

这位游侠骑士虽然明明知道这个老巫婆把追求她的人都变成了驴子和其他动物，却还是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英国公众是第二个鲁杰罗，帕麦斯顿是第二个阿耳契娜。帕麦斯顿虽已年届古稀，并且自1807年以来，差不多一直活动于政治舞台，但他却总是有办法把

① 本文在1853年10月1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开头有以下两段话：“东方的纠纷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变动，即使各党派的情况没有改变，至少各党派的首脑人物的处境有了很大的不同。帕麦斯顿勋爵又变成了公众的红人。人人都谈论他，说他是唯一能够拯救英国的人；人们信心十足地宣称，一旦内阁改组，首相非他莫属；托利党人、辉格党人、自封的爱国人士、报界以及整个社会舆论，无不对他备加颂扬。

帕麦斯顿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使人不由得推测这也许是一种纯粹的虚构，其用途不在国内，而是作为一种出口物品用于国外。然而，这种推测毕竟是错误的。”《人民报》发表时没有这两段话。——编者注

② 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2幕第7场。——编者注

自己装扮成一个新人物,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对他寄予希望,像一般人对未涉世事、前途无量的青年人寄予希望那样。尽管他一只脚已经踏进坟墓,人们却总以为他的真正的政治生涯尚待开始。如果他明天去世的话,全英国都会大吃一惊:原来他已经做了半个世纪的国务大臣了。

虽然他不是一个样样事务精通的政治家,但他至少是一个样样角色都能扮演的演员。喜剧人物和英雄人物、捶胸顿足和私语缠绵、悲剧和闹剧,他都同样演得很成功,虽然更适合他性格的恐怕还是闹剧。他不是第一流的演说家,然而却是一个干练的辩论家。他有惊人的记忆力,有丰富的经验,他无比圆滑,从来不露声色,他具有上流人物所应有的多面才能,熟谙议会里的一切阴谋诡计、党派和人物,遇到困难时能应付裕如,从容不迫,讲演中会迎合听众的偏见,利用他们的感情。厚颜无耻使他对任何突发事变都能处之泰然;利己的心肠和灵巧的头脑使他能从来不作任何忏悔自责;极端的轻佻,十分的冷漠,以及贵族的傲慢,使他永远不致激动。他善于插科打诨,因此能博得一切人的欢心。他从来不发脾气,因此能戏弄暴跳如雷的敌手。当没有本领搞清某个问题时,他知道怎样东拉西扯;即使拿不出像样的看法,他也随时都能用老生常谈编出成套的漂亮话来。

他天生好动而不知疲倦,不甘寂寞,即使不是渴求采取行动,至少也是渴望造成轰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自然会使他在全球每个角落都有事可干。他追求的并不是成功本身,而只是成功的假象。

他什么事也做不了,却什么事都能制造出来。在他不敢介入的场合,他就居间调停。如果他无力同强敌较量,他就找一个弱手来凑合。

他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他不作任何长远的打算,没有任何伟

大的目标,他置身于困境时所想的只是日后炫耀一下他摆脱困境的能耐。他需要纠纷来充实自己的活动;当他发现没有纠纷时,他就制造纠纷。他非常喜爱虚假的冲突,虚假的战斗,虚假的敌人,喜爱交换外交照会,调遣军舰,如此等等,直到在议会中引起激烈的辩论,而且这种辩论肯定能使他获得暂时的成功为止,而这正是他一贯追求的唯一目标。他用艺人的手法来处理国际冲突,先把事情弄到一定的程度,等事态严重化就打退堂鼓,不过无论如何总要获得他所需要的戏剧性的紧张效果。在他看来,历史进程本身不过是专为满足帕麦斯顿封地的帕麦斯顿子爵阁下个人欲望^①而发明的消遣品而已。

他事实上屈服于外国势力,而口头上却抗拒外国势力。他从坎宁那里继承了英国在大陆上推行宪制的使命,因此他一向不愁找不到借口来激起民族偏见和反对其他国家里的革命,而与此同时他又使其他强国对他抱疑忌态度。既然他这样容易地成为大陆各国宫廷心目中的可憎的东西,自然在本国也就肯定能被树立为真正的英国大臣。他虽然出身于托利党³,可是在办外交时却善于沿用构成辉格主义本质的全部虚伪和矛盾。他知道怎样把民主的词句和寡头政治的观点调和起来^②;怎样用旧时英国贵族的傲慢语言来掩盖中等阶级投和平之机的政策;怎样在默许纵容的时候扮演进攻者,在出卖的时候扮演防御者;怎样对表面的敌人讨好,怎样使所谓的盟友气恼;怎样在争执的适当时机站到强者一边去欺压弱者,怎样一边说大话

① “专为满足帕麦斯顿……个人欲望”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专为帕麦斯顿封地的帕麦斯顿子爵阁下”,并在下面加了一句话:“他就是托马斯·卡莱尔笔下那种冒牌的世界领袖人物最好的标本。”——编者注

②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他知道怎样把宽宏大量的词句和气质狭小的观点调和起来”。——编者注

一边溜之大吉。

有人骂他拿俄国的津贴,但也有人怀疑他是烧炭党²³³。1848年,他曾经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因为有人要控告他,说他的所作所为就像是尼古拉的大臣;1850年,他却深感满意,当时外国大使们的一次反对他的阴谋活动在上院获得成功而在下院遭到了失败²³⁴。他出卖别的民族,但是他做得非常有礼貌,因为礼貌是魔鬼用来换取被愚弄者的鲜血的小钱。压迫者永远可以指望得到他的实际帮助,被压迫者从他那里则总会得到大量慷慨的辞令。每当波兰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德国人遭到迫害的时候,帕麦斯顿总是正好在担任政府要职,但是屠杀他们的暴君却老是怀疑帕麦斯顿和受害者有秘密的联系,其实帕麦斯顿迫害他们还是经这些暴君的默许的。到现在为止情形一向是这样:谁要是把他当作对手,那多半不会错,谁要是把他当作朋友,那肯定会倒霉。但是,如果说他的这种外交手腕没有使他和在外国的谈判中获得怎样辉煌的实际结果的话,它在另一方面的成就却非常辉煌:他有办法使英国人民相信他对谈判结果所作的一套解释,使他们把空话当作事实,把幻想当作现实,只听到冠冕堂皇的借口而看不出卑鄙齷齪的动机。

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子爵(他的封号来源于爱尔兰贵族),在1807年波特兰公爵组阁时被任命为海军大臣。1809年任陆军大臣,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828年5月。1830年他非常机灵地转到辉格党人⁶¹方面去,于是他们就让他做辉格党永久的外交大臣。除1834年11月到1835年4月和1841年到1846年这两段托利党执政的时期外,从1830年革命到1851年12月英国的全部对外政策都是由他负责的。

在派西沃先生、利物浦伯爵、坎宁先生、葛德里奇勋爵、威灵顿公

爵相继领导托利党内阁的时期，曾经进行了反雅各宾战争¹²⁸，大举国债，颁布谷物法²³⁵，外国雇佣军队驻扎在英国的土地上²³⁶，人民——用帕麦斯顿的同僚西德茅斯勋爵的话来说^①——不时地“失血”，新闻被封锁，集会被禁止，人民大众被解除了武装，人身自由和正常的司法都被抛在一边，全国简直可以说处于戒严状态，——总而言之，这个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丑恶、最反动的时期，而恰恰在这个长时期内，这位热心保护“自由体制”的吉河德，这位歌颂“光荣宪制”的平达，却是这些托利党内阁的常任的重要的成员，这乍看起来不是很奇怪吗？

帕麦斯顿议会生涯的首场演出就很有特色。1808年2月3日，他起来进行辩护，替什么辩护呢？替外交活动保密辩护，还要替一国对另一国的空前无耻的行为辩护，即替英国一面宣称同丹麦非常和睦一面炮轰哥本哈根并劫夺丹麦的船只²³⁷辩护。关于外交活动保密的问题，他说：

“在这个特殊场合，国王陛下的大臣们有责任（谁加给他们的责任？）保守秘密。”^②

不过他进一步又说：

“而且一般地说，我也反对把外交活动的情况公开，因为泄露这方面的秘密就会断绝今后情报的来源。”^③

① “用帕麦斯顿的同僚西德茅斯勋爵的话来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被删去。——编者注

② “‘有责任保守秘密，’不过他进一步又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有责任保证安全。’不过他进一步改进了这个说法”。——编者注

③ 亨·帕麦斯顿 1808年2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维多克也会使用同样的词句为同样的事辩护。至于对丹麦进行的海盗式的侵犯,帕麦斯顿承认丹麦对大不列颠并没有表现任何敌意,可是他还是硬说大不列颠炮轰丹麦首都并劫夺丹麦船只做得对,因为它要预防丹麦的中立可能在法国的压力下变为公开的敌对。这就是帕麦斯顿阁下公布的新国际法。

在后来的一次宏论中,这位杰出的英国大臣又极力替外国军队留驻英国这件事进行辩护。把这些外国军队从大陆弄到英国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以强力维护1688年威廉带着他的荷兰军队从荷兰来到英国建立的寡头统治。皇家德籍军团的存在使人们完全有根据地“为国家的自由担心”,而帕麦斯顿却以极不郑重的口吻回答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国内雇用16 000名外国人呢?你们知道,我们“在国外雇用的外国军队比16 000人多得多”。(下院,1812年3月10日)

当人们面对从1815年以来始终保持着的庞大常备军而为宪制^①表示类似的担心的时候,帕麦斯顿则认为“我们的军队的组成本身就是对宪制的一种充分的保障”,因为军队中的军官大部分是“有财产和有地位的人”。(下院,1816年3月8日)

当人们从财政的观点抨击保持庞大的常备军时,帕麦斯顿作出了一个奇异的发现:“我们的许多财政困难都是由于过去我们的军队平时编制太小造成的。”(下院,1816年4月25日)

当人们向他指出“全国的赋税重担”、“人民大众的贫困”同耗费无度的军事开支之间的尖锐对比时,他提醒议会:这种赋税重担和贫困是“我们(即英国的政治寡头)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甘愿付出的

^① “为宪制”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被删去。——编者注

代价”。(下院,1820年5月16日)

据他看来,军事专制只能来自

“那些自命为改革派的迷路者;从国家活动的最基本的原则来看,他们要求的那种改革一旦实现必定会导致军事专制。”(下院,1820年6月14日)

如果说他把庞大的常备军当作维持国家秩序的万应灵丹,那么体罚^①就被他当作维持军队秩序的百宝仙方。在1824年3月5日关于惩治叛乱法案²³⁸的辩论中他为实行体罚进行辩护;1825年3月11日,他宣称体罚是“绝对必要的”;1828年3月10日,他再度建议采用体罚;在1833年4月的辩论中,他支持实行体罚的办法,并且以后每一次他都表现出是体罚的业余爱好者。

军队里的任何流弊,只要是对贵族寄生虫们有利,他就不会找不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之辩护。关于出卖军官官衔证书²³⁹的辩论就是一个例子。(下院,1828年3月12日)

帕麦斯顿勋爵喜欢装扮成一个为宗教信仰自由而奋斗不息的人;可是他却投票反对罗素勋爵所提出的废除宣誓法和市镇机关法²⁴⁰的议案。为什么呢?因为他“作为一个热诚的支持宗教信仰自由的人”,不能容许人们“在天主教徒遭受着真正苦难的时候”却来替非国教徒“解除莫须有的压迫”。(下院,1828年2月26日)

为了证明他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热忱,他告诉我们,他“为非国教徒人数的不断增加而忧虑,希望国教在英国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他还希望“国教由异教徒出钱维持”。这位爱开玩笑的勋爵阁下指责

① “体罚”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肉刑和体罚”。——编者注

有钱的非国教徒替没有钱的非国教徒办教堂，^①而

“在英国国教方面，只有穷人缺少做礼拜的地方…… 如果认为穷人应该从自己微薄的收入里拿出些钱来供给教堂，那是荒谬的”。（下院，1824年4月9日）

当然，如果认为英国国教的有钱的教徒应该从自己丰厚的收入里拿出些钱来供给教堂，那就更荒谬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帕麦斯顿是怎样为天主教徒的解放²⁴¹而奋斗的，这是他认为应该特别“要求”爱尔兰人民感谢他的好事之一。他在坎宁内阁任职时自称为天主教徒解放的拥护者，而后来却又参加了公然敌视天主教徒解放的威灵顿内阁，这我不去谈它。或许帕麦斯顿勋爵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的权利之一，不应受到立法机关的干涉吧？且听他自己是怎样回答的：

“虽然我也希望对天主教徒的要求加以考虑，但是我决不承认这些要求是以权利为根据…… 如果我认为天主教徒是在要求自己的权利，那就我个人来说，我会拒绝走进全院委员会。”（下院，1813年3月1日）

可是为什么他要反对天主教徒要求自己的权利呢？

“因为国家立法机关有权剥夺社会任何等级的人的某些政治权利，如果它认为为了全社会的安全和利益必须这样做的话…… 这是文明政治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之一。”（下院，1813年3月1日）

这真是空前未有的最无耻的供状，原来人民群众根本不配有任何权利，他们只有在立法机关——换句话说，也就是统治阶级——认

① “替没有钱的非国教徒办教堂”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满足没有钱的非国教徒办教堂的需要”。——编者注

为适当的限度内才能享有一点自由。于是帕麦斯顿直截了当地宣称：“解放天主教徒是出于恩典和眷顾。”（下院，1829年2月10日）

因此，他所以俯允中止对天主教徒的权利的限制，只是一时的权宜。而在这种权宜的后面隐藏着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爱尔兰的大地主，所以他想使人保持一种错觉，好像除了解放天主教徒就别无他法来消除爱尔兰的灾难，好像解放天主教徒能医治在外地主所造成的苦难，并且能代替济贫法²⁴²。（下院，1829年3月18日）

这位后来把爱尔兰本地人从自己领地上清扫出去的大慈善家，一刻也不能准许爱尔兰人贫困的乌云遮蔽大地主和金融巨头们晴朗的天空^①。

他说：“固然爱尔兰的农民没有享受到英格兰所有农民所享受到的全部幸福。（请想一想每星期只有7个先令收入的家庭所能享受到的全部幸福吧！）然而”，——他接着说，——“爱尔兰农民也有他们的幸福……他们有足够的燃料，没有吃的只是很少见的事”（6天中只有4天！）。^②

多么幸福啊！^③可是爱尔兰农民的幸福还不止这些。“他们有一种比他们的英格兰患难弟兄更为乐天的性格。”（下院，1829年5月7日）

像谈论爱尔兰农民所享受的幸福时一样，他在谈到爱尔兰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勒索时，也是那样嬉皮笑脸：

① “大地主和金融巨头们晴朗的天空”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大地主和金融巨头们的议会上方的晴朗的天空”。——编者注

② 亨·帕麦斯顿1828年6月27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③ “多么幸福啊”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被删去。——编者注

“有人说，爱尔兰地主尽可能地向农民榨取最高的地租。可是阁下，我想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英格兰的地主无疑也是一模一样。”（下院，1829年3月7日）

所以，一个这样迷恋“英国宪制的光荣业绩”的奥秘和“英国自由体制的好处”的人，力图在整个大陆上推行这些事物，这还有什么奇怪呢？

第 二 篇

当改革运动¹²⁹已不可遏止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便脱离了托利党,悄悄溜进辉格党阵营中去。虽然他认为军事专制的危险并不是由于英国土地上驻扎着皇家德籍军团,也不是由于保持着庞大的常备军,而是完全来自“那些自命为改革派的人”^①,但他早在1828年就恩准把选举权扩大到伯明翰、利兹、曼彻斯特这样一些大的工业城市,这是什么缘故呢?

“并不是因为我在原则上拥护改革,而是因为我坚决反对改革。”

他确信,及时对获得异常发展的工业界^②作某些让步,可以成为防止“实行普遍改革”的最可靠的手段(下院,1828年6月27日)。他一成为辉格党的同盟者,便马上不再装模作样地让人觉得辉格党提出的改革法案目的似乎在于打破威尼斯式宪法的狭小框框;正相

① 这几句话在1853年10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大家知道,当改革运动已不可遏止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便脱离了托利党阵营,巧妙地同辉格党结合起来。我们看到,他认为军事专制的危险是来自那些自命为改革派的人的要求。”——编者注

② “工业界”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工业大王们”。——编者注

反,改革的目的在于使中等阶级从人民反对派中分离出来,从而使宪法得到加强和巩固。

“中等阶级将改变态度,他们将由不满宪法一变而为拥护宪法,因而宪法也就能大大得到加强和巩固。”

他安慰贵族们,告诉他们实现改革法案实际上并不会削弱“上院的势力”及其“对选举的影响”。他对贵族们说,宪法不会失去它的封建性质,因为“地主乃是社会结构及国家体制所凭借的伟大基础”。他还用一些带有讽刺意味的暗示来解除他们的恐惧,他说:“有人还责难我们,说我们没有诚意让人民有真正的代表权”;“有人说我们不过是想用另一种形式来保持贵族和地主的势力”。他甚至承认,除了要向中等阶级作某些不可避免的让步之外,“取消选举权”,即取消托利党旧有的腐败的城镇选区²⁴³的选举权,使其转为辉格党的新选区,“是改革法案的主要的指导原则”^①。(下院,1831年3月24日及1832年5月14日)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勋爵阁下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业绩^②吧。

1823年,法国军队根据维罗那会议⁶的决定开进西班牙,要取消这个国家的宪法,把它交给波旁昏君^③及其周围的顽固的僧侣进行

① “即取消托利党旧有的腐败的城镇选区的选举权,使其转为辉格党的新选区”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这就是说,将腐败的城镇选区在托利党贵族和辉格党贵族之间实行一种新的分配,是改革法案的主要的指导原则”。——编者注

② 《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在“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业绩”之前还有“在其生涯中的托利党时期”。——编者注

③ 斐迪南七世。——编者注

残酷报复。当时，帕麦斯顿勋爵坚决拒绝任何“为了抽象原则而进行吉诃德式的十字军征讨”的主张，拒绝采取任何“有利于人民”的干涉行动，虽然这个国家的人民当年的英勇抵抗拯救了英国免于拿破仑统治。他在这个问题上对他当时的对手辉格党人所说的话，生动而准确地反映了自从他当上了他当年的政敌的常任外交大臣之后一直奉行的对外政策。他说：

“有人想叫我们在谈判中进行威胁，哪怕我们并没有为谈判失败作好战争的准备。如果我们老谈战争而实际上想的却是中立，如果我们拿军队来威胁一下就在某种官方文件后面躲藏起来，如果我们在讨论问题时挑逗式地挥舞刀剑，而到要打起来的时候却只能拿出一叠抗议书，那我们就成了虚张声势的胆小鬼，就会遭到整个欧洲的鄙视，成为他们嘲笑的对象。”（下院，1823年4月30日）

最后，我们来谈谈关于希土问题的辩论，因为这次辩论使帕麦斯顿勋爵第一次有机会表现了他无论在内阁或下院都孜孜不倦坚定不移地维护俄国利益的无比才能。他像应声虫似地，一句接一句地重复着俄国的所有口号，叫嚷土耳其人的残忍、希腊的文明、宗教信仰的自由、基督教的精神等等。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他以大臣的身分^①极力反对任何“谴责海军上将科德林顿的”可嘉行动的企图，正是这种行动导致了土耳其舰队在纳瓦里诺的败绩³²，尽管他承认：“这是同一个与我们不处于战争状态的强国进行的战争”，因而是“一次不幸的事件”。（下院，1828年1月31日）

他后来辞职后，大肆攻击阿伯丁勋爵，说他执行俄国命令^②太慢。

① “以大臣的身分”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作为陆军大臣”。——编者注

② “俄国命令”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沙皇命令”。——编者注

“在履行我们对希腊的义务时，我们表现了更多的毅力和果断吗？已经快要到1829年7月了，却还没有履行1827年7月签订的条约⁴⁵……不错，土耳其人是在被赶出了摩里亚……但是为什么法国人在科林斯地峡的军事行动中中止了呢？……由于英国的狭隘政策的介入，他们的继续挺进被阻止了……但是为什么联军没有对地峡北部地区采取像对南部地区一样的行动，没有立即占领应归希腊所有的全部领土呢？我认为，联军同土耳其就希腊问题谈判得太多了。”（下院，1829年6月1日）

大家知道，梅特涅公爵当时是反对俄国侵略的，因此俄国外交官受命——请回忆一下波措-迪-博尔哥和利文公爵的文件——把奥地利描绘成反对希腊解放和欧洲文明的死敌，而俄国外交的唯一目的据说就是推进希腊解放和欧洲文明^①。勋爵阁下自然也就依常规行事：

“奥地利由于目光短浅及倒霉的偏见支配着它的政策，所以快降到二等强国的水平了。”由于阿伯丁的妥协政策，英国看来已成了“米格尔、西班牙、奥地利和马茂德组成的拱门的拱顶石……人们认为，所以迟迟不履行七月条约，与其说是由于畏惧土耳其反抗，不如说是由于坚决敌视希腊的自由。”（下院，1829年6月1日）

他又一次攻击阿伯丁反俄的外交政策说^②：

-
- ① “把奥地利描绘成……推进希腊解放和欧洲文明”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指责奥地利是苏丹的愚蠢的盟友”。——编者注
- ② 在1853年10月1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他又一次攻击阿伯丁反俄的外交政策说”改为“半世纪以来，给俄国向君士坦丁堡的推进设下的唯一障碍，就是这样一句话：保持土耳其帝国的完整为维持均势所必需。而帕麦斯顿在1830年2月5日声称：‘有一种政策把维持欧洲土耳其领土的完整推崇为维护基督教的和文明的欧洲的利益所绝对必需的原则，我反对这种政策。’他又一次抨击阿伯丁”。——编者注

“就我个人来说，我对英国政府的某些文件是不满的；尽管这些文件读起来确实很动听，措辞很优美，大体上还具有同俄国保持和睦的精神；但是另一方面仍不免过分强烈地表示了英国对土耳其的关心，使有关方面看起来很容易觉得比实际上想说的要意味深长得多……我希望英国作出坚定不移的决定——这也可以说是它唯一可以采取的方针——，即在这一战争中无论如何绝对不站到土耳其方面，并且要向土耳其开诚布公地讲明这一点……世上有三件最无情的东西，这就是：时间、火和苏丹。”（下院，1830年2月16日）

说到这里，我应该提请读者回忆一下某些历史事实，以便使读者对勋爵阁下的亲希腊感情的性质不再有任何怀疑^①。

俄国占据了塞凡湖边的格克恰地带（这无疑是波斯的领土），并且要波斯放弃对它自己的另一部分领土卡潘的要求，作为俄国撤兵的交流条件。波斯拒绝了，于是它被侵略，被征服，在1828年2月被迫签订了图尔克曼恰伊条约²⁴⁴。按照这个条约，波斯不得不付给俄国200万英镑的赔款，并割让包括埃里温和阿巴萨巴德的要塞在内的埃里温省和纳希切万省。照尼古拉的说法，签订这个条约的唯一目的是划定沿阿拉斯河的共同边界，硬说这是防止两个帝国将来发生任何纠纷的唯一方法。但是他同时又拒绝把属于波斯的阿拉斯河岸的塔雷什和莫甘两地归还波斯。最后，波斯还保证不在里海驻留舰队。这就是俄波战争的起因和结果。

至于希腊的宗教和自由，俄国当时对这两件事很少关心，正像俄罗斯人的神现在很少关心“圣墓”和著名的“圆顶”的钥匙由谁来掌握⁸⁸一样。俄国的传统政策一向就是先煽动希腊人起义，然后弃之不顾，让苏丹去对他们实行报复。俄国对希腊的复兴实在太同情了，

^① “以便使读者……不再有任何怀疑”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被删去。——编者注

以致在维罗那会议上把希腊人看作叛乱分子,并且承认苏丹有权拒绝任何外国来干涉他与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沙皇^①还提出要“帮助土耳其政府镇压叛乱”——这样的提议自然是被拒绝了。这一企图失败之后,沙皇就转过身去向其他强国提出截然相反的建议:“出兵土耳其,在宫墙之下迫使它接受和约。”为了拿共同行动之类的东西束缚住沙皇的手脚,其他强国于1827年7月6日在伦敦同他缔结了条约,条约规定彼此承担在必要时用武力来调解苏丹同希腊人之间的争端的义务。在该条约签订前几个月,俄国曾同土耳其缔结了另一个条约——阿克尔曼条约²⁴⁵,按照这个条约,俄国应放弃它对希腊问题的任何干预。在阿克尔曼条约缔结前,俄国曾唆使波斯皇太子进犯奥斯曼帝国,并曾对土耳其政府大肆侮辱,以促使它对俄国翻脸。在此种种事件之后,英国大使^②就向土耳其政府提交了,或者说是代表俄国及其他强国提交了1827年7月6日伦敦条约的各项决定²⁴⁶。俄国利用这种种欺骗与谎言造成的混乱,终于找到了发动1828—1829年战争的借口。这次战争以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⁴¹而结束,对于条约的内容,下面引用的麦克尼尔的著名的小册子《俄国在东方的进展》中的一段话作了概括:

“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沙皇取得了阿纳帕、波季和黑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取得了阿哈尔齐赫帕沙辖区的一部分,包括阿哈尔卡拉基和阿哈尔齐赫的要塞,另外还取得了多瑙河口诸岛;条约还规定拆毁土耳其的格奥尔基瓦要塞,土耳其放弃多瑙河右岸沿岸数英里地区……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家庭从土耳其亚洲各省迁往沙皇境内,部分是强迫的,部分是受了教士的影响……沙皇为他在土耳其境内的臣民解除了对当地政府应负的一切义务,并以偿还军事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② 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编者注

开支和赔偿商业损失为名把巨额债款加在土耳其政府身上,最后,还抓住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和锡利斯特里亚不放,作为支付这笔款项的抵押……俄国通过这项条约,使土耳其承认了3月22日的议定书(议定书确保苏丹对希腊拥有宗主权并从希腊取得年贡),同时利用自己的全部势力来促使希腊独立。希腊成了独立国,被任命为总统的是前俄国大臣卡波·迪斯特里亚伯爵。”(第105—107页)

事实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看看帕麦斯顿勋爵^①是怎样描绘这些事实的:

“俄土战争是由于土耳其侵犯了俄国的贸易及权利并违反了条约所致,这是千真万确的。”(下院,1830年2月16日)

帕麦斯顿成了辉格党⁶¹在外交部的化身之后,又把这一观点完善化了:

“尊贵的、勇敢的议员(伊文思上校)指出俄国从1815年到现在的行为一直是侵略别的国家。他特别提到了俄国同波斯及土耳其的战争。但无论是对波斯还是对土耳其,俄国都不是侵略者;虽然俄国的势力由于同波斯的战争而增强,这并不是俄国的本意……在同土耳其的战争中,俄国也不是侵略者。——列举土耳其对俄国的挑衅行为会使议院厌倦;但是土耳其把俄国臣民驱逐出境,扣留俄国船只,违反阿克尔曼条约的全部条款,并且在接到抗议之后仍然拒绝赔偿损失——凡此种种,我认为是无可置疑的。因此,如果一般来说进行战争有它正当理由的话,那么俄国就有这样的理由对土耳其作战。尽管如此,俄国并没有获得任何新的领土,——至少是在欧洲。我知道有几个地点曾在一个长时期被占领(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只是地点,而多瑙河口根本不值一提!)亚洲牧克辛海沿岸也有某些地方被占,但俄国同其他欧洲列强订有协定,根据协定,俄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不得导致它在欧洲的任何扩张。”(下院,1832年8月7日)

①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在“帕麦斯顿勋爵”之后错误地加上了:“1832年8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中”。——编者注

读者现在该明白了,为什么罗伯特·皮尔爵士在议院的公开会议^①上要对勋爵阁下说“他不知道帕麦斯顿是代表谁”。²⁴⁷

^① 1830年2月16日的会议。——编者注

第 三 篇^①

远近皆知子爵阁下是仗义保护波兰人的。每年当“亲爱的、枯燥乏味的、死气沉沉的”达德利·斯图亚特^②引着代表团前来见他时，他从未放过一次机会向他们倾吐他对波兰命运的哀伤，而斯图亚特是

“一位大人物^③，他发表演说，通过决议，表决呼吁书，陪伴代表团，随时都

① 在 1853 年 11 月 4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 1853 年在伦敦根据该报发表的文字出版的小册子《帕麦斯顿与俄国》中，本篇开头是这样一段话：“在伦敦最近举行的一次抗议不列颠内阁在当前俄土冲突中所采取的行动的大会上，一位先生竟敢专门发言批评帕麦斯顿勋爵，因而遭到愤怒的听众暴风雨般的嘘声，不得不默不作声。显然，与会者认为，要说内阁里有俄国的朋友，则这个朋友决不是子爵阁下；这时要是有人当众宣布勋爵阁下已就任首相，人们一定会热烈欢呼的。对这样一个不老实的虚伪的人如此信赖，再一次说明公众多么容易为表面上的出色才能所迷惑，同时再一次证明必须揭去这个阻挠人类自由事业进步的狡猾敌人的假面具。为此我们打算以近 25 年来的历史和一些议会辩论为依据，继续暴露这个老练演员在现代欧洲舞台上扮演的真实角色。”——编者注

② “枯燥乏味的、死气沉沉的”原文为“dully - deadly”，其读音与达德利（Dudley）这个名字的读音相近。——编者注

③ 这句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而斯图亚特被人（对勋爵阁下说来不太友好地或者说不太公正地）说成是‘一位大人物……’”。——编者注

对必要的人物抱着必要数量的信任，必要时还能三呼女王万岁”。

帕麦斯顿勋爵阁下于 1830 年 11 月开始到外交部视事的时候，波兰人已经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武装斗争。不久，到 1831 年 8 月 8 日，汉特先生就代表威斯敏斯特联合会向下院提出为波兰人呼吁的请愿书，要求“撤销帕麦斯顿勋爵在国王陛下内阁中的官职”。休谟先生在同一天也断定，勋爵阁下的沉默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根本不想为波兰人做什么事情，它想把波兰人的命运交给俄国处理”。帕麦斯顿回答说，“现存各项条约加给我们的一切义务，政府永远不会忽略。”那么，在他看来，现存条约加给英国的义务究竟是什么呢？他本人告诉我们：

“俄国占有波兰的权利是以维也纳条约⁹为凭的。”（下院，1833 年 7 月 9 日）

该条约规定占有波兰要以沙皇遵守波兰宪法为条件。可是，

“仅英国参加维也纳条约这一事实，并不等于说我们必须保证俄国不违反这个条约”。（下院，1834 年 3 月 25 日）

保证条约决不意味着保证条约被遵守。米兰人正是这样回答皇帝巴巴罗萨的：“我们确实向您宣过誓，但请记住，我们可并没有宣誓遵守誓言。”²⁴⁸

不过，维也纳条约有一点是很好的。它使缔约者之一的不列颠政府

“有权对任何违反条约的行为持有自己的意见并表示这种意见…… 维也纳条约各缔约国有权要求波兰宪法不受侵犯，这个意见我并未向俄国政府隐瞒过。早在华沙被占领和敌对行动的结果明朗化以前，我就预先把这个意见通知了俄国政府。华沙陷落后，我再次作了通知。但是俄国政府对问题抱着另一种

看法”。(下院,1833年7月9日)

总之,他事先就冷静地估计到波兰要被攻陷,并且等待这一个适当时机来表示和持有他对维也纳条约某些条款的意见,因为他已经确信,宽宏大量的沙皇力图以武力压垮波兰人民只不过是尊重波兰的宪法,尽管这个宪法在波兰人民还拥有许多反抗手段的时候就被他践踏过。与此同时,勋爵阁下还谴责了波兰人,说他们不该“采取不必要的、在他看来无法为之辩解的步骤,即废黜了皇帝”。(下院,1833年7月9日)

“我甚至还可以说,波兰人是侵略者,因为斗争是他们挑起的。”(下院,1832年8月7日)

当人们对波兰会被彻底消灭这件事由耽心变为惊恐时,他声称:

“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要消灭波兰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我认为对于这种企图的任何耽心都是多余的。”(下院,1832年6月28日)

当后来有人向他提起他用这种方式发表的这些与众不同的想法时,他却硬说人们误解了他,实际上他说这些话并不是从政治上说的,而是从匹克威克的意义上说的,他的意思是说俄国皇帝

“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不可能消灭居住在被瓜分的波兰王国里的几百万人”。(下院,1836年4月20日)

当议院在波兰人斗争期间打算进行干预时^①,帕麦斯顿说他应该负起他的大臣职责。当事情终于发生时,他冷冷地告诉他们,

^①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当议院在援波斗争期间威胁说要进行干预时”。——编者注

“议院的任何表决丝毫打动不了俄国，使之取消决定”。（下院，1833年7月9日）

当华沙陷落后俄国人的残暴行为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帕麦斯顿却建议议院对俄国皇帝要尽量温和。他说，

“他对辩论时使用的某些词句比任何人都更感到遗憾。”（下院，1832年6月28日）“当今俄国皇帝是一位思想高尚的人”，“如果说在某些场合，俄国政府对波兰人曾经过于残暴，那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俄国皇帝的权力实际上受到限制的证明，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在那种场合，这位皇帝不过是经不起他人的影响，而不是受自己自发情感的支配”。（下院，1833年7月9日）

当一方面波兰命运业已决定，另一方面土耳其帝国由于穆罕默德-阿里的叛乱而势将崩溃的时候^①，帕麦斯顿却要议院相信，“局势的发展一般是令人满意的”。（下院，1832年1月26日）

当有人提议接济波兰流亡者时，

“他极为难过地表示反对给这些人任何资助，因为，尽管每个慷慨的人的自然的、自发的情感会使他对此加以默许，但要给这些不幸的人任何资助都是和他的职责不相容的”。（下院，1834年3月25日）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就是这位慈悲为怀的人却让不列颠人民承担了很大一部分镇压波兰的开支。

勋爵阁下竭力要向议会隐瞒有关波兰惨剧的全部官方文件。但下院中的那些发言，无疑表明了他在那个灾难性的时期所起的作用，而他对这些发言从未试图加以反驳。

^①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当一方面波兰必将遭到彻底毁灭，另一方面土耳其帝国由于易卜拉欣帕沙的进展而势将崩溃的时候”。——编者注

波兰革命爆发后,奥地利领事并没有离开华沙,而奥地利政府甚至决定派波兰代理人瓦列夫斯基先生前往巴黎,授命他同法英两国政府就波兰王国的复兴问题进行商谈。土伊勒里宫^①宣称,“如果英国同意这个计划,它愿同英国共同行动。”帕麦斯顿勋爵拒绝了这项建议。1831年法国驻圣詹姆斯宫^②的大使达来朗先生提出法英共同行动的计划,但遭到勋爵阁下十分明确的拒绝,并接到勋爵阁下一份照会,照会中说,

“在波兰问题上进行友好调停会遭到俄国拒绝。某几个强国不久以前就拒绝了法国的一项类似的建议。在调停遭到俄国拒绝的情况下,法英两国宫廷的干涉只能带有强制性性质,但圣詹姆斯当局和圣彼得堡当局之间良好友善的关系不允许不列颠国王陛下^③进行这样的干涉。采取这样的行动来反对一位有不容争辩的权利的君主的意志并指望获得成功,这样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不仅如此^④。1848年2月23日,安斯蒂先生在下院公布了如下的情况:

“瑞典动员了它的舰队,要想采取对波兰有利的牵制行动,并收回它在最近一次战争中被无理夺去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勋爵阁下指示我驻斯德哥尔摩宫廷的大使反对这一计划,于是瑞典只好停止了它的军事准备。波斯宫廷也为着类似的目的调派了军队,由波斯皇太子率领,已向俄国国境进军了三日。驻德黑兰宫廷的使馆秘书约翰·麦克尼尔爵士马上去追赶皇太子,在离他的大本营三天路程的地方赶上了他;他按照勋爵阁下的指示并以英国的名义威胁波斯说,只要皇太子再向俄国国境前进一步,英国便要参战。为了阻挠土耳其重

① 指法国宫廷。——编者注

② 指英国宫廷。——编者注

③ 威廉四世。——编者注

④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从“不仅如此”起,到下面摘引的奈特1840年7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为止全部被删去。——编者注

新开战，勋爵阁下也使用了类似的手段。”

伊文思上校曾要求把有关普鲁士抛弃在俄波战争中伪装中立的材料拿出来，勋爵阁下反驳了这个要求，他说，

“本国大臣们对这一斗争不能不深感遗憾，这一斗争如能结束，他们将极为满意。”（下院，1831年8月16日）

当然，他希望这一斗争尽快结束，普鲁士自然和他有同感。

后来在另外一个场合，亨·加利·奈特先生把勋爵阁下在波兰起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作了如下概述：

“只要问题一涉及俄国，勋爵阁下的行动就表现出令人难以理解的不彻底性……在波兰问题上，勋爵阁下让我们一再地失望。不妨回忆一下：当人们坚决要求他尽量做些对波兰有益的事情时，他满口承认事业的正义性，我们的抱怨的正义性；可是他又说，‘诸位现在千万要克制，我们马上就要派一位以自由主义思想闻名的大使去，诸位可以相信我们会妥善安排一切；要是诸位激怒了我国大使将与之办交涉的那个强国，那只会妨碍谈判。所以我请诸位听我劝告，现在要保持镇静；请诸位相信，这样做保证会大有好处的。’我们相信了这些保证；自由主义大使也去了；至于他是否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谈判，我们就再也知道了。我们听的只是勋爵阁下的漂亮话，此外别无结果。”（下院，1840年7月13日）

所谓的波兰王国已经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波兰的民族独立只剩下一个奇异的残留物，这就是自由市克拉科夫。在法兰西帝国崩溃后的一片混乱时期，沙皇亚历山大不是征服了华沙公国，而是干脆把它占领，自然，他当时是力图把它连同被波拿巴划归公国的克拉科夫一起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曾一度占有克拉科夫的奥地利也想把它收回。沙皇既不能把克拉科夫弄到手，又不甘心把它让给奥地利，所以就提议把克拉科夫变成一个自由市。为此维也纳条约第六

款^①规定：

“克拉科夫市及其所属地区永远为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保护下的自由、独立和完全中立的城市。”^②

第九款规定：

“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宫廷保证尊重，并要求别国永远尊重自由市克拉科夫及其所属地区的中立。任何军队任何时候不得以任何借口开进这一地区。”

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²⁴⁹刚刚结束，俄国军队突然开进克拉科夫，占领该市达两月之久。^③然而这在当时被看作是因战争关系而临时采取的的必要步骤，而且在那种动乱时期很快就被人遗忘了。

1836年，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军队以所谓强迫克拉科夫当局交出五年前波兰革命的参加者为借口再次占领克拉科夫。克拉科夫的宪法被废除了，最高权力为三国驻当地的领事所掌握，警察局被奥地利密探控制，参议会被封，法院被解散，克拉科夫大学由于附近各省学生不许前来而陷于停顿，自由市同周围各国的贸易也中断了^④。

① 在这里和下文中，《纽约每日论坛报》未指明1815年维也纳条约第几款。——编者注

② 引自约·休谟1846年8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③ 这句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1831年，克拉科夫被俄国军队短期占领”。——编者注

④ 这段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1836年，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再次占领克拉科夫，其借口是，他们有责任以此种方式把某些波兰流亡者驱逐出该市及其所属地区。对此，勋爵阁下决定不提任何抗议，理由是，如他在1836年及1840年所说，‘很难使我们的抗议具有实效’。但是，当奥地利把克拉科夫完全侵吞时，他却认为单纯的抗议是‘唯一有效的办法’”。——编者注

1836年3月18日,当有人就克拉科夫被占领一事向子爵阁下提出质问时,他说,这种占领不过是暂时的。他对他的北方三盟国的行动的解释是这样宽容和偏袒,以致连他自己也感到必须马上停止,必须中止自己流畅的演说,来作如下庄重的声明: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袒护那些我应当予以批评和谴责的行动。我只是要说明一些情况,这些情况虽然不能为强占克拉科夫辩护,但也许可以使之得到某种谅解,等等……”^①

他承认维也纳条约规定上述三强国事先未经英国同意不得采取任何步骤。但是,

“可以有充分理由说,它们已经不自觉地对我国的公正与坦率表示了应有的尊重,因为它们预计到我们永远不会赞同这种行为”^①。

但是,帕特里克·斯图亚特先生^②认为,有一个比“不提抗议”更好的办法使克拉科夫保全,于是他在1836年4月20日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政府派一个代表到自由市克拉科夫去做领事,因为那里已经有北方三强国的三位领事。英法两国领事都到达克拉科夫将是一件大事^③。子爵阁下看到议院大多数都赞同这一议案,就郑重担保说,政府“打算派一个领事代理去克拉科夫”,以此使斯图亚特先生收回自己的议案。1837年3月22日,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向他提起他

① 亨·帕麦斯顿 1836年3月18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在这里和下文中《纽约每日论坛报》误作“斯特拉特福·坎宁爵士”。——编者注

③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一件大事”之后还有下面这样一句话:“并且至少会使勋爵阁下不致到后来声称他根本没有想到奥地利人、俄国人和普鲁士人将在克拉科夫策划阴谋”。——编者注

的这个诺言，勋爵阁下却回答说，他“改变了自己的打算，没有派领事代理到克拉科夫去，现在也没有这样做的打算”。于是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声称，他要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对这种奇怪的声明作一个书面解释；但是子爵阁下干脆就用下面的办法使这项议案无法通过：他不出席议院会议，使会议不得不因法定人数不足而延期^①。

1840年，“暂时”占领状态仍然存在，因此克拉科夫的居民向法英两国政府提出请愿书，其中提到：

“自由市克拉科夫及其居民的灾难深重，因此下面署名者和他们的同市居民现在只有指望法英两国政府能给以强有力的、开明的保护。他们现在的处境使他们有权呼吁维也纳条约的每个缔约强国进行干涉。”^②

1840年7月13日有人就克拉科夫的这一请愿书向子爵阁下提出质问。他声称：

“在奥地利和不列颠政府看来，克拉科夫的撤兵问题只是时间问题。”^③

至于维也纳条约遭到破坏的问题，

“即使英国打算动武，也根本不可能强制实行自己的意见，因为事情很明显，克拉科夫是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④。

①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在“因法定人数不足而延期”之后还有下面的话：“他就这样始终没有作出解释，说明他为什么或根据什么理由不履行他的诺言，并且顶住了一切想从他那里弄到有关这个问题的书面材料的尝试。”下面，从“1840年，‘暂时’占领状态仍然存在”开始到帕麦斯顿1846年8月17日的演说的引文为止，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都被删去。——编者注

② 转引自乔·坎宁1840年7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③ 亨·帕麦斯顿1840年7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值得注意的是，勋爵阁下说了这话两天以后就同俄、奥、普三国签订了使英国军舰不能进入黑海的条约¹²²，——大概是为了使英国在这一地区无法实现任何行动吧。这恰好是发生在勋爵阁下恢复了英国同上述列强的反法神圣同盟的时候。谈到英国贸易因克拉科夫被占领而受到的损失时，勋爵阁下解释说“向德国输出的总额并未减少”。这个情况正如罗伯特·皮尔爵士公正指出的那样，同克拉科夫毫无关系。关于他在这一问题以及派领事代理去克拉科夫一事上的意图，他说，

“尊贵的反对派绅士们利用了他打算派不列颠领事去克拉科夫这一个不幸的声明（声明是勋爵阁下为了避免对他抱敌对情绪的议院的斥责而于1836年作的），这样的经验使他有权利坚决拒绝对这类问题作任何回答，以免再次遭到这类不公正的抨击。”

1846年8月17日他说，

“欧洲列强是否遵守和履行维也纳条约，并不取决于有没有一个领事代理驻在克拉科夫。”^①

1847年1月28日，当人们再次要求他^②提出书面材料来说明拒不委派不列颠领事去克拉科夫的原因时，他声称，

“这个问题同克拉科夫被吞并问题的辩论没有必然联系，他看不出就这个只有暂时意义的事情重新展开激烈争论有什么好处。”^③

① 亨·帕麦斯顿 1846年8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句的开头部分是：“十年以后，当克拉科夫的恶运已经注定时，当人们再次要求勋爵阁下……。”——编者注

③ 亨·帕麦斯顿 1847年1月28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可见,他是一直坚持他早在 1837 年 3 月 17 日就向议会提出官方文件一事所发表的看法的:

“如果这些文件涉及的是目前尚在研究的问题,那么提供出来是危险的;如果涉及的是过去的问题,那么显然不会有什么用处。”^①

克拉科夫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贸易上具有何等重要意义,不列颠政府是非常清楚的。不列颠驻华沙领事杜普拉上校曾向政府报告说^②:

“克拉科夫升为独立国之后,一直是英国通过黑海、摩尔多瓦、加利西亚以至的里雅斯特运去的大宗商品的贮藏所,这些商品是运到克拉科夫之后再转运到周围各国去的。铁路线将逐渐把它同波希米亚、普鲁士、奥地利的铁路干线连接起来……它还是亚得里亚海和波罗的海之间重要铁路线的中心点。它还要敷设一条直通华沙的铁路……可以有把握地预期,黎凡特以至印度和中国的每个重要地点都将同亚得里亚海连接起来,因此决不能否认克拉科夫这个连接大陆东西两部分的大铁路网的中心对于英国贸易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③

帕麦斯顿勋爵本人也不得不在议院承认 1846 年的克拉科夫起义²¹²是三强国故意挑拨起来的。

“我认为,奥地利军队起先是应克拉科夫政府的请求开进克拉科夫领土的。但后来这些奥地利军队撤走了。撤离的原因至今尚未加以解释。克拉科夫政

① 亨·帕麦斯顿 1837 年 3 月 17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这句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驻华沙领事古·杜普拉上校曾就此作了详细报告”。以下引自该报告的引文被删去。——编者注

③ 马克思引用的这段话出自古·杜普拉 1846 年 3 月 10 日给乔·阿伯丁的报告,转引自斯·沃特利 1847 年 3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府和权力机关随同他们一齐撤离；撤离所造成的直接的后果，至少是最近的后果，就是克拉科夫临时政府的成立。”（下院，1846年8月17日）

1846年2月22日奥地利军队占领了克拉科夫，俄国和普鲁士的军队也随之侵入。²¹²同月26日塔尔努夫的地方长官贴出告示，号召农民杀死地主，并答应给他们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报酬”^①。紧接着这个告示就发生了加利西亚人的大破坏¹⁴，杀死了近2000名地主。3月12日出现了奥地利的告示，号召“忠君的加利西亚人起来维持秩序和保护法律，消灭秩序的敌人”。在4月28日官方的《日报》^②上，弗里德里希·施瓦尔岑堡公爵声明“所采取的行动曾得到奥地利政府的批准”，而奥地利政府无疑是同俄国和沙皇的仆从^③普鲁士按照共同的计划行动的。在所有这些坏事做完之后，帕麦斯顿勋爵认为该是在议院作如下声明的时候了：

“我过于相信奥、俄、普三国政府会怀抱正义感和尊重权利，实在没有料到它们会以这种做法或想法对待克拉科夫，而不按条约载明的规定行事。”（下院，1846年8月17日）

勋爵阁下当时心中记挂的只是怎样才能把即将结束会议的议会敷衍过去。他硬要下院相信“不列颠政府方面将尽一切努力保证维也纳条约各项条款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当休谟先生对于“帕麦斯顿勋爵是否打算叫奥、俄军队撤离克拉科夫”这点表示怀疑时，勋爵阁下要求议院不要相信休谟先生的意见，因为最可靠的情报掌握在

① 这里所引用的这个文件以及下面的文件均转引自理·米尔恩斯 1846年8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编者注

③ “沙皇的仆从”一语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被删去。——编者注

他手里,他相信克拉科夫被占领只是“暂时的”。1846年的议会就和后来1853年的议会一样被他敷衍过去了,奥地利1846年11月11日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版图的宣言很快也发表了。当1847年1月19日议会重新开会时,它从女王^①敕语中得知,克拉科夫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了英勇的帕麦斯顿的抗议书。为了使这一抗议不再有丝毫意义,勋爵阁下这时想出一条妙计,使英国在西班牙婚姻问题²⁵⁰上卷入同法国的争执,并且几乎使两国兵戎相见;为此他遭到斯密斯·奥勃莱恩先生的严厉批评。法国政府曾要求帕麦斯顿共同抗议克拉科夫的被吞并。对此,诺曼比勋爵按照子爵阁下的指示回答说,奥地利干的非法行为,即并吞克拉科夫,并不比法国蒙庞西埃公爵与西班牙公主联姻一事更为严重,前者违反了维也纳条约,后者则违反了乌得勒支条约²⁵¹。可是,乌得勒支条约虽于1782年一度恢复,但在反雅各宾战争¹²⁸中被彻底废除,从1792年起已完全失效。这一点在议院里谁也不比勋爵阁下知道得更清楚,因为在辩论封锁墨西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问题²⁵²时,他本人就曾向议院宣称:

“乌得勒支条约的条款早就由于战争的动荡而失效,只是有关巴西和法属圭亚那的边界的一款例外,因为该款已明确列入维也纳条约。”^②

勋爵阁下为反对俄国侵略波兰所作的努力,还不止于此。

英、荷、俄三国曾经订有一个奇妙的协定,即所谓俄荷贷款协定。反雅各宾战争期间,沙皇亚历山大曾向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公司借过款。波拿巴失败以后,尼德兰国王^③“想给同盟国列强以适当报酬,

① 维多利亚。——编者注

② 亨·帕麦斯顿1839年3月19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③ 威廉一世。——编者注

答谢它们使他的国土获得解放”并使他兼并了他对之没有任何权利的比利时,于是建议同俄国——其他列强照顾俄国而放弃了他们的共同要求,因为俄国当时在财政上遭到严重困难——签订一项协定,协定规定他分期向俄国支付它欠霍普公司的2500万弗洛林债款。英国为了补偿对荷兰的掠夺——侵占了荷兰在好望角附近的殖民地、以及德梅拉拉、埃塞奎博及伯比斯等地,也加入这一协定,并承担一部分对俄国的补助。这项协定列入了维也纳条约,但附有一个**特定条件**:“在债务未偿清以前,如果荷兰和比利时的联合遭到破坏,则贷款停止支付。”当比利时由于革命²⁵³而脱离荷兰的时候,荷兰当然也就拒绝向俄国支付自己那一份^①。另一方面,正如赫里斯先生所说,“俄国也已不再有丝毫理由要英国继续代为偿还债务。”(下院,1832年1月26日)

然而,帕麦斯顿勋爵却认为下述情况是很自然的:

“俄国那时由于支持比利时同荷兰的联合得到酬报,这时则由于这两个国家分裂而得到酬报。”(下院,1832年7月16日)

他十分悲伤地呼叫要忠实地履行条约,首先是维也纳条约。他竭力设法同俄国签订1831年11月16日的新协定,在协定的序言中直截了当地说,该协定是“根据维也纳会议通过的现在仍然完全有效的一般性决议”签订的。

当俄荷贷款协定列入维也纳条约时,威灵顿公爵曾惊呼:

①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自己那一份”这几个字之后还有下面的话:“因为贷款协定规定比利时各省继续是荷兰不可分割的领土,但现在荷兰已经不再享有对这些地区的主权了”。——编者注

“这是卡斯尔雷勋爵在外交上的杰作，因为债务迫使俄国遵守维也纳条约。”^①

因此，当俄国拒绝遵守维也纳条约，占领了克拉科夫的时候，休谟先生提议不再从不列颠国库中拨款给俄国。但是子爵阁下认为，尽管俄国在波兰问题上有权违反维也纳条约，英国在俄国问题上仍旧有义务遵守条约。

但这还不是勋爵阁下行为中最令人惊奇的事实。比利时革命爆发以后和议会批准给俄国新的贷款以前，勋爵阁下就已经以偿还英国在1815年所欠旧债为名，承担了俄在对波兰战争中的开支。尽管从英国最著名的法学家、现在的圣伦纳兹勋爵爱·萨格登爵士的权威声明看来，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丝毫疑问；政府没有任何权利支付哪怕一个先令”。（下院，1832年1月26日）

我们还可以援引权威人士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话：“法律没有授权勋爵阁下支付这笔款项。”（下院，1832年7月12日）

总之，我们现在明白了勋爵阁下为什么不论在什么场合总要重复说：

“再也没有什么能比波兰问题的辩论更使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头疼的了。”^②

① 转引自比·埃斯科特 1847年3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亨·帕麦斯顿 1846年8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段是以下面这样的话结尾的：“对于他始终不渝地为之效劳的那个强国的侵略行为，他目前要作出反对的姿态，而这当中究竟有几分诚意，读者现在也可以作出评价了。”——编者注

第 四 篇^①

子爵阁下有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自我吹嘘的话题,那就是他对整个大陆的立宪自由有贡献。的确,多亏他的发明创造,世界上才有了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立宪”王国^②——三个只能同《浮士德》中瓦格纳的何蒙古鲁士相比的政治幻影。一位科堡氏^③操纵的胖女人唐娜·玛丽亚·达·格洛丽亚压迫下的葡萄牙

① 在1853年11月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篇开头是这样一段话:“有些人期待着不列颠政府在现已开始的俄土战争²⁵⁴期间最终会放弃那种敷衍办法和毫无结果的谈判,而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迫使俄国入侵者放弃他们的掠夺物以及他们幻想统治世界的野心。如果从抽象的可能性和抽象的政策来看,这种期待不能说没有一些道理。但是,只要认真思索一下下述的种种事实,看看那位被看作最坚决反对俄国专制政府向欧洲推进的行动的英国大臣过去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现这种期望是很少有现实根据的。的确,英国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对政府在俄土冲突中采取的政策不满,但他们却天真地相信事情一旦由帕麦斯顿勋爵去做,就会完全两样。这些人如果回忆一下子爵阁下的生平,难免会对1832—1847年这一多事的时期留下一段令人不解的空白,现在,就让我们来填补这段空白,使他们从中得到教益吧。”——编者注

② “‘立宪’王国”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立宪式王国”。以下“——三个”到“政治幻影”被删去。——编者注

③ 斐迪南-奥古斯特-弗兰茨-安东。——编者注

“应被看作是欧洲的独立强国之一”。(下院,1837年3月10日)

就在子爵阁下说这话的同时,有6艘不列颠战列舰在里斯本抛下了锚,奉命前来保卫唐·佩德罗的“独立”女儿免受葡萄牙人民的伤害,并帮助她废除她曾经宣誓要保护的宪法。被交给另一个玛丽亚^①(她虽然罪行累累,但永远也成不了抹大拉的马利亚)统治的西班牙,

“正以欧洲各王国中一个美好的、繁荣的、甚至令人生畏的强国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帕麦斯顿勋爵1837年3月10日在下院的演说)^②

当然,对西班牙债券持有者来说确实是令人生畏的。甚至把伯里克利和索福克勒斯的祖国交给巴伐利亚的一个白痴般的小孩子来进行名义上的统治^③,勋爵阁下也找到了充足的理由。

“国王奥托系来自施行自由宪法的国家。”(下院,1832年8月8日)

巴伐利亚这个德国的贝奥蒂亚^④居然有自由宪法!这话甚至超出了诗的自由和修辞性的夸张,超过了所谓西班牙使人产生“合理的期望”、葡萄牙是个“独立强国”等等说法。至于比利时,帕麦斯顿勋爵为它所做的事无非就是让它负担了一部分荷兰的债款,减去它的

①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编者注

②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整个这句话为“饱受另一个玛丽亚——那不勒斯的母狼压迫的西班牙,按照他的乐天的观点,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美好的和合理的期望:它还会变成欧洲各王国中一个繁荣的、甚至令人生畏的强国,就像它过去那样’”。——编者注

③ 巴伐利亚王子奥托受命为希腊国王时年仅17岁。——编者注

④ 贝奥蒂亚为古希腊一较落后地区。——编者注

卢森堡省,加给它一个科堡王朝。谈到同法国的友好协约²⁷,可以说,这种友好协约从1834年帕麦斯顿勋爵为使它具有完备形式而建立了四国同盟²⁷的时候起就开始不起作用了;我们已经看到勋爵阁下在波兰问题上曾经多么有成效地利用了这种协约关系,我们不久还会听到这种关系在他手中变成什么东西^①。

有一些事实虽然不大引起同时代人的注意,却成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清晰标志,1833年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占领就是一个这样的事实。

俄国的宿愿终于实现了。来自冰冷的涅瓦河畔的野蛮人把繁荣奢华的拜占庭和阳光煦丽的波斯普鲁斯海岸紧紧地抱在自己怀里。自封的希腊皇帝后裔^②占领了——虽然是暂时地——东方的罗马。^③

“俄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决定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土耳其的命运。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的事实,即使是为了保卫它(?),也是对土耳其的独立地位的决定性的一击,就和俄国的旗帜已经飘扬在塞拉尔宫^④上空一样。”(罗伯特·皮尔爵士1834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

由于在1828—1829年那场不幸的战争中战败^⑤,土耳其政府
在它的臣民的心目中失去了威信。于是,正像东方的各个帝国中通

① 从“谈到同法国的友好协约”起的整句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不过,我们还是来谈谈土耳其人和俄国人”。——编者注

② 奥托一世。——编者注

③ 东方的罗马指拜占庭。最后这句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被删去。——编者注

④ 土耳其皇宫。——编者注

⑤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接下去还有“和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编者注

常发生的情况那样,每当最高权力被削弱时,帕沙们就成功地造起反来。早在1831年10月,苏丹^①和在希腊起义时曾支持过土耳其政府的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里之间的冲突就已开始。1832年春,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帕沙带领军队开进了叙利亚,经过霍姆斯会战占领了该省,接着越过托罗斯山,在科尼亚会战中消灭了土耳其最后一支军队之后,就直扑伊斯坦布尔。1833年2月2日苏丹被迫向圣彼得堡求援。2月17日,法国海军上将鲁森到达君士坦丁堡;两天之后,他规劝土耳其政府,并答应在一定的条件下,包括在土耳其政府拒绝俄国援助的条件下,采取措施迫使帕沙撤兵。但是因为鲁森没有人支持,当然他也就无力对付俄国了。“是你叫我来,我就来了。”^②2月20日,俄国舰队从塞瓦斯托波尔出发,运送一大批俄军在波斯普鲁斯海岸登陆,包围了首都。俄国对保卫土耳其是这样热心,以致同时还派了一名俄国军官去通知埃尔祖鲁姆和特拉佩宗特的帕沙说,一旦易卜拉欣的军队要向埃尔祖鲁姆进发,这个地方和特拉佩宗特都必须立即交由俄国军队保卫。1833年5月末,奥尔洛夫伯爵由圣彼得堡来到,对苏丹说他随身带来一个小纸片请苏丹签字,无须征得他的大臣们的同意,也不必让驻土耳其政府的外交使节知道。于是就这样产生了有效期为八年的有名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¹⁵⁶。条约规定,土耳其政府同俄国建立攻守同盟,未经俄国同意不得与其他强国签订任何新的条约,并确认以前的各项俄土条约,特别是阿德里安堡条约^③。附在条约中的一项秘密条款规定,

① 马茂德二世。——编者注

② 莫扎特(唐璜)中骑士团长的雕像所说的话。——编者注

③ “特别是阿德里安堡条约⁴¹”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被删去。——编者注

土耳其政府必须

“为俄帝国朝廷的利益关闭达达尼尔海峡，即不让任何外国军舰以任何借口开进海峡。”①

沙皇能用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并且由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签订而把奥斯曼帝国的宝座从君士坦丁堡搬到圣彼得堡来，他究竟应该感谢谁呢？不是别人，就是坦普尔男爵、爱尔兰贵族、国王陛下最尊贵的枢密院委员、最尊贵的巴斯大十字勋章荣膺者、议会议员、陛下的首席外交大臣亨利·约翰·帕麦斯顿子爵阁下。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1833年7月8日签订的。1833年7月11日，亨·利·布尔沃先生提出一项提案，要求向议院提供有关土耳其-叙利亚问题的文件。勋爵阁下对这一提案表示反对，

“因为这类文件所涉及的事情尚未结束，而整个事情的性质如何要看结局如何而定。既然结果还不知道，提出这一提案也就为时过早”。（下院，1833年7月11日）

布尔沃先生责备勋爵阁下不该不去保卫苏丹反对穆罕穆德-阿里，让俄国军队无阻拦地向前推进，于是，勋爵阁下就开始运用他后来又有所发展的、辩解与自供交织在一起的独特体系。现在我要把这个体系的片断收集到一块来。

“我不准备否认，苏丹在去年下半年曾向英国请求过援助。”（下院，1833年7月11日）

“8月间土耳其政府正式请求援助。”（下院，1833年8月24日）

不，不是8月间。

①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俄土同盟条约特别条款》。——编者注

“土耳其政府请求给予海军援助是在 1832 年 10 月间。”(下院, 1833 年 8 月 28 日)

不, 不是 10 月间^①。

“土耳其政府请求援助是在 1832 年 11 月间。”(下院, 1834 年 3 月 17 日)

勋爵阁下完全说不准土耳其政府向他求援的日期, 就好像福斯泰夫说不准从他背后袭击他的人数^②一样, 他时而说他们穿的是麻衣, 时而又说穿的是草绿色衣服。然而, 帕麦斯顿不准备否认土耳其政府曾拒绝俄国的武装援助并来求助于他的事实。他拒绝了土耳其政府的请求。于是土耳其政府再度求助于勋爵阁下。土耳其政府先是派马乌罗盖尼先生去伦敦, 后来又派纳梅克帕沙请求派一支海军分舰队援助, 并且答应苏丹将负担这支分舰队的全部费用, 将来还要给予新的贸易特权和给予土耳其境内的不列颠臣民以各种优惠来报答这种援助。当时俄国对勋爵阁下会表示拒绝这一点拿得这样准, 竟至附和了向勋爵阁下求援的土耳其全权代表的请求。这是勋爵阁下本人对我们说的, 他说:

“公正心使我不能不说, 俄国对英国政府给予这种援助根本没有表现任何嫉妒; 当请求尚在考虑之中的时候, 俄国大使^③就正式通知我, 说他已经得知了土耳其的这一请求, 并且说, 俄国也愿意看到土耳其帝国能够得到维护和保持, 因此诸位大臣如能使这一请求得到实现, 俄国将深感满意。”(下院, 1833 年 8 月 28 日)

①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接下去还有: “这一点我们是从一年后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得知的。”——编者注

②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 2 幕第 4 场。——编者注

③ 赫·利文。——编者注

但是,尽管土耳其找到俄国这样一个毫无私心地支持它求情的人,勋爵阁下对土耳其政府三番五次的请求仍无动于衷。这时土耳其政府当然也就明白要它干什么了。它知道,它已注定非要请狼来看护羊不可了。但它还是犹豫不决,一直过了三个月,它才决定接受俄国的援助。^①

勋爵阁下说道:“大不列颠对于俄国给予这种援助从未表示过不满;相反,它对于土耳其不管从哪里终于得到了实际援救而感到高兴。”(下院,1834年3月17日)

但是不管土耳其政府向帕麦斯顿勋爵求援是在哪一天,他都不能不承认:

“毫无疑问,如果英国认为可以进行干涉,则入侵军队的前进就会被阻止,而俄军也就不会应邀开进土耳其。”(下院,1833年7月11日)

那么他究竟为什么不“认为可以”进行干涉,挡住俄国人呢?

首先他借口**时间不够**。但是,根据他本人的话,土耳其政府与穆罕默德-阿里之间的冲突早在1831年10月间就已经开始,而决定性的科尼亚会战到1832年12月21日才打起来。难道他在整个这段时期中都没有时间吗?易卜拉欣帕沙在1832年7月的大会战²⁵⁵中赢得了胜利,从7月到12月帕麦斯顿仍旧没有时间。他在整个这一阶段一直是在等待土耳其政府的正式请求,而正式请求照他的最后一种说法是在11月3日才提出来。

① 最后三句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这时土耳其政府当然也就明白要它干什么了。它知道,它已注定非要接受俄国的援助不可了”。——编者注

罗伯特·皮尔爵士问：“难道他对黎凡特发生的事件毫无所知，非要等正式请求来到不可吗？”（下院，1834年3月17日）

而且，从提出正式请求的11月起至2月下旬——俄国直到1833年2月20日才出兵——又过了四个月之久。那么为什么他在这一时期还是毫无作为呢？

不过他还有更好的借口。

埃及帕沙不过是叛臣，而苏丹是享有主权的君主。

“因为这是臣子反对他的君主的战争，而且这个君主又是英国国王的同盟者，所以同帕沙有任何来往都是与真诚不相容的。”（下院，1833年8月28日）

总之，是礼仪不让勋爵阁下去阻止易卜拉欣的军队。是礼仪不许他指示驻亚历山大里亚的领事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影响穆罕默德-阿里。勋爵阁下像西班牙大贵族一样，宁愿让女王被烧成灰烬，也不愿触犯礼仪碰一碰她的裙子。但是可惜得很，勋爵阁下在1832年就曾未经苏丹同意向苏丹的“臣子”派去了领事和外交代表，并且同穆罕默德签订了条约，修改了现存的有关贸易和关税的规章制度，代之以新的规定；他做这些事情既没有事先征得土耳其政府的同意，也没有事后取得土耳其政府的认可^①。（下院，1848年2月23日）

关于这一点，子爵阁下当时的上司格雷伯爵告诉我们说，

“英国在这一时期同穆罕默德-阿里有广泛的商业关系，破坏这种关系对英国不利。”（上院，1834年2月4日）

① 这句话的后一部分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并且同穆罕默德-阿里签订了条约，修改了现存的有关贸易和关税的规章制度；他既没有事先征求土耳其政府的同意，甚至也没有事后取得土耳其政府的认可；这样，他已经把‘叛臣’作为独立的势力对待”。——编者注

怎么,竟同“叛臣”有商业关系!

但是大家要知道,子爵阁下的舰队当时正在杜罗河和塔古斯河上忙着,他的舰队要封锁斯海尔德河,要在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时这些立宪王国诞生方面充当接生婆。所以他当时连一艘军舰也无法派出^①。(下院,1834年3月17日和上院1834年2月4日)

而苏丹始终坚持的正是要求给予海军援助。我们姑且就认可勋爵阁下的论据,假定他确实连一艘军舰也派不出。但是一些很有权威的人士都肯定地对我们说,当时勋爵阁下一艘军舰也不需要派,只需要他说一句话^②。这些权威人士中有曾经在纳瓦里诺消灭了土耳其舰队的海军上将科德林顿。

他说,“很久以前,在撤出摩里亚的问题上,穆罕默德-阿里就曾体会到我们出面说话的分量。当时土耳其政府命令他抗拒一切撤出摩里亚的要求,并要他以人头作担保。他虽然也作了抗拒,但最终还是明智地作了让步,撤出了摩里亚。”(下院,1836年4月20日)

再听威灵顿公爵是怎样讲的。

“如果在1832或1833年议会开会期间他们就明确地告诉穆罕默德-阿里,不许他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进行争夺,他们可能当时就结束了战争,而无须冒险让俄皇派海陆军到君士坦丁堡去了。”(上院,1834年2月4日)

但是还有更大的权威。一位是勋爵阁下本人。

①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接下去还有“去干阻止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或制止穆罕默德-阿里危及世界现状的行动这样的小事”。——编者注

②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接下去还有“以便约束穆罕默德-阿里的野心,阻挡易卜拉欣帕沙的军队。这是马洪勋爵告诉我们的,他说那些话的时候正是他在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期间在外交部任职的时候”。——编者注

他说，“陛下的政府虽然没有满足苏丹关于给予海军援助的请求，但是英国毕竟给了他以道义支持。不列颠政府向埃及帕沙和统率小亚细亚埃及军队的易卜拉欣帕沙所作的声明，对于苏丹同埃及帕沙达成协议（在屈塔希亚）²⁵⁶从而结束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下院，1834年3月17日）

另一位是德比勋爵——当时还被称为斯坦利勋爵，帕麦斯顿的内阁同僚，他

“大胆断言，穆罕默德-阿里的推进所以被停止下来，完全是由于法英两国发表了明确的声明，不许他的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下院，1834年3月17日）

总之，照德比勋爵和帕麦斯顿勋爵本人的说法^①，并不是俄国的分舰队，也不是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军队，而是不列颠驻亚历山大里亚的领事代理^②的明确声明，迫使易卜拉欣停止他向君士坦丁堡的胜利进军，促成了屈塔希亚的协议，协议的结果是穆罕默德-阿里除埃及外还获得了叙利亚帕沙辖区阿达纳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勋爵阁下认为让他的驻亚历山大里亚领事作这一明确声明的适当时机，是在土耳其军队被消灭之后，当时君士坦丁堡已经被哥萨克所占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已为苏丹所签署并被沙皇放进口袋里去了。

如果说时间不够和军舰缺乏使勋爵阁下不能给苏丹以援助，而过分的拘于礼仪又妨碍他去阻止帕沙的行动，那么他至少可以要他的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制止俄国势力的过分加强，把俄国势力限制

①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里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这是这些稀奇的事情中最稀奇的事情——”。——编者注

② 约·曼德维尔。——编者注

在狭小的范围内吧？恰好相反。为了不妨碍俄国的行动自由，勋爵阁下特别注意在最危急的时期根本不在君士坦丁堡留驻大使。

“在到7月8日为止的六个月过程中，驻土耳其大使的权威和地位比驻任何一国的大使都更为重要，比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马洪勋爵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帕麦斯顿勋爵告诉我们说，不列颠大使斯特拉特福·坎宁爵士离开君士坦丁堡是在1832年9月间，驻在那不勒斯的庞森比勋爵在11月间受命接替他的职位；“在做赴任之前的必要准备工作的时候产生了困难”，——虽然送他赴任的军舰在等着他——“由于天气恶劣，他直到1833年5月底才抵达君士坦丁堡”。（下院，1834年3月17日）

由于俄国人还没有到^①，所以庞森比勋爵就受命用了七个月的时间从那不勒斯坐船到君士坦丁堡去赴任。

况且，勋爵阁下又何必必要阻止俄国人去占领君士坦丁堡呢？

“从我这方面来说，我非常怀疑，俄国政府的政策中有任何一点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意图。”（下院，1833年7月11日）

是啊，当然没有！俄国并不想瓜分这个帝国，它倒是想整个独占。帕麦斯顿勋爵除了因这个怀疑而有了安全感之外，他还由于“怀疑俄国的政策是否会在现时就要达到这一目的”而有了第二个安全感，而第三个“安全感”是来自第三个“怀疑”：

① “由于俄国人还没有到”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斯特拉特福·坎宁爵士被召回是在9月间，而庞森比勋爵被委任是在11月间。但是，既然易卜拉欣帕沙还没有越过托罗斯山，还没有揭开科尼亚会战，俄国人还没有占领沙皇格勒”。——编者注

“俄罗斯民族(请注意:是俄罗斯民族!)把它的权力、行政和统治中心都移到南方各省,将是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必然结果,但是俄罗斯民族对这种迁移是否已经作好准备,很值得怀疑。”(下院,1833年7月11日)

除这些反面论据外,勋爵阁下还有一个正面论据:

“他们之所以平心静气地看着土耳其首都被俄国军队暂时占领,那是因为他们完全相信俄国知荣誉和守信用…… 俄国政府援助苏丹的时候是以它的荣誉作保证的,对于这种保证我是绝对相信的。”^①(下院,1833年7月11日)

勋爵阁下所怀抱的信任是如此地玄妙莫测、坚定不移、完全彻底、恒久不变、牢不可破、难以名状、无与伦比和无可救药,如此地无边无际、无所畏惧和无可比拟,以致他在1834年3月17日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已经成为既成事实时仍然宣称,“大臣们并没有信任错”。的确,如果是天性使他的信任之心大得反常,那又怎么能怪他呢?

①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段引文之后还有这样一段话:“他曾同样怀着这种对俄国的信任,信赖俄国不会消灭波兰的宪法和民族生存。但是沙皇颁布了1832年的组织法²⁵⁷,把波兰宪法和民族生存都消灭了。虽然如此,勋爵阁下所抱的无限信任仍然是丝毫没有动摇。”——编者注

第 五 篇

1833年8月21日,《先驱晨报》发表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¹⁵⁶的内容。8月24日,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在下院询问帕麦斯顿勋爵:

“俄土之间是否果真缔结了攻守同盟条约?我希望勋爵阁下能在议会本届会议闭会前不仅把土俄之间所缔结的各项条约的本文,而且把有关缔结这些条约的全部情况提交议院。”

帕麦斯顿勋爵回答说:

“不列颠政府一旦肯定所提到的条约确实存在,一旦获得这一条约的本文,那时它就会决定它应当采取什么政治方针……新闻界有时走在政府前面,决不能因此责难政府。”(下院,1833年8月24日)

过了七个月,他要议会相信,对他来说

“要在8月间正式知道9月间才在君士坦丁堡最后批准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绝对不可能的”。(下院,1834年3月17日)

可见,条约他是知道的,只不过不是正式而已。^①

^① 整个这句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不过,勋爵阁下在8月间真的不能肯定这样一项条约‘确实’存在吗?他当时还没有获得这一条约的本文吗?后来,在1848年3月,他亲口说道:”。——编者注

“不列颠政府得知俄军是带着这项条约撤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消息之后，感到很惊奇。”(帕麦斯顿勋爵 1848 年 3 月 1 日在下院的演说)

可见，勋爵阁下早在条约签字以前就已经获得了它。

“土耳其政府刚一收到它(即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草案)，就把它交到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大使馆，并请求英国保护它对付易卜拉欣帕沙和尼古拉这两方面的逼迫。请求遭到了拒绝。但事情并不是到此为止。这件事还被极端背信弃义地告知了俄国大使^①。于是第二天俄国大使就把土耳其政府交给英国大使馆的那一份条约副本交还土耳其政府，并且讽刺地建议土耳其政府下次要挑选比较可靠的受托人。”(下院，1848 年 2 月 8 日)^②

但是子爵阁下毕竟达到了他所想达到的全部目的。他在下院被质询到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事是 1833 年 8 月 24 日，那时他对这一条约是否存在还不能肯定。8 月 29 日，议会就宣布休会，这时议会从国王^③那里得到这样一个令人快慰的担保：

“破坏土耳其和平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议员们可以相信，国王将密切注视可能损害土耳其帝国的现状或它将来的独立的任何事件。”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解决有名的俄国七月条约之谜的钥匙。条约是在 7 月间签订的，到 8 月间，有关条约的某些消息通过公众报刊透露出来。帕麦斯顿勋爵在下院受到质询。当然，他是一无所知的。接下去，议会闭会了，等到议会复会时，条约已成往事，或者像 1841 年那样已经不顾舆论的反对而生效了。

议会于 1833 年 8 月 29 日闭会，1834 年 2 月 5 日复会。在这闭

① 赫·利文。——编者注

② 引自托·奇·安斯蒂的演说。——编者注

③ 威廉四世。——编者注

会和复会之间发生了两件互相有密切联系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法英联合舰队开到了达达尼尔海峡,在那里展示了一下三色旗和英国国旗之后就开往士麦那,然后又从那里回到了马耳他。第二件事是1834年1月29日土俄两国在圣彼得堡缔结了一个新条约²⁵⁸。这一条约刚一签字,联合舰队就返航了。

这一联合行动的用意在于愚弄不列颠人民和欧洲,要他们相信,在土耳其领海及海岸举行敌意示威是针对着土耳其政府的,因为它缔结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而且由于这个行动,俄国才被迫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上述的那项新条约。这个新条约显然为土耳其政府解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⁴¹强加给它的某些义务,因为俄国在条约中答应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兵^①,并把土耳其应付的赔款缩减为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一。其他各项条款无非是确认阿德里安堡条约,根本没提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并且一个字也没有提军舰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相反,条约为土耳其减轻的负担,还成了俄国为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所规定的达达尼尔海峡对欧洲封闭付出的代价。

“在〈不列颠舰队〉举行示威的当天,勋爵阁下向俄国驻英大使担保说,舰队的这种联合行动对俄国决无任何敌意,也不应当把这种行动看作是对俄国的敌意的示威,其实这种行动根本没有什么用意。我这样说是根据勋爵阁下的同僚、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庞森比勋爵的权威性证词。”(安斯蒂先生1848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

圣彼得堡条约最后批准之后,勋爵阁下对于俄国所坚持的条件的有分寸表示满意。

①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在“……撤兵”之后还有“(锡利斯特里亚除外)”。——编者注

议会复会之后，在外交部的机关报《地球报》上登出一则简讯，其中说道：

“圣彼得堡条约不是证明了俄国的分寸感和明智，就是证明了英法同盟以及两强国使用的强硬而一致的言词对圣彼得堡最高当局产生了影响。”（1834年2月24日《地球报》）

这样一来，舆论界就会不去注意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了，该条约在欧洲所引起的对俄国的敌意也就会削弱了。^①

但是这种诡计不管多么巧妙，却没有成功。1834年3月17日希尔先生提出一项议案，要求

“把土俄两国缔结的各项条约以及英、俄、土三国政府间有关这些条约的一切往来文件的副本提交议院”^②。

勋爵阁下拼命地反对这一决议案，硬要议院相信“只有议院完全信任政府”并拒绝这项提案，“和平才能得到保持”^③。结果这项提案被否决了。但是他拒绝提交文件的理由是这样荒谬和笨拙，以致罗

① 在1854年出版的小册子《帕麦斯顿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中，这段话为“这样一来，一方面，阿伯丁勋爵和威灵顿公爵抗议过的阿德里安堡条约就从英国方面得到了帕麦斯顿勋爵的偷偷的承认，因为勋爵阁下对圣彼得堡协定正式表示满意，而圣彼得堡条约只不过是最后批准阿德里安堡条约；另一方面，舆论界就会不去注意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了，该条约在欧洲所引起的对俄国的敌意也就会削弱了”。——编者注

② 理·希尔1834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③ 这句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他要求议院不要对他施加压力，因为‘只有议院完全信任政府，和平才能得到保持’；如果让政府独立行事，它一定能保护英国的利益，防止外来的侵略”。——编者注

伯特·皮尔爵士用自己的议会语言把他叫作“论据完全不合逻辑的辩论者”^①，连他的追随者伊文思上校也不禁这样叫了起来：

“勋爵阁下的这次演说是我曾经听到过的历次演说中最不能令人满意的一次。”^②

帕麦斯顿勋爵竭力说服议院^③，要它根据俄国的保证把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看作是“建立在相互原则上的条约”。这种相互原则就表现在，一旦战争爆发，达达尼尔海峡不仅对英国封锁，而且也对俄国封锁。这种说法根本就不对；就算是这样，那么这种相互原则也肯定是爱尔兰式的，即一切好处都归一方。俄国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并不是要进入黑海，相反，是从黑海出来。

希尔先生断言“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后果就像土耳其政府把达达尼尔海峡让给了俄国一样”，帕麦斯顿勋爵无法驳倒这种说法，他承认条约是对不列颠军舰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并且承认一旦英俄之间发生战争，则“根据该条约的条款，事实上很可能连商船也不能进入黑海”。但是，如果政府能保持“镇静”，如果政府“不表示不必要的不信任”，即默许俄国今后的一切侵略行为，那么他

“可以认为，甚至这一条约生效的事情也有可能不发生，因此，条约实际上将等于一纸空文”。（下院，1834年3月17日）

此外他还断言，不列颠政府从缔约双方得到的“保证和解释”，在

① 罗·皮尔 1834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乔·伊文思 1834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③ 这句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为了蒙蔽议院，他顺口说了一些话，其大致意思就是”。——编者注

很大程度上促使政府拒绝反对这个条约。可见,在帕麦斯顿看来,应当注意的不是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条款,而是俄国在条约这件事情上所作的保证,不是俄国的行动,而是它的言词。但是就在当天,有人要他注意法国代办拉格勒内先生对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抗议以及涅谢尔罗德伯爵在《圣彼得堡报》上作答时所说的“俄皇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只当拉格勒内先生的照会中的声明不存在”这种咄咄逼人和傲慢无礼的话,这时勋爵阁下就收回了自己说过的话,转而提出一种相反的说法,他声称,

“英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首先必须重视外国的行动,而不是它们在某一场合对某一个别事情所使用的言词。”^①

他忽而叫人注意俄国的言词,不管它的行动,忽而又叫人注意它的行动,不管它的言词。

1837年他仍然对议院肯定地说,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条约。”(下院,1837年12月14日)

而十年以后,当条约早已成为过去,勋爵阁下准备要扮演真正的英国大臣和“我是罗马公民”¹⁵⁴的角色的时候,他才老老实实在地对议院说,

“无疑,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在某种程度上是俄国全权代表奥尔洛夫伯爵在那种使土耳其难于拒绝的情况(正是勋爵阁下所造成的)下强加于土耳其的……实际上,条约使得俄国政府可以在土耳其进行干涉和主宰一切,这是和这个国家的独立不相容的。”(下院,1848年3月1日)

① 亨·帕麦斯顿 1834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在议会关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整个辩论过程中，勋爵阁下像喜剧里的小丑一样，有一个能够适合一切需要和回答一切问题的无所不包的答话，这就是：英法同盟。当人们对他纵容俄国大加嘲笑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反驳说^①：

“如果这些嘲笑针对的是目前英法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那么我只能说，我对于我能参与促成这种友好谅解感到自豪和满意。”（下院，1833年7月11日）

当有人要求他提交有关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文件时，他回答说：

“英法两国现在巩固了它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在不断加强。”（下院，1834年3月17日）

罗伯特·皮尔爵士大声喊道：“我只想指出一点：勋爵阁下只要由于我们欧洲政策的某一问题而陷入窘境，马上便使用一个现成的脱身之法，即向议院祝贺英法之间的亲密同盟，”但是同时勋爵阁下也使他的反对者托利党人越来越怀疑，“英国是不得已才纵容对土耳其的侵犯行为的，这种侵犯行为的直接鼓励者是法国。”^②

由此可见，现在拿出同法国的同盟给人看是要掩盖暗中听命于俄国的事实，就像1840年大嚷大叫同法国决裂是要掩盖同俄国的正式同盟那样。

① 这段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在就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进行辩论的整个期间，勋爵阁下在对付一切攻击他纵容俄国的做法时准备好了一个十分得意的论据，这就是：他和法国的亲密同盟。他像喜剧里的小丑一样，有一个能够应付一切需要和回答一切问题的无所不包的答话，即：英法同盟。当人们对他纵容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大加嘲笑的时候，他反驳说……”。——编者注

② 罗·皮尔1834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勋爵阁下大量提供已经发表的就比利时立宪王国问题谈判情况的文件,大量提供关于“独立国”葡萄牙情况的许多口头上的和文字上的解释,数量之多,使人为之厌倦,可是到现在为止,谁也不能从他那里抠出任何一份有关第一次叙土战争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文件来。1833年7月11日人们第一次要求他把有关这一问题的文件提交出来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提案为时过早,事情尚未结束,结果还不知道”。1833年8月24日他说,“条约尚未正式签字,他尚未弄到条约的全文。”1834年3月17日他说:“谈判尚在进行……,争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尚未结束。”甚至在1848年,当安斯蒂先生告诉他,要他提交文件是因为确信这些文件可以证明勋爵阁下同沙皇进行勾结的时候,我们这位英勇的大臣却宁肯用五个小时的讲话来消磨时间,也不愿用那些一目了然的文件来消除怀疑。这些还不算,1837年12月14日他还厚颜无耻地对托·阿特伍德先生断言^①,“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有关文件早在三年前”,即1834年当他声言只有不把这些文件转交议院“和平才能得到保持”的时候,“就已经提交议院了”。同一天他还对阿特伍德先生说,

“这个条约现在已经成了往事。条约的签订是有期限的,这个期限已经满了。尊贵的议员提出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必要的,是完全多余的。”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有效期限按照原来的规定应该到1841年7月8日满期。1837年12月14日帕麦斯顿勋爵就对阿特

^① 这句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1837年12月14日他在反对托·阿特伍德先生关于提交有关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文件的决议案时,他的那一套谎言、托词、矛盾、诡计和谬论达到了顶点,竟说”。——编者注

伍德先生说,这个期限已经满了。①

“现在你还有什么鬼话,什么巧计,什么藏身的地窟,可以替你遮盖这场公开的羞辱吗?来,让我们听听吧,杰克;你现在还有什么鬼话?”②

① 这句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子爵阁下也知道,不管是在 1834 年,还是在别的任何时候,文件都没有提交给议院。他知道,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在 1837 年 12 月 14 日远未满期,直到 1841 年 7 月 8 日以前是继续具有充分效力的”。——编者注

② 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 2 幕第 4 场。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篇的结尾如下:“这就是那一位为俄军敞开君士坦丁堡的大门、使达达尼尔海峡对英国舰队封闭、帮助沙皇占领君士坦丁堡数月、控制土耳其多年的英国大臣用来给自己筑成最后一个藏身之所的整套骗术。如果设想他现在会掉转身来反对他长久为之效忠的朋友,那就非常荒唐了。”——编者注

第 六 篇

在俄语词汇里没有“荣誉”这个词。这个概念被看作是法国人的幻想。俄国有一句俗话说：“什么是荣誉？这是法国人的契玛拉。”俄国的荣誉的发现完全应该归功于帕麦斯顿阁下，因为他在四分之一世纪过程中每到紧急关头总是最坚决地替沙皇^①的“荣誉”作保。1853年的议会闭会时他就是这样做的，1833年的议会闭会时他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勋爵阁下恰巧正在公开表示“自己绝对相信沙皇知荣誉和守信用”的时候，收到了一些对所有其他国家保密的文件，看了它们之后，对于俄国知荣誉和守信用是怎么回事就不会再有任何疑问了，——如果这种疑问曾经有过的话。勋爵阁下甚至用不着费力抓搔，就能在俄国人身上看到鞑靼人的原形。他遇上了一个奇丑而不加任何掩盖的鞑靼人^②。他收到的是当权的俄国大臣和外交官们的自供状，他们撕去了自己的假面具，表露了最不可告人的思想，毫不掩饰地暴露出他们实行侵略和征服的计划，轻蔑地嘲弄欧洲各国宫廷和大臣们的愚蠢的轻信，恣意嘲笑所有的维莱尔们、梅特涅们、阿伯丁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② 在英文中，“to catch a Tartar”本义为“遇上一个鞑靼人”，转义是“遇上
一个难以应付的对手”或“娶了一个泼妇”。——编者注

们、坎宁们和威灵顿们。他们抱着野蛮人的蛮横无耻态度，混杂着谄媚者阴毒的冷嘲热讽，一同策划着怎样使巴黎不信任英国，使伦敦不信任奥地利，使维也纳不信任伦敦；怎样唆使他们互相倾轧，怎样把他们全都变成俄国的单纯的工具。

在华沙起义时期，总督的档案落到了得胜的波兰人手里。这些档案是在康斯坦丁大公的宫邸中保存着的，其中有俄国大臣们从本世纪初到1830年的密信。最初，波兰流亡者把这些文件带到法国，后来，查尔托雷斯基公爵的外甥扎莫伊斯基伯爵把这些文件交给了帕麦斯顿勋爵，而他就按照基督教的精神把它们忘记了。子爵阁下一方面口袋里装着这些文件，一方面却对不列颠“元老院”和全世界特别狂热地宣布“他绝对相信俄国皇帝知荣誉和守信用”^①。

这些轰动一时的文件终于在1835年末在有名的《公文集》上发表了出来，这并不是子爵阁下的过失。不管国王威廉四世在其他方面如何，但他毕竟是俄国的死对头。他的私人秘书赫伯特·泰勒爵士同戴维·乌尔卡尔特很熟，他把这位先生推荐给国王，从此国王陛下就同这两位朋友密谋反对“真正英国的”大臣的政策。

“威廉四世诏谕勋爵阁下交出上述文件；这些文件交出后，在温莎城堡^②立即对它进行了研究，并且认为最好是把这些文件印出发表。尽管勋爵阁下强烈地反对，国王还是强迫他以外交部的名义批准了发表，因此，负责校订印行这些文件的编辑所发表的东西，没有一句话不是经勋爵签署或简签的。我本人就曾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上看到过勋爵阁下的简签，但勋爵阁下却否认这些事实。帕麦斯顿勋爵是被迫把这些文件交给乌尔卡尔特先生发表的。乌尔卡尔特先生是《公文集》的实际发行人。”（安斯蒂先生1848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

① 亨·帕麦斯顿1853年8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英王的夏宫。——编者注

国王死后，帕麦斯顿勋爵拒绝向印刷人支付印刷《公文集》的费用；他公开地、郑重地否认外交部与发表文件这件事有任何关系，而且，不晓得他用了什么方法，竟使他的副大臣巴克豪斯先生在否认声明^①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1839年1月26日的《泰晤士报》曾刊登了下面的话：

“昨天的《泰晤士报》公布了被帕麦斯顿勋爵撤职的乌尔卡尔特先生同被子爵阁下留任的巴克豪斯先生的通信，我们虽不知道帕麦斯顿勋爵对此感觉如何，但我们可以肯定，被看作绅士并担任大臣职务的其他任何人对此会有怎样的感觉却是完全清楚的。公开出来的这种通信最有力不过地证实了这样一件事，即名叫《公文集》的著名出版物所发表的这一系列正式文件，都是得到帕麦斯顿勋爵许可以后才印行的；无论是作为一个要对国内外政界负责的政治家，或者是作为一个要对印行支付费用的印刷者和发行者的雇主，勋爵阁下对于发表这些文件都是负有责任的。”^②

土耳其在1828—1829年那场倒霉的战争中弄得财源枯竭，阿德里安堡条约又使它对俄国负着债务，因此它曾不得不更加扩大了令人厌恶的专卖制，几乎所有商品只允许那些向政府买了执照的人售卖。这样一来，国内的商业差不多完全掌握在少数几个高利贷者的手里。乌尔卡尔特先生建议国王威廉四世同苏丹^③缔结一项通商条约，这项条约要能保证不列颠贸易获得巨大利益，同时也能促进土耳其的生产能力的发展，使它的财政状况得到恢复，从而使它摆脱俄国的羁绊。这个条约的奇妙的历史，在安斯蒂先生的下面一段话里

① 《巴克豪斯先生同乌尔卡尔特先生的通信》，见1839年1月25日《泰晤士报》第16948号。——编者注

② 引自1843年《公文集》第2卷第6号。——编者注

③ 马茂德二世。——编者注

讲得最清楚：

“帕麦斯顿勋爵和乌尔卡尔特先生之间的一切斗争都是围绕着这个通商条约进行的。1835年10月3日乌尔卡尔特先生被委任为驻君士坦丁堡使馆秘书；把这个职务交给他的唯一目的是叫他在那里确保土耳其接受这个通商条约。但是他一直拖到1836年6月，甚至到7月还不动身。帕麦斯顿勋爵催促他快去。但他对多次要求他出发的建议总是这样回答：只有当这个通商条约完全取得商业部和外交部的同意时，我才动身，那时我将把它带到土耳其，设法使土耳其政府接受……最后，帕麦斯顿勋爵认可了这个条约，条约随即送交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庞森比勋爵（同时帕麦斯顿勋爵指示他绝对不要让乌尔卡尔特先生插手谈判，把谈判完全抓在自己手里。——这完全违背了同乌尔卡尔特先生谈妥的协议）。但是，一当乌尔卡尔特先生由于勋爵阁下的阴谋而被调离君士坦丁堡，条约立即就被搁置到一边去了。两年以后，勋爵阁下又提起这个条约，这时他在议会里把乌尔卡尔特先生大大恭维了一番，称他为条约的拟制者，并且否认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任何功劳。但是勋爵阁下歪曲了这个条约，各项条款都来了个伪造，把这个条约变成了一个毁灭我国贸易的条约。乌尔卡尔特先生的原条约是把住在土耳其的大不列颠的臣民置于最惠国国民（即俄国人）的地位。被帕麦斯顿勋爵篡改了的条约却把大不列颠的臣民置于身负重重税捐、备受压迫的土耳其臣民的地位。乌尔卡尔特先生的条约除条约本身规定的一切捐税外，废除了各种过境税、专卖制、捐税及其他一切关税。帕麦斯顿勋爵所伪造的条约却专立一款，承认土耳其政府有颁布它认为适当的任何贸易规章或限制法令的绝对权利。在乌尔卡尔特先生的条约中，进口税仍照旧为3先令；在勋爵阁下的条约中，进口税却从3先令提高到5先令。乌尔卡尔特先生的条约规定从价税如下：如果纯属土耳其生产的商品，而且按照通常的专卖制度下所规定的价格很容易就能在外国港口销售的话，则英土两国的全权代表所规定的出口税可以提高，以便在保持利润的同时还增加国家收入；如果是非土耳其生产的商品，而且在外国港口的售价不足以承受高额税金，则出口税可以降低。帕麦斯顿勋爵的条约却为一切商品定了一个12先令的固定的从价税，不管商品是否承受得了。原条约使土耳其商船和商品也享有自由贸易的优惠，伪造的条约却丝毫也没有提到这一点……我抗议勋爵阁下的这种伪造，我抗议他把这些掩盖起来，最后，我还要抗议他欺骗议院，硬说什么这就是乌尔卡尔特先生所拟的那个条约。”（安斯蒂先生1848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

被勋爵阁下篡改了的条约对俄国是这样有利，而对大不列颠却是这样令人厌恶，以致黎凡特地区的某些英国商人决定从此以后要在俄国商号的保护下进行贸易，而另一些商人，如乌尔卡尔特先生所说，只是出于一种民族自尊心才没有这样做。

关于勋爵阁下和国王威廉四世之间的秘密关系，安斯蒂先生向议院讲了下面一段话：

“国王要勋爵阁下注意俄国日益加紧侵略土耳其的问题……我可以证明，勋爵阁下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不得已才接受已故国王的私人秘书的指示的，当时他是否遵从君主的意志决定着他的去留问题……勋爵阁下偶而也斗胆进行反抗，但是接下去总是要低声下气地表示忏悔和顺从。我且不来断定勋爵阁下是否果真曾经离职一两天，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勋爵阁下有一次曾遭到被毫不客气地赶下台的危险。我所指的就是已故国王发现了勋爵阁下在选择英国驻圣彼得堡宫廷的大使时竟看俄国政府的脸色行事，把原来被委任担任这个职务的斯特拉特福·坎宁爵士放在一边，而让位给已故的达勒姆伯爵这位更合沙皇口味的大使。”（下院，1848年2月23日）

最令人惊奇的一个事实就是：正当国王对勋爵阁下的对俄政策作徒劳无功的斗争时，勋爵阁下却同他的辉格党盟友一起，在公众中煽起一种对国王的猜疑心理，使人们认为是国王——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托利党人——破坏了“真正英国的”大臣所作的反俄努力。把托利党人对俄国宫廷的专制原则的偏爱强加在君主身上，这自然是为了解释帕麦斯顿的用别的办法无法说明的政策。当亨·利·布尔沃对议院说下面的话时，辉格党的寡头们曾神秘地发出微笑。布尔沃说：

“就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奥地利驻巴黎大使奥波尼伯爵在谈到东方问题时说，英国宫廷惧怕法国的原则比惧怕俄国的野心还要厉害。”（下院，1833年7月11日）

他们又一次发出微笑,那是在托·阿特伍德先生向勋爵阁下提出如下质问的时候:

“当奥尔洛夫伯爵在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签订后来英国时,国王陛下的宫廷是怎样接待他的?”(下院,1833年8月28日)

国王临终之前,同他的秘书——已故的赫伯特·泰勒爵士一起,把一些文件托付给了乌尔卡尔特先生,“以便在适当的时机为威廉四世辩护”。这些文件一旦公布,就会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勋爵阁下和辉格党寡头集团以往的活动。——对于这些活动,公众一般只能从这个寡头集团过去的种种主张、言辞以及它所谓的原则方面来了解,总之,只能从它的故意做作和虚假姿态方面,从它的伪装方面来了解。

在这里应该对那位20年来一直不屈不挠地反对帕麦斯顿勋爵的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给以应有的评价。他的表现说明了他帕麦斯顿的唯一的对手,他从没有因恫吓而沉默,因收买而让步,因甜言蜜语而倾倒。可是女巫阿耳契娜——帕麦斯顿的其他敌人却都被帕麦斯顿用时而哄骗时而诱惑的手法愚弄了。我们在上面引用了安斯蒂先生激烈谴责勋爵阁下的话,而乌尔卡尔特告诉我们:

“十分耐人寻味的是,被谴责的大臣正在设法同一位议员(安斯蒂先生)亲近,表示要同他合作并建立私人的交情,根本不要他正式收回自己的话或道歉。现政府不久前对安斯蒂先生的正式任命就足以说明一切。”(戴·乌尔卡尔特《俄国的进展》①)

而1848年2月8日这位安斯蒂先生还把子爵阁下比作

① 戴·乌尔卡尔特《俄国在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1853年伦敦第2版第406页。——编者注

“沙皇彼得一世在访问英国宫廷期间用不列颠商人的黄金收买了的威廉三世的国务大臣——无耻的卡马森侯爵”。(下院, 1848年2月8日)

在这种情况下, 起来保护帕麦斯顿勋爵而反对安斯蒂先生的谴责的有谁呢? 这里有希尔先生, 也就是那位在1833年签订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时曾经像1848年安斯蒂先生那样谴责勋爵阁下的希尔先生。有罗巴克先生, 他一度曾经是勋爵阁下的死对头, 而在1850年却出力为勋爵赢得了信任投票。有斯特拉特福·坎宁爵士, 他曾经整整十年一直在揭发勋爵阁下纵容沙皇, 而当为了把他调开, 派他到君士坦丁堡去做大使之后, 就心满意足了。还有达德利·斯图亚特, 他是勋爵阁下十分心爱的人, 只因反对勋爵阁下而被略施小计赶出议会好几年, 而当他再度进入议会时, 就成了真正的英国大臣的忠实的伙伴了。还有科苏特, 他可能已从蓝皮书^①上知道出卖匈牙利的是子爵阁下, 然而在到达南安普敦时却称他为“亲爱的、知心的朋友”。

^① 《关于匈牙利问题的通信。1847—1849。遵照女王陛下敕令送交议会两院。1850年8月15日》。——编者注

第七篇²⁵⁹

只要看一眼欧洲地图，就会在黑海西岸看到多瑙河的河口，正是这条发源于欧洲心脏的河，可以说是天然形成的一条通往亚洲的大道。正对面，在黑海东岸，自库班河以南，高加索山脉从黑海东南伸向里海，绵延约 700 英里，把欧亚两洲分开。

谁掌握多瑙河口，谁就掌握了多瑙河，控制了通往亚洲的大道，同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瑞士、德国、匈牙利、土耳其的贸易，首先是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贸易。如果他还掌握了高加索，黑海就成了他的囊中之物^①；而要关闭黑海的门户，只要把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拿过来就行了。占有了高加索山脉就可以直接控制特拉佩宗特，并通过在里海的统治地位直接控制波斯的北方沿海地带。

俄国贪婪的眼光既注视着多瑙河口，又紧盯着高加索山脉。它在多瑙河口是要夺得统治地位，在高加索山脉则是要保住这种地位。高加索山脉把南俄同俄国人从穆斯林那里夺得的格鲁吉亚、明格列利亚、伊梅雷蒂亚和古里亚等富饶的省份隔开。这样，这个庞大帝国的脚就同身子分开了。只有一条可以称为道路的军用通道，

^① 这句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如果把高加索再给这个强国，黑海就完全属于它，成了它的一个内海”。——编者注

从莫兹多克蜿蜒经过达里亚尔峡谷隘口，通往梯弗里斯；这条道路上虽然一个接一个地布满了工事，但仍不断从两旁遭到高加索部族的袭击。这些部族如果有个军事首领把它们联合起来，甚至可能威胁邻近的哥萨克地区。“一想到含有敌意的切尔克西亚人由一个首领联合起来而可能给俄国南部带来的可怕后果，就令人不寒而栗”，——德国人库普弗先生于1829年率领一个科学考察团随同艾曼努埃尔将军考察厄尔布鲁士山时曾这样感叹地说过^①。

现在，多瑙河和高加索这两个地方都吸引着我们的注意，使我们同样地感到担忧，——在多瑙河岸，俄国占领了欧洲的两大谷仓；在高加索，它面临着失掉格鲁吉亚的危险。^②俄国侵占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是由阿德里安堡条约为它作好准备的，它占有高加索的权利也是从这个条约中得到承认的。

该条约第四款规定：

“两个帝国（俄国和土耳其）之间沿格鲁吉亚、伊梅雷蒂亚和古里亚的边界线以北和以东各地，以及从库班河口到圣尼古拉炮台（包括该炮台在内）的黑海沿岸地区，仍归俄国。”^③

关于多瑙河，条约有如下的规定：

“沿多瑙河直到圣乔治河口划为国界，依此，多瑙河诸支流所形成的各个岛屿统属俄国。南岸仍归奥斯曼土耳其政府。但双方同意南岸从圣乔治和苏利

① 阿·库普弗《厄尔布鲁士山旅行记》1830年圣彼得堡版第4页。——编者注

②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句话下面接着还有一句话：“它在这两个地区的活动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编者注

③ 马克思引用的资料来源未能查明。——编者注

纳两条支流的分叉处起,距多瑙河两小时路程(6英里)以内的地区规定为非居住区,不得修造任何建筑物。仍属俄国宫廷所有的诸岛也依此规定。在这些岛屿上除设立检疫所外,不得修造任何设施或工事。”^①

这两项条款确保了俄国“扩张领土和获得贸易特权”,因而公开破坏了威灵顿公爵在圣彼得堡签订的1826年4月4日的议定书²⁶⁰,以及俄国同其他强国在伦敦缔结的1827年7月6日的条约⁴⁵。因此,英国政府当时拒绝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⁴¹。威灵顿公爵曾对这个条约提出抗议。(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1837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

阿伯丁勋爵曾提出抗议。

“他在1829年10月31日致黑茨伯里勋爵的电文中,对阿德里安堡条约的许多章节都大为不满,并且特别注意有关多瑙河诸岛屿的规定。他否认这个和约(阿德里安堡条约)是尊重土耳其政府的领土主权,尊重地中海沿海各国的地位和利益的。”(马洪勋爵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阿伯丁勋爵宣布,

“如果这个条约被批准,土耳其政府的独立就会丧失,欧洲的和平就会受到威胁。”(格雷伯爵1834年2月4日在上院的演说)

帕麦斯顿勋爵本人也告诉我们:

“至于俄国在南高加索以及黑海沿岸地区扩张疆界,这无疑是同它在土耳其战争爆发前向欧洲作的庄重声明不符合的。”(下院,1837年3月17日)

俄国要想把它对高加索西北各地区的名义上的统治权变为现实,只有封锁住黑海东岸,并且切断对这些地区的武器弹药的供应。

^① 马克思引用的资料来源未能查明。——编者注

但是，黑海沿岸和多瑙河口却决不是克拉科夫这样的被勋爵抱怨为“英国无法采取行动”^①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究竟是用什么诡计得以封锁了多瑙河及攸克辛海沿岸，并且迫使大不列颠不仅同意阿德里安堡条约，而且同意俄国自己违反这个条约呢？

这些问题在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被提到了子爵阁下的面前，当时下院已经收到伦敦、格拉斯哥及其他商业城市的商人的许许多多的请愿书，纷纷反对俄国在黑海采取的财政规章，以及它所实行的旨在阻挠英国在多瑙河上进行贸易的规章和限制。俄国在1836年2月7日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下令在多瑙河口的一个岛上设立了一个检疫所。它借口在这里实行检疫条例，说它有权对溯多瑙河而上的船只登船检查，向它们征税，并且有权扣留那些敢于违抗的船只，把它们押送敖德萨。早在检疫所建立以前，更确切些说，早在以建立检疫所为名而设立海关和工事以前，俄国政府就曾作了试探，以便确定它在对待不列颠政府方面可以冒险到怎样的程度。达勒姆勋爵按照从英国得到的指示办事，就不列颠贸易受到阻挠一事向俄国当局提出了抗议。

“他奉命去询问涅谢尔罗德伯爵，涅谢尔罗德伯爵叫他去向南俄罗斯的省长，南俄罗斯的省长又让他去向驻加拉茨的领事，后者同不列颠驻布勒伊拉的领事作了接触，建议不列颠领事把那些被征税的船长叫到多瑙河口来，即叫到他们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现场来，以便进行调查；当然，他清楚地知道那些有关的船长当时都在英国。”（下院，1836年4月20日《帕特里克·斯图亚特先生的演说》）

俄国1836年2月7日的命令引起了不列颠商界的普遍注意。

^① 亨·帕麦斯顿1840年7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当许多船只已经出海或正要启航时，船长们接到严厉的命令，不许承认俄国所强求的登船检查的权利。如果议院不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这些船只就会遭到厄运。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总排水量至少有5 000吨的不列颠船只就会被扣留并押送敖德萨，直到接受俄国的无理要求才会被放回。”（帕特里克·M. 斯图亚特先生 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俄国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中的一项条款，提出要求占有多瑙河口附近多沼泽的沙洲，这个条款本身就是违反它以前同英国及其他列强于1827年缔结的条约的。而在多瑙河入口处修筑工事和炮台，则违反了明确规定不许在离河六英里以内修筑任何工事的阿德里安堡条约本身。征收税款和阻碍通航，则违反了维也纳条约，因为该条约曾宣布：从可以航行的地点起到河口止的各个河流，航行应完全自由；“税额无论如何不得超过现行的税额”，即1815年的税额；“在未征得沿岸各国的普遍同意以前，税额不得增加”。这样，俄国可以用来为自己辩护的唯一论据是1827年的条约，这个条约被阿德里安堡条约所违反，阿德里安堡条约又被俄国自己所违反，而所有这些都是由于维也纳条约被违反所致。

要想从帕麦斯顿勋爵阁下嘴里听到他承认或不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的声明，那是完全办不到的。至于违反维也纳条约的问题，勋爵阁下

“还不曾得到关于发生该条约所不允许的任何事情的正式情报。要是有关方面作出这样的报告，那时就会采取皇家法律顾问根据英国臣民的权利而认为应该采取的步骤”。（帕麦斯顿勋爵 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俄国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的第五款上规定由它来保证多瑙河两公国的“繁荣”和充分的“贸易自由”。而斯图亚特先生证明，俄国十分嫉妒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个公国，因为它们的贸易从1834年起有

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因为它们开始在俄国一向据有的生产部门中与俄国竞争,因为加拉茨正在成为多瑙河上最大的粮仓,正在把敖德萨挤出市场。勋爵阁下对此是这样回答的:

“如果我尊贵的朋友能够证明,我们几年以前同土耳其进行过巨额的、意义重大的贸易,而后来由于别国的侵略或我国政府的漠不关心而缩减为很小的数额的话,那他的确有理由向议会申诉。”但是恰恰相反,“我尊贵的朋友证明,近几年来(同土耳其的)贸易已从微乎其微增长到一个可观的数额”^①。

斯图亚特先生说,俄国阻挠多瑙河上的航行,因为两公国的贸易日益重要。帕麦斯顿勋爵反驳说,在这种贸易微乎其微的时候,俄国并没有这样做。斯图亚特先生说,您没有回击俄国最近在多瑙河上进行的侵略。勋爵阁下回答说,在这些侵略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做。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对于这些情况,若不是在议院直接干预的推动下,政府很可能不会采取措施加以防止呢?”^②帕麦斯顿终于阻止了下院通过决议,因为他向下院保证

“国王陛下^③的政府丝毫不想容忍任何一个强国的侵略行为,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国家,也不管它的力量多么强大”,同时他又告诫下院,“我们也不要轻举妄动,以免使别的强国有理理由说我们是有意挑衅”^④。

下院进行的这场辩论过去了一星期以后,有一个不列颠商人^④写了一封信给外交部,控诉上面所说的那项俄国的命令。对此,外交

① 亨·帕麦斯顿 1836 年 4 月 20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这句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被删去。——编者注

③ 威廉四世。——编者注

④ 詹·贝尔。——编者注

部副大臣^①回答说：

“帕麦斯顿子爵命我通知阁下，勋爵阁下已请皇家法律顾问就俄国在 1836 年 2 月 7 日的命令中所颁布的条例发表意见。同时帕麦斯顿勋爵还命我通知阁下，关于阁下来信中的后一部分，国王陛下的政府认为，俄国当局没有权利在多瑙河口征收任何税款；阁下吩咐代理人拒绝缴纳税款，这样做是对的。”^②

商人按照这封信的指示去做了。但勋爵阁下却把他出卖给了俄国：据乌尔卡尔特先生说，驻伦敦和利物浦的俄国领事现在对每艘开往多瑙河上的土耳其港口的英国船只都抽税，而且“在莱蒂岛上仍设有检疫所”。

俄国侵入多瑙河的行动并不以设立检疫所、修筑工事和征收捐税为限。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的规定，多瑙河的唯一的一条尚可航行的河口苏利纳河口划归俄国所有。在过去属于土耳其人的时候，河道的水深一直保持 14—16 英尺。自从转属俄国以来，水深降到了 8 英尺，即降到运粮船只完全不能通航的程度。而俄国是维也纳条约的参加国，该条约第一一三款规定：

“每个国家都应出资维修纤路和进行一些必要工作，以便使航行通畅无阻。”^①

然而俄国却认为，维持河道通航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水深逐渐降低，让失事船只的残骸等等沉淀于河底，使水浅的地方堆积越来越多的泥沙。除了这种在长时期中接连不断地违背维也纳条约的行为以外，俄国还违背那个除检疫所和灯塔以外不许在苏利纳河口修造任

① 约·巴克豪斯。——编者注

② 戴·乌尔卡尔特《俄国在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1853 年伦敦第 2 版。——编者注

何建筑物的阿德里安堡条约。它竟然下令在那里筑起了一个俄国小型炮台,靠着向商船勒索钱财来维持;这些商船由于河道堵塞不得不停下来花钱进行驳运。

“同否认原则的人不必辩论。①对那些被人们指责为以实力来衡量是非,以私利而不是以正义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的专制政府,谈论抽象原则有什么用呢?”(帕麦斯顿勋爵 1823 年 4 月 30 日的演说)

子爵阁下则遵照他自己的格言,满足于对俄国专制政府谈论抽象原则。而且他走得更远。1840 年 7 月 6 日,他肯定地告诉议院,多瑙河的航行自由有“维也纳条约作保证”;1840 年 7 月 13 日,他向议院抱怨说,虽然俄国占领克拉科夫违背维也纳条约,但是“英国没有办法以强力维护自己的观点,因为克拉科夫显然是英国无法采取行动的地方”,而两天以后,他就同俄国签订了“在同土耳其和平期间”达达尼尔海峡对英国②封闭的条约。这样一来,英国也就失去了“以强力维护”维也纳条约的唯一可能,攸克辛海也就变成了英国无法采取行动的地方了。

这件事办妥之后,勋爵阁下为了让公众舆论得到虚假的满足,就连串发射了许多纸上声明的空炮,用规劝的和多情的语调提醒那个“以实力来衡量是非、以私利而不是以正义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的专制政府”说,

“俄国既已迫使土耳其把作为许多国家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的欧洲一条大河的河口割让给它,那它也就对其他国家担负了责任和义务,它应该把遵循这

① 这句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被删去。——编者注

②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对英国”为“对英国军舰”。——编者注

些责任和义务引以为荣。”^①

涅谢尔罗德伯爵对这样谈论抽象原则作了如下的老一套的答复：“问题将仔细加以研究”，并且不时地表示“帝国政府对于人们如此不信任它的意图感到遗憾”。

这样，由于勋爵阁下的关照，到1853年，事情就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多瑙河已宣布不能航行，粮食都烂在苏利纳河口，而英国、法国和南欧则受着饥荒的威胁。这样，用《泰晤士报》的话说，俄国“在得到其他一些重要属地之后，又占有了多瑙河和攸克辛海之间的铁门”^②。俄国掌握了多瑙河的钥匙，掌握了打开谷仓的万能钥匙，它什么时候觉得西欧的政策应当受到惩罚，什么时候就会把这把钥匙运用起来。^③

① 亨·帕麦斯顿 1823 年 4 月 30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1836 年 3 月 28 日《泰晤士报》第 16062 号。引自戴·乌尔卡尔特《俄国在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1853 年伦敦第 2 版。——编者注

③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文是以下面两段话结尾的：“然而，帕麦斯顿勋爵同俄国之间在俄国的多瑙河计划的问题上所进行的秘密勾结，直到进行关于切尔克西亚的辩论时才被揭发出来。那时，1848 年 2 月 23 日，安斯蒂先生证明：‘子爵阁下就任（外交大臣）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即承认威灵顿公爵和阿伯丁勋爵曾经拒绝的那个条约。”

至于帕麦斯顿勋爵是怎样做了这些事和怎样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力把切尔克西亚交给俄国的，也许可以在另一篇文章中加以论述。”²⁶¹——编者注

第 八 篇

1836年4月20日下院收到的请愿书,以及帕特里克·斯图亚特先生就这些请愿书提出的议案,不仅涉及多瑙河问题,而且涉及切尔克西亚问题,因为商业界盛传俄国政府借口切尔克西亚沿岸被封锁有意不让英国船舶在黑海东岸的某些港口卸货。对此,帕麦斯顿勋爵庄重声明说:

“如果议会信任我们,如果它把对外关系交给我们去办理,我们一定会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持它的荣誉,同时还可以免动干戈。”(下院,1836年4月20日)

数月以后,1836年10月29日,乔治·贝尔先生的一艘运盐商船雌狐号从伦敦直航切尔克西亚。11月25日该船在切尔克西亚的苏茹克-卡列湾被一艘俄国军舰截去,理由是“该船在封锁的海岸作业”(俄国海军上将拉扎列夫1836年12月24日给英国船长柴尔兹先生的信^①)。该船及其货物和人员被押解到塞瓦斯托波尔港,1837年1月27日在那里被俄国人判了罪。不过这时已经不谈什么“封锁”了,而是干脆宣布雌狐号为依法捕获的赃船,理由是“它犯了走私罪”,因为输入盐是被禁止的,而在苏茹克-卡列这个俄国的港湾没

^① 戴·乌尔卡尔特《俄国在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1853年伦敦第2版第320页。——编者注

有设立海关。判决被执行了，而且执行得非常无礼和带有侮辱性。对截夺该船的俄国人都公开授予勋章。不列颠国旗先被升起而后降下，换上了俄国国旗。船长和船上人员被当作俘虏押上了实行截夺的哀杰克斯号，然后从塞瓦斯托波尔解到敖德萨，又从敖德萨解到君士坦丁堡，才允许他们从那里返回英国。关于这艘船本身，一位在这件事发生数年以后到过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国旅行家曾在一篇写给《奥格斯堡报》的通讯中写道：

“我虽然参观过所有的俄国战列舰，但最能引起我的好奇心的船只莫过于挂着俄国旗帜的苏茹克-卡列号，即以前的雌狐号。该船的外貌完全变了。这只小小的船只现在是俄国船队中最好的一只，它现在主要是用来在塞瓦斯托波尔和切尔克西亚沿岸之间进行运输。”^①

雌狐号被劫夺，毫无疑问为帕麦斯顿勋爵提供了履行他“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持它的荣誉”这个诺言的最好机会。除了不列颠国旗的荣誉和不列颠贸易的利益以外，这里还存在另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即切尔克西亚的独立问题。一开始，俄国扣留雌狐号的理由是说它违犯了俄国宣布的封锁令，但是在给它判罪时却用了完全另一种借口，说它违犯了俄国的海关规章。俄国既然宣布封锁，也就是宣布了切尔克西亚为敌对的外国，那么问题就在于不列颠政府是否承认过这种封锁。反之，俄国既然在切尔克西亚施行海关规章，也就是把切尔克西亚看作是它的藩属，那么问题就在于不列颠政府是否承认过俄国占有切尔克西亚的权利？

在继续往下说以前，这里不妨提一下：俄国在当时还远远没有完成它在塞瓦斯托波尔修筑工事的工程。

^① 《黑海和高加索来信。——再谈雌狐号事件》。——编者注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就说过，俄国占据切尔克西亚的任何权利，只能以阿德里安堡条约⁴¹为依据。但是1827年7月6日的条约⁴⁵已规定，俄国不得有任何扩张领土的试图，也不得从对土耳其的战争取得任何贸易特权。因此，俄国以阿德里安堡条约为依据而扩张领土的任何举动都是对1827年条约的公开违背，并且，如威灵顿和阿伯丁的抗议所表明的，决不能得到大不列颠的承认。可见，俄国并没有权利从土耳其得到切尔克西亚。另一方面，土耳其也不能把从来不属于它的东西让给俄国。切尔克西亚对土耳其政府始终是独立的，所以还在阿纳帕驻有土耳其帕沙的时候，俄国就曾经同切尔克西亚的首领数次签订沿海贸易的协定，因为当时正式规定土耳其的贸易只限于阿纳帕港口。既然切尔克西亚是个独立国家，那么俄国人认为自己有权要它实施的地方管理法、卫生条例和海关规章等等，其约束力只能和俄国法令对坦皮科港^①的约束力一样。

另一方面，如果切尔克西亚是一个同俄国敌对的外国，那么俄国只有对它实行封锁的权利，——假定这种封锁不是纸上谈兵，即假定俄国拥有能够强行封锁的海军舰队，并且真正控制了海岸。但是，在全长200英里的海岸线上，俄国只有三个孤立的堡垒，其余的切尔克西亚领土完全掌握在切尔克西亚部族的手中。在苏茹克-卡列湾，连一座俄国堡垒也没有。封锁实际上不存在，因为并没有实行封锁的海军力量。两艘英国轮船——一艘于1834年9月曾到过这个海湾，另一艘就是雌狐号——的船员们也曾经提出确凿的证据，而且这一点也为两个于1837年和1838年到过这个港湾的英国旅行家的公开报告所证实。（1844年3月1日《公文集》第8号）

① 坦皮科港为墨西哥的一个港口。——编者注

当雌狐号开进苏茹克-卡列湾时，

“无论附近还是远处都看不到有一艘俄国军舰……雌狐号抛锚以后过了36小时，当船主和几个职员上岸同切尔克西亚当局就货值税款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一艘俄国军舰才驶进港湾……这艘军舰并不是沿岸行驶的，而是从公海上开来的”。（安斯蒂先生1848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

既然圣彼得堡当局本身已借口违犯封锁令而扣留雌狐号，又借口违犯海关规章而把它没收，我们还有必要再举出进一步的证明吗？

这一事件对切尔克西亚人来说看来是特别有利的，因为他们的独立问题同黑海航行自由问题、不列颠贸易的保护问题以及俄国对一艘不列颠商船的蛮横的海盗行为问题合到了一起。他们得到海上霸主保护的机会看来也更加没有疑问，因为

“在此以前不久，经过成熟的考虑，并且同政府各部进行了几个星期的书信往来，在一个同外交部门有关系的定期刊物《公文集》上发表了切尔克西亚独立宣言^①，并且在帕麦斯顿勋爵亲自审订过的地图上标明了切尔克西亚是一个“独立国”。（斯坦利勋爵1838年6月21日在下院的演说）

谁能想到高尚而侠义的子爵竟如此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事件，俄国劫夺英国财产的海盗行为竟给他提供了正式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和毁灭切尔克西亚独立的求之不得的良机呢？

1837年3月17日，罗巴克先生就雌狐号被没收的问题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向议院提供

“本政府同俄国及土耳其政府之间有关阿德里安堡条约的全部往来文件的副本，以及与俄国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缔结后占领黑海沿岸诸港口及地方有关的

^① 《切尔克西亚独立宣言》，见1836年《公文集》第1卷第4号。——编者注

所有交涉或谈判的报告”①。

罗巴克先生惟恐别人怀疑他有人道的心肠和从抽象原则出发来保护切尔克西亚,所以就坦率地声明:

“俄国可以企图去霸占整个世界,这种企图对我是无所谓的;但是在它侵犯了我们的贸易的这个时刻,我要请求我国(看来这个国家存在于“整个世界”以外的某个地方!)政府给侵略者以惩罚。”①

因此他想知道“不列颠政府是否承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

勋爵阁下虽然被逼得无路可逃了,仍然十分灵巧地发表了长篇讲话,然后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始终没有告诉议院:目前究竟是谁实际上占有切尔克西亚沿岸,这个地方是否确实属于俄国,俄国劫夺了雌狐号究竟是由于该船违犯了财政规章,还是因为有封锁存在着,以及他是否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休谟先生 1837 年 3 月 17 日在下院的演说)

罗巴克先生说,贝尔先生在许可雌狐号开入切尔克西亚以前,曾经同勋爵阁下联系,以便弄清楚该船在切尔克西亚的一个地点卸货会不会有什么不妥或危险,外交部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于是,帕麦斯顿勋爵就不得不向议院宣读他同贝尔先生的往来书信。听着他宣读这些书信,就觉得他好像是在读西班牙的斗篷宝剑喜剧²⁶²,而不是在读一位大臣和一个商人之间的正式信件。丹尼尔·奥康奈尔在听了勋爵阁下宣读的关于雌狐号被劫夺一事的信件之后,禁不住大喊:“我不能不想起达来朗的名言:发明语言是为了掩盖思想。”②

① 约·罗巴克 1837 年 3 月 17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丹·奥康奈尔 1837 年 3 月 17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例如，贝尔先生问道：“在贸易方面是否存在着为国王陛下政府所承认的某些限制？如果没有，他想派一艘装盐的船到那里去。”帕麦斯顿勋爵回答说：“阁下问我做盐的生意是否对阁下有利，”勋爵告诉他，“商号应该自己判断做还是不做某种生意。”贝尔先生回答说：“我根本不是问这个问题；我所要知道的只是国王陛下政府是否承认俄国对库班河以南的黑海海岸的封锁。”勋爵阁下反驳说：“阁下应该去看一看《伦敦官报》，——这方面的消息那里全有。”对于一个想得到这方面消息的不列颠商人说来，根据《伦敦官报》自然要比根据俄皇的命令更为适当。可是贝尔先生在《伦敦官报》上并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承认封锁或其他限制的报道，于是他就把他的船派了出去。结果是：他自己很快就上了《伦敦官报》。

帕麦斯顿勋爵说：“我介绍贝尔先生去看《伦敦官报》，是想让他看了报纸以后确信，关于封锁一事，俄国政府对我国没有发过任何通知和声明。因此也就根本谈不到承认不承认的问题。”^①

帕麦斯顿勋爵介绍贝尔先生去看《伦敦官报》，他这样做不仅否认大不列颠承认俄国的封锁，而且同时还肯定了：在他看来，切尔克西亚沿海地区并不是俄国领土的一部分，因为《伦敦官报》不发表关于外国为了例如平定本国臣民的叛乱而对自己的领土实行封锁的消息。既然切尔克西亚不是俄国领土的一部分，那么在切尔克西亚自然就不可能实行俄国的海关规章。可见，按照帕麦斯顿勋爵自己所说的来看，他在给贝尔先生的信中并不承认俄国有权封锁切尔克西亚沿海地区或者使它受到任何贸易限制。诚然，从他的整个演说里可以看出他是想使议院作出俄国已占有切尔克西亚的推论，但另一

^① 亨·帕麦斯顿 1837 年 3 月 17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方面,他又直率地声称:

“至于俄国在南高加索及黑海沿岸地区扩张疆界,这无疑是同它在土耳其战争爆发前向欧洲作的庄重声明不符合的。”

当他坐下来之前,郑重地保证他要始终不渝地“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持它的荣誉”的时候,看他的样子是已经因他过去的政策所积累的种种不幸而痛苦不堪,不像是又在策划未来的叛卖性阴谋了。在这一天,他不得不恭听如下的严厉的责备:

“勋爵阁下在维护国家荣誉方面表现不够积极和热情,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过去还不曾有一个大臣在不列颠臣民受到欺侮的时候像他这样优柔寡断、顾虑重重、迟疑不决、畏首畏尾。勋爵阁下还要让俄国这样欺侮大不列颠和损害不列颠贸易多久呢?勋爵阁下侮辱了英国,使英国扮演了一个恃强凌弱的角色,对弱者傲慢无情,对强者卑躬屈膝。”^①

是谁把真正的英国大臣这样羞辱了一场呢?不是别人,而是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

雌狐号是在1836年11月25日被没收的。我们刚才所引的下院的激烈辩论是在1837年3月17日进行的。但是直到1837年4月19日勋爵阁下才要求俄国政府

“说明它根据什么理由认为自己有权在和平时期扣留不列颠臣民的商船”^①。

1837年5月17日勋爵阁下收到驻圣彼得堡的不列颠大使达勒姆伯爵的如下的电报:

“阁下!关于苏茹克-卡列湾的事实上的军事占领问题,我应该向阁下禀

^① 达·斯图亚特1837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报：海湾有一座以皇后之名命名的要塞（亚历山德拉），并且由俄国的卫戍部队驻防。

忠实于您的
达勒姆^①

亚历山德拉要塞的实在性，连波将金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到克里木去巡游时请她看的用纸板假充房子的村镇²⁶³都不如，这一点看来是用不着再说了。帕麦斯顿勋爵在收到这封电报的五天以后回电圣彼得堡如下：

“国王陛下的政府考虑到，苏茹克-卡列虽经俄国根据 1783 年的条约承认属于土耳其，而现在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属于俄国——如涅谢尔罗德勋爵所说；所以国王陛下的政府认为自己没有充分根据对俄国扣留和没收雌狐号的权利提出异议。”^②

关于这次谈判，还有一些很奇妙的情况。帕麦斯顿勋爵用了整整六个月的时间去为谈判作准备，而他只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就结束了谈判。他上面这封 1837 年 5 月 23 日的电报突然中止了任何进一步的交涉。这封电报在提到库楚克-凯纳吉条约的签订日期时不是用格里历，而是用儒略历。此外，如罗伯特·皮尔爵士所指出的：

“在 4 月 19 日到 5 月 23 日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一个惊人的转变：官方的抗议变成了满意。看来，是被涅谢尔罗德伯爵的断言说服了，相信土耳其已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把所说的那个海岸割让给俄国。为什么政府对这个命令没有提出抗议呢？”（下院，1838 年 6 月 21 日）

① 《黑海和高加索来信。——再谈雌狐号事件》，见 1844 年《公文集》第 2 卷第 8 号。——编者注

② 戴·乌尔卡尔特《俄国在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1853 年伦敦第 2 版第 320 页。——编者注

这一切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国王威廉四世背地里指使贝尔先生把雌狐号开往切尔克西亚沿岸。当勋爵阁下拖延谈判的时候，国王还完全健康。而当他突然中止谈判的时候，威廉四世已经快死了，勋爵阁下对外交部已经独断专行，好像他已成了大不列颠的专制君主了。本来国王把这艘莽撞的雌狐号派去是有他特殊的目的的，即侮辱一下沙皇^①，表示对阿德里安堡条约不屑一顾，以及确认切尔克西亚的独立，而勋爵阁下则大笔轻轻一挥，就以快死的国王的名义正式承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承认了俄国占有切尔克西亚和没收雌狐号的权利，——爱开玩笑的勋爵阁下这一着不是玩得很妙吗？

贝尔先生我们已经说过是上了《伦敦报》了，而当时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一等秘书的乌尔卡尔特先生也被召回，因为“他曾劝说贝尔先生把雌狐号的冒险计划付诸实施”。

在国王威廉四世还活着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是不敢公开下令取消雌狐号的冒险的，因此在《公文集》上才发表了切尔克西亚独立宣言，才出现了经勋爵阁下审查过的切尔克西亚地图，才有他写给贝尔先生的模棱两可的回信以及他在议院所作的含糊其词的声明，最后，在雌狐号上经管商业事务的贝尔先生的弟弟在启航时才接到外交部委托转交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的公文，并受到不列颠驻土耳其大使庞森比勋爵的直接鼓励。

到女王维多利亚即位初期，辉格党的优势看来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保证了，所以豪侠仗义的子爵的调子也就突然改变。恭顺奉承一变而为傲慢不逊。1837年12月14日托·阿特伍德先生就雌狐号和切尔克西亚问题质问勋爵阁下，勋爵阁下回答说：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说到雌狐号，俄国对自己的行动已作了解释，本政府对这些解释是可以感到满意的。船被扣留并不是由于违犯了封锁令。该船所以被虏获是因为它的主人违犯了俄国的地方管理法和海关规章。”

勋爵阁下针对阿特伍德先生担心俄国侵略这点说道：

“我认为俄国也像英国一样地向世界提供了维护和平的保证。”（帕麦斯顿勋爵 1837 年 12 月 14 日在下院的演说）

在议会闭会时，勋爵阁下向议院提交了他同俄国政府的往来公函，其中两个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已经引用过了。

1838 年，各党派地位又有了新的变化，托利党人又得势了。6 月 21 日他们对帕麦斯顿勋爵进行了严厉的指责。现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拉特福·坎宁爵士当时提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乔治·贝尔先生对勋爵阁下提出的指控，并且处理贝尔先生的赔偿损失的要求。最初勋爵阁下表示极为惊异，说他没有想到斯特拉特福爵士提议的是“这样的琐事”。

罗伯特·皮尔爵士对此大声喊道：“阁下是第一个敢把保护不列颠的财产和贸易说成是琐事的英国大臣。”^①

帕麦斯顿勋爵说：“关于俄国是否有权统辖切尔克西亚，或者是否有权以武力强迫实施那些海关规章和卫生条例这样的问题，无论哪一个商人没有权利要求女王陛下的政府表示意见。”^②

休谟先生问道：“如果外交部不办这类事情，那么要外交部做什么？”^③

勋爵阁下继续说道：“据说，贝尔先生，这位无辜的贝尔先生，是由于我给他的回答而被我引入了一个圈套。谈到圈套，如果确实有的话，那么这个圈套不

① 罗·皮尔 1838 年 6 月 21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亨·帕麦斯顿 1838 年 6 月 21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③ 约·休谟 1837 年 3 月 17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是别人给贝尔先生设下的,而是贝尔先生给别人设下的。”^①

这里指的就是贝尔先生向无辜的帕麦斯顿勋爵提出的那些问题。

在这次辩论的过程中(1838年6月21日),一个很大的秘密终于暴露了。即使勋爵阁下在1836年怀有反对俄国的野心,他也不能去做,道理很简单:早在1831年他刚一上台就首先认可了俄国对高加索的侵占,从而也就偷偷地承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斯坦利勋爵(现在的德比勋爵)指出,俄国当局于1831年8月8日指示它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说俄国想要

“对高加索和相邻的土耳其各省的居民之间的自由交往规定卫生条例”,他应当“把上述条例通知驻君士坦丁堡的各外国使团以及奥斯曼政府”^②。

允许俄国在切尔克西亚沿岸实施所谓卫生条例和海关规章——尽管它们除在上述信件中之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就等于认可俄国对高加索的权利,从而也认可这种权利所依据的阿德里安堡条约。

斯坦利勋爵说道:“这些指示通过最正式的手续通知了驻君士坦丁堡的曼德维尔先生(大使馆秘书),特意要他告知不列颠商人,而且也转送给了帕麦斯顿勋爵阁下。”^②

而帕麦斯顿勋爵则没有也不敢“按照历届政府的常规,通知劳埃德委员会²⁶⁴已经收到这样一份通告的事实”。罗伯特·皮尔爵士惊呼:勋爵阁下犯下了“隐瞒六年”之罪。

① 亨·帕麦斯顿 1838年6月21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达·斯坦利 1838年6月21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当天，滑稽的勋爵阁下仅以 16 票的多数——184 票反对，200 票赞成——而幸免于罪。但是这 16 票压不住历史的声音，也不能使高加索的山民们沉默下去；他们的刀剑的撞击声正在向世界证明：高加索“现在”并不“属于俄国”²⁶⁵——如涅谢尔罗德伯爵所说”而帕麦斯顿勋爵加以附和的那样！

卡·马克思

战争问题。——金融状况。

——罢工²⁶⁶

1853年10月7日星期五于伦敦

《纪事晨报》在上星期五的第4版上刊登了一则电讯，报道苏丹^①已对俄国宣战。而巴黎《祖国报》在昨晚的一则半官方消息中报道，根据来自东方的消息，《纪事晨报》的这个报道尚不能证实。另一家支持政府的报纸《立宪主义者报》报道，应奥地利使臣布鲁克先生的一再请求，土耳其帝国国务会议于25日开会讨论了维也纳照会¹⁸⁴，会后声明土耳其将坚持路西德帕沙最近照会中的意见。第二天又召开了参政会。这个由120名主要的大臣、顾问、帕沙和宗教上层人物组成的参政会决定：

“签署这份没有包括国务会议提出的修改意见的维也纳照会，对苏丹的主权来说将是一种耻辱，而且极为有害。既然沙皇^②声称完全不能接受这些修改意见，并且拒绝撤回他要奥斯曼帝国承担有损帝国独立的义务的要求，参政会

①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②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只有建议苏丹立即采取保全帝国的必要措施，并从侵略者手里解放自己的领土。”^①

至于正式宣战，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消息加以证实。至少这一次是土耳其政府把西方的外交官们弄得狼狈不堪。本来，英法两国政府不敢撤回它们的舰队，但同时又觉得再在贝济克湾保持自己那种可笑的立场已不可能，又不愿以公开向沙皇挑战的姿态通过海峡，所以它们就要土耳其政府以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徒在拜兰节时有危险为理由请求把贝济克湾的舰队派来。土耳其政府拒绝了 this 建议，指出这种危险并不存在，即使有这种危险，它不靠外国援助也能保护基督徒；土耳其政府声明，在节日结束以前它决不请求派舰队来。可是当联合舰队的前卫刚刚驶过海峡，土耳其政府看到它这时已经把动摇不定和不守信义的盟国置于窘境，于是就表示要开战。谈到战争本身，实际上三个月以前俄军越过普鲁特河时就已经开始了。俄军到达多瑙河岸时，第一个战役实际上已经结束。现在可能发生的唯一变化，就是战争将不再是单方面的了。

尽管俄国进行了阴谋活动，突尼斯的贝伊^②和波斯的沙赫^③仍从他们的精锐部队中抽出 6 000 人给苏丹指挥。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土耳其军队已包括欧洲、非洲和西亚的伊斯兰教现有的全部军事力量。两个早就在争夺东方霸权的宗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军队现在对峙着，一个是受个人专横意志的支配，另一个则受环境的宿命力量的支配，这与他们各自的信仰相符，因为正教教会排斥先定论

① 1853 年 10 月 5 日《晨邮报》第 24895 号。——编者注

② 艾哈迈德。——编者注

③ 纳赛尔丁。——编者注

的教义，而伊斯兰教的核心正是宿命论。

今天要举行两个会议：一个是在唐宁街，另一个是在“伦敦饭店”；一个是大臣们的会议，另一个是反对他们的；一个替沙皇说话，另一个则替苏丹说话。

如果有谁对于联合内阁的意图仍然有些认识不清，那么看了《泰晤士报》和《纪事晨报》的社论就会很明白：联合内阁将竭尽全力来防止战争，恢复谈判，消磨时间，拖垮苏丹的军队，支持沙皇继续占据多瑙河两公国。

《泰晤士报》根据可靠的材料兴高采烈地报道：“沙皇主张和平。”^①沙皇“在奥尔米茨亲口”表示了“爱好和平的心愿”²⁶⁷。沙皇不会接受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改意见，他要坚持维也纳照会的原来条文，但他会允许维也纳会议随心所欲地解释这个照会，尽管可以与他的大臣涅谢尔罗德的解释相反。只要他们允许他占领两公国，他也会允许他们占自己的时间去开会。

《泰晤士报》在爱和平的感情冲动之下，竟把俄国和奥国的两位皇帝同非洲内地野蛮人的首领相提并论，以便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俄皇由于自己政治上失策而要发动战争，这与世界究竟有什么关系呢？”^①

都灵、巴黎、柏林和华沙的银行，都提高了自己的贴现率。根据上周发表的银行报告，英格兰银行⁶⁴的黄金储备又减少 181 615 英镑，目前总共只有 15 680 783 英镑。有效流通的银行券总额约减少

① 1853 年 10 月 6 日《泰晤士报》第 21553 号的社论。——编者注

50万英镑，而期票贴现却增多40万英镑^①，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证实了我在谈皮尔法令²¹⁹的那篇通讯中所说的话，即流通中的银行券的减少或增加并不与银行业务做成的多少成正比^②。

多恩布施先生在他的商业月报上最后说了这么一段话：

“上周发生的政治事件，大大地助长了由于小麦歉收、马铃薯病害流行、船舶载货舱位不足的消息频传而引起的粮食贸易中的波动。城市的面粉价格每280磅上涨到70先令，新小麦的价格则上涨到80先令，而贴现率也提高到接近5%。现在粮食贸易极为紧张。东方可能爆发战争，埃及禁止谷物出口，英国小麦歉收已成定局，马铃薯病害流行，从国外（特别是从南欧）进口的数量减少，对法、比、荷等国的需求不断增长——所有这些，是促使几个主要省份市场的小麦价格于上周再度上涨、每夸特分别提高1先令到6先令的主要原因……往年从收割后直到圣诞节，价格总是看跌的，今年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最近几个月以来价格一直在上涨。目前，我国任何地方都还不是粮食真正不够。许多谷仓、仓库和干草堆置场都已经装不下了，某些海港的堆栈也不够用。所以，近来粮价上涨并不是由于现在粮食不够，而是由于人们怕歉收造成将来的粮食不够，人们认为时候一到，歉收的后果就要开始显示出来。即将来临的冬天很可能是一个最难熬最困苦的冬天……大多数意见仍认为粮价还要继续上涨，而且因为大多数投机商继续搞‘收购和囤积’，粮价看样子在明春以前仍然会保持上涨的趋势……预料中的高价看来将延续今年一冬。这种高价在明春大概会大大地吸引人们从那些往常由于路途遥远、运费昂贵而和英国不相接触的远方地区输入粮食。明春，世界各地一切可以向英国出口的地方的粮食，都会源源而来：现在人们存粮不售，以致粮价上涨的同一原因，将会随着价格开始回跌，粮商极力抛出存粮，而使粮食贬值。现在的守则则是买进，那时的口号将是卖出。来年会像1847年那样，是一个危险和灾难之年。”^③

① 1853年10月1日《经济学家》第527期。——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40—346页。——编者注

③ 威·皮佩尔1853年10月初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所附的材料，未注明材料来源。——编者注

曼彻斯特市场上的普遍萧条仍在继续。来自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消息以及关于东方纠纷的消息越来越坏，棉纺厂主、工厂主和商人也越来越心慌。同两个月以前的最高点相比，普通纱线的价格每磅下跌 $\frac{7}{8}$ —1 便士，比同等皮棉的跌价多出约一倍，后者的跌价未超过 $\frac{1}{2}$ 或 $\frac{5}{8}$ 便士。但是，即使减价达 1 便士之多，仍然很难卖出。存货，我们的感伤派政治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这个怪物，在继续增多。自然，不能认为存货的增加会非常迅速。现在，尽管许多市场都存货过多，但商人和工厂主仍然有办法以托卖的方式，把自己的商品运到其他市场上去，而且他们恰好是现在正在广泛地发挥这种才能。但适合出口的不列颠工业品数量很大，经过几段时间就能充斥全世界，如果把这些产品全都抛到几个容量有一定限制的市场上去，必然会使那些目前尚称健康的市场发生同样的过剩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市场动荡。例如，那些报道印度情况稍有好转的消息，仍旧没有说向印度出口可以获利，而只是说新的出口的亏蚀可望减少，——即使这样的消息，就已经使向印度的出口业务增加得相当多。这些业务，有些是那些素日与印度有贸易来往的公司做的，有些是曼彻斯特的纱厂主和工厂主直接做的，这些厂主不放过任何一点向印度做投机性出口生意而得到比较有利的推销机会，怎么也不愿意承担在日益缩小的市场上销售货物而招致的损失。在这里要补充说明一句：曼彻斯特的纱厂主和工厂主从 1847 年起就经常把大宗商品自己装船运到印度等地，然后把赚来的各种殖民地货物自己出卖，或者在英属北美洲或欧洲大陆港口出卖。当然，这一类投机生意不属于厂主的合法经营范围，从事这种投机的厂主对市场情况的了解自然还不及港口商人的一半，但这种投机生意却很受不列颠棉纺厂主们的欢迎，他们在遥远地区做这些生意，觉得就是在实现自己的一个宿愿，即充当主宰世

界工商业命运的最高领袖和可以说是灵魂。假如不是这种投机活动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业过剩资本抽走一年到一年半，那么近五年来英国工业的发展无疑还会更快。

本国产品在纺织品市场上最不景气。虽然大量织布机已停止转动，但存货仍然继续增加。当然，也不能说其他商品的处境就好一些。

在利兹和布拉德福德，在莱斯特和诺丁汉，也都普遍存在这种停滞局面。在诺丁汉，花边生产的劳动时间已减为10小时，甚至8小时。针织品的生产早在今年6月间就已发生萧条，那时，诺丁汉的产量一下子就减少了三分之一。看起来还在不断繁荣的唯一部门是伯明翰及其附近地区的金属制品的生产。

在伦敦，小店主破产的事情开始越来越多了。

我在8月12日那篇通讯中曾指出，纱厂主和工厂主们成立了“制止曼彻斯特地区工人骚动救援工业协会”；该协会由各地方的协会组成，并设立一个中央委员会；它要“抵制工厂工人联合体的一切要求，用合作的垄断来加强资本的垄断，作为一个联合体迫使工人接受自己的条件”^①。

这个计划，大约在两个月以前我就向你们作了报道，而且在这个时期已经悄悄地实现，在普雷斯顿、博尔顿和曼彻斯特现在正在实施，但是直到现在，伦敦的报纸一次也没有提到过这个计划，这不是很稀奇吗？显然，伦敦报界是在竭力向人家隐瞒这样的事实，即工厂主们正在有步骤地组织本阶级反对工人阶级，他们连续采取的那些步骤并不是偶然情况自发产生的后果，而是有组织的反工人联盟事

^① 见本卷第287—288页。——编者注

先周密策划的阴谋所造成的。法国的天主教联盟曾经碰到他们的历史学家——16世纪末《梅尼普讽刺文集》²⁶⁸的作者，19世纪英国的资本家联盟也会碰到自己的历史学家的。

工人们为实现自己的要求，自然要采取这样的方式，即当一部分工人罢工的时候，另一部分工人工作，直到罢工者取得胜利。在工人采取这种行动方式的地方，工厂主们便共同约定关闭他们的**所有**工厂，用这种办法使工人陷于极端贫困。如你们所知道的^①，首先这样做的是普雷斯顿的工厂主们²⁶⁹。现在有13个工厂已经关闭，到下周末所有工厂都将停工，将有24 000多工人被抛到街头。织工向老板们递交了请愿书，请求面谈，或者把争执交付仲裁，但他们的请求遭到了拒绝。普雷斯顿的织工得到了周围各区——斯泰利布里奇、奥尔德姆、斯托克波特、贝里、威斯内尔、布莱克本、彻奇-帕里什、阿什顿、艾尔威尔-韦尔、恩菲尔德、伯恩利、科恩、贝克普等地——工人每人捐一便士的援助，所以工人们看到，抵抗资本的威胁手段的唯一办法就是他们自己联合起来。普雷斯顿的厂主们则派出密使去破坏对罢工者的援助，并鼓动伯恩利、科恩、贝克普等地的工厂主关闭他们的企业，用这种办法造成总停工。在某些地方，例如在恩菲尔德，已经命令监工们向厂主们报告谁是互助运动的发起人，结果有许多从事一便士募捐活动的工人被解雇了。普雷斯顿周围各区的工人们鼓励普雷斯顿的工人保持坚定和团结，与此同时，其他地方的工厂主则为普雷斯顿的厂主鼓掌喝彩，称赞他们是当代的真正英雄。

贝里的情况和普雷斯顿一样。博尔顿的制被工人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谁先罢工，于是该行业的老板们都立即关闭了他们的工厂。

^① 见本卷第366页。——编者注

厂主们除了同时关闭工厂以外，还采取其他一些协同的步骤。例如在基斯利，伦德先生厂里的织工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促使他们罢工的主要原因，是厂主付给他们的工资少于宾利的安德顿先生厂里的织工所得的工资。织工代表团请求伦德先生接见，可是当代表们到他的住所见他的时候，却吃了一个有礼貌的闭门羹。而过了一个星期，安德顿先生厂里就贴出布告，通知工人要降低他们的工资——织工工资每匹布降低3便士，羊毛刷梳工工资每磅降低1法寻便士。同时，伦德先生和安德顿先生还签订了一个攻守同盟，即采用降低一家工厂织工工资的办法来对付另一家工厂的织工。因此，或者是伦德先生的厂里的织工被迫屈服，或者是安德顿先生的厂里的织工被迫也举行罢工，而后者罢工之后，负担更重，这样就使罢工者得不到任何支援，于是两厂工人都将不得不接受工资的普遍降低。

还有些厂主在对付工人时竭力谋取店主的支持。例如，达利曼煤矿的矿主，煤炭大王霍斯福尔先生，当他的工人由于工资降低而罢工的时候，便去找附近矿工常去买东西的肉铺、面包铺和食品杂货铺的店主，劝他们不要赊给工人们任何东西。

在设有“制止工人骚动”协会的地方，加入协会的厂主们议定，如有个别成员违反他们的联盟章程，或向“工人”的要求让步，就课以高额罚金。在曼彻斯特这种罚金高达25 000英镑，在普雷斯顿达3 000英镑，在博尔顿达2 000英镑，等等。

目前的冲突具有一个和过去历次冲突不同的最大特点。在以前各个时期，例如在1832、1839、1840和1842年，所谓普遍休假即在王国普遍同时停工，是很受工人欢迎的主张，也是他们力求达到的一个伟大目标。而现在却是资本家用普遍停产来威胁工人。目前是厂主们企图普遍关闭工厂。大家难道不认为这种做法如获成功将是

一个非常危险的试验吗？厂主们是不是想驱使英国人民来一个六月起义²⁷⁰，以便摧毁他们日益增长的斗争精神，使他们在未来若干年内都服服帖帖呢？

总之，我们必须尽可能密切地注视在英国正在酝酿中的内战的各种征兆，特别是因为，伦敦报界有意闭眼不看这些重大的事实，用一些琐碎事情来转移读者的注意力，例如，报道约克郡的一个工业大王泰特斯·索尔特先生如何在他的工厂宫开幕的时候举行盛大宴会，不但款待了当地的显贵，也款待了他的工人。首都的报纸告诉公众，这位工业大王曾举杯祝愿“工人阶级兴旺、健康和幸福”。但报纸却没有报道几天之后他厂里的波纹织品织工们就接到再度降低工资的通知，工资从2先令3便士减为2先令1便士。他的一个受害者在《人民报》上写道：“如果这就意味着波纹织品织工们的健康或兴旺，那么至少我个人是不要的。”^①

大概读者已从《泰晤士报》上看到，有一位格伦加里的诺伊德特镇的麦克唐奈太太仿效萨瑟兰公爵夫人的做法，着手“清扫”自己的领地，用绵羊来代替那里的人。^②《人民报》根据一位通讯员发自现场 的报道，对此项马尔萨斯主义的行动作了如下一段生动的描写：

“在这位太太的领地上住着一些佃农，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交不起地租；有人告诉我们，某些人欠了很多地租。因此，这位太太便命令他们统统滚开，把他们赶到树林和山洞里去安身，从那时起他们就住在那里，或者确切点说，一批批死在那里，而麦克唐奈太太的马却在温暖舒适的房屋里享福。同时，她表示要

① 厄·琼斯《富人的残忍》，见1853年10月1日《人民报》第74期。——编者注

② 《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07—615页。——编者注

给被赶走的佃农去加拿大的路费，——路费比贫民救济金还少，并且允许他们卖掉他们‘不大的家当’，但是他们除了随身穿的衣服、破旧的桌子和患风湿症的猫以外，实在没有什么家当可卖。最后，她免除了他们所欠的地租——她反正是收不回来了。这被说成是‘乐善好施’。”①

看来，这种赶走居民的事又在苏格兰高地到处风行起来了。例如，苏格兰高地的一个地主查理·福布斯爵士就在《泰晤士报》上写文章这样告诉我们：

“现在养羊是这样有利，以致我们英国的养羊户在任何时候租用船只把那些妨碍他们的人迁走，都是很合算的。”②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0 月
7 日

载于 1853 年 10 月 21 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 390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① 厄·琼斯《富人的残忍》，见 1853 年 10 月 1 日《人民报》第 74 期。——

编者注

② 引自 1853 年 9 月 27 日《泰晤士报》第 21544 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

* 土耳其宣言。——
法国经济状况²⁷¹

1853年10月18日星期二于伦敦

10月4日交给四大强国的土耳其宣言,是一个为苏丹^①对沙皇^②宣战作辩护的文件,从各个方面来看,它都好于1853年5月以来充斥欧洲的大堆大堆的官方文件。

宣言说:苏丹并没有造成引起纠纷的口实。在圣地问题⁸⁸解决以后,就不再有产生纠纷的任何借口了。俄国方面破坏了一切条约,而土耳其方面则用尽了一切和解手段。各强国自己也认为,苏丹不应当同意缅施科夫公爵的照会。那么,怎么能够期望苏丹会赞同内容大致同缅施科夫的照会没有什么差别的维也纳照会¹⁸⁴呢?维也纳会议的解释信也不可能改变情况。既然俄国甚至对凯纳吉条约⁸⁹的明确条文都作了曲解,难道还可以冒险“把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条文交到它的手里,让它能够为它的所谓宗教保护权找到振振有词

①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②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的借口吗”？此外，苏丹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已完全被后来公布的涅谢尔罗德的解释证明是合理的。占领多瑙河两公国从一开始就构成了开战的理由，土耳其政府现在决定宣布这是开战的理由。因此，要求哥尔查科夫公爵撤出多瑙河两省。如果哥尔查科夫公爵在接到上述警告 15 天后给以否定的答复，那么奥美尔帕沙就要开始军事行动，俄国代表就须离开奥斯曼帝国，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就将中止。但是，对俄国商船将不扣留，而只是命令它们离开土耳其港口。海峡将对各友邦的商船继续开放。

苏丹宣言的要点就是如此。

土耳其的最后通牒是本月 9 日通知哥尔查科夫公爵的。所以，撤出两公国的最后期限是到本月 25 日。不过，对于开始军事行动的威胁，不应当完全从字面上去理解，因为奥美尔帕沙肯定不会离开他的强大阵地去进攻俄军。

昨天的《先驱晨报》证实了我对俄军向西运动和这一运动表明它同奥地利有秘密谅解的看法。^①

始终耍弄老一套亚洲式的阴谋诡计的俄国，又利用西方世界的轻信散布谣言，说什么沙皇“刚好迫不及待地”向维也纳派出信使，宣布他毫无保留地完全接受进行调停的各强国提出的一切条件”，可是很遗憾，就在这时他忽然“获悉土耳其政府宣战的消息”。于是，俄国人的圣主自然就立刻收回了他以前曾经作过的一切让步，并且叫嚷说：“现在已别无选择，只有作战，作殊死战（guerre à l'outrance）”。这样一来，似乎是苏丹迫使沙皇进行战争了。

奥地利使臣布鲁克先生据说询问过土耳其政府是否想要政治流

^① 见本卷第 393 页。——编者注

亡者组织一个外籍军团。路西德帕沙回答说,尽管有人不断向土耳其政府提出这类建议,他迄今还没有作任何决定;不过,如果土耳其被它的同盟国抛弃,它将认为自己完全有权为了自卫而采取一切手段,包括雇用分散在欧洲各国的政治流亡者服役。

我们在《立宪主义者报》上读到:

“我们有理由认为,此刻巴黎和伦敦已经接到土耳其政府请求英法方面给予援助的正式呼吁。”^①

报纸上有消息说,奥皇^②将自己的军队缩减了约10万人。然而,实际情况是有这个数目的军人获准离职休假,但是他们随时都可以应召重新入伍。维也纳当局采取这个步骤,一方面是由于财政困难,另一方面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抓住放债人。

下面是一份伦敦的商业通报关于法国粮食贸易的文章摘录,我想读者会对它感到兴趣:

“根据各地的广泛通讯所报告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法国小麦的平均收成将减少整整 $\frac{1}{3}$,其情况在不同地区将有所不同,最差的将是法国南部。诚然,受政府影响的各家报纸,力图使公众相信事情并不是这样,但是,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本身,同报界的这种保证却是完全矛盾的。政府首先放宽了航海条例²⁰⁹以有利于英国,后来又把该条例彻底取消;其次,政府规定了降低本来按滑动比率²³⁵自行调整的税率,把它定在最低限上,而不顾法国划分地区实行不同税率,而且为外国船只开放港口,免除吨税。这以后,政府又允许载运粮食的船只在一切实内河和运河自由航行,并且建议各铁路公司按照降低的税率载运粮食。它开放了阿尔及利亚,并且允许任何吨位的阿尔及利亚船只驶入法国;政府禁止马铃薯和蔬菜的出口,而且不惜随时对许多市场上的买卖横加干涉。所有这

① 1853年10月15日《立宪主义者报》第288号。——编者注

②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注

一切清楚地说明了收成不佳,否则这些预防措施就是完全多余的了。然而法国贸易一个时期以来一直处于令人不安的状态。问题不在于整个帝国的商人对收成有所怀疑,而在于政府规定了固定的粮价,这种错误的措施使商人们不知所措,因而害怕做买卖。众所周知,法令一公布,取消粮食合同的电报就如雪片一样飞向各地。目前还很难估计政府这一措施最终会对价格产生怎样的后果。据估计,法国小麦的平均产量为 8 000 万百升(约 2 800 万夸特)。最近 25 年中产量最高的一年是 1847 年,总量是 9 700 万百升,最低的一年是 1830 年,总量是 5 200 万百升。小麦的产量最近几年有很大增长,它大大快于人口的增长,但是储备目前已完全用光,这个事实表明,居民的饮食大有改善,生活条件比过去好了。

下面的表可以说明最近 25 年内人口增长和小麦产量增加的情况:

	人 口	小麦在 5 年期间的平均年产量 (单位:百升)	
1831	32 569 223	从 1827 年到 1831 年	57 821 336
1836	33 540 910	从 1832 年到 1836 年	68 684 919
1841	34 240 078	从 1837 年到 1841 年	71 512 258
1846	35 400 486	从 1842 年到 1846 年	72 015 564
1851	35 781 821	从 1847 年到 1851 年	86 124 123

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消费增长,将使歉收的后果更加严重,因为本来可以动用的那部分旧有储备没有了,不言而喻,进口小麦的储备也没有了。”^①

从布莱特先生和科布顿先生在爱丁堡的喋喋不休的说教中,从格莱斯顿在曼彻斯特的演说中,以及从若干报纸所作的一旦俄土开战阿伯丁勋爵将由帕麦斯顿勋爵这位豪侠仗义的俄国对头来代替的暗示中,都可以看出英国统治阶级对土耳其心怀叵测。

关于监狱情况的调查报告是目前报刊上不断议论的话题。已经

^① 1853 年 10 月 15 日《经济学家》第 529 期。——编者注

揭发出来的材料表明，伯明翰的现行监狱制度规定使用颈枷和锁在墙上的刑法，莱斯特郡让犯人每天推转盘，而汉普郡则采用饥饿这种更简单的办法，“这就叫自由的国度！”

我在以前的一篇通讯里说过，同缅甸签订的所谓和约只是一种休战；不列颠征服者这次所得到的新的虏获物迟早会成为不断产生新的麻烦的源泉^①。果然，最近一班陆上邮件带来消息说：缅甸主战派的力量正在加强；新领土上简直到处都有为数众多的受阿瓦政府唆使的土匪队伍，因而需要大大加强驻卑谬的武装力量；同时，

“在不列颠军队中，疾病流行，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兵营找不到一处合乎卫生的地方”^①。

印度的不列颠统治者对一切水利工程所抱的可耻的漠不关心态度，正在巴特那地区再一次引起该区常见的霍乱和饥荒（这是长期干旱的后果）。

我从刚刚发表的报告里摘录一份关于不列颠和外国船舶在联合王国海岸附近失事的统计资料^②如下：

年 份	失事船舶	因漏水或互 撞而沉没	触岸搁浅	人员死亡	失事船舶 总 数
1850	277	84	304	784	681
1851	358	—	348	750	701
1852	—	—	—	约 900	1 100

三年间失事船舶总数 2 482

① 见本卷第 225—226 页和第 325 页。——编者注

② 1853 年 10 月 15 日《伦敦泰利斯氏周报》第 75 期。——编者注

人员死亡总数 2 434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0 月
18 日

载于 1853 年 10 月 31 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 391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²⁷²

近来在土耳其战场上有几次重要的军队调动,因而有可能更清楚地判断双方的阵地和计划。俄军——我们首先谈谈他们的情况,因为他们是进攻的一方,所以必须认为他们是采取主动的,——继续向西延伸作战线。整旅整旅的部队相继派往多瑙河上游的维丁方向;现在可以说,俄军的战线是从维丁对面的卡拉法特延伸到赫尔绍瓦对面的奥勒什,它不仅威胁着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而且也同样威胁着通往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道路。俄军第一次向卡拉法特运动就足以表明:他们无疑地要转向土耳其的斯拉夫居民和希腊居民居住地区的中心。与此同时,这种调动还可能说明,俄军的作战计划是要在直达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采取防御和单纯的佯攻,而在通往索非亚以及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道路上采取坚决的进攻。然而,当俄军这样调动时,土耳其人还没有宣战。宣战是在以后;看来沙皇^①对宣战一举极为愤怒,所以很可能促使军队采取比原来所预期的远为坚决的行动。不仅帕斯凯维奇公爵被任命为俄军统帅,而且据说还从驻波兰的俄军即从俄国仅次于近卫军和掷弹兵的精锐部队中抽调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4万人由他率领。这些援军可以保证俄军取得优势,使他们能够在多瑙河上游和下游都采取攻势。同时,这些援军也可以看作是用来对抗据说可能前来援助土耳其的法英军队的。但是俄国的这些援军无论如何不可能在本季中及时地开到多瑙河,参加作战。从华沙经杜布诺、霍京和雅西到布加勒斯特,约有800英里,而部队的每日行程却不能超过8—10英里。因此,这些生力军最早也要过三个月后,即在明年1月初才能占领自己的阵地;如果考虑到季节的影响,这些部队行军的时间很可能还要长。因而,在明年春季的战役开始以前,这些部队将完全位于作战地区以外。

多瑙河两公国的俄军现在约有13—15万人。俄军即使由于疾病和逃跑减少2—3万人,总数仍将超过与它对抗的土军。关于俄军兵力的真实数字,我们只能根据它派往土耳其的师和旅的数量以及这些部队的编制定额进行判断,而关于多瑙河土军的数字却可以从英、法和皮埃蒙特政府派往该地的军官的报道中知道得非常清楚。所有这些报道都一致认为,甚至在埃及部队到达后,奥美尔帕沙指挥的土耳其作战部队也不会超过11万人,其中只有8万人是正规军。在土耳其军队的后方,阿德里安堡有一支由8万列季弗(重新应召服役的老兵)组成的预备队,不过我们还没有得到关于这支预备队的情况的可靠情报。因此,情况是:在打响第一枪时,奥美尔帕沙指挥的部队在数量上将少于自己的敌人,除非敌人犯严重的错误,或者他自己在军事指挥上无懈可击,否则奥美尔帕沙无论如何也不能免于失败。

关于土耳其军队的配置和防御准备的情况,我们也得到了同样确凿的情报。土军修筑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多瑙河,用以阻止敌人强渡;第二道防线从瓦尔纳到舒姆拉;第三道防线在第二道防线

后面几里格的卡姆奇克河畔,那里有一个要塞,可防守巴尔干山脉的山口。据外国军官的记述,这些工事非常坚固,敌人攻占它们的任何企图很可能都要遭到失败。虽然我们非常尊重有重要意义的野战筑城术和这些军官的见解,但是我们认为,接受这一类意见时必须非常谨慎。曾有多少被认为是攻不破的野战工事,结果经过几次霰弹的齐射后,就在第一次强攻时被夺取了!谁不知道,过去最有名的野战工事——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²⁷³之所以坚固,并不是因为它可供消极抵抗,而是因为它有威灵顿的10万人防守,可是进攻它的马塞纳却只有3万人!各个孤立的野战工事,例如山口的野战工事,往往是很有效的,但是在现时的条件下,还不曾有过依靠野战工事的消极抵抗在决战中击溃有才能的将领所指挥的优势敌军的事例。此外,几乎一切都决定于防守野战工事的方法;如果军队缺乏训练或者完全没有训练,那么当敌人以霰弹进行猛烈的射击时,即使有工事的胸墙可以掩蔽,也是无济于事的。

现在我们考察一下土军所设的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沿多瑙河建立的。沿多瑙河构筑这道防线的全部意图,就是阻止俄军强渡。从奥尔绍瓦到黑海的一段多瑙河约长600英里。要在这样长的一线构筑有效的工事并派军队守卫这些工事,就需要有一支超过土军将领现有兵力五倍的军队;即使土军将领拥有这样的兵力,如果这样使用,他也会犯极大的错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第一道防线,只能是从鲁斯楚克到赫尔绍瓦之间的几处防御工事,它们顶多只能加强渡多瑙河的困难,但是不能真正阻止强渡。

从舒姆拉到瓦尔纳的第二道防线,也就是土军1829年在那里被击溃过的一道防线。如果土军在这里进行决战,无疑又要被歼灭。看来,这道防线在防御方面有很大的优点,并且容易用人工来大大加

强。在瓦尔纳和舒姆拉后方的卡姆奇克河防线可能更为坚固，同时还具有迫使敌人必须留下部分兵力封锁上述要塞的优点。但是这两道防线有一个缺点：在后方只有一个狭窄的山口，这是唯一的退路。对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来说，这个缺点就压倒了所有的优点。所以，兵力较弱的军队，除非能像英军在滑铁卢会战²⁷⁴时那样坚信友军会在决定关头对攻击之敌的翼侧进行突击，否则在这里会战就会是极大的错误。

我们不能断定，奥美尔帕沙究竟想怎样利用这些工事。毫无疑问，他很明白他在这次战争中所担任的角色基本上是取守势的一方，所以他用尽筑城术中所能采用的一切方法来加强防线，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知道，他是企图用这些工事使俄军望而生畏，从而迫使他们不敢在最能直接威胁君士坦丁堡的地点渡过多瑙河呢，还是打算就在这里进行决战。据说，他的部队是这样配置的：不论俄军在舒姆拉方向的任何一点渡河，都能随时痛击其主要一路的先头部队，并在其援军到达前将它击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斗失利，第二道防线就可保证土军安全退却。但是，老实说，在这三道防线的任何一道防线上进行大规模的防御战都是错误的：如果俄军集中全部兵力进攻，奥美尔帕沙就很少可能顶得住；如果俄军分兵数路进攻，他就不得不离开自己的防线以攻击其中的一路。对他来说，利用这些工事的最好方法——符合现代战术的唯一方法，就是趁俄军横渡多瑙河的时候，利用这些工事作为攻击其分散的各路纵队的临时基地，利用每道防线的比较顽强的防御阻止俄军前进，以及凭借第三道防线尽一切可能扼守巴尔干山脉最主要的山口，而不进行决战。同时也不能否认，任何军队，尤其是土耳其军队，如果不战而放弃这些工事，士气必然会极度沮丧。因为，如果他们要有要塞围墙和护城壕还不能据

守,那在开阔地带又怎么能击溃俄军呢?普通兵士,尤其是当他还未经过严格训练时,往往正是这样推论的。所以,如果这些工事果真有被认定会有的重要作用,那我们就不能不认为,这些工事对土军本身的威胁要比对俄军更大。

但是,俄军在瓦拉几亚不是也设防了吗?当然是设防了,不过他们的情况是不同的。俄军是进攻的一方;他们的工事只是用于失利时掩护军队退却和阻止追击的敌军;而且他们的退却路线连续被形成四道防线的四条河流所横断。这四道防线是多瑙河、阿尔杰什河、布泽乌河和塞雷特河。这里有构筑预防性工事的良好条件。这几条天然防线对欧洲军队来说并不是退却时的障碍,而且,只要稍加修筑就可成为追击部队的严重障碍。而主要的是,俄军由于在后方只有一条退却路线,所以无意于在这里进行决战。就我们所能判断的,俄军的工事无疑是符合欧洲战术的,土耳其的工事则大多具有亚洲的特点。这种考虑不周之处,也是土军总的部署的主要特点。土军为了防守君士坦丁堡,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通往该城的最近的道路附近,但看来俄军并不打算将首次攻击指向该城,而是指向巴尔干半岛的中部,因为土耳其在那里的统治最弱,而且归根到底在那里有一条俄军通往土耳其首都最近的道路。

然而还有一个情况不应当忘记。俄军的调动不论现在和过去向来是缓慢的、谨慎的。在冬季他们大概不会采取行动。双方相互之间为了夺取多瑙河上的某个沙洲可能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但是,除非沙皇下令采取特别积极的行动,——这种命令很可能因将军们的消极和谨小慎微而不能执行,——否则就很少有可能在春季以前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诚然,强渡多瑙河是可能的,但翻越巴尔干山脉却不可能,而在两者之间,俄军的处境会极其危险。

与此同时,土耳其已向瓦尔纳派遣了自己的舰队。指挥该舰队的英国人斯拉德海军上将看来斗志昂扬。但这一调动也是充满着风险的。的确,俄国舰队除数量而外,很可能在各方面都不如土耳其舰队,但是,当俄军的火炮和战列舰还比土军多一倍的时候,土军是不敢在自己岸防炮台的射程以外进行会战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土耳其舰队放在波斯普鲁斯海峡就比较好,比较安全,俄国舰队大概不会在那里进行封锁。在瓦尔纳,土耳其舰队要冒完全丧失活动能力的危险,而在波斯普鲁斯海峡就可以保持行动的自由,就可以用于向特拉佩宗特和高加索沿岸出击,就可以用于进攻俄国舰队的分散阵位。

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承认,俄军在各方面都比土军占优势。至于奥美尔帕沙这位确实能干的军人能不能靠他个人的才能来改变力量对比,人们正拭目以待。然而老帕斯凯维奇,虽然动作迟缓,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要制服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10 月
20 日前后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11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1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德勒克吕兹被捕。——丹麦。
——奥地利。——《泰晤士报》谈
对俄战争的前景²⁷²

1853年10月21日星期五于伦敦

赖德律-洛兰先生的私人秘书德勒克吕兹先生被捕,是最近在巴黎进行的逮捕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他是被派到巴黎来执行秘密使命的,据报道,在他身上发现了于他不利的文件。令人不能理解的是,赖德律-洛兰先生竟然信任一个始终没有洗刷掉自己在1848年轰动一时的里斯孔图事件²⁷⁵中有出卖过比利时军团嫌疑的人。

看来,哥本哈根的政变不可避免要走最后一步了,因为内阁不肯让步,而下院又宣布,在政府向它提交整个丹麦王国的宪法草案以前反对取消现行宪法。出现了为石勒苏益格公国和荷尔斯泰因公国制定的两个单独草案。这两个草案是对旧普鲁士省议会宪法的拙劣模仿:代表名额在几个“等级”之间分配,选举权取决于地产的占有,选举权的运用受在相应选区有“固定住所”这一条件的限制。这些宪法草案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条:一条规定,废除法院旧有的取消行政法

令的权利；另一条规定，凡是由于参加 1848—1850 年革命斗争而破坏了自己名誉的人，不管后来是否被赦免，一律剥夺其投票权。

我在前一篇通讯中已经说过，奥地利的裁军法令只是为了让放债人上当而编造的^①；现在，当取得贷款的任何希望已消失的时候，当政府宣称它本来就不打算举借任何贷款的时候，当它已着手再次发行纸币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执行奥皇关于裁军的法令，相反，指挥驻伦巴第、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部队的所有将军们，由于这些国家里普遍存在的某种情绪，都毫无例外地要求增加兵员。”^②

《晨邮报》驻巴黎通讯员就俄皇最近访问奥尔米茨和柏林期间的行动报道如下：

“沙皇^③的主要目的是在北方列强之间缔结一个新的联盟…… 俄皇为了克服普鲁士的抗拒，使用了种种论据，也可以说是种种贿赂，因为他曾经表示，一旦他能进入并占有土耳其领土，他愿意把对华沙的占领和对波兰的军事统治让给普鲁士。”^④

至于俄军战胜沙米尔的消息，据巴黎得到的报道，这些消息不过是臆造的产物，因为自从 5 月份沙米尔在门多赫附近告捷，企图在马尔卡河进攻的俄军被击退时起，在高加索并没有发生任何战斗。

“我们完全理解，为了波兰人或匈牙利人而对俄作战是得人心的，——即使我们的干涉除了政治同情以外没有别的理由…… 但是，我们不理解为了土耳其人而进行的战争。”^⑤

① 见本卷第 489 页。——编者注

② 1853 年 10 月 21 日《晨邮报》第 24909 号。——编者注

③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④ 1853 年 10 月 19 日《晨邮报》第 24907 号。——编者注

⑤ 1853 年 10 月 12 日《泰晤士报》第 21557 号。——编者注

10月12日的《泰晤士报》就是这样写的。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又在这家报纸上读到：

“英俄两国军队的第一次交锋就会成为整个大陆革命的信号。我国的贵族的、财阀的、专制的以及随便怎么说绝不是民主的领袖们，有时是能够考虑到这一点的，我们决不认为考虑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认为这样的考虑是完全不应该的……在为了维护土耳其对某些实际上独立的省份的有名无实的主权而对俄作战以前，我们应当作周密的考虑，因为我们那样做会在奥地利帝国中引发叛乱。”①

总之，它一会儿说，英国不应当对俄作战，因为那样做是去保护土耳其人，而不是保护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一会儿又说，英国不应当对俄作战，因为任何为了土耳其而进行的战争，同时也是为了波兰人和匈牙利人而进行的战争！

维也纳《新闻报》说，苏丹建议阿卜杜尔·卡迪尔在一旦发生对俄战争时出任土军司令之职。谈判是通过伊斯兰教谢赫②进行的；这位埃米尔声明，如果事先能征得波拿巴的同意，他愿意赴土耳其就职。预定给他的职位是亚洲的土军司令。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0月
21日

载于1853年11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17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① 1853年10月19日《泰晤士报》第21563号。——编者注

② 阿里夫·希克默德贝伊。——编者注

弗·恩格斯

神圣的战争²⁷⁶

战争终于在多瑙河上开始了，对于双方来说，这是宗教狂热的战争，对于俄国人来说，这是实现传统的野心的战争，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战争。果然不出所料，奥美尔帕沙首先开始了积极的军事行动。按其职责来说，他应当采取某种行动，以表明自己决心用武力把入侵的敌人驱逐出奥斯曼帝国。但是，像维也纳的谣传那样，他已派3—5万人渡过多瑙河，这个消息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可靠的；如果他真的那样做了，那就有理由担心他犯了不可挽救的错误。他所离开的这个河岸能保证他有一道很好的防线和多种多样的防御手段；而在他所要登上的那个河岸上，他所拥有的进攻的兵力将少于敌人，而且如果战败也没有退路。因此，关于他率领这样数量的兵力渡过多瑙河的报道，在没有接到更确实的消息以前，是值得怀疑的。

尽管在欧洲，战争是在对土耳其不利的情况下开始的，但在亚洲情况就全然不同了。在亚洲，从军事观点来看，土耳其和俄国的交界地区把它们分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战区。山脊，更确切些说，山脉把高加索同中央亚美尼亚高原连接起来，并且在流入黑海的各条河流和流入里海的阿拉斯河以及流入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之间形成一道

分水岭。这条以前把亚美尼亚同本都隔开的山脉，现在成了将在其中进行战争的两个独立地区的分界线。山脉到处是悬崖绝壁，几乎寸草不生，只有很少几条道路可以通过，其中最重要的是从特拉佩宗特和巴统到埃尔祖鲁姆的两条道路。因此，从军事行动来说，这些高山差不多是不可通过的，这就使敌对双方都不得不在山脉的两面各有一支比较能够独立行动的独立部队。

黑海沿岸地区横贯着许多河流和山涧，形成一道一道的防线。俄军和土军在重要的地点都设有据点。在这个主要是起伏地的地形上(只有里昂河流域近乎平原)进行防御战，只要敌军没有相应的舰队协同作战，就可以取得很大的战果，挡住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因为是山地，只有很少几道防线可以从陆地上迂回)。如果舰队开近沿海地区，必要时运送部队在敌人翼侧登陆，而陆军则进行正面攻击，那么舰队就可以逐个迂回所有这些坚固的阵地，压制甚至摧毁国境线任何一面的威力很大的要塞。因此，谁掌握制海权，谁便占有黑海沿岸；换句话说，除非联军舰队积极协同土军作战，否则黑海沿岸很可能归俄军所有。

山脉背面的内陆地区，是幼发拉底河、阿拉斯河和库拉河的发源地。土耳其的亚美尼亚省位于国境线的这一面，俄国的格鲁吉亚省位于那一面。这个地区也是山岭交错，一般说来，军队是通不过的。土耳其方面的埃尔祖鲁姆和俄国方面的梯弗里斯可以算作两个直接的作战基地，基地丧失就不可避免地使整个邻近区域丧失。俄军就曾由于强攻埃尔祖鲁姆获胜而决定了1829年的亚洲战局²⁷⁷。

但是，某一地点，对于一方是直接的作战基地，对于他方便是直接的作战目标。因此，连结梯弗里斯和埃尔祖鲁姆的道路将成为敌对双方的作战线。道路有三条：一条沿库拉河上游通过阿哈尔齐赫，

一条沿阿拉斯河上游通过埃里温，一条在前两者之间翻山到卡尔斯。这三条道路双方都有设防城市和据点防卫，因而很难断定哪一条对土军最有利，哪一条对俄军最有利。只要指出这个情况就够了：通过阿哈尔齐赫的道路，是土耳其军队直趋高加索起义地区的捷径，而俄军如果从巴统经过乔罗赫流域由奥尔特向埃尔祖鲁姆前进，就可能迂回推进中的土军。来自巴统的道路与来自梯弗里斯的道路在距埃尔祖鲁姆仅 15 英里的地方会合，因此在上述方向前进的俄军，就有可能截断土军的交通线，如果兵力充足，甚至可以占领埃尔祖鲁姆，因为这个城市的工事是纯粹亚洲式的，无法进行认真的抵抗。

因此，巴统是亚洲战区山脉两侧的锁钥。如果注意到这种情况并考虑到巴统在商业方面的意义，那就不必奇怪，沙皇^①为什么总是不遗余力地想侵占它了。不仅如此，巴统还是土耳其整个亚洲部分的战区的锁钥，因为它控制着沿海地区通往内地的唯一孔道，这条路可以迂回土军在埃尔祖鲁姆前面的一切阵地。黑海的两国舰队，谁能把自己的敌人逐回海港，谁就能控制巴统。

俄军十分明了这个据点的重要性。他们分水陆两路增援南高加索沿海地区。不久前我们就已相信，土军在欧洲虽然比较弱小，但在亚洲却占有决定性的优势。据报道，亚洲土军司令官阿卜迪帕沙拥有 6—8 万人，有的甚至说有 12 万人，并且每天还有大量的贝都英人、库尔德人²⁷⁶和其他好战的非正规部队投到他的麾下。据说，已为高加索起义者储备了武器装备，一旦宣战，土军就将向这个反俄基地的中心突进。但必须指出，阿卜迪帕沙未必能有 3 万以上的正规部队；他在到达高加索之前，必须用这支兵力——也只能用这支兵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力——同顽抗的俄军部队作战。骑马的贝都英人和库尔德人可以出色地进行山地作战,以迫使俄军大大地分散兵力,从而削弱其主力;他们还可以使俄国境内的格鲁吉亚人的村落和俄罗斯族移民的村落遭受很大的破坏,甚至可以和高加索的山民建立某种秘密联系。但是,除非阿卜迪帕沙的正规部队能封锁住从巴统到埃尔祖鲁姆的道路并击溃俄国人可以集中的作战部队的主力,否则非正规部队的胜利只能是昙花一现。在我们今天,要胜利地进行任何起义或非正规的军事行动以对抗强大的正规军,就必须有正规军的支援。土军在这个边境上所处的地位颇似威灵顿当年在西班牙所处的地位。阿卜迪帕沙是否能像那位英国将军一样善于用兵,善于对付在正规作战和必需物资方面都占明显优势的敌人,尚须拭目以待。1829年集结在埃尔祖鲁姆前面的俄军共18 000人;考虑到自那时起土军已进行了改革(虽然在亚洲的那部分土军改革最少),我们认为,如果俄军现在能在这同一地点集中一支3万人的部队,他们便有很大把握获胜。

同欧洲的俄军比起来,现在有关亚洲俄军的可靠材料较少,而谣传却较多,在这种时候,谁能预言他们是否做得到这一点呢?高加索俄军按满额数字名义上是20万人;21 000名黑海哥萨克已派往土耳其边境;据说,有几个师已由敖德萨乘船前往高加索南部海岸的列杜特-卡列。但是大家知道,高加索军队人数不及正式编制的一半,派往高加索山脉以南的援军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不可能达到俄国报纸所报道的数字。根据我们收到的一些互有出入的消息,根本不能够哪怕是大概估计出亚洲边境上俄军的兵力。但是我们可以指出,双方的兵力很可能大致持平(且不考虑高加索人可能很快举行普遍起义),土军也可能还稍多于俄军,因此,完全有理由在这个战区采取攻势。

土军在亚洲获胜的希望的确要比在欧洲大得多。他们在亚洲只需守住一个重要的据点——巴统。向高加索进军,无论从巴统出发或是从埃尔祖鲁姆出发,如果获胜,便可以和他们的同盟者——山民取得直接的联系,还可以至少由陆上一举切断南高加索俄军与俄国的联络,这样就可以全歼这一支军队。另一方面,土军如果失败,会有失去巴统、特拉佩宗特和埃尔祖鲁姆的危险,即使是这样,俄军仍然没有足够的兵力继续前进。土军的所得将大大超过失败时遭受的损失,因此,根据这些正确的和恰当的理由,土军看来已经决定在这个地区打进攻战了。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53 年
10 月 27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11 月 1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2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战争。——罢工。——缺粮²⁷⁹

1853年11月1日星期二于伦敦

伊萨克察炮战²⁸⁰的消息刚传到伦敦,就有一则电讯从维也纳送到伦敦和巴黎,这则电讯说,土耳其政府按照四强国代表的要求,已经下了命令:如果军事行动尚未开始,就推迟到11月1日。双方在伊萨克察互相打炮是否应看作是军事行动的开始呢?这是证券交易所和报界当前极为关切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完全无关紧要,因为不管情况怎样,休战到今天就已经满期了。

据传土耳其军队已在维丁和默钦,即在保加利亚东南和西北边境,越过多瑙河。这个消息是非常靠不住的。据今天巴黎的《新闻报》报道,奥斯曼帝国陆军部在10月15日或16日举行的军事会议上作了决定,一旦得知哥尔查科夫公爵正式拒绝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兵的消息,就在亚洲的两个不同地点开始军事行动:从黑海和格鲁吉亚边境攻打波季要塞。这家报纸还报道,刚被任命为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巴拉盖·狄利埃将军已经带了一个由工程部队和炮兵部队的军官组成的参谋部动身到土耳其去了。巴拉盖先生是以蹩脚的将军和高明的阴谋家而出名的。读者不妨回想一下他在著名的普瓦

捷街俱乐部²⁸¹中的丰功伟绩。

在俄国对欧洲战争响起第一阵炮声的同时，目前在工业区中猛烈展开的资本对劳动的战争也发生了第一次流血。星期五晚上，威根发生了风潮²⁸²，风潮是由煤矿工人和煤炭大王之间的冲突引起的。据报道，星期六城里完全平静，但是，今天电报给我们带来的消息是：在克劳福德勋爵或巴尔卡里斯伯爵的矿上，煤矿工人进行了袭击，结果招来了军队，士兵开了枪，打死了一个工人。由于我要从出事地点的私人那里得到情报，所以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①我要迟发一些，只希望读者对于《每日新闻》和《泰晤士报》的报道多加提防，因为这两家报纸头一家直接受曼彻斯特学派⁶⁴津贴，而后一家正如《先驱晨报》公正地指出的，是“工人阶级的势不两立的、不可调和的、无情的敌人”。

在1842年，曼彻斯特学派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帜把工业无产阶级吸引到武装反抗运动中来，而在危险的时刻出卖了它²⁸³，关于这一点，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下院也曾向科布顿派坦率地谈过。在这个时期，曼彻斯特学派的口号是：“廉价食品和高额工资。”但是谷物法²³⁵刚一废除，曼彻斯特学派所理解的那种自由贸易刚一实现，他们的战斗号召就变成了：“低额工资和高价食品。”由于政府采取了曼彻斯特派的贸易制度，工业巨头们就给自己出了一道在他们统治下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难题，即保证工商业的不断的繁荣和发展。曼彻斯特派已把遇到灾难时的一切退路都断绝了。现在已经不能再像在1831年时那样用议会改革¹²⁹来愚弄群众了；议会改革运动为中等阶级赢得的对立法的影响已经完全被利用来对付工人阶级；与此同时，工人

① 见本卷第520—525页。——编者注

阶级也产生了自己的政治运动——宪章运动⁸⁰。现在已经不能把工业体系中发生的一切反常现象和这个体系内部产生的那些致命的冲突都归罪于贵族保护关税派了,因为自由贸易已经存在了八年左右,实行自由贸易的条件非常有利,还出现了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这两个仿佛是被现代造物主的灵感突然创造出来的埋藏着黄金的世界。工业资产阶级就这样一个一个地、一步一步地、亲手扫除了它精心培育出来的一切幻想,而在过去,它可以在危急时刻利用这些幻想把工人阶级的激愤从他们真正的对头身上引开,而引向工业巨头的对头,即土地贵族。在1853年,厂主的虚伪的欺骗已经行不通了,工人的糊涂的幻想也被打破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已成为不可缓和的、不可掩盖的、公开承认的和人人清楚的事了。厂主们在自己最近的一个宣言中大叫:“现在已经不是工资问题,而是应当由谁来统治的问题了。”^①这样,曼彻斯特自由派终于抛掉披在自己身上的狮皮。他们现在力求做到的就是:让资本来统治,让劳动受奴役。

同盟歇业对罢工——这就是目前在工业区进行的大诉讼,这场诉讼大概要由刺刀来作判决了。一支工业大军,——7万多名工人遭到解雇,流落街头。除了普雷斯顿和威根以外,贝克普地区,其中包括贝克普、纽彻奇、罗滕斯托尔、沙恩福德、斯坦福等地的工厂也都歇业了。伯恩利的工厂已在上星期五停工,帕迪厄姆的工厂在上星期六停工;在阿克灵顿,厂主们正在计划宣布同盟歇业;在贝里,已有约1000人不去做工,厂主们对工人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停止为本城和普雷斯顿的罢工者募捐,就要宣布同盟歇业”^①;在欣德利,星期六下午有三个大工厂关闭,这样一来又有1000多人失去了工作。

^① 1853年10月29日《人民报》第78期。——编者注

伪善的、空话连篇的、心怀恶意的曼彻斯特派骗子集团一方面在爱丁堡大谈和沙皇讲和²⁸⁴，另一方面却在曼彻斯特对自己的同胞进行战争。它一方面鼓吹在俄国和欧洲之间进行仲裁，另一方面却高傲地拒绝自己同胞提出的一切举行仲裁的建议。普雷斯顿的工人曾在一次露天群众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说，

“工厂工人的代表建议市长召集厂主和工人的公开会议来和平解决目前的争端。”^①

但是厂主们不要仲裁。他们只要独裁。正当欧洲的战火燃烧起来的时候，这些亲俄的宣传家大叫裁减军队，而同时却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为内战扩充军队，扩充警察力量。我们要对工人说，我们只能赞同《人民报》的意见：

“如果他们要把兰开夏郡的工厂全都关闭，那么就派代表到约克郡去，去向西区的英勇工人求援。如果西区的工厂也关闭，那么就到诺丁汉和德比去，到伯明翰和莱斯特去，到布里斯托尔和诺里奇去，到格拉斯哥和基德明斯特去，到爱丁堡和伊普斯威奇去！让你们的呼声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出去！把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行业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如果企业主存心拿出他们这个阶级的全部力量来对付你们，你们就拿你们整个阶级的力量去对付他们。如果他们想要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那就让他们如愿以偿，且看这场大考验会有怎样的结局吧。”^①

一方面，厂主和工人之间正在进行斗争，另一方面，贸易正在同市场商品过剩进行斗争，人的勤劳正在同自然的匮乏进行斗争。

在中国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曾经提醒读者注意中国革命对

^① 1853年10月29日《人民报》第78期。——编者注

大不列颠的社会状况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影响。^①现在《观察家》告诉我们：

“中国发生的起义正在产茶地区不可抑制地蔓延；结果，伦敦市场上的茶叶价格看涨，而上海市场上的白布价格看跌。”^②

在利物浦布什比公司的通报中，我们可以看到：

“上海的茶叶市场的开市价格比上季高约 40—50%。存货不多，而新货来得很慢。”^③

根据广州最近的消息，

“起义运动广泛地蔓延于全国，贸易有完全被破坏的危险；工业产品几乎全都跌价，有时跌得很厉害。存货数量很大，而且越积越多，我们担心将来情况也未必能够好转。在厦门，除了几箱鸦片以外，进口贸易目前显然已经停顿下来。”^④

关于上海市场的情况，是这样报道的：

“红茶和生丝都是自由售卖的，但是物主提出的条件却大大地限制了业务；没有人愿意换取工业品，交易主要是靠价格很低的鸦片和从广州带来的银锭来实现。从广州已运出大量金银，储存很快就会用光，所以我们不得不到别处设法筹措银锭和银币，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很快就无法采购产品，除非在进口贸易中情况发生显著的好转。进口贸易的业务极受限制，现在主要是用拍卖的方式销售残次品。”^⑤

10月21日在曼彻斯特出版的吉布森公司的商业通报指出，当前萧条的最主要原因在于：

① 见本卷第 113—120 页。——编者注

② 1853 年 10 月 29 日《观察家》第 2387 号。——编者注

③ 1853 年 10 月 29 日《经济学家》第 531 期。——编者注

“不仅目前从我们巨大的中国市场上不断传来坏消息,而且今后还会继续得到这类消息,因为人们对钱财交易抱着不信任心理,这种情况在长时期内都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在这个大帝国的管理和制度方面看来将要实行的普遍的和根本的变革的结果。”①

关于澳大利亚市场,《墨尔本商业通报》作了如下的报道:

“仅仅约一个月以前采购并且当时就到手的货物,卖出后获利至少有100%或150%,而现在卖货的款项连开支都不够。”②

上星期接到的从菲利普港来的私人信件,也带来了关于市场状况十分不好的消息。大批商品继续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涌来,但是这些商品的售价极低,只好购买很多船舶充当仓库,以避免直接损失。

因此,各家商业通报继续报道工业区市场呆滞和价格下跌的情况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例如,从10月21日曼彻斯特弗雷泽父子的通报上,我们看到:

“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业务范围都大受限制,价格或多或少地普遍下跌。可以肯定,7或8号印花布和马德波勒姆细布每幅下跌 $1\frac{1}{2}$ —3便士;56—66里德③34—36英寸的衬衫面料每幅下跌 $4\frac{1}{2}$ —6便士;36—72里德的衬衫面料每幅下跌3便士;重 $5\frac{1}{4}$ —6磅的39英寸的低级衬衫面料每幅下跌约 $4\frac{1}{2}$ 便士;39英寸60—64里德的衬衫面料每幅下跌3便士;45—54英寸的衬衫面料每幅下跌 $4\frac{1}{2}$ — $7\frac{1}{2}$ 便士;5—8号的低级细棉布每幅下跌 $1\frac{1}{2}$ 便士,14—16号的平衡细棉布每幅下跌3便士;粗平布每幅下跌 $1\frac{1}{2}$ 便士,漂白细棉布每

① 1853年10月29日《经济学家》第531期。——编者注

② 引自1853年10月25日《泰晤士报》第21568号。——编者注

③ 1里德约等于3米。——编者注

幅下跌 3 便士,而在国内市场,某些等级的此种面料每码则下跌约 1—16 便士。在纱线方面,水力纺纱机制品,属一般和中等质量的下跌最多,估计每磅比上个月的报价低 $\frac{1}{4}$ — $\frac{1}{2}$ 便士。40 支走锭纱受影响最大,每磅售价比今年最高点足足下跌了 1 便士。其他各种 20 支纱线,60 支以下者,也受到类似的影响。”^①

关于粮食市场的情况,伦敦《每周快讯》作了如下的报道:

“至于小麦,据已经打场和计算产量的农场主说,收成将比他们预计的更低。他们甚至把它称为半个收成。”^②

此外,一连约有两星期,天气阴冷潮湿,这对于小麦的播种和已经播种的小麦极为不利,也使人们极其担心 1854 年的收成。

来自牛津郡的消息说:

“总的来说,小麦收成特别差;往常每英亩产 40—44 蒲式耳的农场,今年只产 15—20 蒲式耳,而某些耕种得很好的小麦和豆田每英亩只产 8—10 蒲式耳。马铃薯由于遭受严重病害而收成很低。”^②

来自约克郡的消息说:

“由于阴雨连绵,一切户外农活完全停止,而本季收获剩下的东西——真可惜,其中包括全部豆子、大部分春麦和一部分燕麦——由于对坏天气没有很好防备,受潮很厉害,即使经过干燥的春风吹过以后,能不能打谷还成问题。同时,这些谷物有很多都发了芽,这些最后的资源无疑将损失很大一部分。至于这里所说的损失究竟多大,从下面的例子中可见一斑。从蒂斯河一直到卡特里克,到斯托克斯利,包括克利夫兰的整个低地,再从瑟斯克起到沿海的东部,到从哈罗盖特、亨伯河起到沿海的西部,由于阴雨天气,大量禾谷因潮湿而腐坏了;至少有 50% 的马铃薯得了病,收成无望;此外,还需要增补种子,可是旧种子储存不多。十分明显,国内所有产麦区遭到了在我们的记忆里从未有过的灾荒

① 1853 年 10 月 29 日《经济学家》第 531 期。——编者注

② 1853 年 10 月 30 日《每周快讯》第 2707 号。——编者注

和歉收。”^①

来自赫特福德郡的消息说：

“今年直到这个时候我国的收获工作还没有结束，这种情况是完全反常的。然而这是事实，许多田里的燕麦还没有运走，相当大一部分春播豆子也没有运走，而有的地方连大麦也还没有运走；有一些早春作物甚至还没有收割。”^①

上星期六，在《经济学家》上刊登了下面一张表格，表明在 1853 年 1 月 5 日—10 月 10 日期间联合王国输入的小麦和其他各种谷物以及各种粗磨粉和精磨粉的数量。

输出国	小麦 (单位:夸特)	小麦粗磨粉 或精磨粉 (单位:英担)	其他各种 谷物 (单位:夸特)	各种粗磨粉 和精磨粉的 总数 (单位:英担)
俄国				
经北方港口	69 101	64	307 976	65
经黑海港口	704 406	-	1 029 168	-
瑞典	3 386	13	3 809	13
挪威	-	1	561	1
丹麦	220 728	5 291	733 801	5 291
普鲁士	872 170	3 521	899 900	3 521
梅克伦堡-什未林	114 220	-	123 022	-
汉诺威	19 187	-	146 601	-
奥尔登堡	2 056	-	19 461	-
汉撒城市	176 614	53 037	231 287	53 066

^① 1853 年 10 月 29 日《经济学家》第 531 期。——编者注

输出国	小麦 (单位:夸特)	小麦粗磨粉 或精磨粉 (单位:英担)	其他各种 谷物 (单位:夸特)	各种粗磨粉 和精磨粉 的总数 (单位:英担)
荷兰	58 034	306	132 255	308
比利时	15 155	353	20 829	353
英吉利海峡群岛				
(外国产品)	526	4 034	629	4 034
法国	96 652	857 916	470 281	858 053
葡萄牙	4 217	4	21 657	4
亚速群岛	630	-	14 053	1
西班牙	13 939	177 963	48 763	177 985
直布罗陀	-	9	4 368	9
意大利:				
撒丁领地	7 155	2 263	8 355	2 263
托斯卡纳	43 174	67 598	45 597	67 598
教皇国	39 988	-	41 488	-
那不勒斯和西西里	8 618	2	11 977	2
奥地利领地	44 164	370	106 796	370
马耳他	28 569	-	56 281	-
伊奥尼亚群岛	82	-	16 220	-
希腊	1 417	-	10 221	-
瓦拉几亚和摩				
尔多瓦	209 048	-	601 481	-
叙利亚	21 043	-	24 686	-
埃及	297 980	-	543 934	-
其他土耳其领地	218 407	7 370	689 703	7 370
阿尔及利亚	-	-	21 661	-
摩洛哥	3	3	13 451	-
英属东印度	-	205	-	205
英属北美洲	45 587	232 216	62 626	232 493

输出国	小麦 (单位:夸特)	小麦粗磨粉 或精磨粉 (单位:英担)	其他各种 谷物 (单位:夸特)	各种粗磨粉 和精磨粉的 总数 (单位:英担)
美利坚合众国·····	434 684	2 388 056	630 324	2 389 263
巴西·····	-	3	237	320
其他国家·····	1	148	8	148
总计·····	3 770 921	3 800 746	7 093 458	3 802 743

小麦总计····· 3 770 921 夸特
 3 800 746 英担粗磨粉和精磨粉的等价物····· 1 086 522 夸特
 谷物、精磨粉和粗磨粉总计····· 8 179 980 夸特①

《经济学家》为了消除伦敦城的商人们的忧虑,就从上面的表格作出以下的结论:

“在1847年,尽管实行高价输入这种特殊的刺激办法,我们全年输入的小麦和面粉只有4 464 000夸特。在今年头九个月内,我们没有用这种刺激办法(最后两个月除外),就已输入4 856 848夸特。因此,关于这样大量的输入对我们国内供应的影响,完全可以从下面两点中肯定一点:或者是把大部分输入的小麦用于消费,从而在相等程度上把我们本国的产品保存下来,或者是把它存在仓库里,以备后用。”①

然而,这种二者择一的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由于大陆各国已经实行或即将实行禁止输出粮食的措施,粮商认为,目前在英国把粮食存在仓库里是合适的,只留作将来英国粮价上涨到比大陆粮价更高的时候使用。此外,与1847年的情况相反,那些可能受到俄土战

① 1853年10月29日《经济学家》第531期。——编者注

争影响的国家的供应为 2 438 139 夸特谷物和 43 727 英担面粉。11 月 30 日以后埃及也将禁止输出。最后,英国在今年只能指望得到其他国家的通常的每年余粮,而在谷物法快废除之前,它可以在缺粮时期手里有外国在丰收时期积存的粮食。

《泰晤士周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情况作了以下的总结:

“4 磅重的大圆面包的价钱是 1 先令,天气一直是这么坏,在每年这个季节像目前这样坏的天气是 50 年内从未有过的;工人阶级都卷入了罢工的热潮;亚洲霍乱又在我国流行起来;战争狂热也支配着我们。我们只是欠缺战争税和饥饿这两项,不然的话,英国的灾难就算齐备了。”^①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 1853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1 日

载于 1853 年 11 月 15 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 392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① 1853 年 10 月 30 日《泰晤士周报》第 355 期。——编者注

卡·马克思

*波斯进军阿富汗和俄国进军中亚。
——丹麦。——多瑙河和亚洲的
军事行动。——威根的矿工²⁸⁵

1853年11月4日星期五于伦敦

波斯驻圣詹姆斯宫大使沙菲汗突然被沙赫^①从英国召回。这次召回同波斯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²⁸⁶奇怪地巧合在一起(据说,波斯在阿富汗占领了赫拉特),而且也同俄国进军希瓦汗国的首都希瓦这事件²⁸⁷巧合在一起。波斯和俄国的进军可以看成是一路从西一路从北向旁遮普这一不列颠东方领地的北部前哨汇合的两路进军。俄国的进军由佩罗夫斯基将军指挥,他就是那位在1839—1840年进军希瓦时曾遭到失败的将军。近几年来,俄国在威海建立了一支小舰队,现在能够溯阿姆河而上了。

俄国的一支大舰队正在波罗的海游弋,不久以前,它在这里曾经有机会侦察过瑞典哥得兰岛的斯利特工事和港口;俄国对哥得兰岛

① 纳赛尔丁。——编者注

覬覦已久,很想像占领奥兰群岛²⁸⁸(奥兰群岛接近瑞典海岸,1836年俄国在此构筑了强大工事)那样占领该岛。俄国舰队离开哥得兰以后接着就开赴卡特加特和松德海峡,目的是支持丹麦国王①策划的政变,因为哥本哈根的议会很有可能会拒绝驯服地接受宽宏大量的沙皇钦定的所谓全国宪法(Gesammt-Staats-Verfassung)。哥本哈根的局面是这样的:丹麦政府由于得到农民联盟¹⁹²的支持,废除了王位法¹⁸³,实行了新的王位继承法。农民联盟是以切尔宁上校为首的政党,它的主要目标是力求变 Feste Gut 这种封建性的农民地产为自由财产,颁布有利于农民和他们的发展的市政法。被恰当地称之为民族-自由党的政党——艾德丹麦人党¹⁹¹,在1848年曾组成“卡集诺”内阁²⁸⁹,迫使国王接受了1849年的宪法,并且进行了反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战争¹⁹⁵,它主要由一些有专门职业的人组成,它同大陆上其他一切自由派政党一样,忽视考虑基本人民群众利益的必要性,而丹麦的基本人民群众就是农民。因此,它失去了自己对人民的影响,政府几乎完全把它排除出本届下院,现在该党在下院里的代表不过寥寥十来个人。然而,政府在借农民联盟的帮助摆脱了艾德丹麦人党这个令人讨厌的反对派以后,便撕下了假面具,任命了厄斯特德先生这位双方都不欢迎的人物当首相;他们不仅不再哄骗农民政党,而且还用国王的否决权禁止公布政府自己当年提出来引诱农民的新市政法,受政府愚弄和侮辱的农民联盟,便同艾德丹麦人党组成了联盟,并且任命牧师、艾德丹麦人党的领袖之一蒙腊德为宪法委员会副主席。这个联盟使一切想用宪法废除宪法的希望都没有了,于是——既然整个计划都是俄国人制定的,并且是为了他们的利

① 弗雷德里克七世。——编者注

益——，正是在这个危急时刻，俄国舰队就出现在丹麦的领水上。

维也纳和柏林的所有报纸都证实了土军以大量兵力强渡了多瑙河的消息。据《奥地利通讯》报道，俄军在小瓦拉几亚击退了土军。有一条电讯说，上月 21 日两军在亚洲进行了一场大会战。在得到比较详细可靠的消息以前，我们对于是什么情况促使土军总司令在维丁附近渡过多瑙河暂不发表意见；乍看起来，这个行动应看作是一大错误。《科隆日报》说，哥尔查科夫公爵查封了瓦拉几亚的所有金库（没有说明哪些金库，政府的还是其他的）；据另一家德文报纸说，这位将军还把集中在多瑙河准备出口到外国去的全部粮食储备运往腹地。

今天的各家法文报纸证实了沙米尔在同沃龙佐夫公爵部队的战斗中获得胜利的消息。据《阿格拉姆报》报道，丹尼洛公爵接到俄国来的一封重要信件，他接到信以后，就命令把集中在黑山境内的全部粮食都运到扎布利亚克。在黑山，正在制造弹筒和铸造弹头。据说，俄国通知了黑山统治者，俄土两军的冲突一触即发，战争将是爱国的圣战，黑山人有责任警觉地保卫自己的疆界，使邻省不去帮助土耳其政府。

上月 28 日的维也纳报纸《漫游者》说：据圣彼得堡来信，俄皇尼古拉颁布了建立后备军的命令，其司令部将设于沃伦。

本星期二在布莱克本，在圣彼得区议会代表的选举中发生了骚动；士兵被调来进行干预。

普雷斯顿的工人领袖考威尔先生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就威根发生的骚动宣称：

“他对威根发生的事件深表遗憾。他很惋惜，威根的工人没有认识到不当在平均主义上找出路。工人们集合在一起把自己创造的财产加以毁坏，这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财产本身并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损害；占有这种财产的人

才是可恶的暴君。希望工人们珍惜财产和人的生命。行动温和,遵守秩序和保持安宁,才能有把握取得有利于他们的斗争结局。”^①

我决不认为威根矿工付出了七个人鲜血的代价的盲目暴力行动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明白,特别是对于工人阶级的下层(矿工无疑属于工人阶级的下层)来说,当极端的贫困和老板的无以复加的蛮横逼得他们作绝望的挣扎时,要他们“行动温和,遵守秩序和保持安宁”是很困难的。老板们常常故意挑起骚动,以便能要求军队干预,并且根据当局的命令驱散一切工人集会,像他们在威根所做的那样。星期五下午在威根城发生的骚动,就是该地区的煤炭大王们制造的,他们大批人集合在怀特塞德皇家旅馆开会讨论矿工的要求,通过决定拒绝同工人作任何妥协。星期一在威根附近的黑格发生捣毁锯木厂事件,其目的在于反对外来的矿工,他们是巴尔卡里斯伯爵的代理人皮斯先生从威尔士运来代替正在罢工的煤矿工人的。

矿工使用暴力来阻止自己的工人兄弟干他们放下不干的活,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老板们互相保证以重罚的方式来强化他们的同盟歇业²⁸²的时候,对工人们以更加粗鲁而更少虚伪的方式强化自己的罢工难道我们会感到奇怪吗?约瑟夫·休谟先生本人在他写给普雷斯顿工人的一封信中说:

“在那些主张用仲裁而不是用战争来解决民族冲突的人当中,我看到有许多是现在同自己的工人开战的工厂主。”^①

普雷斯顿工厂主协会公布了一篇为总同盟歇业作辩护的宣言。^②写这个宣言的人是不是真诚,可以根据下面的事实来判断,这

① 1853年11月5日《人民报》第79期。——编者注

② 1853年11月3日《泰晤士报》第21576号。——编者注

就是：宣言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厂主的秘密联盟（联盟的纲领我在两个月以前已经向你们的读者介绍过了^①），这样就给蓄意造成的密谋涂上了一层必然性的色彩，厂主们似乎想逃避也不可能。他们责难工人硬要增加10%的工资，少一点儿都不干，但是他们却不告诉公众，厂主们在1847年缩减工资10%时曾答应一旦实业复苏就立即恢复原来的工资；他们也不谈工人们从布莱特先生、科布顿先生等人所描绘的辉煌的图景中，从整个中等阶级报界的一片颂扬声中，从议会开幕式上的国王敕语中，已经不止一次地了解到实业已经复苏。他们也不提从那时起食品价格上涨了40%以上，煤炭上涨了15—20%，肉类、蜡烛、马铃薯以及工人阶级大量消费的一切其他日用品上涨了20%左右，也不提工厂主们是在“廉价食品和高额工资”的口号下战胜自己的对手的！工厂主们责难工人们，说他们继续坚持同一个城市的同类企业的工资要平等。难道他们的厂主们的全部学说，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全部学说，不就是从全国存在着这种平等的假设出发的吗？工厂主们说，工人们是按照某个委员会的命令行事的。工人们是受了“外来人”、“自封的领袖”、“鼓动家”的煽动。在反谷物法同盟²⁹⁰时期，保护关税派也是这样说的，那时他们责难这些工厂主服从布莱特先生和科布顿先生“这两个职业鼓动家”的领导，责难他们按照曼彻斯特的革命委员会的指令盲目行事，这个委员会征收会费，指挥一支讲演人和传教士的大军，用大大小小的出版物充斥全国，形成一个国中之国。最有趣的是，厂主们在责备工人们“按照某个委员会的命令行事”的时候，却把自己叫做“厂主联合会”，通过一个委员会公布了自己的宣言，同曼彻斯特、博尔顿、贝里等等地方的

^① 见本卷第287页。——编者注

“外来人”暗中勾结。其实,老板们的宣言中谈到的“外来人”,只不过是邻近工业区的工人罢了。

不过,我也不认为工人们会达到他们罢工的直接目的。相反,我在前一篇通讯①中曾经指出过,不久的将来,工人们罢工将不是为了提高工资,而是反对降低工资。现在降低工资的事件日益频繁,正在引起同样多的罢工。正像我以前指出的那样,这整个运动的真正结果将是“工人阶级的活动将迅速转入政治领域,而在罢工过程中争得的新的组织——工联,对他们将有重大的意义”。厄内斯特·琼斯以及宪章派⁸⁰的其他领袖重新展开了斗争;星期日在曼彻斯特举行的群众大会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鉴于厂主阶级对我国各行业的工人采取联合行动,抗拒合理的劳动日得到合理的工资的原则,大会认为,只有消灭厂主阶级的垄断,劳动阶级通过人民宪章¹¹⁷的实行在议会下院争得代表名额,工人现在的斗争才能以胜利告终。只有那时,他们才能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废除有害的法律,掌握劳动资料,获得高额的工资、廉价的食物、稳定的工作,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②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1月
4日

载于1853年11月18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3928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385—387页。——编者注

② 1853年11月5日《人民报》第79期。——编者注

弗·恩格斯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²⁹¹

多瑙河上业已开始军事行动,这一点现在已经不再有丝毫疑问了。奥美尔帕沙在维丁附近渡过了多瑙河,占领了卡拉法特(对岸的一个村镇),并向克拉约瓦派出了前卫;在另一个地方,土军正在从鲁斯楚克向对岸的久尔杰沃城进攻。据说,土军还在布勒伊拉和图尔努方向发起第三和第四次进攻。同时,在奥尔泰尼察附近也发生了战斗,不过俄军是进攻的一方。根据我们所收到的报道之一来看,这次战斗持续了3小时,结果俄军被击退;但是本月8日晚上收到的维也纳的另一个报道又说,战斗持续了28小时之久,还是不分胜负。看来,前一个报道比较确实。

关于其他战斗中的结果,也是传说纷纭。从各个报道来看,久尔杰沃的战斗是没有结果的。布勒伊拉和图尔努附近的战斗的结果,我们毫无所知。至于从卡拉法特发动的进攻,有的电讯说,土军取得了某些成功,并迫使俄军退却了;有的电讯却说,土军在进攻之初即受阻,并被击退到卡拉法特。前一种说法比较可靠。

总的说来,只有一点是可靠的:根据下面我们分析的原因,奥美尔帕沙放弃了原来我们认为土耳其在这一边境上理当采取的战法即

采取守势^①。而他采取了进攻行动,并且利用俄军自小瓦拉几亚撤退的时机,于10月28日在自己防线最左翼的维丁附近渡过了多瑙河,但是兵力有多少,我们完全不能断定。然而,在此以后,据我们所知,土军在其他地点只进行佯攻或局部攻击,同时,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以少量兵力渡过多瑙河这样的大河又极不明智,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奥美尔帕沙率领的部队按理当然是作战部队的大部分。除非有绝对可靠的情报,否则我们无法相信:他像某些报道所说的,只带7000人冒险渡过了多瑙河,除远在150英里以外的索非亚有8000人外,再也没有援军和预备队。但是,由于不久前土军主力还集结在瓦尔纳、舒姆拉和鲁斯楚克,所以我们也很难说明,奥美尔帕沙是用什么方法把军队的基本兵力这样突然地集结到远离上述三地平均250英里的维丁地区的。

这个问题最可能的答案是:奥美尔帕沙考虑到俄军向维丁方向推进,因而把自己军队的防线位置略向左移。他责成鲁斯楚克、锡利斯特里亚、瓦尔纳和舒姆拉等地的守军防守直通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后,就选择鲁斯楚克作为右翼的据点,选择维丁作为支援左翼的据点,以尼科波尔为中路军队的集结地点。这道从鲁斯楚克到维丁的防线长约200英里。他在这道防线的左翼集结了所能集结的全部军队,并率领他们渡过了多瑙河,这样显然是迂回俄国的右翼。他企图袭击俄军的先头部队,并把他们击退到希尔河对岸;要从这里通过,他可以正面强渡,也可以派遣另一支部队迂回希尔河,在拉索瓦附近渡过多瑙河。至于横断维丁到布加勒斯特通路的多瑙河第二支流奥吕塔河,土军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渡过,即以中路军队的另一部分在

^① 见本卷第389—390页和第498—500页。——编者注

奥吕塔河与多瑙河交汇处下方的尼科波尔和图尔努附近渡过多瑙河。最后,沿多瑙河而下,在久尔杰沃和布勒伊拉附近进行佯攻,迷惑俄军,使它对土军真正进攻的地点作出错误的判断。

如果暂时撇开政治原因不谈,几乎可以不必怀疑奥美尔帕沙的计划就是这样。伦敦《泰晤士报》^①报道说,土军在久尔杰沃附近已经实行了强渡,这显然是一个假消息。在已集中兵力的强敌面前,分兵两路在相距 250 英里的两个地点强渡欧洲最大的河流,而且是在最宽最难渡的地方强渡,这样的错误是任何一支稍经训练的军队中的少尉也不会犯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奥美尔帕沙所采取的行动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企图从翼侧迂回敌人,并从翼侧和正面同时攻击,席卷敌人的整个战线。如果能以主力突然攻击敌人翼侧,如果不受到敌人正面攻击的威胁,如果在失利的情况下能够退却,如果在整个正面的所有阵地上击溃敌人后能够切断这些阵地与作战基地的交通线,那么,这样的机动是完全正确的。目前,这些都是不能实现的。相反,奥美尔帕沙一旦退却,在瓦拉几亚的右翼军队就有被敌人迂回的危险,他同卡拉法特的联系也就有可能被切断(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向奥地利退却);而土军自卡拉法特向布加勒斯特的进攻,却无论如何威胁不到俄国退却的道路。读者可能还记得,不久前我们曾据此断言:对土军说来,唯一适当的进攻方向,是沿着比萨拉比亚和奥地利边界之间的狭窄地带从多瑙河到塞雷特河的这一方向^②。土军本应采取一种使俄军的交通线马上受到威胁甚至被切断的行动,但是他们却在

① 1853 年 11 月 7 日《泰晤士报》第 21580 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389—390 页。——编者注

战线的另一端发动了进攻,在这里他们即使获胜,也不能指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土军不致遭到正面攻击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主要的战斗行动是在维丁和克拉约瓦或斯拉蒂纳之间进行的,而俄军也因此未必会在多瑙河下游渡河,——除非他们的战略比我们想象的更要大胆。但是,与此同时,在维丁到鲁斯楚克正面的地段上,土军的行动也因有一条大河与敌相隔而受到限制,所以在这个地区战斗势必是不活跃的。

在目前情况下,土军这次行动的主要条件无论如何是不具备的。

耶拿会战²⁹²可以作为这种机动的卓越的历史范例。拿破仑以其主力突然猛扑普军左翼,8小时后就完全席卷了普军的队伍,切断了它退却的道路,并消灭了它,从此这支普军就不复存在了。但是这次会战是在20平方英里的地区内进行的,会战持续的时间为20小时。而现在作战的地区却长达200英里,宽达50英里,又没有道路,所以军队每次运动就相应地需要更多的时间。拿破仑在耶拿会战中之所以大获全胜,是由于出敌不意、兵力强大和行动迅速,现在土军在进攻中采用同样的战法,即使经过一些努力,也势必深深地陷入泥潭之中。所有这些情况看看地图就更清楚了。土军必须从卡拉法特前往克拉约瓦。在这里阻碍土军前进的是从特兰西瓦尼亚的阿尔卑斯山流向多瑙河的数条河流中的第一条河流,这些河流由北而南穿过瓦拉几亚,形成好几道进攻军队必须强行通过的防线。在这方面地形很像伦巴第,这里所说的希尔河和奥吕塔河也与明乔河和阿迪杰河相似。明乔河和阿迪杰河的军事意义一向是引人注目的。

假定土军强渡希尔河(他们可能已经这样做),那么他们在斯拉蒂纳附近的奥吕塔河上将遇到首次严重的抵抗。奥吕塔河又宽又深,是一个严重得多的障碍;此外,俄军只要稍微运动,就可以在那里

集中一支军队,不仅能够击退土军的一切攻击,而且能够立即扩大战果。实际上,俄军在克拉约瓦取得胜利——只要不是很大的胜利——并不会有很大意义,因为土军强行军三天就可以到达卡拉法特和多瑙河,从而摆脱追击。如果土军在斯拉蒂纳失败,则不仅是比较惨重的失败(因为俄军调集到那里的兵力较多),而且在失败后还会遭到俄军五六天的追击。谁都知道,战果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追击时获得的,追击能使战败的军队全军覆没。因此,只要哥尔查科夫愿意在奥吕塔河上进行抵抗,奥美尔帕沙恐怕什么时候也渡不过这条河,因为甚至在对土军最有利的时机,奥美尔帕沙也无法向河岸调集 25 000 人以上的兵力,而哥尔查科夫毫不费力就可在那里及时集中 35 000 人。至于土军自多瑙河南岸进行翼侧攻击,如果没有大量的舟桥和其他器材(在土军中这些器材很少见到)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使土军强渡了奥吕塔河,甚至渡过了阿尔杰什河(更东面的一条大河),谁又能设想,奥美尔帕沙能够夺取俄军在布加勒斯特的防御工事,并在激战中击溃兵力无疑将比土军约大三分之一的俄军呢?

因此,在这次战争中,俄军只要稍能遵循军事原则,奥美尔帕沙就输定了。然而,如果战争不是按照军事原则进行,而是按照外交原则进行,结局就可能两样。

俄军在向卡拉法特派出足以威胁塞尔维亚的大量部队之后,又主动撤离了这一军事重地;奥美尔帕沙没有阻碍地渡过了多瑙河;他的部队在小瓦拉几亚(奥吕塔河以西地区)比较自由而且非常缓慢地运动;土军在其他各地的攻击,就我们所能判断的,都无关紧要;最后,从维丁进攻在战略上是个失误,大家确认奥美尔帕沙不会看不到这一点,——所有这些事实似乎给某些权威人士所作的结论提供了某种根据,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的结论是想象出来的。他们的结论

是：敌对双方的将领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根据这种默契，俄国应该把小瓦拉几亚让给土军。支持这种说法的人说，奥吕塔河是一道非常合适的天然屏障，双方军队在整个漫长的冬季可以隔河相望，而在此期间，外交家们就会再度忙于寻求解决的办法。俄国人采取这种让步，据他们说，不仅可以显示一下他们宽宏大量和爱好和平，而且还可以为占领所掠夺的地区获得某种权利，因为俄国和土耳其共同占领多瑙河两公国是完全符合各项现行条约的。俄国人如果在欧洲作出这种宽宏大量的样子，就可以摆脱在亚洲的真正危险，——他们现在在亚洲的处境看来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坏，而更主要的是，这样他们就有足够力量随时把土耳其人从多瑙河北岸地带赶走，夺回这块让给了土耳其人的地盘。得到宫廷信任的维也纳各报公开阐述这种论调，这一事实可以看作这种论调的论据，这个论据很能引人注目，但决不能说明全部问题。过不几天就可以看出，是这种论调正确，还是终将爆发一场真正的战争。如果情况证明不是后者，我们将会感到意外。

现在已开始明显地看出，双方在亚洲的兵力比原来推断的少得多。据《君士坦丁堡报》报道，10月9日，土军在埃尔祖鲁姆有1万人的预备队；在巴统有4000人的正规部队和2万人的非正规部队，看来这是用来组成作战军队的；在靠近波斯边境的巴亚泽特有3000人；在卡尔斯和阿尔达汉——两个靠近俄国边境的仅次于巴统的重要据点——有总数约16000人的前卫部队。这些部队几天之内应得到叙利亚10000—12000生力军的补充。这些数字比原来我们根据别的报道推算的要小得多：总共不是10万人，而是65000人！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相信通过君士坦丁堡得到的报道，那么，把梯弗里斯、格鲁吉亚同俄国连结起来的高加索山脉的主要山口，现在已被山民

所控制；俄军在沙米尔的猛攻下退却了，现距梯弗里斯近不过 9 英里，而驻格鲁吉亚的俄军司令官沃龙佐夫将军宣称，一旦与土耳其交战，如果得不到 5 万人的援军，他是不能守住这个地区的。这些报道是否可靠，我们无法判断，但是俄军从海上向杰尔库姆-卡列、列杜特-卡列和南高加索黑海沿岸的其他地点的仓促增援表明，俄军在这里的处境并不很妙。关于这些援军的数量传说不一。开始有人说，俄军已经派出了 24 000 人，但是他们哪里有船运这样多的军队呢？现在已经弄清楚，俄军派去的是第十三师——吕德尔斯将军第五军的第一师；该师共有 14 000 人，这是非常可能的。另外又有人说，似乎有 24 000 名（这大概是俄国人爱用的数字）黑海哥萨克从陆路绕过了高加索西部边境，在这个又陡又狭窄的海岸地带没有遇到抵抗就顺利地到达了列杜特-卡列。对于这种说法，我们越想越觉得不真实。黑海哥萨克防守库班河到捷列克河一线已够繁忙，而要派出这样多的骑兵，既无任何支援，也不遭到任何袭击，就在敌对的居民区内通过了长达 150 英里的隘路（在这里，很少的人就可以阻止他们前进，或者将他们的纵队截成两段），——这样的事只有在俄国才可以听到，在俄国，直到今天还有人硬说马塞纳在苏黎世会战中曾被苏沃洛夫击败²⁹³。

由此可见，这就是土军行动最有利的地区。假使土耳其能集中正规部队的兵力向通往梯弗里斯的一条交通干线进行猛烈迅速的攻击（如果能在海上站住脚，可沿海岸进攻，如果不能，可在卡尔斯或阿尔达汉的内陆地区进攻），同时非正规部队按照自己特有的战法采取顽强、坚决、突然的行动，那就可能很快使沃龙佐夫陷入绝境，就可能与沙米尔建立联系，并使整个高加索普遍起义。但是在这里，比在多瑙河更需要大胆、迅速和协调一致的行动。这个地区的土军司令官

是否具备这些素质,尚有待将来证明。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53 年
11 月 7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11 月 2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3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弗·恩格斯

俄军的失败²⁹⁴

为了尽可能搜集有关俄军和土军在瓦拉几亚的战事的消息，我们仔细研究了由加拿大号轮船带来的各种欧洲报纸。现在可以对上星期五我们评论过的由华盛顿号轮船带来的消息^①补充若干重要事实。我们只知道战斗已经进行几次，但是战斗的详情，我们现在知道得很少。我们掌握的材料仍然是支离破碎、互有出入、极不充分的。在没有得到土耳其将领的官方报告以前，这种情况可能继续存在。然而我们至少已经知道，土军的作战指挥相当巧妙，在战斗中士气一直旺盛，没有辜负热烈推崇他们的人的赞扬——很多冷静而客观的人曾经认为这种赞扬是夸大其辞的。所以，对此大家普遍感到惊奇。人们对奥美尔帕沙这位统帅的才能都相信会得到有力的证实，但是，对于他的军队的长处，西方的新闻界人士和政治家们却估计不足。他的军队固然都是土耳其人，但是这些人已经完全不是1829年为吉比奇击溃的那些兵士了。土军尽管处于劣势，条件不利，还是打败了俄军。我们深信，这可能只是俄军遭到更有决定性的失败的预兆和开端。

现在我们第一次听说，君士坦丁堡的军事会议曾经在索非亚集

① 见本卷第526—533页。——编者注

中了约 25 000 人的部队,以备必要时在塞尔维亚作战。说来也怪,关于这支部队及其目的的任何消息以前似乎都没有传到西欧,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奥美尔帕沙正在十分妥善地使用着他们。在索非亚集中这些部队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塞尔维亚人不发动起义(在现在的大公^①执政时期,他们看来不会起义),不倒向俄国,那就没有任何理由把军队留在这个地区;如果塞尔维亚人起义,土军要么开进这个国家镇压起义,为此,在瓦拉几亚驻有俄军的情况下,25 000 人将不够用;要么占领边境出口,不让塞尔维亚人出国门一步,为此,有上述四分之一的兵力即绰绰有余。在这个问题上,奥美尔帕沙所持的显然正是这种观点,因为他把这支部队直接调到了维丁地区,增援那里原有的部队。这些援军对奥美尔帕沙不久前战胜丹年贝尔格将军指挥的俄军右翼无疑作出了重大贡献。关于这次胜利,除了被击毙和被俘的俄军军官数目而外,详情我们一无所知。但是,这次胜利想来一定是很全面的,它在精神上给土军带来的好处,甚至将比在物质上带来的好处还要大。

现在我们还知道,在图尔图凯(位于鲁斯楚克和锡利斯特里亚之间)渡河并占领了奥尔泰尼察的这支土耳其部队,是由伊斯迈尔帕沙或盖昂将军(他虽在苏丹军队中担任要职,但并未脱离基督教)指挥的。由于在匈牙利战争中勇敢善战,博得了大胆、坚决和机智的指挥官的声誉。像他这次以白刃格斗击退了进攻的敌人,成功地执行命令,要是没有卓越的战略才能,很少人能够做到。巴甫洛夫将军在奥尔泰尼察的失败²⁹⁵,会大大有利于土军进入奥吕塔河东岸地区,并且为土军开辟向布加勒斯特推进的道路,因为有消息说,哥尔查科夫

① 亚历山大一世·卡拉乔治维奇。——编者注

公爵并没有像报道的那样向斯拉蒂纳进军,他很明智地不愿分散兵力,因此现在仍然呆在多瑙河两公国的首都。这一情况也说明,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处境十分保险。无疑不久便在该地附近发生了决战。如果哥尔查科夫不是光说大话的人,如果他能在这里集中七八万人(从官方宣布的俄军数字中作了有理由的各种扣除之后,他仍然拥有这么多兵力),那么优势无疑在他这方面。但是,考虑到俄军报告中的数字材料往往有些虚假和夸大,考虑到奥美尔帕沙的军队比原来想象的要强得多和善战得多,应该承认,双方的作战条件比原来想象的就更加相近了,哥尔查科夫也就完全有失败的可能。当然,如果土军总司令能集中受到胜利的鼓舞的五六万人来进行决战(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会妨碍他这样做),那么他成功的机会无疑很大。我们在评论中肯定这一点时力求慎重,因为虽然我们同情土耳其人,但是也没有理由把土耳其的处境说得比实际情况更好。

在研究瓦拉几亚的地理形势,特别是从军事观点进行研究时,不能不回想起伦巴第。瓦拉几亚的多瑙河和伦巴第的波河及其支流,各自形成南面和西面的边界。土军采取的作战计划也颇似 1849 年在诺瓦拉会战²⁹⁶中遭到毁灭的皮埃蒙特军队采取的计划。如果土军取得胜利,他们就更有理由博得我们的称赞,而俄国人的完全无能也就更加明显。无论如何,哥尔查科夫并不是拉德茨基,而奥美尔帕沙也不是拉莫里诺。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53 年
11 月 10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11 月 2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3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工人问题²⁹⁴

1853年11月11日星期五于伦敦

神气严肃而思想深邃的《经济学家》，在《黄金机会与这些机会是怎样被利用的》这个标题下发挥了它的最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论之一。“黄金机会”自然是自由贸易造成的，而“利用”这个机会，或者确切些说，“滥用”这个机会，说的当然是工人阶级了。

“工人阶级破天荒第一次把自己未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联合王国的人口确实开始减少，人口外流超过了人口的自然增长。而工人们是怎样利用他们的机会呢？他们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所做的和他们往常在每一次生活状况得到暂时改善时所做的完全一样：他们纷纷结婚并尽可能快地生儿育女。如果保持这样的人口增长率，人口外流很快就会完全被抵销，黄金机会就会错过。”^①

黄金机会要求不结婚和生儿育女——除非遵照马尔萨斯和他的门徒们所允许的正规增长率！这就是黄金道德！但是，直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自己也承认，人口还是在减少，人口外流并没有被

① 1853年11月5日《经济学家》第532期。——编者注

抵销。可见，现在种种不幸的原因不是人口过剩。

“其次，劳动阶级应该利用为它们提供的难得机遇多事积蓄，成为资本家。可是，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上升到或者开始上升到资本家的行列。他们错过了提供给他们机会。”^①

成为资本家的机会！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又向工人们指出，尽管他们最终争取到使他们原先的工资增加10%，每星期他们也只不过得到16先令6便士以代替15先令罢了。这里它把每星期的平均工资算作15先令，已经偏高很多了。然而问题还不在这里。就算每星期拿15先令，那怎么就能成为资本家呢？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据说，工人们想法不正确，认为要改善自己的处境就应当设法增加自己的收入。《经济学家》写道，“他们罢工了，想用这种办法争到比从事任何工作都要多的收入”。他们每星期挣15先令时，有成为资本家的现实机会，而挣16先令6便士时，这种机会倒会消失！一方面，工人们应当力求使干活的人少而资本很多，以便有可能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但是，如果资本很多而干活的人少，那么工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该利用这种机会，为了这一点而不结婚，不生儿育女！“他们过起更奢侈的生活来了。”在实行谷物法²³⁵的时期，这同一个《经济学家》杂志告诉我们，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差不多快要饿死了。所以，如果他们想要活下去，他们怎么敢过比那时更不“奢侈”的生活呢？《经济学家》过去常常登载有关进口的资料统计表，以证明人民的福利不断增长和经济状况日趋繁荣。当时称之为自由贸易带来的空前福利的标志，现在却斥之为工人阶级不合理的浪费的表现。可是，我们还是无法理解：如果人口减少和消费缩减，进口怎么能够不

① 1853年11月5日《经济学家》第532期。——编者注

断增长；进口减少，出口怎么能够继续增加；进口和出口都缩减，工业和商业又怎么能够扩大？

“第三，工人们应该利用这个黄金机会使他们自己及其子女都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从而使自己变得与他们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相称，并且学会从这种改善中取得最大的好处。不幸，我们不得不说，入学的情况空前糟糕，交学费的情况也非常糟糕。”^①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随着商业繁荣而来的是工厂的扩大，机器应用的增加，成年工人日益为妇女和儿童所代替，以及工作日的延长。在工厂里做工的母亲和儿童越多，入学人数就越少。而且，你们到底要给父母及其子女提供受哪一种教育的机会呢？《经济学家》说，提供要他们学会把人口保持在马尔萨斯所规定的水平上的机会。科布顿先生说，教育就是要向工人们讲明，又挤又脏、通风不良的住所不是保护健康和精力的最好手段。同样，只要你告诉人们，自然规律要求人体经常依靠食物来维持，你也就能够使人不致饿死。《每日新闻》宣称，教育能使我们的工人阶级学会怎样从干骨头中提取营养物质，怎样用淀粉烤制点心，怎样用剩菜熬汤。

总之，归纳起来，被工人阶级错过的黄金机会，就是不结婚，就是过更不奢侈的生活，就是不要求提高工资，就是在每星期挣 15 先令的情况下成为资本家，就是学会怎样以更加粗糙的食物维持身体，怎样以马尔萨斯的邪恶理论作践心灵。

上星期五，厄内斯特·琼斯访问了普雷斯顿城，向遭到同盟歇业的工厂工人发表有关工人问题的讲话。在预定的时间到场参加露天大会的不下 15 000 人（《普雷斯顿舵手》估计的数字是 12 000 人），

^① 1853 年 11 月 5 日《经济学家》第 532 期。——编者注

琼斯先生到达会场时,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我从他的演说中摘引几段如下:

“为什么过去进行这种斗争?为什么现在仍在进行这种斗争?为什么将来还要重新进行这种斗争呢?因为你们的生命之源被资本一手堵死了,资本把它的金杯吸干,给你们剩下的只是渣滓。为什么工厂向你们宣布了同盟歇业就等于威胁你们的生命呢?因为再没有别的工厂可以让你们去做工了,你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挣钱糊口了。是什么东西给资本家这样大的力量呢?是因为他掌握了雇用劳动的一切手段……可见,劳动手段是人民的未来赖以建立的关键……只有包括一切行业在内的群众运动,只有各劳动阶级的全国性运动,才能获得最后胜利……如果你们把自己的斗争行业化,地方化,你们就可能遭到失败;如果你们把全国纳入斗争,你们就一定能取得胜利。”^①

接着,乔治·考威尔先生以十分赞许的措辞提出了一项受到约翰·马修先生支持的动议,建议对厄内斯特·琼斯来访普雷斯顿以及他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工厂主们花了很大力气阻挠厄内斯特·琼斯访问普雷斯顿;大会找不到开会的厅堂,因此不得不在曼彻斯特登广告,通知群众大会在露天举行。一些为私利所驱使的人拚命散布谣言说琼斯先生反对罢工,并在工人中间制造分裂,还邮寄恐吓信,说琼斯访问普雷斯顿可能不利于他的人身安全。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1月
11日

载于1853年11月28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3936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① 1853年11月12日《人民报》第80期。——编者注

卡·马克思

繁荣。——工人问题²⁹⁷

1853年11月15日星期二于伦敦

《经济学家》以《商业报告和金融市场》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力求证明存在着普遍繁荣和商业发展的有利前景，虽然同一期还报道，

“食品价格昂贵，而且仍在上涨”，“小麦每夸特的价格快达到80先令”，“棉花贸易的情况丝毫不能激起工厂主们复工的念头。”^①

谈到进口资料统计表，《经济学家》写道：

“在这一大串数字中有许多有教益的东西，有许多能证实作为激烈政治斗争对象的伟大原则的东西，有许多能解释不久前金融市场发生的事件并阐明未来前景的东西；有许多对政治家、金融家、银行家和商人极有教益的东西，他们从这些数字中将有可能准确地认清目前形势并正确地判断自己的未来。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好帮助就是让大家注意这些报告列举出来的某些基本事实和探讨它们同当前其他最重要的特点的联系。”^①

让我们坐到这位先知跟前来洗耳恭听他那啰里啰嗦的预言吧。这次引用进口资料统计表要证明的不是工人阶级的浪费行为，而是

^① 1853年11月12日《经济学家》第533期。——编者注

这个阶级由于自由贸易而得到的空前福利。统计表如下：

表 一
1月5日—10月10日的消费量

	1852年	1853年
可可	2 668 822 磅	3 162 233 磅
咖啡	25 123 946 磅	28 607 613 磅
茶叶	42 746 193 磅	45 496 957 磅
糖	5 358 967 英担	5 683 228 英担
烟草	21 312 459 磅	22 296 398 磅
酒	4 986 242 加仑	5 569 560 加仑 ^①

从这个统计表一眼就可以看出《经济学家》的谬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上列商品的全部情况是，它们并没有像统计表所说的已被消费掉，它们只是已经上市以供消费，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大概不会有这样无知的店主，连运进他店里的商品量与已经真正卖给居民并被居民消费掉的商品量之间的差别都不了解吧。

《经济学家》写道：“这份清单可以说包括了工人阶级消费的主要奢侈品。”^①

接着《经济学家》就把它算在工人阶级的账上。其实，像咖啡这种东西，在英国工人中的消费量是很小的，而酒他们根本就不消费。也许《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工人阶级的厂主们1853年比1852年消费了更多的酒和咖啡，工人阶级的状况就得到改善了吧？至于茶叶，大家都知道，由于中国革命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混乱，出现了投机性

^① 1853年11月12日《经济学家》第533期。——编者注

的需求。这种需求的产生,是出于对未来的担心,而不是基于现在的需要。至于糖,截至1852年10月与截至1853年10月的消费量之间的差额总共不过是324 261英担;这里我不打算和《经济学家》较量知识的渊博,这家杂志当然晓得,这324 261英担中没有1英担是店主们的存货或被用于上层阶级的糖果点心,这些糖一定全部都叫工人沏茶了。既然面包贵,工人们当然让他们的孩子多吃了一些糖,——玛丽-安东尼达在1788年饥荒时期就曾建议法国人民吃杏仁点心哩。至于烟草的进口增加,那么,随着工人失业和他们的正常生活遭到破坏,他们对烟草的需求量确实是在不断增长。

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决定1853年10月进口的商品量的,并不是这个月的实际需求量,而是根据国内市场上完全不同的情况估算出来的需求量。关于第一个统计表及其“同当前其他最重要的特点的联系”,情况就是这样。

表 二

1月5日—10月10日输入

	1852年	1853年
熏猪肉	62 506 英担	173 729 英担
腌牛肉	101 531 英担	160 371 英担
腌猪肉	77 788 英担	130 142 英担
火腿	6 766 英担	14 123 英担
猪油	14 511 英担	102 612 英担
共计	263 102 英担	580 977 英担
大米	633 814 英担	1 027 910 英担
马铃薯	238 739 英担	820 524 英担

谷物和面粉	5 583 082 夸特	8 179 956 夸特
干 酪	218 846 英担	294 053 英担
黄 油	205 229 英担	296 342 英担
蛋 类	89 433 728 个	103 074 129 个①

无疑只有《经济学家》才能够作出这样一个伟大的发现，即在歉收和必不可免的饥荒年份食品输入比常年有相对的增长，与其说是证明这些产品特别减产，倒不如说是证明消费量突然增加。一种物品的突然涨价，无疑会鼓励该物品的进口。但是，难道谁曾断言过，某种物品价格越高，就越能找到热心的消费者吗？现在我们看看第三类进口商品——工业品原料：

表 三
1 月 5 日—10 月 10 日输入

	1852 年	1853 年
亚麻	971 738 英担	1 245 384 英担
大麻	798 057 英担	788 911 英担
生丝	3 797 757 磅	4 355 865 磅
拈丝	267 884 磅	577 884 磅
棉花	6 486 873 英担	7 091 999 英担
羊毛	63 390 956 磅	83 863 475 磅①

既然 1853 年的生产大大超过了 1852 年的生产，所以需要输入

① 1853 年 11 月 12 日《经济学家》第 533 期。——编者注

和加工的原料也就更多。可是,《经济学家》没有断言,1853年生产的剩余的工业产品都供国内消费了。它把这些剩余产品归之于出口:

“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的出口有巨大增长。就截至10月10日为止的这一个月来说,出口价值增长额就不下1 446 708英镑,总的增长额则达12 596 291英镑;今年的出口总值是66 987 729英镑,而1852年同期的总值是54 391 438英镑……单以不列颠生产的商品出口计算,我们这一年的增长不少于23%。”①

但是,这些价值12 596 291英镑的增多的出口商品究竟是怎样的情况呢?“这些出口商品中相当大一部分尚在运往其最后市场的途中”,而这些商品到达那里,正好使这些市场彻底混乱。“这些增多的出口商品的相当大一部分正在运往澳大利亚”。那里本来就已商品充斥了;“运往合众国”,那里现在就已商品过剩了;“运往印度”,那里正处于萧条状态;“运往南美洲”,那里根本就吞不下在别的市场上找不到销路的过多的进口商品。

“大量增多的输入并消费掉的商品,英国已经付过了款,或者在最近的将来就要按为购买这些商品而开出的到期期票付款……但究竟什么时候把出口商品的钱付给我们呢?过6个月,过9个月,过12个月,某些商品要过一年半或两年。”①

《经济学家》声称,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多么荒谬!

如果你们把这一大堆剩余工业品投入已经为你们的出口商品所充斥的市场,那么你们所期待的时刻就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你们统计表上列举的一大串假想财富的清单,可能成为一大串实际损失的

① 1853年11月12日《经济学家》第533期。——编者注

清单,成为世界范围的破产的清单。统计表三和那些夸耀的出口数字究竟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我们每个人早就了解的情况,即大不列颠的工业产值在1853年大大增长,它的增长超过了常规,其扩大的势头正是在市场不断紧缩的情况下日益加快。

当然,《经济学家》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

它对我们说:“金融市场的困难和利率的提高,只不过是大宗进口商品要马上付款,而大量剩余出口商品除销所产生的暂时性的后果。”^①

在《经济学家》看来,金融市场紧张只不过是出口增多的结果。可是我们也可以同样有权利说,最近这几个月来出口的增加只不过是金融市场困难的必然结果。这些困难发生的同时,还出现黄金流入和外汇行情不利的情况;但是,难道不利的外汇行情不是在鼓励取得国外期票吗,换句话说,不是在鼓励出口吗?正是由于这个规律,英国在它的金融市场发生困难的时期使世界所有别的市场陷于混乱,并且周期性地破坏别国的工业,用低价出售的英国工业品去袭击别的国家。

《经济学家》现在已经找到了工人们根本不对、根本应该受到指责和根本愚蠢的“两点”。

“第一,他们投身于争论的起因在大多数场合只不过是出于可怜的几文钱。”^①

为什么会这样呢?让《经济学家》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争论的性质改变了:争论由关于合同的问题变成了争取政权的斗争。第二,工人们不是自己掌握自己的事情,而是被那些不负责任的、甚至是自封的领

^① 1853年11月12日《经济学家》第533期。——编者注

袖所操纵…… 他们通过蛮不讲理的俱乐部团体统一行动…… 我们并不担心工人阶级本身的政治主张,我们担心和反对的是那些挟持他们并代表他们讲话的人。”

工人们通过建立他们自己的阶级组织来回敬他们的厂主们的阶级组织。而《经济学家》向工人们说,如果他们开除他们的将军和军官们并决定匹马单枪地进行斗争,它就不再“担心”他们了。在法国革命最初几次搏斗时期,北方的联合起来的专制君主的喉舌也曾这样一再地要全世界相信,他们“担心”的不是法国人民本身,而是粗野的救国委员会²⁹⁸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行动、蛮不讲理的俱乐部和讨厌的将军们。

在我的前一篇通讯中,我曾对《经济学家》指出,工人阶级没有利用繁荣时期来受教育并使他们的子女受教育是毫不奇怪的。现在我可以向你们转述下面一份报告,这个报告中提到的人名和细节已经交给我并且很快就将提交议会。报告说,在1852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离……4英里的……城,在一家叫作……的为……先生所有的布匹漂白和最后加工企业中,下面提到的这些人一连干活60个小时,而一共只休息3小时!

姑娘和女孩	年龄
M. S.	22 岁
A. B.	20 岁
M. B.	20 岁
A. H.	18 岁
C. N.	18 岁
B. S.	16 岁
T. T.	16 岁
A. T.	15 岁
M. G.	15 岁

H. O.	15 岁
M. L.	13 岁
B. B.	13 岁
M. O.	13 岁
A. T.	12 岁
C. O.	12 岁
S. B.	10 岁!
Ann B.	9 岁!
男孩	
W. G.	9 岁
J. K.	11 岁 ^①

9 岁和 10 岁的男孩一连干活 60 个小时，而一共只休息 3 小时！
 厂主们还是不要说什么工人轻视教育吧！上面提到的 Ann B.，是一个只有 9 岁的女孩，在 60 个小时的工作中由于疲劳过度倒在地上就睡着了；当她被叫醒的时候，她哭了，但还是被迫继续干活！

看来，工厂的工人们决定要从曼彻斯特骗子手们的手中把争取教育的运动夺过来。据称，在奥卡德公园举行的^②普雷斯顿失业工人群众大会上发生了下面的情况：

“玛格丽特·弗莱彻太太提醒与会者注意：已婚妇女们丢下子女和家务到工厂做工是不适当的。每个工人都有权利为合理的劳动日得到合理的工资，而这一点，她以为，就意味着工人应该得到这样的劳动报酬，这种报酬使他有可能很好地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能让妻子留在家中履行家庭主妇的责任，并能教育子女（欢呼）。发言人在结束她的讲话时提议通过下述决议：

会议决定：城内所有已婚妇女不打算再去上工，直到她们的丈夫得到合理的、充分的劳动报酬为止。

① 1853 年 11 月 5 日《人民报》第 79 期。——编者注

② 1853 年 11 月 7 日举行。——编者注

安·弗莱彻太太(前一个发言人的姐妹)对这一决议表示附议,然后决议被一致通过。

大会主席宣布,在工资增加10%的问题解决以后,关于工厂雇用已婚妇女的问题将展开我国工厂主们未必意料得到的鼓动工作。”^①

现在在各工业区访问的厄内斯特·琼斯正进行争取成立“工人议会”²⁹⁹的鼓动工作。他建议

“各行各业的工人代表到运动的中心,到兰开夏郡,到曼彻斯特去开会,直到取得胜利为止。这样表达的观点将十分有权威和全面,使全世界都听见,并将和在圣斯蒂芬教堂³⁰⁰召开的会议共同占有报纸的篇幅……在现在这样的危机时期,全世界都将比倾听最高傲的议院中尊贵议员的话更加注意地倾听这些最谦逊的工人代表的话”^②。

帕麦斯顿勋爵的机关报却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晨邮报)叫嚷:“说句私下的话,被大吹大擂的进展已受到有效的扼制,并且在4月10日遭到惨败¹⁸²以后,再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尝试来使工人们成为立法者或使裁缝们成为护民官了。”^③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1月
15日

载于1853年11月30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3938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① 1853年11月5日《人民报》第79期。——编者注

② 厄·琼斯《工人议会。告全国各行业工人书》,见1853年11月12日《人民报》第80期。——编者注

③ 1853年11月14日《晨邮报》第24929号。——编者注

弗·恩格斯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³⁰¹

洪堡号轮船带来的战场消息证实了早些时候从欧罗巴号轮船得到的报道：在奥尔泰尼察附近长时间扼守阵地、艰苦奋斗、对抗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的土军，终于在上月 14 日左右退过了多瑙河，占据了自己在图尔图凯附近原先的筑垒阵地。这一事件等报纸和信件到来之后就会明朗化，目前我们还完全不了解这一行动的意图。官方消息说，这次行动没有遇到阻碍，因而，排除了如下的假设：这是由于哥尔查科夫公爵获得了什么决定性胜利的结果，除非我们确实相信该俄军司令官已集结比第一次多一倍的兵力再次攻击这个据点。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事实就可以看出，哥尔查科夫实际上没有 45 000 人的兵力来实现这个目的。还有人说，土军重新退回图尔图凯，是为了避免冬季在奥尔泰尼察受到突然袭击的危险，因为冬季要退过河会遇到很大困难。但是，这种说法与土军一直采取攻势，未遭失败，而且显然占优势的事实有矛盾。此外，土军的左翼不但仍在维丁附近瓦拉几亚的多瑙河岸，而且还不断得到援军，这种情况绝不能证明土军实行总退却。即使考虑到土军可能企图以强大兵力在布勒伊拉或加拉茨渡过多瑙河（这一假设可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仍然不明白，奥美尔帕沙为什么仅仅由于

准备采取坚决的机动以另一支部队来对付俄军左翼，是否需要把自己的军队撤出奥尔泰尼察附近的坚固阵地。不过，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这次战役开始以来的各种事件，这些扑朔迷离的现象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首先大家都知道，土军得以在维丁和图尔图凯两地渡河而未遇到严重抵抗。这毫不足怪，因为战争经验证明：要阻止积极行动的敌人过河，甚至很宽的河，是不可能的；此外，趁敌军部分兵力已经过河时对它攻击，即当敌军只有一条阻塞不畅的退却道路时以优势兵力对它袭击，总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土军在多瑙河北岸巩固下来了，他们在各次小规模战斗中都占上风，他们守住了离布加勒斯特不到 40 英里的奥尔泰尼察达十天之久，而俄军不能把他们逐出这一重要阵地，最后土军毫无阻碍地主动放弃了这一阵地，——所有这些情况表明，对俄土两军在该地区对峙的兵力对比的判断有重大的差误。

土军拥有多少兵力，我们知道得相当准确，而俄军的人数一直是凭猜测。消息说，俄军有两个军渡过了普鲁特河，紧接着又有一个军的部分兵力渡河。如果是这样，俄军在多瑙河两公国的兵力大概不下 15 万人。然而，现在，当事实表明俄军在瓦拉几亚没有这样多军队的时候，我们终于从维也纳得到了有关俄军在瓦拉几亚的实有兵力的可靠报道。俄军的兵力如下：

1. 由丹年贝尔格将军指挥的第四军包括以下 3 个步兵师：

- (1)第十师(由索伊莫诺夫将军指挥) 16 000 人
- (2)第十一师(由巴甫洛夫将军指挥) 16 000 人
- (3)第十二师(由利普兰迪将军指挥) 16 000 人
- (4)1 个步兵营 1 000 人

2. 第五军第十四师由恩格尔哈特将军

指挥的 1 个旅	8 000 人
<hr/>	
步兵共计	57 000 人
3. 由尼罗德将军和菲施巴赫将军	
分别指挥的 2 个轻骑兵师	8 000 人
10 个哥萨克团	6 000 人
<hr/>	
共计	14 000 人
4. 1 个炮兵师(大致按 1 个步兵团有 1 个	
炮兵连, 每连有炮 12 门)共计 170—180 门炮。	

还弄清楚了：吕德尔斯将军指挥的第五军甚至还没有在敖德萨集中，而是一部分在塞瓦斯托波尔，一部分在高加索；奥斯滕-萨肯将军指挥的第三军还在沃伦，至多也只不过刚刚渡过普鲁特河，最早要在三四个星期后才能到达战区；而俄军的预备队骑兵(大部分是重骑兵)还在第聂伯河以东，要五六个星期才能开到需要的地方。这些消息无疑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在六个星期以前得到这些消息，我们会断言，奥美尔帕沙应当渡过多瑙河，在哪儿渡和怎样渡无关紧要，只是越快越好。

可是对俄军的轻率冒险行为，的确不可能找到合理的解释。把约 8 万人的军队带到瓦拉几亚这样的死胡同，并留在那里好几个月，同时，正如俄国人自己承认的，还有 15 000 个病员在医院里，又由于得不到补充，只有靠碰运气，——这样的行动方法是史无前例的，以前谁也没有理由料想到一向谨慎、从不冒险的俄国人会采取这样的行动。要知道，在瓦拉几亚的俄军除了一些分散行动的部队外，能用于作战的部队总共不过 46 000 人，何况许多地点都需要他们呢！

但是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只能解释，这是由于俄国人绝对相信他

们在不列颠政府内的朋友们的外交阴谋会得逞,由于他们毫无根据地轻视自己的敌人,由于他们在距离他们的帝国中心这样远的地区集中重兵和储备大量物资一定有种种困难。

另一方面,土军在小瓦拉几亚的卡拉法特现有 25 000 人,而且还正在继续向那里增援。关于这些部队下一步调动的情况,我们知道得极少。看来,他们甚至还没有推进到克拉约瓦,直到现在,全部行动仍限于占领附近村庄。什么原因,也不清楚。我们只能假设,奥美尔帕沙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军事会议的限制,该会议起初曾把这 25 000 人集中在索非亚。不管那里的情况如何,根据我们在这样远的地方所能作的判断,这些部队在那里是完全无用的,而且在那里就是个错误,因为,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即使打算用他们对付塞尔维亚人(很可能用不上),他们的人数不是太多,就是太少^①。我们认为,把他们调往多瑙河下游会合适得多,因为他们于 10 月 28 日渡河,到 11 月 15 日还很少前进,根本没有任何积极的行动。本来这 15 天的时间可以更好地利用:可以把这些部队向多瑙河下游运动 150 英里到西斯托夫,在那里与土军主力的左翼建立直接联系,再由此经过几日行程到达土军左翼司令部的所在地鲁斯楚克。如果能使这 25 000 人与主力会合,他们的作用要比在卡拉法特大一倍,这是无疑的。事情的进程也证实了这一意见的正确性,因为正如前述,我们不知道这些部队在渡过多瑙河后的 19 天内对奥美尔帕沙作过什么积极的支援。

土军在尼科波尔和鲁斯楚克附近进行的攻击只不过是佯动。看来,这些攻击进行得不坏,只使用了绝对必需的兵力,而且因行动坚

^① 见本卷第 535 页。——编者注

决而容易使敌人迷惑,无法判明进攻者的真正意图。主要的攻击是在奥尔泰尼察进行的。调往该地的兵力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能确定。有消息说,早在11日那天,土军在奥尔泰尼察就有24 000人,而与其对抗的俄军则有35 000人。但是,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如果俄军真比土军多三分之一,他们就会立刻迫使土军退回多瑙河对岸,而事实上11日俄军遭到了失败。

看来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以设想,只有异常拙劣的军事指挥才会妨碍土军把哥尔查科夫逐出瓦拉几亚。但是双方确实都显示了某些极为独特的军事指挥。土军于11月2日在奥尔泰尼察这个显然是主要的渡河地点渡过了多瑙河,并于3日、4日、5日顺利地击退了俄军的攻击,从而确立了在多瑙河北岸的优势。在这三天中,他们的援军应当开到,以便使他们有可能立即向布加勒斯特进军。拿破仑就这样做过,而且拿破仑以后的每个将领都知道,行动的迅速可以弥补兵力的不足,因为这样可以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集中兵力以前进行袭击。正如在商业上说“时间就是金钱”一样,在战争中也可以说“时间就是部队”。但是在瓦拉几亚,这条格言却被忽视了。土军平静地扼守奥尔泰尼察达九天之久(从6日到15日),除小规模战斗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因而俄军有足够的时间来集中兵力,尽可能周密地进行部署,而且设法在退路一旦受到威胁时消除威胁和保障这些退路。不过,也许我们应该这样来推测:奥美尔帕沙只是想把俄军拖在奥尔泰尼察,一直到他的主力在多瑙河下游渡河,并且完全切断俄军的退路。这样做是可能的,尽管采取这样的行动,除在卡拉法特的24 000人和在奥尔泰尼察的24 000人外,还需要在多瑙河下游赫尔绍瓦地区有5万人左右的兵力。但是,如果奥美尔帕沙在那里有这么多军队(这完全可能),这支军队就可以更好地利用时间,

而不把时间消耗在所有这些故作巧妙的机动上。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使七八万人马上在布勒伊拉附近渡过多瑙河,并一举切断俄军在瓦拉几亚的交通线呢?如前所述,很可能现在他正要实现这一运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一运动拖这样久,要采取这样复杂的预备行动?在拥有了已在作战线上作好充分准备的这样的优势兵力以后,迷惑哥尔查科夫公爵的行动就未必有什么意义了。应当马上切断他的退路,把他的军队一举歼灭。

至于土耳其兵士,他们在到目前为止所参加的几次小规模战斗中都表现得很好。炮兵处处表明,沙皇尼古拉把他们列为欧洲劲旅之一并非过誉。一个在军事行动开始前十个星期才组成、并以刚从法国得到的米涅式步枪装备起来的步兵营,在这一短时间内已能十分熟练地执行侦察勤务,并培养出一批善于掌握这种威力很大的武器的第一流射手;他们在奥尔泰尼察得到了显示本领的机会,逐个击毙了俄军的几乎全部高级军官。土耳其步兵看来大体上都很好地掌握了成横队和成纵队运动的一般方法,此外,在奥尔泰尼察的多次攻击中都表现了高度坚定和勇敢的精神;要知道,在奥尔泰尼察的三天战斗中,至少有两天是由土耳其步兵的攻击来决定战斗结局的,而且是以近战来决定的;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在进行白刃战时,俄国步兵是不可轻视的对手。

来自亚洲的消息比来自欧洲的消息对土耳其人来说更加有利。据确悉,切尔克西亚各部族发动了反对俄国人的普遍的联合起义,他们不仅控制了高加索的大门,而且切断了沃龙佐夫公爵后方的交通线,而此时土军则从正面向沃龙佐夫进逼。于是,沙皇从战争一开始就处处失败。我们期望这段历史就这样继续下去直到结束,让战争教会俄国人和他们的政府收敛一下自己的野心和骄横,促使他们从

今以后只管自己的事情。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53 年

11 月 17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12 月 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4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高尚意识的骑士³⁰²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1 月
20 日—28 日之间

1854 年 1 月于纽约以单行本刊
印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Der Ritter

von

edelmüthigen Bewußtsein,

von

Karl Marx.

卡·马克思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

第1版的扉页



小型战争(见德克尔《小型战争论》)的英雄不必是高尚人物,但必须具备高尚意识。按黑格尔的说法,高尚意识不可避免地要转化为卑鄙意识^①。为了说明这个转化,我举一身兼扮隐士彼得和穷汉瓦尔特两个角色的维利希先生的吐露为例。我所谈的只限于“冒险骑士”;至于尾随他的“食客骑士”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为了从刚一开始就使人感觉到高尚意识的特色是用“普通的”谎言表达“高超的”真理,维利希先生对我的《揭露》³⁰³的答复是用下面的话开始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在《新英格兰报》和《刑法报》上刊载了关于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报告。”^②

我从来没有在《刑法报》上刊载关于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报告。大家知道,我在《新英格兰报》上刊载过《揭露》,而维利希先生在《刑法报》上刊载过希尔施的自供^③。

在《揭露》第11页上谈到:“从维利希—沙佩尔派那里偷走的

①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1841年柏林版第377、379—380页。——编者注

② 奥·维利希《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见1853年10月28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3期。——编者注

③ 指威·希尔施《间谍活动的受害者》。——编者注

文件的清单和这些文件的日期可以看出，维利希—沙佩尔派虽然对罗伊特撬桌行窃有所防备，但还是想出高招让文件被偷走，并让文件落到普鲁士警察当局手里。”这一段在第64页也重复过^①。

维利希先生回答说：“马克思先生知道得很清楚，这些文件大部分是伪造的，而部分是虚构的。”^②

大部分是伪造的，就是说，不完全是伪造的。部分是虚构的，就是说，不全部是虚构的。可见，维利希先生承认，在罗伊特行窃之后，正像在此之前一样，属于他的集团的文件，已通过某种途径落入警察之手。我要肯定的正是这一点。

总之，维利希先生之所以高尚，就是因为能在可靠事实后面嗅出虚假意识。“马克思先生知道”。维利希先生从哪里知道马克思先生所知道的事情呢？我知道上述文件中有些是真的。但是，我不知道其中哪一个文件在庭审时被认为是伪造的或是虚构的。不过，我照理应该知道得“更多”，因为，“有一个勃鲁姆”是“安置在维利希身边的马克思的情报员”。因此，勃鲁姆^③是在维利希身边开放的。这样他就离我更远了。我与勃鲁姆从未谈过话，甚至这方面的暗示都没有^④。我只知道勃鲁姆出生在俄国，职业是皮鞋匠；他还以莫里逊的身分出现，大力推销维利希的莫里逊氏丸，现在大概在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83—484、536页。——编者注

② 奥·维利希《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见1853年10月28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3期第329页。——编者注

③ 勃鲁姆(Blum)这个姓的发音与花(Blume)相似。——编者注

④ 德语成语“durch die Blume sprechen”(暗示、用含蓄的言语或示意的举动使人领会)之中也有与勃鲁姆发音相似的“Blume”。——编者注

澳大利亚³⁰⁴。关于维利希—金克尔派特使的活动，我是从马格德堡方面得知的，而不是在伦敦。因此，高尚意识本来可以免除这次毕竟是疼痛的手术，不必仅仅根据怀疑就诽谤自己的一个信徒。

高尚意识先是自欺欺人地硬说我有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情报员；接着又同样自欺欺人地否认我所引用的一封真信。他引证说：“《揭露》第69页注A出自贝克尔的一封信”。³⁰⁵

维利希先生太高尚了，竟然不能设想像贝克尔这种“具有高超精神和性格的人”会认不清像维利希这种人身上的高超精神和性格。因此，他把贝克尔的信变成假信，把我变成伪造者。不言而喻，这是出于高尚。但是，假信总还在律师施奈德第二手中。在审判期间我把它寄给了科隆的辩护人，因为它驳斥了贝克尔参与维利希的蠢举的说法。除了信是贝克尔亲手所写之外，科隆邮局和伦敦邮局的邮戳还能说明发信和收信的日期。

“但是，在此之前金克尔夫人写给我（维利希）一封详细的、说明情况的信；贝克尔在科隆担任了转寄工作。他告诉她信已寄走，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谁隐藏了这封信：马克思先生，贝克尔，还是邮局？”

维利希肯定这与邮局无关。可能是贝克尔？但是当贝克尔处于自由状态时，维利希却不想去问他。因此，就是“马克思先生”了。维利希先生又玩弄他所固有的背后搞鬼的伎俩，把事情说成这样：我公开了贝克尔的、不是写给我的信件，隐藏了他托我转寄的信件。遗憾得很，贝克尔很客气，从来不麻烦我转寄信件，无论是转寄约翰娜太太的信还是转寄约翰·哥特弗里德先生^①的信。去问

① 指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和他的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编者注

贝克尔这种无关紧要的问题，无论是监狱，还是暗检室³⁰⁶都不会来干涉的。维利希先生谎称，他含沙射影地诽谤，是出于纯洁的动机，即鼓励美德，表明善人之间、金克尔派和维利希派之间的同心同德胜过了恶人制造分裂的任何伎俩。

“……在无产阶级内部，在马克思派和维利希—沙佩尔派——这是马克思先生而不是我所给予的名称——之间的关系。”

高尚意识要用别人的倨傲来证明自己的谦虚。所以，他把“科隆起诉书所给予的名称”（见《揭露》第6页^①）变为“马克思先生所给予的名称”。由于同样的谦虚，他把我谈过的（见上述引证之处）某一个秘密的德国团体³⁰⁷内部各派之间的关系变为“无产阶级本身内部各派之间的关系”。

“当1850年秋天泰霍夫来到伦敦时，马克思让德朗克写信给自己，说什么泰霍夫对我作了极端鄙视的评论，这封信宣读了。泰霍夫来后，我们作为男子汉大丈夫，彼此开诚布公地谈了一下；原来信中的传言是臆造的！！”

当泰霍夫来到伦敦时，我让德朗克写信给我，我收到信，宣读了它，然后泰霍夫来到了。“时间顺序”的误错反映了高尚意识的张皇失措，因为他企图在我、德朗克的信和泰霍夫来到之间建立虚假的因果联系。在德朗克的信中——顺便提一下，这信是寄给恩格斯而不是寄给我的——被指控的地方原话是这样的：

“今天我使泰霍夫有点折服，不过这使我和他以及和席利（席利当时在伦敦）发生激烈的争论；后来，泰霍夫不止一次地声明，对济格尔的攻击是维利希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78页。——编者注

个人的花招,此外,他否认维利希有任何军事才能。”①

可见,德朗克所说的不是泰霍夫作了一般的极端鄙视的评论,而是他对维利希先生的军事才能作了鄙视的评论。因此,泰霍夫即使说某某东西是臆造的,这也决不是指德朗克信中的传言,而是高尚意识关于德朗克传言的传言。泰霍夫在伦敦并没有改变他在瑞士所发表的关于维利希先生的军事才能的意见,虽然他可能确实改变了他对这位假苦行僧的其他看法。由此可见,德朗克的信和泰霍夫的到来同我的关系仅限于我宣读了德朗克的信;我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我有权宣读所有信件。例如,宣读过卡尔·布伦的信,他在信中也嘲笑了维利希的军事才能。那时维利希先生已经深信:这封信是我让布伦写的。但布伦与泰霍夫不同,还没有到澳大利亚去,所以,维利希先生就小心翼翼地不提“我的策略的这一范例”。再例如,我曾经不得不宣读罗特哈克尔的信,信中写道:

“我愿意加入其他任何支部,但是我决不愿加入这个支部(即维利希的支部)。”②

他讲到:仅仅是由于反对维利希关于“引人注意的普鲁士的军备”的观点,这就使他遭了灾。维利希的一个帮手要求把他

“立即开除出盟,另一个帮手则主张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这个罗特哈克尔是怎样入盟的,说这事很可疑”②。

① 恩·德朗克 1850 年 7 月底—8 月初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3 部分第 3 卷第 609—610 页。——编者注

② 威·罗特哈克尔 1850 年 7 月—8 月上半月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3 部分第 3 卷第 608 页。——编者注

维利希先生已经深信：这封信是我让罗特哈克尔写的。但由于罗特哈克尔不是在墨尔本淘金，而是在辛辛那提办报，所以维利希先生又认为这另一个“我的策略的范例”也是不宜公之于世的。

高尚意识的本性是一向自我陶醉，并且到处认为自己已得到公认。因此，如果发现有人对他的自我欣赏不表同意，如果泰霍夫否认他的军事才能，罗特哈克尔否认他的政治才能，或贝克尔称他简直是“蠢材”，那么，他就会断定这类反自然的事实是由于阿里曼即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奥尔穆兹德即维利希之间存在着策略矛盾，据此，高尚意识就醉心于最卑鄙的勾当，企图苦思出，引伸出，臆想出这种虚构的策略的秘密。我们看到了，正如黑格尔所说，这种意识根本不在崇高的东西上下工夫，而在最卑鄙的东西，即自己身上下工夫。

维利希先生胜利地高呼：“这就是马克思先生的策略的几个范例。”

“当居于伦敦的、有一定影响的革命活动家送来请帖邀请我们参加会议时，马克思、恩格斯与我之间的第一个矛盾便暴露出来了。我准备接受邀请；我要求：我们应该确保自己的党的地位和组织，但是，关于流亡者中间内部争执的家丑不可外扬。我被投票否决；邀请被拒绝了，于是从这一天起，就开始了伦敦流亡者中间的令人讨厌的争执，其后果至今还存在，尽管在舆论中显然已经失去任何意义。”^①

维利希先生作为一个战时的“游击队员”，认为他在和平时期的使命也是从一个党派转到另一个党派^②。他怀抱着高尚的联合愿望

① 奥·维利希《卡尔·马克思和他的〈揭露〉》，见1853年10月28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3期。——编者注

② “Parteilöser”有“游击队员”之意，也可理解为“奔走于党派之间的人”。——编者注

而被投票否决，这倒完全符合实情。但是这种招认实在十分幼稚，因为维利希先生后来竭力散布流言，说我们已被流亡者从他们的帮会中开除。在这里，他承认我们从我们中间开除了这帮流亡者。这就是事实。而事实还有自己的变容。高尚意识需要证明，是阿里曼妨碍他去完成高尚的事业，妨碍他去预防流亡者遭到的种种不幸。结果他又得造谣，像福音书作者那样去歪曲世俗的编年史（见布鲁诺·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³⁰⁸）。阿里曼——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退出大磨坊街工人协会³⁰⁹，并在1850年9月15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声明与维利希决裂。从这一天起，他们就避免参加任何公开的组织、游行和示威。总之，是从1850年9月15日起始的。1851年7月14日，“各派有名望的活动家”被邀请到菲克勒尔公民那里，1851年7月20日建立“鼓动者协会”，1851年7月27日成立德国“流亡者俱乐部”。³¹⁰正是从这一天起，即从高尚意识的秘密愿望得到满足时起，才开始了“伦敦流亡者”中间的令人讨厌的争执，正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流亡者”和“鼓动者”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大洋两岸展开，这是伟大的老鼠与青蛙之战^①。

谁赐我文字，谁赐我声音，
为描写这场战斗之伟大崇高？
亘古未见比之更自豪的战斗，
充满着狂野的愤怒与喧嚣；
其他战役激烈而残酷，
却不过玫瑰紫罗兰之貌，
我的笔亦变得笨拙，当战斗篇章中

① 指古希腊的一首诙谐叙事诗《老鼠与青蛙之战》，该诗是对荷马《叙事诗》的模仿，作者不详。——编者注

勇敢与荣誉之光共同闪耀。

(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第27首歌)

“这些令人讨厌的争执在舆论中”从来没有“意义”，只是在老鼠与青蛙的私见中才有意义。但是，“其后果至今还存在”。维利希先生之居留美国，就是一个后果。从美国以贷款³¹¹的形式汇到欧洲的钱，又以维利希的形式从欧洲回到了美国。他在那里初建的功勋之一就是在……成立了某秘密委员会，以便为布尔昂的哥特弗里德和隐士彼得^①保护圣杯³¹²，保护民主黄金，不让阿尔诺德·温克尔里德—卢格和梅兰希顿—隆格夺去。

尽管“高尚人物们”已经各得其所，而且用爱德华·梅因的话来说，所有的人，“直到布赫尔在内”，已联合起来，但是，不仅在主力军中，而且在每一个营垒内部，瓦解过程却迅速进行，鼓动者协会不久便成了残缺不全的北斗星，流亡者俱乐部虽有高尚意识的内聚力，也萎缩成维利希、金克尔和客店老板谢特奈尔的三位一体。甚至三位一体对贷款的统辖权——高尚意识具有如此的吸引力——也成了某种甚至不能称之为二元论的东西，即金克尔—维利希。赖辛巴赫先生是个备受尊敬的人，不能继续作为第三者呆在这样一个同盟之内。他在实践中领教了高尚意识的“个人性格”。

高尚意识所引用的“马克思的策略”的几个范例之中，还包括他与恩格斯的一些经历。我在这里引用恩格斯本人的一封信。

“曼彻斯特，1853年11月23日。在奥古斯特·维利希先生为了自我辩护而发表于《纽约刑法报》(10月28日和11月4日)的小说中，我很荣幸地被提到。因此，我不得不就这个与我有关的问题说上

① 指哥·金克尔和奥·维利希。——编者注

几句,以正视听。

朋友维利希把纯粹的懒散与纯粹的积极混为一谈,因而忙来忙去只是为了朋友维利希。他对于有关他个人的一切具有极好的记忆,把别人谈论他的话,甚至是饮酒闲谈时说过的话全都记录在案,——这一事实对凡是有缘和他认识的人来说,早就不是秘密了。但是,朋友维利希一向善于使他的记忆力和他所记录的都得到最充分的运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只要稍有出入或者偶有遗漏,当人们重新提起这类小事的时候,都会使他变成一场戏剧的主人公,变成一群人或一幅生动图画的中心人物。在维利希的小说中,无论是就细节或就整体而言,斗争每时每地都是围绕着白璧无瑕因而遭到迫害的维利希。在每一个单独插曲中,我们在收场时都可看到:威武的维利希发表演说,而他的有罪的敌人则由于感到自己渺小而垂头丧气,痛不欲生。不过,大家对你们还是一清二楚的,无畏又无瑕的骑士们!

因此,在维利希的小说中,高尚人物忍受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不信上帝的人施加的诸多屈辱而受难的时期,同时也是凯旋时期,因为每一次他都胜利地踩下了自己的敌人,而且每一次新的凯旋都胜过一切以往的凯旋。朋友维利希一方面把自己描绘为受难的基督,舍身承担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伴的罪孽,另一方面又把自己描绘为到此审判活人和死人的基督。唯独朋友维利希能够同时一人充当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谁能同时演出这两个方面,谁当然就该被人信仰。

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只好用这些自我陶醉的幻想充塞他的不眠之夜,对此我们早就熟知了;我们感到奇怪的只是,这些特异反应今天仍然通过 1850 年那样的形式流露出来,没有变化。但是,还是

让我们来谈谈细节吧。

朋友维利希除了把施梯伯先生及其一伙变为从很久以前迫害蛊惑者³¹³时代起就已不存在的某个德国‘中央联邦警察局’的爪牙,并且叙述了一大堆同样神奇的‘事实’之外,还以他惯有的准确性硬说我写了论述1849年巴登运动的‘小册子’。朋友维利希曾以罕见的认真态度研究过我的著作的一部分,即其中谈到他的那一部分,因此,他知道得很清楚,我从未出版过这种‘小册子’。实际上,我只是在《新莱茵报·评论》(1850年汉堡和纽约版)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论述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谈到我在普法尔茨—巴登运动时期的个人经历^①。在这篇文章中当然也提到朋友维利希,并且如他所说的,对他‘非常赞许’,但是,这马上使他与他通常所固有的谦虚发生了冲突,因为这篇文章似乎把他变成了‘为数如此之多的其他伟大的国务活动家、独裁者和统帅的竞争者’。

从我这方面说,现在使维利希的高尚心灵乐不可支的这种高度的‘赞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我的‘赞许’是:维利希先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个很合适的营长,因为他曾任普鲁士尉官20年,掌握了这方面必要的知识,他不是没有能力领导小型的战争,特别是游击战争,最后,他还有一个长处,即担任一个600—700人的志愿队队长完全能够胜任,而在那场战役中,大多数的高级军官都是一些没有任何一般的军事素养的人,即使有一些军事素养,也与他们所居的职位完全不相称。说维利希先生比大学生、军士、学校教师或皮鞋匠能够更好地去指挥700人,这对于一个在这方面有20年素养的普鲁士尉官来说,当然是‘非常赞许’的评价!盲人国里,独眼称王。他处于

^① 见《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4章《为共和国捐躯》。——编者注

从属的地位，和担任师长或总司令之职的他的‘竞争者’相比，负责较少，自然可以少犯错误。谁知道，当‘总司令’并不胜任的济格尔，当个普通营长就不能有点成绩？

而谦虚的维利希——看来是由于我的过失，某些美国报纸因他服役多年而称之为‘将军’——伤心地埋怨，似乎是我的‘赞许’使他也成为有名无实的将军的危险，不仅成为将军，而且有成为统帅、**国务活动家**、甚至**独裁者**的危险！朋友维利希想必有非常独特的想法，认为共产党对一位靠拢它的大致过得去的营长和志愿队队长会暗地给予这样出色的嘉奖。

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我只是把维利希当作一个军人来谈的，因为只有作为军人他才能使公众感兴趣，而作为‘**国务活动家**’，那是以后的事了。如果我对他怀有恶意——在他看来，我和我的朋友们对他就是如此——，如果我有兴趣给他作个人鉴定，那么插曲有的是！如果我仅限于讲述轻松的一面，难道我能放过苹果树事件吗？在苹果树下，他和他的贝桑松人³¹⁴曾庄严宣誓，宁愿高歌而死，不愿重离德国国土。难道我能不谈边界上的那出喜剧吗？当时，朋友维利希的样子是似乎真要实现这个誓言了；当时，有一些好心人来找我，十分认真地要我去劝说勇敢的维利希放弃他的决定；最后，维利希集合队伍问大家，他们是不是愿意死在德国土地上而不愿出去流亡，在众人长久的沉默之后，一个唯一的视死如归的贝桑松人高呼：‘留在这里！’而结果呢，大家还是心满意足地带着武器和辎重转移到瑞士境内。最后在辎重上发生的事又是十分引人入胜的插曲。这件事到今天还值得一提，因为维利希本人正在号召半个世界就他的‘人品’发表意见。顺便提一下，谁愿意知道这方面的详情细节和其他趣事，只消问问他的300名在当时没有能为自己找到温泉关的斯巴达人³¹⁵

之中的任何一个。他们随时都愿意背着那个有品性的人叙述极其丢丑的事。在这方面我有很多的见证人。

关于我的‘勇敢’的事，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令我惊讶的是，那时我在巴登发现，勇敢是一种不值得一谈的最普通的品质，仅仅一种单纯的勇敢并不比单纯的善良意志有价值。因此，常有这样的事，每个单独的人是不乏勇敢的英雄，而整个营却像一个人一样，逃之夭夭。维利希的队伍向卡尔斯多夫的进军就是一例，这次进军我在论述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时已作了详细的说明^①。

维利希硬说，在这件事上他曾对我进行过一次无往而不胜的道德说教，并且正是在1850年的新年之夜。我没有记载如何从这一年跨到那一年的习惯，所以我不能担保这个日期。无论如何，维利希决没有做过像他在报刊上所阐述的那种说教。

文章里还写道，在流亡者委员会³¹⁶，我和其他的一些人对伟大人物行为‘不恭’。真可怕呀！但是，当维利希这位不信上帝的人的惩治者突然对普通的‘不恭行为’束手无策时，这些无往而不胜的道德训示到哪里去了呢？大概不会有人让我认真地去谈这些蠢事吧。

在施拉姆和维利希之间闹到要求决斗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②上，我似乎犯了罪，因为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不久，我和施拉姆一起‘离开房间’，因而是事先策划了这件事。

以前，似乎是马克思‘唆使’施拉姆，现在轮换了，我充当了这个角色。一个老练的擅长使用手枪的普鲁士尉官同一个可能从来没有

① 见《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4章《为共和国捐躯》。——编者注

②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1850年8月底（至迟9月1日）举行的会议。——编者注

摸过手枪的商人之间的决斗，确实是把这个尉官‘除掉’的绝妙办法。朋友维利希不顾这一点，还到处诉说——口头上和书面上——，我们想枪杀他。

我和施拉姆同时离开房间，这是有可能的（某种需要使我离开房间，对这样的事情我不作记录）；但是也未必如此，因为我从我所保存的当时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中看到，那天晚上施拉姆和我是轮流作记录的。施拉姆仅仅是被维利希的无耻行为所激怒。他提出同维利希决斗，使我们都大吃一惊。在几分钟之前，大概施拉姆本人也不会料到事情有如此的变化。这个行动是十分突然的。维利希在这里还说，他曾经声称：‘施拉姆，给我出去！’事实上是维利希要求中央委员会赶走施拉姆。中央委员会则认为没有必要满足他的要求。施拉姆只是应马克思的个人请求才离开的，因为马克思希望不要再继续胡闹。在我这一边有记录，在维利希先生那一边则是他的个人人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①

维利希先生又说，他在工人协会上叙述了流亡者委员会的“不恭行为”并为此而提出一项建议。

高尚意识叙述说：“当反对马克思及其一伙的怒潮达到最高峰时，我投票赞成中央委员会处理此事。这事就这样办了。”

办了什么事？是维利希投票呢？还是中央委员会对此事作了处理？真是宽大为怀！他的命令式的一票把他的敌人从达到最高峰的人民怒潮中挽救了出来。维利希先生只是忘了：中央委员会是秘密

^① 这封信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信的原件至今未能找到。——编者注

团体的秘密委员会,而工人协会却是公开的大众的团体。他忘了,由于上述原因中央委员会处理问题是不可能工人协会中提付表决的,因而也不可能出现一个慈悲为怀的人排难解纷的场景,由他充当这个场景中的主人公。朋友沙佩尔会帮助他恢复记忆力。

维利希先生把我们从公开的工人协会带到秘密的中央委员会,又从中央委员会带到安特卫普的一场决斗,即他和施拉姆的决斗^①:

“施拉姆在一个前俄国军官陪同下来到奥斯坦德,据他说,这位军官是在匈牙利革命期间转到匈牙利人这边的,在决斗结束后,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位“前俄国军官”不是别人,而是亨利克·路德维克·米斯科夫斯基。

在发给这位前俄国军官的证件中是这样写的:“本证件持有人亨利克·路德维克·米斯科夫斯基,波兰贵族,在1848—1849年匈牙利战争期间曾任匈牙利护国军第四十六营军官,为人忠勇可嘉,特此证明。

匈牙利前执政者拉·科苏特,1853年11月12日于伦敦。”^②

说谎成性的高尚意识!但目的是高尚的。善与恶之间的对立要用鲜明对照的手法来描绘,让它像一幅生动的图画。多么艺术的一幅人物画呵!一边是这位高尚人物,身旁围绕着

“目前在澳大利亚的泰霍夫,那时在流亡中而目前在阿尔及尔监狱中的法国骠骑兵上尉维迪尔,以及法国报纸所宣扬的一位最坚决的革命者巴泰勒米”。

简言之,一边是维利希本人,身旁围绕着代表两次革命的精英;另一边是罪恶施拉姆,孤苦伶仃,和他在一起的只有一个“前俄国军官”,这位军官不是真正参加过而是“据他说”参加过匈牙利革命,并

^① 决斗于1850年9月11日进行。——编者注

^② 这个文件至今未能找到。——编者注

且在决斗结束后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即归根到底原来是一个魔鬼。接着是艺术性的描绘：美德下榻在奥斯坦德的一个“头等旅馆”内，那里住着一位“普鲁士亲王”，而罪恶和俄国军官则“住在私人房子里”。不过，俄国军官看起来又不完全是“在决斗结束后消失”的，因为根据维利希先生的继续叙述，“施拉姆和俄国军官留在小河边”。而且，俄国军官并没有像我们高尚意识所希望的那样在大地上消失。这从下面的声明中可以看出：

“12月28日《刑法报》上刊载着维利希先生的一篇文章，其中还专门记述了他于1850年在安特卫普与施拉姆的决斗。令我感到遗憾的是，这篇记述向公众报道的并不都是实情。那里谈到：‘决斗是经过安排的，施拉姆在一个前俄国军官陪同下来到，他又如何消失等等，等等。’这都是不真实的。我从来没有为俄国效过力；如果这样称呼我，那就可以把所有参加匈牙利解放战争的波兰军官都叫作俄国军官。从1848年战争开始到1849年战争在维拉戈什全部结束，我一直在匈牙利任职。我也没有消失得无影无踪。施拉姆从发射地点只挪了半步，就向维利希射击，但没有命中，于是维利希从自己的位置向施拉姆射击，他的子弹擦伤了施拉姆的头部。在此之后，我就留在施拉姆身边，因为我们那里没有医生（决斗是维利希先生安排的）；我把施拉姆的伤口洗干净包扎起来，因而也没有注意到有七个人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面收割干草，一面注视着决斗，而他们对我来说可能是危险的。维利希和他的那几个在文章中提到的同伴们急急忙忙离开了，施拉姆则和我从容地留在原地看着他们离去。他们不久就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我还应该指出，当我们到达决斗地点时，维利希和他的同伴早就在那里了，他们为决斗量好了距离，而且维利希还为自己选择了一块背光的地方。我向施拉姆指出这一点，但是他说：‘就让他这样吧！’施拉姆表现得勇敢无畏，十分冷静。我被迫留在比利时，有关人士都是知道的。关于这次形式如此独特的决斗的其他情况，我不想再谈了。

亨利克·路德维克·米斯科夫斯基

1853年11月24日于伦敦”^①

^① 这封信至今未能找到。——编者注

高尚意识的机器开动了。他发明了某个俄国军官，马上又使他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我又一定要代替这个军官，像萨米尔那样在战场上出现了，尽管不是以实体出现。

“次日清晨（在维利希先生到达奥斯坦德之后），他（一个友好的法国公民）给我们看一份布鲁塞尔的《先驱者》，上面登载着一封私人通信，其中有这样一段：‘有许多德国流亡者到了布赖顿。从那个城市给我们来信：赖德律-洛兰和来自伦敦的法国流亡者准备于日内在奥斯坦德与比利时的民主派一起举行代表会议。’谁能有这样的荣誉称这个思想为自己的思想呢？它不是出自法国人，否则，就太凑巧了。这个荣誉完全属于马克思先生，因为即使他的一个朋友有可能执行那个东西，但思想总还是由头脑创造出来，而不是由手创造出来的。”^①

“一个友好的法国公民”把布鲁塞尔的《先驱者》给维利希先生及其一伙看。他给他们看的是不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只有安特卫普的《先驱者》。在地形学和年代学领域内系统地歪曲和捏造，是高尚意识的重要职能。只有这样的背景，即理想的时间和理想的空间，才适合于他的理想的作品。

为了证明这个思想，即布鲁塞尔的《先驱者》中的文章“出自”马克思，维利希先生想使人相信：“它不是出自法国人。”这个思想本来就不会出自某某！“否则，就太凑巧了。”我的上帝，为什么维利希先生本人只能用法语表达的思想就不可能出自法国人呢，这里又怎么突然杀出个法国人呢，我的高尚意识？这个法国人和维利希、施拉姆、前俄国军官和布鲁塞尔的《先驱者》有什么关系呢？

高尚意识的思想的传播器大声嚷嚷得不是时候，泄露了高尚意

^① 奥·维利希《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见1853年10月28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3期。——编者注

识曾凑巧认为必须抛弃一个必要的中间环节。让我们把这个环节再安装上吧。

在施拉姆要和维利希先生决斗之前，法国人巴泰勒米已约定与法国人松容决斗；而这应该在比利时进行。巴泰勒米选择了维利希和维迪尔作助手。松容启程赴比利时。这时候发生了与施拉姆的冲突。于是，两个决斗定在同一天进行。松容没有到决斗地点。巴泰勒米在回到伦敦后公开断言，安特卫普的《先驱者》上的文章出于松容之手。

在高尚意识把巴泰勒米的思想转移给自己，而把松容的思想转移给我之前，是经过长时间犹豫的。正如泰霍夫本人返回伦敦后向我和恩格斯所说的，最初，高尚意识坚信，我想假施拉姆之手打发他去见上帝，他还用书面形式向全世界披露了这个思想。但是，经过三思之后，他又肯定，像魔鬼般老谋深算的人不会考虑通过与施拉姆的决斗来收拾维利希先生。因此，他便抓住了“出自法国人的”思想。

命题：“这个荣誉完全属于马克思先生”。**证明：**“因为如果他的一个朋友有可能把那个东西（不言而喻，“思想”在我们的道德高尚的人那里是没有性的，而不是阴性^①）执行（执行思想！），但思想总还是由头脑创造出来，而不是由手创造出来的”。**因为如果！**好一个**因为如果！**维利希先生为了证明马克思臆造出“那个东西”，便假定马克思的一个朋友执行了，或者更确切些说，有可能执行“那个东西”。如此，就得到所需要的证明。

高尚意识说：“如果确定，马克思的朋友瑟美列把匈牙利王国出卖给了奥地利政府，那么，这就是可靠的证明，云云。”

^① 在这里，“思想”用的是阴性名词，“东西”用的是代词。——编者注

其实恰恰相反。但这与本题无关。假如瑟美列有了出卖行为，那么，这对维利希先生来说就是“可靠的”证明，即证明马克思是布鲁塞尔的《先驱者》上一文的作者。但是，即使前提不肯定，结论却依然有效，换言之，就是仍应肯定：如果瑟美列出卖了圣者斯蒂凡的王国，那么，马克思就出卖了圣者斯蒂凡本人。

在俄国军官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维利希先生又出现了，这次是在“伦敦的工人协会”上，在那里，

“工人们一致谴责马克思先生”，“在他退出协会后第二天，伦敦区部全体会议就一致把他开除出盟”。

但是，在此之前

“马克思和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就一起作出了关于中央委员会迁出伦敦的决定”，

并且不顾沙佩尔的善意警告，成立了自己的区部。根据秘密团体的章程，多数派有权把中央委员会迁往科隆并暂时开除整个维利希区部，而这个区部则无权作出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惹人注目的是：高尚意识一向偏爱小小的戏剧场面，维利希先生在其中充当雄辩大家的角色，而这次却放过惨剧和决裂的场面，不加利用。诱惑力是很大的，可惜白纸黑字的记录摆在那里，证明一贯得胜的基督一连几个小时如坐针毡，哑然无声地听取恶鬼的指控，然后突然溜走，把朋友沙佩尔丢下不管，直到处身信徒们的“区部”时才恢复说话的能力。顺便提一下，当维利希先生在美国一本正经地谈论“由于尊重和信任而和他联系在一起工人协会”是如何美妙时，甚至连沙佩尔先生也认为有必要暂时退出维利希先生的协会。

高尚意识从如此娴熟的“策略”行为的领域向理论领域上升了一

小会儿。但这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实际上,他是继续提供“马克思先生的策略范例”。《揭露》第8页上说:“沙佩尔—维利希派(维利希先生引证时用:维利希—沙佩尔派)从来不以具有自己的思想为荣。他们只有别出心裁地曲解别人的思想的本领。”^①维利希先生为了在公众面前显示他多么富于自己的思想,于是便述说小资产阶级如果掌握政权就会“创立”“哪些机构”,并把它当作自己的最新发现以及对恩格斯和我的观点的反驳。恩格斯和我撰写、被萨克森警察当局从毕尔格尔斯那里查获的通告信^②(它曾刊载于最流行的德国报纸,并构成科隆起诉书的根据),非常详尽地叙述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善良愿望。维利希的布道词就是从那里弄来的。请读者把原稿和抄本作一比较吧!美德是多么宽厚啊,竟然抄袭罪恶写的东西,尽管也“别出心裁地曲解”。从善的愿望弥补了低劣的风格。

《揭露》第64页上谈到,在我看来,共产主义者同盟“不是把组织未来的执政党,而是把组织未来的反对党作为目的”^③。维利希先生由于高尚而抛掉了前半句:“不是未来的执政党”,而抓住后半句:未来的反对党。他如此巧妙地把这个句子劈开,以求证明,追逐地位的人的政党是真正的革命政党。

维利希先生出产的另一个“自己的”思想是:高尚意识和他的敌人之间的实际矛盾也可以从理论上表达为“人分为两类”,即分为维利希派和反维利希派,分为高尚的一类和不高尚的一类。关于高尚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79页。——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所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35页。——编者注

的一类,我们得知,他们的主要特征是:“他们彼此器重。”当高尚意识不再用他的策略范例来使我们开心时,令人感到乏味就是他的特权。

我们看到:高尚意识是如何歪曲或颠倒事实,或用滑稽的假设冒充严肃的命题,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宣布凡属与他相矛盾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不高尚的,卑鄙的。因此,我们看到,他的整个活动完全可归结为发明卑鄙的东西。这一活动的另一面是,高尚意识把他和世人之间发生的实际纠葛——不管他们如何有损名誉——变为确证自己高尚的实际证明。对于纯洁的人来说一切都是纯洁的,敌人如果看不到他的所作所为的高尚,那就恰好证明自己是不纯洁的。因此,高尚意识用不着自我辩白,哪个敌人胆敢强迫他自我辩白,他只要表示道义上的愤怒和惊讶就行了。因此,维利希先生的似乎是自我辩白的插曲本来就根本不需要,只要把我的《揭露》、希尔施的自供和维利希先生的答复比较一下,谁都会深信这一点。因此我只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高尚意识的人们是些什么货色。

尽管希尔施的自供本来是要歌颂维利希先生的,把他捧作拯救自己敌人的救星,但是,这个自供比我的《揭露》更有损他的名誉。因此,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希尔施的自供。希尔施是普鲁士警察当局反对我所属的党的尽人皆知的工具。维利希先生不顾这一事实,却假设希尔施确实是我为了“毁掉”维利希的党而委派的。

“很快他(希尔施)就和马克思的某些拥护者,特别是和一个叫罗赫纳的在一起,开始阴谋活动,企图毁掉协会。因此大家开始注意他。他被揭发了,云云。根据我的建议,把他开除了;罗赫纳袒护他,也被开除了…… 希尔施于是又开始了反对奥·狄茨的阴谋活动…… 阴谋很快又被揭穿。”

根据维利希先生提议把被当作密探的希尔施开除出大磨坊街工

人协会一事,是我在《揭露》第 63 页^①上谈的。这种驱逐在我心目中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知道,驱逐的原因并不是确凿的事实,而是怀疑希尔施和我搞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阴谋活动。这一点连维利希先生本人现在也已承认。我知道希尔施没有犯这个罪。至于罗赫纳,他曾要求拿出希尔施的罪证。维利希先生回答说,不知道希尔施是靠什么生活的。罗赫纳问道,维利希先生靠什么生活?由于这种“不恭的”问法,罗赫纳受到了公意审判,他还不听所有的告诫,不想低头认罪,所以被“开除”。希尔施被开除了,罗赫纳也被打发走了,希尔施的阴谋活动

“现在主要是反对奥·狄茨,并且串通了一个非常可疑的前警探,这个人在我们这里对狄茨提出了指责”。

施泰翰逃出汉诺威的一个监狱到达伦敦后,参加了维利希的工人协会并对奥·狄茨提出指责。施泰翰既非“可疑的”,也非“前萨克森警探”。促使施泰翰对奥·狄茨提出指责的原因是,检察官在汉诺威曾经向他出示了许多他寄给伦敦的维利希委员会³¹⁷书记狄茨的信件。与施泰翰几乎同时出现的有:罗赫纳,刚从汉诺威监狱获释并被驱逐出境的埃卡留斯第二^②,因参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事件而被通缉的居姆佩尔,以及 1848 年因一首革命诗作曾在汉堡被拘、后来自称再次受到迫害的希尔施。他们和施泰翰一起组成了某种反对派,并由于在协会的公开辩论会上反对维利希先生的教义而犯了亵渎圣灵罪。使他们大家感到惊讶的是,对施泰翰指责狄茨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538 页。——编者注

② 约·弗·埃卡留斯。——编者注

答复是维利希开除希尔施。不久他们都退出工人协会并和施泰翰组成一个单独的协会³¹⁸，这个协会也存在了一些时候。他们和我建立联系是在他们退出维利希先生的协会之后。高尚意识颠倒年代顺序，根本不提那个必要的、但不怎么令人舒服的中间环节施泰翰，从而暴露了自己的谎言。

我在《揭露》第66页上谈到：“科隆陪审法庭审讯前不久，金克尔和维利希委派了一个裁缝帮工^①充当特使前往德国……”^②

高尚意识愤怒地叫道：“为什么马克思先生强调裁缝帮工？”

我没有“强调”裁缝帮工，没有像高尚人物所做的那样，例如，他强调皮佩尔是“路特希尔德家里的家庭教师”，虽然皮佩尔已由于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而失掉在路特希尔德那里的工作，成了英国宪章派⁸⁰机关报^③的编委。我把裁缝帮工叫作一个裁缝帮工。为什么？因为我不应该提他的名字，但应该向金克尔先生和维利希先生表明，我完全了解他们的特使的为人。因此，高尚意识指责我对所有裁缝帮工犯了叛国大罪，并对裁缝帮工高唱平达式的颂歌，以此来争取他们的选票。高尚意识为了顾全裁缝帮工的美好名声，宽宏大量地不提被他称为一只遭驱逐的大山羊的埃卡留斯是裁缝帮工，其实，这个职业至今丝毫也没有妨碍埃卡留斯是一位德国无产阶级的大思想家，丝毫也没有妨碍他用刊载在《红色共和党人》、《寄语人民》和《人民报》上的英文论文在宪章派当中博得威望。

① 奥·格贝尔特。——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37页。——编者注

③ 《人民报》。——编者注

维利希先生反驳我对他和金克尔派往德国的裁缝帮工的活动的揭露，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现在谈一下亨策的事情。高尚意识企图向我冲刺一下来掩护自己的阵地。

“顺便提一下，他（亨策）曾借给马克思 300 塔勒。”

1849年5月，我告诉雷姆佩尔先生，《新莱茵报》的财政困难随着订户的增加而更为严重了，因为开支必须用现金支付，而订费总是事后收取；除此之外，由于发表了一些文章，替巴黎六月起义²⁷⁰者说话，抨击法兰克福议员³¹⁹、柏林妥协派³²⁰和三月同盟的头头³²¹，几乎所有股东都逃之夭夭，因而造成了巨大赤字。雷姆佩尔先生让去找亨策，亨策先生借给《新莱茵报》300塔勒，由我写了借据。那时亨策本人正被警察当局追捕，所以他认为有必要离开哈姆，就和我一同去了科隆；到了科隆，我就得知自己已被驱逐出普鲁士国境的消息。向亨策借来的300塔勒、我通过普鲁士邮局收到的订户寄来的1500塔勒、我的一部高速平板印刷机，等等，这一切都用来抵偿了《新莱茵报》对排字工人、印刷工人、纸商、办事员、通讯员、编辑部人员等等所欠的债务。这事亨策先生知道得最清楚，因为他本人曾借给我妻子一个旅行包，用来装她的银器，送到法兰克福去典当，以便我们能够弄到私人所需的费用。《新莱茵报》的账册保存在科隆的商人斯蒂凡·瑞特那里，我授权给高尚意识到那里取得这些账册的经官方认证的摘抄本。

在谈了一些离题的话之后，现在言归正题。

至于维利希先生是亨策的朋友，从亨策那里得到资助，《揭露》丝

毫也不认为不清楚。它认为不清楚的是(第 65 页^①),亨策家曾被搜查并有文件被查获,他被查出在柏林窝藏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的席梅尔普芬尼希,而且“承认”知晓同盟的活动,这么一个亨策竟然在科隆案件接近结案时,在普鲁士警察当局的警惕性达到顶点并对德国和英国每个稍有可疑的德国人严密注视时,得到当局的许可,前往伦敦,并在那里自由自在地同维利希来往,然后又回到科隆来提供反对贝克尔的“假证词”。一定的时期使亨策先生和维利希先生的相互关系具有一定的性质;上述的情况必然使维利希先生本人也感到奇怪,尽管他不知道亨策从伦敦用电报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联络。这里谈的是一定的时期。维利希先生正确地感到这一点,因此他用自己的高尚方式声明:

“他(亨策)在审判之前来到伦敦(这一点我也肯定),他不是到我这里来,而是来参观工业博览会的。”

高尚意识像有自己的布鲁塞尔《先驱者》一样,也有自己的工业博览会。真正的伦敦工业博览会是在 1851 年 10 月闭幕的,而维利希先生让亨策在 1852 年 8 月来“参观它”。席利、海泽和金克尔—维利希贷款的其他担保人都可证实这一情况,亨策先生曾逐一地拜访过他们,争取他们投票赞同把美国的款项从伦敦转移到柏林。

亨策先生在到维利希先生那里逗留之前,早已被作为证人传唤,要他到科隆法院出庭,但不是作为辩护人一方,而是作为起诉人一方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536—537 页。——编者注

的证人。当我们知道维利希先生指示亨策如何在科隆陪审法庭上作证**反对**贝克尔(《揭露》第68页^①)——“具有高超精神和性格的人”，我们就立即把相应的情报寄给贝克尔的辩护人，律师施奈德第二；信恰好在讯问见证人亨策这一天到达。他的证词的性质不出我们所料。因此，贝克尔和施奈德就公开质问他与维利希先生的关系。信保存在科隆的辩护人的文件中，讯问亨策的报道发表于《科隆日报》。

我不作这样的推论：“假如亨策先生确实如何如何，这就是维利希先生的活动的可靠证明；**因为即使**朋友亨策有可能执行那个东西，但思想总还是由头脑创造出来，而不是由手创造出来的。”这种辩证法我情愿让给高尚意识。

我们还是回到维利希先生的本题上来吧：

“为了充分评价这个〈马克思所采取的〉策略，这里还有几个范例。”

在黑森消极抵抗、普鲁士招募后备军以及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表面上冲突³²²时，高尚意识恰好准备在德国掀起军事暴动，方法就是寄送“成立后备军委员会的简要方案给在普鲁士的某些人士”和维利希先生**意欲**“亲赴普鲁士”。

“正是马克思先生从自己人那里得知此事后，把我**意欲**前往的消息告诉了别人，并且后来夸耀说，他用来自德国的假信件戏弄了我。”

确实如此！贝克尔寄给我维利希的一些胡言乱语的信件以及他对这些信件的有趣评论，这些信件贝克尔已在科隆公开了。如果我剥夺自己的朋友阅读这些信件的乐趣，那我就太残忍了。施拉姆和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39页。——编者注

皮佩尔为了逗趣，曾回信戏弄维利希先生，但回信不是“来自德国”，而是通过伦敦市邮局寄的。我们的高尚人物加意小心，决不会去制造信件的邮戳。他硬说“收到一封用模仿的笔迹写的信，并认出它是假的”。这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信都出自同一个人之手。维利希先生“夸耀说”，他发现了模仿的笔迹，并从封封皆真的信件中认出一封是假的，但他过分高尚了，对用亚洲式的夸张手法对他个人的颂扬、对他固执思想的粗俗滑稽的称赞，对他个人奢望的漫无边际的夸张，却认不出那都是戏弄。即使维利希先生想前往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阻碍他成行的也不是我“把消息告诉了第三者”，而是别人告诉了维利希先生本人一个消息。原来，他所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揭掉了本来就是透明的外皮。他为虚荣心所驱使，至今还认为那封使他陷于失望的信是假的，而那些愚弄他的信是真的。高尚意识认为自己是**有美德的**，所以世上应该有“爱情和吃喝”，但不应当有幽默，是这样吗？我们高尚的人不让公众享受阅读这些信件的愉快是不高尚的。

“至于马克思所提到的和贝克尔的通信，所说的一切都是捏造。”

至于这种捏造的通信、维利希先生大驾亲赴普鲁士的**意图**以及我把这消息告知第三者，那么，我认为寄一份《刑法报》给前尉官施特芬是适宜的。施特芬是为贝克尔辩护方面的见证人，贝克尔曾把自己的所有文件交他保管。警察当局迫使施特芬离开科隆，他现在住在切斯特，在那里教书，因为他属于不高尚一类的人，甚至在流亡中也不得不**挣钱**谋生。高尚意识是超凡的人，他不靠资本生活，因为他没有资本，也不靠工作生活，因为他不工作，他是靠社会舆论这种天降食物生活的，靠别人对他的**尊敬**生活的。这是他唯一的资本，他要为此而搏斗。

施特芬写给我这样一封信：

“维利希非常恼恨您引用了贝克尔信中的片断。他把这封信从而也把那段引文叫作捏造。我用事实来驳斥这种荒谬的论断，以证实贝克尔对维利希的看法。有一天晚上，贝克尔笑逐颜开地递给我两封信，建议我在情绪不佳的时候阅读；他说信的内容定会使我开心，说我由于以往的地位可以从军事观点予以评判。我从头到尾阅读了奥古斯特·维利希写给贝克尔的这些信，果不其然，我看到了非常滑稽可笑的庄严命令（用相称的普鲁士王国的术语来说），在这些命令中伟大的元帅和社会救世主从英国发出指示：占领科隆，没收私有财产，建立组织巧妙的军事独裁，实施军事社会法典，只留一种报纸，每日发布思想行动准则的命令，其他报纸一律禁止，以及许多其他细节。维利希非常体谅下情，答应在科隆和普鲁士莱茵省完成这部分工作后，他将亲自莅临，以便区分山羊和绵羊，审判活人和死人。维利希断言，他的‘简要方案容易实现，只要某些人表现出主动精神’，并说‘这将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对谁？）。为了扩大视野，我很想知道有哪些深谋远虑的‘后备军军官’后来向维利希先生‘表示了’这样的态度，也很想知道，在普鲁士后备军集中期间，这些据说是相信‘简要方案的极其严重的后果’的先生们都在哪里，在英国，还是在世界婴儿预定要诞生的地方即普鲁士。维利希非常亲切地把婴儿诞生的喜报寄给了‘某些’人，并且作了描述；但是在这些人当中，除了贝克尔，这位‘具有高超智慧和性格的人’之外，看来竟然没有一个人表示愿意当教父。有一次维利希派来一位名叫……①的副官。这位副官给我很大荣誉，邀我到 he 那里去，并且坚决地相信，他有十分把握能够预测整个形势，比天天直接注视事实的人更为准确。我告诉他，普鲁士军队的军官们决不会认为在他和维利希的旗帜下战斗是一种幸福，他们根本无意于匆忙地宣布成立维利希式的共和国，这时，他对我就很不看起。使他更为恼怒的是，没有物色到一个缺少头脑的人愿意翻印他随身带来的告军官书，号召军官们马上公开表示拥护他称之为民主制的‘那个东西’。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被马克思奴役的科隆’（他对我这样写的），在别的地方翻印了这篇废话并散发给许多军官。因此，《十字报》的‘观察家’得以揭穿这种变普鲁士军官为共和派的巧妙方式的纯洁秘密。

① 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也引用了这封信，指出此人为席梅尔普芬尼希，而没有用省略号。——编者注

维利希声称,他决不相信,具有‘贝克尔式的高超性格和精神’的人们会嘲笑他的方案。因此,他把道破这一事实的话叫作荒谬的捏造。如果他读过关于科隆案件的报道(当然,他是理应一读的),他就会发现,贝克尔像我一样,已经公开地对他的方案表示了您所发表的那封信中的意见。如果维利希愿意得到一个从军事观点对当时情况的正确描写,而不是像他那样根据自己的设想来描写当时的情况,我能够在这方面为他效劳。

很遗憾,在维利希的以往的伙伴中,拒绝按照他的意愿对他的军事天才和他对事物的实际了解表示赞赏的人,还不止是魏德迈和泰霍夫。

威·施特芬

1853年11月22日于切斯特^①

现在,再看看最后一个“马克思的策略的范例”。

维利希先生离奇地记述了1851年2月路易·勃朗举行的一次宴会,这个宴会是在赖德律-洛兰的宴会的对台戏,同时又是为了抵御布朗基的影响而举行的反示威。

“不言而喻,马克思先生没有被邀请。”

不言而喻,没有。谁花两先令就都能出席,几天以后,路易·勃朗还郑重其事地问马克思为什么不到场。

“其间(什么场合,在宴会上?),就有传单在德国工人中间散发了,传单上刊印了未经宣读的布朗基祝酒词³²³,还附有嘲笑纪念会的按语,把沙佩尔和维利希叫作瞞哄人民的骗子。”

“未经宣读的布朗基祝酒词”构成了高尚意识的历史的重要部分,他相信自己的话具有高级意义,已习惯于断然声明:“我从不说谎!”

在宴会后过了没有几天,巴黎的《祖国报》就刊登了布朗基应纪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念会组织者的请求从贝勒岛监狱寄来的祝酒词全文。在祝酒词中，布朗基用他那种明确的形式痛斥了1848年临时政府的所有成员，特别是宴会的组织者路易·勃朗先生。《祖国报》还表示惊讶，为什么这篇祝酒词没有在宴会上宣读。路易·勃朗立刻在伦敦的《泰晤士报》上声明，布朗基是卑鄙的阴谋家，他根本没有给纪念会筹备委员会寄来这样的祝酒词。路易·勃朗、朗道夫、巴泰勒米、维迪尔、沙佩尔等先生和维利希本人，以纪念会筹备委员会的名义给《祖国报》送去一项声明：他们从来没有收到上述祝酒词。但是，《祖国报》在公布这个声明之前，曾问过把祝酒词转寄给它发表的布朗基的妹夫安东先生。它把安东的回信发表在上述先生们的声明下面，安东在回信中说，他确实把祝酒词寄给了巴泰勒米，而且有他的收据。随后，巴泰勒米先生就声明，虽然他收到祝酒词，但他认为这篇祝酒词不妥而压了下来，没有把这件事通知委员会。但是不幸，在此之前，声明签署人之一，前上尉维迪尔在《祖国报》上写道，军人的荣誉感和对真理的追求迫使他承认，他和路易·勃朗、维利希以及其他在委员会的第一个声明上签了名的人都撒了谎。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是上述6个而是13个。他们都看到了布朗基的祝酒词，大家讨论了这个祝酒词，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以7票对6票的多数决定不宣读这个祝酒词。他，维迪尔是投票赞成宣读的6个委员之一。

《祖国报》收到了维迪尔的信之后又收到巴泰勒米先生的声明，得意之情可想而知。它发表了这一声明，还附加了下面的“按语”：

“我们常常给自己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蛊惑者的身上什么更多一些，是吹牛还是愚蠢？从伦敦来的第四封信，使我们更加作难了。我们不晓得他们当中竟有那么多可怜虫，他们是这样迷恋于写作和看到他们的名字被登载在反动的报纸上，甚至甘愿蒙受无穷的耻辱和自卑自贱。公众的嘲笑和愤慨同他们有

何相干——只要《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祖国报》刊载他们的作文练习就行了。为了得到这种幸福，这个世界主义的民主派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出于对文坛的同情心，我们刊载了公民巴泰勒米的下面这封信，这封信是一个新的、我们希望也是最后的证据，证明十分著名的布朗基祝酒词是真实的。他们起初全都否认这个祝酒词的存在，而现在为了确证这个祝酒词的存在而互相争吵起来。”^①

这就是有关布朗基祝酒词的一段往事。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流亡者协会由于“未经宣读的布朗基祝酒词”而与维利希先生的协会决裂。

与德意志工人协会和德国共产主义者协会分裂的同时，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流亡者协会也分了家。一部分被怀疑向往资产阶级民主即赖德律-罗兰主义的会员们呈上了退会声明，后来又被开除。或许，高尚意识应该像现在告诉资产阶级民主派那样告诉这个协会说，是恩格斯和马克思阻止他投入资产阶级民主的怀抱，不让他和“所有由同情的纽带联结起来的革命伙伴”留在一起？或许，高尚意识应该对他们说，“对革命发展的不同见解在分裂时没有起任何作用”？不，高尚意识所说的恰好相反，他说两个协会中发生分裂是由于同样的原则性的分歧，恩格斯、马克思等人代表德意志协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像马迪埃及其一伙代表法国协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一样。高尚的人物甚至害怕，只要同这些资产阶级分子稍一接触，就可能损害“真正的信仰”，因此，他郑重地提出建议，禁止资产阶级分子“哪怕作为访问者”出现在流亡者协会中。

捏造！撒谎！高尚意识发出了表示坚贞不屈的短促喊声。所有

^① P. 迈尔[对巴泰勒米来信的编辑部按语]，见1851年3月12日《祖国报》第71号。——编者注

这一切，都是我的“策略的范例”！让我们看一看吧！

“公民亚当任主席。1850年9月30日开会。

会上介绍磨坊街的德意志民主协会三个代表。他们声称，受委托递交一封信，信被宣读了。〈据称，在这封信中叙述的是分裂的原因。〉公民亚当指出两个协会中刚刚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共同点：两个协会在同样的情况下发生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分裂，云云。公民维利希要求，退出德意志协会的会员〈正如记录所指出的，他后来改正说：“被开除的会员”〉不准甚至作为访问者进入法国协会。〈摘录与原记录相符〉

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流亡者协会档案室保管员
让·克莱达”^①

动听、神奇、夸张、闻所未闻、确确实实、充满冒险情节的关于举世闻名的高尚意识的骑士的故事就此结束。

坦率而正派的人说话句句是真，
相信了，他兼有二者；不相信，他总还坦率。
我知道这样的无赖。^②

卡尔·马克思

1853年11月28日于伦敦

① 这份记录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莎士比亚《李尔王》第2幕第2场。——编者注

卡·马克思

*曼托伊费尔的演说。——普鲁士的宗教运动。——马志尼的宣言。——伦敦市政厅。——罗素的改革。——工人议会³²⁴

1853年11月29日星期二于伦敦

昨天早晨普鲁士议院会议开幕^①，首相曼托伊费尔先生发表了演说。根据我们所收到的电讯来看，演说中谈到东方纠纷那部分所用的措辞，显然是有意要消除人们对圣彼得堡、柏林和维也纳各宫廷之间存在密谋的怀疑。这一点特别突出，还因为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曾根据先前的各种理由，通过同一个曼托伊费尔之口向他忠诚的人民郑重宣布，议院并不负有干预对外政策问题的使命，因为国家与其他各国的关系像国王的私人领地一样，是专门由王室管理的。演说中的这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某种对人

① 1853年11月29日《泰晤士报》第21598号。——编者注

民的呼吁,这表明普鲁士政府的处境极端困难:一方面俄国和法国威胁着它,另一方面它自己的臣民也威胁着它,而且恰好是在它被昂贵的食品价格、极度的商业不景气所困扰,并且想到恶劣的背誓行为³²⁵将遭到报复而无法安宁的时候。普鲁士政府自己使自己失去了通过议院诉诸舆论来寻求避难所的可能性,议院是国王有意作为一个纯粹虚设的机构建立起来的,大臣们自觉地把它当作一个纯粹虚设的机构,人民也非常肯定地把它看成是一个纯粹虚设的机构。时至今日,已不能使人民相信这些虚有其表的机关应该毫不犹豫地被看作是“祖国”的保障了。

今天的《泰晤士报》写道:“决不能说,普鲁士人表现了头脑清醒和远见卓识(他们一度曾经被认为具有这样的品质),因为他们让根据现行宪法选举出来的议院陷于不应有的被轻蔑的境地。”^①

正好相反,普鲁士人已经充分地表现了自己是头脑清醒的,因为他们不让那些背叛了革命、企图篡夺革命果实的人甚至享有表面上的权势,他们叫政府知道,他们是不会受它的骗术愚弄的,他们认为,如果议院还算个什么东西的话,那也无非是加在国家的旧官僚机构上面的一个新官僚机构。

在其他方面呆滞沉闷的德国社会生活面上,一再被宗教纠纷³²⁶掀起风波,这种情况会使任何一个不太熟悉德国过去历史的人大惑不解。时而是所谓德国教会³²⁷的残余分子遭到现政府疯狂的、像1847年那样的迫害。时而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通婚的问题使天主教教士像1847年那样同普鲁士政府争吵起来。时而是弗赖堡大主

① 1853年11月29日《泰晤士报》第21598号。——编者注

教①同巴登大公②之间爆发激烈的斗争，成为最重要的事件，前者把巴登政府开除出教，并且下令在传道坛上宣读他的信件，后者则下令封闭不听话的教堂，逮捕教区牧师。时而是农民纷纷集会，武装起来保卫他们的牧师，赶走宪兵，像比绍夫斯海姆、柯尼希斯霍芬、格林斯费尔德、盖拉赫斯海姆（这些地方的村长则不得不逃跑）以及其他许多村庄发生的事情那样。如果把巴登的宗教冲突看作纯粹是地方性的冲突，那就错了。巴登只不过是天主教会特意选来进攻新教徒君主们的战场。在这个冲突中，弗赖堡大主教代表德国所有的天主教教士，巴登大公则代表所有大大小小的信奉新教教义的当权者。但是，如果说一个国家一方面以它对一切宗教传统抱彻底、大胆和无比的批判精神而著称，另一方面又因不时重新爆发17世纪的宗教纠纷而使整个欧洲吃惊，那么这样的国家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的秘密不过是，政府迫使任何一种只能在暗中活动的人民动乱起初都不得不采取神秘的、几乎不受任何监督的宗教运动形式。教士们也甘心用这种幌子来欺骗自己，他们还以为自己利用人民热情去反对政府只对自己的团体有利，而实际上他们却充当了革命的不自觉、不自愿的工具。

伦敦的日报对马志尼起草的宣言竭力摆出一副惊恐万状和义愤填膺的样子。这个宣言是在被派到卢尼贾纳省——这个地区包括了摩德纳、帕尔马和皮埃蒙特王国一部分领土——去发动起义的第二民族支队的领导人费利切·奥尔西尼那里查获的。宣言号召人民“采取突然行动，就像米兰人过去做过并且现在还要再做的那样”。宣言

① 海尔曼·维卡里。——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一世。——编者注

又说：“短剑用于突然的狙击，能够很好地为我们服务并代替步枪。”^①伦敦报刊把这说成是公开号召“进行卑怯的暗杀”。那么，我只希望知道，在意大利这个公开反抗手段完全没有而密探却到处都是的国家里，革命运动不利用突然性能指望得到成功吗？我希望知道，如果意大利人民真的同奥地利军队交起手来，他们除了使用还没有被奥地利收走的唯一武器——短剑以外，还能用什么武器呢？马志尼根本不是要意大利人用短剑去对手无寸铁的敌人进行卑怯的刺杀活动，——他确实是号召他们用短剑“突然”行动，然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行动，是效法米兰的榜样，在米兰，手里只有刀子的一小群爱国者曾经袭击了全副武装的奥地利卫戍部队的守卫所。

《泰晤士报》写道：“但是，立宪制的皮埃蒙特将遭到罗马、那不勒斯和伦巴第同样的命运！”^①

为什么不呢？难道 1848 年和 1849 年的意大利革命不是被撒丁国王^②出卖的吗？难道皮埃蒙特国王^③阻碍意大利成为共和国比不上普鲁士国王阻碍德国成为共和国吗？马志尼宣言从道义方面来看，情况就是这样。至于它的政治价值，那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我看来，马志尼无论就他对皮埃蒙特人民的看法来说，还是就他对意大利革命的梦想来说都犯了错误。他认为，意大利革命的实现无须凭借欧洲的纠纷所造成的有利形势，而要依靠采取突然行动的意大利密谋家们的秘密活动。

你们大概从伦敦各家报纸上已经知道，英国政府委派了一个委

① 1853 年 11 月 22 日《泰晤士报》第 21592 号第 2 篇社论。——编者注

② 查理·阿尔伯特。——编者注

③ 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编者注

员会去调查最受尊敬的大名鼎鼎的伦敦市政厅这个机关的腐败行为和它的全部组织。委员会的工作还远未结束。下面就是委员会的报告所举出的几个事实。

伦敦市政厅的收入,即使有几项除掉不算,共达40万英镑,官员的薪俸总额非常可观——共107 000英镑,即占总收入的25%以上。法官薪俸规定为14 700英镑,其中市首席法官得3 000英镑,法庭顾问1 500英镑,郡法院法官1 200英镑。市总务官1 892英镑,秘书1 249英镑,伦敦市参议会会议员1 765英镑。市长官邸和市政厅的高级官员每年各得1 250英镑。执权杖侍从官得550英镑,执剑侍从官550英镑;典礼官450或500英镑,典礼次官200或300英镑。此外,这些要人们还领70英镑的服装费,14英镑的靴子费,20英镑的三角礼帽费。本诺克先生在他的证词中说:

“伦敦市政厅所属各机关的支出总额大大超过合众国联邦政府的支出总额;也许更惊人的事实是:伦敦市政厅本身的花费和它的财政管理费用超过了它所得到的租金、赋税和经纪人缴纳的款项的收入总额。”^①

约翰·罗素打算给英国公众吃的改革药丸的伟大秘密终于揭晓了。他提议:一、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这种限制早就名存实亡了);二、重新划分选区,办法是废除某些小的城镇选区,增设较大的城镇选区;三、在各郡选区把财产资格限制由20英镑降低到10英镑,即降低到城镇选区现行限制的水平。但是他拒绝提出第四条关于把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5英镑的提议,因为,用《泰晤士报》的话来说,这样做的结果,

^① 1853年11月24日《泰晤士报》第21594号。——编者注

“现在的选民们实际上就会被剥夺选举权，因为被准许参加投票的那个阶级将在人数上大大超过所有其他阶级的总和，这个阶级只要团结一致就足以占上风了”^①。

换句话说，赋予多数人，即使是小工商业阶级的大多数人选举权，就会把少数人的选举权剥夺掉。这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理由。可是，行将推行的新的改革法案，其最重要的特征并不是这一条，甚至也不是他提出的所有各条的总和。最重要的特征是，宣布将施行这个法案以后所遇到的普遍的十分冷淡的反应。警察局的每一个报告都远比这个“伟大的措施”、这个新改革法案、这个“群贤内阁”¹⁷⁸的集体创作更吸引公众的注意。

厄内斯特·琼斯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只要一宣布展开人民的群众性运动、建立以工人议会为首的全国组织，就会在有钱阶级中间引起惊慌，就会迫使伦敦的资产阶级报纸把注意力投向这个方面。《泰晤士报》马上就看出了这个新运动的重要性，并且第一次登载了有关宪章派大会在曼彻斯特人民学院召开的报道。^②《泰晤士报》的所有同行也开始不断发表社论，评述工人运动和早被认为已经衰败消亡的宪章派所提出的工人议会。《经济学家》就这个问题写了不下四篇文章。可是，报上关于这个具有极大意义的曼彻斯特大会的报道，根本没有正确说明它的性质和会上讨论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我应当作出自己的报道。在这个大会上提出并通过了下列决议：

“1. 大会深信，各个单独的工人团体分散地争取保持合理的工资水平和争取劳动解放是没有效果的，因此，大会认为，只有依靠一个全国组织并受一个统

① 1853年11月26日《人民报》第82期。——编者注

② 1853年11月23日《泰晤士报》第21593号。——编者注

一的领导机关领导的工人阶级联合的群众运动,才能保证给予那些现在正因同盟歇业而遭解雇或正在举行罢工的工人们以应有的帮助,才会使工人们有可能在将来把劳动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现在,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了。人民的群众性运动和全国组织的建立并不要求,也不应该要求干预现存的工联和工人团体的事务;这个组织的活动,目的应该是把所有工人的力量,把工人整体的力量集中起来,积聚起来,联合起来。

2. 为了实现上述决议,亟需尽快召开工人议会;这个议会应该由每个城市的工人在专门召集的公开会议上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这个议会的义务应该包括下面几点:组织一个机构,来通过在全国最广泛地募捐帮助现在正在举行罢工或因工厂主同盟歇业而遭解雇的工人;制定一个领导工人阶级对雇主进行斗争的专门的行动计划;提出各种措施,使工人能够从资本的无限权力下解放出来,独立自主,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不用举行罢工就能得到应得的劳动报酬。

3. 大会选出一个委员会,本着上述目的与各城市和各区进行联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召开工人议会,起草并公布代表们开会所必需的各种文件,同时拟定提交代表讨论的各项问题。”^①

在所有发言中最精彩的是琼斯先生的发言。现在我摘引其中的几段:

“雇主通过伦敦《泰晤士报》的嘴声称,他的利润不干你们的事。说什么你们应该只数你们的人头,而不是数他的利润。人头一多,即使想多得也只能少得。他把这称之为供求规律。他说,调节你们的工资的只是这个规律。是这样吗?不!既然在他的利润很高的时候你们不应该要求提高工资,那么在他的利润下降的时候他也不应该降低你们的工资。然而,即使工人的数目一个也没有减少,他也会对你们说:‘生意不好,日子难过,我的利润减少了,我不能照数给你们发工资了。’所以说,你们的劳动并不是受供求规律的调节,而是受高棉价和低利润规律的调节。供给的规律可能有道理,但生活的规律更有道理。需求的规律很厉害,但饥饿的规律更厉害!我们说,如果资本的一种形式——货币

^① 约·本生《曼彻斯特的一次重要的大会》,见1853年11月26日《人民报》第82期。——编者注

有权获得利润，那么资本的另一种形式——劳动也有权获得它；而且劳动有更大的权利，因为劳动创造货币，而不是相反。什么是利润呢？这就是扣除了全部生产费用以后剩下的资本。你们到现在为止所领取的工资，只是生产费用的一部分。这一份勉强维持活命的工资根本不是劳动的报酬。它只不过是维持活人这架机器干活所必需的费用。可是除了维持这部活机器吃饭和住宿以外，你们总该有一点剩余。除了糊口之外，你们的精神和脑子也需要食粮。雇主害怕你们得到较高的工资；这倒不是因为他付不起工资，最近七年来资本增加了100%以上，而你们只不过要求从你们劳动所得的100%中拿出10%来增加你们的工资。他害怕这个是因为更高的工资会使你们走向独立自主；他害怕这个是因为更高的工资会使你们受到教育；他害怕这个是因为受到教育的人不会再当奴隶；他害怕这个是因为他知道，那时你们再也不会同意干这么多小时的活；他害怕这个是因为那时你们再也不会让自己的妻子到工厂地狱里去当奴隶；他害怕这个是因为那时你们就会送自己的孩子上学校，而不是上工厂；他害怕这个是因为他知道，要是你们的妻子都呆在家里，孩子们都去上学，只有很短的时间在工厂，那么现在促使工资水平下降的那些过剩人手就会摆脱他的控制，劳动就会成为镶在人类自由的王冠上的无价之宝。可是现在问题又不同了。现在问题已经不只是在雇主的利润中得到多少份额或者增加10%的工资，现在问题是阻止把工资降低20%。生意是好是坏，形势不会因此有多大变化；生意好，雇主们要掠夺外国人民，生意坏，他们就要掠夺本国人民。对你们说来，问题很快就具有另一种意义：不是工资高低的问题，而是饿死还是活下去的问题，是在工厂地狱里活还是在工厂大门口死的问题。资本家们，这些西方的哥萨克，首先越过了工人权利的多瑙河疆界；他们实施了受黄金支配的战时法律，他们从垄断组织的炮垒里向我们的队伍发射饿死的炮火。各城市相继宣布戒严。失业现象挖着战壕，而饥饿把云梯架到劳动的城堡上去了，贫困的大炮猛烈地射击着劳动的战线。资本家的大联合一天比一天扩大，他们的运动一天比一天更加具有全国的规模。你们是怎样准备对抗他们的呢？你们的运动一片混乱。既然同盟歇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而你们还在继续分散行动，那么很快就会发现，你们将开始冲进彼此的禁区：一个地方的募捐者将在同一个地点碰上另一个地方的募捐者；在本来应该作为同盟者握手合作的地方，你们将互相敌视；在本来应该帮助克服彼此的弱点的时候，你们将削弱相互的帮助。威根的采煤工人们离普雷斯顿、斯托克波特、曼彻斯特、奥尔德姆不远，但是，他们由于没有得到任何支援而遭到了失败。威根的工厂工人也罢工了。他们对他们的煤矿工

人兄弟的失败是怎样看的呢？他们认为，那些人幸运地脱身了。如果互相挡道，那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们把自己的运动局限在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地区、某一种利益的小圈子里了。你们的雇主的运动正在成为全国性的运动，你们的反抗也应该成为全国性的。在现在的情况下，你们只会很快陷于无政府状态和毁灭。不要以为我对工联的明智、以及它们的行为和不可侵犯性持有异议。

但是，引着小孩学步的带子，对大人来说会成为绊绳。在工人运动的幼年期起过作用的各自单独行动的做法，到了工人运动的成年期便成为致命伤了。让各行各业都来参加吧，我们需要它们的帮助。不要把工人阶级的事业委托给某一个工厂，某一个城市，甚至某一个地区，应该把它委托给工人的议会。”^①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1 月
29 日

载于 1853 年 12 月 12 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 394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① 约·本生《曼彻斯特的一次重要的大会》，见 1853 年 11 月 26 日《人民报》第 82 期。——编者注

弗·恩格斯

*有关俄土战争的几个情况³²⁸

可容 2 万人的营地。

土耳其的兵力 3 个步兵营 = 2 400, 后增 1 个营。2 个近卫连 = 160。

2 个狙击连 = 200。总计步兵 3 560 人。

6 门火炮和 150 名骑警。岛上布署 10 门重炮。在图尔图凯有 22 门火炮。(重炮布署在舒姆拉的前方。)

俄国人(根据奥美尔帕沙的报告)有 20 个步兵营, 3 个骑兵团, 1 个哥萨克团。16 门骑炮兵火炮、16 门步炮兵火炮。从发现大炮前车而得到证实。中央 12 个步兵营组成 3 个强攻纵队——右翼 6 个营, 外加 1 个营。两次从中央发起进攻, 一次从俄军右翼。从中央发起的进攻大多被岛上和图尔图凯的火力所歼; 俄国人几乎推进到战壕前。

舍夫卡捷尔(圣尼古拉)要塞遭到俄国人 5 次进攻, 未下。

1 艘俄国轮船在舍夫卡捷尔要塞或巴统附近搁浅, 1 500 人葬身海底。叶尼卡尔号轮船在雅尔塔(塞瓦斯托波尔)附近

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触礁沉没。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12 月
1 日前后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84 年历史考证
版第 1 部分第 12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多瑙河战争³²⁹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①，土军自奥尔泰尼察的退却，看来标志着俄土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随着这次退却，至少是从卡拉法特附近渡河开始的一系列独特的初期战斗行动看来已经结束；此后，双方不是平静地留在冬季营地，就是执行新的尚未展开的计划。因此，现在似乎已是评论到目前为止的战局的适当时机，尤其是因为刚刚获得了关于多瑙河上唯一的一次重大行动——俄军对土军奥尔泰尼察桥头堡的攻击——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报告。

10月28日，部署在维丁的土军渡过多瑙河，攻占了卡拉法特。土军在攻占这一地点时，除了与兵力不大的侦察队的小战斗以外，大概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因为正当俄军准备在克拉约瓦集中大量兵力进攻卡拉法特时，传来了使他们不安的消息：土军在另一方向作更有威胁性的推进，11月2日在奥尔泰尼察附近渡过多瑙河，严重地威胁着俄军的交通线。同时，土军还在维丁至奥尔泰尼察的多瑙河一线进行了一连串佯攻和次要攻击，不过这些攻击有的因俄军预有防

^① 恩格斯可能指载于1853年12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土耳其战争的进程》一文，见本卷第550—556页。——编者注

范而未能得手,有的则因兵力过少而未能迷惑俄军,使其行动发生严重错误。

因此,卡拉法特的土军没有受到任何惊扰,他们陆续得到了援军的补充,据报道兵力已增加到将近 24 000 人。但这些土军既没有向前推进,也没有受到袭击,所以我们可以暂时不去注意他们。

根据奥美尔帕沙的报告^①,土军在奥尔泰尼察渡河的情况如下:奥尔泰尼察是阿尔杰什河与多瑙河汇合点附近的一个村庄。在多瑙河上与阿尔杰什河口相对的地方有一个岛,在高达 600—700 英尺的陡峭的多瑙河南岸,是图尔图凯村和要塞,这个要塞就建筑在这个高耸的河岸的顶端。因此设在图尔图凯的火炮可以最有效地支援在该处渡河的任何部队。11 月 1 日,土军渡到多瑙河中的那个岛上,并于一夜之间修起了坚固的战壕。11 月 2 日,土军又从岛上渡到阿尔杰什河以东,登上了瓦拉几亚的河岸。乘船渡到瓦拉几亚的有两个营,配有 100 名骑兵和两门火炮。土军在图尔图凯的火炮进行了几次齐射,迫使俄军前哨放弃了离河岸不远的医院建筑物,于是土军马上攻占了这个以后给他们带来很大益处的建筑物。这个有拱形墙的厚实的建筑物几乎不要什么加修就具备了内堡(最常用的野战筑城工事)的一切优点。土军立即开始在阿尔杰什河和多瑙河之间挖掘战壕。经常约有 400 人参加这一作业,篮筐和束柴都是预先准备好的。根据我们得到的全部报道,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这些战壕已形成一道绵亘的防线,完全切断了从俄军阵地通往土军登陆地点的所有通路。虽然形成绵亘的战壕线的工事早被人们否定,被认为没有用处,但是,由于这些战壕具有桥头堡那样的特殊作用,由于

^① 1853 年 12 月 1 日《泰晤士报》第 21600 号。——编者注

土军找到了现成的坚固的内堡,由于土军工兵不足以及与土军特点有关的其他情况,所以采用这种过时的工事体系可能仍然是适当的。土军在阿尔杰什河找到了一些船只,马上用来同原有的船只一起在多瑙河上架桥。这些作业于11月4日早晨几乎全部结束。

可见,土军在奥尔泰尼察就有多瑙河北岸的一个桥头堡。土军没有渡河,而且直到目前也没有这样做。但是,他们在多瑙河北岸已有了一个可靠的登陆场,一俟在图尔图凯集中了足够的兵力就马上可以加以利用。此外,土军有可能占领阿尔杰什河的西岸或东岸,而且他们在该河附近的一切行动,都可得到配置在图尔图凯高地的10门重炮的掩护。由于火炮阵地很高,这里的河面又狭窄,所以它们的射击范围至少可达到桥头堡半英里之外的地方。

据守桥头堡的兵力为3个基干营(2400人)、2个近卫连(160人)、2个狙击连(200人)、100名骑兵和配置在医院建筑物内的12门重炮的炮手。战壕线的右翼可得到图尔图凯的火炮纵射和侧射火力的掩护,此外,图尔图凯的火炮还可对桥头堡正前方的整个平地射击。与阿尔杰什河相接的左翼由设在岛上的一个炮队从翼侧掩护。不过这里有些地方灌木林密布,可以作俄军向前运动时的绝好掩护物。

根据奥美尔帕沙的报告,俄军于11月4日向土军防线攻击时,有20个步兵营、4个骑兵团和32门火炮,共计约有24000人。俄军的兵力部署大致如下:12个步兵营和14门火炮对付桥头堡的中央部分;2个步兵营和2门火炮配置在阿尔杰什河左边(从俄军方面看是右边)的树林里;梯次配置的6个步兵营连同4门火炮对付土军右翼;俄军战线向多瑙河方向延伸并由骑兵从翼侧支援。俄军在火炮进行了一定时间的射击后,先在中央组成了强攻纵队,而两翼则随后

跟进；然后，原来在距土军工事的胸墙约1 200码的阵地上射击的炮兵转移到霰弹的有效射程(600—700码)内，而强攻纵队则急速前进。正如可以预见的一样，距多瑙河最近的俄军左翼纵队，被土军在图尔图凯的火炮打散了；中路纵队也马上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靠阿尔杰什河的右翼纵队被岛上的火力消灭了，而且，看来，这个纵队的兵力本来就太弱，无法取得什么战果。攻击重复了两三次，但已经不像第一次那样奋勇齐心了，这以后，俄军停止了进攻。他们曾经勇敢地冲到土军战壕的边缘(当然不应过于按字面理解这一点)，但是土军火力猛烈，致使俄军无法转入白刃格斗。

在战斗中，奥美尔帕沙将正规军1个营派过了河，作为预备队。这就可以算出，土军投入战斗的共有3 600名步兵和44门重炮。

要弄清俄军的兵力不那么容易。奥美尔帕沙说俄军参加战斗的兵力为20个营，而在奥美尔帕沙军队中的两个英国军官则一致认为真正参加战斗的只有8 000人。这两种说法并不是完全矛盾的。俄军可能在战场上有20来个营的兵力，但是由于地形关系或轻敌的缘故，每次攻击时，强攻纵队的实有兵力可能都不超过8个营。有一个情况两位英国军官没有提到，但奥美尔帕沙谈到了，这就是俄军拥有庞大的预备队。所以俄军每作一次新的攻击都有从预备队调来的一个新的营走在前面。此外，在两位“女王陛下近卫军军官”的报道里，字里行间都表现出愚昧无知和盲目自信，这正是一切军队中享有特权的近卫军的下级军官所固有的特色。

所以，总的说来，我们认为奥美尔帕沙的报道是可信的。在整个作战期间俄军在该地的兵力可能有18—20个营，其中可能有10—12个营相继投入了战斗，因而，在每次攻击时向土军战壕同时推进而未获得成功的部队可能是6 000—8 000人。俄军的损失至少应

为 1 500—2 000 人,这也说明俄军可能投入战斗的兵力。俄军终于被击退了,500 支枪、大量弹药和大批军用物资落入土军之手,伤亡 800 人,而且有些部队退却时秩序紊乱。

如果研究一下双方在这次战斗中的战术,我们可以看出,令人惊讶的是俄军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遭到惨败是咎由自取。他们轻敌的程度是罕见的。他们所要攻击的是设有巨大内堡的相当坚固的阵地,这个内堡不仅可以得到岛上 10 门重炮从翼侧的支援,而且处在图尔图凯的 22 门火炮的射程以内(这些火炮还可控制阵地前面的地段)。土军共有 44 门(至少 38 门)火炮,而且全部或者几乎全部都是重炮。现在每个军官都知道,当向敌人野战筑城工事进攻时,首先,必须以自己的炮兵压制敌人可能用来支援野战筑城工事的火炮和炮队;然后,应当根据可能,破坏敌人的胸墙、围栅和其他障碍物;再后,应当将自己的炮队调到离所要攻击的工事更近的地点,以霰弹连续猛击敌人胸墙;最后,只有这时,才能决定派出强攻纵队向半遭破坏的工事和士气沮丧的守军进攻。为了做到这一点,火炮的数量和口径必须占决定性的优势。但是,我们看到俄军是怎样做的呢?他们用 12 门 12 磅炮和 20 门 6 磅炮进行了短时间的射击以后,就向在数量上和口径上占优势、技术上更占优势的炮兵掩护的桥头堡进行强攻了!俄军的这次射击可以说简直是形式,好像是对土军表示的一种礼节,因为这次射击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目的。此外,如果像所有报告一致肯定的,俄军的炮队果真曾接近到距桥头堡 650 码的地方,那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我们并没有听说有许多轻便火炮。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俄军的勇敢精神,他们在被敌人优势火力的猛烈射击击溃以前,虽然是在敌人火力下,而且可能还是第一次处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却仍然能够接近到距土军战壕线 50 码的地方。

至于土军,我们也不能特别称赞他们的战术。当俄军强攻时,奥美尔帕沙在桥头堡集中了不超过防守所需的兵力,这是很好的。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在图尔图凯所在的桥这头和沙洲上配置任何预备队,特别是骑兵预备队呢?为什么当俄军的败局已定,他没有立刻用骑兵攻击被击溃的敌人呢?最后,为什么他满足于精神上的战果,而忽视夺取全部战果从而决定整个战局的可能性呢?我们只能找出两个原因:第一、野战筑城中的绵亘防线体系使防御者在击退敌人的攻击后不容易实现坚决的进攻,因为绵亘的防线没有留下比较大的余地供大批军队突然猛烈出击之用;第二、奥美尔帕沙不是不相信自己军队在开阔地作战的能力,就是没有掌握足以扩张战果的兵力。

这使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与这一行动有关的战略问题。如果奥美尔帕沙把在卡拉法特无所事事的那些部队调到奥尔泰尼察,那么他的行动不是会更坚决些吗?为什么要把一支 12 000 人的部队连同人数与此相等的预备队派往卡拉法特,去威胁本该是俄军阵地中最适于迎击敌人攻击的地方呢?为什么这 24 000 人没有被调到土军能够获得决定性战果的地方呢?

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现在丝毫不必怀疑,俄军在 10 月底以前不可能在瓦拉几亚集中 50 000—55 000 人以上的兵力。如果考虑到道路缺少,地形横断交错,兵力分散不可避免,再考虑到每支作战部队通常可能遭受的损失,那么俄军在任何一个地点都绝对不可能一下子集中 3 万人以上的兵力。毫无疑问,土军如果能在瓦拉几亚任何一地集中 4 万人的兵力,都可能击溃俄军。可以肯定地说,土军如果想取得这样的结果,并且能够在适当的时刻采取适当的措施,那么就比较容易地集中这样多的兵力,甚至比这多一倍的兵力。但是,欧洲外交的干涉,土耳其帝国国务会议的犹豫不决,

土耳其对塞尔维亚政策的摇摆不定,以及其他类似的各种情况,看来使土耳其采取了一系列不彻底的措施,把奥美尔帕沙在军事行动开始前置于一种极为特殊的境地。他知道俄军的弱点,他自己掌握有在数量上大占优势而且急切求战的军队。但是他的军队被分散在长350英里、宽50—100英里的地区内。他在11月上半月的行动所受到的约束,是这种情况产生的必然后果。因此,在卡拉法特渡河,虽然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是个错误,但这时却有特殊必要了,因为维丁必然是集中了将近2万人的地点,如果不在卡拉法特渡河,这将近2万人的部队便可能因距主力太远而毫无作用。土军的这次渡河,至少可箝制俄军的部分兵力,而且还可鼓舞土军的士气。

在奥尔泰尼察附近的渡河,显然是打算作为一次主要突击,通过这次突击攻占布加勒斯特,并切断被卡拉法特战斗引向西面的俄军的退路,但是这次渡河毫无成果,看来,这是因为没有能够调集向布加勒斯特进军所必需的兵力。奥尔泰尼察会战对士气的鼓舞作用,自然是一大收获,但是土军获胜后9天之久毫无行动,最后又因雨季开始而主动退过多瑙河,这就起了另一种作用。这种毫无行动的表现和这一退却,虽然可能不会完全抵销土军士兵因胜利而受到的鼓舞,却会损害土耳其统帅的威望,而且可能远远超过其应受损害的程度。不过,即令造成这种情况的祸首是土耳其帝国国务会议,奥美尔帕沙也仍然难辞其咎。在多瑙河北岸呆了12天,占有桥梁和足以抗击俄军集中的兵力的桥头堡,拥有大量求战心切的部队,但是没有找出调动三四万人的办法,——的确,如果统帅没有一定的过失,这些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俄军可以庆幸自己得了救。俄军还从来没有只遭受这样少的物质损失就摆脱了严重程度甚至比这轻一半的窘境。俄军本来可能会溃不成军,但是他们却安然无恙。俄军是否还

会让这种对他们不利的情况重演,这是大可怀疑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12 月
1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12 月 1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5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土耳其战争。——工业的灾难³³⁰

1853年12月2日星期五于伦敦

从我写上一篇通讯以来,在土耳其没有再发生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但是俄国的外交——比它的军事才能更加危险的外交,又开始活动了起来;海峡两岸支持政府的报纸已相当明确地透露,当年曾最后把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¹⁵⁶稍加修改而加以认可作为结局的著名的1840年⁷和1841年的伦敦会议¹²²即将重演。《泰晤士报》甚至暗示,会采取“**坚决的缓靖措施**”,换句话说,自命为土耳其保护者的国家要采取某种**武力的缓靖手段来反对土耳其**。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个重大的、其含义不可能被误解的外交行动,——英国内阁最近把一项照会送往君士坦丁堡,由不列颠大使送交土耳其政府,但被11月14日的土耳其帝国国务会议拒绝。这项照会,不过是路西德帕沙对5月间缅施科夫公爵的最后通牒¹²⁴的答复的翻版。帕麦斯顿们和阿伯丁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向苏丹^①示意;不管局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土俄之间的关系从5月以来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西方外交界看来,

①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土耳其什么都没有赢得，俄国也什么都没有输掉。

由于塞尔维亚大公亚历山大不许土耳其军队通过他的领土，要求俄国总领事回到塞尔维亚，而且在他致苏丹的声明中把土耳其和俄国说成是两个对公国具有同等权利的保护国，所以土耳其和塞尔维亚之间很可能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如果发生在其他任何时候都很可能对土耳其有致命的危险，但现在却可能成为土耳其使自己免遭西方外交界毒手的唯一手段。无论发生什么事件，只要能够加剧目前的纠纷，迫使破产的奥地利放弃它那危险的中立，增大欧洲战争的可能性并迫使土耳其去同革命派结盟，那么这种事件必然会有利于土耳其，至少有利于它同俄国的冲突。当然，如果土耳其在欧洲的统治不作根本的改变，以抵销那些使土耳其衰落的内部因素，那么这些因素还是要继续起作用的。

现在让我们放下俄国人和土耳其人之间在多瑙河两公国进行的战争，来谈谈厂主和工人之间在英国各工业区激烈进行的战争。读者必定还记得，厂主曾经疯狂反对和百般诋毁工人争取缩短劳动时间的运动。而现在情况却改变了；正如我当时曾经预言的那样，厂主自己正在把缩短劳动时间的制度强加给工人^①。同盟歇业的真正意义已暴露出来，它是厂主所采取的一种财政措施，是一种医治“价格史”^②上从未有过的工业生产过剩的办法。从星期一起，罗森代尔区（伯恩利、贝克普、纽彻奇）、贝里区和阿什顿区（阿什顿、斯泰利布里

① 见本卷第484—488页。——编者注

② 暗指托·图克的著作《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793—1837年》1838年伦敦版第1—2卷、《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8和1839年》1840年伦敦版以及《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9—1847年》1848年伦敦版。——编者注

奇、格洛瑟普、海德、牛顿)的工厂都已恢复工作,但是每周只开工四天。博尔顿很快也会这样做。曼彻斯特正在考虑什么时候这样做,而不是要不要这样做。再过两三个星期,除了少数拥有有利条件的工业部门以外,将普遍实行这种缩短劳动时间的制度了。接下去,对继续反抗的普雷斯顿工人的援助自然就会停止。但即使每周开工四天,产量仍然会超过需求。不妨回忆一下:三个星期以前普雷斯顿的厂主们手里已经有相当于20个星期的产量的存货,而这批存货几乎无法销售。其实,工业危机已经不是将要开始的问题,它事实上已经到来了。

《泰晤士报》写道:“随着劳动时间的缩短,工人的工资已降低到最近工资增加以前的水平。”^①

《经济学家》杂志一时过于坦率,竟声称:“叫化子是不能提条件的,他只能人家给什么要什么。”^②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工人的罢工开始得为时过迟了;在空前繁荣所造成的有利条件已经消逝之后,从经济方面或者从罢工的直接目的方面来看,罢工都已不能成功。但是,罢工仍然起了自己的作用。它使工业无产阶级革命化;它同粮价高昂和劳动报酬低微这些刺激因素一起,到适当的时候将显示出政治后果。即使现在,关于工人议会的主张(这一主张实际上不过是号召所有的工人在宪章运动⁸⁰的旗帜下重新团结起来)就已经引起了中等阶级报刊的恐惧。

《经济学家》杂志说:“《人民报》的编辑厄内斯特·琼斯先生被看作是菲格斯·奥康瑞尔先生的后继者,正像奥康瑞尔先生曾是汉特先生的后继者一样

① 1853年11月30日《泰晤士报》第21599号。——编者注

② 1853年11月26日《经济学家》第535期。——编者注

……工人们追随汉特和奥康瑞尔的结果，除了沉重的打击和巨大的损失外一无所获，但是他们对这些大王的后继者仍然同样信任，他们现在把琼斯看作是自己的救星。”^①

读者可以从以下两段引文中看出，英国资产阶级报纸，例如受党动机驱使的《先驱晨报》，或者从帕麦斯顿这个厚颜无耻但颇有眼力的观察家那里获取灵感的《晨邮报》，也知道如何判断目前的情况，如何对待繁荣的鲁宾逊³³¹所说的那些粗俗的话。

“如果现在听一听他们的话，就会觉得，工厂主们简直被赋予了神一般的权威，帝国的安危全看是否让他们享有和法国皇帝^②差不多的权力……兰开夏郡6万名左右的工人现在饮食之差几乎不够活命，不过他们并没有抢劫或使用暴力的念头，尽管他们是生活在节俭的厂主完全不设警察来加以保护的城市中。不管他们对不对，这些人总都是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忠于他们的领袖的；像这样和平而又这样有成效的运动，还很难找出第二个来。”（《先驱晨报》）^③

“我们的经济学家曾一再吹嘘什么自由贸易将带来巨大的、我们梦想不到的福利；但是冬季已经来了，来年一回春瘟疫就要流行，现在正是我们的贫民迫切需要比平常好一点的食物和暖一点的衣服的时候，这样才能维持健康，更能抵御疾病；但是恰好在这个时候，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异乎寻常地高昂，简直是在要他们的命。那种要使全国人幸福的人间天堂不见踪影，而那种种预言物价永远低廉和产品永远丰富的说法看来也大可同那些在人民中散布的无数其他幻想归在一起，某些人正是用这些幻想欺骗我们的社会……英国社会是一个污秽的、害人的、不道德的、无知的、残酷的、狂乱的、怨声载道而生活非常困苦的社会。”^④

① 1853年11月26日《经济学家》第535期。——编者注

②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③ 《致〈先驱晨报〉编辑》。——编者注

④ 1853年11月17日《晨邮报》第24932号。——编者注

这是帕麦斯顿阁下的沙龙报纸、他的官方机关报《晨邮报》说的。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2 月
2 日

载于 1853 年 12 月 16 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 395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³³²

1853年12月9日星期五于伦敦

贵报读者对于联合内阁所要的各种外交手腕一直是密切注视的,因此帕麦斯顿们和阿伯丁们借口保护土耳其和保障欧洲和平而支持沙皇^①的任何新尝试都不会使他们感到奇怪,甚至重开维也纳会议^②或伦敦会议也完全不会使他们感到突然。上星期五,首都的证券交易所首先从《纪事晨报》^③上获悉,英国已成功地说服了奥地利和普鲁士支持西方列强再一次调停交战双方的尝试。随后,《晨邮报》也发表了关于“这一尝试”的消息,并且宽慰人心地宣称:

“这次尝试力求取得并且已经取得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合作,四强国签订了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四国无条件地承担义务保持现时的欧洲领土划分,对交战强国则邀请它们通过召开欧洲会议的办法友好地解决他们的争端。按照这个四强国协定将要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判明土耳其的观点,弄清楚它在哪些基本条件下同意进行解决东方冲突的谈判。在弄清楚这一点以后,四强国将请俄国表示它对于进行上述谈判的基本条件的观点,然后将要求这两个强国派全权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② 1853年12月2日《纪事晨报》第27127号。——编者注

代表出席大国会议，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待以后另行确定……沙皇的尊严将予以保全，土耳其的利益也将得到完全的保障，办法是：第一，土耳其和俄国签订友好和睦和通商条约，规定两国在对方领土上的臣民受到应有的保护；第二，苏丹①和五强国签订一项条约——一项类似1841年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协定的条约¹²²，这项条约规定苏丹必须尊重多瑙河两公国和塞尔维亚的现行宪法和特权，而且还承担保护其领土范围内的基督教的特殊义务，就像凯纳吉条约中所规定的那样，不过这次是对欧洲承担义务，而不是对俄国。”②

最后，印刷所广场的雷神③说话了，他在第一版④上宣布，四强国已经最后缔结了同盟，并且已经拟定了在必要时“强迫”俄国和土耳其政府“接受”的条件。有价证券马上上涨。但是，证券交易人的好景不常，因为，同一家《泰晤士报》在第二版上报道，四强国确实起草了议定书，制定了联合照会草案，但是，它们却没有承担强迫任何人接受这个照会的义务。有价证券又跌了下来。“惊人的消息”最后变成了关于已故的维也纳会议的尸体——谈它的精神是荒谬的——复活的老话，同时，有一封电讯也证实了上述的消息：

“12月6日维也纳四强国会议已向君士坦丁堡提出了以新草案为基础的另一个关于处理悬而未决的争端的建议；即使敌对行动不停止，关于议和的谈判也要继续进行。”⑤

在战争就要爆发的前夕，维也纳会议——这位事后作预言的皮蒂娅——刚刚建议土耳其接受缅施科夫公爵的最后通牒。在俄国初

①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② 1853年12月6日《晨邮报》第24948号，引用时稍有改动。——编者注

③ 指《泰晤士报》。——编者注

④ 1853年12月6日《泰晤士报》第21604号。——编者注

⑤ 1853年12月7日《晨邮报》第24949号。——编者注

战失利以后，英国和法国接受了路西德帕沙给缅施科夫公爵最后通牒的答复的立场。现在他们的倒退运动将达到先前交涉中的什么阶段，这无法预言。《奥格斯堡报》宣称，会议的新建议反映了四强国“防止战争”的愿望。^①这确实是惊人的新闻！

不管这一切外交清谈在现状已被战争状态取代的时刻显得多么空洞，我们都不应该忘记，这些召开各种会议的幻想的方案，透露了不列颠内阁的隐秘的意图；支持政府的报纸正在试探内阁能够走出多远；今天的无根据的谣传已经不止一次地预示了明天发生的事件。有一点可以肯定：英国已经提出缔结四国同盟，以强迫土耳其接受四强国将作出的各项决定，即使奥地利不同意也要这样做。即使同盟没有缔结，那么，四强国至少已经签订了“议定书”，规定了进行谈判的原则。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俄国军队占领了两公国并开到保加利亚边境以前一直阻止土耳其行动的维也纳会议，已经复会了，并且已给苏丹发出了新的照会。从召开一次维也纳会议到召开一次伦敦的欧洲会议仅有一步之遥，这一点在1839年穆罕默德-阿里起义时期就已经证明了。如果在俄国进行反土战争的同时召开进行“绥靖”的会议，那么这种会议只能是1827—1829年伦敦会议的重复，而那次会议的结果是土耳其舰队在纳瓦里诺被消灭³²，土耳其因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⁴¹而丧失独立。支持政府的报纸已明白地指出了不列颠内阁提出、其他强国同意的进行谈判的基础是什么。这就是保持“现时的欧洲领土划分”。如果把所提出的建议看作是简单地回到维也纳和约的条款上去，那就大错了。波兰王国被消灭，多瑙河河口落入俄国之手，克拉科夫被合并，匈牙利成为奥地利的一个省——所有

^① 1853年12月3日《总汇报》第337号。——编者注

这些“领土调整”从来没有经任何一个欧洲会议批准过。因此，批准现时的“欧洲领土划分”并不单纯是让土耳其参加维也纳条约，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而更主要的是批准俄国和奥地利从1830年起对这个条约所进行的所有破坏。“俄国和土耳其签订友好和睦和通商条约”——我们在库楚克-凯纳吉条约⁸⁹、阿德里安堡条约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¹⁵⁶的序言中都见过与此完全相同的词句。帕麦斯顿的报纸^①宣布，这是“一项类似1841年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协定的条约”。的确如此。这是一项类似曾经对欧洲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并把攸克辛海变成一个俄国内湖的协定的条约。然而，《泰晤士报》说，为什么我们不坚持把军舰自由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和多瑙河航行自由作为条件呢？但是读一读帕麦斯顿勋爵1839年9月间给当时的驻巴黎代办布尔沃先生的信³³³，我们就会看出，那时也曾抱有类似的希望。

“苏丹必须尊重两公国和塞尔维亚的现行宪法。”但是，要知道，根据现行宪法，这些省份的统治权是由沙皇和苏丹分享的，而这些宪法直到现在从来未被任何一个欧洲会议承认。所以，这次新的会议会使俄国对土耳其各省的事实上的保护权得到欧洲的正式认可。在这种情况下，苏丹将不是对沙皇，而是对欧洲承担保护“其领土范围内的基督教”的义务。这就是说，外国列强在苏丹和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间进行干预的权利将成为欧洲国际法的一个段落，并且，一旦发生任何新的冲突，根据条约欧洲就必须支持俄国的无理要求，俄国作为这个条约的参加国，将有权按它自己的意思解释苏丹领土上的基督徒关于要求保护的申请。由此可见，联合内阁拟定并经它的各家报

① 《晨邮报》。——编者注

纸加以阐述的新条约，乃是欧洲对俄国的一个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广泛的投降计划，乃是一举而批准 1830 年以后历次反革命所造成的一切变化。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对奥地利政策上的改变，即《晨邮报》装腔作势地呼之为“最近十天来突然发生的”改变而欣喜若狂和表示惊讶。至于波拿巴，那么，不管他暗藏着什么意图，反正能利用土耳其作阶梯爬到老的正统列强的天堂中去，当前对于这个暴发户皇帝总是一件称心如意的事情。

联合内阁的观点在支持政府的周报《卫报》上清楚地表述出来了：

“以为俄军在奥尔泰尼察战壕附近被击退，在黑海又有几个堡垒被拿下，就把俄国当作一个被打败了的对手来看待，就认为我们卡住了它的脖子，——这简直是可笑的。这些不大的损失本身只会进一步触发它的骄横之气，只能使它不争到更好的条件就不进行谈判而已。然而，君主们同其他的人们一样，也受各种不同的意念支配。沙皇是个骄傲、激烈的人，但是他也很有谨慎、精明。他卷进了一场他可能会输而不可能赢的争端中。他的政策就是他的先辈们的政策，而他的先辈们到处用战争威胁的办法获得了比真正进行战争更多的好处，同时，他们所坚定不移地奉行的侵略体系也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特点，这使他们能够避免大的失败，甚至能够从小的挫折中取得好处。四强国预先决定欧洲的领土分配不应该作出或不应该容许任何改变，看来，就是以对沙皇的立场及其政策的特点的**这一明智的看法**为根据的。认为沙皇已经被英国踩在脚下的人，或者受了**保护关税派的报纸的胡说八道的欺骗**的人，将会因此而大失所望。但是，当前的问题不是**要羞辱俄国**，而是要**绥靖欧洲**（当然是根据俄国所说的意思），是要尽可能确立法国士兵大使^①以他主子的名番向苏丹担保的持久和平。**即将签订的条约**——这是可以确信不疑的——将不是简单地恢复现状，而是尝试至少在某种固定的基础上来调整土耳其同欧洲的关系以及土耳其政府同它的基督教臣民的关系，这是一种尝试，因为任何保全欧洲的土耳其帝国的协定，

^① 阿·巴拉盖·狄利埃。——编者注

不管它能多么持久,从基础上来说,总是暂时的。可是,这种暂时的协定现在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是必要的。”^①

可见,各强国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帮助沙皇“从小的挫折中取得好处”和不容许“保全欧洲的土耳其帝国”。不言而喻,既然暂时的协定“现在是可以实现的”,它就将有助于实现这个最终结果。

可是,某些情况出人意料地打乱了联合内阁的政客们的算盘。土耳其在黑海沿岸和格鲁吉亚边境获得了新胜利的消息传来。另一方面,有人又言之凿凿地说,波兰境内的全部军队都接到了开往普鲁特河的命令,而发自波兰边境的消息只说是:“上月23日深夜宣布了‘布朗卡’(即征兵),那些以前只征一两名的地方,现在征了八至十名。”这至少证明沙皇不太相信四强国和事佬的天才。奥地利正式声明,“四国宫廷之间没有缔结任何同盟”,这证明,奥地利方面虽然很想把条件强加于土耳其,但是甚至做一做样子,表示要强迫沙皇服从为他的利益着想而拟定出来的条件都不敢。最后,苏丹给法国大使的复照宣称,“如果俄国不完全放弃它所提出的无理要求,如果不立即撤出两公国,现在签订和解协定是根本不能接受的”,这就像晴天霹雳一样使那些靠会议为生的政客们大吃一惊,而老奸巨滑、饱经世故的帕麦斯顿的机关报现在毫不掩饰地向其他的同伙报道了下面一点儿真相:

“俄国不可能同意立即撤出两公国和完全放弃一切要求而又无损于自己的尊严和威望,认为如此堂堂大国不经决死之争就同意这样做,是愚蠢的。因此,很遗憾,我们只能预言目前这种举行谈判的尝试会归于失败。”^②

① 1853年12月7日《卫报》第418号。——编者注

② 1853年12月8日《晨邮报》第24950号。——编者注

吃了败仗的俄国根本不能接受谈判的建议，因而当务之急是要使战争的天平垂向俄国这一方面。但是不让俄国赢得时间又怎样实现这一点呢？俄国唯一的需要是拖延，是有足够的时间来征募新的军队，在全国部署好，集中军队，停止同土耳其的战争，先来收拾高加索的山民。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成功的希望就能增加，举行谈判的尝试就“可能成功，因为俄国成了胜利者，而不是战败者”。因此，据维也纳《东德意志邮报》和支持政府的《纪事晨报》报道，英国才极力劝说土耳其同意停战三个月。^①雷德克利夫勋爵同苏丹进行了五小时的会谈，目的是取得苏丹陛下对停战的同意（苏丹的大臣们曾反对停战），结果是召开了紧急的大臣会议来研究这个问题。土耳其政府最终拒绝了同意停战，而且它不能同意，除非它公开背叛土耳其人民。

今天的《泰晤士报》指出：“在目前的情势下，要使土耳其政府温和克制，适可而止，是不容易的。”^②

土耳其政府太过分了，不懂得沙皇吃败仗是同他的尊严不相容的，因此，土耳其政府应该让沙皇有三个月的停战，以便将土耳其的胜利化为乌有，帮助沙皇重新成为胜利者和“宽宏大量的人”。促成三个月停战的希望并没有完全放弃。

《泰晤士报》写道：“也许，停战的建议由四强国提出结果会比较好些。”^②

好心肠的《晨报》断言：

“很难设想这些报道是准确的”，因为“即使是最大胆设想的人，也不会想到会有这样明目张胆地试图把土耳其的事业出卖给沙皇的事情，或者说，会有这

^① 1853年12月7日《纪事晨报》第27131号。——编者注

^② 1853年12月9日《泰晤士报》第21607号。——编者注

样合乎这个目的的尝试。”^①

激进派的《晨报》对帕麦斯顿“知荣誉守信用”的相信和它对英国外交史的无知，看来都达于极点。既然这家报纸为有执照的小酒店主的联合会所有，我怀疑这些小酒店主本人是不是常常为它写社论。

当英国在君士坦丁堡和维也纳这样忙着充当俄国的保镖的时候，我们且来看一看另一方面俄国是怎样在英国办理自己的事情的。

我在以前的一篇通讯中已经向贵报读者报道，正当联合内阁装出一副在黑海威胁着俄国的样子的时候，俄国军舰的两艘巡航舰——阿芙乐尔号和纳瓦里诺号却在朴次茅斯皇家造船厂进行检修。上星期六^②我们从《先驱晨报》和《每日新闻》上获悉：有六名水兵从俄国阿芙乐尔号巡航舰上逃跑了，他们在即将到达吉尔福德时被俄国巡航舰阿芙乐尔号的一名军官和英国警局的巡官扣住，送回朴次茅斯，交到了胜利号船上，这是一艘英国船，阿芙乐尔号的全体船员在该舰进行检修期间被安置在这艘船上。被押回的水兵在这里遭到残酷的体罚，并且戴上了镣铐。当这件事在伦敦传开时，某些先生通过律师查理·罗纳兹先生的帮助得到了一份下达给海军少将马丁和其他几位英国海军军官以及俄国阿芙乐尔号巡航舰舰长的人身保护令，该指令要求他们将六名水兵送交英国高等法院首席法官。英国造船厂当局拒绝执行这个指令，英国船长请示海军中将，海军中将请示海军上将，而海军上将认为有必要请示海军大臣、有名的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此人十年前在邦迪埃拉事件中曾命令不列颠邮政

① 1853年12月8日《晨报》第19489号。——编者注

② 即12月3日。——编者注

机关为梅特涅效劳³³⁴。至于俄国舰长,尽管女王^①的指令在英国胜利号船上递交给了他,指令内容也由翻译准确地告诉了他,他却轻蔑地把它扔到船舱外,而当它从舷窗再被塞进来时,又被扔了出去。俄国舰长说:“假使指令的确是女王陛下下发的,那就应该送交我国大使或领事。”由于领事不在,副领事拒绝过问此事。12月6日,一份新的指令下达给朴次茅斯海军当局,新指令命令朴次茅斯海军当局不仅把上述六名水兵,而且把俄国舰长交送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海军部没有执行指令,反而尽一切努力使该舰能够出港,驶往海上。几天前,阿美乐尔号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置人身保护令于不顾,由伊斯尔梅捷夫舰长指挥驶往太平洋。同时,我们从昨天的《每日新闻》获悉:

“俄国纳瓦里诺号轻巡航舰仍在船坞中进行全面检修。许多船舶修造工人都在舰上干活。”^②

现在,请注意支持政府的报纸是怎样报道这件“令人吃惊的”事情的。

皮尔派的报纸《纪事晨报》完全保持缄默,因为他们的格雷厄姆在整个这件事情中是最丢脸的一个。首先打破缄默的是帕麦斯顿的《晨邮报》,因为它的勋爵是不会错过机会来显示自己把最伤脑筋的事情形容成引人入胜的故事的技能的。该报说:整个这件事情被夸大和渲染得太厉害了。它根据曾命令无情鞭打逃兵并把他们囚禁起来的俄国舰长的说法指出:

① 维多利亚。——编者注

② 1853年12月8日《每日新闻》第2356号。——编者注

“据六名逃兵本人的口供，他们开小差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受了他们在大街上认识的人的引诱。”^①

这些居然违背自己的意志和不顾俄国舰长的命令在朴次茅斯离船上岸的水兵们

“被灌得酩酊大醉，并被一辆轿式马车送往内地”；在那里，这些人“告诉逃兵们怎样到伦敦，并且给他们留下了几个人的地址，让他们到伦敦后去找”^①，然后就离开了逃兵们。

帕麦斯顿的报纸捏造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目的是要使公众相信，“逃兵们是自己到警察局投案的”，然而这篇谎话编造得太出格了，连《泰晤士报》也没有加以重复。《邮报》还大大地表示了一番义愤，它暗示，整个事件是一些波兰流亡者暗地里搞出来的，他们大概是想刺伤一下他们的慷慨的东道主帕麦斯顿勋爵的感情。

另一家支持政府的报纸《地球报》说：

“外国人只应执行本国外交使节发出的指示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否则英国港口的任何外国人都可以违反我们的法律，而且没有大使过问就不能追究他们的责任了。”^②

因此《地球报》的结论比较稳重，它指出：俄国舰长对向他送达人身保护令的官员的答复，“是不能令人完全满意的”。但是，在人类事务中追求完美的东西是枉然的。

《泰晤士报》大叫：“即使俄国舰长第二天早晨把他们（即被抓回来的六名水兵）统统在自己巡航舰的桁端上吊死，他也完全不受英国法律的限制。”^③

① 1853年12月6日《晨邮报》第24948号。——编者注

② 1853年12月7日《地球和旅行家》第17288号。——编者注

③ 1853年12月7日《泰晤士报》第21605号。——编者注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1840年俄国和大不列颠（在帕麦斯顿勋爵指导下）签订的航海条约里面有一条与此有关的规定：

“缔约双方的领事、副领事和商务代办在驻在国捉拿本国军舰或商船上的逃犯时，应得到地方当局的法律所许可的帮助。”^①

然而，可爱的《泰晤士报》，问题正是在于，英国当局按照法律应当给予俄国舰长什么样的帮助。谈到“在政治危机时期把自己的舰船开到英国修理”的俄国当局本身，《泰晤士报》认为它这样做是“最不客气和最不得体的表现”，因此，“这些舰船上的军官在这里都被列在间谍一类”。但是，《泰晤士报》声称，“不列颠政府对这种政策所能表示的最强烈的鄙视”，不过是让俄国间谍进入皇家造船厂（尽管这会引来公众的某些不满），把不列颠军舰交给他们支配，用不列颠人民的钱为他们雇船舶修造工人，并且，在他们践踏了英国法律后溜走的时候，对他们鸣礼炮欢送。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2月
9日

载于1853年12月26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3960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① 1853年12月7日《泰晤士报》第21605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

俄国的胜利。——英国和 法国的地位³³⁵

1853年12月13日星期二于伦敦

“使土耳其苏丹吃惊的是，尽管黑海驻有法国和英国舰队，一艘土耳其军舰还是被俄国军舰劫走而未受惩罚。春天将给苏丹带来更甚的意外。”^①

这是《新闻报》在上星期六写的。但是，没有等到春天，接下来的星期一就带来了“更甚的意外”。本月5日俄国发自敖德萨的电讯说，俄国舰队在黑海的锡诺普附近击败了一支土耳其的分舰队。³³⁶这个消息随后为法国的《通报》所证实。^②虽然我们还不了解这一事件的详情细节，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俄国的报道把事情过分夸大了；只不过是一批土耳其的巡航舰和载有军队、粮秣、弹药和武器到巴统去的若干运输船只遭到了突然袭击；俄国的兵力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土耳其的兵力，尽管如此，土军还是在进行了一个钟头的殊死战

① 1853年12月19日《新闻报》第32期。——编者注

② 指发表于1853年12月12日《泰晤士报》第21609号的报道。——编者注

斗以后才屈服的。

一个英国人写道，“我们的舰队在那里无论如何不是为了阻止俄国人袭击土耳其。舰队在那里不是为了妨碍俄国人为他们的军队和武器运往高加索护航。舰队在那里不是为了防止黑海变成俄国的内湖。舰队在那里不是为了帮助我们的盟国或是把它从危亡中拯救出来，舰队在那里不是为了预防难忘的纳瓦里诺事件³²重演……我们认为，俄国的海军将领们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大炮射程以内进行军事演习，而英国舰队将像阿伯丁勋爵本人一样继续按兵不动。人民会长久地让这种代价高昂的滑稽剧演下去吗？”^①

联合内阁感到恼怒的是，沙皇在海面上而不是在陆地上打败了土耳其人。内阁希望俄国人在陆上取胜。俄国在海上的胜利可能危及内阁的地位，而且这恰好是发生在布奥尔伯爵要苏丹^②相信沙皇只要防御以及雷德克利夫勋爵竭力劝说苏丹休战三个月的时候。看一看联合内阁的几家出版物怎样分担安抚公众的任务，是十分有趣的。

《泰晤士报》作为整个内阁的代表，表达了内阁对于沙皇的忘恩负义行为的一致愤慨，甚至敢于发表某些威胁之词。

不言而喻，《晨报》更是气势汹汹，它还向读者暗示：要是帕麦斯顿勋爵当首相，或者哪怕是当外交大臣，锡诺普的“不幸”事件是怎么也不会发生的。

《邮报》宣称：“无论如何很明显，派往土耳其海岸作战的俄国海军是能够给土耳其政府的本钱以突然的沉重打击的，而且恰恰是在帝国国务会议有充分理由期待盟国曾公开答应（如果的确意味着某种实际的东西，而不是吹牛）给它提

① 阿·理查兹《新的纳瓦里诺会战》，见1853年12月13日《晨报》第19493号。“一个英国人”是理查兹的笔名。——编者注

②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供帮助可望真正具有价值和生效的地方。在多瑙河两公国已经在‘物质保证’³³⁷的名义下演出过外交喜剧，如果以为黑海是演出新的一幕的合适舞台，那么我们觉得，这样说恐怕没有根据。总之，可以认为，俄国人已经不再把他们的立场虚伪地描绘成防御性的了。使人不得不深以为憾的是，我们的（应读作阿伯丁的）绥靖政策已经走得太远了，已经使我们的盟国遭受沉重的损失，并给我们自己招来理所当然的责难。如果由于我们专门派去进行援助的舰队没有及时进行援助而再次发生这种不幸事件，那将是一种长久受到谴责的丑行。”^①

善于思考的《纪事晨报》，皮尔派的主要报纸，认为

“那个破坏了世界和平的大国现在会倾向于默然同意停战，这不是不可能的”^②。

尼古拉皇帝借口“他不愿意违背”施梯尔贝和吉卡两位国君要放弃对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治理权这种“自动表示的愿望”，11月8日下诏把他们的职权转交给冯·布德贝格将军，可是布德贝格将军要受哥尔查科夫公爵的最高监督。

英国竭力劝说土耳其停火，是在停火只会有助于沙皇赢得时间来集结军队和试图瓦解法英之间的正式同盟的时候；与此同时，尼古拉在进行反对波拿巴的阴谋，想把他推翻，代之以亨利五世；最后，莱奥波德国王、阿尔伯特亲王和奥尔良亲王们正在一起谈判波旁王朝两系的“合并”，关于这种“合并”，吹得十分厉害——这些情况迫使公众又把自己的视线投向温莎城堡，并且怀疑它同布鲁塞尔、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的宫廷暗中勾结。

贵族报纸《先驱晨报》说：“现在这一代英国人应当注意使他们国家的政策

① 1853年12月13日《晨邮报》第24954号。——编者注

② 1853年12月13日《纪事晨报》第27136号。——编者注

不为奥尔良派的复辟幻想、比利时对于被兼并的恐惧和德国的微小利益所左右。”^①

《劳埃德氏新闻周刊》暗示：“有一些内务部未加以监视的密谋家，这些密谋家的姓名在《泰晤士报》的‘宫廷新闻’栏上像寒夜的星星一样闪闪发光。他们不是住在圣约翰伍德，也不是住在切尔西。不，他们是在克莱尔蒙特的大厅里过着舒服得多的生活。³³⁸在这些密谋家中，有一位被尊称为奈穆尔公爵的女王陛下的常客，刚刚从他的英国私邸动身到弗罗斯多夫去修建一座桥——一座深渊上的桥，好让波旁家族的人能够从这座桥上回到法国去。毫无疑问，他回来以后又会到白金汉宫或温莎城堡去吃他的野味。”^②

《先驱》驻巴黎通讯员写道：“你们的大臣们是根据维多利亚的命令行事的。维多利亚女王所要的只是莱奥波德国王所要的东西。莱奥波德国王所想的又只是尼古拉皇帝所想的的东西。所以，尼古拉实际上是英国现在的国王。”^③

波拿巴现在所处的地位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危险，虽然乍看起来他成功的机会从来也没有现在这样好。他已经钻进欧洲王族的圈子里去了。他赢得了尼古拉丧失的威望。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了“可敬的”人物。曾经和俄国一起把他的伯父^④从宏伟的宝座上推翻下来的大国——英国，不得不和他公开结成反俄同盟。环境使他几乎成为欧洲的仲裁人。欧洲大战的前景，会造成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的起义，而这些国家的人民几乎只关心他们民族独立的恢复，他们不大计较他们得到的援助从何而来。看来，这些可能性将使十二月二日的英雄能够随意指挥这些国家的人民，如果他扮演国王之间的调解人的角色遭到失败的话。他的前辈们犯了大错误，因此他的政策在表面上看来甚至表现了民族力量，因为，他至少还能使一些大国

① 1853年12月7日《先驱晨报》第22335号。——编者注

② 1853年12月11日《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第577期。——编者注

③ 1853年12月10日《先驱》周刊第194期。——编者注

④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害怕，而他的前辈们——从临时政府起到立法议会的卫戍官们³³⁹止——却只会在一件事情和一切人面前发抖。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事情的反面吧。波旁王朝两系的合并，不管这种合并实质上有多少价值，它还是在伦敦和维也纳宫廷的庇护下，根据尼古拉皇帝的指示完成了。因此，这应当看作是反对波拿巴的神圣同盟的第一个行动。另一方面，这种合并使法国资产阶级各个政党暂时和解了，而正是这些政党的内讧妨碍了它们在1848—1851年去反对斯特拉斯堡和布洛涅的英雄²⁰⁴所完成的篡位阴谋。在卡诺先生家中开会的蓝色共和党人几乎一致决定，他们将支持正统派推翻波拿巴的任何尝试。看来，这些先生们断然决定了再走一下传统式的循环路线，即由复辟经过资产阶级君主政体再到共和国。对他们说来，共和国从来就只不过是意味着滚开，让我来占据你的位置；如果他们自己不能占据对手的位置，那么至少他们也要使对手遭到在他们看来是最严厉的惩罚——失去位置。谁将扮演什么角色，都已排定。将军、大臣、一切高级官吏都已任命。从这方面看，波拿巴面临着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武装暴乱即使不会导致波旁王朝的复辟，也可能成为总爆发的导火线。但是，总的说来，这个依靠着哥萨克支持的马莱密谋³⁴⁰并不比依靠着土耳其人支持的赖德律-罗兰密谋更危险。我要顺便指出，如果伦敦和泽西岛的所有法国流亡者举行集会的话，赖德律未必敢露面。属于社会主义政党各个不同派别的绝大多数法国流亡者已团结在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流亡者协会中，这是一个毫不掩饰地同赖德律的野心敌对的组织。据说，赖德律在法国农民中间还有一些威望，但是，政权只能在巴黎夺取，不能在各个省里夺取，而在巴黎，他将遇到他无法战胜的反抗。

波拿巴应该害怕的严重危险，是从完全不同的一个方面产生的

危险,那就是食品价格昂贵,商业停滞,帝国国库极度混乱,财源陷于枯竭。首先把波拿巴强加给法国的,是盲目相信“拿破仑”这个名字的魔力和斯特拉斯堡英雄的诱人诺言的农民。他们在饱受王朝复辟的蹂躏,为七月君主专制的投机所伤害,又被共和国强迫支付二月革命的花销之后,在他们心目中,恢复波拿巴王朝就等于恢复他们自己的最高权力。而现在,龙骑兵的讨伐,特别是饥饿,使农民幡然醒悟了。纵火的行动此刻正以空前的速度在法国蔓延。至于中等阶级,它曾经十分愚蠢地猜疑国民议会,认为国民议会由于各种派别倾轧和争吵,由于这些派别对执行机关一致采取反对立场,因而引起了1851年暂时的商业停滞。中等阶级不仅抛弃了它自己的代表,而且有意促成了政变,以恢复它所说的“正规的政府”,首先是“正常的实业生活”。现在它才发现,工业危机既不能用军事专制制度来防止,也不能因军事专制制度使国家信贷极度紧张,把它过分挥霍,并且使金融危机成为商业危机的必然伴侣而得到缓和。因此,中等阶级渴望着重新换一个最终能给他们以“正规的政府”和“正常的实业生活”的政权。至于无产者,他们从一开始就只把波拿巴看作是一种暂时的必要性,看作是哥萨克式的共和国³⁴¹的破坏者和一种替他们向秩序党²⁸¹报仇的工具。由于他们在12月2日以前被一系列的失败所削弱,而在1852年和1853年又整个地忙于自己的事情,他们需要时间来等待适当的时机到来,那时,共同性质的原因和其他一切阶级的普遍不满将使他们有可能重新从事他们的革命事业。

下面这个来自巴黎的商业报告透露了法国社会状况的某些真相:

“最近一个星期巴黎的商业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不算商店老板们订购的新年礼物的生产,以及成衣的缝制,商业看来已处于完全停滞状态。出

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各省的粮价昂贵,使居民群众无法像往常一样购买东西。小麦、栗子和葡萄在法国中部各省都歉收,所以为了购买粮食已经不得不作了许多牺牲的农民,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别的什么都不能买。外省的来信说,近日运到集市上售卖的大部分棉织品都找不到主顾,鲁昂的明显的商业停滞从这里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释了。现在全部出口货物只能运往南美各国。有消息说,法国货物充斥于纽约和新奥尔良市场,因此不能指望那些地方再来定货。往常以产品供应比利时和德国的商行几乎已全部歇业,它们的外国主顾完全不向它们定货了。只要到法兰西银行来贴现的商业期票的数量大为缩减,那就表明巴黎经济停滞,现在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十天以来粮食市场呆滞,粮价下跌,现在又显得活跃起来了,小麦拥有人对存货更具信心。面包坊主们对买进面粉表现出更大的兴趣,而东部省份的一些买主的出现,最终扼止住了价格的下跌趋势。由于巴黎的粮食经纪人无法完成他们在本星期三接到的定货,所以买主都到勒阿弗尔去了,因为那里早先曾经宣布每巴勒降价2法郎。在买主们到了那里以后,面粉价格马上从每巴勒44法郎上涨到47法郎,而每200公斤小麦由83法郎上涨到86法郎。类似的价格上涨情形在北部省的所有市场都发生了。在斯特拉斯堡粮食市场上有大量的粮食,小麦每百升降低1法郎;在里昂,市场不活跃,但价格没有下跌。巴黎黑麦又涨价了;曾有12000公担的燕麦按每100公斤22法郎9生丁的价格售出。本月2日马赛的一封来信称,11月1日至30日期间有341艘船装载804270百升小麦进港。连这些船在内,在近4个月中一共有714艘船向马赛运来了2102476百升的小麦。”^①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2月
13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3年12月27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3961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① 1853年12月10日《经济学家》杂志第537期。——编者注

卡·马克思

帕麦斯顿辞职³⁴²

阿非利加号轮船带来的最有趣而重要的新闻，就是作为阿伯丁勋爵领导下的联合内阁成员之一的帕麦斯顿勋爵辞职³⁴³的消息。这位不知羞耻、圆滑灵巧的策略专家使出了最巧妙的一招。那些作为内阁喉舌的伦敦报纸拼命设法使公众相信，这件事不是由东方问题上的困难引起的，而是因为做事一丝不苟的勋爵阁下作为不列颠宪法的忠实捍卫者不能同意实行议会改革，哪怕是极其细小的改革（细小是约翰·罗素勋爵这样的辉格党人的特点），所以只好辞去自己的职务。这正是帕麦斯顿勋爵屈尊向他的联合内阁同僚们讲述的正式的辞职理由。但是同时他又用尽一切办法，使公众产生完全不同的印象；所以不管官方报纸发表多少声明，人们仍然普遍认为改革法案只不过是一种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内阁对俄国的政策。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最近这次议会会议闭幕以来，所有维护他的报纸就都这样讲。它们以各种各样的调门和形形色色的手法演奏着同一个主题，把帕麦斯顿勋爵描绘成一个反对首相的影响、反对硬要他在东方问题这出戏中担任不体面角色而不得结果的好汉。关于内阁分裂为两大营垒的传说不断出现；竭力让英国公众作好准备，等着看仗义的子爵显示他那独特毅力的好戏。总之，喜剧早已排练就

绪，布景、道具也早已安排妥当，于是在幕后等候的勋爵阁下就以他那惊人的敏感选择了最适当的时机，使得一出台就产生轰动全场的效果。

帕麦斯顿勋爵与他的联合内阁的朋友们决裂恰好是在这样的时刻，奥地利热切地抓住了关于举行新谈判的建议；沙皇^①把他那阴谋和战争的罗网撒得越来越广，竭力挑起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之间的武装冲突，并且威胁塞尔维亚的执政的大公^②：他如果在这场冲突中坚持保守中立，就要被推下王座，土耳其人指望英法舰队出面相助，结果是一支分遣舰队被力量三倍于它的俄国舰队所消灭，5 000 名水兵遭杀戮；俄国舰长们被允许在英国港口和英国船舶上践踏英国法律；“纯洁无暇的女王”和她的“德国亲王丈夫”^③所策划的王室阴谋已经尽人皆知；最后，素来懒得动的不列颠人由于在国外民族自尊心遭到伤害，在国内为罢工、饥饿和商业停滞所苦而变得行动越来越带有威胁性，他们拿本国可怜政府作为唯一的报复对象。帕麦斯顿勋爵在这样的时刻引退，就可以把全部责任从自己身上推卸给他以前的同僚们去承担。他的这一行动成了一件全国性的大事。他马上就变成了代表着人民反对政府——他与之决裂的政府——的人物。他不仅挽救了自己的名声，而且使他的同僚们声名扫地以尽。既然现内阁不可避免的垮台看来是他一手造成的，那么他就成为将接替它的任何新内阁的当然成员。他不仅把命运已定的内阁抛开不管，而且还使这一内阁的继承者非接受自己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② 亚历山大一世·卡拉乔治维奇。——编者注

③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亲王。——编者注

不可。

帕麦斯顿勋爵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撤退，除了挽救自己的名声并且在新政府中稳占一个突出的地位以外，也是在直接为俄国效劳。俄国外交界早就在嘲笑联合内阁笨拙，波拿巴一直猜忌联合内阁对奥尔良王室和科堡王室所表示的同情，甚至君士坦丁堡方面也开始认识到它叛卖盟友、懦弱怕事的弱点了；而现在，就连它在国际领导机构中可能还保有的一点影响也要失去了。一个丧失了统一和名誉、不被朋友信任、不被敌人尊重的政府，一个被人看作处于瓦解前夜的纯粹暂时性的东西，一个甚至存在本身也开始被人怀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根本无力使大不列颠在欧洲列强中保持它应有的地位。帕麦斯顿勋爵的辞职使联合内阁以及英国本身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等于零；而对那位专制君主来说，英国的退出政治舞台哪怕是一两个星期所带来的好处，是比任何时候都大的。在大不列颠领导层中主和派对主战派占了上风。柏林的、巴黎的和维也纳的宫廷都必然会这样来解释帕麦斯顿勋爵的辞职，而且它们将强迫土耳其帝国国务会议接受这种解释，后者的自信心已经因俄国最近的胜利而动摇，它现在是在联合舰队的枪炮保护下开会。

不要忘记，自从帕麦斯顿勋爵成了联合内阁的成员以来，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政治活动就只限于插手制造轰动一时的火药阴谋案件^①，公然利用英国警察跟踪监视政治流亡者；发表演说，开玩笑似地把俄国给多瑙河的航行设下的障碍描绘成不值得注意的

^① 见本卷第95—99页。——编者注

问题^①；最后，在议会会议闭幕^②时所作的庄重的演说里要下院相信，政府在东方危机中的活动是无可指摘的，议员们可以安心地散会，因为大臣们仍然各守职位，同时他还担保“俄国皇帝知荣誉和守信用。”

除了上面列举的一般原因以外，帕麦斯顿勋爵所以要用这种爱国的自我牺牲行为使世人震惊，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已经被人们识破了。他身上的光彩已开始黯淡下去，他以前的所作所为已被公众知道。如果说，在帕麦斯顿公然参预推翻法兰西共和国的12月2日阴谋⁶⁶的时候，在他表演火药喜剧的时候，英国人民曾经受骗上当的话，那么，对勋爵阁下作过认真研究的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所进行的揭露就成了一副清醒剂。这位先生不久以前发表的著作《俄国的进展》，他在英国报刊上登载的许多文章，特别是他在一些反俄集会上发表的传遍整个王国的讲话，都给了帕麦斯顿勋爵的政治威信重重一击，这种打击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将显示出更大的力量。我们自己对恢复历史真实的事业所做的工作，对于英国人重新评价这位诡诈狡猾的政治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是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我们完全出乎意料地从伦敦得到消息说，塔克尔先生把大约两个月以前我们揭露勋爵阁下的真面目并撕下他那政治活动的假面具的那篇详尽的文章^③在伦敦翻印了5万份并且免费地散发了。社会舆论已经变得对勋爵阁下不利，所以他也许是想用现在这

① 亨·帕麦斯顿 1853年7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见本卷第207—208页。——编者注

② 1853年8月20日闭幕。——编者注

③ 指系列文章《帕麦斯顿勋爵》的第三篇。出版商塔克尔于1853年11月以《帕麦斯顿和俄国》为题在伦敦出版了单行本。——编者注

个手腕来躲开或者挡开对他进行谴责的怒潮。我们可以预言，这种手腕不会成功，他那漫长的官场生涯不久就将得到一个可耻的、倒霉的结局。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2 月

16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12 月 3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6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³⁴⁴

耽搁很久之后,我们终于得到了关于俄国正在大肆吹嘘并且已经得到慷慨奖赏的两次胜利的官方文件。^①当然,我们指的是俄军在锡诺普消灭土军分舰队的大海战和在阿哈尔齐赫附近的战斗^②。这些文件都是俄国的官方报告,但是土耳其的官方报纸对此保持缄默(如果有报道的话,那就应当比圣彼得堡的报道早到我们这里),这一情况使我们确信,土耳其政府没有任何好消息可以公布。因此,我们想根据我们现有的情报资料来分析一下上述事件,使读者了解真实情况。

锡诺普会战³³⁶是土军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的结果,所以会这样,只能说完全是由西方外交的恶意干涉或君士坦丁堡某些同法英大使馆有联系的集团暗中勾结俄国而造成的。11月,土耳其和

① 指1853年12月11日《圣彼得堡报》刊登的两篇俄国官方报道,一篇报道了锡诺普海战和阿哈尔齐赫附近的战斗的消息,另一篇报道了俄军官兵的受奖名单。英国多家报刊,如1853年12月23日《先驱晨报》第22349号转载了这两篇报道。——编者注

② 阿哈尔齐赫附近的战斗发生在1853年11月26日。——编者注

埃及的全部舰队都开到了黑海,想借此转移俄国海军将领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注意开往高加索沿岸给起义的山民输送武器弹药的远征队。舰队在大海里呆了18天连一艘俄国军舰也没有遇到。有一种说法是,俄国分舰队在这期间一直没有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因而土耳其派往高加索的远征队得以完成自己的任务。另一种说法是,俄国分舰队摸清了土军的计划,向东撤,对土军的运输船只进行一般的监视,结果土军的这些船只没有到达高加索沿岸便不得不折回锡诺普,同时主力舰队则重新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锡诺普分舰队的军舰上装有大量火药,其中有几艘在战斗开始阶段就因火药爆炸而被焚,看来,这证明后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土耳其的7艘巡航舰、2艘蒸汽舰、3艘轻巡航舰、1—2只小型舰船和几只运输船就这样被抛弃在锡诺普港湾内。锡诺普港湾无异于一个普通的暴露的停泊场,它是一个向黑海敞开的港口,保护它的只有几个疏于管理和修得不好的炮台,其中最好的炮台位于一座早在希腊皇帝时代欧洲可能还没有炮兵的时候修建的城堡内。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怎么会让装备有约300门大部分是小口径炮的分舰队听凭火炮威力比它大两倍的舰队摆布,并且是在距塞瓦斯托波尔很近而最易遭受俄军攻击的土耳其海岸的这样一个地点,而土耳其的主力舰队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平静的水面上怡然自得地游荡。我们知道,土耳其大本营对这一分舰队的危险处境非常关切并就这一点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我们也知道,土耳其、法国和英国的海军将领们曾在军事会议上大喊大叫地发表过各种互不相同的意见,一向爱管闲事的大使们也曾各自为此畅抒己见,然而,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与此同时,有消息说,一艘奥地利轮船曾向塞瓦斯托波尔报告了土军这一分舰队的位置。相反,俄国的官方消息却说,是纳希莫夫在

亚洲沿岸巡航时发现了这支分舰队,并且采取了进行攻击的措施。但是,如果说俄军发现了锡诺普的土军,那么土军必然会从城市的高塔和清真寺尖塔上更早得多地发现俄军。为什么土耳其的炮台把本来用几天工夫便可以大致部署就绪的战斗准备工作搞得这样糟呢?为什么土耳其的船只恰恰停泊在妨碍炮台射击的地方,而不把停泊场改在更能应付危难的地方呢?当时要这样做的话,时间是足够的,因为正如纳希莫夫海军上将所说,他在决定攻击前曾向塞瓦斯托波尔要过3艘三层甲板舰。显然,土军决不会从11月24日到30日不采取任何措施而白白错过6天的时间。土耳其塔伊夫号蒸汽舰逃往君士坦丁堡的报道充分地证明,土军遭到了突袭。^①因此,不能认为俄国的报道是确实的。

在纳希莫夫海军上将指挥下有3艘战列舰(其中1艘是三层甲板舰)、6艘巡航舰、几艘蒸汽舰和6—8只小型舰船。换句话说,这是一支在火炮数量上至少比土耳其分舰队多一倍的舰队。但是,纳希莫夫只是在得到3艘三层甲板舰的增援时才决定向土军发起攻击的,实际上仅仅这3艘三层甲板舰本该就够用了。他只是在兵力上占这样绝对的优势后才发动攻击。他利用浓雾,有的还说,他用了不列颠国旗才不受阻挠地接近到距土军舰队500码的地方,于是战斗开始了。俄军舰船不愿在航行中处于下风岸,便抛下了锚。接着在双方停泊中的舰队之间进行了4小时的炮战,没有进行任何海上机动,很像一场陆上炮战。由于俄军黑海舰队的水兵几乎都是“旱鸭子”,特别是其中波兰犹太人占绝大多数,在大海上与拥有优秀水兵的土耳其舰队作战很少有可能获胜,所以这次能够不采取任何海上

^① 1953年12月22日《总汇通报》第356号。——编者注

战术,不进行任何机动,对俄军是非常有利的。然而,俄军仍然用了4个小时才压制住占劣势的敌军舰队。此外,俄军还占有一种优势,即他们每发未命中目标的炮弹都会使岸防炮台或城市遭到破坏。而在敌人的舰队被压制住前很久,城市已几乎受到彻底破坏,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未命中的炮弹比命中的炮弹多得多。根据俄国的报道,只是土耳其人的居住区受到破坏,而希腊人的居住区则奇迹般地完好无损。但是这个报道是和另一份比较可靠的报道不一样的,后者说,全城已变成了一片废墟。

在战斗进程中,土军有3艘巡航舰被烧毁,有4艘在岸边搁浅后也与1艘蒸汽舰和几只小型舰船一起被烧毁。塔伊夫号蒸汽舰则割断了锚链,大胆地突破俄军封锁线,摆脱科尔尼洛夫海军上将指挥的3艘蒸汽舰的追击,逃到了君士坦丁堡。考虑到俄军舰只的海上机动不够灵活,土军舰船停泊在自己炮台前面的火线圈内而位置不利,特别是考虑到失败难以避免,因此只要风向许可,整个土耳其分舰队也许最好是起锚航行并倾全力向俄军攻击。这样做,虽然不可避免地要牺牲几艘舰船,但是至少可以把分舰队部分保存下来。当然,是否能进行这样的机动,决定的条件是风向;但是奥斯曼帕沙是否考虑到了这一步骤,这还是疑问。

锡诺普的胜利没有使俄军得到荣誉,而土军作战则空前骁勇,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没有一艘军舰投降。土耳其损失了它的宝贵的部分海军力量,俄军暂时控制了黑海,这种事件使土耳其人民和陆海军在精神上受到打击,——这一切完全是由于西方外交的“斡旋”,它阻止了土耳其舰队出海保卫或护送锡诺普分舰队返航。这同样地也由于俄军获得了秘密情报,因而使他们的攻击能够确有把握,万无一失。

俄国人所吹嘘的第二个胜利,是在亚美尼亚的阿哈尔齐赫战斗

中获得的。不久前土军在格鲁吉亚边境的进攻受阻。土军自占领舍夫卡捷尔即圣尼古拉之后,就没有攻占过任何一个重要地点,也没有取得过任何一次稍为持久的胜利。而这种情况是发生在这样的地区里:在这里,俄军不得不在难以想象的最不利的条件下作战,在这里,通往俄国的陆上交通线只有陷于起义的切尔克西亚人的包围圈中的两条,而海上交通线则很容易被切断或受到威胁;俄军所占领的以梯弗里斯为中心的南高加索边区,与其说是强大的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如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土军进攻受阻又当作何解释呢?土耳其人把这一情况归罪于阿卜迪帕沙的叛变,并已将他召回。可是非常奇怪的是,阿卜迪帕沙是土耳其在亚洲唯一对俄军取得过几次地方性的局部胜利的将领。但是可以指出土军的两个错误,来说明土军为什么在战役开始时没有得手并在不久之后便遭到了实际上的失败。土军把兵力分散展开在从巴统到巴亚泽特这条长长的战线上。没有一个地方有足够的兵力可以用来集中进攻梯弗里斯,尽管部分土军当时无可争议地和毫无作用地占领了埃里温城。在一个贫瘠的多山的地区,要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是困难的,但是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不让军队挨饿,这就是尽快集中全部物资和迅速运动。本来两个军就足够了:一个军掩护巴统和向沿岸地区攻击,另一个军通过库拉河谷直取梯弗里斯。但是土军一直在毫无必要地分散兵力,以致每个独立的部队都几乎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另一方面,土耳其舰队由于外交的干涉而没有采取行动,以致使俄国的两个步兵师(属第五军)得以在明格列利亚登陆,从而使沃龙佐夫公爵的高加索军队几乎增加了2万人。沃龙佐夫由于得到了这些援军,不仅能在沿岸地区挡住土军,而且还能满意地看到安德龙尼科夫将军的一个军解救被围困的阿哈尔齐赫要塞并在该城附近的开

阔地战斗中击败土军。俄国人说,他们在那里只用了约1万人,就把18000人的土耳其军队击溃了。这样的消息当然不能作为凭据,但是应当承认,在安纳托利亚土军中大部分是非正规部队,而且差不多都没有欧洲人担任军官,特别是担任高级指挥官和参谋军官,所以就使得土军在双方兵力相等的情况下仍弱于俄军。俄国人还说,他们缴获了10—12门火炮。这大概符合真实情况,因为在这一难以通行的地带,战败者不可避免地要丢掉大部分火炮。但是俄国人又承认,他们一共抓到了120名俘虏。这等于承认,他们在战场上几乎杀害了土军被迫丢下的全部伤员。此外,俄国的报道还证明,俄军对追击措施,至少是拦截部分退却敌军的措施,一定考虑得很差。俄军当时骑兵很多,如果大胆攻击逃敌,就可能截断整营整营的敌人的退路。然而至少根据现有的报道可以看出,这次会战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没有多大的意义。

俄军在多瑙河上除了重复战役开始时在默钦(布勒伊拉对面突出的峭壁上的一个要塞)的那些行动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看来,他们在那里收效甚微。现在我们根据可靠的材料,还可对土耳其集中在维丁的兵力进行更精确的计算。土军有34000名步兵,4000名骑兵,2000名炮兵和66门野炮,这里不包括维丁工事中的和卡拉法特多面堡中的重炮。因此,土军的4万兵力被耗费于占领由布加勒斯特直达塞尔维亚的道路。被箝制在他们所要防守的这样长的战线上的4万军队,如果用来抵抗大部队的进攻则嫌太少,而用来击退小部队的袭击却又过多。如果这4万人和已集结在舒姆拉的部队一起用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起双倍的作用。由于没有这些部队,再加上外交的干涉,土军在奥尔泰尼察的行动便遭到了失败。不能设想奥美尔帕沙会不知道,如果他能带10万人驻守在锡利

斯特里亚和鲁斯楚克之间,俄国人决不会试图派出足以重创土军的兵力在他面前通过和向塞尔维亚山区挺进。现在奥美尔帕沙军队的部署不可能符合他的想法,因此他一定对那些迫使他这样部署的邪恶势力感到非常恼火。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12 月
22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1 月 9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71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附 录

厄内斯特·琼斯

*一本“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的小册子³⁴⁵

我们的读者可能会记得我们就科隆案件揭露出的警方丑闻。马克思博士出版了一本题为《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他在书中揭露了从王国大臣到最低层的警探,包括驻伦敦大使馆在内的普鲁士政府官员的全部阴谋及腐败情况。这本小册子是由沙贝利茨先生在巴塞尔出版的。该书有2 000册在巴登边界被扣留,并在普鲁士政府要求下被烧掉。同时,官方对沙贝利茨先生提出起诉。外交大臣在给各地普鲁士当局的通告信中伪称小册子书名为《共产主义理论》,这一事实说明普鲁士政府多么害怕公众知道小册子的内容。这本小册子肯定会惹起普鲁士政府格外的憎恨,因为那个到处遭人唾骂、甚至为检察官所屏弃的伪证者施梯伯,已被论功行赏,委以主管柏林警察之重任。此人现在已是普鲁士国家的第三大势力。

厄·琼斯写于1853年3月24
日前后

载于1853年3月26日《人民
报》第47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约瑟夫·魏德迈

*欧洲的繁荣。——工人的
工资斗争。——波拿巴主义。
——普奥商约³⁴⁶

1853年4月12日于曼彻斯特

总是和繁荣时期同时出现的工人鼓动，在这里和在美国一样，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不同的只是：这里的人们远不像在美国那样满足于眼前的要求，他们意识到这些要求的不足，正在为进行一场更严肃的斗争而组织起来，随着繁荣的终止和危机的开始，这种斗争必然爆发。但是，提高工资的要求在这里却引起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尽管世界市场需求紧迫，商业活跃，但是许多工厂主却“缩短”工时，而以往这种现象仅仅在生产停滞时期才出现。

厄内斯特·琼斯就此事在他的《人民报》上这样写道：

“商业的活跃和向国外移民使工人过剩状况暂时得到缓解，这种情况以及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使有些地方的劳动阶级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这种缩短工时的做法成了人为制造工人过剩的手段，从而使不提高工资有情可原。或许这些棉纺大王真如大海一样高深莫测。”^①

① 1853年4月2日《人民报》第48期。——编者注

如果从这种局部限制劳动中得出投机减少的结论,那将是极其错误的。恰恰相反,特别是在棉纺织工业中,投机达到了几乎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而个别的棉纺织业(粗棉布,domestics)却处于完全衰落的状态。投机商们认为,仅仅在美国和法国有大规模的投机(用英国的金子修筑铁路),而在这里是分散的,可以说是小规模投机(但这样一来只能使投机热蔓延到一切商品上去),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过度投机。极不正常的冬季和同样不寻常的春季气候想必使谷物受到了损害。如果和往常一样,接着再来一个不正常的夏天,那收成就完全没有指望了。很可能目前的繁荣会维持到秋后。

同时,一年之内现在已是第三个英国内阁出丑了,而且这第三个内阁是最后一个能够没有激进资产阶级直接参与的内阁。辉格党⁶¹、托利党³、联合内阁派相继倒台都不是由于税收赤字,而是由于税收剩余。这就说明了旧政党的全部政策的特点,同时也说明了它们的极端无力。如果现在的内阁大臣们垮了台,那么如果不大大扩大法定的(即有投票权的)选民的范围,英国将无法治理;这种事情很可能在危机开始时发生。

令人厌烦的持久的繁荣使不幸的波拿巴几乎不能保持他的尊严;世界正感到厌烦,波拿巴也惹得世界厌烦起来。遗憾的是,他不能够每月重新结一次婚。这个骗子、酒鬼和赌棍会身败名裂,因为他不得不实行恩格尔的《王公明镜》,哪怕是为了装装样子。这个扮演“国父”的无赖!他的鼎盛时代已经过去,却没有成全任何伟大事业。而主要的事实是:他不单是出卖了自身;通过他,一切在他卵翼下的阶级,那些只懂得通过这位戏子和刺客的匕首来保住他们的至上的社会地位的“旧政党”都出卖了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甚至不能发动一次战争;只要他稍微动一动,就会遇到密集的队伍、林立的

刀枪。此外，安宁使农民得到了十分必要的时间来考虑这个曾经答应为农民的利益而捣毁巴黎的人，现在却用农民的钱装饰巴黎，抵押和赋税不是在减少而是日益增加，尽管人们在财政上实行种种试验，不仅波拿巴主义者，甚至像魏特林这样的社会主义者都期待这种试验能拯救世界。——尽管警察当局禁止人民公开发表意见（就像莫帕先生对2万名无产者参加拉斯拜尔夫人葬礼一事所做的那样），尽管警察当局把对书籍和小册子的传播置于它的特别监视之下，以防止“公民道德”受到不良影响，但是不干预政府本身的行动，他们仍然阻止不了这种从赤裸裸的事实中产生的学说的传播。如果说不这样就无计可施，那么至少有一种办法，这就是为下次革命铺平道路。

在普鲁士，政府由于征收**所得税**而引起了**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感**。好一个所得税和封建官僚政府！官僚们厚颜无耻地任意提高税额，这些舞文弄墨的贵人现在正在多么兴高采烈地到处打听一切商人的商业秘密和营业账目，这是每个有幸根据亲自观察认识这类普鲁士国家公仆的人所不难想象的。甚至地道的普鲁士商人也感到异常愤怒，他们现在不得不饱尝这个立宪宗法式的普鲁士“廉价”政府的种种好处。——普鲁士的**国债**在1848年以前大约是6700万塔勒，从那以后想必已经增加了三倍，而现在又在筹措新的借款！如果在这个肥胖的国王①归天以前保证能搞到这笔款子，他是一定愿意像在三月的日子②那样再流一次汗的。而且路易-拿破仑帮助他重新建立关税同盟。奥地利由于害怕战争而作了小小的让步，现在，主啊，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② 指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编者注

让你的仆人平安地走进坟墓吧!①

奥地利人正在尽一切可能使米兰起义²⁴前完全热中于贸易和繁荣(在赋税负担允许的限度内)的意大利重新行动起来。如果这一切再继续几个月,欧洲就会准备得很好,只等着危机来推动了。此外,从1849年初开始的空前的和长期的繁荣使疲惫不堪的各党派(只要它们还不像法国保皇党那样完全精疲力尽)能够比过去在1830年以后更快更多地恢复元气,那时,商业情况长期动荡,而且整个说来很不景气。再一点就是,在1848年,只有巴黎的无产阶级,以及后来的匈牙利和意大利,由于进行顽强的斗争而弄得疲惫不堪;六月革命以后法国的几次起义都几乎不值一提,它们最后只是摧毁了旧的保皇党。此外,在所有国家中,运动的结果都是很可笑的,除了巨大的历史讽刺和俄国军事力量的集中,就没有什么严肃的或重大的事情了。根据这一切,即使作最冷静的估计,目前的状况也不可能拖过1854年春季。

约·魏德迈写于1853年4月
26日前后—最迟5月1日
载于1853年5月4日《改革报》
第10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① 《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2章。——编者注

威廉·皮佩尔

*英镑、先令、便士，或阶级的 预算，和此预算为谁减轻负担³⁴⁷

格莱斯顿提出了自己的预算。我们都听说过两只公鸡在谷仓的地板上相互对叫。这同两位财政大臣——前任的和现任的①——在下院讲坛上的表现有点相似。不同的是，辉格党矮脚雄鸡借用了保守党火鸡的某些音调。在上个星期我们分析了格莱斯顿先生的财政计划中有关国债的那一部分，并指出，那是个拙劣的支吾蒙哄之作，只是给高利贷者、证券交易人和商人大开方便之门，使他们在做交易时又顺利又省钱。②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这个预算乃是阶级的预算，是由贵族执笔写出的中等阶级预算。首先，让我们把这件令人瞩目之事作一简略的介绍：

1. **关于支出和收入。**财政大臣宣称，本年度的国家支出将比去年的支出超出140万英镑！！一开始就弄出这样一个财政改革预算，真是前景美妙。支出增长的原因也同样令人鼓舞。

① 本·迪斯累里和威·格莱斯顿。——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2—68页。——编者注

这里包括：海军的支出增加 617 000 英镑，陆军和军需增加 9 万英镑，军械增加 616 000 英镑，民兵增加 23 万英镑。可是，作为开发民智之主力和保护知识之堡垒的教育事业却只增加了 10 万英镑。国家本年度总支出的估计数字定为 52 183 000 英镑。总收入的估计数字是 5 299 万英镑。收支相抵，盈余 807 000 英镑。然而，其中要扣除 10 万英镑用于邮船业务。总之，预期的实际盈余有 50 万英镑。

现在我们来谈

II. 财政方案。第一，这位财政大臣讲到所得税，对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不加区分。他提出，两年后，把所得税从每英镑 7 便士降低到 6 便士。然后，再过两年，从 6 便士降到 5 便士，此税率实行三年；在爱尔兰也开征所得税，并降低税额以便把每年 100 英镑的收入也纳入征税范围之内。他说，这“不会触及劳工阶层”。年收入在 100 英镑和 150 英镑之间的人，每英镑只纳税 5 便士。这样做的效果将是：减轻富有者的负担，而把富有者得到的轻松化为重负压到较不富者的头上。富商将交纳得少一些，而为了加以弥补，不富裕的商人要交纳过去不由他们直接交纳的税。这真是奇怪的公平！诚然，在四年之内，收入 100 英镑的人将比收入 150 英镑或 15 万英镑的人每英镑少交两便士。但是，过了这个期限之后，他们将交同样的税；而两年之后富人就享受到靠向较穷的人征税而实现的减税。我们关于征税的看法大大地倾向于累进税制，就是说，百分率随收入数额而提高。因为，5 万便士对年收入 1 万英镑的人说来比 500 便士对年收入 100 英镑的人说来要少。辉格党人的财政政策就是这样一回事：他们凭着一套貌似冠冕堂皇实则支吾蒙哄、转弯抹角的低劣手法，一点一点地但却实实在在地给富人减轻负担而给穷人增加负担。

至于说所得税不会影响到工人，那显然是无稽之谈，因为在我们目前这种雇主与雇工的社会制度下，中等阶级遇到增税时，总是用降低工资或提高价格的办法来使自己得到补偿的。

第二，这位财政大臣接着谈到遗产税。在这方面，他把女婿们和媳妇们的 10% 的“亲属”税减少到 7%——微不足道的小恩小惠！——把各种财产统统纳入课税范围以内，继承应课税的财产要依据终生收益课税。用这个办法，他使国家的税收增加了 200 万英镑，并且自诩在技术和工业同地产的矛盾中支持了前者。这一条倒是讲道理的，这是工商业的发展迫使地产垄断者作出的一个重大让步。我们再重复一遍：这是让步，但这个让步不仅易于规避，而且财政界中拥有地产的立法者们很可能早已想好如何加以规避了。

第三，取消收据印花税。今后不论所收数额有多大，只在收据上贴附 1 便士的邮票即可。这是一项非常有利——对富人有利——的措施，邮票用量的增长将抵销印花税收入减少的损失；但是，这对工人阶级说来还是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工人们涉及的钱款很少达到需要贴邮票的起码数额（5 英镑）。

第四，广告税从现在的 1 先令 6 便士降低到 6 便士。这是低劣手法的又一例。既然已经放弃了 1 先令，那就提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来保留这 6 便士，因为负责征收这 6 便士税的臃肿费钱的机构，会把征收来的全部税款消耗干净！其实理由很可能是：这样就可以不取消那些与征收此税有关的官位和职务了。只刊登广告的报纸增刊予以免税。这两条都是对中等阶级的让步，但保留报纸的印花税，仍然大大妨碍着民主教育的推广。这位财政大臣说：“现有的报纸将获益，但是新的更便宜的报纸就不要办了。”

第五，人寿保险税从 2 先令 6 便士降低到 6 便士。这同样又是

支吾蒙哄手法的一个表现；无报酬的学徒合同税从 1 英镑降低到 2 先令 6 便士；律师执照税从 12 英镑和 8 英镑降低到 9 英镑和 6 英镑；职员培训合同税从 120 英镑降低到 80 英镑。以上的第一项和最后两项，又是对中等阶级的明显的宽待，对穷人则丝毫没有带来什么好处；而 6 便士的广告税、报纸印花税和纸张税保留下来，是为了能够降低仆役税、犬税和马税，以利富人。

第六，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将追加酒类税，而酿酒者将得到“损耗”补贴。

第七，商人的执照税将进一步均等（这是给予中等阶级的又一项优惠）。

第八，对肥皂税及其他一大批物品的捐税加以审核。茶叶税至 1854 年从 2 先令 $2\frac{1}{4}$ 便士降低到 1 先令 10 便士，至 1856 年降低到 1 先令 3 便士，再往后降低到 1 先令。

这就是辉格党人预算的一个大致的轮廓。请问我们的读者，什么时候有更丢脸的“便士立法”之作——用财政大臣自己的说法——从下院的大臣席^①上提出来过？这个东西貌似冠冕堂皇头头是道，开列了一些天花乱坠的条款。但是，它给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带来了什么实际的好处呢？减轻了什么实际的困苦呢？唯一可以摸得到的一点实际的东西是肥皂税和茶叶税的降低，但由此而减轻的负担实在是微不足道。处处都精心划定了限度，超出限度工人就会得益，贵族和中等阶级就要受损；所以竭力避免超过这个限度。这个预算可能会打动一些没有头脑的人：“广告税降低到 6 便士，报纸增刊的

^① 下院发言人右侧最前排的座位，是大臣们的专座。——编者注

印花税取消！”但是，这给人民实际上带来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收据上只须贴1便士的邮票！”但是，这对只“收到”饥饿的雇佣奴隶又有什么关系呢？绝对没有任何关系！“人寿保险税从2先令6便士降低到6便士”。这对每周挣6先令、8先令或10先令、无法保证自己生命不被曼彻斯特的残酷奴役夺去的劳动者来说，甚至对挣1英镑或30先令的人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也没有！律师领取执照将少交3英镑，或职员订培训合同将只交80英镑而不用再交40英镑，这对工人有什么好处呢？遗产税在一个项目上减轻，其全面推行又很易于规避，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这能给他们减轻一丝一毫的负担吗？店主靠工人的贫困获取的利润同工人的工资决不会均等，那么店主的执照税进一步均等对工人有什么好处呢？“财政改革”，这是本届议会议员当选和本届内阁上台执政的两大口号之一。现在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改革，这个辉格党人、贵族和金融巨头们的改革。必须提出点什么，如一些小的让步，但要使它微小得仅能刚刚感觉得到，——此任务由这位财政高手出色地完成了。格莱斯顿的预算是——用他自己的话、自己的说法来说——“为了工商业阶级的便利”而编制的，不过也只是“便士立法”之作而已。

威·皮佩尔写于1853年4月

20日前后

作为社论载于1853年4月23

日《人民报》第51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威廉·皮佩尔

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 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³⁴⁸

每一个人都知道，预算只不过是对于国家本年度收入和支出的一个估计，它是以上一年度的财政经验，也就是以上一年度的平衡表为根据的。

因此，格莱斯顿先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 1852—1853 年度的平衡表来。迪斯累里先生在财政大臣任内曾宣布，1852—1853 年度的预期收入为 52 325 000 英镑，同一时期的预期支出为 51 163 000 英镑；这样，预计盈余 1 162 000 英镑。格莱斯顿先生根据账目实际计算平衡表时发现，上一年度的实际收入额为 53 089 000 英镑，实际支出额只有 50 782 000 英镑，实际盈余额应为 2 307 000 英镑，按格莱斯顿先生的计算为 246 万英镑（我们不知道是怎么计算的）。

这是一种时尚，或者勿宁说议会总是喜欢这样，即把财政大臣看作是神秘的魔术师，他能利用谁也不知道的秘诀妙法制造出国家的全年收入；所以毫不奇怪，不管这个重要人物是谁，他总是非常注意不要损坏了这个给他如此增光的假象。因此，如果国家由于提

高了生产而使税收的总额超出了预计,人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靠这个进程而得以使盈余额超出其前任所许诺一倍以上的财政大臣,无疑是理财本领更大的人。这就是格莱斯顿先生的惬意的想法,而且被寡头联合内阁在议院中的支持者惬意地加以接受和赞赏。

盈余 246 万英镑!

但是,这二百多万英镑,议院分文也不允许用于人民。那么,这些钱要用于什么地方呢?格莱斯顿先生解释道:

“不管这个决算多么令人高兴,议院不应当忘记,这笔盈余大部分已被本年度多项预算支出所占用,每一项都是经过特别投票表决的。”^①

议院曾从迪斯累里先生那里得知,无论如何也会有一笔 100 万英镑以上的盈余。因此它作为筹款委员会³⁴⁹,就超出通常盈余额之外轻松愉快地表决通过了以下的补充拨款:

海军,及邮船运输部门	617 000 英镑
陆军和军需部门	90 000 英镑
除这两笔开销之外,如格莱斯顿先生宣布的,还要再加上:	
卡弗尔战争 ³⁵⁰ 〈不能和平吗?〉	270 000 英镑
军械增支	616 000 英镑
民兵增支	230 000 英镑
公立(应读作私立)学校经费	100 000 英镑

总计 1 923 000 英镑^①

格莱斯顿先生又是计算得不同(可能是因为卡弗尔战争情况捉

① 威·格莱斯顿 1853 年 4 月 18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摸不定而把这一项略去了),按照他的计算,总计只有1 654 000英镑。从本来估计的(只是名义上的)246万英镑的盈余中扣除这个数目,实际盈余就只有806 000英镑,按格莱斯顿先生的计算则为807 000英镑。可是议院还被警告说,甚至这笔不大的款项中还要扣除22万英镑,因为这笔进款的来源是属于偶然性而非固定性的。这样,本来被惬意地宣布的200万英镑结果只剩下587 000英镑了,这个数目用来进行哪怕是最保守的税制改革,也不是一笔很大的本钱。但是,既然已向全国保证政府是个实行改革的政府,那么,改革就一定要进行,因而格莱斯顿先生也就立即加以实施了。

一个平庸的自由贸易论者,譬如像休谟先生,或许会劝财政大臣用他的盈余做一件好事:根据海关统计报告选出一些纳税总额恰好等于587 000英镑的外国商品来,予以免税。但是,对于像格莱斯顿先生这样博学多才、莫测高深的财政炼金术士来说,这样的建议是多么庸俗、平常而无知啊!你们以为,一个简直要把全部国债都消除的人的雄心大志,能用仅仅豁免50万英镑的税金来满足吗?要办这件小事,那肯定就无需把桑乔·木头弄到他的印度不让他留岛去而把位子留给替联合内阁理财的伟大唐·吉河德了。³⁵¹

格莱斯顿的税制改革打着牛津街店铺门面上的那种神气十足的广告牌:

“大减价^①!

五百多万英镑马上就要免了!”

① 英语 Immense Reduction 直译是“大减低”,既可指减价也可指减税。——编者注

这倒是可以吸引人民的注意,甚至可以使最保守的议会老太婆们着迷。

让我们到这家店铺里去看看吧。“格莱斯顿先生,请把您的价目表拿出来看一下。先生,您说的实际上究竟是什么意思?减掉500万英镑吗?”格莱斯顿先生回答道:“一点也不错,亲爱的先生,您想看一看数字吗?数字在这里:

- | | |
|---|-------------------|
| 1. 肥皂税完全取消 | 1 126 000 英镑 |
| 2. 人寿保险税从2先令6便士减为6便士 | 29 000 英镑 |
| 3. 收据印花税一律减为1便士 | 155 000 英镑 |
| 4. 学徒合同税从20先令减为2先令6便士 | } 50 000 英镑 |
| 5. 减低律师执照税 | |
| 6. 广告税从1先令6便士减为6便士 | 160 000 英镑 |
| 7. 出租马车税从每天1先令5便士减为
每天1先令 | 26 000 英镑 |
| 8. 18岁以上男仆税减为1英镑1先令,
18岁以下减为10先令6便士 | 87 000 英镑 |
| 9. 减低私人马车税 | 95 000 英镑 |
| 10. 减低马税、小马税和犬税 | 108 000 英镑 |
| 11. 用执照代替按里程计价的办法以减低驿马税
..... | 54 000 英镑 |
| 12. 减低殖民地邮资税(每封信6便士) | 40 000 英镑 |
| 13. 茶叶税从2先令2 $\frac{1}{4}$ 便士减为1先
令10便士,实行到1854年4月5日;
1855年减为1先令6便士,1856年
减为1先令3便士,此后
减为1先令 | 3 000 000 英镑 |

14. 苹果、奶酪、可可、蛋类、黄油和水果减税 ……	262 000 英镑
15. 133 种小商品减税 ……………	70 000 英镑
16. 123 种小商品免税 ……………	53 000 英镑

总计 …………… 5 315 000 英镑”^①

当然,减税 5 315 000 英镑无疑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这个极为慷慨大方的预算是不是没有缺点呢?肯定是有的。否则怎么可以把它叫作改革呢?宪制改革和牛津街上的店铺都给人以很不错的印象,可是肯定也都有着很不小的缺点。

一切聪明的诡计,人们最终总有办法发现其秘密之所在。格莱斯顿先生的口袋里只有 50 万英镑,但他却赠送给公众 550 万英镑。这些钱他到哪里去弄呢?原来恰恰是到被他用他那种慷慨弄糊涂了的不明真相的公众身上去弄。他赠给公众一个礼物,可是却要求他们对他的惠赠作出回报。当然,这种要求不是以直接的或无礼的方式提出的,甚至也不是对那些他现在恰恰存心要笼络的人提出的。他想要同各式各样的顾客打交道,而魔术师罗素已经教会了聪明能干的格莱斯顿怎样让明天为他今天的慷慨付出代价。

格莱斯顿把旧税削减 5 315 000 英镑。格莱斯顿开征新税 3 139 000 英镑。这样格莱斯顿仍然会使我们得到 2 176 000 英镑的好处。但是,格莱斯顿最多不过是本年度的大臣,而本年度他计划削减的税额只有 2 568 000 英镑,这将使收入减少 1 656 000 英镑,这一亏损由本年度新税预计带来的税款 1 344 000 英镑弥补,剩下的亏损额为 312 000 英镑。将此亏损额从预算所称盈余 807 000 英镑中抵销

^① 威·格莱斯顿 1853 年 4 月 18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后,仍有盈余495 000英镑。

联合内阁预算的基本特点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想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内阁对哪些方面寄予最大希望,各议会反对党最可能提出哪些反对意见,最后,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的。

格莱斯顿虽然是力图引起轰动,力图靠大减税来保证自己既能在财政上出风头,又能笼络民心,但他还是感到必须有个漂亮的、看起来合理的借口,来提出他那增税3 139 000英镑的建议。他懂得,如果不作出一些被议会议员和中等阶级人士称作“原则和正义”的表现,仅仅为了使他得到一次既无必要又无理由的个人满足而改动整个税收制度,那是不允许的。因此,他聪明地决定抓住立法界的柏克司尼弗们身上为他所熟知的弱点而加以利用,巧妙地说这样一些动听的漂亮话来掩饰他打算给公众增加的负担:“公正地扩大某些税种的范围,以求其最终的和持久的平衡。”他为此目的选择的税种是:

- (1)遗产税,
- (2)酒类消费税,
- (3)所得税。

遗产税,按照他的要求,应把所有各种财产一律包括在内。由于地产在此以前是免征此税的,所以估计这个建议能使工商界感到满意。酒类消费税扩大到苏格兰和爱尔兰,以便使它们同酿酒的英格兰处于更加平等的地位。

最后,所得税的征收范围要扩大到100—150英镑的年收入,而且还扩大到爱尔兰。关于所得税的建议,肯定不是格莱斯顿能指望受到或者会受到热烈欢迎的一条。但是这一点,以后我们谈到反对意见时再谈。

除关于遗产税和酒类税的建议外,按自由贸易精神对一大批进口商品减税无疑被大臣们认为是最好的诱饵;店主、家庭主妇以及一般小中等阶级可能会报以一阵赞扬之声,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至少在茶叶方面消费者受益是微乎其微的,大部分的好处都要被公司老板和生产垄断者的利润所吞噬。但肥皂税是完全取消了,格莱斯顿希望这一措施使这个国家不仅能够把所有人的脸都弄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高高兴兴,从而洗去它自己的肮脏、醜陋、难看的形象,而且还能够彻底废除对黑人的奴役,通过促进“非洲棕榈油的合法贸易和生产”而结束无数“汤姆叔叔”的苦难。这一点可以使格莱斯顿放心地吹起牛来,很可能连最油嘴滑舌的服饰商人和最会说大话的江湖医生都要甘拜下风。在这些诱人的图景之外,他又添上数量相当可观的小贿赂,其中包括给爱尔兰旅⁶³的几百万英镑,即豁免贷给爱尔兰的饥荒贷款,还包括给《泰晤士报》的贿赂。该报是“好人阿伯丁”及其联合内阁同僚们的大支柱。这后一项贿赂就是取消只登广告的报纸增刊的印花税,而人所共知,《泰晤士报》是唯一大量发行此类增刊的报纸。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反对派极有可能对预算提出的反对意见。上星期一议院的辩论只不过是初步的小小交锋,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从每天的报纸上东一点西一点地了解各方的意图。在这些报纸上我们得到的消息非常少。《泰晤士报》、《纪事报》和《邮报》实际上是在联合政府控制之下的,而《每日新闻》很难算得上曼彻斯特学派的喉舌,而且它的立场仍在摇摆中,看样子那些符合自由贸易精神的建议对它很有吸引力。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先驱晨报》——托利党即保守党的报纸,我们就会发现,它已经发表了它的评语,而且是以真正异乎寻常的坦率态度发表的。

该报说:“格莱斯顿先生的整个预算,不过是一种以贿赂和假公济私为内容的可鄙的混合物。”^①

因此,托利党人一定会反对格莱斯顿的方案。迪斯累里不会不去向格莱斯顿讨回在扩大遗产税、所得税范围和减低茶叶税方面被窃走的桂冠,以及别的种种本该属于他但却被强占的荣誉。如果说土地贵族必须再一次忍受丧失特权之痛,那他们无论如何也要为自己保住一个自愿放弃特权之美名。但是,由于他们难以在遗产税问题上站住脚,所以迪斯累里将使他们围绕着固定收入与非固定收入有别这个问题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爱尔兰旅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同他并肩战斗。很明显,爱尔兰人不能承认,而且永远也不会承认那笔纯粹是英格兰人先摧残爱尔兰人民而后强加于他们国家的债务。此外,从纯粹实际的观点出发,他们肯定会觉得,豁免300万英镑虚构资本的利息,是为征收酒类消费税和所得税而作出的一个很不够的让步。就曼彻斯特学派而言,虽然他们向自己的选民作出了所得税即使不废除至少也要改革的保证,但不能指望他们不按照生意人的准则行事。生意人的准则就是根本不考虑政治荣誉,而完全理所当然地考虑利润。对这些先生们说来,在“总体”上支持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可能带来的利润决不是微不足道的。

现在谈谈我们对争议中的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所最热烈希望的是内阁失败。这个内阁对内实行的狡猾欺骗的反动政策和对外实行的奴颜婢膝的怯懦政策,都同样使它受到应有的鄙视。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尤其有理由希望它失败,因为这肯定是有利于人民的事情。有一点很清楚:只要贵族的联合内阁按照工商阶级的要求办事,

^① 1853年4月20日《先驱晨报》第22137号。——编者注

这个阶级就既不会自己作出任何政治上的努力,也不会允许工人阶级展开他们自己的政治运动。但是,如果土地占有者方面再一次占了上风,中等阶级要摆脱开他们,就非得把腐朽的寡头议会加以彻底改造不可了。到那时,中等阶级就无法只宣传局部改革了,而是必须按照人民的全部要求行事。人民,除非把自己的原则和利益统统放弃,当然决不会附和并求助于资产阶级,但是对资产阶级说来,那就不是第一次被迫依靠人民的力量了。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会引起目前财政制度的一场毫不含糊的革命。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甚至中等阶级社会也不能不趋向于用单一的直接财产税代替传统的大杂烩式的税收制度。直接税的原则是曼彻斯特学派很久以来就赞成、迪斯累里曾加以肯定的,甚至寡头联合内阁也已予以确认。但是,一旦直接财产税的制度真正建立起来,手中有了政治权力的人民只需开动这架机器,就能够产生出

工人的预算。

威·皮佩尔写于1853年4月
23日—28日之间

作为社论载于1853年4月30
日《人民报》第52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约瑟夫·魏德迈

在英国的流亡者中的派别³⁵²

流亡者内部的党派斗争，缺少一种能使其粉墨登场并施展身手的世界历史舞台；缺少为他们捧场助威的群众。尽管如此，各个派别的代表人物却自愿承担席勒笔下的英雄角色，这些英雄向世人庄严宣告自己的伟大抱负，以便使世人相信他们的崇高使命和不可缺少的领导才干。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自然不会错过机会制造假象，使人觉得流亡者的一切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起码在那些不善分辨是非的人的眼中是如此。

诚然，最便当的方法莫过于对这一切事件轻蔑地耸耸肩表示不屑一顾，就像许多人宁愿扮演傲慢的法利赛人却不愿充当税吏一样³⁵³。坐在“高高的观望台”上保养身体，比亲自参加党派斗争或者哪怕是仅仅为这些斗争的实际意义而费心来得更轻松。然而，这些在流亡中相互争斗的人归根结蒂不过是如今在祖国共同受压迫的阶级的一小部分和代表，只要有限的条件许可他们把群众因受到暴力阻止而无法参加的斗争单独进行下去，他们就有权要求受到重视，这尤其是因为他们中的某些人有责任在面临的革命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不少人认为自己是有责任的并将努力争取这种地位。正确理解流亡者中的党派斗争，肯定有助于理解革命中的党派斗争，并为这种理解作好准备。不过在这方面务必当心，不要把站在同一基地上

的人们的小伎俩同使得有原则分歧的各个派别都感到满意的事情混淆起来。

争斗不休的社会中的各阶级的生活和生存条件,同时也是决定其流亡中的代表人物的态度的条件。无论在什么地方,好心的市侩与精明的投机家进行联合的一切企图,都会因他们的利益无法调和而失败,六月事件²⁷⁰已经明确而有力地证明了这种不可调和性。正是在谁是应当被推翻和消灭的敌人这个问题上人们无法达成一致,因为一些人对消灭“专制暴君”感到满意,而另一些人则把现在又成为革命者的资产阶级派别视为更大的危险,因为在二月事件³⁵⁴和三月事件³⁵⁵中他们曾挽救了旧秩序。

例如,怎么能设想无产阶级的代表们会同赖德律-洛兰以及他的盟友携手并进呢?此人在1848年6月以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分把国民自卫军调到巴黎,以便在大街上屠杀已陷入绝境的无产阶级;又如,怎么能设想他们同科苏特搞在一起呢?这个人当着英国棉纺大王的面妄称要结束社会主义的未来;再者,怎么能设想他们同马志尼携手并进呢?这个人一味同盘剥农民的土地贵族和投机钻营的中等阶级一起搞密谋活动,并且庆幸他的意大利还没有因社会动乱而威胁到有产者的统治。

在各派别通过以往的革命斗争而变得界线分明的地方,在法国人那里,我们也会看到流亡者的十分明确的派别划分。这就像国民议会一样,在那里有左派、中间派、右派,变换的只是保有不同席位的人。腐败不堪的保皇党可以说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为了给穿工作服的工人^①腾地方,大喊大叫的山岳党³⁵⁶也在步他们的后尘。赖

① 指革命者。——编者注

德律-洛兰一伙组成了流亡者的右翼。这个赖德律-洛兰是1848年为了自己的生意而热中于反对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首领,是1849年小资产阶级悲喜剧的落难英雄,他是卢格和阿曼德·戈克的朋友,主张为了在革命首都策动暴乱而实行德美强制征税。他从革命中无非是为自己的团体拯救了名义(革命);而对真正的革命他只想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以便在无产阶级革命面前挽救资产阶级社会。

路易·勃朗及其一伙占据着中间地位,他主张以资产阶级方式实行调解的社会主义、主张资产阶级所中意的适度联合和工资平等。1848年他在卢森堡宫^①为无产阶级进行辩论,而宫外的资产阶级却荷枪实弹对无产阶级下了手。他属于布朗基在其著名的祝酒词³²³中指责犯有“扼杀革命”罪的那一类人。他们

“得对一切的不幸和千千万万牺牲者的鲜血负责。反动派扼杀民主,不过是做了它本行的事情。被轻信的人民当作自己领导者的、把人民出卖给反动派的叛徒,犯下了罪。”^②

奥古斯特·布朗基是公认的无产阶级反对派的领袖;诚然,他本人是法国监狱中的一个犯人,但是他的派别在流亡者中是人数最多的,在法国不久将成为最强大的派别,尽管别的党派带着几分蔑视来看待这个无产阶级的“群氓”。早在1848年2月布朗基就试图把工人组织成一个严密的、可以对革命进程发挥决定影响并把其他政党逐一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的政党。但事隔几个月,种种事件又使他

① 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路易·勃朗主持的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的所在地。——编者注

② 奥·布朗基《伦敦流亡者委员会的路·奥·布朗基公民为2月24日周年纪念宴会寄来的祝酒词》。——编者注

失去了发挥作用的舞台。这个政党的革命政策在这个祝酒词中得到了最精辟的阐述，布朗基在祝酒词中表达了他对“二月革命的阴谋家”的深恶痛绝。

“除了把二月革命的骗子永远赶出市政厅之外，还必须防止新的叛徒。

凡是靠无产阶级上了台而不立即采取下列措施政府都会是叛变的政府：

(1)完全解除资产阶级自卫军的武装。

(2)武装全体工人，成立他们的军事组织。

当然，还应采取许多其他必要的措施，但是采取了这种作为人民安全的预先保证和唯一保障的第一行动，许多其他措施也就会自然由此而产生。

一件武器也不应该留在资产阶级手里，否则就没有活路！……武装和组织是取得进步的的决定性因素，是消除贫困的重要手段。谁有刀剑，谁就有面包。刀剑能制服人，手无寸铁的人群会被驱散。

法国到处是武装了的工人——这就是社会主义降临。对武装起来的无产者来说，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一切障碍、反抗都会一扫而光。但是，消磨时光在马路上的无聊散步、种植自由树和律师的响亮空谈的无产者开始是得到圣水，然后是侮辱，最后是霰弹和永远的贫困！”^①

德国流亡者中有一部分人同布朗基派存在直接的联系，他们近来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³⁰⁷，引起了公众的极大注意，这就是被他们的敌人专门称作“马克思派”的那些人。马克思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写道：“从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来，无产阶级政党在大陆上失去了从前在这个短短时期中例外地享有的东西：报刊、言论自由和结社权，即政党组织的合法手段。尽管反动派猖獗，资产阶级自由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党还是在它们所代表的

^① 奥·布朗基《伦敦流亡者委员会的路·奥·布朗基公民为2月24日周年纪念宴会寄来的祝酒词》。——编者注

阶级的社会地位中找到了通过某种形式联合起来并在某种程度上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所必需的条件。1849年以后^①，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同1848年以前一样，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秘密联合的道路。因此，从1849年以来，大陆上出现了一系列秘密的无产阶级联合会；警察当局破获它们，法庭诅咒它们，监狱冲散它们；而形势又总是使它们重新恢复起来。这些秘密团体中有一部分把推翻现存国家政权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这在法国是正当的，因为在那里，无产阶级已被资产阶级打败，在那里，攻击现存政府是同攻击资产阶级完全一致的。另一部分秘密团体则把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不考虑现存政府的命运。这在像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是必要的，因为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于它们的半封建政府的压迫之下，因而在那里，对现存政府的胜利攻击并不是要破坏资产阶级或所谓中间等级的政权，而是首先要协助它建立统治权。不容置疑，在这里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也会重新参加反对现状的革命，但是，为这一革命做准备工作，为它进行宣传鼓动、为它进行秘密活动和组织密谋都不是他们的任务。他们可以把这种准备工作交给总的形势和直接有关的各个阶级去进行。如果他们不打算放弃自己的党的立场和由无产阶级总的生存条件所直接产生的历史任务，那么他们就必须把这种准备工作交给它们去进行。对他们来说，目前的政府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而现状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停留点，而跟它斗得筋疲力尽，那只是目光短浅和心胸狭窄的民主派干的事情。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不是一个

^① 约·魏德迈在此加了一个注：“在德国北部的某些邦，如图林根、黑森则是自1850年年底以后。”——编者注

密谋团体，而是一个秘密组成无产阶级政党的团体，因为德国无产阶级被公开地剥夺了新闻出版、言论和结社等基本生存条件（火和水）。”^①

从这个同盟中分离出一个派别，或者说一个派别被分离出去，这个派别所要求的即使不是真正的密谋，至少也是表面的密谋，因而要求同民主派的当代英雄直接结盟，这些人野心勃勃，他们关心的首先是利用下一次革命来获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可是在这以前他们一直趾高气扬地以无产阶级的代表自居。我们作为路易·勃朗宴会的参加者，再次与这些人相遇，他们是所谓革命公债的热心推行者，这种公债的基础是对社会各阶级的嘲弄，是抹煞党派对立，也就是一种必然会给无产阶级利益造成毁灭性损害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再次为欺诈和叛卖活动开了方便之门。在理论方面，流亡者协会、革命协会、鼓动协会——不管它们还叫什么名称——都远远落后于法国人的相应协会，这完全是与德国小资产阶级更堕落的情况相适应的，这个阶级只是由于它的不幸的革命尝试才被推进更广泛的世界联系之中，直到现在它还弄清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我们在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那里看到较多的和谐一致（尽管在匈牙利是一位瑟美列同科苏特相对立，在意大利是一个虽然很少却很激进的、没有著名领导人的党派与马志尼相对立），那么其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35页。引文第一句中的“从前”和最后的“（火和水）”是魏德迈加的。“火和水”是古罗马法中的一个用语，断绝火和水，意为剥夺基本的生存条件。——编者注

的原因仅仅在于,他们还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工业在那里尚未引起那种赋予 19 世纪革命斗争以明显特征的阶级分化。

约·魏德迈写于 1853 年 5 月
8 日前后

载于 1853 年 5 月 14 日《改革
报》第 13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威廉·皮佩尔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议会。
——《泰晤士报》。——“工人们”³⁵⁷

不久前的某一天，因繁荣和香槟酒而陶醉、因脑满肠肥而舒服地喘气的《泰晤士报》，轻声轻气地嘟囔说：“我们现在举国幸福而和谐。”它这么说是道出了一条“真理”，一条无论贵族、中等阶级还是任何一个“英国人”都不否认的“真理”。的确，自从工厂主完全制服了地主，以他们的胜利最终结束了持续20年之久的反对地主的战争之后，从另一方面说，自从地主承认了他们的失败，乐于尽情地享受国库掠夺者和庇护人的好处并充分利用通过营私舞弊和投机所得到的暂时的“繁荣”之后，在所有的资本家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的各个派别之间，同样的欢乐和谐的气氛也占了上风（当然，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除外），就像在各种动物之间的“幸福家庭”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幸福”与“和谐”的秘密就在于陶醉，这一方面是由于杜松子酒的缘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繁荣”。

因此，在工人阶级突然以对痛苦的抱怨扰乱这种幸福时，议会、中等阶级、当然还有慈母《泰晤士报》就理所当然地被激怒了。³⁵⁸但他们的确太“有教养”、太柔和了，因而并没有公开表示这种愤怒，而

只是说到“令人痛苦的问题”。不过，这只是他们的头一句话，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个好听的词。如果民众继续对他们施加压力，开始“大吵大闹”，即横下一条心来，那么，不久就可以听到他们下流的脏话了。

立法议会的情景是如此卑鄙齷齪，如此令人作呕，如此腐化堕落，如此懒惰成性，如此恬不知耻，每次打断他们习以为常的嗜睡症，每次发生要求他们注意的事，每次出现要求他们行动的事件，都被认为是而且公开表示是“最痛苦的”事情。但是，使这些神经衰弱的议员深感“痛苦”的不是罪恶、弊端、恐怖和危险等等的存在本身，而是把这些事情摆在他们眼皮底下，强迫他们去“接触”这些“微妙的问题”——这才是他们所哭诉的“痛苦”。

“痛苦”的不是最近大选中巨额贿赂的存在，而只是议会的公告中不得不提到它。“痛苦”的不是一些政府机关不同程度的腐败，而是这种腐败被揭发，被公之于众。“痛苦”的不是在可恶的克扣工资制度下对工人的无耻的压迫，而是工人对这种行为的强烈抗议：“痛苦”的不是帕麦斯顿在英国建立政治间谍网的秘密计划，而是这个计划的被揭发和遭到公开谴责。“痛苦”的不是俄国专制君主侵犯他周围邻邦的独立，而是有“责任”对于保护土耳其，或者说对于“有朝一日帮助重建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所采取的手段进行反思。在当前，“痛苦”的不是公开违背 1850 年的法令¹⁵¹而压迫工厂奴隶，不是强迫妇女超额劳动而损害她们的健康，不是实行欺骗性的轮班和替班制度³⁵⁹，不是无休止的劳累对整个一代人的摧残，甚至也不是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无可否认的事实：工厂工人的平均年龄已经降低了几乎 8 岁（而中等阶级某些人的平均寿命是 28 岁），——对这一切，高尚的教区牧师们和正直的《泰晤士报》是完全不关心的。“痛苦”的只是工厂工人的状况总要被人们提起。“痛苦”的是工人重

新开始鼓动,而慈善家重新开始谴责。是的,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工厂工人决不会被压迫得默不作声。

科贝特先生提议通过一项“限制工厂妇女、青年和儿童的劳动时间,规定每星期前五天限为一天十小时,星期六限为七小时半的法案”,对于这个提议,下院中可尊敬的议员们——不是少数慈善家,而是坚定的中等阶级多数——又是怎么说的呢?请听一听乔治·格雷爵士的话:“他一定为重提这一问题而深感痛苦和遗憾。”的确,英国现在有一个深感痛苦的下院。议院外的中等阶级多数又是怎么说的呢?请听一听《泰晤士报》的话:“恢复工厂的鼓动将会使那些以为在1850年会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绝大多数公众感到痛苦。”我们敢说,工厂中的鼓动以及整个工人运动还会给《泰晤士报》的这些“绝大多数公众”带来巨大的痛苦。他们当然很清楚这一点,因此,《泰晤士报》对“工人们”狂怒不已。

“工人们”在议会中没有代表;要满足自己的一切急迫的需求和愿望,他们都得求助于议院中的某一派别。因为两个上层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总是以工人阶级为代价,而且也“为他们本身的利益”,所以“工人们”总是发现有一方准备把他们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直到改革法案通过和谷物法²³⁵废除以前,是中等阶级维护“劳动者的利益”,而从那时以后则是被击败的贵族。慈善家一直坐在反对派的席位上。很自然,慈善家只保护那些作为受骗者和仆从而被照顾的人。因此,工人不应当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他们这样做,慈善家就不会照顾他们了。而在慈善家手中,工人们必定仍然是奴隶——十小时工作日法令¹¹³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慈善家反对派攻击1847年的法令,作为对他们的获胜的自由贸易派对手的报复。这些对手即工厂主,在工业危机来临的情况下并不激烈反对法令,不管几小时的

工作日他们都不需要。并没有从该法令中获得任何好处的工人，告别了慈善家，投身于独立的政治鼓动。慈善家又干些什么呢？他们又攻击 1850 年的妥协法令，作为对工人的报复。工厂主在工业繁荣来临的情况下再一次把慈善家们撇在一边，因为这时实行十二和十四小时的工作日比较称心。与此同时，工人们又开始大声呐喊，并再次请求慈善家予以保护。慈善家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慈善家又一次提出十小时工作日法令。要我们告诉工人们会发生什么事吗？

为了有一项有效的法令，一项有保证的法令，必须限制机器转动时间。科贝特先生就是这样要求的。帕麦斯顿勋爵好像几乎是支持这个要求的。而约翰·罗素勋爵是怎么说的呢？“如果说我的同事似乎是希望对限制机器转动时间进行立法，他可能是说这不是他的本意。相反，他的本意是说他反对对成年人劳动的任何限制。”这是他的原则！请注意这一点，先生们！其次，“曼彻斯特派”威尔逊-帕滕先生是怎么说的呢？“如果考虑限制机器转动时间的话，我希望能给国家提供一个机会考虑一下政府打算做什么。他只可能考虑做最有害或最专横的事。”拉布谢尔先生是怎么说的呢？——“我感到遗憾的是，勋爵阁下（帕麦斯顿）没有清楚地表明他打算反对将给公众以虚假的许诺的原则。”现在，看《泰晤士报》是怎么说的：——“我们只能认为，强迫规定机器转动时间是一种最专制的社会主义。如果这就是目的的话，如果万一它成为法律，那么英国就将不再是一个适于自由人（即资本家）居住的地方。”

我们要问工人们，在这样的声明之后，他们还能希望有什么成功的机会呢？难道他们还能梦想——哪怕是一瞬间——限制机器转动时间这个真正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最重要的条件，会被中等阶级立法机关批准吗？他们不能。那么他们在慈善家手下又能指望什么

呢？只能是又一个虚假的法案，而且一旦不可避免的危机迫使工人们直接起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时，这种法案甚至会再一次被彻底废除，作为对他们的报复。也像其他对工人有好处的措施一样，不会有什么十小时工作日法令，除非议会成为工人群众的代表机构。在那个时候到来以前，只会发表些所谓关心“妇女、青年和儿童”的伪善声明，此外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措施。“至于工人们，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这是《泰晤士报》所作的结论。我们也要作这样的结论：**工人们！照顾你们自己吧！**

威·皮佩尔写于 1853 年 7 月 7
日前后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7 月 9 日
《人民报》第 62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威廉·皮佩尔

沙皇的胜利³⁶⁰

老涅谢尔罗德,这个所谓的“俄国主和派首领”,伊莱修·伯里特在撰写胜利捷报方面的经常的竞争对手,发出了又一个周知照会¹⁶⁵,这个照会将令整个英国的所有阿伯丁们和布莱特们读来“深感痛苦”。这个照会无疑给了他们一记耳光。它使他们惊慌失措。它使他们无地自容。他们在这种轻蔑、挑衅和蓄意的侮辱面前目瞪口呆。维护秩序的达赖喇嘛用这一切给了他的奴隶们应得的惩罚。^①啊!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我的善良的、体面的绅士们?那么你们就得对彼得戈夫^②百依百顺,就像你们曾经对圣·克卢^③俯首贴耳一样。

“北方的大主和派首领”如此轻蔑地教训伦敦和巴黎的内阁和交易所那些不惜一切代价乞求和平的人:“如果你们要和平,那么鬼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插手别人的纠纷?难道我们在向土耳其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时没有特别向列强告知我们的意图吗?”

难道我们没有“特别关照大不列颠和法国不要采取一种使困难的局势更加

① 讽指俄国沙皇对欧洲列强所采取的态度。——编者注

② 暗指俄国宫廷。——编者注

③ 暗指法国宫廷。——编者注

复杂的态度,不要过于仓卒地采取一方面会鼓励土耳其政府的反对派,另一方面会比过去更加有损我皇①荣誉和尊严的措施吗”②?

难道我们没有“预先警告你们不要支持土耳其政府吗”?但是你们不会听我们的。决不会!

两个海上强国③认为不必听从我们提请他们特别注意的这些意见。他们在我们之前采取了行动,他们断定必须立即行动,先发制人,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而我们曾向他们宣布这种措施只能作为最后手段,我们施行这种措施是使其服从于土耳其政府的最终决定的。而在当前这个时刻,还没有开始施行这些措施;他们立刻把他们的舰队开进君士坦丁堡水域;他们已经占领了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土耳其水域和港口¹⁶⁵。两个强国通过这种先发制人的态度对我们进行示威、施加压力,而这样做,正像我们预先告诉他们的那样,必将使这场危机更加复杂。

你们对我们进行威胁,但考虑到你们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考虑到你们天天都在结结巴巴地祈求和平,所以,你们的这种威胁是滑稽可笑的。如果你们要和平,为什么你们不考虑我们“从和土耳其政府保持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出发而作出的一系列让步”呢?

因为,你们知道,在放弃了一个又一个在协定、条约或者其他双方承担义务的协约的形式下获得保证这种念头之后,我们才把我们的要求降低为只签署一份简单的照会,例如我们已将其文本递交给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② 卡·涅谢尔罗德《涅谢尔罗德伯爵的周知照会。[1853年7月2日]》。——编者注

③ 英国和法国。——编者注

你们的照会。

你们为什么反对这种简单的让步？你们为什么怂恿土耳其把我们的和平使者缅施科夫赶走？³⁶¹你们为什么在我们准备派遣舰队和军队严惩背信弃义的毁约者时说大话？当我们已经知道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才是发自你们颤抖的内心深处的祈求时，你们能指望从你们的示威和恐吓行动中得到什么好处呢？

所有这一切，我亲爱的小鸽子们，正如你们可能已经预见到的那样，必定会是徒劳无益和滑稽可笑的。这一点你们是会认识到的。

鉴于土耳其政府在法国和英国公开声明支持下表示拒绝，修改沙皇以此为根据的决定对我们来说比以前更加不可能了。

于是，皇帝陛下就命令现时驻扎在比萨拉比亚的我们的部队跨越边界线，占领两公国。

因此，我的大好人阿伯丁们和其他温文尔雅的绅士们，你们现在自然将吞下屈辱之果，而在祝你们好胃口时，我们希望你们不会摆出一副“可怕的”难看的面孔。也许你们认为吞下屈辱之果的应该是我们，而不是你们。那么，诸位先生，现在就请动手吧。要我们吞下屈辱之果，威吓我们，攻击我们，逼迫我们，并“承担发动一场大战的严重责任”吧!!! 记住：我们并不想打仗。我们只是进入了两公国。

我们不想对土耳其政府发动一场进攻性的战争，相反，只要我们不被迫卷进去，我们将努力加以避免，但是，因为土耳其政府坚持拒绝我们有权期望得到的道义保证，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暂时用物质保证来代替；因为，对于两个强国在土耳其帝国港口和水域、在一眼可以看到土耳其帝国首都的地方所采取的立场，在现实情况下，我们只能从我们的荣誉和安全出发来考虑。它将纯粹是暂时性的；它对我

们将仅仅是一种保证,直到更好的想法在苏丹^①大臣们的头脑中占据上风。尽管我们要占领两公国一个时期,但事先决不存在任何征服的念头。我们并不企图扩张领土。

一旦苏丹给予我们应得的补偿,同时采取措施排除两个海上强国的态度所施加给我们的压力,我们的部队就会撤回到俄国边界之内。

撤走你们的舰队,别去管苏丹——或者最好把他交给我们来管——你们的和平就会得到可靠的保证。对抗,支持他,让他“强迫我们越过我们本来打算限制自己的狭小的和界限分明的范围”——那么我们就得要你们承担发动一场大战的责任。

涅谢尔罗德——我们也将同他一道——把这番可怕的暗示甩给可怜的阿伯丁人和整个那伙浑身发抖的人,让他们那软弱的头脑去颤栗。想想看吧,民族的荣誉、文明世界的利益以及近乎整个欧洲的命运竟掌握在这样一些背信弃义的懦夫手中!这样,他们会做些什么呢?他们会战战兢兢地匍伏在沙皇脚下。是的,他们会这样做的。他们将忍受沙皇的侮辱和他们自己的堕落——因为他们不敢接受那位专制君主如此挑衅性地向他们提出的挑战。

他们愚蠢的优柔寡断使得奥地利和普鲁士被卷进了俄国的阴谋:在柏林,国王^②及其军队狂热地庆贺沙皇的生日。在君士坦丁堡,一个奥地利的缅施科夫^③代替了俄国的缅施科夫。英国和法国已经被孤立了。我们要问,我们这些浑身发抖的乞求和平者将做什

①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③ 指奥地利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卡·路·布鲁克。——编者注

么呢？他们将匍伏在俄国人的面前！是的，他们会这么做的。

但是，我们也不必为我们的老爷们的蒙辱而过分激动。有谁能指望我们腐朽不堪的寡头政治再现生机？有谁能希望我们半死不活的中等阶级议会突然一跃而起，变成爱国的罗马元老院？有谁能期待我们贪财受贿的伪善的报刊会获得真正的力量，成为热情洋溢、确实代表民意的主要报刊？不，一百个不！我们应当以他们共同的丑行、堕落和腐败为乐。我们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我们的老爷们的衰弱正是我们胜利的保证。至于哥萨克人，他们怎样战胜了我们的反革命——**革命也将怎样把他们二者全都战胜。**

威·皮佩尔写于 1853 年 7 月
12 日—14 日之间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7 月 16
日《人民报》第 63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法 国 的 情 况³⁶²

一、农民的所有制和债务

众所周知,小作坊主怎样被大资本家赶出了作坊,手工业工人怎样由于机器的应用而被挤垮,工人的工资又是怎样因改进和加快了速度的机器动力而普遍被削减。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正常的竞争过程和现代制造业发展中随之而出现的。但是,法国的农民所有者与那些正在现代生产巨人面前消失的手工业工人完全不同;他既不用同国内优越的耕作方式相对抗,也不受任何来自国外的竞争的影响;他也不是为勉强维持生活而被迫向某个只顾赢利的资本家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雇佣奴隶。相反,他是自己的主人,是生产工具的自由和独立的所有者;尽管如此,他的痛苦、他的灾难和他的贫困同别人所遭受的却是一样的。无产者遭受压迫和痛苦是因为没有自己的生产工具,而农民所有者遭受痛苦则是因为他是所有者,这看起来好像不正常,但却是事实。

尽管农民所有制起源于现代,但对前几个世纪的农民的社会地位作一简单的介绍,这也许不会使读者感到无聊,特别是因为那种地

位是现代农民所有制的主要基础。在刚刚建立的封建制度下,土地是国有财产。整个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军事组织,同时,它靠一种社会等级制度和严格的规章使维持共同财富所需的各种职权得以履行。土地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主要的税收来源,所有的公共事务都要靠土地提供的收入来维持。国王作为国家的受托管理人,作为全国土地的主要管理者和国防军的总指挥,任命国家的全部高级官员,这些官员在文职上是地方的长官,同时仅次于国王而指挥军队。他们是国王的封臣,并且在各自的地区内管辖下级行政部门,把地产赐给部下,地产的大小根据他们担任的职务而各不相同。由于文职官员是战场上的指挥官,所以军务是拥有土地的唯一条件。军务包括作战所需的全部装备,作战时的给养也不例外。因此,土地的分配由国防军的编制而决定。

处于最底层、不得使用武器、不得参与公共事务、但要负责养活所有的人的是农奴。劳动被认为是低下的、不体面的职业,农奴不仅要负责耕种土地,而且不得不从事为供养他们的长上所必需做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因此,除了在那些发生战斗的地方以外,战争不会干扰生产的进行。

封建领主的农奴与古代城邦的奴隶截然不同,前者有权要求得到他们出生地的土地。农奴既不能被卖掉,也不能被迁移,他们是自己出生地地产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片地产的所有者必须为他们提供生计。为简化这一制度的运行,并使农奴像以前一样自立,农奴被安置在村舍中,被分配给足够的土地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计。被这样安置下来的农奴,必须无偿耕种庄园主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保留的那一部分地产。

在原始的社会状态下,生活方式极其朴素和简单,当时土地的出

产更多是由于大自然自发的馈赠而不是精心耕种的结果，劳动分工如此之少，劳动者需要完成的工作如此简单，以致几乎每个人都能够从事家庭所要求的日常工作；当时人口如此稀少，以致人人都有广阔的天地——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封建制度的压迫可能并不是太沉重。与古代奴隶制度相比，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进步。在古代奴隶制度下，财富的生产者是可以出售的商品，就像目前美洲的黑人奴隶一样。此外，虽然身为贵族是担任高级官职的必要的资格条件，但贵族中的每一个人却只被赐予头衔和土地上的收入，作为他们承担公共事务的附加物。承担公共事务是一种神圣的责任，渎职者应予撤职并受到惩罚。通行的惯例是，对地产的占有随着受托管理人的死亡而中止，他的家属无权要求把它作为遗产——尽管国王的忠实仆人的儿子们常常得到关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成功地得到了官职，并因此占有了可以在各自家族中继承的地产。他们建立了个人土地所有制。

在成功地保证了对土地的占有之后，大贵族们开始试图使王权服从他们的利益，或者使自己从王权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几个世纪的冲突，这种冲突异常残忍、凶狠，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王权的脆弱的仁慈：在路易十一统治期间，4 000 多名难以驾驭的贵族遭到处决。但是，尽管王权在冲突中占有优势，归根结蒂，只有火药的发明以及随之而把火器用于作战才使王权取得了彻底的最后胜利。仅仅这么一种化合物就使负隅顽抗和桀骜不驯的贵族匍匐在王权的脚下。火药的使用很容易就摧毁了难以驾驭的贵族的据点。在训练有素和兵力集中的军队的火力面前，由贵族的附庸组成的分散的无组织的乌合之众，他们自己独特的作战方式，以及武士制度的全部力量都化为灰烬。贵族武士的

武器对于其持有者来说毫无用处,就像手织机和手纺车现在对于工人来说毫无用处一样。

在我们的叙述所涉及的这一段时间中,农奴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只是按照后者的利益的要求有所调整。当城镇成为主要的工业中心时,乡村农奴的精巧的产品已不能满足他们的主人的口味了。但是,城镇机器生产的高级产品只有用某种东西去交换才能获得——这就是说,必须去购买。货币成了最迫切需要的东西。由于农产品在城镇很抢手,地主们开始变得不那么慷慨了,他们与一部分农奴签订合同和契约。他们把更多的土地用于耕种,并扩大那些以“良好品行”和勤奋而著称的人所占有的土地。但那些人必须为此交纳贡赋。此外,在封地的时代,还有一些小自由农,他们不能保护他们的地产,不得不要求邻近的某个强有力的贵族给予保护,这种保护只有通过交纳贡赋和服劳务才能获得。但也还有另一阶层的人——自由农的子孙,他们不能再在他们父辈的地产上安家;他们不愿意或不够条件加入国王的军队或在城镇找到生计,因此他们被迫接受屈辱的条件而居住在贵族的领地上。结果,随着贵族们的政治权力日趋衰微,他们作为地主的社会权力,他们的收入,他们对生活奢侈品的支配能力,却相应地增长起来。

贵族虽放弃了武器和政治权力,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变得更加稳固。王权不仅维持并保护贵族的特权,而且还扩大了这种特权。躺在胜利的桂冠上休息的宫廷开始纵情于东方式的浮华和淫逸,沉湎于豪华的宴会和娱乐,贵族们也被邀请参加。这一切的结果是,贵族们离开了他们的乡村居所,聚集在王座的周围,并且完全抛弃了他们的旧的生活习惯。如果说旧日的贵族的特点是不顾一切地进行家族争斗、拦路抢劫和反叛作乱的话,他们处于新的地位的后裔则似乎想

要使自己往日的辛酸得到补偿,而不顾一切地沉溺于腐化、荒淫和放荡之中。农民受到的压迫随着骄奢淫逸现象的发展而加剧。在大多数情况下,地主的代理人和管家成为地产的单独管理人——为了满足主人的需要,他们使用一切手段从农民手中获得钱财。书面契约在地主的掠夺行为面前不起什么作用。地主对他们的附庸拥有最大限度的司法权。农民可向之申诉的法官都是原告的雇员,无论何人敢于根据书面契约拒绝支付任何款项,如果他能逃脱因他的鲁莽行为要受到的惩罚的话,他应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再者,必须牢记,法律禁止那些被压迫的人获得任何形式的财产。土地、村舍、产品和家畜,甚至农奴身上的衬衫,这一切都是地主的合法财产。无论农民通过自己的勤劳和节俭省下了多少钱,都必须藏起来,不让贪婪的贵族觉察。目前的农民所有者的前辈们当时的处境就是如此。

无论乡村人口和城镇人口之间的社会状况有多大的差别,当时只有一种不满、愤慨和厌恶的情绪在整个民族中弥漫,只需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就会爆发出来。是宫廷自己创造了这样的时机,它由于采取愚蠢的镇压措施而引起了巴黎街头的战斗,这次战斗以1789年7月14日摧毁巴士底狱和人民获得完全胜利而告终。巴黎人获胜的消息刚刚传到外省,农民就立即行动起来报仇伸冤,摆脱枷锁。他们拒绝服从贵族的统治——他们举火焚烧了他们的契约和封建地契,并摧毁了专制的地主的城堡。为了防止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农民的解放必须立即由国民议会这一新建立的政权机关的法令加以承认。在8月4日一夜之间,所有的封建负担、特权和附属物——整个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都被废除了。什一税被宣布为可以赎买的,并且应该变成用现金支付。然而几天以后,即8月11日,什一税被完全废除了,不用向教士支付任何赔偿。这样,在短短七天之内,

农民除了向国家纳税之外，在法律上解除了一切负担。他们成了自己所经营的土地的自由和独立的所有者。土地被作为赠给农民的礼物。当王室和教会的土地被宣布为国有财产，并被出售以偿还国家的债务并支付目前的开支时，新的所有者公民得到了更多的好处。除此之外，一些已流亡在外的贵族的地产也被出售以充实国库。因此有大量土地进入市场，国家急需货币，货币又十分缺乏——这一切都使土地的价格降低，于是买方得到了一切好处。刚解放的农民自由地购买土地，但他们从哪里得到货币呢？他们打开了窖藏的钱财——他们原先把货币妥善存放，这些货币也许已被锁了若干年，不参与流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农民拥有了所有地产中非常可观的一部分。这就是法国农民所有制的起源。

虽然半世纪以前农民的前途充满希望，但农民所有制在进一步发展中产生了最悲惨的结果。农民所有制是以土地的分割为基础的，而法国的继承法导致了再分割；再分割造成了债务，债务则导致赤贫和破产。根据法国现代的继承法，一个父亲的所有子女都有同样的权利要求继承世袭的地产。假设一个有四个子女的父亲拥有40英亩的土地，他去世时没有债务负担，这个田庄将被分成各为10英亩的四块土地。由于这种分割方式一代一代地相继实行，总有一天地产会变得太小而不能再行分割，在这种情况下，债务就不可避免了。由于子女们都有平等的权利，无论是谁继承父业，都必须给兄弟姐妹们以补偿，除非父亲还有相当于农场价值若干倍的积蓄，其倍数和他的子女一样多。由于这是不可能的事，继承父业的人一般都去找资本家——抵押贷款人——借钱，经验表明，这些借款成为土地承受的永久的负担。如果一位父亲是一个负债的田庄的所有者，他不能积蓄下足够的钱使这块土地在留给他的子女之一时不拖欠债务，

那么,那个在继承产业时就带有债务的孩子又怎么能够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把产业留给他的下一个继承人呢?很明显,每一个后代都在恶劣的前提下起步,总有一天,当一度走运的自由农的子孙们成为乞丐和穷光蛋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会放弃继承权。这种状况究竟导致了多大程度的痛苦,这可以从官方的统计表上看起来,如果说这些统计表有些不符合实际的话,那么它们只是把情况反映得更好而不是更糟。根据 1845 年一份官方统计表^①,在法国:

住房除大门之外没有别的门窗者	348 401
住房除大门之外只有一个门窗者	1 817 328
住房除大门之外只有两个门窗者	1 328 937
	<u>3 494 666</u>

在这些破旧的小屋中居住着整整 1 600 万人,或者说将近人口总数一半的人,所有这些都向国家纳税。同一份统计表指出:

“全法国乡村乞丐的数目达到了 400 万人;而且,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所有者通常食用的面包是由糠、黑麦、大麦、蚕豆和土豆组成的混合物;除了一年中的两三天节日之外,他们几乎吃不上肉。”

1847 年,路易-菲力浦的视察员们报告说,法国被分割为 11 511 841 块小地产,每块地产交纳占其收入十二分之一的税款;只有 6 881 块地产上的收入一年达 400 英镑或更多,整个法国抵押借款的总额达 50 176 万英镑。

谢加赖先生在 1851 年 4 月 29 日的报告中指出:“在法国,几乎所有的土地所有者都是破产者。”事实胜于雄辩,无需多加评论。但

^① 1852 年 5 月 1 日《经济学家》第 453 期。——编者注

是债务并不是困扰农民所有者的唯一困难。农民所有者被来自各方面的障碍包围着,这种障碍日益增加而他们克服困难的能力却相应地日益减少。

二、农民的负担

如果说 50 年前农民的处境是法国的骄傲的话,那么在 19 世纪中叶它已变得十分糟糕。当基佐为抵制建议实行某些有利于工厂主的措施而提到农民的处境时,他捍卫的只是乡村利益的一部分,即以向抵押贷款人交利息的形式,慢慢地从农民的口袋流进了抵押贷款人口袋中的那一部分。我们已经看到,讲平等的中等阶级国家所能做到的一件最不起眼的事情,即在子女中间平分财产,怎样导致了土地债务,怎样给农民铸造了新的枷锁,并把独立的所有者变成了金融寡头的奴隶。但是支付利息只是压迫着农民所有者的负担中的一部分。现代的抵押贷款人像旧日的贵族一样,有自己的代理人、账房先生和律师,所有这些人在可怜的农民得到贷款以前都要对其进行盘剥。首先是签发证书证明抵押人的地产的位置、等级和价值的评估人。必须为他的服务付钱。其次是农民雇来寻找抵押贷款人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大多数一身而二任。资本家雇用他们招揽顾客,顾客则雇用他们寻找货主。他们要求借贷者付给他们的费用随着抵押市场上银根紧和抵押品稳定性差的情况而增加。接着是开列抵押凭据的律师,最后是负责把交易登记在国家登记簿上的登记人。只要是地产易手,或抵押贷款人取消贷款,或者贷款期满,这套程序就得从头再来。但这还不是全部。由于再分割、内部通婚、买卖等原因,财产变得纵横交错,以致一个人的财产往往分散在许多地区,地区的

数目同他拥有的英亩数一样多。在一个地点拥有 100 英亩土地的人，可以在一次交易中把他的地产抵押出去；而在五个不同的地点拥有五英亩土地的人，如果说他要抵押出去的话，就必须交五次费用。

财产从父亲到儿子，从卖方到买方的转移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财产的每次转移都必须依法登记，地产分割成小块的数目越多，需要支付的律师费用就越多。这些花费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是这一制度的主要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除此之外，农民所有者还必须支付其他的法律费用，这些费用是他们通常互相心怀敌意而迫使对方支付的。随着财产变得更加不稳定，随着贫困的增加，出现了贪婪、嫉妒和好打官司的倾向。根据遗嘱分配土地、私下买卖土地等等，使亲属们觉得自己上当受骗，再加上地产的纵横交错，就常常会引起诉诸法律的行动。经常地和精密地分割土地，意味着要划定永久分界线，要竖起坚固的栅栏。因此争争吵吵、冒犯邻居之事是常有的。只有那些真正熟悉这种情况的人才能意识到有一个诚实和相处得好的邻居确实是一大幸事。让我们来谈谈农民无知之福。每一个小农都是疑虑重重和心怀不满的活的泥土。他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盘剥、掠夺和欺骗，理所当然地用怀疑的目光看待他所接触的任何人。反动派所谓的农民无知和头脑简单，这只是对不发达和被忽视的精神状态，对一种反常的痴呆的改头换面的说法，这种情况之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它是教会和国家雇用的僧侣培养和指引的。教士们除去国家给他们的薪俸以外，还向农民索取钱财；但是他们是以自愿送礼的形式索取，那些被愚弄的人由于送了礼物而被许诺有特殊资格得到天堂中的一个舒服的位置。

但这还不是全部。除了抵押贷款人和他的随从，除了法官和教士，还有商人阶级，他们秘密地采取行动，积极地在农民遭受灾难时

进行投机。在所有经营者当中，小农最需要贷款，而在所有经营者当中，小农得到的最少。歉收、洪水、破坏性的冰雹，这一切都可能出现，并足以使小农无力偿付债务。他能以什么作为担保？他的地产吗？它已经按其最大价值抵押给了抵押贷款人。他的收获——他的辛勤劳动的预期报偿吗？一小时的灾难就足以使它毁灭。实际上，除了一张借据之外他什么东西也拿不出来。因此，当他想借物品或现金时，他必须求助于那些以“不是失去一切就是得到一切”为原则做生意的人——高利贷者或赊销商人。这样他就按最苛刻的条件借贷。他不得不支付高利贷者的利息和骗子的利润。一旦落到这些人手中，就几乎不可能解脱。这是因为，虽然他的支出由于借债而增加，他的收入却仍然和从前一样。那些起初迫使他接受不利条件的的原因仍然起作用，或许甚至更为加重。因此，农民所有者正缓慢地但稳步地向资本家交出财产。他的困难一步一步地增加；他一步一步地在债务中陷得更深；他一步一步地走向贫困和破产。但是所有这些交易看起来都对农民更加有利而不是有害——它们具有某种自愿的性质，因为是农民自己同意那些单个的资本家得以牢牢控制他的条件。是他向抵押贷款人求助的，因为他想拥有比他自己的钱所能买到的土地更多的土地。为保护自己他乞求于法律。如果没有高利贷者和赊销商人，他常常会被迫立即放弃自己的田庄。当死亡要求农民留下他那块负债累累的土地时，教士就充当他和上帝之间的仁慈的中间人，即虔诚的农民借以爬上天堂的阶梯，——如果不是债权人先于农民死亡，使农民什么也留不下的话。但是资本家还在另外的名义下出现——即作为国家的集体力量，他们以这种力量从总体上控制农民，并且强制农民以税收的形式交钱；农民交了税，却几乎得不到任何服务，除了宪兵的监视以外。农民从政府开支中得到什

么好处呢？受教育吗？穷人受教育会对事物的现状产生危害。得到军队的保护吗？农民并不需要它；军队是雇用来控制城镇，保卫农民的压迫者的。得到海军的帮助吗？海军保护的是那些掠夺农民的人的漂浮于海洋上的财富。保证对公债债权人守信用吗？国债并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发行的。农民对于保证对债权人守信用毫无兴趣。国家税收全部都花在维护那些与农民完全无关的利益上。尽管如此，农民必须交税——既没有向他征求意见，也不允许他发表意见反对这种税收。

农民的开支不断增加，并已使小所有者走到了破产的边缘，国家却至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通过公有经济来减轻灾难。相反，就好像破产是国家行政当局的目的，各届政府已迅速地走向公共开支远远超出国家财源的境地。在不到 40 年的时间里，在农民不断贫穷的同时，公共开支已经翻了一番以上。自本世纪初以来，各届政府的支出是这样的：——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平均年支出为 75 000 万法郎。1815 年到 1830 年，波旁王朝时期，平均年支出为 91 000 万法郎。路易-菲力浦的“廉价”政府前 12 年中每年花费 115 000 万法郎；后几年的支出达到每年 14 亿法郎。1848 年统治法国的诚实的共和派设法以每年 15 亿法郎的开支管理国家事务。从那以后，公共开支大大增加；但是由于从 1848 年起没有新的税收强加于农民身上，这部分增加的开支不属于目前要探讨的问题。在金融寡头的议会统治下，在全部国税中，农村人口交纳的不少于 57%。因此法国的土地所有者必须向国家交税，以及每年向资产阶级交付总数达 6 000 万英镑的抵押利息，这还未算临时需要的借款的高额利息、赊销商的利润以及法律费用。

公共钱袋的监护人，那些诚实和正直的立法者，乃是像旧日的贵

族一样的无耻的巧取豪夺之徒。如果征税的数目与公共事务的需要相一致,没有人会一直对征收不动产税是否恰当这一点提出质疑。但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实行公开的欺骗和抢劫。不仅国家征收的税额过高,而且农民所有者实际上被迫交纳土地税,而他只不过是土地的名义上的所有者。如果 A 以 1 000 英镑的价钱购买一个田庄,并为支付购买费用而将田庄以 500 英镑的价钱抵押给 B,很显然,事实上 A 只是一半田庄的所有者,但他必须为另一半的全部价值支付利息。但是国家对 B 却从来都不操心。收税人被派到 A 那里, A 被登记为一块价值 1 000 英镑的地产的所有者,他必须交纳该地产的全部的税金。因此, A 作为所有者要为自己支付一半税金,同时还得从他作为农民的收入中拿出钱来为 B 在地产中的份额支付另外一半税金。现在,由于全法国的土地抵押金额已达 5 亿多英镑,由于这笔钱必须包括在土地应纳税的价值中,结果土地所有者必须从他们辛苦得来的收入中拿出钱来为抵押贷款人交纳那部分地产的税款。这是那些无非披着合法外衣、无法无天地欺骗勤劳的人的立法者们策划的抢劫。他们像强盗一样抑制了受害者的声音,锁住了受压迫者的每一部分肢体,以便使政治宣传和发展同样陷于瘫痪。正统派、奥尔良派和共和派相继用尽可能大量的税收,实行同样的加重农民负担的准则;这种方法基本上是有效的,因为农村居民没有抵抗的手段。新的帝国政权是否会向农民所有者征收额外的税,还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不久以后,路易-拿破仑将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增加税收;因为收入甚至不足以抵偿平均开支,更不用说目前流行的铺张浪费了,这种铺张浪费没有为减少它在至今由农民负担的公共税收中所占的份额留下任何余地。

三、小田庄制度的穷途末路

在前两篇文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作为所有者、欠债人、诉讼当事人和纳税人的农村公民——被缚住手脚,听任贪婪追求钱财的资本家宰割的受害者。现在我们应该来看看他作为黄油、奶酪、牛肉、羊肉、谷物等的生产者,简单地说,作为全国食物的供给者的情况。

英国十分盛行的大农场制度与在法国通行的小田庄制度之间有本质的差别。大农场制度就像任何一个工业企业一样,是在商业原则基础上运行的。与资本家投资于棉纺厂的目的相同,大农场主通过把资本投入食物的生产开始经营活动。棉纺厂主和大农场主所关心的都不是他自己私人的消费——他们的企业生产产品,其目的是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对他们各自的经营行业中的无论何种货物,只要可能有很大需求的,他们都竭力供给。两者都追求利润。利润是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市场价格指挥着两者的经营行业的行动。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一个人靠雇用纺织工人而实现自己的目的,另一个人则靠雇用庄稼人和牧羊人。只要减少生产成本就能增加利润。因此,大农场主的最直接的利益,要求他必须经常更新并逐渐改变他的生产方式,因为科学上的新发现和机械上的发明为向前迈进提供手段。在大农场制度下的耕作方式基本上是现代化的、科学的和进步的。

小田庄制度下的耕作方式充其量是一种过时的和固定不变的惯

例。小农在开始经营时就不具有像大农场主一样的目标。他的主要目的是保证有活干并为他自己及家人生产食物。只有当他幸运地获得多余的收成,或者当收税人、收利息的人和别的人逼他付款时,他才会想到把他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

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里,十分之九的土地都由小所有者耕种,为工资而受雇于人是很不稳定的。英国意义上的农业工人几乎不能存在。那些充当工人的人,要么是按年度雇用的仆人,单身汉,要么是所有者中最贫穷的人,他们的田庄的产品不足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因此他们乐意去帮助那些碰巧拥有的土地稍多一些而自己在农忙季节里忙不过来的人。只有这种偶尔帮忙的工作结了婚的人才有一份儿。

由于小农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使自己和家人有活干,小田庄制度排除以机器代替人力劳动的所有现代化工具的使用。小农的进款并不在于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他的收入就等于生产成本本身——这是对他自己辛勤劳动的报偿。降低生产成本就等于是降低他本人的货币价值。蒸汽动力、播种机、收割机及粉碎机等等的使用将取代人力劳动即他自己的劳动;这将会贬低他体力的价值。因此,小田庄制度的存在本身依赖于旧的耕作方式的保存。

那些改进和进行粗放耕种的方法,其发展受封建制度的阻碍,几乎被第一代农民所有者用尽了。在最近20年中,除了风调雨顺的季节偶尔造成的情况之外,农业产品年总产量已固定不变,没有任何增加。犁、铲和锄所能做的一切都已经完成,小所有者只能做到这些。使用一些并不贬低人力劳动的最有利的改良设施,比如灌溉和排水设备,因为地产太小和纵横交错而成为完全不可能。但这还不是全部。种好田获丰收之本在于肥料,而足够多的肥料只有从牲畜那里

才能获得；但小田庄制度完全不适于大量饲养牲畜，就像不适于使用机器一样。小农的地位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可悲的。他被来自各方面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包围着。

为了能使读者了解法国人民从现在通行的耕种制度中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供给这一状况，同时也为了说明大型的耕种制度和小型的耕种制度的不同，我们引用一个法国经济学家卡蒂诺·拉罗什先生的如下的资料，他说：

“法国农产品的总产值，在所有法国人中分配，为每人约 133 法郎。英国农产品的总产值按人均计算约 235 法郎。一个法国农民每年生产 215 法郎的价值，而一个英国农民则生产 715 法郎的价值。在法国，一公顷每年的产量大约值 105 法郎。在英国，其产值超过 244 法郎。法国种植的小麦只能满足三分之二居民的需要。其余的人靠黑麦、玉米、小米、土豆和栗子生活。

每年供屠宰的牲畜为：	每头价值(法郎)	
公牛和阉牛	492 905	153
母牛	718 956	89
牛犊	2 487 362	26
羊(阉羊)	3 432 166	$13 \frac{1}{2}$
羊(母羊)	1 337 327	$9 \frac{1}{4}$
羊羔	1 035 188	$5 \frac{2}{3}$
猪	3 957 407	35

牲畜肉的总价值在法国居民中分配，为每人将近 12 法郎，而政府的报告说是 16 法郎。

拉罗什估计，各种牲畜每头所提供的食物净重如下：

	法国	英国
	公斤	公斤
公牛	248	360
母牛	144	—
牛犊	29	60
羊(阉羊)	17	40
母羊	12	
羊羔	6	20
猪	73	—

结论是每个法国人消费大约 $19\frac{1}{2}$ 公斤的肉食。”^①

如果这个估计是正确的,那么两头英国公牛相当于三头法国公牛;一头英国牛犊相当于法国的两头;一只英国羊等于两只法国羊和一只羊羔;一只英国羊羔超过三只法国羊羔。

拉罗什估计,英国和法国拥有的公牛数之比为2:1;羊则为57:32。法国的数量较少、质量较差的牲畜要为4 300万公顷土地提供肥料。英国的数量较多、质量较好的牲畜只为2 300万公顷土地提供肥料。

在法国,不少于2 400万的农村人口创造的农业生产总值为188 080万英镑,而在英国,不超过600万的农业人口创造的农业生产总值为139 356 875英镑。其实,没有必要到法国去进行比较。在撒克逊人入侵爱尔兰之前——即在上次饥荒之前——在这个兄弟国家中有200万个效率很高的劳动者被雇用,他们创造的年产值为

^① 1851年9月13日《经济学家》第420期。——编者注

48 020 834英镑,而在英国,只有 100 万个效率很高的工人被雇用,其年产值却达 139 356 875 英镑。按伦敦的消费率计算,法国农民所提供的肉类食品总量只够供应 543 万人食用。因此,如果法国几个最大的城市的居民按伦敦的消费率消费牲畜肉的话,那么 2 950 多万名法国人就得立即变成素食者。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城镇人口的消费量比平均消费量要多得多。因此,饲养牛、羊、猪等牲畜的人只是在牲畜活蹦乱跳的时候才能享受它们的陪伴所带来的愉快,但是却极少用任何一种烤熟了的这些牲畜的肉来点缀他的餐桌。

但是人们会问,既然法国的食物供应如此缺乏,那怎么会在 1851 年向英国出口如此大量的小麦呢?理由显而易见。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之比是 2:1,——因此每个农民家庭只需供养半个城镇家庭。城镇中消费者的平均数同每一个农村的个人相比,等于半个人。因此,农产品的国内市场十分有限,不是有利于农民而是牺牲农民的利益而出口大量的农产品,这与现状十分吻合。上面已经说过,只有当小农有剩余,或者当经济拮据迫使他出卖自己应吃的口粮时,他才会到市场上去。在后一种情况下——这是目前的普遍现象——农民出售产品的数量,是根据国家和金融巨头向他索取的多少以及他的产品的市场价格来决定的。收成越多,对农民辛勤劳动的报偿越丰厚,他能留给自己的就越少。大丰收留给他自己消费的东西极少,因为丰收导致市场价格降低,远远低于超额的供给允许的降价程度。例如,如果丰收的超产部分为平均产量的 10%,那么小麦的价格可能比平均价格低 20%。如果农民的平均产量为每年 100 蒲式耳,为了满足他的债权人的要求,他不得不比如说以每蒲式耳 5 先令的价格出售其中的 50 蒲式耳,把另 50 蒲式耳留给自己用。如果一季丰收的产量增加到 110 蒲式耳,他只能以每蒲式耳 4 先令的价格

出售小麦,因此为满足债权人的要求,他必须出售 62.5 蒲式耳,留给自己用的只剩 37.5 蒲式耳。因此对农民来说,丰收之年就是缺粮之年,而谷物商人由于不能在国内市场处理全部超额的供给,他会发现把前者所缺乏的那一部分产品出口到国外是有利可图的。有人会认为出口会使国内的价格不再低落,终究对小农有利。没有这样的事。小农既没有机会把自己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也不能等待到开始出口之时;他受到各方面要求付款的压力,在十分之九的情况下,谷物刚刚从田里收回来他就不得不把它卖给囤积商人。

凡妨碍食物之生产使之不能充分供给者,都对国家的繁荣有害,对人口的增长有害。经验证明,人口的增长是一切工业、社会和政治进步之本,凡阻碍人口之增长者,都不利于人类的繁荣。小田庄制度非常适合于生活在半野蛮状态下的稀少的人口,他们除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外,要满足的需求极少甚至根本没有。但它同现代工业及密集的和日益增长的城镇人口是水火不相容的。最佳的农业制度是使尽可能少的人处于农村的无知状态,而向城镇人口提供最大限度的纯收益。生产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所需的人手越少,则余下来提供舒适和豪华的生活用品的人手就越多。现代大农场制度最能满足这些条件。小田庄制度既不能使它自己的特殊产品——小农——幸福,也不能促进社会的总的发展。它本身既不先进,也不能为城镇——所有进步和发展的中心——提供充足的生存手段。由于与现代文明不相容,它迅速地走向毁灭,灭绝是它的唯一出路——爱尔兰的情况就是法国农民所有者的未来。

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说,实行大农场制度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机器动力代替人力劳动对劳工的利益有损害。确实如此,但这并不会使生产方式变坏;它只是要求改变分配方式,而这种改变正是工人

阶级利益之所在。但只要土地和土地上的果实仍然属于私人所有，我们就应优先选择英国的大农场制度，而不是法国的小田庄制度。后者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可以从以下的资料中看出：

从1815年到1842年，法国的人口只增加了18%，并且在那一时期，人口增长越来越缓慢；前11年为9%；随后的9年不到6%；而从1835年到1842年的7年间，只有3.1%。1806年的人口普查表明人口为29 107 425人。1846年，据当年的人口普查，人口只增加到35 409 486人，40年中只增加了21.5%多一点。然而，据官方文件，1847年法国人口为35 400 486人，前几年中出现的逐渐停滞，在那一年变成了明确的倒退。在1801年和1851年间，英国的人口增加了98%，而且主要是在城镇。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除非废除目前这种生产食物的制度，法国的人口不可能增加。唯一会增加的只有乞丐，自本世纪初以来，乞丐已增加了10倍。

(待 续)

约·格·埃卡留斯写于1853年6
月底—7月底

载于1853年7月16、23和30
日《人民报》第63、64和65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阿道夫·克路斯

“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 “最优秀人物”和国民经济学家³⁶³

波士顿《新英格兰报》预感到自己那种平淡无味的《国外消息》式的激进主义的重要性，在“没有教养的”公众不再对它进行评论之后，以值得赞许的谦虚态度把自己评价为“最优秀报纸”。这家报纸一段时间以来向我们展示了一些滑稽可笑的闹剧。它像一艘超载的、破旧的小船，从旧大陆的海岸出发进行探险旅行。它猛然发觉自己处在了深海中央，你瞧，人们竟忘了带上罗盘、领航员和精于航海学的船长；它成了风浪无常变化的玩物。在这里，一位尊贵的长者试图向漫不经心的人群讲解形势的严峻性；而当面带笑容的女神嘲弄般地出现在远处，对这帮庸人的混乱行径旁观取乐，从而扰乱了教诲人的礼拜时，他还没有超出福音书的范围。这些杂乱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登上后甲板，轮番转动舵轮，调整风帆。整个混乱局面由于这些直接互相矛盾却又全都出自好心的建议反而加剧了，那位冒牌船长^①听从这些建议，筋疲力尽地想完成这个本身无法解决的任务，想求得

^① 暗指爱·施莱格，1853年起为《新英格兰报》出版者。——编者注

“高度统一”，想找到通往迦南这个未来的奶和蜜的世界的真正的、正确的航线，而刚才他还坐在自己的舱房里梦想并感觉自己是第二个[让·]保尔呢。

今天，就像在临终前的喘息中作最后一搏，突然扯起新的、更大的风帆；明天，又像经过消耗体力的高烧刺激后那样松弛无力。全体船员又疲惫不堪、垂头丧气地把风帆降下来。人们回想起“有趣的”家庭纠纷，想消除这种吵吵嚷嚷的混乱局面。人们试图通过宣布**欧洲观点与美洲观点**的对立使到处传扬的自由公理会³²⁷的美好的活动的“高度统一”破裂，以便掩饰使人感到无能为力的现实的对立。人们不久前还以自由布道者的身分赞赏过雅典公民那种懒散的思想的卓越，赞赏过他们自豪地披在肩上的羊毛片，而现在，雅典公民退到了次要地位，新的演员站到了前台。既然一个有血亲关系的家庭成员过去曾迷迷糊糊完全看不到**古典古代**的文明是建立在绝对的奴隶制基础上的，那么，人们还能期待这些新演员会理解现代**资产阶级**文明是建筑在雇佣劳动的奴隶制基础上的吗？肯定不能。——

在“欧洲观点与美洲观点”的斗争中，代表欧洲出场的是“莱奥尼达斯”式的糊涂虫卢格，他是半打在半明半暗中摸索前进的南德独裁者的波美拉尼亚的北极光。众所周知，他鼓吹他称之为人道主义的一种东西，并且让人在约翰牛那里不时地把自己吹嘘为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之后德国哲学第三梯队的中坚力量。可以把卢格的“观点”简单地作一概述。他在哲学家康德的著作中认识了**有限的自由体系**，在费希特的著作中认识了**绝对自由的原理**，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认识了以**辩证法为中介的绝对自由的原理和体系**。卢格先生暴露了对辩证法一向的本能的反感，他只理解辩证法比较容易的一面，即坚持

矛盾的一面,而没有理解克制矛盾的一面。所以,很自然,他总是把辩证法,例如马克思的辩证法,诋毁为诡辩术。卢格把他的人道主义称作把绝对自由的原理和体系引进社会的入门。卢格先生的这种人道主义,他的实践与理论的统一,就我们所能理解的而言,在于:他在实践家面前把他的实际上的笨拙行为冒充为理论,在理论家面前又把他那古怪的、内容贫乏的思维方式冒充为实践。自从费尔巴哈、鲍威尔、施特劳斯等人一个个轮流被打发走以后,就不再有科学泰斗,更不用说在这期间出现唯物主义者了。从那时起,卢格老爹产生了一种心情,这种心情感染了那位把他的著作译为德语式的美国话的翻译者,对着傻丫头甘泪卿说:

真弄得我头脑昏乱,
好像有磨轮在我头里乱转。①

而卢格已习惯于竭力大声向公众称颂每一任科学泰斗,借以获得自己的知名度。现在用所有这些东西做成了一盘各种矛盾的大杂烩,由于缺少辩证法,最近又浇上了民主主义的酱汁,这个大杂烩作为人道主义的包厢虽然没有在世界剧院里受到欢迎,却在《雅努斯》报上受到了一部分“经过精心挑选的”读者的欢迎,可惜的是,在包厢建成之前,这部分人几乎全部走光了。

在欧洲的新闻界,卢格先生最近几年投身《先驱》,该报由他的朋友桑顿·汉特在伦敦编辑出版,后者在《雅努斯》上合乎逻辑地被赞扬为“英国社会主义者的最出色的作家”。这个故作庄重、胆小怕事的人为了把宪章主义置于死地,曾经宣传过共产主义,因此我们当时就

① 歌德《浮士德》第1幕第4场。——编者注

已经在美国报刊上揭露过他。今天，我们党有充分的根据谴责他。汉特曾挤进宪章派执行委员会¹⁴³，企图使宪章派落入财政改革者们（工业资产阶级）的手中。为了引诱厄内斯特·琼斯上当，无论是在最辉煌的繁荣中还是在最不利的境况中他都宣扬使用有形的暴力，并且仅仅对枪杆子感兴趣，作为报应，他被解除了在工人中间的那个正式职务。太好了！现在这个无赖摘下了面具。他成了中等阶级的一个最值得尊敬的空谈家，布莱特解释说，对这个真正的“守旧的英国人”和遇事决不参与的博爱的热中者来说，这个现代英国资产者的这一理想是对不幸的印度人民有利的，不久以前他认为，比起“糟糕的共和国”来他本人更喜欢专制制度。在被吹嘘出来的“高度统一”的背后狂妄自大的人以自己的极端浅薄而自鸣得意，然而当这种“统一”被卷入现实的冲突之中时，它显得多么可怜！

现在我们转而谈谈“美洲观点”，它在《新英格兰报》上扮演了家庭争吵的对手的角色。这个观点的绝大部分都是老生常谈，新近又加了一些流行小调中的格言警句，显然，这些东西是在小酒馆中，在费城淡啤酒的作用下编造出来的。它们适合做填充肥料坑的材料，这个肥料坑的围墙是用谎言、下流话和陈词滥调砌成的。一些费城的罗马人，主要是那位珀舍先生，就是那个不久前想在皮尔斯的猎取官职的荣誉军团里充当顾圣的捧场者来挣块肩章的人，他们现在喜笑颜开，俨然是这个思潮的胜利者^①。一种经济理论，保守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遭到一切派别的社会主义者的直接反对，——美国人凯

^① 暗指泰·珀舍和查·格普《新罗马或世界合众国》1853年纽约版。费城是这两人在美国居住的城市。——编者注

里和法国人巴师夏的这种理论,在轻信的公众^①面前被说成是德国和美国的最新发现,是国民经済学的“高度统一”。我们将会看到,在夸夸其谈的高度统一敢于进入现实生活的一切地方,它都作为驯服工具供那些现实的暴力驱使。《新英格兰报》的编辑部似乎还没有因从事像国民经済学那样艰辛的唯物主义研究而玷污自己纯洁的思想。因为我们每天都看到,对每个有兴趣排泄的人,……社会问题的讨论……^②。上面提到的学说连同巴师夏先生本人最后都于1849年在蒲鲁东的《人民之声报》上进行的论战中在欧洲社会主义法庭上败诉了;历史的滚滚巨轮早就使得这种针对一定历史时期的理论表述在欧洲社会中失去了一切根据。在美国,今天社会矛盾的发展还远远没有达到已被严重侵害的欧洲所达到的程度,这个理论在那里找到了经济学家凯里这样一个代表人物。这个理论也已经在威兰德教授那里找到了它的保守的资产阶级的对手(从现代英国学派的立场来看)。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新英格兰的大多数学院被推荐为教科书,这使凯里的追随者感到异常不快。

我们简单概述一下这个学说的主线,巴师夏在他的《社会的和谐》中用优美的文笔和通俗易懂的形式对这个学说作了概括,而亨·查·凯里在宣扬这个学说时则没有一点阐述才能,没有概括能力和准确性。不能否认,凯里也有一些积极的认识,甚至是独特的好的想法。他的主要功绩在于:他真正创造了一种特有的、直接在美国土地上成

① 阿·克路斯在此处加了一个注:“顺便说一下,从《新英格兰报》持续不断的呼救声和流传的谣言来看,这些公众好像是仓促作出的假定。”——编者注

② 在《改革报》上这两个地方缺损,无法辨认。——编者注

长起来的、不带外国色彩的产品。他的科学一点也不具有普遍的性质，它是纯粹的**美国科学**。这种科学企图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条件不是斗争与对抗的条件，而是联合与和谐的条件。（理论上很美，而现代工业城市对此提供了实践！）这些经济条件划分为：

1. **地租**，归土地所有者的份额。
2. **利润**，归资本家的份额。
3. **工资**，在完成的产品的价值中归工人的份额。

我们看到，凯里是有经验的，不像费城那些初出茅庐的罗马小青年或者在他们之前的海因岑，把阶级的存在同**政治特权**和垄断的存在联系起来，从而认为，社会和谐无论如何是随着法国大革命仓促达成的，并获得适用于一切时代的专利权。相反，凯里为经济事实寻找经济原因，当然，他在这方面没有超越表现得还不明显的、模模糊糊的、正在发展的美国阶级关系。因此他只是证明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点**在他看来是社会生活的正常关系。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凯里学派与英国经济学家们的论战。它攻击资产阶级的古典代表和无产阶级的最具有斯多亚精神的反对者**李嘉图**，认为他的著作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句话，是一切“资产阶级制度的敌人”的军火库。它不仅狂热地追击李嘉图，而且也追击现代资产阶级欧洲的其他所有一流的经济学家，指责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先驱，说他们分裂社会，为内战制造武器，因为他们厚颜无耻地证明，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基础一定会在它们中间引起必然的、不断发展的对抗。

巴师夏，法国人，是绝对的自由贸易论者；费城的罗马小青年笃信不疑地、天真地照搬他那套“自由贸易的好处”。凯里本人是作为自由贸易论者开始自己的经济学生涯的，当时他常常闹出笑话

来，例如，由于资产阶级的法国具有保护关税倾向而把它同中国相提并论。正如自由贸易派⁶⁴惯常所做的那样，他把社会中的一切不和谐归因于国家不适当地干预应纳入私人产业等等的经营活动。这是纯粹的美国佬，彻头彻尾的美国佬。今天凯里先生变得不高兴了，唉声叹气，和法国人西斯蒙第一样为英国的集中化的大工业的破坏影响而悲伤，他认为这种大工业产生了社会中的“坏原则”。假如他知道，充满“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分散精神和个体精神的德国黄口小儿在大资本的力量雪崩般的膨胀中是如何看到雪球形成的，他一定会万分惊奇。可是凯里除了完全忽视工业的破坏性影响中的**革命的、变革的因素**外，他到底还是地道的美国佬，以致不认为工业本身应该对此负责，而这正应该是他的推理的唯一正确的结论。他让英国人个人对他们的工业的影响负责，不用说，又让李嘉图对英国负责。囿于这一矛盾，他不得不一步步地深入研究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深入研究曾经有过但早就被排挤掉的宗法制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联合。

但是，凯里及其追随者又一次表现了美国佬的机智：他们以站在“最广大、最受苦的阶级”一边为借口，而且我们要承认，他们也是怀着这样的良好愿望和信念，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西斯蒙第是这样做的，他咒骂**现代工业**，渴望重新回到**过时的工场手工业时代**；而他们所做的是，在今天宣扬保护关税。所以，归根结蒂他们只不过是想用他们种种博爱的空话来人为地**加速美国工业资产阶级的英国式的发展**。这是英国和美国之间竞争斗争中的一种博爱的、乌托邦式的方式，这种斗争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经济学的天才的一面在这里表现得特别出色。因为这一点甚至完全被凯里学派忽略了，所以如果我们设想那些国家痔疮患

者和《新英格兰报》新出炉的国家经济学家对此哪怕有一点了解的话，那自然会是一种奢望，因为他们已经在资产阶级的污泥中陷得没过了耳朵，却丝毫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已经背得烂熟的这个潮流的历史意义。

在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斗争中，我们也看到后者越来越陷入威尼斯、热那亚和荷兰的境地，在它们的贸易势力的垄断被摧毁之后，它们都被迫贷出自己的资本以获取利息。热那亚和威尼斯曾帮助荷兰复兴，荷兰曾给英国提供过资本，同样，现在英国也被迫对美利坚合众国做同样的事。只是今天在这一转变中一切关系都比以前有所发展。英国的状况不同于那几个国家的状况，因为在那些国家贸易垄断是占统治地位的因素，这种垄断很容易被打破，而英国却同时拥有工业的垄断，这种垄断就其本质而言比较坚韧。另一方面，英国资产阶级的资本过度饱和现象越来越严重，因而不得不在两大洲修建铁路，把资本投入柏林的煤气照明业、波尔多的葡萄园、俄罗斯的工厂和美国的轮船。这一切给最富趣味的考察带来了素材，使人看到英国的中心资本的吸引力是如何必然地以它又辐射到世界每个角落的离心力为补充的。这是一次革命——而且，是英国人白白为欧洲大陆建造了所有这些交通大道和供生产用的机器。美国不期待革命；它以保守的资产阶级的办法结算自己的帐目，它不时地用破产来同英国进行清算。这是它迅速崛起的秘密之一，这是一种正常现象，正像铁路和轮船发生灾祸一样。同样的漠不关心，同样的令人眩晕的生产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使成千上万在其他情况下决不可能来到世间的东西被创造出来，另一方面又冷酷无情地通过蒸汽造成了成百成百人的过早死亡。前者就是以后者为补充的。**资本家联盟的**

财富毫无顾忌地成倍增长,而对人的死活全然不顾!对“个性在盎格鲁撒克逊精神中的胜利!”所作的评论就是这样说的。这一切都是事实,当然,这是费城的罗马小青年那种“平淡的怕打斗的心理和平庸的理解力”所难以理解的,他们从某篇保守的评论中竟然领悟到,洛厄尔的女工今天的收入要比30年前好三倍。按照这一聪明的结论,那些女工过去一个星期只能吃到四天半的饭,她们的裸体最多只能用一块遮羞布来遮盖。这座城市完全是在30年中新出现的,它在30年中从平静地艰难度日的200居民发展成一个有36 000人口的工业城市,今天在这些人口中约有 $\frac{1}{3}$ 是女工^①,她们平均每周拿到三美元的工资用以糊口,这就是说,她们的工资围绕着这个平均价格涨落,营业好的时候她们一周能存上一个分尼,完全停产或只开半工时,她们的积蓄就又花光,这些女工的绝大多数不是由于民主的规定,而是由于处境所迫注定要独身。这一切都是事实,一个“民主的”猎取官职的候选人竟可以视而不见,人们甚至可以认为,他是有足够的视力的。

“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除此之外人们(即费城的罗马人)看不到别的”,这一点我们在美国这里当然不能否认;黄热病扮演罗马民主派专员角色的时间已够长了,这种平等在新奥尔良已经显示出来。但是,年轻的先生,平等的机会是在资产阶级视野的那一边,只有在改革者认识了现代工人关系的整个影响之后,他的没有成见的广阔的

① 阿·克路斯在此处加了一个注:“洛厄尔的人口中的 $\frac{5}{8}$ 是女性,男性只有 $\frac{3}{8}$ 。我们相信,事实上这种比例失调还要严重得多。”——编者注

视野才能包容平等的机会。

我们现在概述了每一个大陆的英雄，而在概述新大陆的那个英雄时着重讨论了本来意义上的、被他一再平淡无味地模仿的国民经济学，（我们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遵守对公众应有的礼节，是为了打破在他们论述的单调中体现的无聊，打破在他们论述的晦涩中表现的肤浅的知识）——在这之后，我们还必须指出，两个派别都互相指责对方对世界历史严重无知（我们只是简单地提一下），编辑部有时也把这些动人的“有趣的”场面叫作“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在这里，海因岑带着疯狂的罗兰的旧面具以教父的身分出现。

敌对达到高度激烈的程度，看来敌对双方的论战与其说将化解为渴望的“高度统一”，不如说将在拳打脚踢中变本加厉。于是，就临时凑成了仲裁人的统一，把某个“庄重的”人物、某个小共和国的前外交官和公使呼唤出来，当作扭转局面的神仙，如果庄严宣告的治国才能和国际法威严没有完全欺骗我们的话。这种治国才能和国际法威严在小心谨慎的判决中处处都在出卖这位现在就已经在未来的政府重担的压力下叹息不止的人。他调停“斗争”使所有各方都满意；因为两个派别都受到误解，所以没有一派愿意比另一派更不光荣地后退。“莱奥尼达斯”和藹地走到他的对手、“不知名的希腊人”（费城的罗马小青年在喜剧中扮演了他们的角色）的身边，虽然有时还闷闷不乐地嘟囔几句。人道主义祭司合唱团激动地唱道：“在这个神圣的殿堂，不知复仇为何物！”^①幕布垂下了，只是没有五彩缤纷的焰火映红爱国主义的舞台造型，最后一幕还在

^① 艾·希卡内德《魔笛》第2场第3幕。——编者注

后面。

“庄重的”仲裁人充当吵闹的赫拉克利特赢得了所有各方的好感,这种好感是所有在他面前吵闹不休的“未来科学”的探宝者慷慨赐予的,这些人自己承认,他们以加利福尼亚淘金者的方式把他们的未加琢磨的还很粗糙的珍珠扔在了公众面前。看哪,突然间一位不请自来的因而极为尊贵的客人轻松地走来,他更喜欢充当德谟克利特,取笑所有的小丑,他还根据所有的证据相信,在整个斗争中上市出售的是大量的吵闹和少得可笑的羊毛。他嘲笑特有的民主主义悟性的整个臆造,这种悟性只能把革命想象为欧洲中央委员会³⁶⁴的用绳子牵着走的“凶猛的冥府看门狗”。他安慰大人阁下们,告诉他们不应该害怕巴什基里亚人,普鲁士人和巴伐利亚人也没有那么可恶,他向他们说明,不靠王公的君主制,不靠那些头戴挂着或者没有挂着猴屁股帽徽的尖顶头盔的年轻人的那种全国盛行的集会,德国也可以有对付巴什基里亚人的机会,他讥笑为36国的国君、普鲁士、比克堡、达姆施塔特或巴登的政府的民族独立而怀有的温情的“革命的”忧虑,讥笑给予帝国军队——“德意志民族”的帝国军队——的超过巴什基里亚人的偏爱。他嘲笑在逼近的巴什基里亚人潮涌面前表现出的恐惧,嘲笑庄严的责骂,嘲笑治国才能这种小伎俩,嘲笑向普鲁士—巴登的君主们发出的道义的民族宣言,宣言要他们悉心用他们那种残缺不全的专制制度来忠实地抵御巴什基里亚人,保卫36个祖国,这样,民主派预期在拿破仑的预言³⁴¹作出50年后才会出现的大冲突就不会提前到来,而这种预言决不会让他们在生前看到其实现。他嘲笑民主派软弱无能的、荒唐的努力,他们企图把欧洲社会存在的整个痉挛,把整个巨大的历史危机,把千倍的

困难、麻烦和阶级问题变成哥萨克与共和派的无知的、肤浅的对立，把推翻整个生产制度的斗争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世界市场的动荡、阶级斗争和工业变革等等，变成一个纯粹小酒馆餐桌上的问题，变成一顿需要加以布置的友好的早餐。他嘲笑某个缅施科夫的粗野的跟斗，嘲笑他的上司涅谢尔罗德和拉本斯基外交上的荒唐行为，还嘲笑穿翻口靴子的欧洲反革命的唐·吉诃德，嘲笑有权势的可怕的犹太征兵者尼古拉^①，嘲笑他的有治国才能的对手以及他们的高级法官的“无可奈何的声音”。他祝贺“残存的小火星”最终熄灭，祝贺整个装腔作势的官方民主派机关的最终腐朽，而另一方面他向那些由于无产阶级的鲁莽而惊奇得目瞪口呆的竞技队员耳语道：不讲空话的物质的革命正因为如此才恰恰在今天成为不可避免的，它是俄国的势均力敌的对手。

各方面的窃窃私语都被人听到，民主派的绅士们表示出“应有的愤怒”。情绪越来越激动，谁也没有发现，这个无产阶级的滑头冷嘲热讽地作了一番训斥之后悄悄地离开了“高度统一”的神圣殿堂。不停地清理着喉咙。被低估和冷落的治国才能开了紧急一枪，枪声在忧伤中渐渐消失，这种治国才能现在出现在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有名无实的政府权力的总管面前，他带着庄重阴郁的表情，深思熟虑地表现出一副袖手旁观的姿态，从容不迫地摆脱了那群使劲哑舌作声的天才。彼得大帝的遗嘱在他的腋下熠熠生辉，一本猪皮制成的俄国历史书遵照他的命令被搬来并打开，成捆的写在羊皮纸上的条约高高地堆积在他身边。他提高了嗓门。斯维亚托斯拉夫、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尼古拉一一闪现，经过从莫斯科

^① 参看本卷第 268—269 页。——编者注

连续推进到多瑙河的一系列无容置疑的路标。它们指向何方？指向君士坦丁堡，指向沙皇的命运之城。是这样吗？发抖吧，拜占庭！谁来拯救你？谁来把世界从哥萨克的大洪水中拯救出来？民主派吗？“它独自^①徒劳地对着俄国提高它无可奈何的嗓门，民主党在伦敦城，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在圣詹姆斯宫^②都同样声名狼藉”，总管自己这样说。德国的王公吗？他们自己只不过是哥萨克式的君主。布斯特拉巴吗？他自己就想当一个哥萨克“勒马”莱茵河畔。阿伯丁吗？他不是已经有一次让哥萨克直达阿德里安堡了吗？

还剩下谁呢？斯拉夫革命吗？一个不幸的黑山的“Holperlips”^③。它对有治国才能的悲观主义者不再有用处。那还有什么？没有，再也没有了，哪里也找不到拯救的办法！让我们蒙头哀伤，让我们埋葬我们的烛光——哥萨克式的欧洲。且慢！这里革命即将来临，伟大的“暴力的人民革命”，“第四等级”，它来了，对于这个“等级”来说，如果它想看到对其他等级来说自然早已解决的“刀叉问题”^④以后对它也能得到解决的话，那么它除了“去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鞑鞑潮流”，再没有别的事情要做了。是啊，起来吧，同“第四等级”一

① 阿·克路斯在此处加了一个注：“‘民主党’是不是突然把福斯老姨妈和《科隆日报》的布吕格曼先生算作了‘您的’一类？因为后者在最近的麻烦中至少有60次独自提高了他那很爱国、很富民族精神、很仇视俄国的嗓门。整个可尊敬的德国新闻界，除了《十字报》、《波罗的海报》、《奥格斯堡报》、《总邮报》，也都如此。所以‘名声不佳的人’的‘警觉的眼睛和告戒的话’还都有同情者。”——编者注

② 圣詹姆斯宫是过去英国的王宫。当时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虽早已移居白金汉宫，但圣詹姆斯宫仍是英国宫廷的代称。——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第23页。——编者注

④ 即吃饭问题。——编者注

起,起来进行“人民革命”!起来反对俄国!俄国,它是“欧洲的权杖秩序、十字秩序、军刀秩序和金钱秩序”的大本营。

讲演者要结束了,他的“无可奈何的声音”变弱了,他扬起头,环顾四周,扬扬得意,“庄重”、平静而冷漠,

另一个骑手在哪里?

马厩里不见了他的小马。

人们目瞪口呆地打量着这伙老实人。“那里没有山谷吗?”没有人回答。忧郁的讲演者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蓝色的天穹,他结结巴巴地说:“怪论”——他无奈地垂下眼睛——这双眼睛在街上碰到溜走的入侵者,那人正在玩一盒长条火柴——他继续笑着。

阿·克路斯

阿·克路斯写于 1853 年 9 月
8—9 日

载于 1853 年 9 月 14、17、21 和
24 日《改革报》第 48、49、50 和
51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阿道夫·克路斯

*瑟美列和匈牙利王权象征物³⁶⁵

致《改革报》编辑部

贵报以值得称许的独立精神**独家**在报刊上为我们的涉嫌领导人瑟美列进行辩护，这使我的那些作为世界主义者既不为“马扎尔人的上帝”服务，也不拜倒在“俄国人的上帝”脚下的同志倍感快慰。请允许我再补充我认为读者还不太清楚的一些情况。这些补充将会表明，在党面前诬称我们英勇的、简朴的自由战士是叛徒，甚至是被收买的叛徒，这种断言是多么荒谬，这种诬蔑是多么下流。最近的事实揭穿了他的对手的动机；因为对于一位像他这样久经考验的爱国者，的确只有令人最感不快的私人纠葛才能使一些不了解内情的人（而且只能使这样的人）对这种莫须有的事情信以为真。

瑟美列同一个（现在已经去世的）奥地利“宫廷代理人”（在匈牙利这样称呼国家检察官）的女儿结了婚。他的父亲很富有。在整个1848—1849年革命期间，瑟美列夫人住在维也纳她的母亲那里，并且断绝了同丈夫的一切联系，这也许是得到了他的同意。1849年年底，老岳母死了，瑟美列夫人悄悄地变卖了自己的财产并兑换成现

款,这当然无可指责。她父亲的老相识^①很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帮了她的忙。因为在奥地利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到。瑟美列夫人在变卖了财产并兑换成可靠的外国的期票之后,让人给她弄到一张到普鲁士某疗养地的护照,但她没有去那里,而是去了伦敦并从那里到了巴黎,以便分担她丈夫的放逐之苦。奥地利的老爷们则没有捞到任何可以充实他们国库的东西。因此,那种怀疑瑟美列试图事后从沉船中挽救其余财产的陈词滥调,都成了无稽之谈。

近几年的种种事件教训了我们要谨慎行事,而且我们生来就决不再过于轻信他人,至少是对1848—1849年间公认的名人;只是对瑟美列有所不同。你们读过他的《概述》,并且想必会承认书中每一行字都显示出他是一个才智卓越的人。这些吹牛大王发怒的原因,从他揭露这些人的思想空虚时的尖锐笔触和他运用精神武器时的高超技巧中就足以得到解释。瑟美列远远超过我们的许多同胞。他的文章符合匈牙利最进步的观点,而且充满了一种彻底批判精神。我要向激进派的健全理性大声疾呼,这样一位如此思考和如此写作的人难道只凭反动报刊的几篇不可靠的报道就可以被怀疑为奥地利的间谍吗?

马扎尔人

阿·克路斯写于1853年10月
24日—28日之间

载于1853年10月29日《改革报》第69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① 亚·巴赫。——编者注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俄国的失败。——阿伯丁的和平
布道。——英国的工人运动³⁶⁶

(通 讯)

1853年11月18日于伦敦

伦敦的小道消息现在非常盛行。土耳其人跳出了外交的死胡同,并且已经证明,他们不仅能够独立自主,而且还能够向前迈进,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打败俄国人。土耳其人在不久前还被看作世界上最软弱的民族,这个民族的生存,除了列强不可能达成瓜分其领土的协议外,似乎再没有其他任何保障了。就是这些土耳其人,这同一个民族,已经使趾高气扬的沙皇受到羞辱,并使那些以他们自己的迟钝麻木为标准来衡量土耳其的生命力的瓜分狂们极为不快地大吃一惊。到现在为止来自战地的所有消息都一致认为,俄国人被打败了,他们反击土耳其人的企图已经付诸东流。

在4日发生的奥尔泰尼察战役²⁹⁵中,俄国人约有3000人阵亡,其中有14名高级军官。几乎全体营级军官以及许多上校负伤。看

来，在土耳其军队中有一些擅长射击的能手，他们以让俄国军官领略自己的射杀技艺为特别的乐事。而俄国军官则以即决审判和枪毙在俄军中服役的心怀不满的波兰人作为补偿。

即使后来从维也纳传来的神话般的捷报没有得到证实，土耳其人在4日的行动也已经足以使全体外交阴谋家不知所措，这些人曾竭尽全力在很不稳固的基础上重新打开谈判的大门。在切尔克西亚，命运同这些野蛮的世界征服者开了一个更大的玩笑。据来自特拉佩宗特的通讯说，沙米尔的军队打败了2万名俄国人；没有被击毙的，全被俘虏。

重大事件给大人物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老阿伯丁，这位不惜一切代价的媾和大臣，在本月9日为市长就职举行的宴会上一语道破。

就在伦敦各报报道了关于奥尔泰尼察战役的第一批消息的当天，阿伯丁向参加宴会的吃客们进行了和平布道。他在讲话的末尾断然保证说，他的媾和政策决不包含排除战争的可能性。能有一个如此伟大的天才来当政府首脑，这个国家真是幸运。

来自英国北部的关于劳资争端的报道，比来自东方的消息更令人扫兴。工人们失算了。早在几个月前，繁荣还被福星高照，夏季提高工资的许多尝试取得了成就，这种成就使工人的胆子大了起来。他们认为，工厂主可以受他们的摆布了，但他们弄错了。工厂主非但没有提高工资，反而又开始降低工资。资产阶级的报纸一再声称，棉纺织厂厂主不得不限制他们的生产。因此，为了使工人恢复理智，把工厂关闭一段时间，没有比这更合理的借口了。工人们已经有很长时间不断向资本家提出种种

要求，他们太放肆了，因此资本家一有可能就抓住机会来了结这类麻烦事。

如果说工人对消除他们同资本家以及资本家统治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歧还抱有某些希望的话，那么能够使它们恢复理智的最方便的办法莫过于资本家最近的行动方式了。还在夏天的时候，棉纺大王就纷纷结成联盟来抵制进一步提高工资。实行大规模的突然袭击是一下子就把工人置于死地的最上策。当市场饱和已成定局，而工人仍然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有些工厂甚至罢工的时候，联合起来的厂主们就作出决定，把他们的工厂关闭一个月。

由于这个决定，现在兰开夏郡有七八万工厂工人被解雇。这种做法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工人被剥夺了获取救济金的一切可能，外来援助即使不是完全断绝，也已减少到最低限度，工人在商业停滞期间所能指望的教区方面的援助，也在不安分的借口之下遭到拒绝。而主要的是，工人被逼得走投无路之后，人们提出了最不利的开工条件。在有将近25 000人挨饿的普雷斯顿，厂主们提出了他们打算使工厂重新开工的条件，即比今年3月1日以前的工资降低10%，而面包价格却几乎上涨了一倍。

煤矿工人的情况也一样。矿主已经考虑效法棉纺大王的做法。《每日新闻》的一位通讯员写道：威根的煤矿工人饿得受不了，只好放弃罢工。

饥饿是(自由的?)现代社会惩罚其自由雇佣工人的皮鞭。资本家向他的叛逆的工人喊道，挨饿吧！直到你无条件屈服为止！对付他的奴隶，他既不需要皮鞭、棍棒，也不需要监牢。挨饿吧！这就一

语道破了现代所有者的全部权力。

约·格·埃卡留斯

约·格·埃卡留斯写于 1853 年
11 月 18 日

载于 1853 年 12 月 8 日《改革
报》第 103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阿道夫·克路斯

戴维·乌尔卡尔特³⁶⁷

我们从最近轮船带来的一份英国报纸中惊奇地发现，近来常被叫作英国反俄大会的鼓吹者戴·乌尔卡尔特先生竟被称为**替俄国效劳的工具**①。我们只能把这种谬论解释为“自由斯拉夫民族”的阴谋，因为整个欧洲无人不知，乌尔卡尔特至今一直是个顽固的极其狂热的反俄分子和亲土耳其分子。据说，他在驻君士坦丁堡使馆任秘书的时候，俄国人甚至想毒死他。因此，我们要对这个人交待几句，他的名字虽然大家都在谈论，但他所起的作用几乎没有一个人清楚。

乌尔卡尔特总是坚守**某种**固执的念头。20年来他一直揭露帕麦斯顿和俄国人的诡计，却**劳而无功**。一个人有**某种**正确的思想，但又无法让人接受，自然会几乎发疯，他的情况就是如此。他认为帕麦斯顿和他的外交所以至今能够站得住脚，是由于辉格党和托利党不和，这一点部分说来是对的，当然只是对了一部分。目前的英

① 厄·琼斯《俄国人在英国的运动》，见1853年11月12日《人民报》第80期。——编者注

国议会评价某人，并不是依据他的功绩，而是看他“**在职**”或“**不在职**”。乌尔卡尔特这个天生的保守分子认为，要挽救目前的英国议会，只有双管齐下，一方面加强国王的大权，另一方面加强地方**市政自治**。他希望，西欧组成一个像俄国人那样紧密而单一的实体以对抗俄国。所以，他既对政党**毫无兴趣**，也坚决反对中央集权倾向。由于1848年以来的所有革命暂时都对俄国的前进有利，所以他就愚蠢地把这种结果误认为俄国外交的结果，认为这是俄国的**原始动机**。因而在乌尔卡尔特的心目中，俄国密探就成了革命的秘密领袖。由于在保守的旧体系中奥地利同俄国针锋相对，所以他对奥地利特别倾心，而对可能损害奥地利国际影响的一切恨之入骨。他既反对俄国的标准，也反对革命的标准，却坚持民族的个性和特性。在他眼里，犹太人、茨冈人、西班牙人和伊斯兰教徒（包括切尔克西亚人在内）是四个最优秀的民族，据说唯有他们没有受到巴黎和伦敦的庸俗气味的熏染。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历史观必然带有极大的主观性；他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仅仅当作外交问题。至于客观的关心物质利益的历史观，他认为那就像把各种罪行归纳为律条，而不把犯人送上法庭审判。一位评论家对乌尔卡尔特评论说：

“他是一位可尊敬的、固执的、爱真理的、热情的、偏见极深的、完全违反理性的老朽。”

既然他毕生只有一个使命，即以偏执狂者的敏锐和丰富的专门知识进行反俄斗争，所以这一切完全无妨。毕生只有一个使命的骑士，必然会以“高尚的愁容骑士”的姿态再现于世，而且无论在这里或欧洲他都不难找到像桑乔·潘萨这样的随从。《论坛报》的伦敦的初

学撰稿人“A.P.C.”^①就是这个家伙的改头换面的角色。

阿·克路斯写于 1853 年 12 月

7 日—19 日之间

载于 1853 年 12 月 19 日《改革报》第 112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① 费·普尔斯基。——编者注

厄内斯特·琼斯

俄国工具之诡计，“我们的” 内阁在东方之丑行³⁶⁸

联合内阁已不再是一个“联合体”——它从诞生之日起一直就是一个反对自由的阴谋集团——它已四分五裂，穷途末路的各个派别由于它们本身的腐败而分崩离析。没有外部的压力，没有激烈的动荡，而是正如我们所预言，自身的腐朽使它们土崩瓦解。帕麦斯顿勋爵第一个辞职。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大家都知道他敌视一切改革。”我们认为这不是充分的理由，因为约翰勋爵^①的改革法案不大可能是什么全面的改革，以至于竟然刺激了那个把波兰、匈牙利、意大利、葡萄牙或土耳其当作牺牲品的人的脆弱神经。真正的原因必须更深入地加以探讨。

正如马克思博士精辟的文章^②所揭示，帕麦斯顿勋爵一直是俄国的朋友，一直充当俄国的工具。目前形势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把阿伯丁这样一个爱好和平的人都推入一场欧洲战争——至少，要

① 约·罗素。——编者注

② 指系列文章《帕麦斯顿勋爵》，见本卷第395—478页。——编者注

避免这样一种结局将是非常困难的。准俄国人帕麦斯顿说，

“这绝对不行，不管怎样英国也要避免进行干涉。”

他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当然，不是留在内阁里。那样他将不是被多数票压倒，就是不得不按照他的同僚们因外部形势所迫而必须采取的那种观点行事。所以他就辞职，用这个办法来削弱内阁，置内阁于困境，而且恰恰在最关键的时期迫使他们继续分裂。或者，如果他们修修补补地重新建立起“联合体”，他就在议院作为“独立反对派”出现，阻碍他们的每一个行动。他能够以他们做得太过头为理由反对他们，他也能够假意说他们做得不够而反对他们。这样，无论用两个办法中的哪一个，都能够阻止他们做任何反对俄国的事情。也许，他还可以自己组成一个内阁，在一切恶果已经发生之后，在英国遭到无可补救的打击之后上台执政，把俄国所干的当作“既成事实”接受下来，把实际上是他自己所造成的恶果一股脑儿推到他的前任身上，说上一句“啊！那时如果我是首相情况就会完全不同”这样的话，而把全部好名声归于自己。然后，国人在处于恐慌和饥饿、商业停滞的情况下，只好听任他借口挽救已被破坏得难以挽救的商业而同俄国达成不光彩的协议。

根据我们对此人品格的了解，我们敢推测说，这位前大臣所怀的鬼胎就是如此。这是在一场反俄战争的前夕为了俄国的利益而玩弄的花招。

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唐宁街上这个可鄙内阁的阴谋诡计转移到它在战场上的所作所为的话，还可以发现新的同样令人憎恶的原因。俄国人用绝对优势的炮火对付简直毫无防御能力的舰船，使成千上万的土耳其人葬身海底。这是一场卑劣的大屠杀，其卑劣残忍的程

度为“文明”战争史上所未有。据说，俄国人这样干的时候居心险恶地挂着不列颠的旗帜作掩护。如果这后一条消息查明属实，大不列颠就应当立即为俄国海盗船肮脏的旗杆对它的旗帜的这种亵渎要求赔偿。可是，不列颠政府是怎样做的呢？“我们的”舰队可曾对着塞瓦斯托波尔发出它那令人胆寒的隆隆炮声？可曾在返航的海盗船已望见自家海岸之时将其击沉？没有。两艘蒸汽舰偷偷摸摸地开往战场，不敢说“我们去保护我们的力量薄弱的盟友”，不敢提供军事帮助——噢，不！那样可能会得罪俄国——而只是作为流动药房去给伤员送药。他们这样做才可望得到沙皇^①的允许，因为这是为了人道主义，而沙皇就是以人道主义著称的。

不列颠政府的行为令人更加蔑视的是：实际上，在低声下气地以不是去干涉而只是去救助伤员为理由把两艘蒸汽舰派往黑海以后，当奥地利大使^②以令人震惊的蛮横无礼态度要求对这一行动进行解释时，不列颠政府竟丢尽脸面，作出屈辱性的保证说绝无任何敌对或进攻的意图！而一艘俄国战舰跟踪英国这两艘船，监视它们在任何地方的行动，对此就没人要求作出“解释”了，尽管黑海是土耳其的而不是俄国的水域。

而且，我们还被告知，如果联军舰队真的开进黑海，那它将“只是去防止俄国海军和土耳其海军之间发生冲突”。这实际上的意思是，土耳其人将奉命不得进行自卫，他们被禁止在自己的海域航行，而俄国人则被允许拥有一切。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② 卡·路·布鲁克。——编者注

苏丹^①现在已经理所当然地要求兑现他得到过的许诺，即被派去援助他的舰队在需要时应该由他来支配。而且他已经说了：“我需要。”他召见了各国的使节和舰队司令。而这些人是怎样回答的呢？“我们不敢采取行动，我们必须派人向我们各自的政府请示。”

在信使能够到达圣詹姆斯宫和土伊勒里宫^②之前，或者在他们能够把答复带回来之前，土耳其的每一艘船就可能已被击沉，两三万俄国人就可能已在小亚细亚海岸登陆，到了塞里姆帕沙和阿卜迪帕沙的后方。

等待指示！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派使节和舰队去土耳其，而在给他们的指示中却不规定如何处置紧急情况，这是个什么政府！即使是最胆怯最幼稚的政治家，**如果他是诚实正直的**，也会作出这样的规定。常识会告诉他们，既然俄国同土耳其处于交战状态，而两个国家各自的舰队都正在攸克辛海巡航，那是会发生冲突的。使节们和舰队司令们本应奉有在此种紧急情况下如何行动的指示。连这样一点点深谋远虑都没有的人，不配管理一个鸡窝，更不要说管理我们的帝国了。但他们并不是缺少深谋远虑。他们够狡猾的了。他们故意捆住他们的代表和官员的手脚——给这些人的指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指示之一显然是**什么都不要做**。

并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采取这样的方针。这种自造弱势的幼稚行为，这种不许便宜行事的禁令，并不总是表现在我们的使节和海

①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② 圣詹姆斯宫是过去英国的王宫。当时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虽早已移居白金汉宫，但圣詹姆斯宫仍是英国宫廷的代称。土伊勒里宫是法国的皇宫。——编者注

军军官的身上。但那一定是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一个名叫兰伯特的分舰队指挥官在缅甸的海岸上就有足够的便宜行事之权，把英国投入了它多少年来未经历过的麻烦最多危害最大的战争。^①为什么？就因为一个商人没有马上拿到 90 英镑，和一名小吏被留在太阳下站了一刻钟。但现在，人家轻蔑地让不列颠舰队去遮阳处乘凉，一个忠实的老盟友受到毁灭的威胁，一场以可耻的悬殊武力干出的野蛮屠杀几乎就在我们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生。在这样的时候，英国最大舰队的司令^②和一位最高级别的使节^③手中的权力，竟然不及一个小小的分舰队指挥官和一名被派去送信的小吏！

事实在说话。难道不列颠人民不该也起来说话，用毫不含糊的语言来结束这种现在左右着我们的大帝国之命运、阻碍着全世界之解放的这种既愚蠢又背信的不光彩的政策？

厄·琼斯写于 1853 年 12 月 22

日前后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12 月 24

日《人民报》第 86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
- ① 指 1852 年英国以缅甸地方当局“虐待英国商人”为借口发动的第二次英缅战争。兰伯特是当时英国侵缅舰队的指挥官。——编者注
- ② 詹·惠·迪·邓达斯。——编者注
- ③ 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子爵。——编者注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 1 从本文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对东方问题作系统的论述。1853年,俄国和西欧列强在近东和巴尔干半岛上的矛盾日益尖锐并导致了后来的克里木战争。当年3月10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就东方问题写篇文章,并就文章内容提出了几点建议。3月22日马克思收到了恩格斯的文章《土耳其》,认为“很出色”,并连同自己写的那部分作为一篇通讯寄出。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3月22日。文章随北极号轮船3月23日从利物浦出发,4月5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4月7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36号,署名卡尔·马克思。文章发表时,《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在文前加了这样一段话:“就此而论,我们确实应当赞扬通讯作者的杰出才能,正是他提供了这篇有趣的作品。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观点,其中有些观点我们是根本不同意的,但是那些不看他的文章的人会忽略关于当前欧洲政局的重大问题的最有启发性的资料来源之一。”

《论坛报》在发表马克思的文章时有时署名马克思,有时没有署名。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问世以后,人们才知道马克思寄给《论坛报》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恩格斯写的,有的是整篇,有的是一部分。恩格斯写的《土耳其》这一部分曾同其他一些有关东方问题的文章一起,收入由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编辑的卡尔·马克思论东方问题的文集《东方问题。1853—1856年关于克里木战争事件的论文集》1897年伦敦版。——3。

- 2 自1848年起担任托利党下院领袖的迪斯累里于1853年3月被免去了职务,帕金顿接替了他的位置。这个变化是托利党(见注3)长期的党内摩擦的结果。遭到保护关税派的托利党人反对的迪斯累里主张在财政和贸易政策上对自由贸易派的工业资产阶级作一定让步。尽管这次暂时失利,

但迪斯累里的路线后来仍然占了上风,这个路线反映了把旧的贵族托利党变成英国资产阶级保守派政党的趋势。——3。

- 3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代表地主贵族和英国教会高级教士的利益,一贯是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捍卫者,坚决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败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的垄断权。1832年的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到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3、54、80、147、209、289、399、653。
- 4 1853年3月1日帕麦斯顿在下院会议上谰称,如果大陆上的强国要求把政治流亡者逐出不列颠群岛,英国是不答应的。但是,3月4日首相阿伯丁却在上院的演讲中允诺在流亡者问题上可以向大陆上的强国政府作出让步。马克思在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里曾谈到这个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64、670—671页)。——4。
- 5 蒂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于1807年7月7日(同俄国)和9日(同普鲁士)签订的和约。和约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为了分裂战败国,拿破仑对俄国没有提出领土要求,反而使它获得了普鲁士的比亚韦斯托克地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区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以及拿破仑对伊奥尼亚群岛的统治权,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的大陆封锁)。在蒂尔西特,亚历山大一世答应在法国的调停下开始同自1806年起和俄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土耳其举行和平谈判。1807年8月俄国和土耳其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未能缔结和约;1809年军事行动恢复,1812年土耳其战败后才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见注120)。在蒂尔西特,拿破仑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之间还达成了一项瓜分欧洲的秘密协议。除君士坦丁堡以外的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巴尔干半

岛和瑞典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法国将在埃及和余下的非洲国家扩张势力,并可在欧洲为所欲为。——5、106。

6 莱巴赫会议和维罗纳会议是神圣同盟召开过的两次会议。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持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见注9)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

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分别召开过几次会议:1818年亚琛会议,1820—1821年特罗保会议,1821年5月莱巴赫会议和1822年的维罗纳会议。根据会议的决议,曾于1820—1821年间镇压意大利的革命运动、1823年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并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6、106、408。

7 1839—1841年土埃战争和由此引起的各大国间的矛盾加剧,是40年代初东方向题尖锐化的原因。土耳其苏丹的军队于1839年开进了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在1831—1833年占领的叙利亚,但被击溃。西方各强国深恐俄国单独干涉土埃冲突,于1839年7月27日向苏丹提出一个联合照会,声称所有大国都将帮助土耳其政府。但是,英法之间在近东、特别是在埃及的势力范围问题上有争执,结果只有英、俄、奥、普四国于1840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各强国对苏丹军事援助办法的伦敦公约。法国原有意帮助穆罕默德-阿里,但又惧怕因此面临形成新的反法同盟的危险,不得不放弃对穆罕默德-阿里的支持。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军事干涉,穆罕默德-阿里被迫放弃埃及本土以外的全部领地并服从土耳其苏丹的最高权力。——6、361、613。

8 欧洲正统主义国家是指欧洲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过程中被推翻的各个“合法的”王朝和君主制国家。达朗朗所代表的法国外交界在维也纳会议(见注9)上提出所谓的“正统主义原则”(来自拉丁字“legitimus”,即“合法的”),内容就是要恢复“合法的”王朝在欧洲各国的

统治地位。——6。

- 9 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各国从1814年9月18日至1815年6月9日在拿破仑法国被击败后断断续续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是英、普、俄、奥等反拿破仑战争联盟国家的君主和代表，法国因波旁王朝复辟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缔结的旨在恢复各国王朝统治和满足战胜国领土要求的条约和协议，统称为维也纳条约。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奥地利获得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斯等地，普鲁士获得莱茵河两岸及北部萨克森的土地；瑞典从丹麦获得挪威；俄国获得芬兰，并把华沙大公国改为波兰王国，由沙皇统治；克拉科夫成为俄、普、奥共同保护的共和国。奥地利的尼德兰（比利时）合并于荷兰称为尼德兰王国。德意志组成松散的德意志联邦；瑞士重新恢复中立；英国得到荷兰的殖民地好望角与锡兰以及法属殖民地马耳他岛。会议的最后决议规定，恢复法国1792年的疆界，恢复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并将法国置于列强的严格监督之下；法国不得再侵占欧洲领土。1815年9月关于成立神圣同盟的决议是对维也纳决议的补充。

恩格斯在1845年10月15日致《北极星报》编辑的信中谈到这次会议时写道：“‘科西嘉怪物’最后被牢牢地禁闭起来之后，大大小小的帝王们立刻在维也纳开了一次大会，以便分配赃物和奖金，并商讨能把革命前的形势恢复到什么程度。”“所有一切战胜国都把拿破仑的垮台看做法国革命的复灭和正统主义原则的胜利。……”——6、259、279、296、311、375、416、618。

- 10 米尔米东人(les mirmidons)出自比埃尔·让·贝朗瑞的诗歌《米尔米东人或阿基里斯的葬礼》。诗中以隐喻的方式描绘了猥琐低能的复辟时期的法国君主和欧洲的其他一些正统主义的拥护者。米尔米东人在传说中指南特萨利亚的一个部落，该部落的战士曾在特洛伊战争中在阿基里斯统率下作战，同时 mirmidon 也有矮胖、侏儒的意思，借以指猥琐、无能的人。——6。
- 11 土耳其军队曾于1529年和1683年两次围攻维也纳，第一次围攻未能成功，第二次围攻又被波兰国王扬·索比斯基率领的军队击退。

库列夫察战役是1828—1829年俄土战争期间于1829年5月30日发生的一场战斗，结果土耳其军队被击溃。——7。

- 12 加列戈人是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的山区居民。他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许多城市中都有自己的居住区。——9。
- 13 指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在1848—1849年利用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的民族运动反对革命的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在1848年革命前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匈牙利王国的版图。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匈牙利革命政府却拒绝承认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的民族独立权。奥地利的反革命利用了这一情况，使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的起义军同匈牙利人的革命军作战。——10。
- 14 卢西族是19世纪人们对居住在加利西亚、喀尔巴阡山山区和布科维纳的乌克兰人的称呼。加利西亚的乌克兰农民在1846年2—3月举行起义，与此同时在奥地利管辖的波兰地区，以克拉科夫为中心爆发了波兰贵族的民族解放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乌克兰农民与反对奥地利的波兰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多次唆使起义农民将矛头指向波兰起义部队。起义农民击败了波兰起义部队，随后又大规模摧毁地主庄园。奥地利政府在平息了波兰贵族的起义运动之后，又镇压了加利西亚的农民起义。——10、426。
- 15 指1848年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的进程中，广泛的反封建运动和争取完全脱离土耳其统治的斗争蓬勃发展。但是在苏丹土耳其和沙皇俄国的武装干涉下，革命还是被镇压下去了。——10。
- 16 基里尔字母是古斯拉夫语中的一种字母（另一种是格拉哥里文字母），以9世纪中叶的传教士基里尔的名字命名。基里尔同他的兄弟梅福季一起把一些宗教经文从希腊语翻译成古斯拉夫语。俄语、保加利亚语和其他许多斯拉夫语言都使用形式上有所变化的基里尔文字。——11。
- 17 阿格拉姆和布拉格的狂热分子指克罗地亚和捷克民族运动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这些人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反对用革命民主的方法解决民族问题，主张被压迫的各斯拉夫民族联合在哈布斯堡帝国范围内。在1848年于阿格拉姆（萨格勒布）召开的克罗地亚会议的决议中有这种倾向；在1848年6月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上，温和自由派（帕拉茨基、沙法里克）基于这种观点，主张巩固哈布斯堡王朝。与此相反，这个代表大会的民主左派（萨宾纳、弗里奇、利贝尔特等人）则力争与德国和匈牙

利的革命民主运动共同行动。——11。

- 18 指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战争以土耳其的失败和1812年5月布加勒斯特和约(见注120)的签订而告终。和约规定将比萨拉比亚割让给俄国,还规定给予塞尔维亚以内政自治权,这就为塞尔维亚后来的独立奠定了基础。——12。
- 19 加腊沙宁领导的塞尔维亚反俄进步党派,是在西方强国的援助下成立的。1853年3月,塞尔维亚公爵亚历山大根据俄国驻君士坦丁堡特使缅施科夫公爵的要求,革去了加腊沙宁政府首脑和外交大臣的职务。不同党派之间的斗争导致了1853年塞尔维亚国内政治局势的尖锐化。——12、259。
- 20 马克思在寄出3月22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通讯以后,大约在3月24日以前,又为《人民报》写了这篇简讯。简讯发表在1853年3月26日《人民报》第47期,署名卡·马克思。——14。
- 21 指1853年3月4日皮尔斯总统的就职演说。演说明确表示新的美国政府无意插手欧洲政治,对“争取人类自由和普遍进步的事业”只含混不清地表达了泛泛的“同情”。——14。
- 22 这是恩格斯应马克思1853年3月10日来信之邀撰写的关于东方问题的第二篇文章。文章基本上贯穿了马克思来信中提出的第2点建议:“俄国对土耳其的侵犯。奥地利的贪婪。法国的野心。英国的利益。这个纠纷的种子在贸易上和军事上的意义。”
恩格斯写成的这篇文章在3月23—25日,最迟是在25日寄出的。同时寄出的还有马克思25日写的通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发表时把收到的文章分成了两部分。马克思论述时事的部分4月11日作为通讯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39号,署名卡尔·马克思(见本卷第22—26页)。恩格斯写的这部分一天后作为社论发表在1853年4月12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40号,没有署名。——16、22。
- 23 阿富汗战争指1838—1842年的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英国为了对阿富汗进行殖民奴役而发动的这次战争以英国殖民者的侵略计划破产而告终。

同阿富汗接壤的印度西北部的信德省是1843年被英国征服的。在

英国阿富汗战争期间,东印度公司(见注 85)用威胁和暴力手段迫使信德的封建统治者同意英国军队通过他们的领地。英国人利用这个机会,于 1843 年要求当地封建主自认是东印度公司的藩属,并在摧残了起义的俾路支各部落(信德的土著居民)后宣布整个信德省并入英属印度。

印度北部的旁遮普是在英国和锡克教徒的战争(1845—1846 年、1848—1849 年)中被英国人占领的。锡克教是 16 世纪旁遮普的一个教派,它的平等教义成了 17 世纪末反对印度封建主和阿富汗侵略者的农民的指导思想。以后锡克教徒本身分化出封建上层分子,其代表人物领导了 19 世纪初包括整个旁遮普和邻近一些地区的锡克教徒国家。1845 年英国殖民者利用锡克教显贵中的叛变分子,挑起了和锡克教徒的冲突,于 1846 年使锡克教徒国家变成了英国的一个藩属。1848 年锡克教徒举行起义,但 1849 年被完全征服。旁遮普被占领后,整个印度就成了英国的殖民地。——17、165。

- 24 米兰起义是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拥护者 1853 年 2 月 6 日在米兰发动并得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支持的起义。起义者大多数是意大利的爱国工人,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奥地利的统治,但是他们的密谋策略导致了起义的失败。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634—635、640—643、668—669 页)对这次起义作了评价。——20、36、46、88、349、655。
- 25 黑山曾是苏丹的一个藩属,1852 年土耳其和黑山武装冲突后,脱离苏丹而获得完全的独立。武装冲突中俄国要进行调停,被土耳其政府拒绝。1853 年初,土耳其军队在奥美尔帕沙率领下入侵黑山。奥地利政府担心黑山的战事和俄国保护黑山的举动会在哈布斯堡帝国的斯拉夫地区引起骚乱,急忙派遣莱宁根伯爵率领一个特派使团到君士坦丁堡,要求土耳其军队撤出黑山并恢复冲突前的状态。当时奥地利军队集结在黑山边境,土耳其政府被迫让步,同意接受莱宁根提出的条件,停止军事行动。——22、299、389。
- 26 指铸有埃及圣牛阿皮斯图象的钱币;在古希腊,这种铸有动物图象的钱币曾经在公元前 5 世纪以前流通。——23。
- 27 友好协约(*entene cordiale*)是 1830 年七月革命后法国和英国之间建立的和好同盟关系的用语,直到 1834 年 4 月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

了所谓的四国同盟条约,这种同盟关系才具备了正式的条约手续。但是,在签订条约的时候英法利益的矛盾就已暴露出来,致使后来两国关系日趋紧张。这个条约在形式上反对专制政体的“北方列强”(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实际上它使英国得以在对付葡萄牙的王位追求者唐·米格尔和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的借口下,向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提供军事援助,扩大自己在这两个国家中的影响。——25、227、301、432。

- 23 这是恩格斯应马克思 1853 年 3 月 10 日来信之邀撰写的关于东方问题的第三篇文章。文章基本上贯穿了马克思来信中提出的第 3、4 点建议:“3. 一旦发生总的殴斗,土耳其将迫使英国站到革命的一边,因为英国在这里同俄国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4. 伊斯兰教帝国必然崩溃。它将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处于欧洲文明的影响之下。”

恩格斯在 3 月 25—31 日之间写成的这篇文章最迟是在 31 日寄出的。马克思把自己写的有关普鲁士的通讯与此文合在一起寄给了《纽约每日论坛报》。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 4 月 1 日。《论坛报》编辑部又一次把它们分为两部分,马克思写的那部分以《柏林密谋》为题发表在 4 月 1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45 号,署名卡·马克思(见本卷第 34—37 页)。恩格斯写的《土耳其问题》作为社论发表在 4 月 19 日《论坛报》第 3746 号,没有署名。——27、34。

- 29 希腊起义是 1821 年春天由希腊爱国者的秘密组织——赫特里发动的。1821 年 3 月 7 日,亚·伊普西朗蒂(在俄国服役的希腊军官,在敖德萨领导一个赫特里组织)率领一支 5000 人的起义部队渡过普鲁特河,占领了雅西。伊普西朗蒂部队的进军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推动了很快就席卷全国的群众性起义。1822 年 1 月,在埃皮扎夫罗斯召开的国民议会宣布希腊独立,并通过了宪法。土耳其苏丹由于无力对付起义的希腊人,便召令自己的藩臣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相助,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在易卜拉欣帕沙的指挥下侵入摩里亚半岛(伯罗奔尼撒半岛),到处残害希腊居民。

起义开始时,神圣同盟(见注 6)各国对起义抱观望态度。后来考虑到可以利用这种斗争巩固自己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影响,英国、俄国和法国才开始支持希腊,并给予军事援助。俄国在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中又取得了胜利,结果,土耳其不得不承认希腊为独立国。在 1827—1829 年

- 召开的伦敦会议上,英国、法国和俄国把反动的君主政体强加给了希腊人民。——27。
- 30 法纳尔的希腊人是居住在君士坦丁堡老城内法纳尔区的希腊居民,是一些希腊的世袭贵族和权贵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领后定居法纳尔的希腊富有家族的后裔。自17世纪后半叶起,在这些法纳尔的希腊人中就有人出任土耳其政府的译员,到1821年希腊起义(见注29)时,他们中间又有人成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高官要人。——27。
- 31 1804年塞尔维亚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土耳其近卫军对塞尔维亚人的大屠杀。在格·彼得罗维奇领导下,起义发展成争取塞尔维亚民族独立的解放战争(1804—1813年)。在起义过程中,土耳其封建主的土地转归塞尔维亚农民所有。起义者得到俄国经济上、外交上的支持;彼得罗维奇被推举为最高首领后,于1805年4月召集国民议会,向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政府提出地方自治的要求,遭拒绝后继续领导这场斗争,于1808年被宣布为塞尔维亚世袭最高首领,1811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管理机构。土耳其在1806—1812年俄土战争中遭到失败,在1812年5月28日与俄国签订的布加勒斯特和约中被迫答应给塞尔维亚以内政自治权。不久,苏丹乘拿破仑入侵俄国之机,撕毁和约,于1813年征讨塞尔维亚,并在那里恢复了自己的统治。——28、39。
- 32 纳瓦里诺会战(纳瓦里诺,现名皮洛斯,是希腊的城市和港口)是1827年10月20日进行的以土埃舰队为一方和以英国海军上将爱·科德林顿指挥下的英、法、俄联合舰队为另一方的会战。英、法、俄各国为了武装调停土耳其和希腊起义(见注29)者之间的战争而把自己的联合舰队开进了希腊领海。因土耳其司令部拒绝停止对希腊居民的迫害,会战开始,结果土埃舰队全军复没;会战加速了1828—1829年俄土战争的爆发。——29、39、218、409、620、630。
- 33 约翰王的大宪章即自由大宪章(Magna Charta Libertatum),它是受到骑士和市民支持的英国大封建主和大主教强加给英王“无地约翰”的。这个于1215年6月15日签署的大宪章限制了国王的权利,首先使大封建主和贵族获得了好处,甚至规定在他们的封建特权遭到破坏时,可以举行起义反对王室。对骑士阶层和城市居民也作了某些让步,但宪章没有给基本居

民群众即农奴任何权利。——29。

- 34 1849年俄国和奥地利向土耳其要求引渡1849年后逃出匈牙利的革命者，其中包括拉·科苏特和约·贝姆，但土耳其政府却打算用改信伊斯兰教的流亡者来改组和扩充自己的军队，所以拒绝了这一要求。西方列强担心俄国在近东和南欧影响的扩大，决定对俄国进行反击。英国政府向达达尼尔海峡派出了自己的舰队，这一大规模的干预行动迫使尼古拉一世作出让步，放弃了引渡流亡者的要求，但土耳其政府却将不愿加入伊斯兰教的流亡者全部驱逐出境，其中包括此后不久抵达伦敦的科苏特。——30。
- 35 彼得大帝遗嘱是西欧政治家和政论家进行反俄宣传的一个并不存在的文件，据说彼得一世在其中论述了俄国外交政策的总方针。1797年出版的《骑士德翁的政治生涯》一书，最先提出有此遗嘱的说法。后来，法国人查·路·勒叙尔在他1812年出版的《论俄罗斯国家从它产生到19世纪初叶的发展》一书中，叙述了这份伪遗嘱的内容；1837年，弗·加亚尔代在《勋章获得者德翁的回忆录》一书中又使它具有了文件的形式。在19世纪，西欧普遍相信，这份遗嘱或者真正是彼得一世的文件，或者是根据他某个后裔的材料编写的。——30、261。
- 36 瓜分波兰指18世纪根据圣彼得堡协定对波兰进行的三次瓜分。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奥地利分得了加利西亚，普鲁士分得了瓦尔米亚以及滨海区、库雅维亚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加特加利亚的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划归俄国。1793年第二次瓜分波兰时俄国得到白俄罗斯部分地区和第聂伯河西岸和乌克兰地区，普鲁士得到了格但斯克、托伦及大波兰的部分地区。奥地利未参加第二次瓜分。1795年第三次瓜分时，立陶宛、库尔兰、白俄罗斯西部地区和沃伦的一部分划归俄国。奥地利攫取了包括卢布林和克拉科夫在内的小波兰区的一部分。包括华沙在内的波兰本土大部分划归普鲁士。第三次瓜分以后，波兰贵族共和国已不再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
- 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见注9）上，华沙大公国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在华沙大公国的大部分疆土上成立了波兰王国，由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兼任国王。——31。
- 37 指奥地利警察当局以1853年2月米兰起义（见注24）和匈牙利人亚·李贝尼行刺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事件为借口，对被怀疑参加反政府密谋

和参加匈牙利和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人,进行大批逮捕和审判。——34、36。

- 38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划的对被控“密谋叛国”的11名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307)盟员进行的审判。罪证是普鲁士警探编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当局从被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文件。警察局根据伪造的文件和假证据判处7名被告3年至6年徒刑。马克思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和恩格斯在《最近的科隆案件》中彻底揭露了审判案策划者的陷害勾当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国际工人运动所采用的卑鄙手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71—545和563—570页)。——35。
- 39 指拿破仑第三对莱茵河左岸地区的领土要求。法国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从17世纪起就把莱茵河左岸视为法国在东方的“天然边界”。——35。
- 40 这是恩格斯应马克思1853年3月10日来信之邀撰写的关于东方问题的第四篇文章,是《土耳其问题》(见本卷第27—33页)的续篇,文章根据马克思来信中提出的第3和第4点建议(见注28)写成。恩格斯在4月1日开始写这篇文章,最迟是在4月7日完成并寄给马克思的,这样马克思才能在定期发稿的4月8日星期五连同自己的通讯一起寄出。
- 通讯于4月9日随阿拉伯号轮船从利物浦出发,于4月20日到达纽约。编辑部将这一通讯分成了两部分。恩格斯论述欧洲土耳其今后命运的部分作为社论发表在1853年4月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48号,没有署名。马克思撰写的部分作为伦敦通讯同期发表,署名卡尔·马克思。——38、44。
- 41 阿德里安堡条约是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俄国获胜后两国于1829年9月14日缔结的和约。根据条约,多瑙河口及附近诸岛屿,以及库班河口以南黑海东岸很大一部分土地划归俄国所有。土耳其必须承认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自治,赋予它们独立选举国君的权利。这种自治由俄国来保障,这等于确立了沙皇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权。土耳其政府还被迫承认希腊为独立国(同土耳其的联系仅限于向苏丹纳年贡),遵守以前就塞尔维亚的自治问题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并用特别敕令赋予这种自治以法律效力。——39、105、121、154、208、412、433、460、469、620。

- 42 指1806—1812年和1828—1829年的两次俄土战争结束后分别签订的布加勒斯特条约(见注120)和阿德里安堡条约(见注41)。土耳其在这两个条约中被迫答应给塞尔维亚以内政自治权。——39。
- 43 亚尼纳的阿里帕沙是巴尔干半岛西南广大地区事实上的独立的统治者(他的属地包括伊庇鲁斯、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南部等其他地区,以亚尼纳城为中心),从1820至1822年一直同苏丹处于交战状态。他对土耳其军队的作战行动,在某种意义上也促成了希腊起义(见注29)的胜利,但他所领导的带有封建分立主义性质的起义却于1822年失败了。——39。
- 44 1828年春俄土战争爆发后,法国军队在梅松将军率领下于同年8月开进希腊南方的摩里亚(伯罗奔尼撒),几乎没有遇到土耳其埃及军队的抵抗就占领了这个半岛。这次以援助希腊人为名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为了削弱俄国在巴尔干不断增长的影响,加强法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39。
- 45 英、俄、法三国代表讨论希腊问题的伦敦会议于1827—1829年举行。1827年7月6日,三大强国在伦敦缔结了一个公约,确认英俄1826年4月4日在彼得堡签订的议定书,承认希腊的自治权。像议定书一样,公约也承认希腊为一独立国家并同意用武力调停希土冲突。根据这个协议,三强国向希腊领海派去了联合舰队,参加了纳瓦里诺会战(见注32)。在伦敦会议上还签署了其他几个有关希腊的文件,其中包括1829年3月22日的议定书,这份议定书确定了希腊的国界,并规定在希腊建立君主政体。但是,这些协议以及英法两国力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努力,均未动摇土耳其政府在希腊问题上的立场,只是吉比奇将军率领下的俄军在1829年战事中取得的胜利才迫使土耳其政府作出让步。——39、179、410、460、469。
- 46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载的原文中,编辑部曾在文章的最后加了如下一段话:“现在,想对欧洲的人民事业有所帮助的人的责任就是:尽一切力量促进土耳其治下的基督教国家发展工业,普及教育,尊重法律,发扬向往自由和独立的本能。世界和平和进步的前途都有赖于此。要想丰收,在耕耘和播种上所花费的任何劳力都不能认为是多余的。”——43。
- 47 暗指自由派资产阶级在普鲁士1848年三月革命(见注355)刚刚开始就已

转向右翼。在柏林3月18日起义爆发后,资产阶级立即组织了城市武装来对付起义的工人。恩格斯在他的著作《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描述了普鲁士当时的情况,他指出:“资产阶级和被推翻的制度的拥护者在柏林的街垒上订立了联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1页)。——45。

- 48 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是为德文周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写的。因为周报连续刊载了威·希尔施的辩护文章《间谍活动的受害者》,其中提到马克思和间谍亚·班迪亚有共事关系的问题。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反驳了希尔施对自己的诬蔑,澄清了自己同班迪亚的关系。

文章写于1853年4月9日,载于1853年5月5日的《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8期,署名卡尔·马克思。——48。

- 49 维多克等人的自供指《维多克回忆录》1828—1829年巴黎版第I—IV卷。

阿·谢努的《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年巴黎版。

律·德拉奥德的《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1850年巴黎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专门写了一篇书评来分析批判谢努和德拉奥德写的书,书评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1850年第4期。——48。

- 50 指费·库珀的长篇小说《密探》中的主人公哈·伯奇,他是一个有信仰和爱国心的高级密探。——48。

- 51 即希尔施和其他警探根据普鲁士警察当局的指示所伪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这个伪造的会议记录在科隆案件中曾被用来作为控告材料。马克思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中对这个伪造材料作了详细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71—545页)。——49。

- 52 从这篇通讯开始马克思用一组三篇文章来论述联合内阁的预算问题,在抨击格莱斯顿财政计划的同时,继续对联合内阁和英国寡头体制进行批判。这组文章在马克思1852年夏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定期撰稿工作中占有重要位置。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4月12日,4月13日文章随洪堡

号轮船从南安普敦出发,4月26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4月27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53号,署名卡尔·马克思。——53。

- 53 “废除对女王陛下的犹太臣民的某些权利限制”的法案是约·罗素1853年2月24日在下院提出的。过去英国信仰犹太教的公民既不能担任国家公职,也不能充当议员,因为所有的议员都必须以基督徒的真正信仰宣誓。这一法案使犹太人有权被选入下院。该法案在下院被通过,却遭到上院的否决。马克思在《议会辩论。——僧侣反对社会主义。——饿死人》一文中对该法案作了评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51—657页)。——53、324。
- 54 加拿大教会后备基金是1791—1840年用出卖加拿大土地所得进款的七分之一建立起来的,主要用来津贴享有特权的英国国教会和长老会教会。其他教会代表对基金的这种分配办法十分不满,因而促使英国议会在1853年通过了加拿大教会后备基金法案,授权加拿大立法机关将基金按各教教徒人数比例分配给各个教会。——53、68、324。
- 55 根据英国议会通常的程序,在讨论某些重要问题时,下院即自行宣布成为全院委员会开会,由下院议长在主席名单中指定一人担任全院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whole House)主席主持会议。——53。
- 56 南海泡沫公司即南海公司,是英国在对南美和太平洋诸岛开展贸易的名义下于1712年前后成立的,它的真正目的是从事国家证券投机。这个公司从政府那里获得一系列的特权和垄断权,其中最重要的是发行国家有价证券的权利。该公司进行大规模的投机活动,于1720年破产。它的破产使英国国债大大增加。1853年格莱斯顿曾试图用收买该公司贬值股票的办法来偿还一部分国债。——57、64、101、130、253、364、382。
- 57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出典于伊索寓言《说大话的人》。一个说大话的人自吹在罗陀斯岛上跳得很远很远,别人就用这句话反驳他。其转意就是: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57。
- 58 指1853年2—3月下院讨论爱尔兰的梅努斯天主教神学院的教育制度问题。根据议会的决议,这个建于1795年的学院自1846年起一直在领取建造和维修新楼的津贴。英国议会定期拨给梅努斯神学院津贴,目的是把爱尔兰天主教僧侣笼络到英国统治阶级方面来,从而削弱爱尔兰民族

解放运动的力量。——60。

- 59 《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便士》一文是马克思在《人民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论述阿伯丁联合内阁预算的文章，文章内容与《内阁的成就》（见本卷第53—61页）关于预算问题部分基本一致，文章写于1853年4月13日前后，作为社论发表在1853年4月16日的《人民报》第50期，署名卡·马。——62。

- 60 本统计表中的资料，马克思主要取自威·科贝特的著作《纸币对黄金》1828年伦敦版第21—25页。

科贝特根据英国1752年前通行的历法（按这种历法，新年是从3月25日算起）确定女王安即位是在1701年，按新历是1702年。——62。

- 61 辉格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詹姆斯王位继承权的一批议员被敌对的托利党人（见注3）讥称为辉格。辉格（Whig）为英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曾与托利党轮流执政，19世纪中叶，辉格党内土地贵族的代表和保守党的皮尔派以及自由贸易派一起组成自由党。从此自由党人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人的位置。——64、80、133、148、161、176、208、289、400、413、653。

- 62 这是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关于英国预算问题的第二篇文章。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为4月19日。4月20日文章随波罗的海号轮船从利物浦出发，5月1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5月3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58号，署名卡尔·马克思。——69。

- 63 爱尔兰派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议会中爱尔兰议员所组成的派别。1847年以前，这个派别一直由丹·奥康奈尔领导。该派的大部分成员是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即妥协派的代表，他们代表着爱尔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大地主和天主教教权派集团的利益。同时，在这一派中，还有依靠富裕租佃者的爱尔兰自由派人物。在托利党（见注3）和辉格党（见注61）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爱尔兰旅同曼彻斯特派（见注64）一起，能够改变议会中的力量对比，影响议会内部的斗争，有时还能决定政府的命运。

19世纪50年代初该派部分议员与激进的爱尔兰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联合,在下院形成一个独立的反对党。1859年由于爱尔兰旅的领导人同英国统治集团达成妥协,该反对党瓦解。——70、84、171、667。

64 曼彻斯特学派又称自由贸易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一个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两个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要求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并于1838年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自由贸易政策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开拓国际市场、进行经济扩张的要求。在19世纪40至50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英国自由党的左翼。——70、80、146、151、176、195、219、227、240、314、350、359、510。

65 英国的知识税(Taxes on Knowledge)包括报纸广告税、报纸印花税和纸张税。从表面上看,知识税似乎是针对所有出版机构的,但其真正的目的是阻止反对派报刊的出版和发行。例如《人民报》就是由于税收而被迫提高价格,结果因工人订户锐减而难以维持。——70。

66 十二月二日的英雄和萨托里练兵场的英雄均指路易·波拿巴。前者暗指波拿巴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一事,后者暗指1850年秋波拿巴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练兵场举行军事检阅,即拥戴波拿巴的示威。而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在和法国驻伦敦大使的谈话中,表示支持路易·波拿巴。这一事先未征得辉格党(见注61)其他阁员同意的表态,导致帕麦斯顿于1851年12月19日被迫辞职。

帕麦斯顿公开充当“奥地利大臣”指在1852年12月阿伯丁联合内阁中任内务大臣的帕麦斯顿对居住在英国的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流亡者实行的种种迫害,包括暗中检查流亡者来往信件,在报刊上对流亡者进行诽谤宣传,并通过警察和司法进行追究迫害。英国内务部向奥地利和其他各国政府警察当局提供有关流亡者活动和计划的情报,并帮助他们追踪监视流亡者。——71、639。

67 据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1525年在帕维亚同西班牙国王和德国皇帝查理五世交战失败被俘后曾写信给他的母亲说:“除了名誉以外,一切都

丢了。”——71。

- 68 这是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第三篇也是最后一篇关于英国预算的文章，文章开头先谈了几条当前的新闻。《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发表本文时，加了如下的编者按语：“本报读者在今日早晨的一号《论坛报》上发表的本报伦敦通讯员马克思博士的文章中，可以找到对格莱斯顿先生预算的巧妙说明以及英国现有各党派对这个预算的态度。我们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碰到更为一针见血的对这个预算及其编制者的批评，我们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文章。”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4月22日。文章随亚细亚号轮船从利物浦出发，5月5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5月6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61号，署名卡尔·马克思。——77。

- 69 伦敦议定书是1852年5月8日由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丹麦和瑞典的代表在伦敦签订的关于保证丹麦王国完整的协议。该议定书的基础是1850年7月4日伦敦会议的上述参加国（普鲁士除外）所通过的确定丹麦王国（包括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的领地不可分割的原则，1852年的议定书还指出俄皇是丹麦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之一（作为以彼得三世的名义在俄国称帝的荷尔斯泰因-哥托尔普公爵查理-彼得-乌尔里希的后裔）；其他的继承人都放弃自己的权利，把权利让给被宣布作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继承人的克·格吕克斯堡公爵。这就为俄国沙皇后来在格吕克斯堡王朝中断的情况下觊觎丹麦王位提供了可能。——77、100、271、297。

- 70 指1850年罗马教皇试图为英国指派天主教主教，此事激起了英国国教会和英国政府的反对。人们把教皇干涉英国天主教事务叫做“罗马天主教的侵犯”。1851年在英国颁布了一项法律，宣布教皇的指派无效。

在尼德兰开始的类似激愤情绪，是1853年为改变罗马天主教教阶制而在那里重建天主教主教管区的行动引起的。——77。

- 71 参看艾·约·西哀士《第三等级是什么？》1789年巴黎第2版第3页：“1. 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2. 迄今为止，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3. 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81。

- 72 梅费尔派或梅费尔激进派是由摩耳斯沃思、贝尔纳-奥斯本等人组成的贵族假激进派的别称。梅费尔是伦敦的一个贵族豪华私邸区。——85。
- 73 暗指阿伯丁联合内阁,特别是它的内务大臣帕麦斯顿对侨居在英国的政治流亡者所采取的种种迫害手段(见注66)。——86。
- 74 这是恩格斯应马克思1853年4月23日来信之邀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一篇关于瑞士问题的文章。文章主要报道了在瑞士的政治流亡者所遭受的迫害。恩格斯显然是想告诫英国人不要效仿这个小小的“中立”国,成为大陆反动政府的帮凶。

恩格斯在接到马克思的来信后于4月24日着手写这篇文章,4月26日将文章寄往伦敦。马克思在接到恩格斯的文后补充了一些关于火箭事件的报道,作为一篇通讯于4月29日寄往纽约。文章随坎布里亚号轮船4月30日从利物浦出发,5月11日到达哈利法克斯,5月13日到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发表时将这篇文章分成了两部分。恩格斯撰写的没有注明写作日期的这一部分,作为一篇单独的伦敦通讯发表在1853年5月17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70号,署名卡尔·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关于瑞士暴动的另一部分,与马克思关于火箭事件的报道一起发表在1853年5月1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68号,署名卡尔·马克思。

《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这篇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之后又略加删节以《瑞士》为标题由哥·克耳纳译成德文刊载于1853年6月1日的纽约《改革报》。从此以后,《改革报》就常常刊登马克思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的译文或摘要。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是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和阿·克路斯。——87、95。

- 75 指维也纳会议(见注9)1815年3月20日签署的一项关于保证瑞士“永久中立”的宣言。——87。
- 76 法国和瑞士的冲突发生在1851年12月—1852年1月间,起因是路易·波拿巴要求瑞士驱逐法国的共和主义流亡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反对者,但却遭到了瑞士联邦议会的拒绝。在1836年,瑞士政府曾受到法国七月王朝军事上的威胁,因为当时瑞士政府让法国流亡者,其中包括路易·波拿巴本人在瑞士避难;这次,瑞士政府又像1836年一样,被迫作出重大的让步。——88。

- 77 纳沙泰尔(德文名诺因堡)是瑞士的一个州,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见注9)上被划归普鲁士;但却完全独立于普鲁士王国之外,仍旧是瑞士联邦的第21个州。在1848年2月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纳沙泰尔州宣布彻底脱离普鲁士,成立共和国。但是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在1852年3月24日的伦敦议定书中仍然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重申,维也纳会议决定给予他的对纳沙泰尔的“主权”继续有效。于是在普鲁士和瑞士共和国之间便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直到1857年法国进行了外交干涉,普鲁士被迫放弃了对纳沙泰尔的要求,冲突才算平息。——88。
- 78 奥地利与瑞士在1853年发生了冲突,原因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在1853年2月6日的米兰起义(见注24)失败后从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地区,特别是从伦巴第逃出后,在瑞士的泰辛州获得了避难权。——88。
- 79 瑞士雇佣兵是瑞士各州按照协议向欧洲其他国家提供的雇佣兵。从15世纪到19世纪中叶,瑞士各州曾同欧洲各国缔结了向对方提供瑞士雇佣兵的协议。这里所说的那不勒斯和其他地方的瑞士雇佣兵是指1848年伯尔尼州和其他一些州向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提供的雇佣兵,这些雇佣兵在反对意大利革命运动中的行为引起瑞士进步群众的极大愤怒,最后导致提供雇佣兵协议的废除。——89。
- 80 宪章派是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多条件的人民宪章(见注117)。英国工人阶级为实现人民宪章掀起了广泛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由于资产阶级收买工人上层和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到50年代中期运动终于失败。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全国宪章派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哈尼、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列宁把宪章运动称作“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90、146、210、219、257、324、525、582、615。
- 81 索得崩德是瑞士7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在1843年为了对抗瑞士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而组成的单独联盟。瑞

士联邦议会 1847 年 7 月通过的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是宗得崩德在同年 11 月初对其他州采取军事行动,挑起国内战争的导火线。1847 年 11 月 23 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军击溃。天主教僧侣和城市贵族上层当中领导过宗得崩德的分离主义分子,在宗得崩德被击溃后仍不止一次地利用一部分落后保守的农民企图抗拒自由主义的改革和夺取各州的政权。——91、98。

- 82 《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颠国债的兑换。——印度、土耳其和俄国》是马克思结束曼彻斯特之行(4 月 30 日—5 月 19 日)以后,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一篇通讯。当时英国议会正在辩论更换东印度公司(见注 85)特许状以及与之相关的印度的治理改革问题,马克思从本文起撰写了一系列有关英国在印度实行殖民统治的文章。

这篇通讯的写作日期是 5 月 24 日,随 5 月 28 日的加拿大号轮船同马克思 5 月 27 日的通讯一起从利物浦出发,6 月 6 日到达哈利法克斯,约于 6 月 8 日到达纽约。文章发表在 1853 年 6 月 9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90 号,署名卡尔·马克思。——100。

- 83 指《新莱茵报》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有关丹麦问题的文章,譬如恩格斯 1848 年 9 月 7 日写的《和丹麦的休战》一文。——101。

- 84 英格兰银行是 1694 年由私人创办的一家银行。当时,英国政府为了筹措经费,向放债者提供特别让步,允许他们组建英格兰银行,授予它独家发行货币的权利。创办者把银行的固定资本借贷给政府,英国的国债便由此产生。英格兰银行实际上由政府控制,起着国家银行的作用(参看《资本论》第 24 章第 7 篇第 6 节《工业资本家的产生》)。19 世纪该行逐渐承担起中央银行的职责,1844 年银行法令确认它为发行货币的中央机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它在名义上仍是一家私人银行,1946 年才正式成为国家的中央银行。——101、127、161、286、340、363、382、481。

- 85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 1600 年至 1858 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经营垄断贸易,推行殖民掠夺政策的工具。从 18 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这个公司长期控制着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行政权。它的贸易和行政特权由英国议会定期续发的公司特许状规定。公司管理中的独断专行,经营

- 不善,加之 19 世纪初日益强大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使印度对外“开放”的趋势,都使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和影响日渐削弱。1853 年下院辩论印度法案时中心问题就是英国今后在印度的统治形式问题,因为 1854 年 4 月 30 日是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截止日期。1857—1859 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了他们殖民统治的形式。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宣布成为英王的领地。——102、115、132、138、161、195、220、241、253、265、324。
- 86 印度三大管区是根据英属印度的行政区划,由东印度公司(见注 85)任命的省督管辖的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三个地区的名称。根据 1773 年的印度管理法令,孟加拉省督升为印度境内所有英国领地的总督。——103。
- 87 印度协会是自由贸易论者(见注 64)约·狄金逊于 1853 年 3 月 12 日创立的印度改革促进协会。——103、220。
- 88 圣地问题亦称圣地纠纷是希腊正教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的一个多年的纠纷。纠纷的核心是争夺巴勒斯坦的圣地:伯利恒的耶稣诞生教堂和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的管辖权。争执的问题之一就是圣墓所在寺院的钥匙以及保护该寺院圆顶权利的归属问题。1850 年路易·波拿巴再次挑起了这一纠纷。他为了巩固自己在东方的地位,在君士坦丁堡支持天主教派的要求。沙皇俄国保护当地正教教会的特权,并以此为借口干涉土耳其内政,强行占领斯拉夫区,并最终达到占领墨西拿海峡的目的。双方的实际目的都是争夺近东霸权。摇摆不定的土耳其政府起初对法国的要求让步,但在 1853 年 5 月 4 日,当俄国特命全权公使缅施科夫到达土耳其时,土耳其政府又被迫同意特别保障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与此同时,苏丹在英法两国大使的支持下,拒绝了尼古拉一世关于承认他是奥斯曼帝国正教居民的保护者的要求。圣地纠纷演变成激烈的外交冲突,成为导致克里木战争的原因之一。俄国有时将因圣地纠纷引起的这场战争称作圣战。——104、207、298、411、489。
- 89 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是在俄土战争(1768—1774 年)后两国于 1774 年 7 月 21 日签订的和约。根据这个条约,战胜国俄国得到了黑海北岸的南布格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地区,其中包括金布恩要塞;此外还得到了亚速、刻赤和叶尼卡列三个城市。土耳其被迫承认了克里木和其他鞑靼人居住

地区的独立,为俄国以后吞并这些地区造成了有利条件。俄国商船获得了自由通过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条约还规定苏丹应给予希腊正教教会一系列特权,其中包括第十四款即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一座正教教堂的规定。——105、217、260、489、621。

- 90 这篇通讯是马克思关于当前政治问题,主要是国际关系问题的一篇报道,其中有关君士坦丁堡谈判的部分是马克思5月24日通讯,即《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颠国债的兑换。——印度、土耳其和俄国》一文(见本卷第100—106页)的续篇。

这篇通讯的写作日期是5月27日,同马克思5月24日的通讯一起到达纽约。文章发表在1853年6月10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1号,署名卡尔·马克思。——107。

- 91 1853年奥地利同皮埃蒙特(撒丁)断绝了外交关系,皮埃蒙特当局对来到撒丁的意大利流亡者给予保护,这些流亡者是从受奥地利管辖的伦巴第逃出来的1848—1849年民族解放运动和1853年2月6日米兰起义(见注24)的参加者。——108。

- 92 1852年12月路易·波拿巴宣布自己是法国皇帝以后,尼古拉一世根据同奥地利宫廷和普鲁士宫廷的约定,对路易·波拿巴没有使用“正统”君主间通常的称呼“国王陛下和亲爱的兄弟”,而使用了“国王陛下和亲爱的朋友”这个称呼,并且没有称他为“皇帝拿破仑三世”,而称之为“皇帝路易·拿破仑”。奥地利宫廷和普鲁士宫廷却违反了约定,对法国皇帝使用了通常的称呼,但它们强调必须遵守维也纳会议(见注9)的决定,以此暗示路易·波拿巴政权不合法,因为维也纳会议决定不许波拿巴王朝占据法国王位。——109。

- 93 比尤克德列是位于君士坦丁堡附近波斯普鲁斯海岸的一个别墅区,俄国驻土耳其使馆的避暑官邸也建在那里。——110。

- 94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这篇通讯除了论述俄土矛盾以外,主要是有关中国问题的评论。评论结合着中国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揭露和谴责了英美法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5月31日。文章随太平洋号轮

船6月1日从利物浦出发,6月12日到达纽约。报纸编辑部把它分为两部分,关于中国的部分作为社论发表在1853年6月1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4号,没有署名;其余部分作为通讯同期发表,标题是《土耳其问题。——〈泰晤士报〉。——俄国的扩张》,署名卡尔·马克思。——113、121。

- 95 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一发现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14。

- 96 1853年1月5日,咸丰帝在太平军已攻克岳州,行将夺取武昌、汉阳的形势下,谕令“该督抚悉心体察被贼地方,分别蠲缓,奏请恩施。其余应征钱粮之处,亦著严查各州县,总期照旧开征,毋得稍有浮勒。”本段引文和正文中马克思的引文均见《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七十七第十八页。

这里咸丰帝提到的“该督抚”,当指湖南、湖北两省的总督和巡抚。马克思文中的“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督抚”一语显然是不确切的。——115。

- 97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是由官方特许的垄断组织“公行”在广州进行的。公行的商人叫作“行商”。行商制度在南京条约第五款中被取消。——119。

- 98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就查理·伍德爵士6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详细评介了英国政府在印度的改革计划。《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发表本文时特别推荐说:“英国政府提出了他们对印度管理改革的计划,它是一个不彻底的、贫乏的计划,不能令任何人满意。在这点上我们的读者会发现,我们的伦敦通讯记者的见解是非常有教益的。”从这篇文章开始,马克思写了一系列关于英国在印度推行殖民政策的文章。

这篇通讯的写作时间,在《论坛报》上发表时注明为“1853年5月7日星期六”。而马克思笔记本中记载的是在6月3日和7日寄出过两篇通讯,虽然我们至今尚未发现这两篇通讯的手稿,但这篇文章所援引的消息全部来自6月1—7日的报刊,估计可能是编辑部将6月3日和7日的两篇通讯缩减和调整后再合并为一篇通讯,发表时写错了日期。

马克思6月3日的通讯随6月4日的亚细亚号轮船从利物浦出发,6月16日到达纽约。6月7日的通讯随6月8日的洪堡号轮船从南安普敦出发,6月21日到达纽约。两篇合并后的文章发表在1853年6月22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01号,署名卡尔·马克思。——125。

- 99 即卫斯理教派或循道教派,是约·卫斯理于18世纪在英国创立的一个教派;18世纪末脱离英国国教会,并作为新教的一个教派在美国和加拿大得到广泛传播。卫斯理教派要求严格履行宗教仪式,主张社会改良,着重在下层群众中进行传教活动。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131。
- 100 柴明达尔在大莫卧儿帝国时代是指主要来自被征服的印度教徒中间的封建领主。他们的世袭土地特有权被保留了下来,条件是从自己向被压迫农民征收的租税中抽出一定份额交给政府。“柴明达尔”这个名词还被用来指孟加拉的土地税大包税主。1793年英国政府用“永久柴明达尔”法把柴明达尔(包税主)变成了私有土地的地主,以他们作为英国殖民当局的阶级支柱。随着英国人对印度的步步征服,柴明达尔制略经改变后也在印度某些地区实行起来。——133、241、246。
- 101 莱特即印度农民,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实行新的土地税法以前,在英国殖民者没有破坏印度的村社以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村社农民。在从1793年起实行所谓柴明达尔制(见注100)的地区(最初在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实行,后来稍微改变了形式,在联合省和中央省以及马德拉斯省部分地区实行),莱特成了柴明达尔(地主)的佃农。在19世纪初孟买和马德拉斯两管区实行“莱特瓦尔”土地税收制后,莱特成为国有土地的持有者,而按印度英政府随意规定的数额缴纳地租税。根据“莱特瓦尔”制,莱特同时被宣布为他们所租佃的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实行这一法律上自相矛盾的土地税收制,为农民规定了高得无力缴纳的地租;因欠税日增,农民的土地逐渐转到包买商和高利贷者手里。——133、241、246。
- 102 这是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关于印度问题的第二篇文章。其中除了介绍和批评了英国政府的印度管理改革方案外,还谈到了印度的社会关系及英国的殖民政策对印度的影响等问题。
- 马克思大约从1853年4月开始研究印度史,他后来在写作《资本论》时又利用了本文中关于印度农村公社制度、分工的论述(见《资本论》第1卷第12章)。
- 马克思很可能在寄出6月7日的通讯后立即着手这篇文章的写作,在撰写过程中,他利用了恩格斯6月6日来信中的许多见解。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6月10日,通讯随尼亚加拉号轮船6月11日

从利物浦出发,6月22日到达哈利法克斯,大约于6月24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6月25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04号,署名卡尔·马克思。——137。

- 103 莫卧儿人是16世纪从中亚细亚东部侵入印度的突厥侵略者,1526年他们在印度北部建立了伊斯兰教国家大莫卧儿帝国。“莫卧儿”(Mogul)一词为“蒙古”(Mongol)的转音,因该帝国的创造人(巴卑尔,1483—1530)自称是蒙古人,相传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的直系后裔,这就是“莫卧儿”一词的由来。大莫卧儿帝国在17世纪中叶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以及阿富汗的部分地区。但是,由于农民起义和印度各民族对伊斯兰教侵略者的反抗加剧,以及他们经常的内讧和封建割据趋势的日益加强,到18世纪的上半叶莫卧儿帝国便逐渐分裂成许多小邦,这些邦逐渐被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

1803年英国人占领德里以后,大莫卧儿王朝的后裔靠东印度公司(见注85)的赡养费过活,成了该公司的傀儡。1858年英国殖民者宣布印度是不列颠王国的领地之后,莫卧儿帝国遂亡。——137、223、245。

- 104 林伽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湿婆神的象征。崇拜林伽的宗教盛行于南印度。这一印度教派不承认种姓(见注111),反对斋戒、祭祀和朝圣。——138。
- 105 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138。
- 106 七国争雄亦称七国时代,是英国史编纂学中用以表示英国中世纪初期七国并立时代的术语,6—8世纪时英国分为七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这些王国极不稳定,分合无常。马克思借用这个词来描绘德干(印度的中部和南部)在穆斯林入侵以前的封建割据状态。——138。
- 107 婆罗门是梵文 Brāhmana 的音译,意译为“净行”或“承习”。印度古代的僧侣贵族,印度的第一种姓(见注111)。世代以祭祀、育经(吠陀经)、传教为业。

婆罗门教是印度古代宗教之一。约于公元前7世纪形成,因崇拜梵

- 天及由婆罗门种姓担任祭司而得名。以吠陀为最古的经典。信奉多神，其中主神为婆罗贺摩(梵天，即创造之神)、毗湿奴(通入天，即保护之神)和湿婆(大自在天，即毁灭之神)，并认为三者代表宇宙的“创造”、“保全”和“毁灭”三个方面。主张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之说。——138、142、250。
- 108** 萨尔赛达庙是位于孟买北部的萨尔赛达岛上的庙宇，以 109 座佛教石窟而闻名。——138。
- 109** 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 1602 年至 1798 年的荷兰贸易公司。它是荷兰在印度尼西亚推行殖民掠夺政策的工具。公司从荷兰政府获得了好望角以东的通商垄断权，不许荷兰盟国或个别荷兰人在此地区进行贸易。它在印度尼西亚活动的特点是用强制手段巩固和保存当地奴隶占有制关系和封建关系，在为荷兰人效劳的土著政权的封建官僚机构的帮助下，掠夺当地被征服的居民。随着荷兰的全面衰落以及当地大规模的起义，公司逐渐衰败最后宣告倒闭。——138。
- 110** “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见注 64)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反对国家干涉经济范围内的任何事务。——140、146。
- 111** 种姓是职业世袭、内部通婚和不准外人参加的社会等级集团。种姓的出现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的分工有关。种姓制度曾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纪各国，但在印度社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古印度的《摩奴法典》规定有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143、245。
- 112**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这篇通讯的开头部分报道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因为英国各地爆发了一系列工人罢工运动。文章中还特别引用了厄·琼斯关于宪章运动的来信。后半部分马克思继续对联合内阁的印度改革法案进行了批判，并宣布将另写一篇长文详细论述英国的殖民政策。
-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 6 月 17 日。通讯随亚美利加号轮船 6 月 18 日从利物浦出发，6 月 30 日到达纽约，发表在 1853 年 7 月 1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09 号，署名卡尔·马克思。——145。
- 113** 十小时工作日法令是英国议会在 1847 年 6 月 8 日通过的只适用于童工

- 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1848年5月1日起作为法律生效。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实际上并不遵守这项法律。——146、679。
- 114 禁止实物工资的法令是1831年10月15日英国议会颁布的禁止用实物支付工人工资的法令,但由于缺乏完备的实施细则,工厂主们常常利用该法令的漏洞不予执行。——146。
- 115 结社法或工人联合法是1825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律确认议会在1824年通过的废除禁止组织工人团体(工联)的决定,但实际上对工人结社的限制却更加严格了。按照1825年结社法的规定,凡鼓动工人参加团体或参加罢工均被视为“强制”和“暴力”行为,一律按刑事犯罪惩处。——146、287、324。
- 116 称得上是全国大会的宪章派(见注80)群众大会是1846年8月2日在黑石山脊举行的。琼斯在信中说要去黑石山脊参加的群众大会是1853年6月19日举行的。——147、189。
- 117 即人民宪章,英国宪章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该宪章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了宪章派的下列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和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147、525。
- 118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继续批判英国纵容俄国侵略土耳其的政策。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6月21日。通讯随海尔曼号轮船6月22日从南安普敦出发,7月7日到达纽约,文章发表在1853年7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14号,署名卡尔·马克思。——154。
- 119 指解决圣地问题(见注88)过程中,俄国特命全权公使缅施科夫1853年5月6日以最后通牒方式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俄土协定草案。其中要求土耳其帝国保障正教居民的宗教自由,并承认俄国沙皇对他们的保护权。这一草案遭到苏丹的拒绝。——156。
- 120 布加勒斯特条约是1812年5月28日俄国和土耳其结束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时签订的和约。和约规定把到普鲁特河为止的比萨拉比亚和

- 南高加索的一些省份割让给俄国,俄国获得多瑙河沿岸的通商航行权;和约还规定土耳其应给予塞尔维亚以内政自治权。和约确认俄土两国过去达成的关于承认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拥有某些自治权的协定,还确认1774年库楚克-凯纳吉条约(见注89)所规定的俄国保护多瑙河两公国的正教居民利益的权利。——156。
- 121 巴尔塔利曼尼协定是俄国和土耳其在派军队进驻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镇压那里的革命运动以后,于1849年5月1日签订的。根据这一协定,占领制度要一直保持到革命危机完全消除的时候(外国军队直到1851年才撤出两公国)。根据协定苏丹需征得沙皇同意后方可任命国君;如革命重起,俄国和土耳其还将采取包括再一次进行军事占领的多种措施。——156、273、309、361。
- 122 1841年公约是1841年7月13日俄国、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为一方,土耳其为另一方,在伦敦签订的关于黑海海峡的公约。公约责成土耳其政府在平时不准外国军舰通过黑海海峡,实际上废除了1833年签订的对俄国有利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见注156),该条约规定只向俄国军舰开放黑海海峡。在1841年公约上签了字的沙皇政府被迫承认西方列强提出的海峡“中立化”的原则,但1841年公约没有对战时黑海海峡的使用作出规定,这就使土耳其有可能在战时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外国军舰通过。——157、228、279、303、361、424、613、619。
- 123 暗指1853年2月英国政府将其驻君士坦丁堡代办罗斯上校召回,并任命斯·德·雷德克利夫为英国驻土耳其公使以接替罗斯的职位。——158。
- 124 指涅谢尔罗德总理大臣1853年5月31日给土耳其外交大臣路西德帕沙的一封信。这封信把缅施科夫使团的失败归罪于土耳其政府,并且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接受缅施科夫在离开君士坦丁堡以前所提出的要求土耳其帝国保障正教居民的宗教自由,并承认俄国沙皇对他们的保护权。涅谢尔罗德以采取军事手段进行威胁,暗示在最后通牒遭到拒绝时将出兵占领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在路西德帕沙1853年6月16日的回信中,得到英法两国支持的土耳其拒绝了沙皇政府的要求。——159、613。
- 125 这是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关于印度问题的第三篇文章,文中主要叙述了不列颠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史及东印度公司(见注85)的发展

史。

笔记本中记录马克思在6月24日写了一篇通讯,并标有“××××印度”的字样,很可能就是这篇文章。通讯6月25日随亚美利加号轮船从利物浦出发,7月7日到达波士顿,7月8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7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16号,署名卡尔·马克思。但通讯日期误刊为“6月21日星期六”。——161。

- 126 “光荣革命”指英国1688年的政变。这次政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宣布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从1689年起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这次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政变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作“光荣革命”。——162、210。

- 127 七年战争是1756—1763年间以英国、普鲁士、汉诺威为一方,以法国、奥地利、俄国等为另一方,在欧洲、美洲、印度和海上进行的战争。英、法争夺殖民地和商业霸权以及普、奥之间争夺西里西亚是战争的起因。

在欧洲,普鲁士与奥地利等国之间的战争,以普鲁士对奥地利的胜利而结束,根据1763年签订的胡贝图斯堡和约,普鲁士夺得西里西亚,成为欧洲大陆上的新兴强国。

英法之间的战争主要发生在海上、北美、西印度群岛和印度。1755年英国不断攻击法国商船,法遂占领英国梅诺卡岛。1756年英国对法国宣战,在东方主战场印度与法国人及其走卒印度王公作战,1757年控制了印度孟加拉,1761年消灭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与此同时,法国在北美失去了加拿大,在非洲的塞内加尔及在小安的列斯群岛也蒙受巨大损失,被迫讲和,于1763年签订了巴黎和约。该和约确保了英国在战争中获取的殖民地,此后英国成为海上霸主。——162。

- 128 反雅各宾战争即二十三年战争,指1792—1815年欧洲国家同盟(英、普、奥、俄等)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1792年2月欧洲各封建专制国家联军对革命的法国发动战争。资产阶级贵族的英国支持联军,1792年8月10日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以及1793年1月处死国王路易十六以后,英国于1793年初加入反法同盟的联军,公开参战。1793年春,反法同盟从四面向法国本土进攻,并支持法国王党叛乱。在1794年6月的弗勒吕斯战役中反法联军被击败。1797年

10月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同盟瓦解。

1798年12月英、俄、奥等国组成第二次反法同盟,1800年6月,拿破仑在意大利马伦戈战役中击败奥军主力,迫使奥地利签订吕内维尔和约,后又迫使英国签订亚眠和约,同盟解散。

1805年夏,英、俄、奥、瑞典等国第三次组成反法同盟,12月2日,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大败俄、奥联军,签订普拉茨堡和约。

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在耶拿战役和奥尔施泰特战役中击败普军主力,1807年2月8日在埃劳,6月14日在弗里德兰战役中打败俄军,迫使俄、普签订蒂尔西特和约(见注5),第四次反法同盟联军失败。

1809年春,英、奥等国组成第五次反法同盟,同年7月拿破仑在瓦格拉姆战役中战胜奥军,迫使奥地利签订维也纳和约。至此,拿破仑统治了整个西欧和中欧。

1813年10月在莱比锡战役中,拿破仑被击败,1814年3月反法联军进入巴黎。4月6日拿破仑退位,流放厄尔巴岛,波旁王朝复辟。

1815年3月拿破仑回到巴黎复位,英、俄、普、奥等国组成第七次反法同盟,6月18日在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被击败。6月22日第二次退位,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长达二十三年的反雅各宾战争最后结束。——164、401、427。

- 129 辉格党内阁首相格雷和副首相罗素于1831年3月在议会中提出一项改革法案。这个提案旨在打破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地位,增加资产阶级议员的席位。经过议会内外的斗争,1832年6月7日英国议会通过了这项选举权的改革法案,但是为此项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仍未获得选举权。按照1832年的选举法,在城市里,年收入租金不少于10英镑的房东和承租人有选举权;在农村只有年缴租金50英镑以上的租地者有选举权。关于这项议会改革法案,可参看恩格斯的《英国十小时工作制法案》。——164、407、510。

- 130 卡纳蒂克战争是英法两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东南部卡纳蒂克王国内进行的战争,他们分别支持当地的王公进行争夺王位的战争,实际是想通过各自的傀儡来侵占印度东南沿海这一战略要地,战争从1746年开始,断断续续地打到1763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因在1761年1月占领了法国在印度南部的主要据点而最后获胜。——165。

- 131 1756年,孟加拉的纳瓦布为了防止英国人入侵他的领地,对英国人开战,夺取了英国人在印度东北部的根据地加尔各答。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在克莱夫的指挥下,很快又重新占领了加尔各答,摧毁了支持纳瓦布的法国人在孟加拉的工事设施,并于1757年6月23日在普拉西打败了纳瓦布的军队。1763年,在沦为英国东印度公司附属领地的孟加拉爆发了起义,但被英国殖民主义者镇压。英国人在占领孟加拉的同时又占领了属孟加拉纳瓦布管辖的恒河中游省份比哈尔,1803年征服了孟加拉以南的奥里萨,这片领土上的几个封建王国都落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手中。——165。
- 132 1790—1792年和1799年,东印度公司向印度南部的一个独立的封建王国迈索尔发动战争。这个王国的首脑是曾参加过迈索尔同英国人战争的提普·萨希布。第一次战争的结果,迈索尔的一半领土被公司和与公司结盟的封建王公侵占。第二次战争迈索尔彻底失败,提普死,迈索尔沦为藩属王国。——165。
- 133 军费补助金制度,或称军费补助合同制度,是东印度公司把印度各王国的统治者变成它的藩臣的手段之一。最常见的合同或规定是王公必须为驻扎在他们领土上的公司的军队提供给养(补助);或强迫王公接受一些附有盘剥条件的贷款,违者将被没收领地。——165、221。
- 134 缅甸战争是19世纪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征服缅甸而发动的战争。第一次缅甸战争(1824—1826年)的结果,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占领了与孟加拉交界的阿萨姆省和沿海的阿拉干、奥那沙冷。根据1826年2月24日签订的杨端波条约,上述地区脱离缅甸。1852年第二次缅甸战争的结果是勃固省并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领地。由于第二次缅甸战争结束之后没有签订和约以及于1853年2月即位的新的缅甸国王不承认勃固省被占领,所以在1853年,当马克思写这篇文章时,人们估计英国会对缅甸采取新的军事行动。19世纪60年代英国又强加给缅甸许多不平等条约,并在1885年作为第三次缅甸战争的结果,并吞了整个缅甸的领土。——169、225。
- 135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报道了关于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的辩论情况,论述了英国,特别是爱尔兰的地主和租佃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6月28日。通讯随大西洋号轮

船6月29日从利物浦出发,7月10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7月1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16号,署名卡尔·马克思。——171。

- 136 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是约·纳皮尔于1852年11月向英国议会提出的。为了结束土地所有者和租佃者之间的斗争,该法案在某种程度上放宽了在爱尔兰租佃土地的条件。1853年在联合内阁的虚假同意下,法案在下院被通过,因为联合内阁希望爱尔兰议员支持自己的政策;但是,法案在上院却遭到了反对。在以后几年,法案在两院之间转来转去,并被一再修改,但是即便修改过的法案,仍然遭到大地主代表的顽固抵制。1855年7月,对法案的讨论被不定期地推迟,事实上否决了这项法案。马克思在许多文章中对这些法案作过分析和评价。——171、266、288、325。
- 137 临时租佃者即没有租期保障的租佃者(tenants at will),是从中世纪保留下来的一种租佃形式。这种租佃形式不为租佃者规定固定的租期,地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撕毁或修改租约。——173、196。
- 138 英国政府在镇压179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后,把英爱合并的法令强加给爱尔兰。1801年1月1日英爱合并生效后,英国议会又通过法令废除了爱尔兰议会在18世纪末为保护年轻工业而建立的保护关税制度,结果导致爱尔兰的企业无法与英国工业竞争而纷纷破产,爱尔兰变成了英国的农业附属地。——173。
- 139 “本身尚待证明的论据”(petitio principii)系哲学用语,指证明中的一种逻辑错误,即把未经证明的判断作为证明论题的论据。——174。
- 140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追述了1828—1829年俄土战争的经过,指出沙皇现在的外交手段与上次战争中的手段如出一辙。在通讯的第二部分马克思继续报道了英国工人的罢工运动。
-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7月1日。通讯随阿拉伯号轮船7月2日从利物浦出发,7月13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7月1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19号,署名卡尔·马克思。——178。
- 141 “绥靖希腊”是欧洲列强在19世纪20年代希腊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解放战争时期干涉希土冲突时外交文件中的用语。——179。
- 142 指涅谢尔罗德1853年6月11日发给俄国驻外使节的周知照会,其中表明沙皇政府对缅甸科夫使团同土耳其政府谈判结果所采取的立场。涅谢

尔罗德严厉抨击了土耳其政府的行为,申明俄国向土耳其提出的最后通牒,要求承认沙皇为苏丹的希腊正教臣民的保护者的理由。照会还威胁说,如果土耳其拒绝这一要求,俄国将采取“坚决措施”。——181、227。

- 143 宪章派执行委员会指 1840 年 7 月成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的执行委员会。这个协会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在宪章运动高涨年代其会员曾达到 5 万人。执行委员会由全体大会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每年选举一次,是全国宪章派组织的领导机构及大会间歇期间的常务机构。1848 年宪章运动的失败和宪章派的分裂使该协会丧失了群众性。但是,在厄·琼斯和其他宪章派成员的领导下,协会在 1851—1852 年期间仍然为在革命基础上复兴宪章运动,贯彻人民宪章及 1851 年宪章派大会所宣布的社会主义原则进行了斗争。协会于 1858 年停止了活动。

1853 年时,厄·琼斯、罗·乔·甘米奇和詹·芬伦都是宪章派执行委员会的成员。——186、710。

- 144 马克思在这篇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的上半部分依据公开发表的官方文件继续揭露沙皇的侵略政策。在通讯的下半部分继续评述英国议会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 7 月 5 日。通讯随富兰克林号轮船 7 月 6 日从南安普敦出发,7 月 19 日到达纽约,发表在 1853 年 7 月 20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24 号,署名卡尔·马克思。——191。

- 145 1784 年的皮特法令是关于改进东印度公司(见注 85)和英国在印度领地的行政管理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成立了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督察委员会由国王委派枢密院的六个委员组成,主席由内阁大臣担任,实际上他是印度事务大臣和印度的最高统治者。督察委员会设在伦敦,它的决议由东印度公司三个董事组成的秘密委员会传达到印度。因此,由于 1784 年的法令,设立了一套通过督察委员会(英国政府)和董事会(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的双重性制度。督察委员会于 1858 年被撤销。——197。

- 146 撒提是过去流行于印度东部地区的一种风俗,即把寡妇同丈夫的遗体一起烧掉。——200。

- 147 印度大厦又称东印度大厦,是伦敦东印度公司管理机关的所在地,在莱登霍尔街。——201、241。

- 148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的开头部分继续评论英国的外交政策,第二部分继续报道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斗争的情况。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7月8日。通讯随欧罗巴号轮船从利物浦出发,7月19日到达哈利法克斯,大约于7月21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7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26号,署名卡尔·马克思。

了解统治阶级各个派别对十小时工作日问题的态度,对英国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所以马克思可能将这部分的主要内容寄给了《人民报》,威·皮佩尔把它加工成社论,发表在1853年7月9日《人民报》第62期(见本卷第677—681页)。——205。

- 149 针线街是伦敦的一条街道,英格兰银行(见注84)的所在地。“马克沃姆”(muck worm)这个英国词的意思是“粪蛆”,转义是“守财奴”、“吝啬鬼”。——209。

- 150 新济贫法是1834年英国通过的《关于进一步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国和威尔士的济贫法的法令》。该法令禁止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金钱和食品救济,只允许用一种方式来帮助贫民,就是将他们安置在习艺所中。习艺所的制度同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210、291。

- 151 十小时半工作日法是英国议会在1850年8月5日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女工和童工每周前五天的每个工作日为十小时半,星期六为七小时半,并确定了工作日的起止时间。这项法律所以能够通过,是因为工人们抗议高等控诉院(英国的高等法庭之一)宣判违反1847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令(见注113)的工厂主无罪,这一判决事实上等于取消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1850年的法令虽然禁止工厂主采用轮班制(见注359)规避1847年的法律,但同时却使延长工作日半小时成为合法的了。——211、678。

- 152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继续对英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批判。他在批评英国统治阶级在沙皇外交使团面前怯懦让步的同时,肯定了宪章运动(见注80)在对外政策领域所起的积极作用。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7月12日。通讯随北极号轮船7月13日从利物浦出发,7月23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7月25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28号,署名卡尔·马克思。——214。

- 153 和平协会是教友会教派于1816年在伦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协会得到了自由贸易派(见注64)的积极支持。自由贸易派认为,在和平条件下,英国通过自由贸易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工业优势进而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

1853年1月底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国际和平大会上自由贸易派表现得十分活跃。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对在英国进行的反法战争宣传和反对扩充军备的决议,然而这些决议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214。

- 154 “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是古罗马享有种种特权和尊贵地位的罗马公民使用的一个傲慢用语。

帕麦斯顿在1847年英希冲突中以英籍葡萄牙商人帕西菲科在雅典的房屋被烧毁为借口,把舰队派往希腊并向希腊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其真实目的是想夺取爱琴海中希腊的几个战略要地。帕麦斯顿就此问题在议会发表的演说中使用了“我是罗马公民”这一用语,声称必须享有英国臣民的地位和声望。——215、226、447。

- 155 指所谓的“士麦那事件”。1853年夏季奥地利驻士麦那总领事韦克贝克尔下令逮捕了匈牙利流亡者科斯塔。科斯塔被捕后,即被押往奥地利的驃骑兵号军舰。因此,流亡者同奥地利海军军官在士麦那发生了一场武装冲突。美国的圣路易号军舰舰长英格拉哈姆向奥地利军舰舰长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说如拒不放人,或载有科斯塔的奥地利军舰企图溜走,他将炸沉这艘军舰。由于其他强国领事的调解,武装冲突被及时制止。经过几个月的谈判,科斯塔获释,前往美国。——216、238、263、278、296、338。

- 156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于1833年7月8日在君士坦丁堡缔结的共同防御条约。在条约签订以前,俄国的军队已在波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地方登陆。这支部队被派遣到土耳其是为了支援苏丹去对付威胁土耳其首都的易卜拉欣帕沙(起义反对苏丹的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1833年5月,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法国的调停下同穆罕默德-阿里缔结了和约,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割让给穆罕默德-阿里。尽管苏丹的直接危险已经过去,但沙皇的外交使团趁机利用这一紧张局势和俄军驻扎在土耳其的机会,迫使土耳其政府同俄国缔结防御同盟,并正式签订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条约列入了一项秘密条文:土耳其必须禁止所有外国军舰通过海峡,而俄国军舰除外。一

- 直到 1839—1841 年新的埃及危机(见注 7)再次出现时,尼古拉一世不得不同英国以及其他强国商讨对付穆罕默德-阿里的共同行动,迫于列强的压力,尼古拉一世才认可了在和平期间禁止一切国家的军舰通过海峡的原则。——218、433、613、621。
- 157 卡夫丁峡谷(Furcae Caudinae)在古罗马卡夫丁城(今蒙泰萨尔基奥)附近。公元前 321 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卡夫丁峡谷包围并击败了罗马军队。按照当时的惯例,罗马军队必须在由长矛交叉构成的“轭形门”下通过。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词即由此而来,意即遭受奇耻大辱。——219。
- 158 1872 年以前在英国,在对候选人提名进行表决时是用举手的方式进行的,没有选举权的人也可以参加表决。但是在正式选举时,虽然也是用举手的方式来决定候选人的取舍,但参加举手表决的却只有极少数符合财产资格、居住时间资格等等条件的“合法”选民,而且被举手否决了的候选人还可以当选。——219。
- 159 交易所小街是伦敦交易所附近的一条街道,南海公司(见注 56)管理机关所在地。街上有多家银行及高利贷机构,是各种金融业务和投机生意的重要场所之一。——221。
- 160 纳瓦布(nawab 或 nabob)是印度莫卧儿帝国(见注 103)时代各省总督的称谓。后演变为一种尊称,并不代表任何官职。18 世纪后期指那些在东印度公司(见注 85)任职期间,通过搜刮掠夺大发横财的暴发户。——222。
- 161 拉甲(raja)是古代印度贵族的称号,指一族的酋长或一地的首领。最初由人民推选,后演变成世袭职位。近代英国殖民政府称印度土著王公为拉甲。——222、251。
- 162 札吉达尔(Jagirdar)是大莫卧儿帝国(见注 103)的伊斯兰教封建贵族的代表,他们曾得到暂时使用的大片领地(札吉),因此,他们必须服兵役和提供一定名额的军队。在大莫卧儿帝国瓦解时期,札吉达尔变成了世袭的封建领主。——222、241。
- 163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结合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初英、法、俄三国为争夺在土耳其的势力范围而发生的冲突,继续对 1853 年沙皇的侵略政策进行了分析。为此他翻译了巴黎《新闻报》上发表的前法国驻伦敦大使塞巴斯蒂

亚尼将军和路易-菲利浦之妹阿黛拉伊德女士(她曾是其兄长的亲密顾问)通信中的一些重要段落。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7月15日。通讯随亚细亚号轮船7月16日从利物浦出发,7月28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7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33号,署名卡尔·马克思。——225。

- 164 汉普顿宫是伦敦附近泰晤士河畔的一座宫殿,在16至18世纪是英国退位国王的王宫。——225。
- 165 涅谢尔罗德于1853年7月2日(俄历为6月20日)给俄国驻外使节的第二个周知照会中声称,英国和法国在俄军进入多瑙河两公国之前就把舰队派往海峡,首先表示了对俄国的敌意。法国外交大臣德·德路易斯在1853年7月15日的复照中则认为,冲突的责任应由俄国承担。——227、228、235、682。
- 166 沙皇政府利用1839年土埃冲突(见注7)中英法矛盾加剧之机,于1839年9月通过俄国外交官布伦诺夫建议帕麦斯顿签订一项协议,名义上是共同援助苏丹,实际上是划分俄英两国在近东的势力范围。英国政府力图独占在土耳其的霸权,借口东方问题必须达成全欧协议,拒绝了 this 建议。——230。
- 167 马克思的这篇通讯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讲述了俄土冲突引发的外交阴谋,美国作为新的一分子也介入了这场纠纷。许多资产阶级的民主人士希望,美国能成为反对沙皇主义的一股力量,士麦那事件(见注155)在欧洲和美国引起的反响便说明了这一点。通讯的第二部分马克思继续谈论印度问题,主要是揭露不列颠的殖民管理机构通过税收政策对印度农民所进行的无情剥夺。
-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7月19日。通讯随华盛顿号轮船7月20日从南安普敦出发,8月4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8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38号,署名卡尔·马克思。——235。
- 168 据圣经传说,金牛犊是以色列人为走出埃及而祈求祭司亚伦用黄金铸造的领路之神(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32章)。后来,人们常用“金牛犊”比喻崇拜的偶像。——237、362。
- 169 指坦吉马特政策的反对者所策划的谋杀阿·麦吉德苏丹的密谋。阿·麦吉

- 德于 1839 年 11 月 3 日颁布诏书, 答应实行改革政策(坦吉马特政策), 例如, 调整税收制度, 宗教信仰自由, 保障臣民生命、财产和遗产的安全等等。目的是采取与新兴资产阶级妥协的办法, 巩固君主制度。虽然上述的改革极为有限, 但以苏丹的弟弟阿·阿齐兹为核心的反对派却拚命反对, 并秘密策划杀害苏丹。——237。
- 170** 指驻多瑙河俄军司令哥尔查科夫 1853 年夏在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后对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居民发布的告示。告示说: 俄军进入多瑙河两公国, 目的不是更改过去条约中已对公国作了保证的政治机构和制度。——238。
- 171** 收税官是英国在印度的官员, 行使地方官、地方首席法官和主管收税人的职权。——241。
- 172** 这是马克思 1853 年写的一系列有关印度问题的文章中的最后一篇, 从内容看应当是《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见本卷第 137—144 页)的续篇。马克思按原来的思路对英国殖民政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指出了工业和资本的集中对社会关系所产生的革命影响。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 7 月 22 日。通讯随尼亚加拉号轮船 7 月 23 日从利物浦出发, 8 月 4 日到达哈利法克斯, 8 月 7 日到达纽约, 发表在 1853 年 8 月 8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40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245。
- 173** 马拉塔人是印度境内居住在德干西北部地区的一个部族。从 17 世纪中叶起, 这个部族开始进行反对莫卧儿(见注 103)封建主的武装斗争, 他们沉重地打击了大莫卧儿帝国并加速了它的崩溃。在这一斗争进程中建立了一个马拉塔人的独立邦。这个邦的封建上层人物不久就走上了侵略战争的道路。17 世纪末, 马拉塔邦被封建内讧所削弱, 但是在 18 世纪初, 又形成了一个以最高统治者派施华为首的诸马拉塔王国的强大联盟。马拉塔封建主为了称霸印度而与阿富汗人进行斗争, 1761 年遭到惨重的失败。在 1803—1805 年英国—马拉塔战争中诸马拉塔王国被东印度公司(见注 85)征服。——245。
- 174** 圣威廉堡(威廉堡)是英国人于 1696 年在加尔各答修建的一个城堡, 以当时英国国王奥伦治威廉三世的名字命名。英国人在 1757 年征服孟加拉以后, 把政府机关迁入这个城堡, 城堡的名字遂被用来指“孟加拉管区政

府”，后来指“印度英政府”。——248。

175 札提是北印度的一个种姓集团，它的基本群众是耕作农，其中也有军事封建等级的代表。在17世纪，农民札提曾多次举行起义，反对外来的莫卧儿（见注103）封建主的统治。——250。

176 奥里萨（东印度）的札格纳特庙是崇拜印度教主神之一毗湿奴-札格纳特（见注105）的中心。庙里的僧侣受到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从群众朝拜以及豪华祭祀中取得巨额收入。在群众朝拜时，他们趁机怂恿住在庙里的妇女卖淫，而在举行祭祀时，则有一些狂热信徒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251。

177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的上半部分对英国的国内政策，特别是对罢工运动的发展进行了评论。通讯的第二部分分析了沙皇外交代表使团在巴尔干半岛的活动。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7月29日，但马克思很可能先于29日，从22日便开始准备这篇文章的写作了。通讯随阿非利加号轮船7月30日从利物浦出发，8月11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8月12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44号，署名卡尔·马克思。——253。

178 群贤内阁（1852—1855年）即阿伯丁联合内阁，是由一部分辉格党（见注61）的寡头政治家、皮尔分子、激进派和爱尔兰议员团的某些代表组成。这个内阁之所以能够在执政党和托利党（见注3）反对派在下院席位相等的条件下存在，是因为得到了爱尔兰旅（见注63），即在英国议会中拥有60多人的爱尔兰议员团的支持。——254、281、324、377。

179 马克思讽刺地把那些支持将马车夫的报酬降低到1英里6便士的人比作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约·汉普敦。1637年，汉普敦拒绝向皇家收税官交纳“造船费”这一未经下院批准的捐税，并且在法庭上坚持英国人有抗交皇家非法征收捐税的权利。就汉普敦拒绝纳税一事进行的审判使英国社会中反对专制制度的情绪更加高涨。——255。

180 圣山（Mons sacer）位于罗马附近。据传说，大约在公元前494年，古罗马的平民由于不堪忍受贵族的压迫都上了圣山。——255。

181 乔·绥夫特遗言嘱咐用自己的全部财产在都柏林建立一所疯人院。由他出资建立的爱尔兰第一所疯人院于1757年开业。——257。

- 182 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在伦敦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计划前往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接受人民宪章。示威者在肯宁顿广场集结后,本来打算从这里向议会大厦进发,但是,政府禁止示威游行,军警齐集伦敦,阻挠游行。宪章派的许多领导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示威游行,并且劝说游行的群众解散。反动势力利用游行的失败来向工人进攻和迫害宪章派。——257、549。
- 183 1848年宪法中的最后一个宪法指1849年6月5日的丹麦宪法。丹麦国王的政变指弗雷德里克七世为加强国王权力而于1853年提出对1849年宪法进行修改一事。修改后的新宪法于1855年10月2日生效。
- 王位法(Lex Regia)是国王弗雷德里克三世于1665年11月14日颁布的丹麦王位继承法。这项法律确立了丹麦国王的绝对权力,建立了容许按女系继承王位的制度。这一王位法于1853年废除。根据1852年5月8日的伦敦议定书(见注69)和1853年7月31日的新王位继承法,取消了女系的继承权。由于当时在位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没有直系继承人,便确认格吕克斯堡王朝的克里斯蒂安公爵作继承人。新法律间接确认了俄国王朝的代表即荷尔斯泰因-哥托尔普公爵(彼得三世)的男系后裔有继承丹麦王位的权利。——258、271、276、521。
- 184 由于俄土关系的尖锐化,1853年7月24日由奥地利政府发起,在维也纳召开了一个有奥地利代表和英、法、普三国大使参加的会议,以便在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实行调停。会议制定了一个和解性的致俄国沙皇和土耳其苏丹的照会(所谓的维也纳照会)。照会规定苏丹有义务遵守库楚克-凯纳吉条约(见注89)和阿德里安堡条约(见注41),保障在奥斯曼帝国的希腊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不受侵犯。根据会议的决定,照会首先应该递交沙皇,然后在沙皇对照会表示首肯的情况下再递交苏丹。尼古拉一世同意了照会的内容,同时保留了自己可以随意解释照会的权利;但是苏丹政府在路西德帕沙1853年8月19日给英、法和普鲁士的照会中提出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为沙皇政府不可能接受的保留条件,尤其是把俄国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兵作为同意签署照会的先决条件。——259、267、336、357、479、489。
- 185 黎塞留在政治遗嘱(1633年)中阐述了法国君主专制制度国内外政策的最重要的原则,竭力为他扩张法国疆界和夺取欧洲霸权的野心寻根立据。

查理大帝敕令是墨洛温和加洛林王朝历代法兰克国王的法令集；其中有如何管理被征服的领土的法令。——262。

186 11世纪末，土耳其奥古兹人占领了小亚细亚的东部，建立了以伊康尼城（古称科尼亚城）为中心的土耳其封建国家。在塞尔柱王朝领导下的伊康尼苏丹王国进行了反对拜占庭和十字军的斗争，赶走了希腊的皇帝们。到13世纪后半叶，由于蒙古的入侵和封建割据日益增长，伊康尼苏丹王国分成了许多单个的独立公国。和拜占庭接壤的诸公国中，有一个公国位于安纳托利亚的西北区，由部落领袖奥斯曼领导，成了后来新的土耳其国家——奥斯曼（奥托曼）帝国的核心。在14世纪，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的不仅有伊康尼苏丹原来的领地，而且还有被土耳其人夺取来的邻国的领土。在1453年，即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统治时期，土耳其奥斯曼人占领了拜占庭皇帝的最后一个堡垒——君士坦丁堡，并把它变成奥斯曼帝国的京都。——263。

187 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地中海东南岸地区，其首都是君士坦丁堡。1453年土耳其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中国史籍中称东罗马帝国为拂菻或大秦。——263。

188 纽约水晶宫是1853年为世界工业博览会建立的，当年7月15日开放。此后一直是举办各种展览的场所。1856年被大火焚毁。——264。

189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除继续报道俄土冲突外，还较多谈到丹麦事态的发展。马克思对丹麦问题已经作了较长时间的研究，并作了各种有关的摘录。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8月2日。通讯随洪堡号轮船8月3日从南安普敦出发，8月15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8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47号，署名卡尔·马克思。——265。

190 独户农是俄罗斯帝国的一类特殊的国家农民，由较低级的戍边军人组成，以前负有保卫莫斯科王国边疆的义务，他们在边疆分成单户定居，既是军人又是农民。——269。

191 艾德党或艾德丹麦人党是19世纪40至60年代丹麦的自由主义党派，名称来自其1842年提出的民族主义的口号“从松德到艾德的丹麦”。它坚

持把公国(艾德河以北)划入丹麦,同时又力图把主要为德国人居住的荷尔斯泰因公国与丹麦分开,这反映了丹麦资产阶级害怕荷尔斯泰因的工业与其竞争。因此,这个自由主义的党派便反对实行对丹麦王国各部分都适用的王位继承法(见注 183)。——270、521。

192 指“农民之友协会”,它是由丹麦自由主义派的领袖于 1846 年创立的农民联盟,左右着 40 年代丹麦的农民运动。协会的主要要求是通过国家的帮助把农民依据封建租佃权所使用的土地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这一协会提出的废除封建契约、实行普选权等要求都是从富裕农民的利益出发的。——270、521。

193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继续报道丹麦问题。美国在欧洲特别是在东方问题上采取积极的政策,以反对欧洲反动国家的姿态出现,尤其是在保护匈牙利流亡者免遭迫害方面的举动,使它在进步的公众舆论面前,甚至在英国获得了普遍的好感。马克思根据当时报纸的反映,对此作了比过去更详细的报道,可以说当时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所有报道都得到了《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赞赏。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 8 月 5 日。通讯随亚美利加号轮船 8 月 6 日从利物浦出发,16 日到达哈利法克斯,约于 8 月 18 日到达纽约,发表在 1853 年 8 月 1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50 号,署名卡尔·马克思。——273。

194 萨利法(Lex Salica)是日耳曼萨利法兰克人部落的习惯法的记录,编于 6 世纪初。萨利法第五十九章取消了女系后裔的继承权,其中包括王位继承权和土地继承权。一些西欧君主国根据萨利法长期采用了仅由男系继承的王位继承制。——276。

195 指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1815 年维也纳会议(见注 9)通过一项决议: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仍归丹麦君主国所有。1848 年在法国二月革命和德国三月革命的影响下,这两个公国的德意志居民掀起了反对丹麦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成立了临时政府。该政府曾向德意志联邦议会和普鲁士求援,普鲁士统治集团在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发动了反对丹麦的战争,向两个公国派出了联合部队。但在实际作战中采取消极态度,并于 1848 年 8 月 26 日在马尔默同丹麦政府签订了为期七个月的停战协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 1848 年 9 月批准了这一协

定,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抗议怒潮并导致法兰克福人民起义。1849年3月2日普鲁士又恢复了战争行动,但在支持丹麦政府的英国和俄国的压力下,普鲁士被迫于1850年7月2日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暂时放弃了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并入德国的要求。两公国的军队很快被丹麦军队打垮,丹麦王国在那里恢复了1848—1849年革命前的统治。——277、521。

196 1783年和约是北美独立战争(1775—1783年)结束时签订的美英巴黎条约。在条约中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的独立。——279。

197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全欧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结束时签订的两个和约:一个是德国皇帝、德意志诸侯和瑞典在奥斯纳布吕克签订的和约;另一个是德国皇帝和法国在明斯特签订的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反哈布斯堡王朝联盟的胜利,加速了法国在欧洲取得霸权地位,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款,瑞士联邦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279。

198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除了继续报道俄土纠纷的情况外,着重谈了英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一些内政问题,其中包括马克思在前些时候的通讯中已经谈过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人口外流的问题,造成这种外流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以及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还先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其他通讯员分析了英国王室在俄土纠纷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这一公众极感兴趣的话题。

这篇通讯实际上是由笔记本中注明8月9日和12日的两篇通讯组成的。通讯分别随太平洋号和阿拉伯号轮船8月10日和13日从利物浦出发,8月23日同时到达纽约。编辑部将两篇通讯合在一起,将时事部分放在了前面,注上了最近的日期,发表在1853年8月2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54号,署名卡尔·马克思。——281。

199 路易·波拿巴在准备1851年12月2日政变时以共和国总统的身分举行招待会和阅兵时,曾用腊肠、冷盘野味和香槟酒等款待军官和士兵。——281。

200 在典地产法令是爱尔兰议会于1849年通过的。这一法令规定,如果抵押地产的所有者没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可以拍卖他的地产。这就使破产地

主的地产生落到高利贷者、中间人和富裕租佃者的手中。

1852年的地主和租佃者法案以及1853年的租佃者权利法案(见注136)都是作为对该法令的补充而提出的。——288。

- 201 上院议员根据中世纪的传统必须向王室宣读庄严的誓言(效忠誓)。同时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见注33)授权英国封建主在他们的封建特权遭到破坏时可以举行起义反对王室。——288。

- 202 指英国在1846—1847年葡萄牙人民起义反对国内反动制度期间,支持统治葡萄牙的科堡王朝的旁系,并联合西班牙的干涉者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292。

- 203 马克思在这篇及下篇通讯《土耳其问题在下院》(见本卷第304—318页)中详细报道了英国议会两院就不列颠政府对东方问题的态度所进行的辩论,报道清晰地勾画出统治阶级内部各种派别及其在决定性策略上的分歧。两篇文章是一个整体。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8月16日。通讯随海尔曼号轮船8月17日从南安普敦出发,9月1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9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62号,署名卡尔·马克思。——295。

- 204 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洛涅、斯特拉斯堡和巴黎三个城市名称的第一个音节组成。暗指波拿巴1836年9月30日在斯特拉斯堡发动武装叛乱、1840年8月6日在布洛涅试图入侵英国以及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299、633。

- 205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继续报道英国议会对政府外交政策的辩论。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8月19日。通讯随欧罗巴号轮船8月20日从利物浦出发,8月29日到达哈利法克斯,约于9月1日到达纽约,这样编辑部便在同一天收到了两篇通讯,两篇通讯均发表在1853年9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62号,署名卡尔·马克思。

本文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注明的写作日期是“8月18日星期五”,这显然是笔误,因为星期五是8月19日,也是马克思自己记录的日期。——304。

- 206 除了1853年5月6日俄土条约的草案(见注119)以外,缅施科夫公爵还

- 向土耳其政府建议单独签订一个共同防御同盟的秘密条约。这一条约的草案规定：一旦某强国企图用武力阻挠实现上述关于希腊正教教会在土耳其的特权的协定，俄皇将给予苏丹军事援助。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支持下，不但拒绝了条约的草案，也拒绝了秘密防御条约的草案。——306。
- 207** 指1853年6月16日土耳其外交大臣路西德帕沙对俄国总理大臣涅谢尔罗德1853年5月31日来信(见注124)的答复。路西德帕沙在他的答复中拒绝了涅谢尔罗德信中提出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和指责，同时他通知俄国，苏丹准备派遣一个特别使团到彼得堡解决冲突，商定一个不削弱苏丹主权而又确认土耳其的希腊正教教会权利的办法。——306。
- 208** 1839年，米哈伊尔继承父位。塞尔维亚公爵米·奥布廉诺维奇企图建立独裁统治政权，遭到了商业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被迫退位。继承者米哈伊尔依然力图继续推行其父的政策。1842年8月，拥护温和宪法和资产阶级改革的所谓法律捍卫者举行起义赶走了米哈伊尔。起义的领导人亚·卡拉乔治维奇被推举为塞尔维亚公爵，他的政权受到商人寡头政治家的支持。这一政权的代表人物(加腊沙宁等)制定了将南部斯拉夫的领土统一于塞尔维亚政权之下的计划。——309。
- 209** 航海条例是为了保护英国海运，对付外国竞争而制定的一系列条例。条例规定进口货物只能用英国船只或货物出产国的船只；英国沿海的航行和与殖民地的贸易只限于英国船只。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航海条例，是1651年克伦威尔为对付荷兰的转口贸易和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而颁布的条例，以后几年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航海条例在19世纪20年代已受到很大限制，1849年只保留了有关沿海贸易部分，1854年被全部废除。——316、331、491。
- 210**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概括了欧洲大陆一些国家的报刊对俄土冲突的反映，对刚结束的英国议会会议作了一个总结。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8月23日。通讯随大西洋号轮船8月24日从利物浦出发，9月4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9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64号，署名卡尔·马克思。——319。
- 211** 指波兰流亡者的右翼保皇派，其中心是亚·查尔托雷斯基公爵在巴黎的私

邸——“兰伯特寓所”。波兰的流亡贵族也居住在英国和其他国家。——323。

212 1846年2月,波兰爱国者为实现波兰的民族解放举行起义。由于小贵族分子的叛卖行为以及普鲁士警察当局逮捕了起义的领导者,全国性普遍起义未能发生,只在克拉科夫,起义者于2月22日获得了胜利并且建立了民族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徭役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于1846年3月初被镇压了下去。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在维也纳签订了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从1846年7月起担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拒绝了法国关于联合抗议这项条约的建议,并且在1846年11月23日的信中向维也纳当局暗示,英国不打算保护克拉科夫共和国,同时又伪善地呼吁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放弃它们对克拉科夫的野心。关于帕麦斯顿对波兰事件的态度,马克思在《帕麦斯顿勋爵》这篇抨击性著作(见本卷第395—478页)中也作了描述。——323、426。

213 指皮尔派、辉格党人(见注61)和所谓的梅费尔激进派(见注72)于1852年春在伦敦切舍姆街的约·罗素私邸达成的协议。协议规定了对德比的托利党内阁实行共同的反对派的路线,并且规定了一旦德比内阁垮台组织联合内阁的条件。1852年12月成立阿伯丁联合内阁时切舍姆街协议仍然是有效的,因此辉格党和皮尔派的首领占据了内阁中最重要的职位,梅费尔激进派的代表人物也分到了一些职位。——324。

214 这是马克思写给《晨报》的一封供发表的信件,写信的起因是:在《晨报》上进行的关于巴枯宁的论战中,该报在1853年8月24日刊登的一封信中暗示《新莱茵报》曾传播有损巴枯宁名声的谣言。

这场论战是由该报1853年8月19日刊登的戈洛文的匿名文章《欧洲。——一个人》引起的。为反驳这篇颂扬巴枯宁的文章,戴·乌尔卡尔特的追随者弗·马克思于8月23日在该报发表了一篇短评《俄国间谍巴枯宁》,署名“弗·马”。8月24日该报又刊登了戈洛文、赫尔岑和波兰流亡者沃尔采尔反驳“弗·马”的信,信中说:早在1848年就有一家德国报纸传播过这种诽谤等等。

马克思为反驳戈洛文等人的指责,于1853年8月30日写了这封《致〈晨报〉编辑》的信,该信发表在1853年9月2日的《晨报》第19406号,署名卡尔·马克思。1853年8月27日,弗·马发表声明作答,其中说,欧洲发

生的革命向来都是被沙皇间谍煽动起来的。8月29日,戈洛文和赫尔岑发表了另一封题为《弗·马是什么人?》的信。在这以后,戈洛文继续进行论战,赫尔岑退出。8月31日,《晨报》又刊登了卢格的一封信,标题是《米哈伊尔·巴枯宁》,其中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公开进行诽谤,指责他们蓄意传播损坏巴枯宁名誉的谣言。9月3日,《晨报》发表了戈洛文的匿名短评《应该怎样写历史》,在这篇作为答复马克思1853年8月30日给《晨报》编辑的信的短评中,戈洛文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进行了新的攻击。

为回击戈洛文和揭穿卢格的捏造,马克思于9月4—7日写了一篇声明,但《晨报》编辑部拒绝发表这个声明,马克思遂把它寄给了《人民报》,最后以致《人民报》编辑为题发表在1853年9月10日的《人民报》第71期。

1853年10月《晨报》宣布结束关于巴枯宁的争论。有关这一争论及马克思的声明等情况,见马克思1853年9月3日写给恩格斯的信。——327、333。

- 215 德累斯顿起义是1849年5月3日至9日在萨克森的首都德累斯顿爆发的武装起义。起义的原因是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起草的帝国宪法和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起义的领导者是赛·奇尔纳、米·巴枯宁等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几乎没有参加斗争,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街垒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起义于5月8日遭到萨克森政府军队和普鲁士军队的镇压。——329。

- 216 马克思在这篇简短的通讯中主要报道了英国的罢工运动。一个月以前,他在7月29日的通讯《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出租马车。——爱尔兰。——俄国问题》(见本卷第253—264页)中已对此作了报道。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8月30日。通讯随富兰克林号轮船8月31日从南安普敦出发,9月14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9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73号,署名卡尔·马克思。——330。

- 217 嫌疑犯处治法是1793年9月17日法国国民公会颁布的一项法律。它规定,所有那些其行为或交往、言谈、著作表现出拥护暴政者均应被逮捕。——335。

- 218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的上半部分继续对俄土冲突进行了报道。他认为,由于土耳其关于修改维也纳照会(见注184)的建议一定会遭到俄国的拒绝,

俄土冲突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除此之外，他再次谈到了美国对待俄土冲突的态度问题。通讯的第二部分谈的是英国经济的发展问题。马克思预见英国将面临一场新的贸易危机。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9月9日。通讯随阿非利加号轮船9月10日从利物浦出发，9月22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9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81号，没有署名。——336。

- 219 1844年法令是英国政府为解决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倡议实施的英格兰银行（见注84）改革法。该法令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部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各自有其独立的现金储备。银行部经营纯银行业务，发行部掌管银行券的发行；并规定银行券任何时候都应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作为保证基金，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限为1400万英镑。尽管实行了1844年的银行法，但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实际上不是取决于保证基金，而是取决于流通领域内对银行券的需求量。在经济危机时期，由于对货币的需求量激增，英国政府一再被迫暂时停止实行1844年的法令，增加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数额。——341、364、482。

- 220 马克思的这篇通讯主要描述了英国的经济危机，他发现当前英国的经济状况与1847年时的情景极为相似。当时，从英国开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曾席卷全欧。他在9月15日写给阿·克路斯的信中说：“我认为，商业萧条将在春季开始，像1847年那样。”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9月13日。通讯随华盛顿号轮船从南安普敦出发，9月29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9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86号，署名卡尔·马克思。——347。

- 221 指1852年秋瑞士泰辛州当局封闭设在洛迦诺的嘉布遣会的天主教堂，并把22名意大利的嘉布遣会会士遣回伦巴第的事件。嘉布遣会士是受奥地利保护的，而瑞士和奥地利的关系由于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在瑞士居留的问题已经很紧张，瑞士当局反对嘉布遣会的上述做法使瑞奥关系变得更加尖锐。这一争端直到1855年才被调解平息。——348。

- 222 指托·卡莱尔《现代评论。（二）模范监狱》一书，1850年伦敦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1850年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分析批判该书的书评。——349。

- 223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主要报道了俄土冲突的进展情况和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对此所采取的态度。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9月20日。通讯随波罗的海号轮船9月21日从利物浦出发,10月3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10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89号,署名卡尔·马克思。——357。

- 224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主要报道了在土耳其拒绝维也纳照会后俄土冲突加剧的情况,除此之外还谈到了英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文中马克思利用了恩格斯应他的请求寄来的有关兰开夏郡和英国其他工业区的经济状况的材料。马克思把这份材料分成了两部分,在本篇和下篇通讯中各利用了其中的一部分。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9月23日。通讯随阿拉伯号轮船9月24日从利物浦出发,10月6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10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92号,署名卡尔·马克思。——368。

- 225 乌列玛是伊斯兰教用语,指教内博学之士。广义指伊斯兰教的神学家和法学家阶层。在中近东伊斯兰教国家是穆斯林教指导者,为学校提供教师,监督司法工作等。乌列玛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曾有过巨大的影响。——376。

- 226 防疫法是1848年9月4日英国议会颁布的一项法令,对在传染病流行期所应采取的行政措施作了明文规定。这个法令在1848—1849年以及后来1853年霍乱流行期间都起过一些作用。——377。

- 227 指1851年12月底开始并席卷了英国东南部和中部许多城市的机器制造厂工人的罢工。罢工是机械工人联合会组织的,其目的是取消加班加点和改善劳动条件。为对付罢工,企业主们宣布同盟歇业。持续3个月之久的斗争,以企业主的胜利结束。工人们不得不在原有的条件下复工,但是企业主也由于罢工和同盟歇业而受到巨大的物质损失。——378。

- 228 这是马克思根据恩格斯寄来的关于英国经济状况的材料撰写的第二篇通讯。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9月27日。通讯随洪堡号轮船没有准时在9月28日,而是推迟两天后从南安普敦出发,10月14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10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0号,署名卡尔·

马克思。

《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被误写为“9月29日星期四”。——381。

229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来的著作中用“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这些更确切的术语代替了“劳动价值”、“劳动价格”的用语（见恩格斯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1891年版所写的序言）。——385。

230 这是恩格斯关于俄土战争系列军事文章中的第一篇。鉴于俄土纠纷日益尖锐，战争威胁日益临近，马克思在1853年9月17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就军队的态势等等写点什么是很重要的”。恩格斯因此写了这篇分析俄国和土耳其在巴尔干和亚洲的军事力量状况的文章。

恩格斯很可能是在9月28日动手写作这篇文章的，因为他必须在9月29日准时将稿件寄出，以便马克思能在30日收到稿件，誊清后再寄出。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9月30日。通讯随加拿大号轮船10月1日从利物浦出发，10月13日到达哈利法克斯，约于10月16日到达纽约。编辑部根据得到的最新消息将通讯的头一段作了些修改和补充，然后作为社论发表在1853年10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0号，没有署名。——388。

231 指奥美尔帕沙1846年指挥土耳其军队出征库尔德斯坦，镇压那里爆发的反苏丹的起义。——389。

232 这是马克思为揭露以帕麦斯顿为代表的英国寡头政治而写的一组抨击文，以回击当时一些报纸对帕麦斯顿的吹捧。这些报纸称他是阿伯丁联合内阁中唯一可靠的献身于民族利益的大臣，只有他才能圆满地代表联合内阁。

马克思在1853年10月1日——大约12月22日之间写成这组抨击文，写作时广泛地查考了史料，首先查考了所谓的《蓝皮书》——定期出版的、卷帙浩繁的英国议会资料及外交部文件。此外，他还利用了关于议会会议的报告，主要是汉萨德出版的《议会辩论》，以及各种国际条约、外交文件汇集、评论集和大量报刊材料。

《帕麦斯顿勋爵》一文开始只是计划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1853年10月，在马克思寄出他的第一篇文章后，又与厄·琼斯达成协议，同时在宪章派（见注80）机关报《人民报》上发表这组文章。

《人民报》把这些文章作为一组完整的论文,用一个总标题《帕麦斯顿勋爵》发表,署名马克思博士,并在每篇文章之前加上:“马克思博士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而作,兼寄本报”。《人民报》在1853年10月22日—12月24日这段时间内共刊载了马克思的八篇文章。最后一篇也和前几篇一样,结尾都附有“待续”字样。从马克思在1853年12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本想再写几篇文章来谈帕麦斯顿在1840—1841年伦敦公约(见注7、122)签订期间的政策以及帕麦斯顿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立场,但这种想法没有实现。

《纽约每日论坛报》仅发表了其中的四篇文章,且都采用了社论形式,标题也各不相同。1853年10月19日《论坛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相当于《人民报》连载的第一、二两篇;1853年11月4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与俄国》,相当于第三篇;1853年11月21日发表的社论《现代史的一章》,相当于第四、五两篇;1854年1月11日发表的社论《英国与俄国》,相当于第七篇。第六、八两篇《论坛报》根本没有刊载。两家报纸所发表的文字也不尽相同。显然,马克思在给《论坛报》和《人民报》寄原稿时,估计到这两家报纸发表这篇抨击文的形式不同,作了些许文字上的修改。此外,《论坛报》编辑也对作者原文作了一些改动。

这组抨击帕麦斯顿的文章传播很广。1853年11月26日《格拉斯哥哨兵》转载了《论坛报》的《帕麦斯顿与俄国》一文(《人民报》上的第三篇)。1853年12月伦敦的出版者塔克尔以同一标题出版了这篇文章的单行本;1854年初,塔克尔再版了这个单行本。马克思根据《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对它作了修改和补充。不久,塔克尔又出版了另一个单行本《帕麦斯顿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扉页上的标题是《帕麦斯顿,他过去做了些什么》);这个单行本翻印了《人民报》发表的第四篇(缺前四段)及第五篇,改动不大。这两种单行本作为第一、二两号被编入塔克尔出版的《政治评论集》,并于1855年和其他作者的抨击文一起重版。

1855年11月17日和1856年1月5日,与帕麦斯顿对立的乌尔卡尔特派的报纸《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刊载了《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文章中的两篇(即《人民报》发表的第三、六两篇)。其中的前一篇还单独重印,编为设菲尔德出版的《自由新闻》小丛书第4A号。差不多就在同时,乌尔卡尔特派的伦敦机关报《自由新闻》于1855年12月29日、1856年1月5日和12日、2月9日和16日分五次刊登了全部八篇文章。这些文章又由

《〈自由新闻〉小丛书》单独印行，标题《帕麦斯顿勋爵传》，作为该丛书的第5号出版。单行本指出了作者的名字。

纽约的《改革报》于1853年11月2日用德文发表了马克思在《论坛报》上发表的第一篇社论《帕麦斯顿》。译文是阿·克路斯从《论坛报》上节译的。在编辑部的前言中说道：“帕麦斯顿的名字现在又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所以我们决定从《论坛报》上节译这些文字。这篇评论表明作者对于英国情况的了解非同一般，所以尽管没有署名，也不难猜出是谁写的。”11月2、3、4、8和9日刊载在《改革报》上的《帕麦斯顿》一文，相当于《人民报》发表的第一、二篇。1855年2月，马克思把题为《帕麦斯顿勋爵》的两篇文章寄给布雷斯拉夫（弗罗茨瓦夫）的《新奥得报》发表，这两篇文章基本上是《人民报》和《论坛报》发表的文章的摘要。马克思的抨击文章的摘要（有作者的署名）还收入德国政论家爱·费舍尔于1859—1860年在柏林出版的《新公文集。现代史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第1、2两卷。

1893年，马克思逝世后，第三篇曾用波兰文刊载在同恩格斯有联系的波兰社会党人在伦敦出版的杂志《黎明》第7期上。第七篇曾在1897年由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根据《论坛报》原文并以同一标题（《英国与俄国》）收进她和爱·艾威林共同出版的马克思论东方问题的文集。1899年在伦敦又出版了由爱·马克思编辑的八篇文章的汇编：卡尔·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传记》。——395。

- 233 烧炭党是19世纪初意大利的一个秘密政治团体。最初在法国统治下的那不勒斯王国成立，旨在争取意大利独立，推翻专制制度，建立立宪政体。成员主要是城市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军官、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人物。它的领导机构是“最高温特”。1817—1831年间曾在意大利多次发动起义，仅1820年的那不勒斯起义获得成功，一度迫使国王斐迪南一世颁布宪法。30年代初，由于反动派和奥地利军队的联合镇压，烧炭党逐渐衰落，作为独立的团体已不复存在。——400。

- 234 英国议会于1850年6月讨论与所谓“帕西菲科事件”（见注154）有关的英希冲突问题时，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得到下院的赞同。相反，上院却以37票的多数表示反对政府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法国和俄国也反对英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并通过它们驻伦敦的大使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法国大使以示威的姿态离开伦敦，俄国大使拒绝出席帕麦斯

顿举行的宴会。——400。

- 235 谷物法是英国历届托利党(见注3)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采用滑动比率: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401、491、510、538、679。
- 236 驻扎在英国的外国雇佣兵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从德国各小邦,特别是从汉诺威——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国王的世袭领地——招募到英国军队里来的。在1799—1802年的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失败后,英国于1803年11月将其组建成一支军队,其编制一直保留到1816年。——401。
- 237 丹麦因为与法国进行贸易有利可图,没有参加反法同盟。英国为了阻止丹麦加入拿破仑宣布的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的大陆体系,于1807年9月炮轰哥本哈根。遭炮轰的哥本哈根被迫向英国交出自己的舰队。即使如此,丹麦在炮轰事件后仍然参加了大陆体系,追随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401。
- 238 惩治叛乱法案(Mutiny Act)是英国议会从1689年至1881年每年都要通过一次的法案。这项法律授权国王保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军和海军,在军中实行各种军事条令和制度,实行军法审判。1689年第一次通过的惩治叛乱法案是为了对付英国兵变,该法案制定了一套惩治参加哗变、违抗命令、违犯纪律等等行为的制度。——403。
- 239 在不列颠军队中服役的军官,逾期仍得不到与其军衔相符的任职时,便可按照惯例,出卖自己的官衔证书,然后领取原职位的一半军饷,几年之后再最终退役。

马克思在1855年3月3日写给《新奥得报》的通讯《军衔买卖——澳

大利亚消息)中也谈到了英国买卖军官官衔的情况。——403。

- 240** 市镇机关法(Corporation Act)是英国议会于1661年通过的,为了消除清教徒在城镇中的巨大影响,它要求市镇机关中的选职人员承认英国国教教会的信条和戒律。

宣誓法(Test Act)是英国议会于1673年通过的,它要求一切公职人员必须承认英国国教教会的信条。

这两项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颁布的法律本来是为了对付清教徒的,后来却变成了对付反对英国国教教会的所有派别的武器和维护英国国教教会特权的工具。——403。

- 241** 天主教徒的解放是指1829年英国议会取消了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市镇机关法和宣誓法也因此被废除。天主教徒大部分是爱尔兰人,他们获得了被选入议会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但同时选民的财产资格却被提高了五倍。英国统治阶级指望用这个手段把爱尔兰资产阶级和信奉天主教的土地占有者的上层拉到自己方面来,以便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404。

- 242** 济贫法(Poor Laws)是英国1601年颁布的,它规定每个教区必须缴纳教济贫民的特别税,教区中不能维持自己和自己家庭生活的居民可以通过济贫会得到救济。

1834年通过的新济贫法(见注150)对1601年济贫法作了重要修订。——405。

- 243** 腐败的城镇选区是指英国那些到18—19世纪时居民已经稀少或根本无人居住的小市镇和乡村。这些市镇和乡村从中世纪起就享有选举代表进入议会的权利。然而这些代表实际上是由当地的大土地贵族指派的。这种特权被1832、1867和1884年的改革所取消。——408。

- 244** 图尔克曼恰伊条约是俄国和波斯两国于1828年2月22日在图尔克曼恰伊村签订的一个条约,该条约结束了1826—1828年的俄波战争。条约规定了俄国和波斯新的国境线,即基本以阿拉斯河为共同边界,跨阿拉斯河的埃里温省和纳希切万省划归俄国。条约给予俄国商船在里海自由航行和俄国独自享有在里海拥有舰队的特殊权利。与此同时,波斯必须作出不在里海驻留舰队的保证。——411。

- 245 阿克尔曼条约是俄国与土耳其于1826年10月7日签订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土耳其政府应严格遵守以前同俄国缔结的各项条约,给予俄国商船在土耳其领海航行的自由,给予俄国商人在土耳其领土上经商的权利,并放弃所有1806—1812年俄土战争后划归俄国所有的对黑海高加索沿岸地区的权利。条约重申苏丹承认塞尔维亚自治,并规定要从当地大贵族中选举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国君。阿克尔曼条约没有提及希腊问题。土耳其统治集团根据这一点,在1828—1829年俄土战争的前夕硬说俄国已根据这个条约放弃了对希腊事务的干预,如果它帮助希腊人就是违背这个规定。但实际上“对希腊事务不感兴趣”这句话沙皇政府并不是在签订阿克尔曼条约时说的,而是在这以前几个月说的。——412。
- 246 1827年7月6日各强国在签署伦敦条约(见注45)时同时签署了一个附加条约。该附加条约在土耳其对签约国的干预企图反抗时生效。条约和附加条约是分别签署的,并分别得到各国的批准。英国驻土耳其大使斯·坎宁向土耳其政府提交了这份附加条约。——412。
- 247 在1853年10月1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文章以下面一段话结尾,这段话看样子是报纸编辑部加的:“这句话使人清楚地看到,帕麦斯顿勋爵决不代表自由、荣誉和英国所固有的一切优点。勋爵阁下在那个时候以及在我们所描写的他的活动的最早期是怎样一个人,那么他今天仍然是怎样一个人;所以凡是知道他的人在今天这样严重的关头除了看到他他对正义和人权采取假热心的态度外,别的什么也不用想从他那里得到。我们尚未谈到的他那政治生涯部分留在下一次谈;遗憾的是这一部分并不是最精彩的。”——414。
- 248 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为达到兼并意大利领土的目的,企图取消意大利北部那些自由市的市政自由,米兰人从1159年起就拒绝服从这个皇帝。在随后的长期斗争中米兰于1162年遭到破坏,但最终还是这些城市取得了胜利。——416。
- 249 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是反对沙皇制度的民族解放起义。1830年11月29日在华沙以军事政变开始的这次起义,曾经赶走了沙皇的军队。起义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波兰小贵族的手里。他们由于拒绝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废除农奴依附地位的要求,没有能够把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没有农民的支持注定了起义的失败,起义遭到了沙皇的残酷镇压。

对这次起义的评价,见恩格斯《关于论波兰问题的演说》和《德国农民战争》第4节结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513—515页)。——421。

- 250 西班牙婚姻问题指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及其妹玛丽-路易莎-费南达公主的婚姻问题。英国最初打算让伊萨伯拉嫁给同英国宫廷关系密切的科堡亲王莱奥波德,让她妹妹嫁给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幼子蒙庞西埃公爵,这一计划将加强英国在比利牛斯半岛的地位。可是过了一些时候,英国又坚持让玛丽-路易莎-费南达嫁给莱奥波德亲王,让伊萨伯拉嫁给西班牙波旁家族的代表人物唐·恩里克。由于后者同进步党有联系,伊萨伯拉的母亲与路易-菲力浦联合了起来。基佐政府于1846年10月不顾英国的外交要求为法王路易-菲力浦的小儿子蒙庞西埃公爵订下了同西班牙公主玛丽-路易莎-费南达的婚约,破坏了英国所策划的科堡亲王莱奥波德同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的婚盟。英法两国政府之间围绕“西班牙婚约”而进行的外交斗争在1846—1847年引起英法关系的尖锐化,法国外交在这个问题上获胜以后,帕麦斯顿竭力寻找机会进行报复,他拒绝同法国一起共同抗议克拉科夫被吞并(见注212)便是一例。——427。

- 251 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是法国和西班牙为一方同参加反法联盟的国家(英国、荷兰、葡萄牙、普鲁士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另一方签订的条约,它结束了争夺西班牙继承权的长期战争(1701年开始)。根据法国和英国1713年4月1日签署的条约的第6款,西班牙王位仍留给法国王位追求者——路易十四的孙子波旁王族的菲力浦·安茹公爵,但法王必须放弃他合并法国和西班牙两个王国的计划,并放弃他自己以及波旁王朝法国支系的继承者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条约批准把法国和西班牙在西印度和北美的许多殖民地以及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

帕麦斯顿于1846年谴责法国破坏乌得勒支条约指的是路易-菲力浦又想通过他的小儿子同西班牙公主的婚姻而合并两个王国。——427。

- 252 1838年4月16日法国的一支海军中队以保护在墨西哥的法国臣民为借口封锁了墨西哥的港口。11月27—28日韦拉克鲁斯港被占领。1839年3月9日墨西哥被迫同法国签订了一个条约和一个协定。

英法舰队于1845年开始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实行封锁,目的是想迫使阿根廷政府向外国船只开放巴拉那河和乌拉圭河(这两条河由于阿根廷

- 与乌拉圭之间的战争,从1841年起就被封锁了),并以此迫使阿根廷承认乌拉圭的独立。1852年阿根廷政府接受了上述要求。——427。
- 253** 指1830—1831年比利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使比利时脱离了荷兰王国,推翻了拿骚国王威廉,在比利时建立了以科布尔克王朝为首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428。
- 254** 1853—1856年的俄土战争又称克里木战争或东方战争,最初是俄国和土耳其为争夺在近东的统治权而进行的战争。1854年土耳其联合英、法两国,1855年又联合撒丁王国,共同对抗俄国。最后俄国战败,交战双方于1856年3月30日签订巴黎和约,战争才算结束。——430。
- 255** 指1832年7月底在贝兰(叙利亚)进行的会战。埃及军队在易卜拉欣帕沙的率领下击溃了苏丹的军队,并把它逐出叙利亚。随后埃及军队开进小亚细亚,并于1832年12月在科尼亚打败了土耳其的军队,为埃及在1831—1833年的埃土战争中取胜奠定了基础。1833年,根据在屈塔希亚签订的和约(见注256),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里实际上被承认为埃及和叙利亚的独立的统治者。——436。
- 256** 在1833年5月的屈塔希亚和约中,穆罕默德-阿里承认苏丹为形式上的最高统治者,而他为此得到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阿达纳。在1840年7月15日签署的伦敦公约附加条款第一条中再次重申了这一协议。——439。
- 257** 1832年波兰王国的组织法是俄国沙皇在镇压了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见注249)之后颁布的。这个组织法废除了沙皇统治下的波兰土地上的民族自治残余,废除了1815年宪法、波兰议会和波兰军队。——441。
- 258** 1834年1月29日在圣彼得堡缔结的俄土条约对1829年的阿德里安堡条约(见注41)的某些条款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条约减少了阿德里安堡条约规定的土耳其每年所应交付的战争赔款的数目,把赔款总数减少了200万杜卡特。——444。
- 259** 在1854年1月1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文开头是以下这段话:“看来,帕麦斯顿勋爵的辞职已经在英国产生了他所能预期的那种奇迹般的效果。公众对他辞职后留下的内阁越来越不满,其实这个内阁的政策却是帕麦斯顿直到他在职的最后一分钟最坚决地予以支持的。同时那些痛

斥联合内阁的党派却竞相颂扬帕麦斯顿。它们一方面号召给予俄国的侵犯以有力的和应有的回击,但是另一方面它们似乎极其渴望它们所热爱的这位国务活动家回到领导岗位上来。这个训练有素和不知疲倦的演员就是这样在愚弄全世界。如果不是涉及重大的利害关系,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景象。关于误解是如何根深蒂固我们业已指出过了,现在我们只想在下面再提供一些证据,来说明帕麦斯顿出于某种原因一贯为俄国卖力,并为此而利用英国。凡是想看一看现代史舞台的幕后情形,并给这些事件和人物作出与它们的实际价值相符的评价的人,我们认为,都会从我们的叙述中获得某种教益。”

这些话不可能是马克思这篇文章的原文,因为《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文章的后几篇,马克思寄给《论坛报》编辑部不迟于1853年12月6日,即至少是在帕麦斯顿短期辞职(1853年12月16日)的前10天。报纸编辑部拖延很久,即到1854年1月11日才发表这篇文章,所以在发表时作了补充。补充的东西可能是从马克思的另一篇后来写的文章中借用来的。根据燕·马克思的记事簿上的记载,这篇文章于1853年12月20日寄往纽约,谈的是英国报刊对帕麦斯顿辞职的反应。1853年12月20日的这篇文章没有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手稿至今没有找到。——458。

- 260 1826年4月4日俄国和英国在彼得堡签订了一个议定书,其目的是力图掩饰它们站在希腊方面干涉希土冲突的真正目的,声明它们既不打算用损害土耳其的办法来扩大自己的领土,也不打算在苏丹属地上追求特殊的影响和贸易特权。英、俄、法在缔结1827年7月6日伦敦条约(见注45)时重申了这个声明。——460。
- 261 这里所说的另一篇文章并没有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出现,在燕·马克思的记事簿中可以看到,这篇文章马克思在1853年12月6日就已经寄往纽约了。《人民报》于1853年12月24日刊载了这篇文章,作为《帕麦斯顿勋爵》一文的第八篇。——466。
- 262 西班牙的斗篷宝剑喜剧又称袍剑剧,是17世纪西班牙描写上层社会世态人情并以情节取胜的戏剧,因斗篷和宝剑为剧中人物的典型装扮而得名。——471。
- 263 据说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俄国南部各省的总督波将金公爵在1787年叶卡捷琳娜去南方巡游经过的道路两侧用纸板搭了一些只有临街

一面墙的房屋,以造成此地根据 1774 年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见注 89)划归俄国后发展迅速的假象。因此人们有时把实际并不存在的骗人的东西、为掩盖真相而制造的虚假事物称之为“波将金村”。——474。

- 264 劳埃德委员会是 17 世纪在伦敦建立的一个专门办理海上保险的团体。劳埃德原是伦敦的一个咖啡馆的老板,英国第一家海船保险公司就是在这家咖啡馆里组织起来的。劳埃德委员会拥有庞大的贸易、船舶信息机构及自己的报纸。后来,欧洲各国很多轮船保险公司也都用劳埃德的名字命名。——477。
- 265 指 19 世纪 20 年代末开始的北高加索山区人反对沙皇俄国的战争。战争是由沙皇政府的殖民政策和受沙皇政府支持的当地封建主的统治压迫引起的。30 年代中,高加索的山民们在达吉斯坦和车臣建立了一个以沙米尔为首的宗教军事国家。土耳其和英国曾企图利用沙米尔所领导的运动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使高加索脱离俄国。这一斗争延续了几十年。在克里木战争结束以后,俄国军队才陆续击败沙米尔的力量,于 1859 年 8 月拿下他们的最后退守地古尼布。——478。
- 266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的开头简单报道了俄土战争爆发的情况及英法两国对此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接着用很大的篇幅继续报道英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人罢工的情况。其中关于棉纺织品交易的一段很可能是恩格斯写的,因为马克思曾在 1853 年 9 月 30 日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在文章中扩充一下棉纺织品方面的情况,使它至少能成为文章中单独的一部分。
-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 10 月 7 日。通讯随亚细亚号轮船从利物浦出发,10 月 19 日到达纽约,发表在 1853 年 10 月 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04 号,署名卡尔·马克思。10 月 24 日和 25 日纽约德文报纸《改革报》删节后转载了这篇文章,标题为《英国状况》。——479。
- 267 1853 年 9 月,尼古拉一世和奥皇弗兰西斯-约瑟夫在奥尔米茨举行了一次会谈。会谈后,奥地利政府试图促使西方列强采取新的步骤,在苏丹无条件接受维也纳照会(见注 184)的基础上调解俄土冲突,但未能成功。尼古拉一世在同弗兰西斯-约瑟夫会谈的过程中企图使后者相信,在多瑙河两公国的俄军不会强渡多瑙河,俄军只在多瑙河北岸采取防御行动。——481。

- 268 《梅尼普讽刺文集》是1594年在法国发表的一本匿名的政治抨击性小册子，其作者是与国王亨利四世有密切联系的雅·吉洛·弗·克莱蒂安、皮·勒鲁瓦等人。抨击的对象是1576年在胡格诺教徒战争时期创立的天主教联盟，这个联盟的封建贵族首领力图削弱国王权力，确立天主教上层的无限特权。这一作品的篇名取自公元前1世纪罗马作家瓦罗摹仿古希腊哲学家梅尼普写成的《梅尼普讽刺文集》。——485。
- 269 普雷斯顿罢工是19世纪50年代英国工人规模最大的罢工之一。1853年8月，普雷斯顿和附近棉纺织厂的织布工和细纱工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10%。企业主联合会为了对付罢工，于1853年9月宣布同盟歇业。在3万名普雷斯顿工人中约有2万5千人参加了罢工，在其他城市工人的援助下，罢工持续了九个多月。1854年2月，同盟歇业宣告结束，但罢工仍在继续。为了破坏罢工，企业主从爱尔兰和英国的习艺所中往普雷斯顿招募工人。1854年3月，罢工领导人被捕。由于资金枯竭，工人被迫复工。罢工于5月结束。——485。
- 270 指1848年6月巴黎工人的英勇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实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经过四天的英勇斗争，最后在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487、583、671。
- 271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主要报道了俄土冲突和一些经济问题。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10月18日。通讯随北极号轮船10月19日从利物浦出发，10月30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10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12号，没有标题，署名卡尔·马克思。——489。
- 272 恩格斯在他的通讯《俄军在土耳其》（见本卷第388—394页）中粗略分析了俄土力量的对比、将来的主战场及可能发生的战役等等，从《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这篇开始他将就俄土战争的情况作详细报道。
恩格斯最迟应在10月20日将这篇文章寄出，以便马克思能在21日连同自己写的那部分一起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

注明的日期是10月21日。通讯随阿非利加号轮船10月22日从利物浦出发,11月4日到达纽约。编辑部把恩格斯写的这一部分作为社论发表在1853年11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19号,没有署名。

马克思把自己10月21日写的通讯连同恩格斯写的《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一起寄给了《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在1853年11月5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17号,署名卡尔·马克思。——495、501。

- 273** 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指葡萄牙托里什韦德拉什附近的长条形防御阵地。它是1810年在葡萄牙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中,根据威灵顿的命令为保卫里斯本防备法军侵犯而修建的。这一阵地有三层坚固的工事,在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1808—1814年)中起了重要作用;1810—1811年依靠这一阵地击败了马塞纳元帅率领的法军对里斯本的进攻。——497。
- 274** 滑铁卢会战是拿破仑第一同第七次反法同盟联军进行的最后一次会战。1815年6月16日拿破仑在利尼会战(比利时)中击败由布吕歇尔率领的普军,并企图把普军同威灵顿率领的英荷军队分割开,各个击溃。但是在1815年6月18日决定性的滑铁卢会战中,当法军攻击威灵顿的军队并企图包围其翼侧的时候,布吕歇尔指挥的普军巧妙地摆脱了追击,突然出现在法军的左翼,与在滑铁卢和法军主力进行激战的英荷联军会合。普军的到来使本已胜利在望的法国军队终于失败。6月22日拿破仑第一决定退位,法兰西第一帝国告终。——498。
- 275** 1848年革命期间,一些比利时的工人和民主主义者在巴黎组成共和派军团,打算通过北部省突袭比利时,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当时北部省政府的专员是德勒克吕兹。1848年3月29日,其中一支志愿者的部队刚刚进入法国与比利时接壤的北部省,在里斯孔图村附近便遭到比利时军队的伏击,全军覆没。比利时国王莱奥波德一世政府以此为借口,大肆逮捕和迫害民主主义者,其高潮是8月9—30日在安特卫普审理的所谓里斯孔图案件。17名被告被判处死刑,1848年11月改判为30年监禁。——501。
- 276**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泰晤士报》在10月27日的报道中说,土耳其的军队在奥尔泰尼察附近渡过了多瑙河。这一预言有些为时过早。恩格斯便以此为题,就交战双方的前景及可能采取的战术再次作了分析,然后把文章寄给了马克思。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10月28日。通讯随亚美利加号

轮船 10 月 29 日从利物浦出发, 11 月 11 日到达哈利法克斯, 11 月 14 日到达纽约, 作为社论发表在 1853 年 11 月 1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25 号, 没有署名。——504。

277 埃尔祖鲁姆是土耳其在高加索的重要要塞, 1829 年 6 月被帕斯凯维奇指挥的俄军攻占。这一事件对俄军在 1828—1829 年的俄土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505。

278 贝亦美人是西亚、北非等地讲阿拉伯语的游牧和半游牧民族。库尔德人是西亚山区讲伊朗语的游牧民族。他们勇猛善战, 在许多军队中充当雇佣兵和职业军人。——506。

279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主要报道了英国工人的斗争情况。其中用对比的方法揭露了英国自由贸易派在外交政策中的虚伪谎言, 以及他们在工厂中所实行的残酷的压迫措施。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 11 月 1 日。通讯随波罗的海号轮船 11 月 2 日从利物浦出发, 11 月 14 日到达纽约, 发表在 1853 年 11 月 1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25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509。

280 在多瑙河军事行动开始后不久, 俄军司令官哥尔查科夫公爵就命令把多瑙河区舰队的一部分从伊兹梅尔调到布莱洛夫(布勒伊拉)和加拉茨地区。1853 年 10 月 23 日, 两艘俄国蒸汽舰和八艘炮艇在通过土军占据的伊萨克察要塞时发生炮战, 土耳其守卫部队遭到重大的损失。——509。

281 指普瓦捷街委员会, 即所谓秩序党的领导机关。秩序党是法国两个保皇派——正统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的联合组织。这个在 1848 年形成的保守派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从 1849 年到 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期间, 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路易·波拿巴集团利用了该党反人民政策的破产来达到波拿巴的目的。巴·狄利埃将军在共和国存在的年代里曾支持普瓦捷街委员会, 而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前夕倒向波拿巴派。——510、634。

282 威根风潮指 1853 年威根纺织工人和煤矿工人的罢工运动。参加煤矿工人大罢工的约有 5000 多名矿工。威根的工厂主和矿主们用宣布同盟歇业和大批解雇工人来对付罢工。10 月 28 日, 他们又决定于 10 月 31 日重

新开工,并准备从威尔士招募工人。消息传开,上千名罢工者用石头砸了工厂的会议室、商会和某些企业主的住宅。工人被赶来的军队驱散。10月31日,即煤矿重新开工之日,罢工者和被招募来的工人之间发生冲突,士兵开了枪,一些罢工者被打死。——510、523。

- 283** 1842年8月初,在英国的许多工业区特别是在兰开夏郡,爆发了罢工和工人骚动。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向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废除谷物法。他们曾多次鼓动工人采取行动。但是,资产阶级被大规模的罢工和骚动吓倒,又看到工人是在追求自己的目的,于是便转而支持对工人的血腥镇压。恩格斯在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英国谷物法史》中对这些事件作了详细的描述。——510。
- 284** 指布莱特和科布顿在和平协会(见注153)组织的爱丁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会议的总结报告载于1853年10月14日《泰晤士报》。——512。
- 285**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继续报道英国罢工和同盟歇业的情况,特别是上篇已谈到的威根风潮。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11月4日。通讯随阿拉伯号轮船11月5日从利物浦出发,11月7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11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28号,署名卡尔·马克思。——520。
- 286** 指伊朗军队为并吞赫拉特所采取的军事行动。赫拉特是一个商路枢纽,阿富汗和伊朗曾为争夺它发动过多次战争。英国殖民者利用1856年10月伊朗军队攻占赫拉特一事对伊朗发动战争,战争的结果,沙赫不得不从赫拉特撤兵。1863年赫拉特被并入阿富汗埃米尔的领地。——520。
- 287** 1853年沙皇政府组织了对哈萨克斯坦的征伐。由奥伦堡总督瓦·阿·佩罗夫斯基指挥的俄国军队逆锡尔河而上攻打浩罕(马克思本文中误指希瓦)。俄军建立了锡尔河战线后,便以此为基地进攻中亚的浩罕、布哈拉和希瓦等汗国。——520。
- 288** 1808—1809年俄国和瑞典的战争结束时于1809年9月17日签订了腓特烈港和约。和约规定,瑞典必须将芬兰,也就是托尔尼奥河以东的领土以及奥兰群岛割让给俄国。瑞典因此丧失了原三分之一的领土和四分之一的人口。——521。
- 289** 卡集诺内阁指1848年3月22日在全国革命高潮中成立的丹麦政府。

1848年3月21日和22日丹麦的自由主义者受德国三月革命的影响在哥本哈根“卡集诺”剧院举行群众大会。会后,与会者前往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的王宫举行示威游行,丹麦国王在惊恐之中基本上接受了自由派的要求。3月22日成立了有自由派政党艾德党领袖参加的新的政府,并向人民许诺,将召开立宪会议,起草宪法。——521。

- 290**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谷物进口税,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此项法律是为维护英国大地主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反谷物法同盟要求贸易自由,有组织地进行反对谷物法的斗争,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厂主的利益是一致的。1846年谷物法废除以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而实际上该同盟一直存在到1849年。——524。

- 291** 这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1853年11月2日来信的请求而写的关于俄土战争进程的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三篇文章全部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社论发表。第一、三两篇文章的标题均为《土耳其战争的进程》,第二篇标题为《俄军的失败》。

这篇文章估计是在11月7日完稿,然后寄往伦敦。它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11月8日。文章随华盛顿号轮船11月9日从南安普敦出发,11月24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11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34号,没有署名。编辑部在发表时补充了一段奥尔泰尼察会战的最新消息。——526。

- 292** 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特会战都发生在1806年10月14日这一天,通常统称为耶拿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普鲁士军队被击溃,并向拿破仑法国投降。1807年7月7日两国签订了有损普鲁士尊严的极为苛刻的蒂尔西特和约(见注5)。普鲁士丧失了将近一半领土,实际上降到了拿破仑法国附属国的地位。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81页)中说:“普鲁士国家已经灭亡过一次”。——529。

- 293** 1799年9月25—26日马塞纳指挥的法军在苏黎世附近击败了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将军的俄国军团。这次失败使已从北意大利出发与里姆斯

基-科尔萨科夫军团会合的苏沃洛夫指挥的俄军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尽管敌军兵力占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苏沃洛夫的部队却给法军一系列打击,并绕过苏黎世,挺进到莱茵河上游地区。恩格斯于1859年在自己的著作《波河和莱茵河》里对俄军进军瑞士作了很高的评价,称苏沃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是“到当时为止所进行的一切阿尔卑斯山行军中最出色的一次”。——532。

- 294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撰写的关于俄土战争进程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在接到恩格斯的文后加上自己写的分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部分作为一篇通讯寄给了《纽约每日论坛报》。

恩格斯应在11月10日将此篇文章寄往伦敦。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11月11日。通讯随加拿大号轮船从利物浦出发,11月14日到达哈利法克斯,11月27日到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把通讯分成两部分,同时发表在1853年11月28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36号。恩格斯写的军事部分作为社论发表,没有署名,标题为《俄军的失败》,但编辑部显然作了较大的改动,至少是开头部分,因为文中对土军的肯定性评价与恩格斯在此前后发表的文章不一致。

马克思写的部分作为通讯发表在同一天天的《论坛报》上,标题为《工人问题》,署名卡尔·马克思。——534、537。

- 295 1853年11月1日,土耳其军队从图尔图凯渡过多瑙河来到一个岛上,在那里威胁俄军占领的奥尔泰尼察,然后又趁俄军总司令丹年贝尔格(不是巴甫洛夫)按兵不动的机会,从该岛渡河到多瑙河左岸,占领了奥尔泰尼察,并建立了有岛上和河右岸炮火掩护的坚固的桥头堡。11月4日,俄军企图把土军赶出奥尔泰尼察,但因丹年贝尔格指挥无方而失败。关于奥尔泰尼察战役恩格斯在《土耳其战争的进程》和《多瑙河战争》(见本卷第550—556、605—612页)等文章中都有论述。——535、723。
- 296 在1849年3月23日北意大利诺瓦拉会战中,拉德茨基指挥的奥军巧妙地利用了皮埃蒙特将军拉莫里诺兵力分散的弱点,大败皮埃蒙特的军队。结果,奥地利恢复了在北意大利的统治地位。——536。
- 297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继《工人问题》(见本卷第537—540页)之后,进一步阐述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及工人阶级的状况。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11月15日。通讯随大西洋号轮

船 11 月 16 日从利物浦出发, 11 月 29 日到达纽约, 发表在 1853 年 11 月 3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38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541。

298 救国委员会是雅各宾党专政时期(1793 年 6 月 2 日—1794 年 7 月 27 日)法国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547。

299 工人议会是 1854 年 3 月 6 日至 18 日在曼彻斯特召开的。由于 1853 年英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高涨, 以琼斯为首的宪章派(见注 80)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的主张, 把各个工联与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联合起来, 首先使全国各个不同地区的罢工协调起来。这一组织应该由定期召开的工人议会领导, 而工人议会由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大会和参加了“群众运动”的各工联大会选出的代表组成。工人议会于 1854 年 3 月 6 日至 18 日在曼彻斯特召开, 讨论并通过了“群众运动”纲领, 成立了由 5 个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被选为名誉代表的马克思寄去了一封信(见《给工人议会的信》), 他在信中指出, 建立独立的群众性政党是英国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马克思认为工人议会的召开具有重大意义, 这是使英国工人运动摆脱工联主义狭隘圈子的尝试, 是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的第一步。

可是, 组织“群众运动”的尝试没有成功, 因为工联的大多数领袖都对政治斗争抱否定态度, 不支持建立统一的工人群众性组织的主张。1854 年夏天罢工运动的低落对广大群众参加运动也起了不利的影 响。1854 年 3 月以后工人议会再没有召开会议。——549。

300 圣斯蒂芬教堂是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区的一座建筑, 从 1547 年起到 1834 年被焚毁为止, 英国下院的会议都在这里举行, 所以后来人们往往把英国议会称作圣斯蒂芬教堂。——549。

301 这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撰写的关于俄土战争进程的第三篇文章。马克思在接到恩格斯的 文章后, 补充了关于土耳其军队退却的最新消息。文章开头的两句话是编辑都加的。

恩格斯最迟应在 11 月 17 日完成这篇通讯, 以便马克思能在 11 月 18 日收到, 然后再寄出。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 11 月 18 日。通讯随欧罗巴号轮船 11 月 19 日从利物浦出发, 12 月 6 日到达纽约, 作为社论发表在 1853 年 12 月 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44 号, 没有署名。——550。

- 302 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这篇抨击文章写于1853年11月20日至28日之间,在阿·克路斯和约·魏德迈的协助下于1854年1月在纽约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署名卡尔·马克思。这篇文章是对刊载在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奥·维利希的《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一文的反击,同时也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工人运动中不坚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维利希力图使别人怀疑马克思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宗派活动所作的批判的公正性。马克思在驳斥这种诽谤时,谈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真正原因,揭露了这个集团的冒险主义、宗派主义的策略。在写这篇抨击文时,马克思从他和恩格斯于1852年5—6月合写的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77—407页)中借用了个别段落。马克思生前这本小册子没有再版过。——557。
- 303 指马克思写于1852年10月底—12月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71—545页)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痛斥了普鲁士政府和警察当局迫害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的卑鄙手段。这篇抨击文于1853年1月在瑞士巴塞尔以单行本形式刊印。在美国,这部著作最初于1853年3月5日至4月23日连载在波士顿的《新英格兰报》上,1853年4月底,该报出版社又出版了单行本。马克思在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中引用的《揭露》一文中的段落,全部以波士顿版的小册子为依据。——561。
- 304 在1854年纽约版《高尚意识的骑士》中,出版者在此处加了一个脚注:“勃鲁姆先生不是在澳大利亚,而是在费城,当美国工人同盟成立时,他是同盟理事会中维利希的代理人。”——563。
- 305 贝克尔在1851年1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维利希给我写了几封非常有趣的信,我没有回答;但是他情不自禁地向我陈述了自己的新的革命计划。他指定我去发动科隆卫戍部队起来革命!!!不久前我们曾对此捧腹大笑。他的这种蠢举还会使许许多多的人倒霉,因为只是这样一封信就足以保证成百个审判蛊惑者的法官能得到3年的薪俸。如果我在科隆发动了革命,他是不会拒绝担负下一步行动的领导者的责任的。真够朋友!”马克思曾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第69页的注文中引用了这封所谓的假信的内容。——563。

- 306 暗检室最早是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建立的一个机构,其职能是向政府提供私人的通信秘密。后来暗检室一词成了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邮政部门秘密机构的统称,这些机构秉承政府的旨意,专门从事违法的信件检查活动。——564。
- 307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的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

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564、673。

308 布·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和1842年不伦瑞克版第3卷。在宗教史的著述中,前三篇福音的编者被称为符类福音作者。鲍威尔在他的《符类福音作者》一书中指出了福音书上的说法和真实历史事件之间的明显矛盾。——567。

309 大磨坊街工人协会是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别称,该协会是1840年2月由正义者同盟成员卡·沙佩尔、约·莫尔等人成立的,其宗旨是在工人中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9世纪50年代协会设在伦敦索霍区的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

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和以维利希—沙佩尔为首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少数派的斗争中,协会大多数成员站在少数派一边,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以后,它成为国际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被英国政府查封为止。——567。

310 鼓动者协会和德国流亡者俱乐部都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的组织,这两个组织的会员都很少,其主要任务是募集资金,以便在德国“立刻”发动“革命”。维利希和他的拥护者们加入了流亡者俱乐部。这两个组织很快便解散了。关于它们的详细情况可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77—407页)。——567。

311 指所谓的德美革命公债,这是哥·金克尔和流亡者俱乐部的其他领导人于1851—1852年企图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和旅美德国人中间举借的公债,

其目的是为了再次在德国唤起革命。举借贷款的主意是朱·马志尼想出来的。金克尔、维利希和赖辛巴赫于1851年中在伦敦成立了“为即将到来的德国共和革命”筹措资金组织委员会，并试图拉拢有名望的民主主义者作“保证人”。1851年9月—1852年3月金克尔一直在美国动员美籍德国人和在美的德国流亡者认购公债。此后，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流亡组织也纷纷效仿。1852年9月，赖辛巴赫提出了第一个财务报告，同年10月，在伦敦组织委员会会议上就如何使用收到的100英镑公债发生争执，宣告了德美革命公债运动的失败。1853年初，维利希再次去美国筹集资金，但一无所获。这笔既不能用于广告，也不能用于旅行费支出的款项最后被存入了英国银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嘲笑了金克尔这种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唤起革命的尝试。——568。

312 圣杯，根据中世纪的传说，这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使用的杯子，用精美玉石雕成，具有神奇的力量。——568。

313 蛊惑者指19世纪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卡尔斯巴德联席会议通过了一项对付“蛊惑者的阴谋”的专门决议，这之后“蛊惑者”一词开始流行。

早在与拿破仑斗争时期就已产生的学生会的许多会员，在维也纳会议(1814—1815年)后反对德国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政治示威，在示威中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年大学生赞德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的代理人科策布成了镇压“蛊惑者”的借口。——570。

314 贝桑松人指的是1848年11月维利希在法国贝桑松组织的志愿部队。这支由德国流亡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志愿部队到1849年初为止，一直领取法国政府的津贴。这支部队后来编入维利希军团，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期间在维利希的指挥下参加了1849年5—6月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571。

315 斯巴达人指公元前480年希腊—波斯战争期间，由300名斯巴达人组成的队伍。这支队伍在国王莱奥尼达斯指挥下英勇保卫温泉关，抗击波斯的全部军队。在温泉关会战中，莱奥尼达斯及其队伍全部战死。——571。

- 316 流亡者委员会即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原名是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是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附属机构,1849年9月18日成立。马克思也是该委员会委员。1849年12月3日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领导人的建议,该委员会改组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流亡者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倒向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1850年9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们宣布退出这个组织,委员会遂被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控制。——572。
- 317 维利希委员会指1850年9月15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在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后,另外成立的一个委员会。由于它与19世纪40年代瑞士一些反动的天主教州的单独联盟极为相似,马克思和恩格斯便把这个组织戏称为宗得崩德(见注81)。——581。
- 318 指施泰翰工人协会,它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于1852年1月在伦敦成立的一个协会。该协会的主席是汉诺威的流亡者施泰翰。加入该协会的,除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威·沃尔弗、威·李卜克内西等人以外,基本上是那些脱离了受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影响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工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工人罗赫纳也曾积极参加了协会的筹建工作。希尔施曾是该协会的创建人之一,他的普鲁士警探身分暴露之后,从1852年2月初起便不再参加协会的活动。后来,该协会的许多成员,其中包括施泰翰本人在内又都接受了沙佩尔集团的影响,重新加入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582。
- 319 法兰克福议员指1848年5月18日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的议员。全德国民议会的目的是消除德国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状态并制定全德宪法。在法兰克福议会中,除了勃鲁姆、福格特等人组成的左翼外,还有卢格、施勒费尔、齐茨、特吕奇勒尔等人组成的极左翼,或称激进民主党。议会的多数派是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它又分裂成两派:中间派右翼和中间派左翼。中间派拥护君主立宪政体。但是由于自由派多数的胆怯和妥协,以及小资产阶级左翼的动摇,议会害怕接管国家的最高政权,并且在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主要问题上没有采取坚决的态度,所以议会不仅没有成为真正统一德国的机构,而且变成了没有实际权力、引导群众离开革命斗争的纯粹的争论俱乐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

了许多文章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583。

- 320** 柏林妥协派指 1848 年 5 月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上主张妥协的那些议员。这次国民议会是为了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而召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拥护这种妥协作法, 否认人民主权原则的议员叫作妥协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许多批评柏林妥协派的文章。——583。
- 321** 三月同盟是主要在德国南部和中部成立的各种民主同盟的统称, 它们加入了中央三月同盟。中央三月同盟是 1848 年 11 月底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议员为了集结激进小资产阶级和左翼自由资产阶级各派力量而建立的, 其宗旨是保卫德国 1848 年三月革命的成果。它们的领导者是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如福禄培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 他们用空话来代替革命行动, 不是号召人民起来斗争, 而是幻想走议会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48 年 12 月起就开始在《新莱茵报》上和许多著作中尖锐地抨击同盟的领袖们对反革命斗争的畏首畏尾和犹豫不决。——583。
- 322** 指普鲁士和奥地利于 1850 年秋为了争夺在德国的霸主地位而发生的冲突。冲突的起因是黑森的革命发动。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争夺干预黑森内政的权利而先后把自己的军队派往黑森。最后, 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压力下, 普鲁士被迫作出了让步。——585。
- 323** 指在监狱中的奥·布朗基寄给“平等者宴会”的祝酒词《人民要警惕》。“平等者宴会”是 1851 年 2 月 24 日为纪念 1848 年二月革命 3 周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会议。宴会的组织者是路·勃朗领导下的一部分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 布朗基流亡者协会的首领巴泰勒米、亚当以及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了解情况, 派自己的拥护者康·施拉姆和威·皮佩尔去参加宴会, 但是, 他们被逐出会堂, 并遭到维利希和沙佩尔拥护者的毒打。布朗基在祝酒词中把包括路·勃朗在内的 1848 年临时政府的成员看作威胁未来革命的暗礁, 所以宴会的组织者故意压下了这篇祝酒词, 没有在宴会上宣读, 但 1851 年 2 月 27 日巴黎出版的《祖国报》第 58 号及其他许多法国报纸都全文登载了这篇祝酒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译成了德文和英文, 并加了前言。(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奥·布朗基祝酒词的德文译文的前言》[附祝酒词全文])。祝酒词德译文发行量很大, 并在德国和英国广为流传。关于祝酒词被隐瞒的情况见 1851 年 3 月 17 日马

克思致恩格斯的信。——588。

- 324 这是马克思综合当前的时事新闻而写的一篇通讯。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11月29日。通讯随北极号轮船从利物浦出发,12月11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12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48号,署名卡尔·马克思。——592。

- 325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违背了他在普鲁士1848年三月革命时期对人民所许下的关于建立宪制的庄严诺言。——593。

- 326 指普鲁士官员受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委托同罗马教皇进行的谈判,其目的在于调解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教会之间的冲突。这一通常被称作“教会纠纷”或“科隆纠纷”的冲突是由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通婚所生子女的宗教信仰问题引起的。1837年11月科隆大主教因拒不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要求,违背普鲁士法律,许诺这类子女信奉天主教而以叛国罪被捕,冲突就此开始。此后,天主教教会与普鲁士新教国家之间的这场争执持续了数年之久。1842年5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统治时期,经过谈判,这一冲突以普鲁士政府向天主教教会投降而宣告结束。马克思在1842年7月9日致卢格的信中将这一结局称为“普鲁士在全世界面前亲吻教皇的鞋子”。——593。

- 327 在1848—1849年革命前,德国各宗教反对派——所谓“德国天主教”和新教的“自由公理会”——的代表们企图建立全德国的国教。1844年在德意志各邦建立的“德国天主教”否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位,反对天主教的许多教义和仪式,竭力使天主教适应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自由公理会”是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于1846年和1847年从官方新教会中分离出来的,它曾试图成立全德国的教会。“自由公理会”与“德国天主教”在1859年合并。这些宗教派别都反映了40年代的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的不满和它要求全国政治统一的愿望。——593、708。

- 328 恩格斯为写作关于俄土战争进程的最后一篇文章而作了一些笔记,很明显,他是想在报道俄土战争其他战场的情况时利用这些笔记。但文章发表时却没有收入这些笔记。

从笔记援引的报道可以推算出恩格斯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在1853年12月1日前后。笔记本中的摘录引自1853年11月29—30日的报

刊, 奥美尔帕沙的报告刊登在 12 月 1 日的《泰晤士报》上。

这篇文章第一次用原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2 卷第 539 页上, 署名弗·恩格斯。——601。

- 329 这是恩格斯应马克思 1853 年 11 月 23 日来信的请求撰写的关于多瑙河战争的一篇总结性文章。文章于 12 月 1 日完成后寄出, 这样马克思便可在 12 月 2 日收到, 并加上自己的文章一起寄给《论坛报》编辑部。马克思认为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出色, 他在 12 月 2 日写信给恩格斯说: “感谢你的一篇好文章。德纳先生在美国将博得元帅的称号。”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 1853 年 12 月 2 日。通讯随亚细亚号轮船 12 月 3 日从利物浦出发, 12 月 15 日到达纽约。编辑部在发表时把这篇通讯分成了两部分, 恩格斯写的这一部分被当作社论发表在 1853 年 12 月 1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52 号, 没有署名。——605。

- 330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主要报道了英国工人的罢工斗争, 对整个罢工形势作了总结, 是《曼托伊费尔 的演说。——普鲁士的宗教运动。——马志尼的宣言。——伦敦市政厅。——罗素的改革。——工人议会》一文(见本卷第 592—600 页)的续篇。

马克思的这篇通讯与恩格斯的《多瑙河战争》(见注 329)一文本是寄给《论坛报》的一篇通讯, 编辑部把它分成了两部分发表在同一天的报纸上, 恩格斯写的部分作为社论, 马克思写的部分作为通讯发表在 1853 年 12 月 1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52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613。

- 331 繁荣的鲁宾逊, 是弗·约·鲁宾逊, 葛德里奇子爵的绰号。1825 年经济危机前夕他以英国财政大臣的身分预言英国经济会长期繁荣下去。——616。

- 332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报道了当前的重要事件, 即四强国开始重新调停俄土冲突。他结合四国协定问题, 再次猛烈抨击了英国的外交政策。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 12 月 9 日。通讯随亚美利加号轮船 12 月 10 日从利物浦出发, 12 月 22 日到达哈利法克斯, 25 日到达纽约, 发表在 1853 年 12 月 2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60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618。

- 333 在马克思 1853 年的摘录笔记中, 有他从《地中海东部诸国家和岛屿问题信件汇编》中摘录的帕麦斯顿 1839 年 9 月 10 日写给布尔沃的信。——

621。

- 334 詹·格雷厄姆任大不列颠内务大臣时,为讨好奥地利政府,于1844年命令英国邮政主管部门让警察局暗中检查意大利革命流亡者的信件。

邦迪埃拉事件——是指以密谋组织的成员邦迪埃拉兄弟为首的意大利爱国者的一个小队于1844年6月在卡拉布里亚海岸登陆一事。邦迪埃拉兄弟是意大利籍奥地利海军军官,“青年意大利”的成员,他们的目的是要在意大利举行起义,反对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的统治。由于队伍中有人叛变,当局俘虏了远征队的参加者,邦迪埃拉兄弟和他们的7名同伴在1844年7月秘密审判后被枪杀。——626。

- 335 俄国舰队在黑海锡诺普附近击败了一支土耳其的分舰队,由此可能引起的政治及军事方面的后果成了各国舆论关注的焦点,也是马克思撰写这篇通讯的原因。与此同时,马克思继续抨击了英国的外交政策。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12月13日。通讯随太平洋号轮船12月14日从利物浦出发,12月26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12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61号,署名卡尔·马克思。——629。

- 336 锡诺普会战发生在1853年11月30日。土耳其舰队在把军队和装备运往高加索沿岸的途中,被帕·斯·纳希莫夫指挥的俄国黑海分舰队发现并受到攻击。参加会战的是俄国的6艘战列舰和2艘巡航舰,对有海岸炮垒炮火支援的土军16艘军舰(其中有2艘蒸汽舰)。可是,俄国舰队的火炮装备比土耳其优越。会战结果,土耳其舰队的15艘军舰被击毁,区舰队司令、海军元帅奥斯曼帕沙被俘。锡诺普的胜利大大加强了俄国在黑海的军事地位,同时也促使英法两国更快地参加反俄战争。——629、641。

- 337 尼古拉一世1853年6月26日就俄国政府决定把军队开进多瑙河两公国所发表的宣言以及沙皇俄国的一系列外交文件都宣称,占领两公国的目的,是建立“物质保证”来保障希腊正教教会在土耳其的权利和特权,并使苏丹履行其对俄国的义务。——631。

- 338 圣约翰伍德和切尔西是伦敦两个人口稠密的普通居民区;克莱尔蒙特宫是伦敦市郊的一个城堡,1848年2月流亡到英国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及其全家曾在此居住。——632。

- 339 指1850年5月1日根据法国内政大臣的命令成立的立法议会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的17名成员,他们属于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由于贪图权力和立场反动而被称之为卫戍官。这个绰号是从维·雨果根据中世纪德国生活而写的同名历史剧中借用的。在德国,卫戍官是皇帝指派的城堡和地区的统治者。——633。
- 340 马莱密谋指1812年10月马莱将军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未得逞的密谋。有右翼保皇党人和共和党人参加的这一密谋的策划者指望拿破仑的军队在俄国遭到失败,并企图利用他们所散布的拿破仑已在远征俄国时阵亡的谣言来达到自己的目的。——633。
- 341 哥萨克式的共和国是马克思套用的拿破仑的一个预言:“50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参看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23页)。——634、717。
- 342 帕麦斯顿辞职的消息传出后,英国报刊发表了大量评论,马克思以此为题材《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这篇通讯。编辑部在改动了本文的第一句话后作为社论发表。
-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12月16日。通讯随阿非利加号轮船12月17日从利物浦出发,12月30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3年12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65号,没有署名。——636。
- 343 1853年12月16日帕麦斯顿宣布退出阿伯丁联合内阁,但他的辞职申请没有被接受,反而很快地又回到了原来的职位,继续担任内务大臣。——636。
- 344 恩格斯在这篇通讯中根据英国报刊提供的资料详细报道了锡诺普会战和阿哈尔齐赫战斗的情况,同时再次抨击了英国和法国的外交政策。
-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中注明的日期是12月23日。通讯随加拿大号轮船12月24日从利物浦出发,1854年1月4日到达哈利法克斯,最迟于1月8日到达纽约。作为社论发表在1854年1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71号,没有署名。——641。
- 345 这篇文章是厄·琼斯根据马克思提供的资料写成的,文中的主要内容都与马克思进行过商讨,许多用语都与马克思1853年3月18日写给《纽约每

日论坛报》的通讯《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普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67—674页)相同。——651。

346 这是约·魏德迈根据恩格斯1853年4月12日来信的内容撰写的一篇通讯,文中甚至整段摘录了信中的内容。除此之外,魏德迈还间接引用了部分马克思对普奥税收及两万名无产者参加弗·万·拉斯拜尔夫人葬礼一事的评价。——652。

347 这是发表在《人民报》上的论述联合内阁预算问题的第二篇社论。第一篇社论是马克思应厄·琼斯的请求而写的,发表时署名:C. M.,本文及后来发表的第三篇社论均未署名。据推测,第二、第三篇社论很可能是威·皮佩尔受马克思的委托而写的。这篇社论与马克思4月19日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非格斯·奥康瑞尔。——内阁的失败。——预算》(见本卷第69—76页)谈的是同一个问题,文中不仅使用了相同的资料,而且对所得税、遗产税和取消、削减其他税收的看法也是一致的。——656。

348 这是发表在《人民报》上的论述联合内阁预算问题的第三篇社论,也是最后一篇。这篇社论同第二篇社论一样,很可能是威·皮佩尔受马克思的委托而写的,并利用了马克思为《论坛报》撰稿时所用的资料。文中与马克思4月22日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见本卷第77—86页)中的观点一致,尤其是在评论各种政治派别对改革提案所抱的态度方面。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中,误将这篇文章作为马克思的著作收入了正文部分。标题中的“肥皂”(Soap)和“贿赂”(Sop)两个词在英语中发音相似。——661。

349 根据英国议会通常的程序,在讨论弥补国家开支的许多重要问题时,下院即宣布作为筹款委员会开会。这是下院作为全院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的情况之一。——662。

350 卡弗尔战争是18—19世纪南非卡弗尔人和英国殖民主义者之间进行的战争。卡弗尔人是欧洲殖民主义者对操班图语的南非各部族(主要是科萨人)的称呼。英国从1811年起在开普地区多次挑起武装冲突。1846—1853年英国发动了第五次反对卡弗尔人的战争。在战争的头几年内,当

地居民曾多次打败过英国军队。1852年,英国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卡弗尔人战败后于1853年3月9日与英国签订了和约,将科萨各部落的一部分领土割让给英国殖民者。——662。

- 351 皮佩尔在这里把查·伍德(Charles Wood)谑称为桑·木头(Sancho Timber)。在英文中 Wood(伍德)一词意为木头,与 Timber(木材)意义相近。这样就查·伍德比作了西班牙古典小说《唐·吉珂德》中的主人公唐·吉珂德的侍从桑·潘萨,在小说中,一位公爵戏弄桑·潘萨时把他派到一个名叫“不让他留岛”的小城去当总督(《唐·吉珂德》下卷第42—53章)。

查·伍德是1846—1852年罗素内阁的财政大臣,在1852—1855年联合内阁里改任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联合内阁财政大臣格莱斯顿的前任是1852年德比内阁的迪斯累里,但德比内阁存在的时间很短,不足一年。——663。

- 352 这篇文章是约·魏德迈根据马克思1852年7月20日写给阿·克路斯的信写成的。克路斯在8月6日将马克思来信的内容作了摘录寄给了魏德迈。文中对法国流亡者的评价与马克思的观点一致。在谈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威·沙佩尔集团时,魏德迈大段摘引了马克思的有关著作和文章。——670。

- 353 法利赛人是公元前2世纪至2世纪犹太教内的一个派别,主要由文士和律法师组成,为哈西德派精神上的后继人。除遵守《律法书》外,也信奉口传律法,强调维护犹太教传统和犹太人生活规范,主张与异己者严格隔离。

关于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见《旧约·路加福音》第18章第9—13节。——670。

- 354 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671。

- 355 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1848年3月初,在法国二月革命(见注354)的影响下,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镇压,发生了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形势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威力,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报刊检查制度;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把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671。
- 356 山岳党指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1848—1851年,山岳党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属于山岳党。——671。
- 357 根据燕·马克思笔记本中的记录,马克思很可能直接参与了这篇文章的写作,为它提供了详细的资料、论证的观点等(见注148)。这篇文章的内容与马克思7月8日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莱亚德的提案。——围绕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斗争》(见本卷第205—213页)基本一致。两篇文章都谈到了科贝特的提议和《泰晤士报》的立场,不但对这两个问题的评价是一致的,而且所引《泰晤士报》上的文字也完全相同。——677。
- 358 1853年初英国的工厂工人再次掀起了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争取废除各种敌视工人的法律的广泛运动。首先开始的是反对“厂内店铺和实物工资制”的斗争,并为此成立了“争取货币工资”全国同盟;《人民报》自1853年2月19日起开辟了相关的专栏。——677。
- 359 轮班和替班制度是英国工厂主为了逃避法律对儿童和妇女工作日的限制而采取的一种混乱的换班制度。当时年满18岁的男工每天从早上5点半开始工作到晚上8点半,共15小时。为了能在此时间内为成年工提供足够的辅助劳力,厂主便给那些受法律保护的未成年工和妇女规定了不

同的上班时间。有一部分人的工作时间被分成了两段，还避开了法定的吃饭时间。由于这些人的上班时间不一样，使工厂视察员很难进行监督。——678。

- 360 这篇文章很可能是皮佩尔在马克思的建议和帮助下写成的。文章主要谴责了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德 1853 年 6 月 20 日的周知照会，文中摘录的照会中的有关段落及穿插其中的评论都与马克思在《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诡计和诡辩。——涅谢尔罗德最近的照会。——东印度问题》一文（见本卷第 214—224 页）中的评论一致，特别是两篇文章中对英国和法国优柔寡断的态度及他们在俄国外交手腕面前懦弱退却的批评更是彼此一致。——682。
- 361 缅施科夫公爵作为俄国特使于 1853 年 2 月 28 日抵达君士坦丁堡，3 月 16 日向土耳其政府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库楚克-凯纳吉条约（见注 89）要求建立沙皇对希腊正教教会的保护权。5 月 6 日又向土耳其政府递交了一份包含同样要求的俄土协定草案（见注 119）。土耳其政府不顾俄国方面的多次最后通牒而拒绝了这一非分的要求。缅施科夫随即于 1853 年 5 月 21 日离开了君士坦丁堡。沙皇政府以后便以缅施科夫外交使团的要求被拒绝为借口，一再以采取军事行动对土耳其进行威胁。——684。
- 362 埃卡留斯这一组关于法国农民的文章，是在马克思的鼓励和帮助下写成的。厄·琼斯曾在 1851 年 6 月 7 日《寄语人民》第 6 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的国家，它的地主和农奴》，他在文章里把小农场制度看作消除农村贫困和抵制加重剥削工人的抗衡力量。根据威·皮佩尔 1851 年 6 月 21 日写给恩格斯的信，我们得知马克思曾就这篇文章与琼斯进行过一次交谈，并希望他继续写文章谈谈土地国有化等问题。因琼斯忙于宪章派的各种活动，未能继续与马克思讨论并发表有关文章。但宪章运动等群众运动的高潮使农民问题等策略原则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所以马克思鼓励埃卡留斯来写这篇文章。埃卡留斯写文章时遵循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观点，同时还利用了马克思在 1850—1853 年间所收集的《经济学家》上的大量资料。这里发表的只有这组文章的前三篇，后续的文章至今尚未发现。——687。
- 363 马克思从 1850 年起就特别关注美国庸俗经济学家亨·查·凯里的理论。

凯里把自己的著作《国内外的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存在的原因及其消除的办法》（1853年费城版）寄给了马克思，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的文章《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07—615页）中的一些段落。凯里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祸患都产生于大工业的集中化，而这种集中化又要归咎于英国。《纽约每日论坛报》竭力吹嘘凯里的这本书，因为它对美国主张实行保护关税的资产阶级有利。所以《论坛报》一直阻止马克思在该报批驳凯里的庸俗经济学说。这期间马克思在与阿·克路斯和约·魏德迈的通信中，经常谈论经济问题和各种经济学说。克路斯对马克思不能在《论坛报》上批判凯里而遗憾，决定利用马克思的经济学笔记为《改革报》写一篇文章。克路斯针对《新英格兰报》散布的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而写的这篇文章沿用了马克思的观点，并利用了马克思在来信中寄给他的一些笔记。马克思在1853年10月12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在反对《新英格兰报》的文章中，从我论及凯里等的信中非常成功地采纳了有关的部分。”——707。

- 364 欧洲中央委员会即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它是根据朱·马志尼的倡议于1850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一个国际性的组织。马志尼的倡议曾得到司徒卢威和卢格的全力支持。卢格经司徒卢威的推荐，作为德国民主派的代表加入了委员会。加入委员会的还有赖德律-洛兰、阿·达拉什和科苏特。这个无论成份和思想都极其复杂的组织存在的时间不长。由于意大利和法国民主派流亡者之间的关系恶化，该委员会于1852年3月实际上已经瓦解。马克思在《时评（1850年5—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64—370页）中批判了该委员会1850年7月3日的成立宣言。——717。
- 365 克路斯的这篇文章是根据马克思1852年5月10日左右写给他的一封信写成的。当时有流言说匈牙利流亡者贝·瑟美列和拥有百万财富的奥地利国王的全权代表有联系，他的反对者科苏特更是添枝加叶，说他是奥地利警察局的特务等等。克路斯1852年4月24日就此写信请教马克思，马克思在5月10日的回信中谈了自己对瑟美列的了解和判断。克路斯根据这封信写出了这篇为瑟美列辩护的文章。——721。
- 366 埃卡留斯的这篇文章是在马克思的鼓励下写出的。马克思在1853年11

月中给克路斯的信中写道：“如果付钱，我主张先让埃卡留斯得一点，否则他只能整天干裁缝活。根据我们商定的结果，他现在将定期寄通讯去”。在帮助埃卡留斯写通讯时，马克思不仅为他提供资料，而且还为他作文字润色加工。对此，克路斯在1853年12月7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写道：“从埃卡留斯定期通讯稿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写得很不错，就像是马克思本人写的一样”。——723。

- 367 克路斯的这篇文章是根据马克思1853年11月12日以后写给他的一封信写成的。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不过从阿·克路斯1853年12月7日写给魏德迈的信中，可以看出这封信不仅确实存在，而且也是他写这篇文章的基础。克路斯在信中告诉魏德迈说：“由于在我收到的一份报刊上，琼斯不恰当地把乌尔卡尔特称为俄罗斯的同盟者，马克思就附寄了一些有关乌尔卡尔特的笔记。他写道，他已用通信的方式清洗了琼斯的皮毛。我将写一篇短文来描述乌尔卡尔特。”——727。

- 368 琼斯在《人民报》上发表的这篇通讯主要评论了帕麦斯顿勋爵辞职一事。文章中的重要论点都与马克思《帕麦斯顿辞职》（见本卷第636—640页）中的评价完全一致。从1853年10月以来，马克思和琼斯又恢复了密切合作的关系。从马克思1853年10月5日写给克路斯的信来看，马克思当时曾经和琼斯谈论过帕麦斯顿。由此可以推论：事先不和马克思商讨，这篇文章是不可能写成的。——730。

人名索引

A

- 阿拔斯·米尔扎 (Abbas Mirza 1783—1833)——波斯王储,在对俄国的战争 (1807—1813 和 1826—1828) 中任波斯军队指挥官。——412、419。
- 阿伯丁伯爵, 乔治·汉密尔顿·戈登 (Aberdeen, George Hamilton Gordon, Earl of 1784—1860)——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曾任外交大臣 (1828—1830 和 1841—1846)、殖民和陆军大臣 (1834—1835) 和联合内阁首相 (1852—1855)。——4、14、25、38、40、54、102、128、131、154—158、183、192、195、207、214、219、226、262、267、290—293、302—303、307—309、313、347—348、358、362、370、377、409、410、469、492、630、636、667、682—685、719、723—726。
- 阿卜迪帕沙 (Abdi Pasha 生于 1801 年)——土耳其将军,1853 年任高加索土军司令,1854 年参与镇压希腊起义。——507、645、733。
- 阿卜杜尔·阿齐兹 (Abd-ul-Asis [Abdul-Aziz] 1830—1876)——土耳其苏丹 (1861 年起),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的兄弟。——237。
- 阿卜杜尔·卡迪尔 (Abd-ul-Kader 1807—1883)——阿尔及利亚艾米尔,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占领军的民族解放斗争 (1832—1847) 的领袖,1847 年被法军捕获,1852 年经法国政府允许流亡大马士革。——503。
-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 (Abd-ul-Medschid I [Abdul Medjed] 1823—1861)——土耳其苏丹 (1839—1861)。——5、7、22、25、106、111、112、149—150、158、178、181、216—218、235、237、240、259、260、263、268、281、282、291、296、302、306—309、312、319—320、322、339、357—363、368、370—371、375、376、394、479—481、489、490、535、613、614、619—624、629—630、685、733。
- 阿黛拉伊德, 欧仁妮·路易莎, 奥尔良公主 (Adelaide, Eugène-Louise, princesse d'Orléans 1777—1847)——奥尔良公主,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一世的妹妹。——228。

- 阿尔巴诺(Albano)——英国建筑师。——294。
- 阿尔比马尔伯爵, 乔治·托马斯·凯佩尔(Albemarle, George Thomas Keppel, Earl of 1799—1891)——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会议议员; 20年代初任英国驻印度殖民军指挥官。——243。
- 阿尔伯特, 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Albert, Prinz von Sachsen-Koburg-Gotha 1819—1861)——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292—293, 631, 637。
- 阿尔宁-亨利希斯多夫-韦尔贝洛伯爵, 亨利希·弗里德里希(Arnim-Heinrichsdorf-Werbelow, Heinrich Friedrich Graf von 1791—1859)——普鲁士外交家, 曾任勃兰登堡内阁外交大臣(1849)和驻维也纳大使(1845—1848, 1851—1858)。——259, 267, 302。
- 阿迦·穆罕默德(Aga Muhammad [Mahmed] 1742—1797)——波斯的沙赫(1794—1797), 卡查尔王朝的创立者。——122。
- 阿盖尔公爵, 乔治·道格拉斯·坎贝尔(Argyll, George Douglas Campbell, Duke of 1823—1900)——英国国务活动家, 皮尔分子, 后为自由党人; 曾任掌玺大臣(1853—1855, 1859—1866, 1880—1881)、邮政大臣(1855—1858和1860)、印度事务大臣(1868—1874)。——215。
- 阿礼国, 拉瑟福德(Alcock, Sir Rutherford 1809—1897)——英国外交官, 1844年起历任驻厦门、福州、上海、广州等埠领事, 1859—1865年为驻日公使, 1865—1871年为驻华公使。——117。
- 阿里·阿斯米帕沙(Ali Asmi Pasha)——土耳其驻阿勒颇军队指挥官(1853)。——322。
- 阿里夫·希克默德贝伊(Arif-Hikmet-Bei 生于1786年)——伊斯兰教的谢赫(1846—1854)。——503。
- 阿里欧斯托, 洛多维科(Ariosto, Ludovico 1474—1533)——意大利诗人, 长诗《疯狂的罗兰》的作者。——397, 456, 716。
- 阿里帕沙(Ali Pasha 1742—1822)——巴尔干半岛西南一个国家的创立者和执政者, 定都亚尼纳城(1788—1822); 在同土耳其苏丹的军队激战两年(1820—1822)以后投降, 最后被杀害。——39。
- 阿美士德伯爵, 威廉·皮特(Amherst, William Pitt, Earl of 1773—1857)——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驻华大使(1816—1817)、印度和孟加拉总督(1823—1828)。——225。
- 阿什博特伯爵(Asbóth, Graf)——匈牙利流亡者, 科苏特的拥护者。——14。

- 阿特伍德, 托马斯(Attwood, Thomas 1783 —1856)——英国银行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449、456、475 —476。
- 埃尔芬斯通, 蒙特斯图亚特(Elphinstone, Mountstuart 1779 —1859)——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1796年起在东印度公司供职, 1808年任驻喀布尔大使, 1819—1827年任孟买省督;《印度史》一书的作者。——222。
- 埃尔施, 约翰·赛米尔(Ersch, Johann Samuel 1766 —1828)——德国目录学家, 哈雷大学地理学和统计学教授。——72。
- 埃卡留斯, 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 —1889)——德国裁缝和新闻工作者;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工人政论家;侨居伦敦, 正义者同盟盟员,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 总委员会总书记(1867—1871年5月), 美国通讯书记(1870—1872), 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1872年以前支持马克思, 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 后为工联主义运动的活动家。——582、687 —706、723 —726。
- 埃卡留斯, 约翰·弗里德里希(埃卡留斯第二)(Eccarius, Johann Friedrich[Eccarius II])——德国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1851年起流亡伦敦;约·格·埃卡留斯的兄弟。——581。
- 埃利斯, 爱德华(Ellice, Edward 1781 —1863)——英国国务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委员。——59、67。
- 埃伦伯勒伯爵, 爱德华·罗(Ellenborough, Edward Law, Earl of 1790 —1871)——英国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曾任印度总督(1842—1844), 海军首席大臣(1846), 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8);爱·罗·埃伦伯勒男爵的儿子。——199、207、222、302。
- 埃姆利男爵——见蒙塞尔, 威廉, 埃姆利男爵。
- 埃皮门尼德斯(克里特岛的)(Epimenides aus Kreta 约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神学家, 克里特岛上的僧侣, 传说他酣睡了半个多世纪。——175。
- 埃斯科特, 比卡姆(Escott, Bickham)——英国政治活动家, 1847年是议会议员。——429。
- 埃斯特哈济公爵, 帕尔·安塔尔(Esterházy, Pál Antal Fürst 1786 —1866)——匈牙利大地主, 奥地利外交官, 曾任匈牙利革命政府外交部长(1848年3—9月)。——231。

- 爱德华四世(Edward IV 1442—1483)——英国国王(1461—1483)。——288。
- 艾哈迈德(Ahmed 死于 1855 年)——突尼斯的贝伊(1837—1855)。——480。
- 艾哈迈德帕沙(Ahmed Pasha)——土耳其将军, 1853—1854 年任高加索土军司令。——339。
- 艾曼努埃尔, 格奥尔吉·阿尔先耶维奇(Эммануэль, Георгий Арсеньевич 1775—1837)——俄国将军, 原籍匈牙利; 高加索驻军司令(1826—1831); 曾对厄尔布鲁士山进行考察(1829)。——459。
- 艾韦贝克, 奥古斯特·海尔曼(Ewerbeck, August Herman 1816—1860)——德国医生和政论家, 1841—1846 年在巴黎领导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 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人,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 年退出同盟;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是在巴黎建立的德国人协会书记和《新莱茵报》驻巴黎通讯员; 50 年代是语言教师和图书管理员。——327。
- 艾泽曼(Eisermann)——德国书商和出版商, 柯尔曼的经理。——50。
- 安·斯图亚特(Anna [Ann, Anne] Stuart 1665—1714)——英国女王(1702—1714)。——63。
- 安德顿, 威廉(Anderton, William)——英国约克郡的厂主。——486。
- 安德龙尼科夫公爵, 伊万·马尔哈佐维奇(Андроников, Иван Малхазович 1798—1868)——俄国将军, 格鲁吉亚人; 克里木战争期间任阿哈尔齐赫驻军指挥官。——645。
- 安德森(Anderson)——苏格兰银行行长。——346。
- 安东, 古斯塔夫(Antoine, Gustave)——19 世纪 50 年代初在伦敦的法国流亡者; 奥·布朗基的妹夫。——589。
- 安斯蒂, 托马斯·奇泽姆(Anstey, Thomas Chisholm 1816—1873)——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议会议员(1847—1852); 曾任香港首席检察官(1854—1859)。——419、443、444、446—450、452—457、466、470。
- 奥波尼伯爵, 安塔尔(Apponyi, Antal Graf 1782—1852)——奥地利外交官, 匈牙利人; 曾任驻巴黎大使(1826—1849)。——455。
- 奥勃莱恩, 威廉·史密斯(O'Brien, William Smith 1803—1864)——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青年爱尔兰”右翼领导人, 议会议员; 1844 年起为合并取消派成员, 1847 年起为爱尔兰独立同盟成员, 1848 年因筹划起义而被英国当局逮捕, 被判死刑, 后改终生流放, 1856 年遇赦。——348、427。
- 奥布廉诺维奇, 米哈伊尔(塞尔维亚的米哈伊尔)(Obrenović, Mihailo [Michael

- [from Serbia] 1823—1868)——塞尔维亚大公(1839—1842和1860—1868)。——260,309。
- 奥布廉诺维奇,米洛什(Obrenović, Miloš 1780—1860)——塞尔维亚大公(1817—1839和1858—1860)。——42。
- 奥尔良公爵夫人,埃莱娜·路易莎·伊丽莎白(Orléans, Hélène-Louise-Elisabeth, duchesse d'父姓梅克伦堡-什未林 Mecklenburg-Schwerin 1814—1858)——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长子斐迪南的遗孀,法国王位追求者巴黎伯爵的母亲。——292。
- 奥尔良公主——见阿黛拉伊德,欧仁妮·路易莎,奥尔良公主。
- 奥尔良王朝——法国王朝(1830—1848)。——292,638。
- 奥尔洛夫伯爵,阿列克谢·费多罗维奇(Орлов, 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граф 1786—1861)——俄国将军、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代表俄国同土耳其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1833),曾任出席巴黎会议(1856)的俄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参议院院长和内阁委员会主席(1856年起),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委员和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主席;反对废除农奴制。——433,456。
- 奥尔西尼,费利切(Orsini, Felice 1819—1858)——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的参加者;因谋刺拿破仑第三(1858)而被处死。——594。
- 奥当奈尔(O'Donnell)——英国将军。——340。
- 奥夫利, E. S. (Offley, E. S.)——美国外交官,曾任驻士麦那领事(1853)。——239。
- 奥康奈尔,丹尼尔(O'Connell, Daniel 1775—1847)——爱尔兰律师和政治家,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自由派右翼领袖。——70,471。
- 奥康瑞尔,菲格斯·爱德华(O'Connor, Feargus Edward 1794—1855)——英国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出版者;1848年后成为宪章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之一。——69—70,615—616。
- 奥朗则布(Aurangzeb [Aurang-Zebe] 1618—1707)——印度大莫卧儿王朝的缔造者(1658—1707)。——138。
- 奥丽珈·尼古拉耶夫娜(Олга Николаевна 1822—1892)——俄国女大公,尼古拉一世的女儿,后为符腾堡国王卡尔-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的王后。——293。

奥美尔帕沙——见拉塔什,米哈伊尔。

奥日埃, J. (Augier, J.)——法国新闻工作者。——110。

奥斯本, 托马斯, 丹比伯爵, 卡马森侯爵, 利兹公爵 (Osborne, Sir Thomas, Earl of Danby, Marquis of Carmarthen, Duke of Leeds 1631—1712)——英国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首相 (1674—1679 和 1690—1695); 1695 年被议会指控犯有贪污罪。——162, 457。

奥斯丁 (Austin)——1853 年是伯明翰监狱副狱长。——349。

奥斯曼帕沙 (Osman Pasha 约 1785—1860)——土耳其海军上将, 锡诺普会战中任土耳其分舰队指挥官。——644。

奥斯曼帕沙 (Osman Pasha)——1853 年为阿勒颇总督。——322。

奥斯滕-萨肯, 德米特里·叶罗费耶维奇 (Остен-Сакен, Дмитрий Ерофеевич 1789—1881)——俄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时期任南方军团司令 (1853—1854), 塞瓦斯托波尔城防司令 (1854 年底—1855 年初)。——552。

奥托一世 (Otto I 1815—1867)——巴伐利亚亲王, 希腊国王 (1832—1862)。——431—432。

奥泽罗夫,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Озе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1817—1900)——俄国外交官, 1852—1853 年任驻君士坦丁堡代办。——22。

B

巴巴罗萨 (红胡子)——见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 (红胡子)。

巴尔卡里斯——见克劳福德伯爵, 詹姆斯·林赛·巴尔卡里斯。

巴甫洛夫, 普罗科菲·雅柯夫列维奇 (Павлов, Прокофий Яковлевич 1796—1868)——俄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时期任多瑙河和克里木俄军指挥官 (1853—1854)。——535, 551。

巴哈杜尔沙赫二世 (Bahadur-Shah II 1767—1862)——印度大莫卧儿王朝最后一个钵帝沙赫 (1837—1858), 1849 年起靠英国人供养, 实际上被剥夺了政权; 印度民族解放起义 (1857) 时被起义者重新立为皇帝; 1857 年 9 月德里陷落后被英军逮捕并流放到缅甸 (1858)。——223。

巴赫男爵, 亚历山大 (Bach, Alexander Freiherr von 1813—1893)——奥地利国务活动家, 律师, 专制君主制的拥护者和教权主义者; 曾任司法大臣 (1848—1849) 和内务大臣 (1849 年 7 月—1859 年 8 月)。——722。

巴克豪斯, 约翰 (Backhouse, John 1772—1845)——英国官员, 曾任外交副大臣

- (1827—1842)。——453,464。
-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创始人和理论家;1840年起侨居国外,曾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1849年因参与领导德累斯顿起义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1851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囚禁期间向沙皇写了《忏悔书》;1861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伦敦;1868年参加第一国际活动后,在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妄图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由于进行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1872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327—329,333—335。
- 巴拉盖·狄利埃伯爵,阿希尔(Baraguay d' Hilliers, Achille, comte 1795—1878)——法国将军,1854年起为元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1851年统率巴黎卫戍部队;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3—1854),1854年指挥波罗的海的法国远征军;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1870年任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509,622。
- 巴塞勒米,艾曼纽埃尔(Barthélemy, Emmanuel 1820左右—1855)——法国工人,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成员和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5年因刑事罪被处死刑。——574,577,589。
-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代表人物。——711。
- 巴特,伊萨克(Butt, Isaac 1813—1879)——爱尔兰律师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52—1865);60年代是被囚禁的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的辩护人,1871年起为爱尔兰自治派的领导人。——70。
- 巴西利乌斯·海瓦利安(Basilus Haivalian)——亚美尼亚教会在阿勒颇的牧首。——322。
- 班迪亚,亚诺什(Bangya, János 1817—1868)——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和军官,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成为科苏特的密使,同时也是秘密警探;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贝伊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在切尔克斯人反俄战争时期作为土耳其间谍在高加索活动。——48—51。
- 邦迪埃拉,阿蒂利奥(Bandiera, Attilio 1810—1844)——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

- 动家,奥地利舰队的军官,“青年意大利”成员;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而被处死(1844)。——625。
- 邦迪埃拉,埃米利奥(Bandiera, Emilio 1819—1844)——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奥地利舰队的军官,“青年意大利”成员;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而被处死(1844),前者之弟。——625。
-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宗教和历史研究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34年在柏林大学、1839年在波恩大学任非公聘神学教师,1842年春因尖锐批判圣经而被剥夺教职;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人;早期为黑格尔正统派的拥护者,1839年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理论家,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1837—1842年初为马克思的朋友;1842年夏天起为“自由人”小组成员;1848—1849年革命后为《新普鲁士报》(《十字报》)的撰稿人;1866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50、567、709。
- 贝尔,乔治(Bell, George)——英国商人,英国派往高加索的间谍;后者的哥哥。——467、471—477。
- 贝尔,詹姆斯·斯塔尼斯拉斯(Bell, James Stanislas 死于1842年)——英国商人,英国派往高加索的间谍,前者的弟弟。——463、471、475。
- 贝尔坦,路易·玛丽·阿尔芒(Bertin, Louis-Marie-Armand 1801—1854)——法国新闻工作者,奥尔良党人,《辩论日报》的出版者(1841—1854)。——128。
- 贝克尔,海爾曼·亨利希(Becker, Hermann Heinrich “红色贝克尔” der “rote Becker” 1820—1885)——德国地方法院见习法官和政论家,科隆工人和业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8—1849);《西德意志报》的发行人(1849年5月—1850年7月);1850年底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5年徒刑;60年代是进步党人,后为民族自由党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2—1866),北德意志联邦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67—1874);1875年起为科隆市长。——563、566、584—588。
- 贝克尔,尼古劳斯(Becker, Nicolaus 1809—1845)——德国诗人,《德国的莱茵》一诗的作者。——78。
- 贝克莱,弗兰西斯·亨利·菲茨哈丁(Berkeley, Francis Henry Fitzhardinge 1794—1870)——英国政治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48。
- 贝朗瑞,皮埃尔·让·德(Béranger, Pierre-Jean de 1780—1857)——法国诗人,以

写政治讽刺诗而著称,他在诗歌中抨击封建反动势力、教权主义和现存社会制度。——6。

贝林,亚历山大(Baring, Alexander 1774—1848)——英国国务活动家和银行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商业大臣(1834—1835)。——346。

贝伦兹,尤利乌斯(Berends, Julius 生于1817年)——柏林一印刷厂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40年代中起是柏林手工业者联合会领导人;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是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1853年流亡美国。——34、36。

贝姆,约瑟夫(Bem, Józef 1794—1850)——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830—1831年起义的领导人;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1849年是匈牙利革命军领导人;革命失败后避难土耳其,入伊斯兰教,被苏丹封为穆拉德帕沙,任土耳其军队指挥官。——295。

贝内文特亲王——见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德,贝内文特亲王。

贝特曼-霍尔韦格,莫里茨·奥古斯特(Bethmann-Hollweg, Moritz August 1795—1852)——普鲁士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保守党领袖,普鲁士第一议院议员(1849—1852),后为第二议院议员(1852—1855);曾任宗教、教育和卫生大臣(1858—1862)。——35、44。

本诺克,弗兰西斯(Bennoch, Francis)——英国商人,1853年是伦敦市政厅委员。——596。

本生男爵,克里斯蒂安·卡尔·约西亚斯(Bunsen Christian Karl Josias Freiherr von 1791—1860)——普鲁士外交官、政论家和神学家,曾任驻梵蒂冈代表(1824—1839)和驻伦敦公使(1842—1854)。——598。

比顿,约翰·埃利奥特·德林克沃特(Bethune, John Elliot Drinkwater 1801—1851)——英国官员,法学家,印度总督参事室参事(1848—1851)。——134。

比彻-斯托,哈丽雅特·伊丽莎白(Beecher-Stowe, Harriet Elisabeth 1811—1896)——美国女作家,美国废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193、667。

比诺,让·马蒂亚尔(Bineau, Jean-Martial 1805—1855)——法国工程师和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公共工程部长(1849—1851)和财政大臣(1852—1855)。——366。

彼得大帝——见彼得一世。

彼得一世,彼得大帝(Пётр I, Пётр Великий 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

- 沙皇,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30、123、261、457、718。
- 庇护九世(Pius IX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131、348。
- 毕尔格尔斯,约翰·亨利希(Bürgers, Johann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政论家,《莱茵报》撰稿人(1842—1843),1846年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1851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6年徒刑;后为民族自由党人;60年代为民族联盟盟员和杜塞尔多夫《莱茵报》的编辑。——579。
- 波措-迪-博尔哥伯爵,卡尔·奥西波维奇(沙尔·安德烈)(Поццо-ди-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Charles André], граф 1764—1842)——俄国外交官,科西嘉人;曾任驻巴黎公使(1814—1821)和大使(1821—1835),驻伦敦大使(1835—1839)。——179—183、227、258、262、410。
- 波将金公爵,格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Потемкин,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нязь 1739—1791)——俄国国务活动家,1784年起为元帅,俄土战争时期任总司令(1787—1791);曾领导俄罗斯南方边区的垦殖;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474。
- 波莱克斯芬,约翰(Pollexfen, John 约生于1638年)——英国商人、著作家和经济学家,主张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167。
-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 波拿巴王朝——法国皇朝(1804—1814、1815和1852—1870)。——634。
-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1589—1792、1814—1815和1815—1830)。——408、633、698。
- 波特兰公爵,威廉·亨利·本廷克(Portland, William Henry Bentinck, Duke of 1738—1809)——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794—1801),首相(1783和1807—1809)。——400。
- 波兹——见狄更斯,查理。
- 勃朗,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后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588—589、672、675。

- 勃鲁姆, 约翰奈斯(Blum, Johannes 假名莫里逊 Morrison)——俄国鞋匠, 40年代流亡伦敦, 正义者同盟盟员, 民主派兄弟协会领导成员, 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和科隆安全委员会委员(1848—1849); 革命失败后流亡巴黎, 1850年中移居日内瓦, 共产主义者同盟日内瓦支部成员;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562。
- 伯克, 埃德蒙(Burke, Edmund 1729—1797)——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 重农主义者; 初期倾向自由主义, 后为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对者; 写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203。
- 伯里特, 伊莱休(Burritt, Elihu 1810—1879)——美国语言学家, 博爱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 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的组织者。——682。
- 伯里克利(Perikles [Pericles] 公元前495左右—429)——雅典国务活动家, 战略家(公元前444—429); 曾促进奴隶主民主制的巩固。——431。
- 博德金, 威廉·亨利(Bodkin, William Henry 1791—1874)——英国法学家,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1841—1847); 1853年任检察长。——96。
- 博蒙特男爵, 迈尔斯·托马斯·斯泰普尔顿(Beaumont, Miles Thomas Steypltone, Baron 1805—1854)——英国地主, 自由党人, 上院议员。——237、302。
- 博尼法斯, 路易(Boniface, Louis 生于1796年)——法国新闻工作者, 波拿巴主义者。——112、339、479、480。
- 博雅多, 马泰奥·马利亚(Bojardo [Boiardo], Matteo Maria 1441左右—1494)——意大利诗人, 《恋爱中的罗兰》一诗的作者。——568。
- 博伊林, 詹姆斯(Boylin, James)——英国伦敦郊区火箭工厂厂主威·黑尔的雇员。——96。
- 布奥尔-绍恩施坦, 卡尔·斐迪南·冯(Buol-Schauenstein, Karl Ferdinand von 1797—1860)——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驻彼得堡公使(1848—1850)、驻伦敦公使(1851—1852)、首相兼外交大臣(1852—1859)。——215、259、267、296、306、337、370、630。
- 布德贝格男爵,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Будберг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барон 1798—1876)——俄国将军, 1853—1854年为驻多瑙河两公国的特派专员。——631。
- 布尔昂的哥特弗里德——见哥特弗里德(布尔昂的)。
- 布尔克奈伯爵, 弗朗索瓦·阿道夫(Bourqueney, François-Adolphe, comte de 1799—1869)——法国外交官, 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41—1844)和大使

- (1844—1848)、驻维也纳公使(1853—1856)和大使(1856—1859);法国出席巴黎会议(1856)的代表。——259、267、302、337。
- 布尔沃,威廉·亨利·利顿·厄尔(Bulwer, William Henry Lytton Earle 1801—1872)——英国外交家,议会议员(1830—1837),辉格党人;1839年和1840年任英国驻巴黎代办,后任驻马德里公使(1843—1848)、驻华盛顿大使(1849—1852)、驻佛罗伦萨大使(1852—1855)、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8—1865)。——434、455、621。
- 布赫尔,阿道夫·洛塔尔(Bucher, Adolph Lothar 1817—1892)——普鲁士司法推事和政论家;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柏林《国民报》通讯员;后为民族自由党人,俾斯麦的拥护者;50年代赞同戴·乌尔卡尔特的外交观点。——568。
- 布莱克特,约翰·芬威克·伯戈因(Blackett, John Fenwick Burgoyne 1821—1856)——英国议会议员。——137、314、317。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政治家、棉纺厂主,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60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70、135、148、192—194、201、214、220、227、492、524、682。
- 布朗,约翰·波特(Brown, John Porter 1814—1872)——美国外交官,东方学家,1853年为驻君士坦丁堡代办。——238。
-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密谋性组织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五月十二日起义的组织者,同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巴黎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领导人,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一生中有36年在狱中度过。——588—590、672—673。
- 布里格斯,约翰(Briggs, John 1785—1875)——英国将军,1801—1835年在东印度公司供职,1853年是东印度公司监视会成员。——222。
- 布林德,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为临时政府成员;与马克思同去伦敦,在那里成为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成员;1849—

- 1850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撰稿人；50年代中起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60年代起是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期间和战后为极端沙文主义者。——716—717。
- 布卢姆菲尔德男爵，本杰明(Bloomfield, Benjamin, Baron 1768—1846)——英国外交官，曾任驻瑞典和挪威大使(1823—1832)。——419。
- 布鲁图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 公元前85—42)——罗马国务活动家，贵族共和派密谋反对凯撒的策划者之一。——36。
- 布鲁克男爵，卡尔·路德维希(Bruck, Karl Ludwig Freiherr von 1798—1860)——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工商和公共工程大臣(1848—1851)、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3—1855)、财政大臣(1855—1860)；1860年4月自杀。——216、320、479、490、685、732。
- 布鲁姆，亨利·彼得，布鲁姆·沃克斯勋爵(Brougham, Henry Peter, Lord Brougham and Vaux 1778—1868)——英国国务活动家、法学家和文学家；辉格党人，20—30年代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曾任大法官(1830—1834)，曾促进1832年选举改革的实施；议会议员。——206。
- 布伦，卡尔·冯(Bruhn, Karl von 生于1803年)——德国新闻工作者，流亡者同盟和正义者同盟盟员，1848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起义和巴登起义的参加者，1850年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后，追随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后为拉萨尔的拥护者；60年代在汉堡出版拉萨尔派的机关报《北极星》。——565。
- 布伦德尔·德·瓦勒施泰恩(Brendl de Wallestern)——法国塔尔努夫省省长。——426。
- 布伦诺夫伯爵，菲利浦·伊万诺维奇(Бруннов, 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граф 1797—1875)——俄国外交官，曾任驻伦敦公使(1840—1854和1858—1860)和大使(1860—1874)；出席1856年巴黎会议的俄国代表团团员。——24、149—150、155、192、231—233、293、297、305。
- 布罗顿——见霍布豪斯，约翰·卡姆，布罗顿男爵。
- 布洛克，彼得·费多罗维奇(Брок, Петр Федорович 1805—1875)——俄国国务活动家，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275。
- 布吕格曼，卡尔·亨利希(Brüggemann, Karl Heinrich 1810—1887)——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政论家，自由主义者；1830年起为德国大学生联合会领导人之一，1832年参加汉巴赫大典，1832—1840年被监禁，1842—1843年为《莱茵报》

- 撰稿人,1845—1855年为《科隆日报》主编;1848—1849年革命时期持保守派立场。——719。
- 布什比公司(Bushby & Co.)——利物浦的一家茶叶贸易公司。——513。
- 布斯特拉巴——见拿破仑第三。

C

- 查尔托雷斯基公爵,亚当·耶日(Czartoryski, Adam Jerzy, Fürst 1770—1861)——波兰大地主,19世纪初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密友,曾任俄国外交大臣(1804—1806);1830—1831年波兰起义时为临时政府首脑,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在那里领导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323、452。
- 查理大帝——见查理一世,查理大帝。
- 查理·阿尔伯特(Charles Albert 1798—1849)——撒丁和皮埃蒙特国王(1831—1849)。——595。
- 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国王(1625—1649),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161。
- 查理一世,查理大帝(Charles I, Charlemagne 742—814)——法兰克国王(768—800)和皇帝(800—814)。——262。
- 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英国国王(1660—1685)。——314。
-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被1830年的七月革命赶下王位。——181、262。
- 查普曼,约翰(Chapman, John 1801—1854)——英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赞同在印度实行改革。——249。
- 柴尔德,乔赛亚(Child, Josiah 1630—1699)——英国商人、经济学家和银行家;重商主义者;东印度公司董事长。——166。
- 柴尔兹,托马斯(Childs, Thomas)——英国商船雌狐号船长。——467。

D

- 达尔豪西侯爵和伯爵,詹姆斯·安德鲁·布龙-拉姆齐(Dalhousie, James Andrew Broun-Ramsey, Marquess and Earl of 1812—1860)——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分子,议会议员,曾任印度总督(1848—1856),执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132、223、325。
- 达拉什,阿尔伯特(Darasz, Albert 1808—1852)——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

- 人,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波兰流亡者民主组织的领导成员,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委员。——717。
-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德,贝内文特亲王(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Maurice de, Prince de Bénévent 1754—1838)——法国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797—1799、1799—1807和1814—1815),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代表,驻伦敦大使(1830—1834)。——419、471。
- 达赖喇嘛——682。
- 达勒姆伯爵,约翰·乔治·拉姆顿(Durham, John George Lambton, Earl of 1792—1840)——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辉格党人;曾任驻彼得堡特命全权大使(1832),驻维也纳、柏林和彼得堡大使(1835—1837)。——455、461、474。
- 大莫卧儿王朝——见莫卧儿王朝。
- 丹东,若尔日·雅克(Danton, Georges-Jacques 1759—1794)——法国政治家和法学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335。
- 丹尼洛一世,彼得罗维奇·涅哥什(Danilo I, Petrovic Njegoš 1826—1860)——黑山大公(1852—1860)。——522。
- 丹年贝尔格,彼得·安德列耶维奇(Данненберг, Петр Андреевич 1792—1872)——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时期在多瑙河和克里木任第四军团司令。——535、551。
- 道光(1781—1850)——中国清朝皇帝(1821—1850)。——114。
- 德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比克斯塔夫的)斯坦利勋爵(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Lord Stanley of Bickerstaffe, Earl of 1799—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殖民大臣和陆军大臣(1833—1834和1841—1845),内阁首相(1852、1858—1859和1866—1868)。——3、207、289、290、323、439、477。
- 德克尔,卡尔·冯(Decker, Carl von 1784—1844)——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561。
- 德拉奥德,律西安(De la Hodde, Lucien 1808—1865)——法国政论家,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一些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警探。——48。
- 德拉库尔,埃德蒙(Delacour [De la Cour], Edmond 1805—1873)——法国外交官,曾任驻维也纳代办(1847—1851)和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3)。——25、110、111、216、298。

德拉修斯,阿伦·路易·弗雷德里克(Delasusse [de la Susse], Aron-Louis-Frédéric 1788—1860)——法国海军上将。——110。

德朗克,恩斯特(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国政论家和作家,曾一度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1848年初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7月是同盟中央委员会派往瑞士的特使;1852年4月底流亡英国;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时期(1852)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警察当局的丑恶行径;国际会员;70年代脱离政治活动而经商。——49、50、564。

德勒克吕兹,路易·沙尔(Delescluze, Louis-Charles 1809—1871)——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革命家,1830和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848年是北部省政府委员,曾被缺席判处流放,后逃往英国,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回到法国;1854年因密谋反对第二帝国而被捕;1868年是《觉醒报》创办人和出版者;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参加者,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公共工程委员会委员、福利委员会委员(5月)和军事代表,1871年5月25日在巴黎巷战中阵亡。——501。

德利乌斯(Delius)——普鲁士官员,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52—1853);卡·德利乌斯的兄弟。——36。

德利乌斯,卡尔(Delius, Karl)——普鲁士商人。——36。

德鲁安·德路易斯,爱德华(Drouyn de Lhuys, Edouard 1805—1881)——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40年代是温和的奥尔良保皇派,1851年后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外交部长和外交大臣(1848—1849、1852—1855和1862—1866)和驻伦敦大使(1855);1855年是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227、235—237、297、306、347、370。

德律埃,昂利(Druey, Henri 1799—1855)——瑞士国务活动家,激进主义者,联邦委员会委员(1848—1854),司法和警务部长(1848年起),1850年为瑞士联邦主席。——93。

德米特里,安塔基(Demetrius, Antachi)——阿勒颇的希腊正教教派牧首(1853—1854)。——322。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 约公元前460—370)——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的主要代表,留基伯的学生。——717。

- 德穆兰, 吕西·西姆普利斯·卡米耶·贝努瓦(Desmoulins, Lucie-Simplice-Camille-Benoist 1760—1794)——法国法学家和新闻工作者,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右翼雅各宾党人。——335。
- 邓达斯, 詹姆斯·惠特利·迪恩斯(Dundas, James Whitley Deans 1785—1862)——英国海军上将, 克里木战争期间任英军地中海舰队司令官(1852—1855年1月)。——5、121、128、734。
- 狄茨, 奥斯瓦尔德(Dietz [Diez], Oswald 1824左右—1864)——德国建筑师,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0年流亡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后来是该集团中央委员会委员; 1852年赴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581。
- 狄更斯, 查理(Dickens, Charles 笔名波兹 Boz 1812—1870)——英国现实主义作家。——666。
- 狄金逊(Dickinson)——英国布莱克本一家铸造厂厂主。——383。
- 狄金逊, 约翰(Dickinson, John 1815—1876)——英国政论家, 自由贸易论者; 东印度改革促进协会创始人之一; 写有关于印度的著作。——103、170、198—203、247。
- 狄摩西尼(Demosthenes 公元前384—322)——古希腊政治家和演说家, 雅典的反马其顿派的领袖, 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 雅典同盟反马其顿战争失败后(公元前338年)被驱逐出雅典。——25。
- 迪斯累里, 本杰明, 比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 托利党领袖, 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 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 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3、56、59、60、67、70—72、80—82、84—85、149、195、206、226、274、291、304、340、656、661、669。
- 迪希——见迪斯累里, 本杰明, 比肯斯菲尔德伯爵。
- 多尔戈鲁科夫公爵, 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Долгоруков, Васил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князь 1803—1868)——俄国国务活动家; 曾任陆军大臣(1853—1856), 宪兵头目和第三厅厅长(1856—1866)。——275。
- 多恩布什(Dornbush)——英国粮商。——482。
- 杜普拉, 古斯塔夫斯·查理(Duplat [Du Plat], Gustavus Charles)——英国军官和外交官, 曾任驻华沙领事(1841—1854)。——425。

E

厄斯特德, 安德斯·桑德(Oerstedt, Anders Sandoe 1778 — 1860)——丹麦国务活动家和法学家, 1853 — 1854 年任首相兼内务大臣。——521。

恩格尔哈特, 安东(Энгельгардт, Антон 1796 — 1872)——俄国将军, 曾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1853)。——551。

恩格尔, 约翰·雅科布(Engel, Johann Jakob 1741 — 1802)——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老师。——653。

F

法耳梅赖耶尔, 雅科布·菲力浦(Fallmerayer, Jakob Philipp 1790 — 1861)——德国历史学家、旅行家、东方学家; 1848 年起为慕尼黑大学历史学教授; 写有关于希腊历史方面的著作。——261。

菲茨罗伊, 亨利(Fitzroy, Henry 1807 — 1859)——英国国务活动家, 皮尔分子, 议会议员; 曾任海军大臣(1845), 内务副大臣(1852 — 1855)。——254。

菲茨威廉伯爵, 查理·威廉(Fitzwilliam, Charles William, Earl of 1786 — 1857)——英国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207、340。

菲克勒尔, 约瑟夫(Fickler, Joseph 1808 — 1865)——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 1849 年巴登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 1849 年为巴登临时政府成员;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以后流亡英国和美国。——567。

菲利莫尔, 约翰·乔治(Phillimore, John George 1808 — 1865)——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皮尔分子, 议会议员(1852 — 1857)。——148。

菲施巴赫(Фишбах)——俄国将军, 1853 年是多瑙河俄军指挥官。——552。

斐迪南-奥古斯特-弗兰茨-安东, 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Ferdinand August Franz Anton, Prinz von Sachsen-Koburg-Gotha 1816 — 1885)——葡萄牙国王(1837 — 1853), 称斐迪南二世, 王国摄政(1853 — 1855); 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的丈夫。——430。

斐迪南多-阿尔伯托-亚马多(Ferdinando-Alberto-Amedeo 1822 — 1855)——热那亚公爵, 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的弟弟。——108。

斐迪南多二世, 斐迪南二世(Ferdinando II, Ferdinand II 绰号炮弹国王 King Bomba 1810 — 1859)——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1830 — 1859)。——278。

斐迪南七世——见斐南多七世。

斐南多七世(Fernando VII 1784—1833)——西班牙国王(1808和1814—1833)。——408。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708。

费特尔·冯·多根费尔德,安塔尔(Vetter von Doggenfeld, Antal 1803—1882)——匈牙利将军,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后流亡意大利和瑞士;1867年返回匈牙利。——14。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布(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708。

福布斯,查理(Forbes, Charles)——苏格兰大地主。——488。

福克斯,查理·詹姆斯(Fox, Charles James 1749—1806)——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外交大臣(1782、1783—1806)。——132、163。

弗莱彻,安(Fletcher Ann)——普雷斯顿的女工厂主。——549。

弗莱彻,玛格丽特(Fletcher, Margaret)——普雷斯顿的女工厂主,安·弗莱彻的妹妹。——548。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50年代脱离革命斗争,50—60年代为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职员。——670。

弗兰茨一世(Franz I 1768—1835)——奥地利皇帝(1804—1835),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92—1806),称弗兰茨二世。——191。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109、481、491。

弗兰西斯——见弗兰茨一世。

弗兰西斯——见弗朗索瓦一世。

弗兰西斯-约瑟夫——见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弗朗索瓦一世,弗兰西斯一世(François I [Francis I] 1494—1547)——法国国王(1515—1547)。——71。

弗雷德里克三世(Frederik III 1609—1670)——丹麦国王(1648—1670)。——271。

弗雷德里克七世(Frederik VII 1808—1863)——丹麦国王(1848—1863)。——258、271、276、521。

- 弗雷泽父子公司(Fraser, Son & Co.)——曼彻斯特的一家棉纺公司。——514。
- 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I 1826—1907)——1852年起是巴登的实际上的统治者,1856年起是巴登大公。——594。
- 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红胡子)(Friedrich I Barbarossa 1123左右—1190)——1152年起是德国国王,后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104、416。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 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35—36、109、235、363、592、654、685。
- 弗略里,查理(Fleury, Charles 原名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克劳泽 Carl Friedrich August Krause 生于1824年)——德国商人,在伦敦经商,普鲁士的间谍和警探。——48、95。
- 傅阿德埃芬蒂——见傅阿德帕沙(傅阿德埃芬蒂),穆罕默德。
- 傅阿德帕沙(傅阿德埃芬蒂),穆罕默德(Fuad Pasha [Fuad Effendi], Mehmed 约1815—1869)——土耳其国务活动家,1848年是驻多瑙河两公国的政府专员,曾任外交大臣(1852—1853)和总理大臣(1861—1866)。——5、23、105。
- 富拉顿,约翰(Fullarton, John 1780—1849)——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写有一些有关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作。——342。

G

- 盖昂,理查·德博弗尔(Guyon, Richard Debaufre 1803—1856)——英国军官,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任匈牙利革命军将军,革命失败后加入土耳其军队,被封为库尔西德帕沙,1853年任高加索土军指挥官。——535。
- 甘米奇,罗伯特·乔治(Gammage, Robert George 1815左右—1888)——英国政论家和宪章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鞍匠和鞋匠;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852—1853);《宪章运动史》一书的作者。——187。
- 哥尔查科夫公爵,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Горчаков 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князь 1793—1861)——俄国将军,曾任多瑙河俄军司令(1853—1854),南部军队总司令(1854年9月—1855年2月),后为克里木驻军总司令(1855年2—12月),波兰王国总督(1856—1861)。——191、238、268、274、359、374、389、490、509、522、530、535—536、550、554—555、631。
- 哥特弗里德(布尔昂的)(Godefroy de Bouillon 1060左右—1100)——下洛林公爵(1089—1100),第一次十字军远征(1096—1099)的首领;曾积极参与占领

- 耶路撒冷(1099)。——568。
-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143, 430, 709。
- 戈尔德海姆, 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奥古斯特(Goldheim, Friedrich Theodor August 约生于 1807 年)——普鲁士警官, 19 世纪 50 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察局密探。——95。
- 戈克, 阿曼德(Goegg, Amand 1820—1897)——德国海关官员、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 年是巴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1862 年返回德国; 日内瓦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创建人之一, 国际会员; 70 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672。
- 戈洛文, 伊万·加甫里洛维奇(Головин, Иван Гаврилович 1816—1886)——俄国自由派地主, 政论家, 侨居英国; 40—50 年代同赫尔岑和巴枯宁有联系。——327, 333—334。
- 格贝尔特, 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Gebert, August Friedrich)——德国木匠,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巴登起义和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 流亡瑞士, 1850 年迁往伦敦,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并为该集团的中央委员。——582。
- 格斯拉赫, 威廉(Gerlach, Wilhelm)——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 伦敦郊区威·黑尔火箭工厂的工人。——96—97。
- 格莱斯顿, 威廉·尤尔特(Gl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派, 19 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 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 和 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 1880—1885, 1886 和 1892—1894)。——56—68, 70—75, 78—84, 101—102, 125, 129—130, 132, 159—160, 192—194, 206, 253, 324, 352, 382, 492, 656—668。
- 格赖夫, 弗里德里希·威廉(Greif, Friedrich Wilhelm 约生于 1819 年)——普鲁士警官, 19 世纪 50 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察局密探。——48。
- 格兰维尔伯爵, 乔治·鲁森-高尔(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Earl 1815—1891)——英国国务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领袖; 曾任外交大臣(1851—1852, 1870—1874 和 1880—1885)、殖民大臣(1868—1870 和 1886)、枢密院院长(1852—1854, 1855—1858 和 1859—1865)。——215。
-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 贝尔纳·阿道夫(Granier de Cassagnac, Bernard-Adolphe 1806—1880)——法国新闻工作者, 1848 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 后

- 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员(1852—1870);曾为《立宪主义者报》撰稿,50年代为《国家报》主编。——25。
- 格雷伯爵,查理,豪伊克子爵(Grey, Charles, Viscount Howick, Earl of 1764—1845)——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之一,曾任海军首席大臣(1806),外交大臣(1806—1807),内阁首相(1830—1834)。——437、460。
- 格雷伯爵,亨利·乔治(Grey, Henry George, Earl of 1802—1894)——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陆军大臣(1835—1839)、陆军大臣兼殖民大臣(1846—1852);查·格雷的儿子。——207。
- 格雷,乔治(Grey, George 1799—1882)——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46—1852、1855—1858和1861—1866)和殖民大臣(1854—1855)。——208、679。
- 格雷厄姆,詹姆斯·罗伯特·乔治(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皮尔分子,议会议员,曾任海军首席大臣(1830—1834和1852—1855),内务大臣(1841—1846)。——299、625。
- 格里利,霍拉斯(Greeley, Horace 1811—1872)——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纽约每日论坛报》创办人之一和编辑。——194。
- 格里伦佐尼,乔万尼(Grillenzoni [Grillanzoni], Giovanni 1796—1868)——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拥护者。——348。
- 格伦特维,尼古拉·弗雷德里克·塞韦林(Grundtvig, Nicolai Frederik Severin 1783—1872)——丹麦神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下院议员。——100。
- 格罗夫纳,罗伯特勋爵,伊伯男爵(Grosvenor, Lord Robert, Baron Ebury 1801—1893)——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75。
- 格罗伯,约翰·哥特弗里德(Gruber, Johann Gottfried 1774—1851)——德国学者,文学史家。——72。
- 格罗特(Grote)——英国政治活动家,1836年是议会议员。——461。
- 格普,查理(Goepp, Charles)——美国政论家,原籍德国;50年代同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接近;1850年曾同泰佩舍合作著书,宣传在美国领导下建立“世界合众国”的思想。——710、715。
- 葛德里奇子爵——见鲁宾逊,弗雷德里克·约翰,葛德里奇子爵。
- 葛德文,威廉(Godwin, William 1756—1836)——英国将军,在第二次英缅战争

(1852)中任英军总司令。——225。

顾圣(顾盛),凯莱布(Cushing, Caleb 1800—1879)——美国法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710。

H

哈布斯堡王朝——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朝(1273—1806年,其间有间断)、西班牙王朝(1516—1700)、奥地利皇朝(1804年起)和奥匈帝国皇朝(1867—1918)。——20。

哈德威克伯爵,查理·菲利浦·约克(Hardwicke, Charles Philip York, Earl of 1799—1873)——英国海军上将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302。

哈克尔贝格-兰道男爵,奥托(Hackelberg-Landau, Otto Freiherr von 死于1853年)——奥地利海军军官。——238。

哈利迪,弗雷德里克·詹姆斯(Halliday, Sir Frederick James 1806—1901)——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孟加拉省督(1854—1859)。——195。

哈麦尔-普格施塔尔男爵,约瑟夫·冯(Hammer-Purgstall, Joseph Freiherr von 1774—1856)——奥地利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1796—1835年负责近东方面的外交事务;写有关于土耳其历史的著作。——27,261。

哈森克莱维尔,约翰·彼得(Hasenclever, Johann Peter 1810—1853)——德国画家。——264。

海因岑,卡尔(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莱比锡总汇报》记者,《莱茵报》撰稿人;1844年9月逃往布鲁塞尔,1845年春移居瑞士,1847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0年秋定居美国,后为《先驱者》报的主编(1854—1879)。——712,716。

海泽,亨利希(Heise, Heinrich 1820—1860)——德国律师和新闻工作者,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大胡蜂》报出版者和编辑(1848—1850),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流亡英国。——584。

汉普敦,约翰(Hampden, John 1594—1643)——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反对专制独裁,革命斗争的参加者,在国内战争中牺牲。——255。

汉普顿男爵——见帕金顿,约翰·萨默塞特,汉普顿男爵。

汉特,亨利(Hunt, Henry 1773—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

义者,议会议员。——416。

汉特,桑顿·利(Hunt, Thornton Leigh 1810—1873)——英国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40—50年代支持宪章运动中的右翼;《先驱》的创办人之一。——615、709。

豪伊克子爵——见格雷伯爵,查理,豪伊克子爵。

荷尔斯泰因·哥托尔普——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贵族世家。——277。

赫伯特,悉尼,利男爵(Herbert, Sidney, Baron of Lea 1810—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曾任海军部秘书长(1841—1845),军务大臣(1845—1846和1852—1855)和陆军大臣(1859—1861)。——70、215。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俄国哲学家、政治家和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74年流亡法国,1852年移居伦敦,“自由俄国印刷所”创办人,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327。

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 约公元前540—480)——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717。

赫里斯,约翰·查理(Herries, John Charles 1778—1855)——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1852年是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95、428。

贺拉斯(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65—8)——罗马诗人,同奥古斯都关系甚密。——87。

黑茨伯里,威廉·阿考特(Heytesbury, William A' Court, Lord of 1779—1860)——英国外交官,曾任驻俄国大使(1828—1832)。——460。

黑尔,罗伯特(Hale, Robert)——伦敦郊区一家火箭工厂的所有人之一。——95—98、107。

黑尔,威廉(Hale, William)——伦敦郊区一家火箭工厂的所有人;罗·黑尔的父亲。——95—98、107。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113、561、566、708。

黑森亲王夫人——见路易莎,黑森-卡塞尔亲王夫人。

亨策,尤利乌斯(Henze, Julius 1816左右—1873)——普鲁士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最迟从1851年5月起成为警探,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原告证人。——583—584。

- 亨利, 托马斯(Henry, Thomas 1807—1876)——英国伦敦治安法庭法官。——95、97。
- 亨利五世——见尚博尔伯爵, 昂利·沙尔·斐迪南·玛丽·迪约多内·达尔图瓦, 波尔多公爵(亨利五世)。
- 胡森, 爱德华(Hooson, Edward 1825—1869)——英国工人, 宪章运动的拥护者。——186、189。
- 怀斯, 约翰·艾什福德(Wise, John Ayshford)——英国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1853)。——294。
- 怀斯曼, 尼古拉斯·帕特里克·斯蒂芬(Wiseman, Nicolas Patrick Stephen 1802—1865)——英国天主教牧师, 1850年起为威斯敏斯特大主教和红衣主教。——348。
- 霍布豪斯, 约翰·卡姆, 布罗顿男爵(Hobhouse, John Cam, Baron Broughton 1786—1869)——英国国务活动家, 辉格党人, 1831年的工厂法的倡导者; 曾任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35—1841和1846—1852)。——151、202。
- 霍格, 詹姆斯·韦尔(Hogg, James Weir 1790—1876)——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议会议员; 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董事长(1846—1847和1852—1853); 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委员(1858—1872)。——135、137、253。
- 霍兰男爵, 亨利·理查·福克斯·瓦萨尔(Holland, Henry Richard Fox Vasall, Baron 1773—1840)——英国国务活动家, 辉格党人; 30年代曾多次入阁。——232、233。
- 霍普公司(Hope & Co.)——英国的一家贸易公司, 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设有分公司。——427—428。
- 霍斯福尔, 托马斯·贝里(Horsfall, Thomas Berry 生于1805年)——英国政治活动家, 煤矿主,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486。

J

- 基奥, 威廉·尼古拉斯(Keogh, William Nicholas 1817—1878)——爱尔兰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皮尔分子; 英国议会中爱尔兰议会党团的领袖之一; 屡任英国的爱尔兰管理机构中高级司法职务。——131。
- 基谢廖夫,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Киселев, 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1800—1869)——俄国外交官, 曾任驻巴黎大使(1851—1854)——125。
- 基佐, 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

- 1874)——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奥尔良党人; 1812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 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 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25、38、88、91、227、695。
- 吉比奇-扎巴尔干斯基伯爵, 伊万·伊万诺维奇(Дибич-Забалканский,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князь 1785—1831)——俄国元帅, 原籍德国; 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任总司令, 曾指挥俄国军队镇压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7、39、534。
- 吉布森-奥德公司(Gibson, Ord & Co.)——曼彻斯特的一家公司。——514。
- 吉布森, 托马斯·米尔纳(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的拥护者, 后为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商业大臣(1859—1865和1865—1866)。——70、75、80、192。
- 吉查(Géza [Gyözö] 949左右—997)——匈牙利执政者(972—997), 曾促进基督教在匈牙利的传播。——61。
- 吉卡公爵, 格雷戈尔·亚历山大(Ghika [Ghica], Grigore Alexandru Fürst 1807—1857)——摩尔多瓦国君(1849—1853和1854—1856)。——268、274、319、321、362、631。
- 吉洛, 雅克(Gillot, Jacques 1550—1619)——法国作家。——484。
- 季托夫, 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Титов, 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1805—1891)——俄国外交官, 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43—1853); 1855年为俄国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309。
- 济格尔, 弗兰茨(Sigel, Franz 1824—1902)——德国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为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和巴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1851年流亡英国; 1852年迁居美国, 作为将军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1866年为纽约新闻工作者; 阿·济格尔的哥哥。——564、571。
- 加腊沙宁, 伊里亚(Garasănin Ilija 1812—1874)——塞尔维亚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 原籍俄国, 自由主义者; 曾任内政大臣(1843—1852和1858—1859), 内阁总理和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61—1867); 50年代实行反俄政策, 后来又实行亲俄政策。——12、260、309。
- 杰马诺斯(Germanos)——君士坦丁堡希腊正教教派牧首(1852—1853)。——

179。

金克尔,哥特弗里德·约翰(Kinkel, Gottfried Johann 1815—1882)——德国诗人、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850年在卡·叔尔茨的帮助下越狱逃跑,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海尔曼》周报编辑(1859),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51、563、564、568、582—584。

金克尔,约翰娜(Kinkel, Jahanna 父姓莫克尔 Mockel 1810—1858)——德国女作家,哥·约·金克尔的妻子。——563、564。

久洛伊,费伦茨,毛罗什-纳梅特和纳达什卡伯爵(Gyulay [Giulay], Ferenc, Graf von Maros-Németh und Nádaska 1798—1868)——奥地利元帅,匈牙利人,镇压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曾任陆军大臣(1849—1850),1859年意大利战争初期指挥奥地利军队,在马真塔战败。——191。

居姆佩尔,约翰·亨利希(Gümpel, Johann Heinrich)——德国雪茄烟工人和木工,1845年起为汉堡工人联合会会员;1851年为逃避司法追究而流亡伦敦,同年12月初起同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有联系。——581。

K

卡波·迪斯特里亚伯爵,乔瓦尼·安东尼奥(Capo d'Istria, Giovanni Antonio Graf 1776—1831)——希腊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1809—1822年在俄国供职,任外交副大臣(1815—1822),曾参加维也纳会议(1815);后任希腊总统(1827—1831),奉行亲俄政策,后被外国间谍所谋杀。——413。

卡德威尔子爵,爱德华(Cardwell, Edward, Viscount 1813—1886)——英国政治活动家,最初归属托利党,继而成为皮尔派领袖之一,后为自由党人;曾任商业大臣(1852—1855),爱尔兰事务大臣(1859—1861),殖民大臣(1864—1866)和陆军大臣(1868—1874)。——215。

卡蒂诺·拉罗什(Catineau la Roche)——法国经济学家。——702。

卡尔·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Karl Friedrich Alexander 1823—1891)——符腾堡亲王,符腾堡国王,称卡尔一世,娶俄国女大公奥丽珈·尼古拉耶夫娜为王后。——293。

卡尔尼茨基伯爵,拉迪斯劳斯(Karnicky, Ladislaus Graf 1820—1883)——奥地利外交官,曾任驻伯尔尼代办(1853)。——107—108。

卡拉德,尼古拉(Carrard, Nicolas 死于1853年)——瑞士反政府的教权主义反

- 对派领袖,1850、1851和1853年弗赖堡起义的领导人。——98。
- 卡拉乔治·彼得罗维奇(Karadjordje Petrović 1768左右—1817)——塞尔维亚人民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斗争(1804—1813)的领导者,1808年起为塞尔维亚大公(执政者),1813年逃往国外,1817年秘密回国后被杀死。——42。
- 卡莱尔,托马斯(Garlyle, Thomas 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宣扬英雄崇拜,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托利党人;1848年后成为工人运动的敌人。——349。
- 卡马森侯爵——见奥斯本,托马斯,丹比伯爵,卡马森侯爵,利兹公爵。
- 卡诺,拉扎尔·伊波利特(Carnot, Lazare-Hippolyte 1801—1888)——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七月王朝时期为众议院议员(左派反对派);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教育部长(1848年2—7月),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秩序党的反对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成为共和党反对派领袖,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633。
- 卡斯尔雷子爵——见斯图亚特,亨利·罗伯特,卡斯尔雷子爵。
- 卡索拉,卡洛(Cassola, Carlo 1814—1894)——意大利革命家,同马志尼及《意大利与人民》报有联系;曾参与米兰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失败后流亡伦敦和巴黎。——348。
- 喀德邻二世——见叶卡捷琳娜二世。
- 开普勒,约翰奈斯(Kepler, Johannes 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在哥白尼学说的基础上,发现行星运动的规律。——113。
- 凯里,亨利·查理(Carey, Henry Charles 1793—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创始人。——710—713。
- 坎伯尔,乔治(Campbell, Sir George 1824—189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官,议会议员(1875—1892),自由党人,1843—1874年屡任英国驻印度的殖民官员;写有关于印度的著作。——199—203、220、223、242—243、249。
- 坎宁,乔治(Canning, George 1770—1827)——英国政治活动家,外交官,托利党领袖,议会议员;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委员;曾任外交大臣(1807—1809和1822—1827)和首相(1827)。——399、400、452。
-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708。
- 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влович 1779—1831)——俄国大公,1814

- 年起任波兰军队总司令和波兰总督。——123、452。
- 考莱伯爵,亨利·理查·查理·韦尔斯利(Cowley, Henry Richard Charles Wellesley, Earl 1804—1884)——英国外交官,曾任驻巴黎大使(1852—1867)。——4。
- 考威尔,乔治(Cowell, George)——英国工人,宪章运动活动家,1853—1854年普雷斯顿大罢工领导人之一;曾出席工人议会(1854)。——522、540。
- 柯波克,詹姆斯(Coppock, James 1798—1857)——英国法学家,议会选举事务代理人。——350。
- 柯尔培尔,让·巴蒂斯特(Colbert, Jean-Baptiste 1619—1683)——法国国务活动家,重商主义者,财政督察长(1661年起),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外政策;曾建立国家工场,促进内外贸易。——80。
- 柯尔曼,雅科布(Kollmann, Jacob)——德国书商和出版商。——50。
- 柯立尔,罗伯特·波雷特(Collier, Robert Porrett 1817—1886)——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54。
- 科堡王朝——见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
- 科贝特,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1802年起出版《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62—63、209、210。
- 科贝特,约翰·摩尔根(Cobbett, John Morgan 1800—1877)——英国政治活动家,律师,议会议员;威·科贝特的儿子。——209—211、257、679。
- 科布顿,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自由主义者,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议会议员;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如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71、148、194、195、266、315—317、323、492、524。
- 科德林顿,爱德华(Codrington, Edward 1770—1851)——英国海军上将,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参加者,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官(1826—1828);在纳瓦里诺会战中任俄、英、法联合舰队指挥官(1827)。——409、438。
- 科尔尼洛夫,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Корнилов,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06—1854)——俄国海军中将,黑海舰队参谋长(1849—1853),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阵亡。——5、644。
- 科拉(Кола, М.)——俄国外交官,驻加拉茨领事(1852—1854)。——126。
- 科里,阿默·劳里(Corry, Armar Lowry 1792—1855)——英国海军上将。——121。

- 科斯策尔斯基, 弗拉基斯拉夫 (Kościelski, Władysław 1818 — 1895) —— 波兰民主主义者, 波森 1848 年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后流亡柏林, 同《新莱茵报》编辑部有联系; 50 年代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 任将军。——328。
- 科斯塔, 马丁 (Kosztka, Mátin 死于 1858 年) —— 匈牙利革命家, 匈牙利 1848 — 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 后迁美国, 入美国籍; 所谓“士麦那事件”的参与者。——216、238、277、296、338。
- 科苏特, 拉约什 (路易, 路德维希) (Kossuth, Lajos [Louis Ludwig] 1802 — 1894) —— 匈牙利政治活动家, 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1848 — 1849 年革命时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 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50 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14、51、70、71、78、96 — 98、457、574、671、675。
- 科洪, 罗伯特·吉尔摩 (Colquhoun, Robert Gilmour 1803 — 1870) —— 英国外交官, 曾任驻布加勒斯特总领事 (1834 — 1858)。——320。
- 克拉伦登伯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 (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 — 1870) —— 英国国务活动家, 外交官,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爱尔兰总督 (1847 — 1852), 曾镇压爱尔兰 1848 年起义; 外交大臣 (1853 — 1858、1865 — 1866 和 1868 — 1870)。——25、40、149、155、156、159、207、215、237、267、274、297、301、302、347、358、361、362、369、376 — 377。
- 克莱达, 让·茹尔 (Clédat, Jean-Jules 1832 — 1887) —— 法国革命家, 1850 年反政府颠覆活动的参加者, 1851 年是在伦敦的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成员。——591。
- 克莱蒂安, 弗洛朗 (Chretien, Florent 1541 — 1596) —— 法国著作家, 政治性小册子《梅尼普讽刺作品集》的编辑。——485。
- 克莱夫, 罗伯特 (Clive, Robert 1725 — 1774) —— 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将军, 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的肇始人, 孟加拉省督 (1757 — 1760 和 1765 — 1767)。——165、251。
- 克莱门蒂, 路易吉 (Clementi, Luigi) —— 意大利革命家, 马志尼的拥护者。——348。
- 克兰里卡德侯爵, 乌利克·约翰·德·伯格 (Clanricarde, Ulick John de Burgh, Marquess of 1802 — 1874) ——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辉格党人; 曾任驻彼得堡大使 (1838 — 1841), 邮政大臣 (1846 — 1852), 掌玺大臣 (1857 —

- 1858)。——206、288、302。
- 克劳福德伯爵,詹姆斯·林赛·巴尔卡里斯(Crawford, James Lindsay Balcarres, Earl of 1783—1869)——英国大地主和煤矿主。——383、510、523。
- 克劳弗德,爱德华·亨利·约翰(Craufurd, Edward Henry John 生于1816年)——英国法官,议会议员(1852—1853)。——194。
- 克劳泽,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见弗略里,查理。
- 克雷默,格奥尔吉(Кремер, Георги)——俄国外交官,曾任驻伦敦总领事(1853)。——95。
- 克里斯蒂安,格吕克斯堡公爵(Christian, Prinz von Glücksburg 1818—1906)——丹麦王位继承人(1852年起),丹麦国王(1863—1906),称克里斯蒂安九世。——271。
- 克路斯,阿道夫(Cluß, Adolf 1825—1905)——德国工程师,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年是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书记,1848年流亡美国;华盛顿海军部职员;50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通信,曾为德国、英国和美国许多工人和民主派报纸撰稿,同魏德迈一起在美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脱离政治活动;19世纪末成为著名的建筑师。——707—720、727—729。
-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英国国务活动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161、314。
- 克罗斯利,弗兰西斯(弗兰克)(Crossley, Francis [Frank] 1817—1872)——英国厂主,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52—1859)。——219。
- 克洛茨,阿那卡西斯(Cloots, Anacharsis 1755—1794)——法国政治活动家,原籍普鲁士;法国大革命的参加者,左派雅各宾党人,国民公会成员,革命后被处死。——335。
- 克梅蒂,乔治——见伊斯迈尔帕沙。
- 库尔西德帕沙——见盖昂,理查·德博弗尔。
- 库利汗——见纳迪尔沙赫(库利汗)。
- 库珀(库柏),詹姆斯·费尼莫尔(Cooper, James Fenimore 1789—1851)——美国现实主义作家。——48。
- 库普弗,阿道夫·雅柯夫列维奇(Купфер, Адольф Яковлевич 1799—1865)——俄国物理学家、矿物学家、结晶学家和气象学家,1829年任厄尔布鲁士峰科学

考察队队长。——459。

L

拉本斯基, 克萨韦里·克萨韦里耶维奇 (Лабенский, Ксавери Ксавериевич 1800—1855)——俄国外交官和新闻工作者, 曾一度为驻伦敦和柏林大使馆随员。——718。

拉布谢尔, 亨利, 汤顿男爵 (Labouchère, Henry, Baron Taunton 1798—1869)——英国国务活动家, 辉格党人; 曾任商业大臣 (1839—1841 和 1847—1852), 殖民大臣 (1855—1858)。——208, 233, 680。

拉德茨基伯爵, 约瑟夫·温采尔 (Radetzky, Joseph Wenzel Graf 1766—1858)——奥地利陆军元帅, 1831年起为意大利北部的奥军司令; 1848—1849年镇压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 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的总督 (1850—1856)。——44—46, 536。

拉多萨夫利埃维奇, 泰奥多尔 (Radosavlievič, Theodor Ritter von)——奥地利外交官, 驻塞尔维亚总领事 (1850—1858)。——320。

拉斐德侯爵, 玛丽·约瑟夫·保尔·罗什·伊夫·吉贝尔·莫蒂埃 (Lafayette, Marie-Joseph-Paul Roch Yves-Gibert Motier, Marquis de 1757—1834)——法国将军,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 在任国民自卫军长官时 (1789—1791) 曾指挥士兵向马尔斯广场上要求建立共和国的游行示威 (1791) 群众开枪射击; 1792年是一个军团的指挥官, 妄图把它变成反革命工具, 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逃往国外; 1830年资产阶级七月革命的领袖之一。——70。

拉弗尔斯, 托马斯·斯坦福 (Raffles, Thomas Stamford 1781—1826)——英国殖民官员, 曾任爪哇总督 (1811—1816); 《爪哇史》一书的作者。——139, 142。

拉盖罗尼埃子爵, 路易·埃蒂耶纳·阿尔图尔·迪布勒伊-埃利永 (La Guéronnière, Louis-Étienne-Arthur Dubreuil-Helion, vicomte de 1816—1875)——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50年代为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国家报, 帝国报》主编 (1850年起)。——236。

拉格勒内, 泰奥多斯·玛丽·梅尔基奥尔·约瑟夫·德 (Lagrené, Theodose-Marie-Melchior-Joseph de 1800—1862)——法国外交官, 驻彼得堡大使馆一等秘书、代办 (1831—1834)。——447。

拉马丁, 阿尔丰斯 (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

- 和政治家,40年代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外交部长(1848),临时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脑。——70。
- 拉马谢, H. (Lamarche, H.)——法国新闻工作者。——112。
- 拉莫里诺, 杰罗拉莫 (Ramorino, Gerolamo 1792—1849)——意大利将军, 1834年领导由马志尼组织的流亡革命者向萨瓦的进攻;意大利 1848—1849年革命时期指挥皮埃蒙特军队, 由于采取叛变的策略, 使奥地利军队获得了胜利。——536。
- 拉什顿, 本杰明 (Rushton, Benjamin 死于 1853 年)——英国工人, 宪章主义者。——189。
- 拉斯拜尔, 罕丽达·阿黛拉伊德 (Raspail, Henriette-Adélaïde 死于 1853 年)——法国自然科学家和政治家, 弗·万·拉斯拜尔的妻子。——654。
- 拉塔什, 米哈伊尔 (奥美尔帕沙) (Lataş, Mihail [Omer Pasha] 1806—1871)——土耳其将军, 原籍克罗地亚;克里木战争时期先后在巴尔干半岛 (1853—1854), 克里木 (1855) 和高加索 (1855—1856) 任土军总司令。——339、340、358、359、363、389、490、496—500、504、522、526—530、534—536、550、552—554、601、606、607—611、646。
- 拉瓦莱特侯爵, 沙尔·让·玛丽·费利克斯 (Lavalette [La Valette], Charles-Jean-Marie-Félix, marquis de 1806—1881)——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1851—1853), 内务大臣 (1865—1867) 和外交大臣 (1868—1869)。——308。
- 拉扎列夫,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 (Лазарев 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1788—1851)——俄国海军上将, 1833年起任黑海舰队总司令;曾对南极地区作过科学考察。——467。
- 莱奥——见卢西尼扬, 列翁。
- 莱奥波德一世 (Leopold I 1790—1865)——比利时国王 (1831—1865)。——108—109、229、292、631。
- 莱奥波德二世——见莱奥波德-路易-菲力浦-玛丽-维克多。
- 莱奥波德-路易-菲力浦-玛丽-维克多 (Léopold Louis-Philippe-Marie-Victor 1835—1909)——比利时国王 (1865—1909), 称莱奥波德二世;莱奥波德一世的儿子。——292。
- 莱奥尼达斯 (Leonidas 公元前 508 左右—480)——斯巴达国王 (公元前 488—480), 在温泉关保卫战中阵亡。——708、716。

- 莱宁根-威斯特堡伯爵, 克里斯蒂安·弗兰茨(Leinigen-Westerburg, Christian Franz Graf 1812—1856)——奥地利将军, 曾率特派使团赴君士坦丁堡(1853)。——22, 301。
- 莱亚德, 奥斯丁·亨利(Layard, Austen Henry 1817—1894)——英国考古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19世纪60年代起为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外交大臣助理(1861—1866), 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77—1880), 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委员(1885)。——205—206, 214, 226, 306, 308—311。
- 赖德律(赖德律-罗兰),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 [Ledru Rollin, Ledru 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改革报》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848), 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 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 1869年回到法国。——501, 576, 588, 633, 671—672。
- 赖辛巴赫伯爵, 奥斯卡尔(Reichenbach, Oskar Graf von 生于1815年)——德国西里西亚地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1850年起侨居英国, 后迁居美国。——568。
- 兰伯特(Lambert)——英国驻缅甸军队的军官(1853左右)。——734。
- 兰斯唐侯爵, 亨利·配第-菲茨莫里斯(Lansdowne, Henry Petty-Fitzmauric, Marquess of 1780—1863)——英国国务活动家, 辉格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06—1807), 枢密院院长(1830—1841和1846—1852), 不管部大臣(1852—1858)。——290。
- 朗道夫, 皮埃尔·弗朗索瓦(Landolphe, Pierre-François 1809—1889)——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的参加者;流亡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71年回到法国。——589。
- 勒鲁瓦, 皮埃尔(Le Roy, Pierre)——法国作家, 政治性小册子《梅尼普讽刺文集》的编辑。——485。
- 雷德克利夫子爵——见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子爵, 斯特拉特福·坎宁。
- 雷蒙, X. (Raimond, X.)——105。
- 雷姆佩尔, 鲁道夫(Rempel, Rudolf 1815—1868)——德国商人, 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威斯特伐利亚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 属于左翼, 拒绝纳税运动的领袖;曾一度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后

- 为进步党人。——583。
- 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让·迪普莱西(Richelieu, Armand-Jean du Plessis, duc de 1585—1642)——法国国务活动家和神学家,红衣主教。——262。
- 李贝尼,亚诺什(Libényi, János 1831—1853)——匈牙利裁缝;曾于1853年2月18日谋刺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后被处死。——36。
-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175、524、712、713。
- 李希特尔,约翰·保尔·弗里德里希——见让·保尔。
- 里德,托马斯·梅恩(Reid, Thomas Mayne 1818—1883)——英国作家;1840年只身赴美,曾在社会下层和印地安人中生活;1846年参加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1849年去欧洲参加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抵达时革命已经失败;1850年回英国后从事惊险小说的创作。——97。
- 里夫,亨利(Reeve, Henry 1813—1895)——英国新闻工作者,官员;《泰晤士报》撰稿人(1840—1855);曾任枢密院秘书(1853)。——358、368。
- 里彭伯爵——见鲁宾逊,弗雷德里克·约翰,葛德里奇子爵。
- 里奇韦父子公司(Ridgway & Sons)——英国的一家印刷和出版公司。——453。
- 理查兹,阿尔弗勒德·贝特(Richards, Alfred Bate 笔名一个英国人 An Englishman 1820—1876)——英国剧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反对科布顿和曼彻斯特派的和平主义;50年代曾同乌尔卡尔特派进行论战。——78、159、239、275、630。
- 理查一世(狮心理查)(Richard I Lion-Hearted 1157—1199)——英国国王(1189—1199)。——104。
- 利德尔,亨利·乔治,拉文斯沃思伯爵(Liddell, Henry George, Earl of Ravensworth 1821—1903)——英国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207。
- 利法特帕沙,萨迪克(Rifat Pasha, Sadik 1798—1855)——土耳其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53年3—5月)。——23、111。
- 利普兰迪,巴维尔·彼得罗维奇(Липранди, 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1796—1864)——俄国将军,曾任多瑙河俄军师长(1853—1854)、克里木俄军师长(1854—1855),在黑河战役中任军长。——551。
- 利齐乌斯(Liziu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书商和出版商。——51。
- 利文公爵,赫里斯托弗尔·安德烈耶维奇(Ливен, Христофор Андреевич, князь

- 1774—1839)——俄国外交官,曾任驻柏林公使(1810—1812),驻伦敦大使(1812—1834)。——180—183,262,410,435。
- 利文公爵夫人,达丽娅(多罗苔娅)·赫里斯托弗罗夫娜(Ливен, Дарья [Доротея] Христофоровна 1785—1857)——赫·安·利文公爵的夫人,曾在欧洲的外交生活中起重要作用。——25。
- 利文男爵,威廉·卡尔洛维奇(Ливен, Вильгельм Карлович, барон 1800—1880)——俄国将军,曾多次独立完成外交使命。——363。
- 利物浦伯爵,罗伯特·班克斯·詹金森(Liverpool, Robert Banks Jenkinson, Earl of 1770—182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屡任内阁大臣,曾任首相(1812—1827)。——400。
- 利兹公爵——见奥斯本,托马斯,丹比伯爵,卡马森侯爵,利兹公爵。
- 柳里克王朝——罗斯公爵世家,后为俄国沙皇的王朝(912—1598),即基辅大公伊戈尔的后裔的王朝;据编年史记载,伊戈尔是半传说中的瓦利亚基军队统帅柳里克的儿子。——262。
- 隆格,约翰奈斯(库尔茨韦格,约翰奈斯)(Ronge, Johannes [Kurzweg, Johannes] 1813—1887)——德国教士,神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天主教运动的发起人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849—1861)。——568。
- 娄,罗伯特(鲍勃),舍布鲁克子爵(Lowe, Robert [Bob], Viscount of Sherbrooke 1811—1892)——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会议员;《泰晤士报》撰稿人;曾任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委员(1853—1855),财政大臣(1855—1858和1868—1873),内务大臣(1873—1874)。——253。
- 卢格,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2—1843年同马克思一起编辑《德法年鉴》;1844年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568,672,709,717。
- 卢卡斯,弗雷德里克(Lucas, Frederick 1812—1855)——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领袖之一,会议员。——131。
- 卢西尼扬,列翁(莱奥)(Лусинян, Левон)——亚美尼亚大公,政治冒险主义者,流亡国外,1853年住在英国。——150。
- 鲁宾逊,弗雷德里克·约翰,葛德里奇子爵,里彭伯爵(Robinson, Frederick John,

- Viscount Goderich, Earl of Ripon 1782—1859)——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商业大臣(1818和1841—1843)、财政大臣(1823—1827)、首相(1827—1828)。——400、616。
- 鲁森男爵,阿尔班·雷纳(Roussin, Albin-Reine, baron 1781—1854)——法国海军上将和政治活动家;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32—1834),海军大臣(1840—1843)。——433。
- 路斯塔洛,埃利泽(Loustalot, Elysée 1762—1790)——法国政论家,雅各宾党人,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巴黎革命》的出版者。——108。
- 路特希尔德家族——金融世家,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582。
- 路西德帕沙,穆斯塔法·穆罕默德(Reschid Pasha, Mustafa Mehemed 1800左右—1857)——土耳其国务活动家,曾任总理大臣(1846—1852和1856—1857),外交大臣(1853年5月—1855年5月)。——105、109、191、238、259、260、282、295、300、306、320、322、337、362、377、479、491、613、620。
-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I [Louis-Philippe], duc d'Orl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4、161、162、182、228、292、693、698。
-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莎,黑森-卡塞尔亲王夫人(Luise, Prinzessin von Hessen-Kassel 1817—1898)——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的王后。——271。
- 路易十一(Louis XI 1423—1483)——法国国王(1461—1483)。——689。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80。
- 伦茨堡——瑞士贵族世家。
- 伦德(Lund)——英国约克郡的工厂主。——486。
- 罗巴克,约翰·阿瑟(Roebuck, John Arthur 1801—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457、470—471。
- 罗登伯爵,罗伯特·乔斯林(Roden, Robert Jocelyn, Earl of 1788—1870)——英国政治活动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289。
- 罗赫纳,格奥尔格(Lochner, Georg 1824—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1年底流亡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

- 1871—1872),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 和 1871)代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
友和战友。——580—581。
- 罗纳兹, 查理(Ronalds, Charles)——英国法学家。——625。
- 罗斯, 休·亨利(Rose, Hugh Henry 1801—1885)——英国将军, 后升元帅, 驻君
士坦丁堡代办(1852—1853), 克里木战争时期为驻克里木法军司令部代表;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镇压者之一; 曾任驻印度军队司令
(1860—1865), 驻爱尔兰武装部队司令(1865—1870)。——5、158、299、
306。
- 罗素, 亨利(Russell, Henry 1751—1836)——英国法学家, 曾在印度当法官(1798
—1813)。——222。
- 罗素伯爵, 约翰(Russell, John, Earl of 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 辉格
党领袖, 曾任首相(1846—1852 和 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 和
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 1855 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
会议。——53、55、60、70、102、130—131、132、148、151、156、194、206、208、
216、226、232—233、238、253、267、274、304—308、312、358、362、377、403、
596、636、665、680。
- 罗特哈克尔, 威廉(Rothacker, Wilhelm 1828—1859)——德国政论家和新闻工
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 运动失败
后流亡瑞士, 后经伦敦迁居美国;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 年夏天结识马克
思和恩格斯; 1851 年为《高地哨兵》(辛辛那提)编辑, 1853 年起为《人权报》编
辑, 后为《体操报》编辑。——566。
- 罗伊特, 麦克斯(Reuter, Max)——19 世纪 50 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
探。——562。
- 洛伊希滕贝格公爵夫人——见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
- 吕德尔斯,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Лидерс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0—
1874)——俄国将军, 1853—1854 年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 1855 年任南方部
队指挥官, 1856 年初任克里木俄军总司令, 1861—1862 年任波兰总督。——
532、552。

M

- 马迪埃(Madier)——法国机械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9 世纪 50 年代初流
亡英国。——590。

- 马丁, 威廉·范绍 (Martin, William Fanshaw 1801—1895)——英国海军上将, 舰队司令, 朴茨茅斯造船厂厂长 (1853—1857)。——625。
- 马多克, 托马斯·赫伯特 (Maddock, Thomas Herbert 1792—1870)——英国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253。
- 马尔科姆, 约翰 (Malcolm, John 1769—1833)——英国外交官, 东印度公司官员, 曾任驻德黑兰公使 (1799—1801、1808—1809 和 1810), 孟买省督 (1826—1830); 写有关于印度和波斯的著作。——222。
-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 教士, 人口论的主要代表。——283, 378, 487, 524, 537—539。
- 马洪子爵, 菲利浦·亨利·斯坦霍普 (Mahon, Philip Henry Stanhope, Viscount 1805—1875)——英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皮尔分子, 议会议员; 外交副大臣 (1834—1835)。——440, 460。
- 马克思, 弗兰西斯·约瑟夫·彼得 (Marx, Francis Joseph Peter 1816—1876)——英国地主, 保守派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 戴·乌尔卡尔特的朋友和拥护者。——327。
- 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 1814—1881)——马克思的妻子、忠实的朋友和助手。——50, 583。
- 马莱, 克劳德·弗朗索瓦·德 (Malet, Claude-François de 1754—1812)——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反波拿巴密谋 (1808 和 1812) 的参加者; 密谋失败后被处死。——633。
- 马茂德二世 (Mahmud II 1785—1839)——土耳其苏丹 (1808—1839)。——179—182, 229, 412, 433—440, 453。
- 马姆兹伯里伯爵, 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 (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Earl of 1807—1889)——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保守党人, 曾任外交大臣 (1852 和 1858—1859), 掌玺大臣 (1866—1868 和 1874—1876)。——207, 237, 290, 296—301。
- 马塞纳, 安德烈 (Masséna, André 1756—1817)——法国将军, 1804 年起为元帅, 拿破仑第一的多次远征的参加者, 1814 年倾向波旁王朝方面。——497, 532。
- 马图舍维奇伯爵, 安德烈 (Матушевич, Андрей, граф 1796—1842)——俄国外交官, 曾代表俄国出席特罗保会议 (1820)、维罗纳会议 (1822) 和伦敦会议 (1830)。——180, 182, 183。
- 马乌罗盖尼 (马乌罗热尼) (Maurogeni [Maurojeni])——土耳其外交官, 19 世纪

- 30年代为驻维也纳代办。——435。
- 马修, 约翰(Matthew, John)——英国工人, 宪章运动参加者。——540。
- 马志尼, 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 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 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 1853年是米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50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1864年成立国际工人协会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的影响之下, 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 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3—4、44、46、70、93、107、594、671、675。
- 玛丽-安东尼达(Marie-Antoinette 1755—1793)——法国王后(1774—1793), 路易十六的妻子,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543。
- 玛丽-罕丽达(Marie Henriette 1836—1902)——奥地利女公爵, 比利时国王莱奥波德-路易-菲力浦-玛丽-维克多的妻子。——292、356。
- 玛丽-路易莎-费南达(Maria Luisa Fernanda 1832—1897)——西班牙公主, 伊萨伯拉二世的妹妹, 蒙庞西埃公爵的妻子。——427。
-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Maria-Christina 1806—1878)——西班牙王后(1829—1833), 斐迪南七世的妻子, 王国摄政女王(1833—1840)。——431。
-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洛伊希滕贝格公爵夫人)(Мар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1819—1876)——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的女儿。——293。
- 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Maria II da Gloria 1819—1853)——葡萄牙女王(1826—1828和1834—1853)。——430。
- 迈恩多夫男爵, 彼得·卡季米罗维奇(Мейендорф, Петр Казимирович, барон 1796—1863)——俄国外交官, 曾任驻柏林公使(1839—1850)和驻维也纳公使(1850—1854)。——215、282、306、363、374。
- 迈尔, P. (Mayer, P.)——法国新闻工作者。——590。
- 麦格雷戈, 詹姆斯(MacGregor, James)——英国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1852—1853)——70。
- 麦考莱, 托马斯·巴宾顿(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 印度总督所属参事室参事(1833—1838); 曾编有印度刑法典, 该刑法典于1860年被批准为法律。——134、200。
- 麦克库洛赫, 约翰·拉姆赛(Ma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

- 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116。
- 麦克尼尔,约翰(McNeill[M'neill], John 1795—1883)——英国外交官,曾任驻德黑兰公使(1836—1842),调查克里木英军军需状况的政府全权代表(1855)。——412、419。
- 麦克唐奈(MacDonnell)——苏格兰地主。——487。
- 满族王朝——见清朝。
- 曼,托马斯(Mun, Thomas 1571—1641)——英国商人和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贸易差理论的创立者,1615年起为东印度公司董事。——166。
- 曼德维尔,约翰·亨利(Mandeville, John Henry 1773—1861)——英国外交官,曾任驻土耳其大使(1831—1832)。——439、477。
- 曼努,扬库(Manu, Iancu)——瓦拉几亚外交大臣(1850—1854)。——320。
- 曼桐(Mindon, Min 死于1878年)——缅甸国王(1853—1878);曾进行一系列进步改革,反对英国的蚕食政策。——325。
- 曼托伊费尔男爵,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Freiherr von 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参与宪法(1848年12月)的颁布和三级选举制的实行(1849);曾任内务大臣(1848年11月—1850年12月)和首相(1850—1858);1859年和1860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4年入选第一议院。——35、44、592。
- 曼托伊费尔男爵,卡尔·奥托(Manteuffel, Karl Otto Freiherr von 1806—1879)——普鲁士政治活动家,内务副大臣(1851—1853),农业大臣(1854—1858);奥·泰·曼托伊费尔的弟弟。——35。
- 芒茨,乔治·弗雷德里克(Muntz, George Frederick 1794—1857)——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兵工厂厂主,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时期(1832)曾组织多次群众集会拥护改革。——314。
- 芒罗,托马斯(Munro, Thomas 1761—1827)——英国将军,马德拉斯总督(1819—1827)。——222。
- 梅恩,理查德(Mayne, Richard 1796—1868)——英国警官,1850年起任伦敦警察局长。——331。
- 梅兰希顿,菲利浦(Melanchton, Philipp 1497—1560)——德国神学家,人道主义者;温和派的代表,路德最亲密的助手,和路德一起竭力使新教适合诸侯的利益。——568。
- 梅特涅-温内堡公爵,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奈波穆克·洛塔尔(Metternich-

- Winneburg, Clemens Wenzeslaus Nepomuk Lothar Fürst von 1773—1859)——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38、88、91、181、232、410、626。
- 梅因,爱德华(Meyen, Eduard 1812—187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人”小组成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柏林《改革报》编辑(1861—1863);后为民族自由党人。——568。
- 门登——见曼桐。
- 蒙腊德,迪特莱夫·哥特哈德(Monrad, Ditlev Gothard 1811—1887)——丹麦主教和政治活动家,曾任教育和宗教大臣(1848和1859—1863),首相兼财政大臣(1863—1864);50年代为民族自由党领袖。——521。
- 蒙庞西埃公爵,安东·玛丽·菲力浦·路易(Montpensier, Antoine-Marie-Philippe-Louis, duc de 1824—1890)——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一世的儿子,西班牙公主玛丽-路易莎-费南达的丈夫,1868—1869年为西班牙王位追求者,1871年被流放巴利阿里群岛。——427。
- 蒙塞尔,威廉,埃姆利男爵(Monsell, William, Baron Emly 1812—1894)——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英国议会中爱尔兰党团的领袖之一;曾任军械局秘书(1852—1857)。——131—132。
- 米尔恩斯,理查·蒙克顿(Milnes, Richard Monckton 1809—1885)——英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9世纪下半叶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313、314、426。
- 米格尔,马里亚·埃瓦里斯托(Miguel, Maria Evaristo 1802—1866)——葡萄牙执政者(1826—1828),葡萄牙国王(1828—1834)。——410。
- 米哈伊尔(塞尔维亚的)——见奥布廉诺维奇,米哈伊尔。
- 米涅,克劳德·埃蒂耶纳(Minié, Claude-Étienne 1804—1879)——法国军官,米涅式步枪发明者。——555。
- 米切尔,约翰(Mitchell, John 1815—1875)——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青年爱尔兰”革命民主派领导人,主张同宪章派合作;1848年因参与爱尔兰起义的准备工作而被判处15年流放,1853年逃出流放地,流亡美国;站在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348。
- 米斯科夫斯基,亨利克·路德维克(Miskowsky, Henrik Ludvic 1814左右—1854)——波兰军官,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后来先后迁居德国和英国。——574—576。

密勒, 约瑟夫(约)(Miller, Joseph [Joe] 1684—1738)——英国喜剧演员。——78。

缅施科夫公爵,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Менш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князь 1787—1869)——俄国军事和国务活动家, 1836—1853年任海军大臣, 1853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特命全权大使, 克里木战争时期(1853—1856)任陆海军总司令。——5、22、46、104—105、109—111、121、126—127、149、155—156、158、215、260、298、300—302、305—311、363、374、489、613、619、684、685。

明托伯爵, 吉伯特·埃利奥特(Minto, Gilbert Elliot, Earl of 1782—1859)——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海军首席大臣(1835—1841)、掌玺大臣(1846—1852), 1847—1848年在意大利执行外交任务。——233。

莫尔斯沃思从男爵, 威廉(Molesworth, Sir William, Baronet 1810—1855)——英国国务活动家,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公共工程大臣(1853—1855)和殖民大臣(1855)。——54、215、294、427。

莫里逊——见勃鲁姆, 约翰奈斯。

莫里逊, 詹姆斯(Morrison, James 1770—1840)——英国厂主和商人, 曾以出售所谓的“莫里逊氏丸”而大发横财。——562。

莫帕, 沙勒曼涅·埃米尔·德(Maupas, Charlemagne-Émile de 1818—1888)——法国律师, 波拿巴主义者, 巴黎警察局长(1851),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 第二帝国时期为警务大臣(1852—1853)。——34—36、654。

莫卧儿王朝(大莫卧儿王朝)——印度钵谛沙赫王朝(1526—1858)。——137、198、245、246。

莫扎特, 沃尔夫冈·阿马多斯(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433。

墨尔本子爵, 威廉·拉姆(Melbourne, William Lamb, Viscount 1779—1848)——英国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 曾任内务大臣(1830—1834)和首相(1834和1835—1841)。——233。

默里, 休(Murray, Hugh 1779—1846)——英国地质学家和新闻工作者。——162—165。

缪尔纳, 亚马多·哥特弗里德·阿道夫(Müllner, Amandus Gottfried Adolf 1774—1829)——德国作家、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 写有一些宣扬宿命论思想的悲剧。——52。

穆罕默德-阿里 (Mehmed Ali 1769—1849)——埃及执政者(1805—1849),曾实行多次有利于埃及大地主和实业家的改革。——218、228、230、233、418、433—439、620。

穆罕默德-阿里帕沙 (Mehmed Ali Pasha 约 1807—1868)——土耳其军事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曾任总理大臣(1852—1853年5月),陆军大臣(1853—1854年1月)。——111、377。

穆罕默德·傅阿德帕沙——见傅阿德帕沙(傅阿德埃芬蒂),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穆特吉姆帕沙 (Mehmed Mutergim Pasha 1809—1882)——土耳其国务活动家,曾任陆军大臣(1853年初)并屡任总理大臣。——111。

穆勒,詹姆斯 (Mill, James 1773—183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学方面是边沁的追随者,《英属印度史》一书的作者。——163—164。

穆斯塔法-奈利帕沙(穆斯塔法帕沙) (Mustafa Naili Pasha [Mustapha Pasha] 1796左右—1871)——土耳其国务活动家,曾任总理大臣(1853年5月—1854年5月)。——362、377。

穆欣 (Мухин)——俄国外交官,曾任驻塞尔维亚总领事(1853)。——614。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5、409、420、427、529、554、632、698。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4、15、22、25、34、35、71、88、109、156、158、181、220、236、258、266、281、293、297、299、301、348、356、503、616、622、631—634、638、653、699。

讷尔纳 (Nörner)——普鲁士法警。——95。

纳迪尔沙赫(库利汗) (Nadir Shah 1688—1747)——波斯沙赫(1736—1747),统帅和征服者,1738—1739年曾对印度进行掠夺性的远征。——134、138。

纳夫,威廉·马蒂亚斯 (Naeff, Wilhelm Matthias 1802—1881)——瑞士国务活动家和法学家,自由主义者,1848年宪法的起草人之一;联邦院议员(1848—1875),联邦总统(1853—1854)。——107。

- 纳梅克帕沙(Namik Pasha)——土耳其政治活动家,1832年在伦敦执行外交任务。——435。
- 纳皮尔,约瑟夫(Napier, Joseph 1804—1882)——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1852年起任德比内阁总检察长,1858—1859年任爱尔兰事务大臣。——289—290。
- 纳赛尔丁(Nasr-ed-Din 1831—1896)——波斯沙赫(1848—1896)。——282、480、520。
- 纳希莫夫,帕维尔·斯捷潘诺维奇(Нахимов, Павел Степанович 1802—1855)——俄国海军上将,锡诺普会战中任俄军分舰队指挥官,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1854—1855)的组织者和领导者。——642。
- 奈穆尔公爵,路易·沙尔·菲利浦·拉斐尔(奥尔良的)(Nemours, Louis-Charles-Philippe-Raphaël d'Orléans, duc de 1814—1896)——法国将军,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英国;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一世的第二个儿子。——632。
- 奈特,亨利·加利(Knight, Henry Gally 1786—1846)——英国作家和旅行家,议会议员。——420。
- 瑙特,斯蒂凡·阿道夫(Naut, Stephan Adolf)——德国商人,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经理,1849年4月起为发行负责人,1850年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在莱茵地区和南德的发行负责人。——583。
- 内夫策,奥古斯特(Nefftzer, Auguste 1820—1876)——法国新闻工作者,《新闻报》撰稿人(1844—1857和1859—1861),《时报》主编。——278。
-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5、21、23、25、43、105、106、109、112、123、127、149、150、158、178—181、191、192、211、215—218、235—237、239、258—263、268—269、273—277、282、291、293、296、303、305—308、314、323、328、337、340、348、357—363、369—370、373—376、389、393、412、416—418、426、434、443、447—452、455、457、475、481、489—490、495、502、512、522、555、618—624、630—632、637—639、678、682—686、718、723、732。
- 尼罗德(Нирод)——俄国将军,1853年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552。
- 涅波科伊奇茨基,阿尔图尔·阿达莫维奇(Непокойчицкий, Артур Адамович 1813—1881)——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5。
- 涅谢尔罗德伯爵,德米特里·卡尔洛维奇(Нессельроде, Дмитрий Карлович, граф

- 生于1816年)——俄国外交官,卡·瓦·涅谢尔罗德伯爵的儿子。——5。
- 涅谢尔罗德伯爵,卡尔·瓦西里耶维奇(Нес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аф 1780—1862)——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16—1856)和总理大臣(1845年起)。——22、180、183、192、214、217、219、226—228、232、235、258、276、282、301、347、363、370、373—376、447、461、474、478、481、490、682—685。
- 牛顿,伊萨克(Newton, Isaac 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113。
- 纽卡斯尔公爵,亨利·佩勒姆·法因斯·佩勒姆·克林顿(Newcastle, Henry Pelham Fiennes Pelham-Clinton, Duke of 1811—1864)——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分子,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46),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1854),陆军大臣(1854—1855),殖民大臣(1859—1864)。——290。
- 纽曼,弗兰西斯·威廉(Newman, Francis William 1805—1897)——英国语文学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写有宗教、政治和社会问题方面的著作。——176。
- 诺曼比伯爵,康斯坦丁·亨利·菲普斯(Normanby, Constantin Henry Phipps, Earl of 1797—1863)——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任爱尔兰总督(1835—1839),陆军和殖民大臣(1839),内务大臣(1839—1841),驻巴黎大使(1846—1852)。——427。
- 诺思,弗雷德里克(North, Frederick 1732—1792)——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767),首相(1770—1782),内务大臣(1783)。——132、163。
- 诺伊曼男爵,菲力浦(Neumann, Philipp Freiherr von 约生于1778年)——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232。

P

- 帕金顿,约翰·萨默塞特,汉普顿男爵(Pakington, John Somerset, Baron Hampton 1799—1880)——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海军首席大臣(1858—1859和1866—1867),陆军大臣(1867—1868)。——3、70、85、253、304、312。
- 帕拉迪斯,让·巴蒂斯特(Paradis, Jean-Baptiste 生于1827年)——法国新闻工作者,《新闻报》撰稿人(1853)。——260。

-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 依靠该党右派; 曾任陆军大臣(1809—1828), 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 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4、25、31、38、40、71、78、156、158、207—208、209、214—215、229—233、256、267、292、294、317、318、322、323、340、347、348、358、362、377、397—478、492、549、616、621、623—627、630、636—639、678—680、727、730—731。
- 帕斯凯维奇公爵, 伊万·费多罗维奇 (Паскевич,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князь 1782—1856)——俄国元帅,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 1831年夏天起为镇压波兰起义(1830—1831)的俄军总司令, 1832年起为波兰王国总督, 1849年为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军总司令, 1854年为俄国西部和南部驻军总司令, 5—6月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495、500。
- 派顿, 威尔逊 (Patten, Wilson)——英国厂主, 自由贸易派, 议会议员。——680。
- 派西沃, 斯宾塞 (Perceval, Spencer 1762—1812)——英国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首席检察官(1802—1806), 财政大臣(1807—1809), 首相(1809—1812)。——400。
- 炮弹国王——见斐迪南多二世, 斐迪南二世。
- 佩德罗一世, 唐·佩德罗 (Pedro I, Don Pedro 1798—1834)——巴西国王(1822—1831), 葡萄牙国王, 称佩德罗四世(1826), 后把葡萄牙王位让自己的女儿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431。
- 佩尔采尔, 莫尔 (Perczel, Mór 1811—1899)——匈牙利政治家和将军, 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 1851年流亡英国。——51。
- 佩拉特, 阿普斯利 (Pellat, Apsley 1791—1863)——英国厂主, 资产阶级激进派, 议会议员。——186。
- 佩里埃, 沙尔·尼古拉·斐迪南 (Perrier, Charles-Nicolas-Ferdinand 1812—1882)——瑞士军官和著作家, 弗赖堡州国民自卫军司令(1849—1852), 弗赖堡起义(1853)领导人。——98—99。
- 佩罗夫斯基, 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 (Пер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795—1857)——俄国将军, 奥伦堡军事总督(1833—1842), 奥伦堡和萨马拉两省总督(1851—1857); 曾任希瓦远征军指挥官(1839—1840)。——520。

- 庞森比子爵, 约翰(Ponsonby, John, Viscount 1770 左右—1855)——英国外交官, 曾任驻那不勒斯公使(1832), 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32—1841)和驻维也纳大使(1846—1850)。——440、444、454、475。
- 皮埃特里, 皮埃尔·玛丽(Piètri, Pierre-Marie 1809—1864)——法国政治家,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巴黎警察局长(1852—1858)。——34。
- 皮尔, 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 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 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 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 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 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的起草人; 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73、82、199、292、341、342、344—346、364、414、424、429、432、445—446、448、474—477、482、510。
- 皮尔, 罗伯特(Peel, Robert 1822—189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皮尔分子, 后为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海军副大臣(1855—1857); 英国首相罗·皮尔的儿子。——148。
- 皮尔斯, 富兰克林(Pierce, Franklin 1804—1869)——美国国务活动家, 民主党人, 曾任总统(1853—1857)。——14、710。
- 皮科克, 巴恩斯(Peacock, Sir Barnes 1810—1890)——英国法学家, 印度总督参事室参事。——134。
- 皮佩尔, 威廉(Pieper, Wilhelm 1826 左右—1899)——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流亡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1853 年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9 年返回德国, 1892 年在汉诺威一所中学任教。——582、586、656—669、677—686。
- 皮斯(Peace)——詹·林·巴·克劳福德伯爵的雇员。——523。
- 皮特(小皮特), 威廉(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反对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1781 年起为议会议员, 曾任财政大臣(1782—1783)和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84、163、197。
- 平达(Pindaros 约公元前 522—442)——古希腊抒情诗人, 写有一些瑰丽的颂诗。——401、582。
- 珀舍, 泰奥多尔(Pösche, Theodor 1826—1899)——德国教员和统计学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后迁美国。——710—711。

-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711。
- 普尔斯基,费伦茨·冯(Pulszky [Pulsky], Ferenc von 1814—1897)——匈牙利政治家、作家和考古学家;波兰人,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50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人,1867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议会议员(1867—1876和1884—1897)。——14,729。
- 普雅德,皮埃尔·欧仁(Poujade, Pierre-Eugène 1813—1854)——法国外交官,驻布加勒斯特总领事(1849—1854)。——320—321。

Q

- 齐德林斯基(塞里姆帕沙,泽德林斯基)(Ziedlinski [Selim Pasha, Zedlinsky])——土耳其将军,波兰人,1853—1854年任多瑙河土军指挥官,称塞里姆帕沙。——733。
- 恰尔钦斯基,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Чалчинский, Иван Дмитриевич 1810—1856)——俄国外交官,1853年为驻多瑙河两公国总领事。——268。
- 乔斯林子爵,罗伯特(Jocelyn, Robert, Viscount 1816—1854)——英国军官,议会议员,1845—1846年在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供职。——220。
- 乔治·桑(George Sand 真名奥罗拉·杜班 Aurore Dupin 1804—1876)——法国女作家,著有长篇社会小说多种,浪漫主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327—328。
- 乔治一世(George I 1660—1727)——英国国王和汉诺威选帝侯(1714—1727)。——62—63,167。
- 乔治二世(George II 1683—1760)——英国国王和汉诺威选帝侯(1727—1760)。——62—63,167。
- 乔治三世(George III 1738—1820)——英国国王(1760—1820)。——62—63,163,167。
- 切尔宁,安东·弗雷德里克(Tscherning, Anton Frederick 1795—1874)——丹麦政治活动家和军官,自由党人;曾任陆军大臣(1848)。——521。
- 清朝——中国皇朝(1644—1911)。——113,119。
- 穷汉戈蒂耶(穷汉瓦尔特)(Gautier Sansavoir [Walter von Habenichts] 死于1096年)——法国骑士,第一次十字军远征(1096—1099)中法国农民支队的统帅。——561。

穷汉瓦尔特——见穷汉戈蒂耶。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 --1869)——英国律师、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宪章派领袖,《北极星报》编辑,《寄语人民》和《人民报》出版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858年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暂时断交。——69、146—148、187—189、219、257、487、525、539—540、549、597—600、615、652、710。

R

让·保尔(Jean Paul 原名约翰·保尔·弗里德里希·李希特尔 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 1763—1825)——德国讽刺作家。——708。

热尔贝,沙尔(Gerbex, Charles 1816—1879)——瑞士军官,1852年起为弗赖堡州国民自卫军司令,镇压1853年弗赖堡起义的策划者。——98。

热那亚公爵——见斐迪南-阿尔伯托-亚马多。

日拉丹,埃米尔·德(Girardin, É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836—1866年曾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后为《自由报》编辑(1866—1870);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110。

S

萨德勒,约翰(Sadleir, John 1814—1856)——爱尔兰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英国议会中爱尔兰党团的领袖之一,蒂珀雷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董事;1853年任财政副大臣;1856年因蒂珀雷里银行破产而自杀。——131。

萨尔蒂科夫公爵,阿列克塞·德米特里耶维奇(Салтыков, Алекс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князь 1806—1859)——俄国旅行家、作家和艺术家,曾游历印度(1841—1843和1845—1846)。——224、250。

萨格登,爱德华·伯滕肖,圣伦纳兹男爵(Sugden, Edward Burtenshaw, Baron St. Leonards 1781—1875)——英国国务活动家和法学家,托利党人,1852年是大法官。——429。

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德国王朝,同比利时、保加利亚、英国和葡萄牙王室有联系。——292、356、432、637。

萨瑟兰女伯爵,伊丽莎白·鲁森-高尔,斯塔福德侯爵夫人,公爵夫人(Suther-

- land, Elizabeth Leveson-Gower, Countess of, Marchioness of Stafford, Duchess of 1765—1839)——苏格兰大地主,斯塔福德侯爵的妻子,哈·伊·乔·鲁森-高尔·萨瑟兰的婆婆。——209、487。
- 塞巴斯蒂亚尼伯爵,奥拉斯·弗朗索瓦·巴斯蒂安(Sébastieni, Horace-François-Bastien, comte de 1772—1851)——法国元帅,外交家;1801—1802年在土耳其、埃及和叙利亚任拿破仑第一的外交使节;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2),驻伦敦大使(1835—1840)。——228—233。
- 塞尔维亚的米哈伊尔——见奥布廉诺维奇,米哈伊尔。
- 塞尔维亚的亚历山大——见亚历山大一世·卡拉乔治维奇。
- 塞里姆帕沙——见齐德林斯基。
- 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米格尔·德(Cervantes Saavedra, Miguel de 1547—1616)——西班牙作家。——663、718、728。
- 桑德斯,约翰(Sanders, John)——苏格兰场的警官,1853年负责对伦敦的政治流亡者的监视工作。——96。
- 瑟美列,贝尔塔兰(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国务活动家和政论家,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曾任革命政府内务部长(1848)和首脑(1849);革命失败后流亡巴黎,1865年回到匈牙利。——51、577、578、675、721—722。
- 瑟美列(瑟美列夫人)(Szemere [Madame Szemere])——贝·瑟美列的妻子。——721。
- 沙贝利茨,雅科布·卢卡斯(Schabelitz, Jakob Lukas 1827—1899)——瑞士出版商和书商,1846年10月—1848年5月为《德意志—伦敦报》编辑,1846年起为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1848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40年代末—50年代初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雅·克·沙贝利茨的儿子。——651。
- 沙尔,雅克·于贝尔(Charles, Jacques-Hubert 1793—1882)——瑞士政治活动家和作家,1853年弗赖堡起义的参加者。——99。
- 沙菲汗(Schafi Khan [Shafi Khan])——伊朗外交官,1853年任驻伦敦公使。——520。
- 沙利文,约翰(Sullivan, John)——英国政论家,1853年曾参与印度改革法案的发表。——164。
- 沙米尔(Schamyl [Shamyl] 1798左右—1871)——达吉斯坦教长(1834年起),达吉斯坦和车臣教民的宗教领袖(30—50年代),穆里德派的思想家;反对当

- 地的封建领主和沙皇殖民主义者。——159、502、522、532、724。
- 沙佩尔, 卡尔(Schapper, Karl 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创建人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该委员会案件(1849年2月8日)的被告之一; 1849年2—5月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 《新莱茵报》撰稿人;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 1856年起重新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 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564、574、578、579、588。
- 莎士比亚, 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103、313、318、379、397、435、450、591。
- 尚博尔伯爵, 昂利·沙尔·斐迪南·玛丽·迪约多内·达尔图瓦, 波尔多公爵(亨利五世)(Chambord, Henri-Charles-Ferdinand-Marie Dieudonne d'Artois, duc de Bordeaux, comte de, Henri V 1820—1883)——法国波旁王室长系的最后代表, 查理十世之孙; 1830年七月革命胜利后逃亡国外, 法国王位追求者, 称亨利五世。——631。
- 绍莱, 约瑟夫(Chollet, Joseph)——1853年弗赖堡起义的参加者。——99。
- 圣伦纳兹——见萨格登, 爱德华·伯滕肖, 圣伦纳兹男爵。
- 圣马尔克-日拉丹(Saint-Marc-Girardin 1801—1873)——法国作家、文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 奥尔良党人; 《辩论日报》撰稿人。——128。
- 圣托马斯·阿奎那——见托马斯·阿奎那。
- 圣者斯蒂凡一世(Stephan I Szent 975左右—1038)——匈牙利公爵(997年起), 1001—1038年为匈牙利国王。——578。
- 施拉姆, 康拉德(Schramm, Conrad 1822—1858)——德国新闻工作者,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1848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1848年11月起为《基尔民主周报》出版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9年起流亡伦敦, 后侨居泽稷岛,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发行负责人,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2—1857年侨居美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572—577、585。
- 施莱格, 爱德华(Schläger, Eduard)——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9世纪50—70年代流亡美国, 50年代初为《新英格兰报》编辑和出版者, 1880年回到德国。——707。

- 施奈德第二, 卡尔(Schneider II, Karl)——德国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8年是科隆民主协会主席和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1849年2月7日《新莱茵报》案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护人; 1849年2月8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案件的被告之一; 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极左派;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 后脱离政治活动。——563、585。
- 施泰格尔(Steiger)——瑞士外交官, 1853年是驻维也纳代办。——108。
- 施泰翰, 哥特利布·路德维希(Stechan, Gottlieb Ludwig 1814左右—1875)——德国细木工, 1836年起侨居巴黎, 成为流亡者同盟和正义者同盟盟员; 1840年返回德国,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工人兄弟会领导人之一; 1850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1851年为《德意志工人俱乐部》编辑和发行人, 同年被捕, 后越狱逃往伦敦; 新伦敦工人协会领导人之一。——581。
- 施特芬, 威廉·卡尔(Steffen, Wilhelm Karl)——普鲁士军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被告证人, 1853年流亡英国; 50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接近; 1858年迁居美国。——586—588。
- 施特拉索尔多-格拉芬贝格伯爵, 米夏埃尔(Strassoldo-Grafenberg, Michael Graf 1800—1873)——奥地利国务活动家, 曾任米兰总督(1850—1853); 尤·凯·施特拉索尔多-格拉芬贝格的弟弟。——355。
- 施特劳斯, 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 黑格尔的学生; 《耶稣传》(1835)和《基督教教义》(1840)的作者; 他对圣经的历史性批判奠定了青年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基础; 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709。
- 施特雷克富斯, 阿道夫·卡尔(Streckfuß, Adolph Carl 1823—1895)——德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34。
- 施梯伯, 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 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2—1860),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和主要原告证人; 同维尔穆特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 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 在法国境内的德国情报机关的首脑。——34—36、44、95、651。
- 施梯尔贝公爵, 巴尔布·德米特里·比波斯库(Stirbei, Barbu Demetrius Bibescu Fürst 1801—1869)——瓦拉几亚国君(1849—1853和1854—1856)。——

268、274、319、362、631。

施瓦尔岑堡公爵，弗里德里希 (Schwarzenberg, Friedrich Fürst zu 1800—1870)——奥地利将军，镇压加里西亚农民起义(1846)的策划者之一，1849年率领奥地利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426。

斯宾塞，赫伯特 (Spencer, Herbert 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者。——176。

斯蒂凡一世(圣者)——见圣者斯蒂凡一世。

斯卡利，弗兰西斯 (Scully, Francis 生于 1820 年)——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47—1857)。——290。

斯拉德，阿道夫 (Slade, Adolphus 1804—1877)——英国海军军官，纳瓦里诺会战(1827)的参加者；曾在土耳其军队中任职(1849—1866)，克里木战争前夕获海军少将衔，后升海军上将，称穆斯哈佛帕沙。——500。

斯莱尼，罗伯特·阿格莱昂比 (Slaney, Robert Aglionby 1792—1867)——英国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1826—1835, 1837—1841 和 1847—1867)。——187。

斯坦利——见德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

斯坦利，爱德华·亨利·斯密斯，德比伯爵 (Stanley, Lord Edward Henry Smith, Earl of Derby 1826—1893)——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60—70年代是保守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外交副大臣(1852)、殖民大臣(1858—1859 和 1882—1885)、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和印度事务大臣(1858—1859)、外交大臣(1866—1868 和 1874—1878)；爱·德比伯爵的儿子。——150—152、161、171、190。

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拉特福·坎宁 (Stratford de Redcliffe, Stratford Canning, Viscount 1786—1880)——英国外交官，议会议员(1828—1841)；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26—1828 和 1841—1858)。——25、110、111、216、259、305、358、369、412、422、439、455、457、476、613、624、630、734。

斯特奇，查理 (Sturge, Charles 1802—1888)——英国农场主，约·斯特奇的弟弟。——286。

斯特奇，约瑟夫 (Sturge, Joseph 1793—1859)——英国农场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的创始成员。——286。

斯图亚特，达德利·库茨 (Stuart, Lord Dudley Coufts 1803—1854)——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与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有联系。——97、274、312、316、323、415、422、423、457、460、473。

- 斯图亚特, 亨利·罗伯特, 卡斯尔雷子爵 (Stewart, Henry Robert, Viscount Castlereagh 1769—1822)——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殖民和陆军大臣 (1805—1806 和 1807—1809)、外交大臣 (1812—1822), 英国政府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429。
- 斯图亚特, 帕特里克 (Stewart, Patrick)——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议会议员 (1835—1836)。——422, 461—463, 467。
- 斯图亚特-沃特利, 詹姆斯·阿奇博尔德 (Stuart-Wortley, James Archibald 1805—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 (1835—1837 和 1842—1859)。——425。
- 斯托——见比彻-斯托, 哈丽雅特·伊丽莎白。
- 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列维奇 (Святослав Игоревич 942 左右—972)——基辅大公 (945 左右—972)。——261, 718。
- 松容 (Songeon)——法国民主主义者, 1848 年革命时期是巴黎工人秘密革命团体的成员; 曾流亡伦敦; 19 世纪 80 年代是巴黎市参议会议长。——577。
- 苏楚, 若安 (Suțu, Joan [Sutzo Joan])。——260。
- 苏尔特, 尼古拉·让, 达尔马提亚公爵 (Sault, Nicolas-Jean, duc de Dalmatia 1769—1851)——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元帅, 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1808—1814 年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任法军指挥官, 七月王朝时期任陆军大臣 (1830—1834 和 1840—1845)、外交大臣 (1839—1840) 和首相 (1832—1834, 1839—1840 和 1840—1847)。——231。
- 苏路克, 法斯廷 (Soulouque, Faustin 1782 左右—1867)——海地共和国总统 (1847—1849), 1849 年自立为帝, 称法斯廷一世。——300。
- 苏沃洛夫,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 (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30—1800)——俄国元帅和军事理论家, 七年战争 (1756—1763) 和俄土战争 (1768—1774 和 1787—1791) 的参加者, 曾率兵完成向意大利和瑞士的远征 (1799); 保罗一世执政时被黜; 著有《团谕》和《制胜的科学》等军事理论著作。——392, 532。
- 绥夫特, 乔纳森 (Swift, Jonathan 1667—1745)——爱尔兰作家。——257。
- 索尔特, 泰特斯 (Salt, Titus 1803—1876)——英国厂主。——380, 487。
- 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公元前 497 左右—406)——古希腊剧作家, 古典悲剧作家。——431。
- 索伊莫诺夫, 费多尔·伊万诺维奇 (Соймонов,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1800—

1854)——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时期任多瑙河和克里木俄军指挥官(1853—1854),在因克尔曼战役中阵亡。——551。

T

塔克尔(Tacker, E.)——英国出版商。——639。

泰霍夫,古斯塔夫·阿道夫(Techow, Gustav Adolf 1813—1893)——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柏林攻占军械库的参加者,普法尔茨革命军参谋长(1849),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成为瑞士的流亡者组织“革命集中”的领导人之一;1852年迁居澳大利亚。——564—566、574、577、588。

泰季谢夫,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Татищев, Дмитрий Павлович 1767—1845)——俄国外交官,曾任驻马德里公使(1815—1821),俄国出席维罗那会议的代表(1822),驻维也纳大使(1826—1841)。——192、216。

泰勒,赫伯特(Taylor, Herbert 1775—1839)——英国将军,曾任国王威廉四世的私人秘书(1830—1837)。——452、455、456。

坦普尔——见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唐·佩德罗——见佩德罗一世。

汤顿男爵——见拉布谢尔,亨利,汤顿男爵。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234。

提普·萨希布(Tippu Sahib 1749左右—1799)——迈索尔的执政者(1782—1799),反对东印度公司的扩张政策,在同英国的战争中阵亡。——165。

帖木儿(跛帖木儿)(Timür-i-lang[Tamerlane]1336—1405)——中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帖木儿王朝(1370—1507)的创立者。——144、223。

图克,托马斯(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者,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614。

图古特男爵,约翰·阿马多斯·弗兰茨·德·保拉(Thugut, Johann Amadeus Franz de Paula, Baron 1736—1818)——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驻君士坦丁堡代办(1769—1771)和公使(1771—1776)、驻华沙公使(1780—1783)、

- 驻那不勒斯公使(1787—1789)、外交大臣(1793—1800)。——260。
- 托马斯(圣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意大利经院神学家和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60、67。

W

-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莱奥(Waldeck, Benedikt Franz Leo 1802—1870)——普鲁士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副议长和左翼领导人之一;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和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议员(1867年起);进步党的领袖。——34、36。
- 瓦列夫斯基伯爵,亚历山大·弗洛里安·约瑟夫·科隆纳(Walewski, Alexandre-Florian-Joseph Colonna, comt de 1810—1868)——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曾任驻伦敦大使(1851)、外交大臣(1855—1860);拿破仑第一和波兰的瓦列夫斯卡娅伯爵夫人的儿子。——419。
- 瓦斯伯爵,赛米尔(Vass [Wass], Sámuel, Graf 约生于1815年)——匈牙利革命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1850),1859年回到匈牙利。——14。
- 威尔逊,詹姆斯(Wilson, James 1805—1860)——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1847—1859),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曾任财政大臣(1853—1858),印度财务大臣(1859—1860);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176。
- 威尔逊-帕滕,约翰(Wilson-Patten, John 1802—1892)——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680。
- 威兰德,弗兰西斯(Wayland, Francis 1796—1865)——美国神学家、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曾任普罗维登斯大学校长;著有伦理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通俗教科书。——711。
- 威廉-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Wilhelm Friedrich Ludwig 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称威廉一世(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35。
- 威廉一世(William I 1772—1843)——荷兰国王(1813—1840)和比利时国王(1815—1830)。——427。
- 威廉三世(奥伦治的)(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尼德兰总督

- (1672—1702), 英国国王(1689—1702)。——62、161、162、167、402、455。
- 威廉四世(William IV 1765—1837)——英国国王(1830—1837)。——419、437、443、452—456、474—475。
- 威廉斯, 威廉(Williams, William)——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会议员(1853)。——54、79。
- 威灵顿公爵, 阿瑟·韦尔斯利(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 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 英军总司令(1827—1828、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181、222、400、404、428、438、460、469、497、507。
- 威斯特华伦, 斐迪南·奥托·威廉·亨宁·冯(Westphalen, Ferdinand Otto Wilhelm Henning von 1799—1876)——普鲁士政治活动家, 曾任内务大臣(1850—1853); 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34—35。
- 威斯特摩兰伯爵, 约翰·费恩(Westmorland, John Fane, Earl of 1784—1859)——英国外交官, 曾任驻柏林公使(1841—1851)、维也纳公使(1851—1855)。——259、267、282、302、337。
- 韦克, 路易(Weck, Louis)——瑞士政论家, 1853年弗赖堡起义的参加者。——99。
- 韦克贝克尔, 彼得(Weckbecker, Peter Ritter von 1808—1871)——奥地利外交官, 1853年任驻士麦那总领事。——216、238。
- 维迪尔, 茹尔(Vidil, Jules)——法国军官, 社会主义者, 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领导人;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发生联系。——574、577、589。
- 维多克, 弗朗索瓦·欣仁(Vidocq, François-Eugène 1775—1857)——法国的刑事犯, 后为巴黎治安警察局长; 一般认为《维多克回忆录》(1828)一书出自他的手笔; 他的名字已成为狡猾的密探和骗子等的代名词。——48、402。
-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197、219、292、293、322、325、416、427、437、475、626、632、637。
- 维尔穆特, 卡尔·格奥尔格·路德维希(Wermuth, Carl Georg Ludwig 1803—1867)——德国警官, 汉诺威警察局长,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和原告证人; 同施梯伯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578。
- 维尔特, 格奥尔格(Weerth, Georg 1822—1856)——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共产主

- 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50。
- 维卡里,海尔曼·冯(Vicari, Hermann von 1773—1868)——德国天主教高级僧侣,1842年起为弗赖堡(巴登)大主教。——594。
- 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Vittorio Emanuel II 1820—1878)——撒丁国王(1849—1861),意大利国王(1861—1878)。——595。
- 维莱尔伯爵,让·巴蒂斯特·赛拉芬·约瑟夫(Villèle, Jean-Baptiste-Séraphin-Joseph, comte de 1773—1854)——法国国务活动家,正统主义者,曾任首相(1822—1828)。——179、227、451。
-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鲁士军官,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为志愿军团首领;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同卡·沙佩尔一起组成反对马克思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3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任将军。——48、51、561—591。
- 维斯康蒂公爵夫人——见阿尔康纳蒂·维斯康蒂侯爵夫人,康斯坦扎。
- 维耶雷,路易(Wuilleret, Louis 1815—1898)——瑞士法学家和国务活动家,教权主义者,弗赖堡州保守党领导人;曾因涉嫌参加1853年弗赖堡起义而被捕。——99。
- 魏德迈,约瑟夫(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军官、新闻工作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846—1847),《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编辑;曾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1846);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编辑(1849—1850),共产主义者同盟法兰克福区部领导人(1849—1851);1851年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588、652—655、670—676。
- 魏特林,克里斯蒂安·威廉(Weitling, 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职业是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工人同盟的创始人,《工人共和国》杂志的出版者;1849年流亡美国,晚年接近国际工人协会。——654。
- 翁格恩-施特恩堡男爵,恩斯特·威廉(Унгерн-Штернберг, Эрнст Вильгельм)——俄国外交官,50年代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270。
- 沃龙佐夫公爵,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Воронцов,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князь

- 1782—1856)——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曾任高加索驻军司令和高加索总督(1844—1854)。——522、532、555、645。
- 沃伦,查理(Warren, Sir Charles 1798—1866)——英国军官,1858年起为将军,曾在印度任职(1816—1819和1830—1838);克里木战争参加者(1854)。——248。
- 沃姆斯利,乔舒亚(Walmsley, Joshua 1794—1871)——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238。
- 沃特利——见斯图亚特-沃特利,詹姆斯·阿奇博尔德。
- 沃伊诺维奇伯爵,马尔科·伊万诺维奇(Войнович, Марко Иванович, граф 死于1807年)——俄国海军军官,达尔马提亚人,1801年起为海军上将;1781年曾率部远征,意在里海东岸一个岛上修筑防御工事,但未成功。——122。
-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亲土耳其分子;30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议会议员(1847—1852);《自由新闻》(1866年起改名为《外交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1855—1877);议会议员。——31、129、295、321、358、362、377、452—456、464、639、727—729。
- 乌泽纳,奥古斯特(Usener, August 生于1818年)——普鲁士军官,德国和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曾在奥地利和英国的警察机关供职,威·赫尔的火箭工厂工人(1853)。——96、98。
- 伍德,查理(Wood, Charles 1800—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46—1852),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2—1855),海军首席大臣(1855—1858),印度事务大臣(1859—1866),掌玺大臣(1870—1874)。——102—104、125、132—135、137、138、151—152、195、198、199、204、206、253、299、304、663。

X

- 希尔,理查·莱勒(Sheil, Richard Lalor 1791—1851)——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和剧作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445、446、457。
- 希尔施,威廉(Hirsch, Wilhelm)——德国店员,19世纪50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探,曾伪造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文件。——48—52、95、561、580—582。

- 希卡内德,艾曼努埃尔(Schikaneder, Emanuel 1751—1812)——奥地利演员、歌唱家和作家,歌剧《魔笛》的词作者。——716。
- 悉尼——见赫伯特,悉尼,利男爵。
- 悉尼,菲利浦(Sidney, Philip 1554—1586)——英国诗人,内侍官和外交官。——318。
- 西哀士,艾曼纽埃尔·约瑟夫(Sieyès, Emmanuel-Joseph 1748—1836)——法国教士和宪法理论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温和的君主立宪派(斐扬派);后为元老院议员,1815年国王路易十八复辟后被放逐,定居布鲁塞尔,1830年7月回到巴黎;《第三等级是什么?》一书作者。——81。
- 西德茅斯子爵,亨利·阿丁顿(Sidmouth, Henry Addington, Viscount 1757—1844)——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兼财政大臣(1801—1804),掌玺大臣(1806—1807),内务大臣(1812—1821)。——401。
- 西尔莫伊伯爵,帕尔(Szirmay, Pál, Graf 1804—1883)——匈牙利革命家,科苏特的拥护者,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经巴黎流亡伦敦;1855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51。
- 西摩尔,乔治·汉密尔顿(Seymour, George Hamilton 1797—1880)——英国外交官,曾任驻彼得堡(1851—1854)和维也纳(1855—1858)公使。——274、305、347。
-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713。
- 席勒,弗里德里希·冯(Schiller, Friedrich von 1759—1805)——德国诗人、作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670。
- 席勒,沙尔(Schiller, Charles)——法国新闻工作者。——110、268、274。
- 席利,维克多(Schily, Victor 1810—1875)——德国法学家,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秘密组织“革命集中”的成员,1852年迁居法国;国际会员,曾帮助总委员会巩固在巴黎的国际,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564、584。
- 席梅尔普芬尼希(奥耶的),亚历山大(Schimmelpfennig von der Oye, Alexander 1824—1865)——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巴登的斗争以及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

- 流亡英国,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有联系;1858年迁居华盛顿,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584、587。
- 咸丰(1831—1861)——中国清朝皇帝(1850—1861)。——115、119。
- 谢吉布埃芬蒂(Schekib Effendi[Shekib Effendi])——土耳其官员。——238。
- 谢加赖(Chegaray)——法国经济学家。——693。
- 谢努,雅克·埃蒂耶纳·阿道夫(Chenu, Jacques-Étienne-Adolphe 生于1816年)——法国七月王朝时期一些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奸细和密探。——48。
- 谢特奈尔,奥古斯特·斐迪南(Schärtner, August Ferdinand 1817—1859)——德国制桶匠,1848—1849年革命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伦敦,开设小酒店,酒店成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地;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为该集团中央委员会委员。——568。
- 欣克尔代,卡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冯(Hinckeldey, Karl Ludwig Friedrich von 1805—1856)——普鲁士政府官员,1848年起为柏林警察局长,1853年起为内务部警察司司长。——34—36。
- 休谟,约瑟夫(Hume, Joseph 1777—1855)——英国政治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54、80、137、220、416、421、426—429、471、476、523、663。

Y

- 亚当(Adam)——法国制革工人,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成员,1850年是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591。
-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在哲学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柏拉图的学生。——196。
-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6、376、420、427。
- 亚历山大一世·卡拉乔治维奇(Aleksander I. Karageorgević 1806—1885)——塞尔维亚大公(1842—1858)。——260、321、535、614、637。
- 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Александра Федоровна 1798—1860)——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的皇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女儿。——474。

- 亚眠的彼得——见隐士彼得或亚眠的彼得。
- 亚述巴尼拔(萨尔达尼拔)(Assurbanipal [Sardanapalus] 约生于公元前 626 年)——亚述国王(公元前 668—约 626)。——308。
- 叶卡捷琳娜二世(喀德邻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39, 122, 474。
- 伊伯男爵——见格罗夫纳, 罗伯特勋爵, 伊伯男爵。
-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英国女王(1558—1603)。——161, 166。
- 伊林斯基, 亚历山大(伊斯肯德贝伊)(Ilinski, Alexander [Iskander Bey] 1810—1861)——土耳其将军, 原籍波兰,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 称伊斯肯德贝伊, 在土耳其供职; 1853—1854 年在多瑙河, 1855 年在克里木, 1855—1856 年在高加索任土军指挥官。——339。
- 伊塞特帕沙(Izzet Pasha)——土耳其将军, 1853 年任巴尔干半岛驻军指挥官, 1853—1854 年任贝尔格莱德军事总督。——339。
- 伊斯尔梅捷夫,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Изыльметьев, Ив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813—1870)——俄国海军上将, 1853—1854 年任阿芙乐尔号巡航舰舰长。——625—627。
- 伊斯迈尔帕沙(Ismail Pasha 1805—1861)——土耳其将军, 原籍切尔克西亚, 1853—1854 年任多瑙河土军指挥官。——535。
- 伊斯迈尔帕沙(Ismail Pasha 原名乔治·克梅蒂 György Kmety 1810—1865)——土耳其将军, 原籍匈牙利;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并加入土耳其国籍, 被封为伊斯迈尔帕沙; 克里木战争期间先在多瑙河(1853—1854), 后在高加索(1854—1855)任土军指挥官。——535。
- 伊索(Aesop [Aisopos] 公元前 6 世纪)——古希腊寓言作家。——57。
- 伊万迪斯(Ivandis [Yvandis])——瓦拉几亚内政部某司司长。——320。
- 伊万四世·瓦西里耶维奇(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 1530—1584)——俄国沙皇(1547—1584)。——718。
- 伊文思, 乔治·德·莱西(Evans, George de Lacy 1787—1870)——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克里木战争期间任师长(1854)。——413, 420, 446。
- 易卜拉欣帕沙(Ibrahim Pasha 1789—1848)——埃及统帅, 曾率领土耳其军队镇压希腊的起义者(1824—1828), 在埃及对土耳其的战争(1831—1833 和

- 1839—1841)中任埃及军队总司令;1844年起为埃及的共同摄政者;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里的义子。——433、436—440、443。
- 隐士彼得或亚眠的彼得(Peter l'ermite 或 Peter d'Amiens 1050左右—1115)——法国僧侣和传教士,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时(1096—1099)为农民自卫军的领袖之一。——561、568。
- 英格拉哈姆,邓肯·纳撒尼尔(Ingraham, Duncan-Nathaniel 1802—1891)——美国海軍军官,1853年为圣路易号舰舰长;所谓“士麦那事件”的参与者。——239、338。
- 英格利斯,罗伯特·哈里(Inglis, Robert Harry 1786—1855)——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195、442。
- 尤尔,安德鲁(Ure, Andrew 1778—1857)——英国化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写有工业经济学方面的著作。——95。
- 约翰(无地王)(John Lackland 1167左右—1216)——英国国王(1199—1216)。——29。
- 约翰尼——见罗素,约翰。

Z

- 扎莫伊斯基伯爵,弗拉基斯拉夫(Zamoyski, Wladyslaw, Graf 1803—1868)——波兰将军,大地主,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为流亡巴黎的波兰保守的保皇派集团领导人。——452。
- 泽肯多夫男爵,奥古斯特·亨利希·爱德华·弗里德里希(Seckendorff, August Heinrich Eduard Friedrich Freiherr von 1807—1885)——普鲁士法学家,大法官;第二议院议员,属于中间派(1849—1851);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公诉人。——651。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他同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营幕去，构成了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情节。据传说，阿基里斯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他的身体除没有浸水的脚跟外，不能被任何武器所伤害，后来，他因脚跟，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中箭而身亡。后人用“阿基里斯之踵”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和最弱的一环。——111。

阿耳契娜——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和博雅多的《恋爱中的罗兰》中的人物；凶恶的女巫。——397、456。

阿拉丁——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神灯的所有者。——254。

阿里曼（安格拉·曼纽）——体现世上万恶之源的古波斯神安格拉·曼纽的希腊名字。安格拉·曼纽同体现从善之源的阿胡拉·玛兹达（希腊名字叫奥尔穆兹德）有着永世不可调和的仇恨。——567。

埃林杜尔——阿·缪尔纳的悲剧《罪》中的人物。——52。

奥狄浦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忒拜国王，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奥狄浦斯王》和《奥狄浦斯在科隆纳斯》中的主要人物；传说他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谜语，因而使忒拜城逃脱了吸血怪物的毒手。——196。

奥尔穆兹德——见阿里曼。

B

柏克司尼弗——查·狄更斯的小说《马丁·切斯维特的一生》中的人物，是个伪君子，假好人。——666。

F

疯狂的罗兰——阿里欧斯托的同名长诗中的主人公。——716。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435。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430。

G

甘泪卿——见玛甘泪。

H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379。

哈努曼——印度传说中的神猴，后来被奉为印度教的毗湿奴的化身。——143。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他的12件功绩之一是驯服并抢走地狱之犬塞卜洛士。——83。

何蒙古鲁士——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浮士德的弟子瓦格纳用中世纪的炼金术制造出来的“人造矮人”，但只是一个在曲颈玻璃瓶里面能发光的胎儿形，不能从玻璃瓶中脱化出来，也不能发育。——430。

J

基督——见耶稣基督(基督)。

L

理查三世——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103。

利维坦——据圣经传说，是大海怪。——83。

鲁杰罗——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人物。——397。

M

玛甘泪(甘泪卿)——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一个温柔多情的姑娘。——709。

弥赛亚——圣经中的人物，意即“受膏者”，古代犹太人封君立王时，受封者额上被敷膏油，而受膏者即是上帝派来的使者。——12、39、587。

摩奴——传说中的古印度立法者；《摩奴法典》是婆罗门在1—5世纪这一时期内编纂的。——104、195。

抹大拉的马利亚——据圣经传说，她是基督的继承者，是一个悔过的罪

人。——431。

P

皮蒂娅——古希腊德尔斐城阿波罗神殿的女巫。——619。

匹克威克——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主要人物。——417。

S

萨米尔(萨马伊尔)——犹太神话中的众魔之王,也是死神的化身。——576。

撒巴拉——印度传说中的神牛,在印度教中被奉为财富和土地之神。——143。

塞卜洛士——古希腊神话中看守地狱大门的三头犬,凶暴的守卫者的象征。——83。

桑乔·潘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珂德》中的人物,唐·吉珂德的侍从。——663、728。

山姆大叔——美国资产阶级的谑称,由英语“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缩写“U. S. Am.”组成,流传很广。——277。

沙辛曼——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东方的君主。——222。

山鲁亚尔——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东方的君主。——222。

所罗门——古犹太王;在中世纪的文学中,特别在东方的文学中以英明公正的君主著称。——35。

T

汤姆叔叔——比彻·斯托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主要人物。——667。

唐·吉珂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225、401、663、718。

W

瓦格纳——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人物,浮士德的门生;崇尚空论、脱离生活的烦琐者的典型。——430。

温克尔里德,阿尔诺德——据圣经传说是瑞士武士,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人民英雄;相传瑞士人同奥军在森帕赫城下作战时,他舍身杀敌使瑞士人获胜,是史诗《森帕赫之歌》中的主人公。——568。

Y

亚当——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据《创世记》记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

创造的第一个男人。——591。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569、578。

约翰牛——18世纪英国作家约·阿巴思诺特在1712年写的政治讽刺小说《约翰牛传》中塑造的人物——一个急躁、坦率、滑稽的绅士形象,用以影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英国人。后来此名成为英国或英国人的绰号,广为流传。——210、297、708。

Z

札格纳特——古印度教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之一。——138、251、349。

祖莱卡——歌德的诗歌《致祖莱卡》中的主人公。——144。

文 献 索 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 [《波斯进军阿富汗和俄国进军中亚。——丹麦。——多瑙河和亚洲的军事行动。——威根的矿工》], 载于 1853 年 11 月 1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28 号([Persian expedition in Afghanistan and Russian expedition in Central Asia - Denmark - The fighting the Danube and in Asia - Wigan collier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28, 18. November 1853.)。——510。
- 《柏林密谋》, 载于 1853 年 4 月 1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45 号(The Berlin conspirac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45, 18. April 1853.)。——44。
-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载于 1853 年 8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40 号(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40, 8. August 1853.)。——366。
- 《大陆和英国的情况》, 载于 1853 年 9 月 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64 号(Affairs continental and English.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64, 5. September 1853.)。——493。
- 《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查理·伍德爵士的东印度改革》, 载于 1853 年 6 月 2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01 号(The Russian humbug - Gladstone's failure - Sir Charles Wood's East Indian reform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01, 22. Juni 1853.)。——275。
- 《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宪章运动》, 载于 1853 年 7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19 号(Russian policy against Turke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19, 14. Juli 1853.)。——227。

- 《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诡计和诡辩。——涅谢尔罗德最近的照会。——东印度问题》，载于1853年7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28号（The Russo-Turkish difficulty - Ducking and dodging of the British Cabinet - Nesselrode's last note - The East-India ques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28, 25. Juli 1853.）。——200。
- 《菲格斯·奥康瑞尔。——内阁的失败。——预算》，载于1853年5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58号（Feargus O'Connor - Ministerial defeats - The budge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58, 3. Mai 1853.）。——78、192。
- 《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载于1853年3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10号（The attack on Francis Joseph - The Milan riot - British politics - Disraeli's speech - Napoléon's will.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10, 8. März 1853.）。——46。
- 《工人问题》，载于1853年11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36号（The labor ques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36, 28. November 1853.）。——547。
- 《广告税。——俄国的行动。——丹麦。——合众国在欧洲》，载于1853年8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50号（Advertisement duty - Russian movements - Denmark - The United States in Europ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50, 19. August 1853.）。——282。
- 《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颠国债的兑换。——印度、土耳其和俄国》，载于1853年6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0号（Affairs in Holland - Denmark - Conversion of the British debt - India, Turkey, Russ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90, 9. Juni 1853.）。——109。
-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波士顿版（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 Boston 1853.）。——561、564、579—585、673—675。
-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巴塞尔版（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 Basel 1853.）。——561、651。
- 《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载于1853年5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61号（Riot at Constantinople - German table moving - The budge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61, 6. Mai 1853.）。——193。

- [《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普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 载于 1853 年 4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33 号([Kossuth and Mazzini - Intriguers of the Prussian government - Austro-Prussian commercial treaty - "The Times" and the refugee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33, 4. April 1853.). ——4。
- 《马志尼。——瑞士和奥地利。——土耳其问题》, 载于 1853 年 6 月 1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91 号(Mazzini - Switzerland and Austria - The Turkish ques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91, 10. Juni. 1853.). ——125、348。
- 《米哈伊尔·巴枯宁》, 载于 1848 年 8 月 3 日《新莱茵报》(科隆)第 64 号(Michail Bakunin.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64, 3. August 1848.). ——328。
- 《缅甸战争。——俄国问题。——外交官的有趣信件》, 载于 1853 年 7 月 3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33 号(War in Burmah - The Russian question - Curious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33, 30. Juli 1853.). ——493。
- 《内阁的成就》, 载于 1853 年 4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53 号(Achievements of the ministr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53, 27. April 1853.). ——129。
- 《帕麦斯顿和俄国》, 载于 1853 年《政治飞行传单》(伦敦)第 1 期(Palmerston and Russia. In: Political Fly-Sheets. Nr. 1. London[1853].). ——639。
- 《帕麦斯顿和俄国》, 载于 1853 年 11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16 号(Palmerston and Russ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16, 4. November 1853.). ——639。
- 《贫困和自由贸易。——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 载于 1852 年 11 月 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01 号(Pauperism and Free Trade - The approaching commercial crisi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01, 1. November 1852.). ——354。
- [《土耳其宣言。——法国经济状况》], 载于 1853 年 10 月 3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12 号([The Turkish manifesto - France's economic posi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12, 31. Oktober 1853.). ——502。
- [《维也纳照会。——美国与欧洲。——舒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

- 载于 1853 年 9 月 2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81 号([The Vienna note -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 Letters from Shumla - Peel's bank act.]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81, 24. September 1853.)。——364、482。
- [《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印度的铁路建设》], 载于 1853 年 10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89 号([The Western powers and Turkey - Imminent economic crisis - Railway construction in India.]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89, 4 Oktober 1853.)。——368。
- 《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便士》, 载于 1853 年 4 月 16 日《人民报》(伦敦)第 50 期(The new financial juggle; or Glastone and the Pennies. [Gez]; C. M.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50, 16. April 1853.)。——129。
- 《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 载于 1853 年 2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86 号晚上版(Elections - Financial clouds - The Duchess of Sutherland and slaver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86, 8. Februar 1853, 1. evening ed.)。——209、487。
- 《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 载于 1853 年 2 月 2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01 号(The Italian insurrection - British politic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01, 25. Februar 1853.)。——595。
- 《议会辩论。——僧侣反对社会主义。——饿死人》, 载于 1853 年 3 月 1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16 号(Parliamentary debates - The clergy against socialism - Starva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16, 15. März 1853.)。——208。
- 《英国的繁荣。——罢工。——土耳其问题。——印度》, 载于 1853 年 7 月 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09 号(English prosperity - Strikes - The Turkish question - Ind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09, 1. Juli 1853.)。——155、186。
- [《在下院中。——报刊论东方问题。——沙皇宣言。——丹麦》], 载于 1853 年 8 月 1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47 号([In the House of Commons - The press on the Eastern question - The Czar's manifesto - Denmark.]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47, 16. August 1853.)。——273。
- 《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 载于 1853 年 10 月 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04 号(The war question - Financial matters - Strike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04, 21. Oktober 1853.)。——614。

- 《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载于1853年8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38号(The war question - Doings of Parliament - Ind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38, 5. August 1853.)。——200、357。
- 《战争问题。——不列颠的人口和贸易报告书。——议会动态》,载于1853年8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54号(The war question - British population and trade returns - Doings of Parliamen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54, 24. August 1853.)。——484、490、524。
- 《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出租马车。——爱尔兰。——俄国问题》,载于1853年8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44号(Financial failure of government - Cabs - Ireland - The Russian ques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44, 12. August 1853.)。——287。
- 《政局展望。——商业繁荣。——饿死人事件》,载于1853年2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81号(Political prospects - Commercial prosperity - Case of starva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81, 2. Februar 1853.)。——354。
-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载于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4号(Revolution in China and in Europ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94, 14. Juni 1853.)。——513。

弗·恩格斯

- 《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载于1848年9月10日《新莱茵报》(科隆)第99号(Der dänisch-preußische Waffenstillstand.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99, 10. September 1848.)。——100—101。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署名]:卡尔·马克思,载于1851年10月25、28日、11月6、7、12、18日和1852年2月27日、3月5、15、18、19日、4月9、17、24日、7月27日、8月9日、9月18日、10月2、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283、3285、3293、3294、3298、3312、3395、3398、3403、3406、3407、3425、3432、3438、3517、3534、3564、3576、3594号《德国栏》(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Germany. [Gez.]; Karl Marx.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1851. Nr. 3283, 25. Okt. ; Nr. 3285, 28. Okt. ; 3293, 6. Nov. ; Nr. 3294, 7. Nov. ; Nr. 3298, 12. Nov. ; Nr. 3312, 28. Nov. - 1852. Nr. 3389, 27. Febr. ; Nr. 3395, 5. März; Nr. 3403, 15. März; Nr. 3406, 18. März; Nr. 3407, 19. März; Nr. 3425, 9. April; Nr. 3432, 17. April; Nr. 3438, 24. April; Nr. 3517, 27. Juli; Nr. 3534, 19. Aug. ; Nr. 3564, 18.

- Sept. ;Nr. 3576, 2. Okt. ;Nr. 3594, 23. Okt. Rubrik: Germany.)。——264、329。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1—3期(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s-Campagne.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York. 1850. H. 1—3.)。——570、572。
《俄军在土耳其》，载于1853年10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0号(The Russians in Turke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00, 17. Oktober 1853.)。——527—528。
〔(和丹麦的休战)〕，载于1848年7月22日《新莱茵报》(科隆)第52号([Der Waffenstillstand mit Dänemark.]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52, 22. Juli 1848.)。——100—101。
《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载于1849年2月15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22号(Der demokratische Panslavismus.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22, 15. Februar 1849.)。——329。
《瑞士的内战》，载于1847年11月14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91号(Der Schweizer Bürgerkrieg. In: 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 Nr. 91, 14. November 1847.)。——88。
《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载于1853年11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19号(Movements of the armies in Turke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19, 8. November 1853.)。——527。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载于1853年11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34号(The progress of the Turkish war.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34, 25. November 1853.)。——534。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11月17日左右》，载于1853年12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44号(Progress of the Turkish war. About November 17, 1853.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44, 7. Dezember 1853.)。——614。
《最近的科隆案件》。〔署名〕：卡尔·马克思，载于1852年12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45号(The late trial at Cologne. [Gez.]: Karl Marx.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45, 22. Dezember 1852.)。——35、9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载于1851年6月28

- 日《德累斯顿新闻通报》第 177 号([Ansprache der Zentralbehörd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vom März 1850.]In: *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 Nr. 177, 28. Juni 1851.)。——579。
-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850 年 9 月 15 日》(Protokoll der Sitzung der Zentralbehörd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vom 15. September 1850.)。——567、578。
- 《流亡中的大人物》1852 年版(*Die großen Männer des Exils*. 1852.)。——49、562。
- 《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 载于 1853 年 10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00 号(*Panic on 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 - Strike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00, 17. Oktober 1853.)。——524。
- [《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 载于[《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起诉书][1852 年科隆版]([*Erklärung über den Austritt aus dem Londoner Arbeiterbildungsverein*.] In: *Anklageschrift [zum Kölner Kommunisten Prozeß]*. [Cöln 1852].)。——567。

其他作者的著作^①

A

- 阿伯丁, [乔·][《给威廉·蒙塞尔的信。1853 年 6 月 3 日》], 载于 1853 年 6 月 6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447 号(Aberdeen, [G.]:[*Brief an William Monsell*, 3. Jun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47, 6. Juni 1853.)。——131 — 132。
- 阿伯丁, [乔·][《1852 年 12 月 27 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 1852 年 12 月 28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310 号(Aberdeen, [G.]:[*Rede in House of Lords*, 27. Dezember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10, 28. Dezember 1852.)。——54。
- 阿伯丁, [乔·][《1853 年 3 月 4 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 1853 年 3 月 5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368 号(Aberdeen, [G.]:[*Rede im House of Lords*, 4. März

①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的著作的版本, 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放在四角括号[]内的是已经查清的作者姓名。

1853.]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68, 5. März 1853.)。——4。
- 阿伯丁, [乔·][《1853年7月7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7月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75号(Aberdeen,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7. Juli 1853.]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5, 8. Juli 1853.)。——207。
- 阿伯丁, [乔·][《1853年8月12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8月1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506号(Aberdeen,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12. August 1853.]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06, 13. August 1853.)。——301、307。
- 阿伯丁, [乔·][《1853年11月9日在市长就职宴会上的演说》], 载于1853年11月1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582号(Aberdeen, [G.]: [Rede auf dem Bankett anlässlich des Lord Mayor's Day am 9. November 1853.]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82, 10. November 1853.)。——723—724。
- 阿尔比马尔, 乔·[《1853年7月1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7月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70号(Albemarle,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1. Juli 1853.]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0, 2. Juli 1853.)。——243。
- 阿特伍德, [托·][《1833年8月28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3年伦敦版第20卷(Attwood, [Th.]: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8. August 1833.]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0. London 1833.)。——456。
- 阿特伍德, [托·][《1837年12月14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8年伦敦版第39卷(Attwood, [Th.]: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4. Dezember 1837.]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39. London 1838.)。——476。
- 埃尔施, 约·赛·/约·哥·格鲁伯《科艺全书》(共167卷)1832年莱比锡版第22卷(Ersch, J. S./J. G. Gruber: Allgemeine Enzyk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Bd. 1—167. Bd. 22. Leipzig 1832.)。——72。
- 埃伦伯勒, [爱·][《1853年7月7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7月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75号(Ellenborough, [E.]: [Rede im House of Lords, 7. Juli 1853.]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5, 8. Juli 1853.)。——205。
- 埃斯科特, [比·][《1847年3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7年伦敦版第91卷(Escott, [B.]: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März 1847.]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91. London

- 1847.)。——429。
- [艾韦贝克,海·](斯拉夫人在波希米亚的斗争……7月3日巴黎†[通讯]),载于1848年7月6日《新莱茵报》(科隆)第36号([Ewerbeck, H.]: *Den Kämpfen der Slawenrace in Böhmen...* [Korrespondenz:]† Paris, 3. Juli.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36, 6. Juli 1848.*)。——327。
- 安东,古·(致《祖国报》编辑先生),载于1851年3月7日《祖国报》(巴黎)第66号(Antoine, G.: *A M. le rédacteur du journal la Patrie.* In: *La Patrie. Paris, Nr. 66, 7. März 1851.*)。——589。
-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俄土同盟条约的特别条款。1833年7月8日》,载于1836年《公文集》(伦敦)第3卷第26号(Unkiar Skelessi; *Separate article of the Treaty of Alliance concluded between Russia and Turkey on the 26th June (8th July) 1833, (communicated to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by the Prince of Lieven on the 16th of January, 1834.) (Translation.)* In: *The Portfolio. Vol. 3. Nr. 26. London 1836.*)。——434, 448—453。
- 安斯蒂,[托·奇·]〔(1834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4年伦敦版第22卷(Anstey, [Th. C.]: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7. März 1834.]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2. London 1834.*)。——445。
- 安斯蒂,[托·奇·]〔(1848年2月8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8年伦敦版第96卷(Anstey, [Th. C.]: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8. Februar 1848.] In: *Hansard's parliamentay debates. Vol. 96. London 1848.*)。——443, 457。
- 安斯蒂,[托·奇·]〔(1848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8年伦敦版第96卷(Anstey, [Th. C.]: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3. Februar 1848.] In: *Hansard's parliamentay debates. Vol. 96. London 1848.*)。——419, 437, 444, 452—455, 470。
- 奥勃莱恩,[威·斯·]〔(1847年3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7年伦敦版第91卷(O'Brien, [W. S.]: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März 1847.] In: *Hansard's parliamentay debates. Vol. 91. London 1847.*)。——427。
- 奥康奈尔,[丹·]〔(1837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7年伦敦版第37卷(O'Connell, [D.]: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7.

- März 1837.]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37. London 1837.). — 471。
- 奥日埃, J.《最新消息……》, 载于 1853 年 5 月 26 日《国家报》(巴黎)第 146 号 (Augier, J.: Les dernières nouvelles... In: Le Pays. Paris. Nr. 146, 26. Mai 1853.). — 110。

B

- 《巴克豪斯先生同乌尔卡尔特先生的通信》, 载于 1839 年 1 月 25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16948 号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r. Backhouse and Mr. Urquhart. In: The Times. 16948, 25. Januar 1839.). — 453。
- 巴枯宁, 米·《编辑先生》, 载于 1848 年 7 月 11 日《奥得总汇报》(布累斯劳)第 159 号 (Bakunin, M.: Herr Redacteur! In: Allgemeine Oder-Zeitung. Breslau. Nr. 159, 11. Juli 1848.). — 328。
- 巴枯宁, 米·〔致《奥得总汇报》的声明〕, 载于 1848 年 7 月 16 日《新莱茵报》(科隆)第 46 号 (Bakunin, M.: [Erklärung an die "Allgemeine Oder-Zeitung". Breslau. Nr. 159, 11. Juli 1848. Abdr.]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46, 16. Juli 1848. [U. d. T.]: Die A. O.-Z....)。 — 328。
- 巴枯宁, 米·《致斯拉夫人的呼吁》1848 年克滕版 (Bakunin, M.: Aufruf an die Slaven. Von einem russischen Patrioten M. Bakunin. Mitglied des Slavenkongresses in Prag. Koethen 1848.). — 329。
- 巴师夏, 弗·《经济的和谐》1850 年巴黎版 (Bastiat, Fr.: Harmonies économiques. Paris 1850.). — 711。
- 巴师夏, 弗·/[皮·约·]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 年巴黎版 (Bastiat, Fr./[P.-J.]Proudhon: Gratuité du crédit. Discussion entre M. Fr. Bastiat et M. Proudhon. Paris 1850.). — 712。
- 巴泰勒米, 艾·《致〈祖国报〉主编》, 载于 1851 年 3 月 12 日《祖国报》(巴黎)第 71 号 (Barthélemy, E.: Au rédacteur en chef du journal la Patrie. In: La Patrie. Paris. Nr. 71, 12. März 1851.). — 589。
- 帕特, 伊·〔《1853 年 4 月 12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3 年 4 月 13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401 号 (Butt, I.: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2. April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01, 13. April 1853.). — 70。
- 鲍威尔, 布·《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1842 年莱比锡—不伦瑞克版

- (Bauer, B. : 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Bd. 1—3 [3 u. d. T.]: 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und des Johannes. Leipzig, Braunschweig 1841—1842.)。——567。
- 贝克莱, [弗·] [(1853年6月14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6月1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55号 (Berkeley, [F.]: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4. Jun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55, 15. Juni 1853.)。——148。
- 本生, 约·《曼彻斯特的一次重要的大会》, 载于1853年11月26日《人民报》(伦敦)第82期 (Benson, J. : Highly important meeting at Manchester.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82, November 26, 1853.)。——598。
- 波措-迪-博尔哥, 沙·安·《波措-迪-博尔哥伯爵的急电副本。1826年12月22日于巴黎》, 载于1843年9月1日《公文集》(伦敦)第1卷第2号 (Pozzo di Borgo, Ch. A. : Copy of a despatch from Count Pozzo di Borgo, dated Paris, 22nd Dec. 1826. In: The Portfolio. Vol. 1. Nr. 2, Sept. 1st. London. 1843.)。——179—180, 228。
- 波措-迪-博尔哥, 沙·安·《波措-迪-博尔哥伯爵的加急密电副本。1828年11月28日于巴黎》, 载于1836年《公文集》(伦敦)第1卷第7—9号 (Pozzo di Borgo, Ch. A. : Copy of a very secret despatch, from Count Pozzo di Borgo, dated Paris, the 28th November, 1828. In: The Portfolio. Vol. 1. Nr. 7—9. London 1836.)。——180—182, 258。
- 波措-迪-博尔哥, 沙·安·《波措-迪-博尔哥伯爵的加急密电副本。1828年12月14日于巴黎》, 载于1836年《公文集》(伦敦)第2卷第13号 (Pozzo di Borgo, Ch. A. : Copy of a very secret despatch, from Count Pozzo di Borgo, dated Paris, December 14th, 1828. In: The Portfolio. Vol. 2. Nr. 13. London 1836.)。——182。
- 波莱克斯芬, 约·《英国和印度工业生产之间的矛盾, 兼答〈东印度贸易概论〉一书》1697年伦敦版。引自约·拉·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年伦敦版 (Pollexfen, J. : England and India inconsistent in their manufactures; being an answer to a treatise entitled "An essay on the East India trade." London 1697. Nach: J. R. M [a] cCulloch: 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5.)。——167。
- 勃朗, 路·《致〈泰晤士报〉编辑》, 载于1851年3月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0748号 (Blanc, L. :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In: The Times. London. Nr.

- 20748, 5. März 1851.)。——589。
- 博蒙-瓦西, 爱·德·(维也纳会议以来的欧洲各国历史·俄罗斯帝国)1853年巴黎版。引自1853年6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46号(Beaumont-Vassy, E. de; Histoire des états européens depuis le Congrès de Vienne. Empire Russe. Paris 1853. Nach: The Times. London. Nr. 21446, 4. Juni 1853. [U. d. T.]; Letters have been received...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Thursday, June 2, 6 p. m.)。——127。
- 博尼法斯, 路·(我们获得了……), 载于1853年5月26日《立宪主义者报》(巴黎)第146号(Boniface, L.; Nous avons, par Vienne... In: Le Constitutionnel. Paris. Nr. 146, 26. Mai 1853.)。——112。
- 博尼法斯, 路·(我们接到……), 载于1853年10月5日《立宪主义者报》(巴黎)第278号(Boniface, L.; Nous recevons communication... In: Le Constitutionnel. Paris. Nr. 278, 5. Oktober 1853.)。——479。
- 博尼法斯, 路·(最近……), 载于1853年9月5日《立宪主义者报》(巴黎)第248号(Boniface, L.; Par le dernier... In: Le Constitutionnel. Paris. Nr. 248, 5. September 1853.)。——339。
- 布尔沃, [亨·] [(1833年3月11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3年伦敦版第19卷(Bulwer, [H.];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1. März 1833.]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19. London 1833.)。——434。
- 布尔沃, [亨·] [(1833年7月11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3年伦敦版第19卷(Bulwer, [H.];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1. Juli 1833.]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19. London 1833.)。——455。
- 布莱克特, [约·] [(1853年8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8月1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509号(Blackett,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August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09, 17. August 1853.)。——314。
- 布莱特, 约·[(1853年6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6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46号(Bright,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3. Jun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46, 4. Juni 1853.)。——135。
- 布莱特, 约·[(1853年6月27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6月28日《泰晤

- 士报》(伦敦)第 21466 号(Bright,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7. Jun 1853.]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66, 28. Juni 1853.). —201。
- 布莱特, 约·[(1853 年 7 月 1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3 年 7 月 2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470 号(Bright,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0, 2. Juli 1853.). —193—194。
- 布朗基, 路·《伦敦流亡者委员会的路·奥·布朗基公民为 2 月 24 日周年纪念宴会寄来的祝酒词》, 载于 1851 年 2 月 27 日《祖国报》(巴黎)第 58 号(Blanqui, L.: Toste envoyé par le citoyen L. - A. Blanqui à la commission près les réfugiés de Londres, pour le banquet anniversaire du 24 février. In: La Patrie. Paris. Nr. 58, 27. Februar 1851.). —588, 672—673。
- 布鲁姆, [亨·] [(1853 年 7 月 7 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 1853 年 7 月 8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475 号(Brougham, [H.]: [Rede im House of Lords, 7. Juli 1853.]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5, 8. Juli 1853.). —205。

C

- 查普曼, 约·《印度的棉花和贸易及其与大不列颠的利害关系, 兼评孟买管区的铁路交通》1851 年伦敦版(Chapman, J.: The cotton and commerce of India,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Great Britain; with remarks on railway communication in the Bombay Presidency. London 1851.). —248—249。
- [柴尔德, 乔·]《论东印度贸易是最有利于国家的对外贸易》1681 年伦敦版。引自约·拉·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 年伦敦版([Child, J.]: A treatise wherein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East India trade is the most national of all foreign trades, &c. London 1681. Nach: J. R. M[a]cCulloch: 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5.). —166。
- 《出租马车税法案》, 载于 1853 年 8 月 10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503 号(Hackney carriage duties bill.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03, 10. August 1853.). —290。

D

- 《大不列颠、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同奥斯曼帝国之间关于平息黎凡特事件的协定。1840 年 7 月 15 日于伦敦》, 载于《关于黎凡特事件的公文集》(三卷集) [1841 年] 伦敦版第 1 卷(Convention, concluded between the courts of Great

Britain, Austria, Prussia, and Russia, on the one part, and the Sublime Ottoman Porte on the other,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Levant, signed at London, July 15, 1840. In: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the Levant. Pt. 1. London [1841].)。——464。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伦敦版(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211, 288, 377。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阿尔诺德·卢格三巨头及其为现代自由思想的斗争》1852 卡塞尔版(Die Triarier David Friedrich Strauß, Ludwig Feuerbach und Arnold Ruge, und ihr Kampf für die moderne Geistesfreiheit. Kassel 1852.)。——709。

德比, [爱·乔·][《1834 年 3 月 17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4 年伦敦版第 22 卷(Derby, [E. G.]: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7. März 1834.]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2. London 1834.)。——438。

德比, [爱·乔·][《1838 年 6 月 21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8 年伦敦版第 43 卷(Derby, [E. G.]: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1. Juni 1838.]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43. London 1838.)。——470, 477。

德比, [爱·乔·][《1853 年 7 月 7 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 1853 年 7 月 8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475 号》(Derby, [E.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7. Juli 1838.]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5, 8. Juli 1853.)。——207。

德克尔, 卡尔·冯·《从现代军事观点看小型战争。或论所有三个兵种在小型战争中的运用和使用》1822 年柏林第 1、2 版(Decker, C. von: Der kleine Krieg im Geiste der neueren Kriegführung. Oder: Abhandlung über die Verwendung und den Gebrauch aller drei Waffen im kleinen Kriege. 1. u. 2. Aufl. Berlin 1822.)。——561。

德朗克, 恩·《布朗基。(摘自恩·德朗克《巴黎革命回忆录》手稿), 载于 1853 年 5 月 4 日《改革报》(纽约)第 10 期(Dronke, E.: Blanqui. (Aus einem Manuscript: "Pariser Revolutions-Memoiren von Ernst Dronke".) In: Die Reform. New York. Nr. 10. 4. Mai 1853.)。——672。

德鲁安-德路易斯, [爱·][《今天早晨……[1853 年 6 月 25 日周知照会摘录]》], 载于 1853 年 7 月 15 日《晨邮报》(伦敦)第 24825 号(Drouyn de Lhuys, [E.]:

- The Moniteur of this morning... [Auszug aus der Zirkularnote vom 25. Juni 1853.] In: The Morning Post. London. Nr. 24825, 15. Juli 1853.)。——227。
- 德鲁安·德路易斯, [爱·] (下面是……[1853年7月15日周知照会]), 载于1853年7月1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83号(Drouyn de Lhuys, [E.]: The following is a translation... [Zirkularnote, 15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83, 18. Juli 1853.)。——235。
- 德拉奥德, 律·(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1850年巴黎版(De la Hodde, L.: La naissance de la République en Février 1848. Paris 1850.)。——48。
- 狄金逊, 约·(官僚制度下的印度管理)1853年伦敦—曼彻斯特版(Dickinson, J.: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under a bureaucracy. London, Manchester 1853. India Reform. Nr. 6.)。——103, 170, 198, 202—203, 247。
- 迪斯累里, [本·] [(1852年12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2年12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290号(Disraeli, [B.]: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3. Dezember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290, 4. Dezember 1852.)。——72。
- 迪斯累里, [本·] [(1852年12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2年12月1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01号(Disraeli, [B.]: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Dezember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01, 17. Dezember 1852.)。——81。
- 迪斯累里, [本·] [(1853年3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3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67号(Disraeli, [B.]: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3. März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67, 4. März 1853.)。——80。
- 迪斯累里, [本·] [(1853年4月8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4月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98号(Disraeli, [B.]: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8. April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98, 9. April 1853.)。——56—59, 64, 67。
- 迪斯累里, [本·] [(1853年7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7月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75号(Disraeli, [B.]: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7.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5, 8. Juli 1853.)。——206。

E

- 恩格尔, 约·雅·(王公明镜)1798年柏林版(Engel, J. J.: Fuerstenspiegel. Berlin

1798.)。——653。

F

法耳梅赖耶尔, 雅·菲·《东方来信片断》1845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第1—2卷(Fallmerayer, J. Ph.: Fragmente aus dem Orient. Bd. 1. 2. Stuttgart, Tübingen 1845.)。——262。

菲茨威廉, [查·][《1853年7月7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7月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75号(Fitzwilliam, [Ch.]: [Rede im House of Lords, 7. Juli 1853.]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5, 8. Juli 1853.)。——207。

《废除广告税》, 载于1853年8月5日《纪事晨报》(伦敦)第27025号(Abolition of the advertisement duty. In: The Morning Chronicle. London. Nr. 27025, 5. August 1853.)。——273。

福布斯, 查·《致〈泰晤士报〉编辑》, 载于1853年9月2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544号(Forbes, Ch.: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44, 27. September 1853.)。——488。

弗莱里格拉特, 斐·《西班牙来信》, 载于1841年11月30日《知识界晨报》(斯图加特—蒂宾根)第286号(Freiligrath, F.: Aus Spanien. In: 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 Stuttgart, Tübingen. Nr. 286, 30. November 1841.)。——670。

弗兰西斯, 乔·亨·《尊贵的帕麦斯顿子爵的主张和政策。巴特大十字荣誉军团成员、议员、大臣、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1852年伦敦版(Francis, G. H.: Opinions and policy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Viscount Palmerston. G. C. B., M. P., etc. as minister, diplomatist, and statesman, during more than forty years of public life. With a memoir. London 1852.)。——398—399, 402—411, 413—417, 422, 429—431, 446, 463—465, 475—677。

富拉顿, 约·《论通货的调整》1844年伦敦版(Fullarton, J.: On the regulation of currencies; being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it is proposed to restrict, within certain fixed limits, the future issues of credit of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of the other banking establishment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London 1844.)。——342—343。

G

甘米奇, [罗·][《1853年6月19日在黑石山脊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引自

- 1853年6月25日《人民报》(伦敦)第60期。[标题]:《宪章运动的光荣复兴》(Gammage, [R.]: [Rede auf dem Meeting von Blackstone Edge, 19. Juni 1853.] Nach: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60, 25. Juni 1853. [U. d. T.]: Glorious revival of Chartism.)。——187—189。
- 《改革法案》, 载于1853年11月26日《人民报》(伦敦)第82期(The Reform Bill.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82, 26. November 1853.)。——597。
- 哥尔查科夫, 米·德·[《致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居民的宣言》], 载于1853年7月1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77号(Gortschakow, M. D.: [Proklamation an die Bewohner der Moldau und der Walachei.]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7, 11. Juli 1853.)。——238。
- [戈洛文, 伊·加·](《应该怎样写历史》), 一个外国通讯员作, 载于1853年9月3日《晨报》(伦敦)第19407号([Golowin, I. G.]: How to write history. From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407, 3. September 1853.)。——334—335。
- 戈洛文, 伊·加·/亚·赫尔岑/斯·沃尔采尔《俄国间谍巴枯宁》, 载于1853年8月24日《晨报》(伦敦)第19398号(Golowin, I. G./A. Herzen/S. Worcell: The Russian agent, Bakunin.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398, 24. August 1853.)。——327。
- 格莱斯顿, [威·][《1853年3月1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3月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65号(Gladstone, [W.]: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 März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65, 2. März 1853.)。——79—80。
- 格莱斯顿, [威·][《1853年4月8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4月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98号(Gladstone, [W.]: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8. April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98, 9. April 1853.)。——58—59、64。
- 格莱斯顿, [威·][《1853年4月18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4月19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156号(Gladstone, [W.]: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8. April 1853.]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156, 19. April 1853.)。——72—75、657—658。
- 格莱斯顿, [威·][《1853年7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7月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75号(Gladstone, [W.]: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7.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5, 8. Juli 1853.)。——206。

- 格莱斯顿, [威·] [《1853年7月28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7月2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93号(Gladstone, [W.]: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8.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93, 29. Juli 1853.)。——255。
-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 [贝·阿·]《东方事件》, 载于1853年3月23日《立宪主义者报》(巴黎)第82号(Granier de Cassagnac, [B.-A.]: Des affaires d'Orient. In: Le Constitutionnel. Paris. Nr. 82, 23. März 1853.)。——25。
- 格雷, [查·] [《1834年2月4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4年伦敦版第21卷(Grey, [Ch.]: [Rede im House of Lords, 4. Februar 1834.]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1. London 1834.)。——437、460。
- 格雷, [亨·] [《1853年7月7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7月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75号(Grey, [H.]: [Rede im House of Lords, 7.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5, 8. Juli 1853.)。——205。
- 格雷, [乔·] [《1853年7月5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7月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73号(Grey, [G.]: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5.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3, 6. Juli 1853.)。——679。
- 格伦特维, 尼·《向丹麦人民说明议会解散的原因》(Grundtvig, N.: Auflösung des Parlaments, dargelegt dem dänischen Volk.)。——100。
- 格罗特[《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6年伦敦版第32卷(Grote: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0. April 1836.]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32. London 1836.)。——460。
- 《工人结社法案, [1853年8月5日上院的辩论》], 载于1853年8月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500号(Combination of workmen bill. [Debatte im House of Lords, 5. August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00, 6. August 1853.)。——286。
-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1847年12月8日[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载于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卷(Statuten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Angenommen vom zweiten Kongreß.] 8. Dezember 1847. In: Wermuth/Stieber: Die 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Im amtl. Auftr. zur Benutzung der Polizei-Behörden der sämmtl. deutschen Bundesstaaten. . . dargest. Th. I. Berlin 1853.)。——578。

- 《关于丹麦王位继承问题的争论,或欧洲列强应当做些什么》(Die umstrittene Frage der dänischen Erbfolge, oder was sollen die Mächte Europas tun.)。——101。
- 《关于黎凡特事件的公文集》第1卷:《国王陛下主持议会两院会议。1841年》[1841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the Levant. Pt. I.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1841. London [1841].)。——434、465、621。
- 《关于俄国用以瓦解英法同盟的手段的秘密回忆录》,载于1836年《公文集》(伦敦)第2卷第14号(Memoir on the means possessed by Russia for breaking up the alliance between France and England. In: The Portfolio. Vol. 2. Nr. 14. London 1836.)。——182。
- 《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截至1853年7月5日为止的六个月》,载于1853年8月6日《经济学家》(伦敦)第519期(Accounts relating to trade and navigat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July 5, 1853.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519, 6. August 1853.)。——284—285。
- 《关于匈牙利问题的通信。1847—1849。遵照女王陛下敕令送交议会两院。1850年8月15日》(Correspondence relativ to the affairs of Hungary. 1847—1849.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August 15, 1850.)。——457。
- 《关于修正工厂工作时间的法案》,载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1850年伦敦版(An act to amend the acts relating to labour in factories.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1850.)。——211。
- 《关于英属印度从最初到当前的历史和评述》,休·默莱[等]著,1832年爱丁堡—伦敦版第1—3卷(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account of British India, from the most remote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 Von Hugh Murray[u. a.]. Vol. 1—3. Edinburgh, London 1832.)。——161—165。
- 《关于执行岸防勤务的海军志愿兵法案》,载于1853年8月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96号(Naval coast volunteers bill.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96. 2. August 1853.)。——266。
- 《国王陛下关于加快消除某些疾病、预防治疗流行性疾病的十年法案》,载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1848年伦敦版(An act to renew and a-

mend an act of the tenth year of Her present Majesty, for the more speedy removal of certain nuisances, and the prevention of contagious and epidemic diseases.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1848.)。——377。

H

- 哈麦尔, 约·冯·《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十卷集)1827—1835年佩斯版(Hammer, J. von: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grossentheils aus bisher unbenützten Handschriften und Archiven. Bd. 1—10. Pest 1827—1835.)。——27, 261。
- 《海关法》。[1853年7月1日下院的辩论], 载于1853年7月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70号(Customs', &c., acts. [Debatte im House of Commons, 1.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0, 2. Juli 1853.)。——193—194。
- 《海员权利法案》, 载于1853年8月30日《先驱晨报》(伦敦)第22250号(The merchant shipping bill. In. The Morning Herald. London. Nr. 22250, 30. August 1853.)。——331—332。
- 《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Forming a continuation of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year 1803". 3. ser. . . London. . .):
- 1831年第5卷——416。
 - 1832年第6卷——418。
 - 1832年第9卷——417, 428。
 - 1833年第13卷——417。
 - 1833年第14卷——417, 428。
 - 1833年第19卷——417, 433—435, 441, 448, 452, 455。
 - 1833年第20卷——432—435, 441, 443, 448, 455。
 - 1834年第21卷——437, 460。
 - 1834年第22卷——416, 432—448。
 - 1836年第32卷——422, 434, 438, 460—463, 467。
 - 1837年第37卷——422—423, 460, 469, 472, 476。
 - 1837年第38卷——422。
 - 1838年第39卷——449, 476。
 - 1838年第43卷——467—469, 474—476。

- 1840年第55卷——420—423、461、465。
—1846年第88卷——421、423、425、429。
—1847年第89卷——424、427。
—1847年第90卷——425—429。
—1847年第91卷——427、429。
—1848年第96卷——419、427、437、443、452—457。
—1848年第97卷——443。
—1848年第98卷——419。
- 汉特,[亨·][《1831年8月8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1年伦敦版第5卷(Hunt, [H.]: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8. August 1831.]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5. London. 1831.)。——416。
- 赫里斯,[约·查·][《1832年1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2年伦敦版第9卷(Herries, [J. Ch.]: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6. Januar 1832.]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9. London. 1832.)。——428。
- 黑尔(小),威·(编辑先生。[1853年4月16日的信]),载于1853年4月18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155号(Hale, W., jun.: Mr. Editor. [Brief vom 16. April 1853.]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155, 18. April 1853.)。——97。
- 黑格尔,乔·威·弗·《精神现象学》,约·舒尔采编,1841年柏林第2版(Hegel, G. W. F.: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rsg. von Johann Schulze. 2. unveränd. Aufl. Berlin 1841.)。——561、566。
- 《黑海和高加索来信。——再谈雌狐号事件》,载于1844年《公文集》第2卷第8号(Letters from the Black Sea. —The Vixen again. In: The Portfolio. Vol. 2, Nr. 8, London 1844.)。——468、474。
- 霍格,[詹·][《1853年6月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6月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48号(Hogg,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6. Jun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48, 7. Juni 1853.)。——135、137。

J

- 吉布森,[米·][《1853年4月1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4月1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03号(Gibson, [M.]: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4. April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03, 15. April 1853.)。——70。

加亚尔代, [弗·]《舍伐利埃·德翁回忆录》1837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Gaillardet, [F.]: Mémoires du Chevalier d'Eon, publié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sur les papiers fournis par sa famille, et d'après les matériaux authentiques déposés aux archive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T. I. Bruxelles 1837.)。——30。

K

卡莱尔, 托·《现代评论》1850年伦敦版: 一、《时事。2月》, 二、《模范监狱。3月》(Carlyle, Th.: Latter-day pamphlets. London 1850. Nr. 1: The present time. February. Nr. 2: Model prisons. March.)。——349、399。

凯里, 亨·查·《国内外的奴隶贸易: 这种贸易存在的原因及其消除的办法》1853年费城版(Carey, H. Ch.: The slave trade, domestic and foreign: why it exists, and how it may be extinguished. Philadelphia 1853.)。——711—712。

凯里, 亨·查·《论工资率: 世界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费城—伦敦版(Carey, H. Ch.: Essay on the rate of wage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Philadelphia, London 1835.)。——711。

坎伯尔, 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1852年伦敦版(Campbell, G.: 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To which is prefixed some account of the natives and native institutions. London 1852.)。——203、220、223、242、249。

坎伯尔, 乔·《印度管理方案》1853年伦敦版(Campbell, G.: A scheme for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London 1853.)。——200。

坎宁, [斯·][《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6年伦敦版第32卷(Canning, [S.]: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0. April 1836.]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32. London 1836.)。——461。

坎宁, [斯·][《1838年6月21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8年伦敦版第43卷(Canning, [S.]: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1. Juni 1838.]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43. London 1838.)。——467、476。

坎宁, [斯·][《1840年7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0年伦敦版第55卷(Canning, [S.]: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3. Juli 1840.]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55. London 1840.)。——420。

- 柯立尔, [罗·] [《1853年3月1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3月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65号(Collier, [R.]: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 März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65, 2. März 1853.)。——53。
- 科贝特, [威·] 《给西德茅思勋爵的信。1817年1月30日》, 载于1817年2月1日《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第32卷第5期(Cobbett, [W.]: A letter to Lord Sidmouth. London, 30. January 1817. In: 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 Vol. 32. Nr. 5, 1. Februar 1817.)。——62。
- 科贝特, 威·《纸币对黄金。或论英格兰银行、债务、股份、偿债基金和各种利用纸币的诀窍和计谋的历史与奥妙》1828年伦敦版(Cobbett, W.: Paper against gold; or, the history and myste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of the debt, of the stocks, of the sinking fund, and of all the other tricks and contrivances, carried on by the means of paper money. London 1828.)。——62—63。
- 科贝特, [约·] [《1853年7月5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7月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73号(Cobbett,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5.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3, 6. Juli 1853.)。——208、679。
- 科布顿, 理·《印度战争是怎样发生的。缅甸战争的起因》1853年伦敦版(Cobden, R.: How wars are got up in India. The origin of the Burmese war. London 1853.)。——266。
- 科布顿, [理·] [《1853年4月14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4月1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03号(Cobden, [R.]: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4. April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03, 15. April 1853.)。——71。
- 科布顿, [理·] [《1853年6月27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6月2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66号(Cobden, [R.]: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7. Jun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66, 28. Juni 1853.)。——195。
- 科布顿, [理·] [《1853年7月1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7月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70号(Cobden, [R.]: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0, 2. Juli 1853.)。——193。
- 科布顿, [理·] [《1853年8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8月1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509号(Cobden, [R.]: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August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09, 17. August 1853.)。——315—316。
- 科德林顿, [爱·] [《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

- 录)1836年伦敦版第32卷(Codrington, [E.]: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0. April 1836.]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32. London 1836.)。——438。
- 科苏特,[拉·]《亲爱的阁下……[给达德利·斯图亚特的信。1853年4月15日]》,载于1853年4月2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12号(Kossuth, [L.]: My Lord - In answer... [Brief an Lord Dudley Stuart. 15. April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12, 26. April 1853.)。——97。
- 科苏特,[拉·]《亲爱的阁下……[给梅恩·里德上尉的信。1853年4月23日]》,载于1853年4月2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12号(Kossuth, [L.]: My dear Sir... [Brief an Captain Mayne Reid, 23. April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12, 26. April 1853.)。——97。
- 科苏特,[拉·]《亲爱的阁下……[给梅恩·里德上尉的信。1853年4月23日]》,载于1853年4月25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161号(Kossuth, [L.]: My dear Sir... [Brief an Captain Mayne Reid, 23. April 1853.] <Copy. >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161, 25. April 1853.)。——97。
- 科苏特,[拉·]《致梅恩·里德上尉》,载于1853年4月25日《晨报》(伦敦)第19294号(Kossuth, [L.]: To Captain Mayne Reid.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294, 25. April 1853.)。——97。
- 克拉伦登,[乔·]《[1853年7月7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7月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75号(Clarendon,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7.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5, 8. Juli 1853.)。——207。
- 克拉伦登,[乔·]《[1853年8月2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8月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97号(Clarendon,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2. August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97, 3. August 1853.)。——273。
- 克拉伦登,[乔·]《[1853年8月8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8月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502号(Clarendon,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8. August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02, 9. August 1853.)。——376。
- 克拉伦登,[乔·]《[1853年8月12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8月1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506号(Clarendon,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12. August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06, 13. August 1853.)。——299、301—302。
- 克兰里卡德,[乌·约·]《[1853年7月7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7月8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475 号(Clanricarde, [U. J.]: [Rede im House of Lords, 7.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5, 8. Juli 1853.)。——206。

库普弗,阿·(厄尔布鲁士山旅行记)1830 年圣彼得堡版。引自 1844 年《公文集》(伦敦)第 2 卷第 8 号(Kupffer, [A.]: Voyage dans les environs du Mont Elbrouz dans le Caucase, enterpris par ordre de Sa Majesté l'Empereur; en 1829. Rapport fait à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t.-Petersbourg. St.-Petersbourg 1830. Nach: The Portfolio. Vol. 2. Nr. 8. London 1844. [U. d. T.]: Letters from the Black Sea and the Caucasus. - The Vixen again.)。——459。

L

拉布谢尔, [亨·][《1853 年 7 月 5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3 年 7 月 6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473 号(Labouchère, [H.]: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5.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3, 6. Juli 1853.)。——680。

拉弗尔斯,托·斯·(爪哇史。附地图和插图)(两卷集)1817 年伦敦版第 1 卷(Raffles, Th. S.: The history of Java. With a map and plates. Vol. 1. 2. Vol. 1. London 1817.)。——139、142。

拉盖罗尼埃, [路·埃·][《和平与战争》], 载于 1853 年 7 月 16 日《国家报, 帝国报》(巴黎)第 197 号(La Guéronnière, [L.-É.]: La paix et la guerre. In: Le Pays. Journal de l'Empire. Paris. Nr. 197, 16. Juli 1853.)。——236。

拉马谢, H. (《东方事件。——拒绝俄国的最后通牒》), 载于 1853 年 5 月 26 日《世纪报》(Lamarche, H.: Affaires d'Orient. — Rejet de l'Ultimatum Russe. In: Le Siècle. May 26, 1853.)。——112。

莱亚德, [奥·亨·][《1853 年 7 月 7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3 年 7 月 8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475 号(Layard, [A. H.]: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7.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5, 8. Juli 1853.)。——206。

莱亚德, [奥·亨·][《1853 年 8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3 年 8 月 17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509 号(Layard, [A. H.]: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August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09, 17. August 1853.)。——308—311。

李嘉图, 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 年伦敦第 3 版(Ricardo, 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3. ed. London. 1821.)。——175。

- [理查兹,阿·贝·]《俄军占领两公国》,载于1853年6月21日《晨报》(伦敦)第19343号([Richards, A. B.]: The Russian occupation of the Principalities.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343, 21. Juni 1853.). —159。
- [理查兹,阿·贝·]《新的纳瓦里诺会战》,载于1853年12月13日《晨报》(伦敦)第19493号([Richards, A. B.]: The new battle of Navarino.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493, 13. Dezember 1853.). —630。
- [理查兹,阿·贝·]《〈泰晤士报〉和新的火药阴谋》,载于1853年4月21日《晨报》(伦敦)第19291号([Richards, A. B.]: "The Times" and the new gunpowder plot.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291, 21. April 1853.). —78。
- [理查兹,阿·贝·]《需要解释》,载于1853年8月5日《晨报》(伦敦)第19382号([Richards, A. B.]: The demand for explanations.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382, 5. August 1853.). —275。
- [理查兹,阿·贝·]《在英国的难民》,载于1853年3月24日《晨报》(伦敦)第19267号([Richards, A. B.]: The refugees in England.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267, 24. März 1853.). —45—46。
- 利德尔,[亨·]《(1853年7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7月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75号(Liddel, [H.]: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7.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5, 8. Juli 1853.). —207。
- 利文,赫·/安·马图舍维奇(利文公爵和马图舍维奇伯爵给涅谢尔罗德伯爵的紧急电报。1829年6月1日(13日)),载于1843年8月1日《公文集》(伦敦)第1卷第1号(Lieven, Ch./A. Matuschewitsch: Copy of a despatch from Prince Lieven, and Count Matuszewich, addressed to Count Nesselrode, dated London, 1st (13th) June, 1829. In: The Portfolio. Vol. 1. Nr. 1. August 1st. London 1843.). —180,183。
- 卢西尼扬,列·《亚美尼亚大公的公告》,载于1853年6月17日《纪事晨报》(伦敦)第26983号(Lussinjan, L.: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Prince of Armenia. In: The Morning Chronicle. London. Nr. 26983, 17. Juni 1853.). —150。
- 路斯达洛,[埃·]《伟人们……》,载于1789年《巴黎革命》[巴黎]第1期(Loustalot, [E.]: Les grands ne nous paraissent grands... In: Révolutions de Paris. [Paris.] Nr. 1. 1789.). —108。
- 《论东印度对英国的贸易,答对这种贸易的种种异议》1720年伦敦版。引自约·拉·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年伦敦版(The advantages of the East

- India trade to England considered, wherein all the objections, etc. to that trade are fully answered. London 1720. Nach: J. R. McCulloch: 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 . . London 1845.)。——166。
- 罗巴克, [约·阿·] [《1837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7年伦敦版第37卷 (Roebuck, [J. A.]: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7. März 1837.] In: The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37. London 1837.)。——470—471。
- 罗纳兹, 查·《俄军在朴茨茅斯造船厂》, 载于1853年12月8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356号 (Ronalds, Ch.: The Russians in Portsmouth dockyard.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356, 8. Dezember 1853.)。——626。
- 罗素, 约· [《1853年2月10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2月1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49号 (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0. Februar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49, 11. Februar 1853.)。——54。
- 罗素, 约· [《1853年4月4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4月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94号 (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4. April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94, 5. April 1853.)。——55。
- 罗素, 约· [《1853年6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6月4日《晨报》(伦敦)第19329号 (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3. Juni 1853.]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329, 4. Juni 1853.)。——131。
- 罗素, 约· [《1853年7月1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7月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70号 (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0, 2. Juli 1853.)。——194。
- 罗素, 约· [《1853年7月5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7月6日《泰晤士报》(伦敦版)第21473号 (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5.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3, 6. Juli 1853.)。——680。
- 罗素, 约· [《1853年8月2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8月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97号 (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 August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97, 3. August 1853.)。——274。
- 罗素, 约· [《1853年8月15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8月1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508号 (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5. August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08, 16. August 1853.)。——304。
- 罗素, 约· [《1853年8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8月17日《泰晤士

报) (伦敦) 第 21509 号 (Russell, J. :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August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09, 17. August 1853.)。——304 — 307。

M

[马尔萨斯, 托·罗·]《人口原理。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作家的研究评论》1798 年伦敦版 ([Malthus, Th. R.] :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with remarks on the speculations of Mr. Godwin, M. Condorcet, and other writers. London 1798.)。——283。

马[克思], 弗·(俄国间谍巴枯宁), 载于 1853 年 8 月 27 日《晨报》(伦敦) 第 19401 号 (M[arx], F. : The Russian agent Bakunin.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401, 27. August 1853.)。——328。

马洪, [菲·亨·] [(1836 年 4 月 20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6 年伦敦版第 32 卷 (Mahon, [Ph. H.] :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0. April 1836.]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32. London 1836.)。——434, 438, 440, 460。

马姆兹伯里, [詹·] [(1853 年 7 月 7 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 1853 年 7 月 8 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1475 号 (Malmesbury, [J.] : [Rede im House of Lords, 7.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5, 8. Juli 1853.)。——207。

马姆兹伯里, [詹·] [(1853 年 8 月 12 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 1853 年 8 月 13 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1506 号 (Malmesbury, [J.] : [Rede im House of Lords, 12. August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06, 13. August 1853.)。——296 — 297, 300。

迈尔, P. [(对巴泰勒米来信的编辑部按语)], 载于 1851 年 3 月 12 日《祖国报》(巴黎) 第 71 号 (Mayer, P. : Nous nous sommes... In: La Patrie. Paris. Nr. 71, 12. März 1851.)。——590。

麦克库洛赫, 约·拉·《商业和商轮航运业的实用、理论和历史辞典。III. 附地图和插图》1847 年伦敦版 (M[ac] Culloch, J. R. : A dictionary, practical,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of commerce and commercial navigation. III. with maps and plans. A new ed., corr., enl., and improved; with a suppl. London 1847.)。——116, 161 — 164, 166。

- 麦克库洛赫, 约·拉·《政治经济学文献。各科分类书目。附史评、评注和作者介绍》1845年伦敦版(M[a]cCulloch, J. R.: *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 a classified catalogue of select publications in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s of that science, with historical, critical, and biographical notices.* London 1845.)。——166。
- [麦克尼尔, 约·]《俄国在东方的进展和现状》1836年伦敦版([McNeill, J.]: *Progress and present position of Russia in the East.* London 1836.)。——122、410—413。
- 曼, 托·《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 兼答通常反对贸易的各种异议》1621年伦敦第2版。引自约·拉·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年伦敦版(M[un], Th.: *A discourse of trade from England unto the East Indies; answering to diverse objections which are usually made against the same.* 2. ed. London 1621. Nach: J. R. M[a]cCulloch: *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5.)。——166。
- 曼, 托·《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或我国对外贸易的差额是衡量我国财富的尺度》, 他的儿子约·曼等出版, 1664年伦敦版。引自约·拉·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年伦敦版(Mun, Th.: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raign trade, or the balance of our forraign trade is the rule of our treasure.* Publ. by his son, J. Mun etc. London 1664. Nach: J. R. M[a]cCulloch: *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5.)。——166。
- 芒茨, 乔·[(1853年8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8月1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509号》(Muntz, G.: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August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09, 17. August 1853.)。——314。
- 蒙塞尔, [威·] [(给阿伯丁勋爵的信。1853年6月2日)], 载于1853年6月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47号(Monsell, [W.]: [Brief an Lord Aberdeen, 2. Jun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47, 6. Juni 1853.)。——131。
- 蒙塞尔, [威·] [(给阿伯丁勋爵的信。1853年6月4日)], 载于1853年6月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47号(Monsell, [W.]: [Brief an Lord Aberdeen, 4. Jun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47, 6. Juni 1853.)。——131。
- 《梅尼普讽刺文集》, [作者: 雅·吉洛·弗·克莱蒂安、皮·勒鲁瓦等] 1594年[无出版地点]版(*Satyre Ménippée.* [Verf.: J. Gillot, F. Chrestien. P. Le Roy u. a.] O. 1594.)。——484。
- 《美国的欧洲政策》, 载于1853年7月29日《议会报》(都灵)第178号(*La politi-*

- ca americana in Europa. In: Il Parlamento. Turin. Nr. 178. 29. Juli 1853.)。——278—280。
- 米尔恩斯, [理·蒙·] [《1846年8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6年伦敦版第88卷 (Milnes, [R. M.]: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7. August 1846.]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88. London 1846.)。——426。
- 米尔恩斯, [理·蒙·] [《1847年1月28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7年伦敦版第89卷 (Milnes, [R. M.]: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8. Januar 1847.]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89. London 1847.)。——424。
- 米尔恩斯, [理·蒙·] [《1853年8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8月1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509号 (Milnes, [R. M.]: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August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09, 17. August 1853.)。——313。
- 莫尔斯沃斯, [威·] [《1847年3月11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7年伦敦版第90卷 (Molesworth, [W.]: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1. März 1847.]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90. London 1847.)。——427—428。
- 穆勒, 詹·《英属印度史》1818年伦敦版 (Mill, J.: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India. London 1818.)。——163—164。

N

- 奈特, [亨·加·] [《1840年7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0年伦敦版第55卷 (Knight, [H. G.]: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3. Juli 1840.]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55. London 1840.)。——420。
- 内夫策, 奥·《这全部与利益有关……》, 载于1853年8月4日《新闻报》(巴黎) (Nefftzer, A.: Nous avons reçu... In: La Presse. Paris. 4. August 1853.)。——278。
- 涅谢尔罗德, 卡·瓦·《东方问题。[1853年7月2日(6月20日)的周知照会]》, 载于1853年7月12日《晨报》(伦敦)第24822号 (Nesselrode, K. W.: The Eastern Question. [Zirkularnote, 2. Juli (20. Juni) 1853.] In: The Morning Post.

- London. Nr. 24822, 12. Juli 1853.)。——217。
- 涅谢尔罗德, 卡·瓦·(涅谢尔罗德伯爵答苏丹的修改意见。[给迈恩多夫男爵的电报(1853年8月26日)]), 载于1853年9月22日《晨报》(伦敦)第19423号(Nesselrode, K. W. ; Count Nesselrode's reply to the Sultan's modifications. [Depesche an Baron Meyendorf, Petersburg, 26. August(7. September) 1853.]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423, 22. September 1853.)。——374—375。
- 涅谢尔罗德, 卡·瓦·(涅谢尔罗德伯爵的周知照会。[1853年7月2日(6月20日)]), 载于1853年7月12日《晨报》(伦敦)第19361号(Nesselrode, K. W. ; Count Nesselrode's Circular Note, [2. Juli(20. Juni) 1853.]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361, 12. Juli 1853.)。——683—684。
- 涅谢尔罗德, 卡·瓦·(涅谢尔罗德伯爵给泰季谢夫先生的电报。1829年2月12日于圣彼得堡), 载于1836年8月3日《公文集》(伦敦)第4卷第27号(Nesselrode, K. W. ; Despatch from... to M. de Tatistcheff. St. Petersburg, Feb. 12. 1829. In: The Portfolio. Vol. 4. Nr. 27, August 3. London 1836.)。——191—192。
- 尼古拉一世《皇帝……以下宣言……[1853年7月8日(20日)]》, 7月23日彼得堡[通讯], 载于1853年7月29日《汉堡消息报》第178号(Nikolai I: Der Kaiser hat folgendes Manifest [8. (20.) Juli 1853]... [Korrespondenz aus]: Petersburg, den 23sten Juli. In: Hamburger Nachrichten. Nr. 178, 29. Juli 1853.)。——268—269。
- 尼古拉一世《全俄皇帝陛下的诏书。1853年10月27日(11月8日)》, 载于1853年12月1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09号(Nikolai I: Most High Rescript of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all the Russias, to his Adjutant-General Prince Gortschakoff, General of Artillery. Sarskoje-Zelo, Oct. 27, (Nov. 8.)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09, 12. Dezember 1853.)。——629。
- 纽曼, 弗·威·《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Newman, F. W. ;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51.)。——176。

P

- 帕金顿, [约·][《1853年8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8月1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509号(Pakington,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August 1853.]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09, 17. August 1853.)。 — 311。

帕拉迪斯,让·(《新闻报》……),载于1853年7月26日《新闻报》(巴黎)(Paradis, J.; La Presse publiait. . . In: La Presse. Paris. 26. Juli 1853.)。 — 260。

帕麦斯顿, [亨·约·] [《……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乔·亨·弗兰西斯编《尊贵的帕麦斯顿子爵的主张和政策》1852年伦敦版(Palmerston, [H.];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 . .] In: G. H. Francis: Opinions and policy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Viscount Palmerston. London. 1852.);

—1808年2月3日——401。

—1812年3月10日——402。

—1813年3月1日——404—405。

—1816年3月8日——402。

—1816年4月25日——402。

—1820年5月16日——402—403。

—1820年6月14日——403。

—1823年4月30日——409、463、465。

—1824年3月5日——403。

—1824年4月9日——404。

—1825年3月11日——403。

—1828年1月31日——409。

—1828年2月26日——403。

—1828年3月10日——403。

—1828年6月27日——407。

—1829年2月10日——405。

—1829年3月18日——405。

—1829年5月7日——405。

—1829年6月1日——410。

—1829年6月11日——410。

—1830年2月5日——410。

—1830年2月16日——411、413。

—1831年3月24日——408。

—1832年5月14日——408。

- 1832年6月28日——417。
- 1832年7月16日——428。
- 1832年8月7日——413。
- 1832年8月8日——431。
- 1833年4月2日——403。
- 1833年7月9日——416—417。
- 1834年3月25日——418。
- 1836年3月18日——422。
- 1836年4月20日——417。
- 1837年3月10日——431。
- 1837年12月14日——475。
- 1838年6月21日——476、477。
- 1848年3月1日——447。

帕麦斯顿, [亨·约·] [《……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伦敦版 (Palmerston, [H.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 .]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 . London. . .):

- 1831年8月8日(1831年第5卷)——416。
- 1831年8月16日(1832年第6卷)——420。
- 1832年1月26日(1832年第9卷)——418。
- 1832年6月28日(1833年第13卷)——41。
- 1832年8月7日(1833年第14卷)——417。
- 1833年7月9日(1833年第19卷)——418。
- 1833年7月11日(1833年第19卷)——434、436、441、448。
- 1833年8月24日(1833年第20卷)——434、442、449。
- 1833年8月28日(1833年第20卷)——435。
- 1834年3月17日(1834年第22卷)——435—441、445—448。
- 1834年3月25日(1834年第22卷)——416。
- 1836年4月20日(1836年第32卷)——422、462、463、465。
- 1837年3月17日(1837年第37卷)——425、460、472。
- 1837年3月22日(1837年第37卷)——422。
- 1837年12月14日(1838年第39卷)——447—450。
- 1840年7月6日(1840年第55卷)——465。

- 1840年7月13日(1840年第55卷)——423、461。
- 1846年8月17日(1846年第88卷)——423、426、429。
- 1847年1月28日(1847年第89卷)——424。
- 1848年3月1日(1848年第97卷)——443。
- 帕麦斯顿, [亨·约·] [(……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泰晤士报》(伦敦)……(Palmerston, [H.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 .] In: The Times. London. . . 1853.):
- 1853年7月7日(7月8日第21475号)——207、638。
- 1853年8月16日(8月17日第21509号)——318。
- 1853年8月20日(8月22日第21513号)——452。
- 1853年8月21日(8月22日第21513号)——322。
- 《帕麦斯顿勋爵同〈公文集〉的关系》, 载于1844年《公文集》(伦敦)第2卷第6号(The connection of Lord Palmerston with the Portfolio. In: The Portfolio. Vol. 2. Nr. 6. London 1844.)。——453。
- 珀舍, 泰·《阶级斗争战士》, 载于1853年9月3日《新英格兰报》(波士顿)第78号(Poesche, Th. : Die Klassenkämpfer. In: Neu-England-Zeitung. Boston. Nr. 78, 3. September 1853.)。——710。
- 珀舍, 泰·/查·格普《新罗马或世界合众国》1853年纽约版(Poesche, Th./Ch. Goepp: The New Rome; or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World. New York 1853.)。——710。
- 《陪审法庭对海尔曼·贝克尔博士和同志们的审判。指控他们参与叛国性密谋。10月22日会议》, 载于1852年10月23日《科隆日报》第271号(Assisen-Procudur gegen D. Herm. Becker und Genossen. Anklage wegen hochverrätherischen Complots. Sitzung vom 22. Oktober.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271, 23. Oktober 1852.)。——584—585。
- 佩利埃《不仅是谣传……》, 载于1853年6月18日《国民议会报》(巴黎)第169号(Pellier, Am. : Non seulement les bruits. . . In: L'Assemblée nationale. Paris. Nr. 169, 18. Juni 1853.)。——158。
- 皮尔, [罗·] [(1832年7月12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3年伦敦版第14卷(Peel, [R.] :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2. Juli 1832]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14. London. 1833.)。——429。
- 皮尔, [罗·] [(1834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

- 1834年伦敦版第22卷(Peel, [R.]: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7. März 1834]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2. London 1834.)。——432、436、446、448。
- 皮尔, [罗·][(1838年6月21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8年伦敦版第43卷(Peel, [R.]: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1. Juni 1838]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43. London 1838.)。——474。
- 皮尔, [罗·][(1840年7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0年伦敦版第55卷(Peel, [R.]: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3. Juli 1840]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55. London 1840.)。——423。
- 皮尔斯, [富·]《就职宣言》, 载于1853年3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08号(Pierce, [F.]: Inaugural Addres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08, 5. März 1853.)。——14。

Q

- 《切尔克西亚独立宣言》, 载于1836年《公文集》(伦敦)第1卷第4号(Declaration of Circassian independence, addressed to the courts of Europe. In: The Portfolio. Vol. 1. Nr. 4. London 1836.)。——470。
- 《前任议员菲格斯·奥康瑞尔的精神状况委员会》, 载于1853年4月16日《人民报》(伦敦)第50期(Commission to examine into the state of mind of Feargus O' Connor, Esq., late M. P. for Nottingham.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50, 16. April 1853.)。——69。
- 乔治·桑[《给卡尔·马克思的信。1848年7月20日》], 载于1848年8月3日《新莱茵报》(科隆)第64号(George Sand: [Brief an Karl Marx, 20. Juli 1848.]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64, 3. August 1848.)。——328。
- 琼斯, 厄·《富人的残忍》, 载于1853年10月1日《人民报》(伦敦)第74期(Jones, E.: The cruelties of the rich. The highland lady. - The Yorkshire factory prince.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74, 1. Oktober 1853.)。——487。
- [琼斯, 厄·]《俄国人在英国的运动》, 载于1853年11月12日《人民报》(伦敦)第80期([Jones, E.]: A Russian movement in England.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80, 12. November 1853.)。——727。
- 琼斯, 厄·《工人议会。告全国各行业工人书》, 载于1853年11月12日《人民报》(伦敦)第80期(Jones, E.: A Parliament of Labour. To the trades and

- working men in general.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80, 12. November 1853.)。——548—549。
- 琼斯,厄·《人民之友》,载于1853年4月16日《人民报》(伦敦)第50期(Jones, E. : The People's Friend.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50, 16. April 1853.)。——69—70。
- [琼斯,厄·]《西区》,载于1853年6月25日《人民报》(伦敦)第60期(Jones, E. : The West Riding.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60, 25. Juni 1853.)。——189。
- 琼斯,厄·〔1853年6月19日在黑石山脊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引自1853年6月25日《人民报》(伦敦)第60期(Jones, E. : [Rede auf dem Meeting von Blackstone Edge am 19. Juni 1853.]Nach: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60, 25. Juni 1853. [U. d. T.]: Glorious revival of Chartism.)。——187—189。
- 琼斯,厄·〔1853年7月7日在哈利法克斯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引自1853年7月16日《人民报》(伦敦)第63期(Jones, E. : [Rede auf dem Meeting in Halifax am 7. Juli 1853.]Nach: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63, 16. Juni 1853. [U. d. T.]: Growded meeting at Halifax. - Defeat of the Manchester peacemongers.)。——219。
- 琼斯,厄·〔1853年11月4日在普雷斯顿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引自1853年11月12日《人民报》(伦敦)第80期(Jones, E. : [Rede auf einem Meeting in Preston am 4. November 1853.]Nach: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80, 12. November 1853. [U. d. T.]: Immense demonstration at Preston.)。——540。
- 琼斯,厄·〔1853年11月20日在曼彻斯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引自1853年11月26日《人民报》(伦敦)第82期(Jones, E. : [Rede auf einem Meeting in Manchester am 20. November 1853.]Nach: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82, 26. November 1853. [U. d. T.]: Highliy important meeting at Manchester.)。——597。

R

- 日拉丹,埃·德·《是和平还是战争?》,载于1853年5月27日《新闻报》(巴黎)(Girardin, E. de: Est-ce la paix, est-ce la guerre? In: La Presse. Paris. 27. Mai 1853.)。——110。

S

- [萨尔蒂科夫,阿·德·]《印度信札》1848[可能是1849]年巴黎版([Saltykow, A. D.]: *Lettres sur l'Inde*. Paris 1848[vielm. 1849].)。——223—224、250。
- 萨格登,[爱·][《1832年1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2年伦敦版第9卷(Sugden, [E.]: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6. Januar 1832.]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9. London 1832.)。——429。
- 瑟美列,[贝·]《拉约什·鲍蒂扬尼、阿尔图尔·戈尔盖、拉约什·科苏特。匈牙利解放战争中的活动家的政治概述》1853年汉堡版(Szemere, [B.]: *Graf Ludwig Batthyány, Arthur Görgei, Ludwig Kossuth. Politische Charakterskizzen aus dem Ungarischen Freiheitskriege*. Bd. 1—3. Hamburg 1853.)。——721。
- 沙利文,约·《穆勒〈关于双重政府的历史〉一书摘录》1853年伦敦—曼彻斯特版(Sullivan, J.: *Extract from Mill's History on the double government*. London, Manchester 1853. *India Reform*. Nr. 5.)。——163—164。
- 《商业报告和金融市场》,载于1853年11月12日《经济学家》(伦敦)第533期(*The trade returns and the money market*.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533, 12. November 1853.)。——541—546。
- 圣马尔克-日拉丹《我们不能……》,载于1853年5月30日《辩论日报》(巴黎)。引自1853年6月1日《晨报》(伦敦)第19326号(Saint-Marc Girardin: *Il nous est impossible...* In: *Journal des Débats*. Paris. 30. Mai 1853. Nach: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326, 1. Juni 1853. [U. d. T.]: *Stockjobbers, brokers and all...*)。——128。
- 斯宾塞,赫·《社会静力学,或论人类幸福的重要条件及对其中第一个条件的详细分析》1851年伦敦版(Spencer, H.: *Social statics: or, the conditions essential to human happiness specified, and the first of them developed*. London 1851.)。——176。
- 斯坦利,[爱·亨·][《1853年6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6月1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54号(Stanley, [E. H.]: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3. Jun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54, 14. Juni 1853.)。——150、161、171、190。
- 斯图亚特,[达·][《1837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

录)1837年伦敦版第37卷(Stuart, [D.]: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7. März 1837.]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37. London 1837.). —473。

斯图亚特,[达·][《1837年5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7年伦敦版第38卷(Stuart, [D.]: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5. Mai 1837.]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38. London 1837.). —422。

斯图亚特,[达·][《1853年8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8月1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509号(Stuart, [D.]: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August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09, 17. August 1853.). —312。

斯图亚特,[帕·][《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6年伦敦版第32卷(Stewart, [P.]: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0. April 1836.]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32. London 1836.). —422, 463。

T

泰季谢夫,[德·巴·]《电报副本。1827年6月29日于维也纳》,载于1836年《公文集》(伦敦)第2卷第2号(Tatistcheff, [D.P.]: Copy of a despatch. Dated Vienna, the 29th June, 1827. In: The Portfolio. Vol. 2. Nr. 2. London 1836.). —216。

图古特,[约·阿·]《图古特男爵1774年9月3日的报告摘录》。引自约·冯·哈麦尔《奥斯曼帝国的历史》1832年佩斯版第8卷(Thugut, [J. A.]: Auszug aus dem abgeordneten Berichte des Freyherrn v. Thugut, de dato 3. September 1774. Nach: J. von Hammer: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Bd. 8. Pest 1832.). —261。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9—1847年》1848年伦敦版(Tooke, T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 with a general review of the currency question, and remarks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act 7 & 8 Vict. c. 32. Being a continuation of the history prices from 1793 to 1839. [Vol. 4.] London 1848.). —614。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Thomas Aquina: Summa Theologica.). —60, 67。

W

- 威尔逊·帕滕, [约·] [(1853年7月5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7月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73号 (Wilson-Patten,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5.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3, 6. Juli 1853. — 680。
- 威兰德·弗·《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 (Wayland, F.: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ston 1843.)。 — 711。
- 威廉四世 [(1833年8月29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3年伦敦版第20卷 (William IV: [Rede im House of Lords, 29. August 1833.])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0. London 1833.)。 — 443。
- 威廉斯, [威·] [(1853年3月1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3月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65号 (Williams, [W.]: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 März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65, 2. März 1853.)。 — 54, 80。
- 威灵顿, 阿·韦· [(1834年2月4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4年伦敦版第21卷 (Wellington, [A. W.]: [Rede im House of Lords, 4. Februar 1834.])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1. London 1834.)。 — 438。
- 维迪尔, 茹·《致编辑先生》, 载于1851年3月10日《祖国报》(巴黎)第69号 (Vidil, J.: Monsieur le rédacteur. In: La Patrie. Paris. Nr. 69, 10. März 1851.)。 — 589。
- [维多克, 弗·欧·]《维多克回忆录》(四卷集)1828—1829年巴黎版 ([Vidocq, F.-E.]: Mémoires de Vidocq. T. 1—4. Paris 1828—1829.)。 — 48。
- 维多利亚 [(1847年8月29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7年伦敦版第89卷 (Victoria: [Rede im House of Lords, 29. August 1847.])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89. London 1847.)。 — 427。
- 维利希, 奥·《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 载于1853年10月28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3期 (Willich, A.: Doctor Karl Marx und seine Enthüllungen. In: 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Nr. 33, 28. Oktober 1853.)。 — 561, 567, 570, 572, 582, 584, 591。
- 乌尔卡尔特, [戴·]《东方的精神。在一个多事之秋穿越鲁米利亚的旅行札记》1838年伦敦版第1—2卷 (Urquhart, [D.]: The spirit of the East. Illustrated in

a journal of travels through Roumeli during an eventful period. Vol. 1. 2. London 1838.)。——31。

乌尔卡尔特, [戴·]《俄国在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1853年伦敦版(Urquhart, [D.]: Progress of Russia in the West, North, and South, by opening the sources of opinion and appropriating the channels of wealth and power. London 1853.)。——129, 456, 464, 466—467, 474, 639。

乌尔卡尔特, [戴·]《俄国和大不列颠的力量对比》, 载于1853年8月15日《晨报》(伦敦)第19390号(Urquhart, [D.]: The relative power of Russia and Great Britain.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390, 15. August 1853.)。——296。

乌尔卡尔特, [戴·]《何谓“保护”希腊正教?》, 载于1853年8月11日《晨报》第19387号(Urquhart, [D.]: What means “protection” of the Greek Church?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387, 11. August 1853.)。——295。

[乌尔卡尔特, 戴·]《皇帝和沙皇》, 载于1853年8月23日《晨报》(伦敦)第19397号([Urquhart, D.]: The Kaiser and the Czar.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397, 23. August 1853.)。——321。

乌尔卡尔特, [戴·]《土耳其及其资源。它的自治组织和自由贸易》1833年伦敦版(Urquhart, [D.]: Turkey and its resources: its municipal organization and free trade; the state and prospects of English commerce in the Eas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of Greece, its revenue and national possessions. London 1833.)。——31。

乌尔卡尔特, [戴·]《土耳其在俄土问题上的看法》, 载于1853年12月15日《晨报》(伦敦)第19495号(Urquhart, [D.]: Turkish views of the Turco-Russian question.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495, 15. Dezember 1853.)。——639。

乌尔卡尔特, [戴·]《外交中的时机。——“欧洲的承认”》, 载于1853年8月12日《晨报》(伦敦)第19388号(Urquhart, [D.]: Time in diplomacy — The “European recognition.”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388, 12. August 1853.)。——295。

乌尔卡尔特, [戴·]《英法战争》, 载于1853年8月16日《晨报》(伦敦)第19391号(Urquhart, [D.]: War between England and France.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391, 16. August 1853.)。——295。

乌尔卡尔特, [戴·]《政治罪犯》, 载于1853年9月20日《晨报》(伦敦)第19421

- 号(Urquhart, [D.]: The political malefactors.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421, 20. September 1853.). —358, 362, 377。
- 伍德, 查·〔〈1853年6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6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46号(Wood, Ch.: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3. Jun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46, 4. Juni 1853.). —132, 134, 137。
- 伍德, 查·〔〈1853年7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7月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75号(Wood, Ch.: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7.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5, 8. Juli 1853.). —206。

X

- 希尔, [理·]〔〈1834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4年伦敦版第22卷(Sheil, [R.]: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7. März 1834.]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2. London 1834.). —445。
- 希尔施, 威·《间谍活动的受害者。辩护书》, 载于1853年4月1、8、15、22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4、5、6期(Hirsch, W.: Die Opfer der Moucharderie. Rechtfertigungsschrift. In: 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1853. Nr. 3, 1. April; Nr. 4, 8. April; Nr. 5, 15. April; Nr. 6, 22. April.). —48—52, 561, 580。
- [西哀士, 艾·约·]《第三等级是什么?》1789年[巴黎]修订第2版([Sieyès, E. J.]: Qu'est-ce que le tiers état? 2. éd., corr. [Paris] 1789.). —81。
- 席勒, 沙·《采取……》, 载于1853年8月1日《祖国报》(巴黎)第213号(Schiller, Ch.: On écrit de... In: La Patrie. Paris. Nr. 213. 1. August 1853.). —268。
- 席勒, 沙·《雅西通讯……》, 载于1853年8月4日《祖国报》(巴黎)第216号(Schiller, Ch.: Une correspondance de Jassy... In: La Patrie. Paris. Nr. 216, 4. August 1853.). —274。
- 席勒, 沙·《有人肯定……》, 载于1853年5月26日《祖国报》(巴黎)第146号(Schiller, Ch.: On assure que... In: La Patrie. Paris. Nr. 146, 26. Mai 1853.). —110。
- 《消除(大城市)煤烟措施的法案》, 载于1853年8月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502号:(Smoke nuisance abatement (Metropolis) bill.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02, 9. August 1853.). —294。
- 谢努, 阿·《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年

- 巴黎版(Chenu, A.: Les conspirateurs.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sous Caussidière; les corps-francs. Paris 1850.)。——48。
- 休谟,[约·][〔1831年8月8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1年伦敦版第5卷(Hume,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8. August 1831.]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5. London 1831.)。——416。
- 休谟,[约·][〔1837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7年伦敦版第37卷(Hume,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7. März 1837.]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37. London 1837.)。——468、471、476。
- 休谟,[约·][〔1846年8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6年伦敦版第88卷(Hume,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7. August 1846.]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88. London 1846.)——421。
- 休谟,[约·][〔1847年3月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7年伦敦版第90卷(Hume,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4. März 1847.]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90. London 1847.)。——426—429。
- 休谟,[约·][〔1853年3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3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67号(Hume,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3. März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67, 4. März 1853.)。——54、80。

Y

- 伊文思,[乔·][〔1833年8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3年伦敦版第20卷(Evans, [G.]: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4. August 1833.]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0. London 1833.)。——434。
- 伊文思,[乔·][〔1834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4年伦敦版第22卷(Evans, [G.]: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7. März 1834.]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2. London 1834.)。——446。
- 伊文思,[乔·][〔1834年3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4年伦敦版第22卷(Evans, [G.]: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5. März 1834.]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2. London 1834.)。——

- 418。
- 《印度的管理。继续辩论[1853年6月9日下院的辩论]》，载于1853年6月1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51号(Government of India. Adjourned Debate. [Debatte im House of Commons, 9. Jun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51, 10. Juni 1853.)。——137。
- 《印度的国内状况》1853年伦敦—曼彻斯特版;(Native states of India. London, Manchester 1853. India Reform. Nr. 4.)。——221—223。
- 《印度的铁路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附地图和附录》，一位印度老邮递员著，1848年伦敦第3版(Indian railways and their probable results, with maps and an appendix, containing statistic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merce of India. By an old Indian Postmaster. 3. ed. London 1848.)。——248。
- 《印度法案》，载于1853年7月1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81号(India bill.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81, 15. Juli 1853.)。——227。
- 《印度管理法案。[1853年6月30日下院的辩论]》，载于1853年7月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69号(Government of India Bill. [Debatte im House of Commons, 30.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69, 1. Juli 1853.)。——195。
- 《印度管理法案。[1853年7月28日下院的辩论]》，载于1853年7月2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93号(Government of India Bill. [Debatte im House of Commons, 28.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93, 29. Juli 1853.)。——253。
- 《印度管理法案。[1853年7月29日下院的辩论]》，载于1853年7月3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94号(Government of India Bill. [Debatte im House of Commons, 29.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94, 30. Juli 1853.)。——253, 265。
- 英格利斯, [罗·][《1833年8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3年伦敦版第20卷(Inglis, [R.]: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4. August 1833.]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0. London 1833.)。——434, 442。

Z

《致〈先驱晨报〉编辑》，[署名]：一个兰开夏郡人，载于1853年11月17日《先驱

晨报)(伦敦)第 22318 号(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Herald. [Gez.]: A Lancashire man. In: The Morning Herald. London. Nr. 22318, 17. November 1853.). —616。

报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B

《比利时独立报》

—1853 年 10 月 18 日第 288 号:(S'il faut en croire...)。 —502。

《比利时解放报》

—1853 年 7 月 23 日第 204 号:(La bourse de Paris...)。引自 1853 年 7 月 29 日《议会报》(都灵)第 178 号:(La politica americana in Europa.)。 —45、278。

C

《晨报》

—1853 年 3 月 24 日第 19267 号:(The newspaper organs of the court...)。 —24。

—1853 年 4 月 4 日第 19276 号:(The Moniteur of to-day...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Sunday evening.)。 —46。

—1853 年 4 月 5 日第 19277 号:(You will recollect... [Korrespondenz aus:] Brussels, April, 3.)。 —45。

—1853 年 4 月 7 日第 19279 号:(The Times of yesterday...)。 —46。

—1853 年 4 月 16 日第 19287 号:(The metropolitan public...)。 —71。

—1853 年 6 月 1 日第 19326 号:(Stock jobbers, brokers and all...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Monday.)。 —128。

—1853 年 7 月 11 日第 19360 号:(The "Interpellations" on "Monday".)。 —214。

—1853 年 7 月 18 日第 19366 号:(The public are getting...)。 —236。

- 1853年7月19日第19367号:(The Hungarian refugees at Smyrna.)。——239。
- 1853年8月22日第19396号:(The Emperor went...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Saturday evening.)。——322。
- 1853年8月22日第19396号:(Lord Palmerston and the Pol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Paris.)。——322。
- 1853年9月22日第19423号:(Billstickers beware!)。——375。
- 1853年9月22日第19423号:(Trembling with indignation...)。——368。
- 1853年9月22日第19423号:(War is imminent...)。——375。
- 1853年9月23日第19424号:(“Times” denegation.)。——369。
- 1853年12月8日第19489号:(The Morning Chronicle of yesterday...)。——625。
- 《晨邮报》
- 1853年3月31日第24734号:(The government... [Korrespondenz aus:] Berlin.)。——34。
- 1853年4月18日第24749号:(In a public point of view.)。——71。
- 1853年7月11日第24821号:(A telegraphic despatch...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Saturday.)。——215。
- 1853年7月15日第24825号:(The Moniteur of this morning...)。——227。
- 1853年7月18日第24827号:(The ques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urkey...)。——237。
- 1853年7月27日第24835号:(The working classes in...)。——256。
- 1853年7月28日第24836号:(Many an occurrence...)。——257。
- 1853年8月1日第24839号:(Letters have arrived... [Korrespondenz aus:] Paris.)。——268。
- 1853年8月2日第24840号:(On Tuesday last we announced...)。——267。
- 1853年8月11日第24848号:(The Eastern question is settled.)。——282。
- 1853年9月14日第24876号:(The market for...)。——365。
- 1853年9月15日第24877号:(Were we disposed...)。——365。
- 1853年9月19日第24881号:(Our readers are...)。——369。
- 1853年9月20日第24882号:(On several late occasions...)。——359。
- 1853年9月26日第24887号:(Money-market and city news.)。——382。

- 1853年10月5日第24895号:(The intelligence from Constantinople...)。——480。
- 1853年10月19日第24907号:(With reference to the proceedings... [Korrespondenz aus:]Paris, Monday.)。——502。
- 1853年10月21日第24909号:(A letter from Vienna...)。——502。
- 1853年10月21日第24909号:(A telegraphic despatch... [Korrespondenz aus:]Paris, Wednesday.)。——502。
- 1853年11月14日第24929号:(At length something...)。——549。
- 1853年11月17日第24932号:(War and its probabilities...)。——616。
- 1853年12月6日第24948号:(The Russians at Portsmouth —Singular affair.)。——619、627。
- 1853年12月6日第24948号:(We cannot wonder...)。——619。
- 1853年12月7日第24949号:(The conference of the Great Powers... [Korrespondenz aus:]Vienna, Dec. 5.)。——619。
- 1853年12月8日第24950号:(From the very beginning...)。——623。
- 1853年12月13日第24954号:(No point in...)。——631、664 —665。

D

《地球和旅行家》

- 1834年2月24日第9764号:(It affords us...)。——445。
- 1853年6月16日第17139号:(The frequent changes...)。——157—158。
- 1853年9月13日第17215号:(Perhaps at no period...)。——364。
- 1853年9月15日第17217号:(Prince Gortschakoff's order...)。——359。
- 1853年9月20日第17221号:(One of our morning contemporaries...)。——368。
- 1853年9月22日第17223号:(The care which the Russian Minister...)。——371。
- 1853年9月23日第17224号:(Rumours have once...)。——371。
- 1853年12月7日第17288号:(It turns out that the case of...)。——627。

《帝国报》

- 1853年7月16日第197号:(M. le comte Nesselrode...)。——236。

G

《改革报》

—1853年10月24、25日第64、65号:(Szemere und die Wiederauffindung der ungarischen Kroninsignien.)。——721。

《观察家》

—1853年8月6日第2375号:(More Russians.)。——293。

—1853年8月6日第2375号:(Triumph of the peace party.)。——293。

—1853年10月29日第2387号:(The Chinese revolution. I.)。——513。

《观察家报》

—1853年5月23日:(Notice has been given...)。——102。

—1853年9月4日:(To explain why...)。——352、353。

—1853年9月11日:(The Bank of England...)。——353。

—1853年9月19日(The beginning of the end!)。——366。

—1853年9月25日:(Nearly all the interests...)。——381—382。

《公文集》

—1836年第3卷第24号:(Reply to the Frankfurt Journal.)。——183。

—1844年第2卷第8号:《黑海和高加索来信。——再谈雌狐号事件》(Letters from the Black Sea and the Caucasus.—The Vixen again.)。——468、474。

《国民报》

—1853年7月6日第307号上午版:(Kaiser Nikolaus I. wider die Donau-Fürstenthümer.)。——268。

—1853年7月7日第309号上午版:(Heute sind, wie...)。——268。

H

《汉堡消息报》

—1853年7月29日第178号:(Der Kaiser hat Befehl...)。——269。

J

《纪事晨报》

—1853年3月24日第26910号:(The journalists who have proposed...)。——24。

- 1853年4月7日第26922号:(English funds.)。——56、64。
- 1853年4月27日第26939号:(The debate of last night...)。——667。
- 1853年4月27日第26939号:(The tactics of the opposition...)。——667。
- 1853年6月15日第26981号:(The amendment which is ...)。——152。
- 1853年6月17日第26983号:(The division on Lord Stanley's motion...)。——150、153。
- 1853年6月17日第26983号:(Whilst the dangers...)。——157。
- 1853年8月1日第27021号:(The Divan is again... [Korrespondenz aus:] Vienna, Saturday evening.)。——269—270。
- 1853年8月2日第27022号:(The Hamburg Correspondent under date of St. Petersburg, 21st ult., says...)。——269—270。
- 1853年9月3日第27050号:(When the peace of Europe...)。——336。
- 1853年9月7日第21053号:(Large numbers of...)。——353。
- 1853年9月19日第27063号:(In the great council... [Korrespondenz aus:] Constantinople, Aug. 21.)。——359。
- 1853年10月4日第27076号:(Turkey and Russia.)。——479。
- 1853年12月2日第27127号下午版:(Notwithstanding the rains...)。——618。
- 1853年12月7日第27131号晚上版:(Advices from Constantinople... [Korrespondenz aus:] Vienna, Tuesday.)。——624。
- 1853年12月13日第27136号:(The letter from our Constantinople correspondent...)。——631。

《经济学家》

- 1847年5月8日第193期:(The present crisis, its character and remedy.)。——344。
- 1847年5月8日第193期:(The state of the currency in England.)。——344。
- 1847年12月25日第226期:(On the use and functions of bank notes.—Circulation.—The Bank Act of 1844.)。——344。
- 1851年9月13日第420期:(French husbandry.)。——703。
- 1852年3月13日第446期:(France: her difficulties, social and political.)。——693。
- 1852年5月1日第453期:(Pauperism in London and Paris.)。——693。

- 1852年10月30日第479期:(Elements of peace in France and strength in England.)。——703。
- 1853年3月12日第498期:(Turkey and its value.)。——18,32。
- 1853年5月14日第507期:(Backwardness of the season.)。——118。
- 1853年5月21日第508期:(China and the tea trade.)。——117—118。
- 1853年5月21日第508期:(Influence of land tenure on production.)。——176。
- 1853年7月16日第516期:(Bank returns and money market. [Für die Woche bis 9. Juli 1853.])。——237。
- 1853年7月30日第518期:(The corn trade under protection.)。——267。
- 1853年7月30日第518期:(The Eastern question.)。——270。
- 1853年8月6日第519期:(Bank returns and money market. [Für die Woche bis 30. Juli 1853.])。——286。
- 1853年8月6日第519期:(From Messrs J. and C. Sturge's Circular.)。——286。
- 1853年9月3日第523期:(Bank returns and money market. [Für die Woche bis 27. August 1853.])。——345,351。
- 1853年9月10日第524期:(As applied to interest on capital.)。——352。
- 1853年9月10日第524期:(Bank returns and money market. [Für die Woche bis 3. September 1853.])。——352。
- 1853年9月10日第524期:(Supply and demand.)。——352。
- 1853年9月17日第525期:(There is a very great...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Sept. 15, 1853.)。——366。
- 1853年10月1日第527期:(The preceding accounts...)。——481。
- 1853年10月15日第529期:(From a very extensive...)。——492。
- 1853年10月29日第531期:(By the Eagle...)。——513。
- 1853年10月29日第531期:(From Messrs Bushby and Co.'s Circular. Liverpool, Oct. 22, 1853.)。——513。
- 1853年10月29日第531期:(From Messrs Fraser, Son, and Co's Circular. Manchester, Oct. 21, 1853.)。——515—516。
- 1853年10月29日第531期:(The overland mail...)。——513。
- 1853年10月29日第531期:(Since the date...)。——513。

- 1853年10月29日第531期:(Our supplies of grain.)。——516。
 —1853年10月29日第531期:(Probable supply of corn.)。——518。
 —1853年10月29日第531期:(Useful and useless education.)。——538。
 —1853年10月29日第531期:(The wheat-sowing season.)。——515—516。
 —1853年11月5日第532期:(Golden opportunities, and the use made of them.)。——537—539。
 —1853年11月12日第533期:(Faults and follies of the wages movement.)。——541—542、544—547。
 —1853年11月12日第533期:(The trade returns and the money market.)。——541—547。
 —1853年11月26日第535期:(The Labour Parliament.)。——597、615、616。
 —1853年11月26日第535期:(The Lancashire strikes.)。——597。
 —1853年11月26日第535期:(The turn-outs and the poor law.)。——597、615。
 —1853年11月26日第535期:(To prevent strikes.)。——597。
 —1853年12月10日第537期:(The state of commercial affairs...)。——635。

K

《科隆日报》

- 1853年6月26日第175号:(Wie mit Bestimmtheit... [Korrespondenz aus:] Kopenhagen, 22. Juni.)。——184。
 —1853年7月14日第193号:(Nach den heute... [Korrespondenz aus:] Wien, 11. Juli.)。——238。
 —1853年7月31日第210号:(An politischen Nachrichten... [Korrespondenz aus:] Berlin, 29. Juli.)。——269。

L

《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

- 1853年12月11日第577期:(Our foreign conspirators.)。——632。

《立宪主义者报》

- 1853年8月19日第231号:(Le Journal de Constantinople...)。——320。
 —1853年10月15日第288号:(Nous avons lieu...)。——491。

《利物浦信使报》

—1853年9月21日:(The Eastern policy of ministers.)。——370。

《联邦报》

—1853年5月23日第141号:(Die österreichische Gesandtschaft...)。——107—108。

《伦敦泰利斯氏周报》

—1853年9月10日第70期:(The Birmingham inquisition.)。——349。

—1853年9月10日第70期:(Temple of Juggernaut.)。——349。

—1853年9月10日第70期:(York and Lancaster Railway directors.)。——350。

—1853年10月15日第75期:(India and China.)。——493。

—1853年10月15日第75期:(Leicester goal inquiry.)。——493。

—1853年10月15日第75期:(Mr. Gladstone in Manchester.)。——493。

—1853年10月15日第75期:(Peace conference at Edinburgh.)。——493。

—1853年10月15日第75期:(Peace or war; or, Drummond versus Bright.)。——493。

M

《马克巷快报和农业报》

—1853年9月5日第1132号:(The weather was...)。——354、355。

—1853年9月12日第1133号:(The reports from the Baltic...)。——355。

—1853年9月12日第1133号:(Though the weather has been...)。——354。

—1853年9月26日第1135号:(The activity in the corn trade...)。——383。

《马赛信使报》

—1853年3月20日第2928号:(Affaires d' Orient.)。——22—23。

《曼彻斯特卫报》

—1853年7月27日第2562号:(Mr. Cobbett's factory bill...)。——258。

—1853年7月27日第2562号:(The three elements...)。——258。

《漫游者》

—1853年9月4日第408号:(Wir erhalten die Erlaubniß... [Korrespondenz aus:]Odessa, 26. August.)。——337。

《每日新闻》

- 1853年3月23日第2133号:(The traditions of. . .)。——24。
 —1853年11月8日第2330号:(Our cabinet ministers)。——539。
 —1853年11月17日第2338号:(The colliers of Wigan have been fairly starved into a surrender.)。——725。
 —1853年12月5日第2353号:(Extraordinary occurrence at Portsmouth.)。——625。
 —1853年12月8日第2356号:(The Russians at Portsmouth.)。——626。
 《每周快讯》
 —1853年10月30日第2707号:(Town talk.)。——515。
 《民族报》
 —1853年9月7日第250号:(L' intervention américaine.)。——338。

N

《纽约每日论坛报》

- 1853年8月6日第3839号:(Peace or war.)。——338。

P

《普雷斯顿舵手和州报》

- 1853年11月5日第1512号:(The labour crisis.)。——539。

《普鲁士政治时事问题周刊》

- 1853年4月2日第25期:《柏林最近的逮捕和住宅搜查》(Die neuesten Verhaftungen und Haussuchungen in Berlin.)。——44。

R

《人民报》

- 1853年4月2日第48期:(The new trick of the cotton-lords.)。——652。
 —1853年4月9日第49期:(Russell's educational scheme.)。——55。
 —1853年6月25日第60期:(Spitalfields broad silk weavers.)。——187—189。
 —1853年7月16日第63期:(Manchester. - Meeting of manufacturers.)。——287。
 —1853年10月29日第78期:(As they've made their bed so they must lie)。——511。

- 1853年10月29日第78期:(Open air meeting.)。——512。
—1853年11月5日第79期:(Alarming riot at Blackburn. - Application for the military.)。——523。
—1853年11月5日第79期:(Grand gathering of the People! Triumphant verdict in favour of the Rights of Labour, and the People's Charter!!)。——525。
—1853年11月5日第79期:(The operatives of Preston.)。——523、548。
—1853年11月12日第80期:(Education.)。——549。
—1853年11月12日第80期:(Immense demonstration at Preston.)。——540。
—1853年11月12日第80期:(The operatives of Preston.)。——549。
—1853年11月26日第82期:(Highly important meeting at Manchester.)。——597—600。

《瑞士》

- 1853年5月24日第120期:(Les dispositions de l' Autriche. . .)。——108。

S

《时代报》

- 1853年4月3日第77号:(反革命)(Die Contre-Revolution.)。——44—45。

T

《太阳报》

- 1853年9月3日第19014号:(Another attempt. . .)。——341。
—1853年11月16日第19077号:(Defeats of the Russians.)。——551—552。

《泰晤士报》

- 1853年3月2日第21365号:(The mission of Count Leiningen. . .)。——30。
—1853年3月7日第21369号:(The state of the Turkish Empire. . .)。——30。
—1853年3月21日第21381号:(Some inconvenience is. . .)。——5。
—1853年3月25日第21385号:(It is strange. . .)。——24。
—1853年4月5日第21394号:(The consolidated fund and national debt redemption act.)。——55、64。
—1853年4月20日第21407号:(The great problem of the income-tax. . .)。——82。
—1853年4月26日第21412号:(The New Zurich Gazette. . .)。——97。

- 1853年4月27日第21413号:(Nothing can be clearer...)。——667。
- 1853年4月29日第21415号:(军用火箭工厂和政府)(The war rocket factory and the government.)。——95—96。
- 1853年5月23日第21435号:(The following is ...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22. Mai 1853.])。——110。
- 1853年5月23日第21435号:(The short period...)。——122。
- 1853年5月28日第21440号:(The short conversation...)。——122。
- 1853年6月4日第21446号:(Letters have been received... [Korrespondenz aus:]Paris, Thursday, June 2, 6 p. m.)。——126, 133。
- 1853年6月6日第21447号:(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132。
- 1853年6月8日第21449号:(The returns of the Board of Trade...)。——145, 677。
- 1853年6月16日第21456号:(At this stage...)。——149—150。
- 1853年6月17日第21457号:(The fate of the Government India Bill...)。——153。
- 1853年6月18日第21458号:(It is so important...)。——155。
- 1853年6月21日第21460号:(The convention of Balta Liman...)。——157。
- 1853年6月25日第21464号:(A good many people...)。——172—175。
- 1853年7月7日第21474号:(The revival of the factory agitation...)。——211—212, 679—680。
- 1853年7月8日第21475号:(Navigation of the Danube.)。——207。
- 1853年7月8日第21475号:(Russia and Turkey.)。——205—208。
- 1853年7月15日第21481号:(Turkey and Russia.)。——226。
- 1853年7月28日第21492号:(Cabmen's strike.)。——255。
- 1853年8月4日第21498号:(Increase of population.)。——283。
- 1853年8月4日第21498号:(It is evident...)。——276。
- 1853年8月10日第21503号:(Landlord and tenant (Ireland) bill.)。——288—289。
- 1853年8月22日第21513号:(The prorogation.)。——322—323。
- 1853年9月5日第21525号:(The Shrewsbury and Birmingham Railway Company...)。——349。

- 1853年9月7日第21527号:(The quotation of gold...). —351。
—1853年9月16日第21535号:(The bank of England...). —364。
—1853年9月19日第21537号:(There was a considerable... [Korrespondenz aus:]Manchester, Sept. 17.)。 —366。
—1853年9月20日第21538号:(Highland ejections.)。 —487。
—1853年9月20日第21538号:(The number and variety...). —378。
—1853年9月20日:(The Turkish question...). —360—361。
—1853年9月20日第21538号:(The Turkish question has plainly become...). —359—361、371。
—1853年9月21日第21539号:(Gobemoucherie.)。 —369。
—1853年9月21日第21539号:(Pacific policy of England and France.)。 —369。
—1853年10月6日第21553号:(To the successive phases...). —481。
—1853年10月12日第21557号:(A war may...). —502。
—1853年10月19日第21563号:(Some Frenchman has...). —503。
—1853年10月25日第21568号:(Nothing of general political interest... [Korrespondenz aus:]Sydney, July 1.)。 —514。
—1853年11月1日第21574号:(The Wigan riot.)。 —510。
—1853年11月3日第21576号:(Preston manufacturers' manifesto.)。 —524。
—1853年11月22日第21592号:(No one can...). —595。
—1853年11月23日第21593号:(The strikes.)。 —597。
—1853年11月24日第21594号:(We have at last...). —596。
—1853年11月29日第21598号:(The energetic and...). —592—593。
—1853年11月30日第21599号:(Short time movement by the employers.)。 —615。
—1853年12月1日第21600号:(A letter from Constantinople...). —606。
—1853年12月1日第21600号:(Private letters from Vienna of the 25th... [Korrespondenz aus:]Paris, Nov. 29, 6. p. m.)。 —613。
—1853年12月7日第21605号:(An attempt has been made...). —628。
—1853年12月9日第21607号:(The effect produced in Europe...). —624。
—1853年12月12日第21609号:(Russian victory.)。 —629。

- 1853年12月13日第21610号:(The intelligence from...)。——670。
 《泰晤士周报》
 —1853年8月21日第345期:(The parliamentary doings of '53.)。——326。
 —1853年10月30日第355期:(The war mania.—Thickening of the plot.)。——519。

W

《卫报》

- 1853年12月7日第418号:(A conference for the settlement...)。——623。

X

《先驱》

- 1853年8月6日第176期:(Lord Clarendon has...)。——293。
 —1853年9月3日第180期:(The threatened stop in the rise of wages.)。——353。
 —1853年9月10日第181期:(It appears that the Swiss...)。——346。
 —1853年9月10日第181期:(The governing classes. No II.—Earl of Aberdeen.)。——347—348。
 —1853年12月10日第194期:(Letters from Paris. Letter 102. [Gez.]: S.)。——632。

《先驱晨报》

- 1833年8月21日第15920号:(Turkey and Greece. (Private Correspondence.))。——442。
 —1853年3月25日第22115号:(Our Paris correspondent...)。——24。
 —1853年3月25日第22115号:(Reported entry of the Russians into Bucharest.)。——22。
 —1853年4月20日第22137号:(As the present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668。
 —1853年5月26日第22168号:(By submarine telegraph...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Tuesday evening) 。——121。
 —1853年6月20日第22189号:(Not even the pressing interest...)。——155。
 —1853年6月21日第22190号:(Lord Dudley Stuart...)。——160。

- 1853年7月25日第22219号:(Lunacy in Ireland...)。——257。
—1853年8月4日第22228号:(In the House of Commons yesterday...)。——277。
—1853年8月30日第22250号:(The merchant shipping bill.)。——332。
—1853年10月17日第22291号:(Why should a war...)。——490。
—1853年10月18日第22292号:(War to the knife.)。——490。
—1853年10月31日第22303号:(Additional strikes in Lancashire.)。——511。
—1853年11月1日第22304号:(Go and take...)。——510。
—1853年12月6日第22334号:(Among the great...)。——625。
—1853年12月7日第22335号:(Hobbes - whose reputation...)。——632。
—1853年12月23日第22349号:(The Russian version of the late battles.)。——641。

《新莱茵报》

- 1848年7月16日第46号:(Die A. O. -Z. (Nr. 151 [vielm. 159]) bringt folgende Erklärung Bakunins...)。——327。
—1848年10月13日第115号:(Von allen Seiten...)。——328。

《新普鲁士报》

- 1853年8月2日第177号:(Oesterreichischer Kaiserstaat.)。——275。

《新闻报》

- 1853年9月16日第216号:(Aus Galacz sind...)。——363。
—1853年10月14日第240号下午版(Man erzählt hier... [Korrespondenz aus:] Konstantinopel, 3. October.)。——503。

《新闻报》

- 1853年6月11日第6期:(We have endeavoured...)。——149。
—1853年7月2日第9期:(The news of the rejection...)。——192。
—1853年8月6日第14期:(The funds continue...)。——291。
—1853年12月19日第32期:(We stated in our...)。——629。

《新闻报》

- 1853年5月27日:(Les détails suivans...)。——110。
—1853年7月15日:(Peut-on compter...)。——228—233。
—1853年7月18日:(Le Journal de l' Empire...)。——236。
—1853年8月23日(La matière fait...)。——322。

—1853年9月9日:(L'Impartial de Smyrne...)。——337—338、340。

—1853年9月9日:(On lit dans...)。——338。

—1853年11月1日:(Depuis jeudi dernier...)。——509。

《星期日泰晤士报》

—1853年9月25日第1616号:(The wages movement - "The strikes.")。——384。

Y

《议会报》

—1853年7月29日第178号:(La politica americana in Europa.)。——278—280。

Z

《总汇报》

—1853年6月1日第152号:(Es ist in diesen... [Korrespondenz aus:] Berlin, im Mai.)。——126。

—1853年12月3日第337号:(Der neue Vorschlag der Mächte der Wiener Conferenz.)。——620。

《总汇通报》

—1853年5月25日第145号:(Le projet de chemin...)。——109。

—1853年8月11日第223号:(Napoléon, Par la grâce...)。——281。

《祖国报》

—1853年3月7日第66号:(Vous avez publié...)。——588—590。

文学著作

A

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397、456、716。

B

贝克尔,尼·(德国的莱茵)。——78。

贝朗瑞,皮·让·德·〈米尔米东人或阿基里斯的葬礼〉。——6。

比彻·斯托,哈·伊·〈汤姆叔叔的小屋〉。——667。

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397、456、568。

D

狄更斯,查·〈马丁·朱述尔维特的一生〉。——667。

G

歌德〈浮士德〉。——430、709。

歌德〈致祖莱卡〉。——143—144。

H

贺拉斯〈书信集〉。——87。

K

库珀,詹·费·〈密谋〉。——48。

L

〈老鼠与青蛙之战〉。——567。

M

缪尔纳,阿·〈罪〉。——52。

莫扎特〈唐璜〉。——433。

S

塞万提斯〈唐·吉珂德〉。——401、663、718。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435、450。

莎士比亚〈皆大欢喜〉。——397。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379。

莎士比亚〈李尔王〉。——591。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103。

莎士比亚〈尤利乌斯·凯撒〉。——313、318。

X

希卡内德, 艾·〈[歌剧脚本]魔笛〉。——716。

Y

〈一千零一夜〉。——222、254。

圣经

—《新约全书·路加福音》。——655。

报 刊 索 引

A

- 《阿格拉姆报》(Agramer Zeitung)——奥地利政府机关报,1826年在阿格拉姆(今萨格勒布)创刊。——522。
- 《奥得总汇报》(Allgemeine Oder-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天主教反对派的机关报,1846年4月起用这个名称在布雷斯劳(弗罗茨拉夫)出版,编辑是莫·埃尔斯纳、尤·施泰因和约·泰梅;1849年4月起该报调整出版方针,并更名为《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支持布雷斯劳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从而成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被普遍认为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其最活跃的撰稿人之一是路·海尔贝格;1855年该报曾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1855年12月31日停刊。——328。
- 《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Oesterreichisch-Kaiserliche Wiener Zeitung)——奥地利政府的官方报纸,1780—1931年在维也纳出版,曾数度易名,如《维也纳日报》(Wiener Zeitung)等;1814年1月1日起正式作为日报出版。——426。
- 《奥地利通讯》(Oesterreichische Correspondenz)——奥地利政府的半官方石印报纸,1850—1863年在维也纳出版。——4、14、522。
- 《奥格斯堡报》(Augsburger Zeitung)——见《总汇报》。
- 《奥地利劳埃德氏杂志》(Journal des österreichischen Lloyd)——奥地利保守派的日报,1848年12月—1854年在维也纳出版,每日出版两次(晨刊和晚刊)。——192。

B

- 《巴黎革命。献给全国及佩蒂·奥古斯坦区》(Révolutions de Paris, dédiées à la Nation et au district des Petits Augustins)——法国的一家周报,1789年7月12日—1794年2月28日由路·玛·普律多姆在巴黎出版,1790年以前主编是埃·路斯达洛。——108。

- 《巴塞尔日报》(Basler Zeitung)——瑞士的一家日报,1831年创刊,1839年为巴塞爾保守派的机关报,1859年停刊。——338。
- 《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 《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简称《笨拙》,1841年在伦敦创刊,主编威·梅·萨克雷。——340。
-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比利时的一家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最初名称为《独立报》(L'Indépendant),1843年6月27日改用现名出版;19世纪中叶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机关报。——502。
- 《比利时解放报》(L'Emancipation Belge)——比利时的一家日报,1830年在布鲁塞尔创刊,天主教教权派的机关报。——45、278。
-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见《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 《波罗的海报》(Ostsee-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35年在斯德丁创刊,原名《波罗的海交易所新闻》(Börsen-Nachrichten der Ostsee)。——719。
-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德国的一家日报,18世纪初在柏林创刊,1785—1911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751年起因报纸所有人是克·弗·福斯而被称为《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1911—1934年正式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代表柏林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的观点。——719。
- 《布雷斯劳日报》(Breslau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20年创刊,19世纪40年代持自由派观点,50年代持保守主义倾向。——330。

C

-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起在伦敦出版;19世纪50年代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报纸。——24、45—46、71、84、128、159、214—215、236、239、275、295、321、322、327—329、333—334、358、362、369、374、375、377、624—625。
-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英国的一家日报,1772—1937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中叶是辉格党右翼的机关报。——34、71、110、216—218、227、237、256、267、282、359、365、369、382、480、502、549、616—623、627。

D

- 《德累斯顿新闻通报》(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

- 1904年出版,起初具有民主自由主义倾向;1848年10月1日成为行政区政府机关报。——579。
-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 Zeitung)——布鲁塞尔德国流亡者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1848年2月27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主编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成为报纸的经常撰稿人,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88。
- 《帝国报》(Journal de l'Empire)——见《国家报,帝国报》。
- 《的里雅斯特日报》(Triester Zeitung)——奥地利的一家日报,政府的官方报纸;1850—1915年在的里雅斯特出版。——110。
-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英国的一家晚报,1803年起在伦敦每日出版;1866年以前是辉格党的机关报,以后是保守党的机关报。——146、157—158、359、364、368—371、445、627。
- 《东德意志邮报》(Ost-Deutsche Post)——奥地利温和自由派的日报,1848—1866年在维也纳出版。——624。
- 《独立报》(L'Indépendant)——见《比利时独立报》。

F

-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德国的一家日报,1665年左右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创刊,1684—1903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823—1903年每日出版文学附刊《戏剧节目。精神、情感和舆论杂谈》。(Didaskalia. Blätter für Geist, Gemüth und Publizität);19世纪40年代报纸具有温和自由派的倾向;1842—1843年曾多次转载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的文章。——77。
- 《法兰克福邮报》(Frankfurter Postzeitung)——见《法兰克福总邮报》。
- 《法兰克福总邮报》(Frankfurter Oberpostamts-Zeitung)——德国的一家报纸,1817—1866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临时中央政府——帝国摄政和帝国内阁——的机关报,50年代是联邦议会的机关报;1852年起用《法兰克福邮报》(Frankfurter Postzeitung)的名称出版,1829—1847年编辑是卡·彼·贝尔利,1848—1849年为G.马尔滕。——282、719。
-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见《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

G

- 《改革报》(Die Reform)——美国的一家报纸,美国工人同盟的机关报,1853年3月5日—1854年4月26日由哥·泰·克耳纳用德文在纽约出版,起初每周出一次,后来每周两次,1853年10月15日起改为日报。——711、721。
- 《公道报》(L'Impartial)——土耳其的一家法文报纸,1840年在士麦那创刊;政府的官方报纸。——281、339。
- 《公文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英国的一家丛刊,简称《公文集》(Portfolio),主要刊登外交公文和现代史方面的材料,1835—1837年由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1843—1845年以《公文集。外交评论》(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的名称出版;1859—1860年在柏林出版德文版,德文名称是《新公文集。当代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Das Neue Portfolio. 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ktenstücke zu Zeitgeschichte),德文版主编是费舍。——180—183、192、228、434、452—453、468—470、475。
- 《观察家》(The Examiner)——英国的一家周报,1808—1811年在伦敦出版;40年代为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293、513。
-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英国保守派的周报,英国最老的一家星期日报;1791年在伦敦创刊。——102、352—353、366、381—382。
- 《国家报。帝国报》(Le Pays. Journal de l'Empire)——法国的一家日报,1849年在巴黎创刊;1852—1870年是波拿巴政府的半官方报纸。——110、236。
-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4月1日—1915年在柏林出版;50年代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后为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1866年以后支持俾斯麦的政策,1870—1871年曾号召兼并法国领土,主张武力镇压巴黎公社。——268、322。
- 《国民报,或总汇通报》(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见《总汇通报》。
- 《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 nationa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48—1857年在巴黎出版;代表两个保皇派,即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人的观点,支持他们的合并。——158、236、337、368、590。
- 《国外消息。政治和文学杂志》(Die Grenzboten.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und Literatur)——德国自由派的周报,1841—1922年在莱比锡出版。——707。

H

- 《汉堡消息报》(Hamburger Nachrichten)——德国的一家日报,1792年创刊,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代表拥护帝国宪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反动年代是普鲁士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是俾斯麦的半官方报纸。——268—269。
- 《红色共和党人》(The Red Republican)——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左翼的机关报,1850年6—11月在伦敦出版;主编是乔·朱·哈尼。——582。
- 《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见《泰晤士报》。

J

-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英国的一家日报,1770—1862年在伦敦出版;40年代为辉格党的机关报,50年代为皮尔派的机关报,后为保守党的机关报。——56、64、150、152、157、269、273、336、353、359、479、481、618、624、631、667。
- 《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左翼的机关刊物;1851年6月—1852年4月在伦敦出版;主编是厄·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支持这个杂志,参加它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在周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582。
- 《解放报》(L'Emancipation)——见《比利时解放报》。
- 《经济学家。每周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和文学总汇报》(The Economist. Weekly Commercial Times, Bankers' Gazette, and Railway Monitor: a political, literary, and general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由詹·威尔逊在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32、117、118、176、237、267、270、284—286、344—345、351、352、366、481、513—518、537—539、541—547、597、615—616、634—635、693、703。
- 《君士坦丁堡报》(Journal de Constantinople)——土耳其的一家法文报纸,1846年创刊,每月出六次,半官方报纸,鼓吹法国在土耳其的影响。——321、531。

K

- 《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英国激进派的周报,1802—1835年由威·科贝特在其先后住过的地方用不同名称出

版。——62。

《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创刊,1802—1945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代表温和自由派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持批判态度,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科隆教会争论中代表天主教会的利益;《莱茵报》被查封后,报纸成为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1831年起报纸出版者是杜蒙,1842年报纸的政治编辑是海尔梅斯。——184、238、269、522、585、719。

L

《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Lloyd's Weekly London Newspaper)——英国自由派的报纸,1842年创刊,1843—1918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632。

《劳埃德氏新闻周刊》(Lloyd's Weekly Newspaper)——见《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

《劳埃德氏杂志》(Der Lloyd)——见《奥地利劳埃德氏杂志》。

《劳埃德氏周刊》(Lloyd's Paper)——见《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

《利物浦信使报》(The Liverpool Courier)——英国保守派的报纸,1808年创刊。——370。

《立宪主义者报。政治和文学汇闻》(Le Constitutionnel. Journal politique, littéraire, universel)——法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15—1870年用不同名称在巴黎出版,40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代表以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25、112、234、320、338、339、479、491。

《联邦报》(Der Bund)——瑞士的一家日报,激进派的机关报,1850年起在伯尔尼出版。——107—108。

《伦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英国政府官方报纸,1666年创刊,每周出两次。——472。

《伦敦泰利斯氏周报》(Tallis's London Weekly 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52年5月—1853年10月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以后改名为《帝国报》(Empire),1856年停刊。——349、493。

《论坛报》(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M

《马克巷快报和农业报》(The Mark Lane Express, and Agricultural Journal)——英

- 国的一家周报,商界的刊物,1832—1924年在伦敦出版。——354—355、383。
- 《马赛信号报》(Le Sémaphore de Marseil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27—1945年在马赛出版。——159。
- 《马赛信使报》(Courrier de Marseille)——22—23。
-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英国的一家报纸,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最初为周报,后改为每周出两次,1855年起改为日报。——258、379。
- 《漫游者》(Der Wanderer)——奥地利保守派的日报,1809—1873年在维也纳出版。——337、522。
-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党的报纸,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年1月21日由W.K.黑尔斯在伦敦创刊,1909年起同时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出版,1930年停刊;第一任编辑为查·狄更斯,继任的编辑有约·福斯特、哈·马蒂诺(1852—1866)、H.J.林肯、总编辑约·鲁滨逊(1868—1901)、编辑阿·加德纳(1902—1919),最后一任编辑为J.斯·霍奇森;60年代末起亨·拉布谢尔是报纸的三个所有者之一,1901年起为某公司所有,数月后归乔·卡德伯里独有。报纸支持自由贸易派的观点,1862年美国内战爆发,它是英国报纸中唯一支持北方的报纸。70—8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24、312、351、539、625、626、667。
- 《每周快讯》(Weekly Dispatch)——英国的一家周报,1801—1928年每逢星期日报在伦敦出版;报纸反映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515。
-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鲁·莱克索在纽约创办的德文周报,从1852年3月20日开始出版到1911年12月29日停刊止曾几易其名,1853年3月18日—1854年3月10日用这个名称出版,此后又先后以不同的名称出版,如《纽约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和《刑法报》(Criminal-Zeitung)等等。——561—562、566、576。
- 《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La Nation. Organe quotidien démocrate socialiste)——比利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1848—1856年在布鲁塞尔出版。——293、338。
- 《墨尔本商业通报》(Melbourne Commercial Circular)——澳大利亚的一家周报。——514。

《纽约论坛报》(New-York 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斯等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71、191、193、228、263—264、329、338、389、397、399、401、402—433、435—442、444—446、448—450、458—459、463、465—466。

《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先驱报》(The New-York Herald)——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1835年创刊,创办人和发行人是唐·戈·贝奈特,编辑是谢·舍维奇(1866年起),1841—1924年用这个名称在纽约出版。——14。

《纽约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P

《普雷斯顿舵手和普雷斯顿郡报》(The Preston Pilot and County Advertiser)——英国的一家周报,1825—1888年在普雷斯顿出版。——539。

《普鲁士石印通讯》(Preußische Lithographische Correspondenz)——普鲁士外交部的半官方报纸,在柏林出版;编辑是沙伊德勒(19世纪50年代)。——337。

《普鲁士政治时事问题周报》(Preußisches Wochenblatt zur Besprechung politischer Tagesfragen)——德国保守派的周报,具有右派自由派观点的普鲁士容克小组(周报派)的机关报;1851—1861年在柏林出版。——44。

《普鲁士周报》(Preußisches Wochenblatt)——见《普鲁士讨论政治时事问题周报》。

R

《人民报。民主社会共和国的报纸》(Le Peuple. Journal de la république d

- émocratique et sociale)——法国的一家日报,蒲鲁东派的机关报;主编是约·蒲鲁东;1848年9月2日—1849年6月13日在巴黎出版,是1848年4—8月出版的《人民代表·劳动者日报》(Le Représent du Peuple. Journal quotidien des travailleurs)的续刊,1849年9月25日—1850年5月14日改名为《人民之声报》(La Voix du Peuple)出版,1850年6月15日—10月13日又改名为《1850年人民报》(Le Peuple de 1850)出版,并改为每周三次。——711。
- 《人民报。维护公正政治和普遍权利》(The People's Paper, the champion of political justice and universal right)——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左翼的机关报,1852年5月由厄·琼斯在伦敦创刊;1852年10月—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并对报纸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周报除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为之撰写的文章外,还转载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在这个时期,报纸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后来琼斯同资产阶级激进派日益接近,致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撰稿并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6年6月报纸转入资产阶级实业家手中。——55、69—70、146—148、187—189、287、331、332、487、488、511—512、523、525、540、548、549、582、597—600、615、630、652、727。
- 《人民之声报》(La Voix du Peuple)——见《人民报。民主社会共和国的报纸》。
- 《瑞士》(La Suisse)——瑞士自由派的日报,1846—1860年在伯尔尼出版。——108。

S

-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etersbourg)——俄国的一家报纸,外交部的机关报;1825—1914年用法文出版,每周三次。——641。
- 《圣彼得堡报》(St.-Petersburg Zeitung)——俄国的一家日报,1727—1914年先由科学院,后由教育部用德文出版。——322。
- 《圣彼得堡消息报。政治和文学报》(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ѣдомости. Газет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俄国的一家日报,1728—1914年用这个名称出版,后来改名为《彼得格勒消息报》(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е Вѣдомости),1917年停刊;19世纪50年代每周出两次,由科学院出版,1875年起由国民教育部出版。——296、447。
- 《时代报。最新柏林晨报》(Die Zeit. Neueste Berliner Morgen-Zeitung)——德国

- 保守派的报纸,1851—1858年在柏林出版。——44、374。
- 《十字报》(Kreuz-Zeitung)——见《新普鲁士报》。
- 《石印通讯》(Lithographische Correspondenz)——见《普鲁士石印通讯》。
- 《世纪报》(Le Sièc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1939年在巴黎出版,1870—1871年间曾在图尔和波尔多出版;19世纪40年代代表部分仅限于要求温和的宪法改革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110、112、292。

T

- 《太阳报》(The Sun)——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798—1876年在伦敦出版。——340—341、552。
-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第二,约·沃尔特第三继其后为主要所有人。19世纪先后任主编的有托·巴恩斯(1817—1841)、约·撒·德莱恩(1841—1877)、托·切纳里(1877—1884)、乔·厄·巴克(1884—1912),助理编辑乔·韦·戴森特(1845—1870)等,50—60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人士、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5、23—25、30、55、64、78、82、83、96、97、110、122、123、126、132、133、145—146、149—150、153—157、159、172—177、193、201、205—206、211—212、226、253、255、256、275、283、288—289、296—302、306—307、308—316、318、322—323、326、349、351—353、358、360、361、364、366、368、376、453、481、488、493、502、523、524、528、551、592、593、595—597、604、619、621、624、627—630、661—669、677—681。
- 《泰晤士周报。伦敦历史、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报》(The Weekly Times; A London Newspaper of History, Politic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英国自由派的周报,1847—1885年在伦敦出版。——326、519。
- 《通讯》(Correspondenz)——见《奥地利通讯》。

W

- 《维也纳日报》(Wiener Zeitung)——见《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

《卫报》(The Guardian)——英国的一家周报,英国国教会的机关报;1846年在伦敦创刊。——622—623。

《卫星报》(Satellite)——特兰西瓦尼亚的周报,在喀琅施塔得出版。——337。

《文学报》(Literatur-Blatt)——见《知识界晨报》。

X

《戏剧节目。精神、情感和舆论杂谈》(Didaskalia. Blätter für Geist, Gemüth und Publizität)——见《法兰克福报》。

《先驱》(The Leader)——英国的一家周报,1850年3月—1860年6月由桑·汉特在伦敦出版。——293、347、348、353、632、709。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英国保守党的日报,1780—1869年在伦敦出版。——22、24、121、155、160、257、277、490、510、616、625、631、641、667、668。

《先驱者》(Le Précurseur)——比利时的一家日报,1836年在安特卫普创刊。——576、584。

《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见《奥得总汇报》。

《新公文集。当代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Das Neue Portfolio. 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ktenstücke zu Zeitgeschichte)——见《公文集。公文汇编》。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101、327、328、583。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1850年1—10月在伦敦编辑,汉堡和纽约印刷,共出6期。——50、570。

《新莱茵报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s-Revue)——见《新莱茵报。政治经济

评论)。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容克和宫廷奸党的喉舌;1848年6月在柏林创刊;创办人是恩·路·格尔拉赫和汉·胡·克莱斯特-雷佐夫,编辑是海·瓦盖纳(1848—1854);报纸的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所以又有《十字报》(Kreuz-Zeitung)之称;1939年停刊。——275、587、719。

《新闻报》(La Press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年在巴黎创刊,七月王朝时期具有反政府的性质;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反波拿巴派的报纸;1836—1857年主编是埃·日拉丹。——110、228、236、260、277、322、338、340。

《新闻报》(Die Presse)——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848—1896年在维也纳出版;1861—1862年报纸采取反波拿巴主义的立场,曾刊登马克思的文章和通讯。——45、278、363、503。

《新闻报》(The Press)——英国的一家周报,托利党的机关报,1853—1866年在伦敦出版。——149、192、291、629。

《新英格兰报》(Neu-England-Zeitung)——美国的一家民主周报,1846—1853年由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在美国波士顿用德文出版;约·魏德迈曾为报纸撰稿。——561、707、710、711。

《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英国的一家周报,1822年起在伦敦出版;19世纪50年代为辉格党机关报。——347、384。

《刑法报》(Criminal-Zeitung)——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Y

《雅努斯。德文杂志》(Janus. Deutsche Zeitschrift)——在美国出版的一家德文周报,1851年1月—1852年12月由卡·海因岑主持的编辑部在纽约出版;在美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的机关报。——709。

《议会报》(Il Parlamento)——意大利温和自由派的日报,1853年起在都灵出版。——278、338。

《邮报》(Post Zeitung)——瑞典的一家报纸,在斯德哥尔摩出版。——269。

Z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法国的一

家日报,1789年在巴黎创刊,1814年起用这个名称出版;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1849年革命时期支持反革命;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70—80年代报纸具有保守主义倾向。——105、128、358—359、368、590。

《知识界晨报》(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德国的一家日报,1807年由约·弗·科塔创刊,在斯图加特和蒂宾根出版,最初的名称为《知识阶层晨报》(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Stände);报纸在1817—1849年出版附刊《文学报》(Literatur-Blatt),1830年起附刊主编是沃·门采尔;1837—1865年用现在这个名称出版;1827年起报纸主编是海·豪夫;报纸在1826—1840年还出版夜刊《知识界午夜报》(Mitternachtzeitung für gebildete Leser),其间1826—1838年是用《知识阶层午夜报》(Mitternachtzeitung für gebildete Stände)的名称出版;1835年起主编是爱·布林克迈尔。——670。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由科塔出版社先后在蒂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和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特别是三月革命以前,报纸是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喉舌;50—60年代支持在奥地利霸权下统一德国的计划。——126、468、620、719。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1901年在巴黎出版,1811年1月1日起用这个名称出版,最初用《国民报,或总汇通报》(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的名称出版;1799—1814、1816—1868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年2月26日起加副标题《法兰西共和国官方报纸》;巴黎被困期间,报纸在巴黎和图尔两地同时出版,后在波尔多出版,是甘必大领导的国防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机关报。——109、269、281、366、368、629、643。

《祖国报。商业、农业、工业、文学、科学和艺术报》(La Patrie. Journal du commerce, de l'agriculture, de l'industrie, de la littérature,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在巴黎创刊;1850年报纸支持秩序党的保皇派选举联盟;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109—110、215、268、274、479、588—590。

地名索引

A

- 阿巴萨巴德 411。
 阿达纳 439。
 阿德莱德 353。
 阿德里安堡(今埃迪尔内) 39、105、
 121、154、156、208、218、281、412、
 433、445、453、459、462、464、469、
 471、477、621。
 阿迪杰河 529。
 阿迪斯库姆 200。
 阿尔巴尼亚 19、22、260、261、394。
 阿尔卑斯山脉 137。
 阿尔达汉 531。
 阿尔及尔 233、574。
 阿尔及利亚 491、517。
 阿尔杰什河 499、530、606、607。
 阿尔瑞特山 7—11、41。
 阿尔塔 20。
 阿弗尔——见勒阿弗尔
 阿富汗 199、520。
 阿格拉 240、366。
 阿格拉姆(今萨格勒布) 11、522。
 阿哈尔卡拉基 412。
 阿哈尔齐赫 412、505、641、644、
 645。
 阿克尔曼(今别尔哥罗德) 412—
 413。
 阿克灵顿 511。
 阿拉伯 139。
 阿拉斯河 411—412、505。
 阿勒颇 321。
 阿姆河(今奥克苏斯河) 520。
 阿姆斯特丹 427。
 阿纳帕 154、412、469。
 阿什顿 366、485、614。
 阿斯隆 193。
 阿斯泰拉巴德(今戈尔甘) 122、
 126。
 阿瓦 325、493。
 阿希佩拉哥群岛——见爱琴海
 埃尔祖鲁姆 433、505、508、531。
 埃及 7、18、23、139、228、229、279。
 埃里温 411、506、645。
 埃内兹 278。
 埃塞奎博 428。
 爱丁堡 193、492、512。
 爱尔兰(绿色的埃林) 75、81、84、
 130、168、172、177、253—264、
 289—290、330、348、400、405、434、

657、659、666、703。
 爱琴海(阿希佩拉哥群岛) 5、262。
 艾尔斯伯里 340。
 艾尔威尔-韦尔 485。
 安蒂瓦里(今巴尔) 20。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 218、433、434、
 439—450、456、613、621。
 安拉阿巴德 366。
 安纳托利亚 646。
 安特卫普 330、574—575。
 安条克(安塔基亚) 105。
 敖德萨 17、104、109—111、208、
 306、311、330、337、375、461、463、
 468、507、552、629。
 奥地利 4、8、10、13、24、27、30、31、
 46、88、92、94、107、120、123、125、
 181、191、192、208、215、231、233、
 235、238、258—261、267、270、274、
 278、279、283、296—300、301、306、
 307、320、322、337、338、348、355—
 356、359、369—376、382、393、410、
 420—427、452、481、490、502、503、
 517、528、552、585、595、614、618、
 623、637、654、685、728。
 奥尔德姆 208、384、485、599。
 奥尔登堡 516。
 奥尔米茨(今奥洛穆茨) 363、481、
 502。
 奥尔绍瓦 260、497。
 奥尔泰尼察 526、535、550—551、
 554、555、605—606、607、610、611、
 622、646、723。

奥尔特 506。
 奥尔特河(奥吕塔河) 527—531、
 535。
 奥兰群岛 521。
 奥勒什 495。
 奥里萨 165、251。
 奥恰科夫 392。
 奥斯曼帝国——见土耳其
 奥斯坦德 42、574—576。
 澳大利亚 114、116、291、353、378、
 482、511、545、562、565、574。

B

巴巴达格 339。
 巴登 570、572、594、651。
 巴恩斯利 184。
 巴尔干 28、31、39、390—392、497、
 498—499。
 巴尔米拉 140。
 巴尔塔利曼尼 155、156、273、309、
 361。
 巴伐利亚 431。
 巴格达 17。
 巴勒斯坦 298。
 巴黎 5、51、92、104、108、125、127、
 158、179、180、229、231、236、258、
 260、266、292、305、323、327、328、
 337、356、358、374、376、419、452、
 485、491、501—502、509、621、
 633—635、638、654、671、691、722、
 728。
 巴罗达 367。

- 巴拿马地峡 279。
 巴塞尔 90、651。
 巴特那 366、493。
 巴统 121、505—508、531、603、629、
 645。
 巴西 169、427、518。
 巴亚泽特(今多乌巴亚泽特) 531、
 645。
 百蒙德西 348。
 拜占庭——见君士坦丁堡
 保加利亚 41、261、310、321、363、
 393、509、620。
 贝奥蒂亚 431。
 贝尔格莱德 11、42、321、390。
 贝济克湾 217、281、299、307、315、
 359、480。
 贝卡谷地(克列西利亚) 229。
 贝克普 485、511、614。
 贝拉里 367。
 贝勒岛 589。
 贝里 383、485、511、525、614。
 贝鲁特 263。
 贝拿勒斯 366。
 贝奇 11。
 贝桑松 571。
 北部省 635。
 北京 115、119。
 北美洲 163。
 本都 121、505。
 比哈尔 165。
 比利时 6、46、87、93、118、330、354、
 356、428—431、438、449、482、517、
 575、576、635。
 比萨拉比亚 9、258、311、528、684。
 比绍夫斯海姆 531。
 比斯开湾 121。
 比尤克德列 110、111、300。
 彼得—保罗要塞 3。
 彼得堡——见圣彼得堡
 彼得戈夫 682。
 彼得瓦尔丁(今彼得罗瓦拉丁)
 216。
 卑谬 493。
 秘鲁 169。
 宾利 486。
 槟榔屿 226。
 波茨坦 235。
 波多利亚 269。
 波尔多 714。
 波河 536。
 波季 154、412、509。
 波兰 6、16、31、123、217、313、314、
 317、323、348、415、420、427—432、
 495、502、620、623、632、730。
 波罗的海 129、229、262、269、316、
 330、355、378、425、520。
 波士顿 184、707。
 波斯(今伊朗) 16、17、115、122、
 123、126、139、165、167、411、412、
 419、458。
 波斯湾 504。
 波斯尼亚 8、12、41、216、261、320、
 393。
 波希米亚 261、425。

波雪 99。
 伯比斯 428。
 伯恩利 485、511、614。
 伯尔尼 107、108、125。
 伯明翰 184、314、349、350、384、407、
 484、493、512。
 勃固 225、226、325。
 柏林 34—37、44—47、49—51、92、
 95、123、267、328、330、481、502、
 522、583、584、638、685。
 博尔顿 184、383、484—486、525、
 615。
 波斯普鲁斯海峡 5、16、19、30、40、
 216、238、267、316、358、432、433、
 443、500、642。
 布达佩斯 42、90。
 布德万 249。
 布尔昂 568。
 布哈拉 17。
 布加勒斯特 22、40、156、216、268、
 274、275、363、496、527—530、535、
 551、554、611、646。
 布科维纳 9。
 布拉德福德 380、484。
 布拉格 11。
 布赖顿 576。
 布莱克本 184、383、485、522。
 布勒伊拉 260、461、526、528、550、
 555、646。
 布雷斯劳(今弗罗茨瓦夫) 328。
 布里奇沃特 384。
 布里斯托尔 167、184、512。

布鲁萨 260。
 布鲁塞尔 104、576、578、631。
 布洛涅 633。
 布宜诺斯艾利斯 427。
 布泽乌河 499。

C

柴郡 384。
 彻奇(彻奇-帕里什) 485。

D

达达尼尔海峡 5、16、18、110、129、
 156—159、216、279、303、307、357、
 361、368、381、434、444—446、458、
 465、619、621、683。
 达尔马提亚 11。
 达卡 141、243。
 达勒姆 219。
 达里亚尔峡谷 459。
 达利曼 486。
 达温 184。
 鞑靼 119、123、139、451。
 大不列颠 3—13、23、25、27—31、
 38、46、68、78、82、83、90、103、104、
 114—118、120、122、126—129、
 133、138—143、145—153、157、
 161、165—170、173—177、181—
 187、192、197、210—224、226—
 230、240、242、245—252、259、267、
 270、279、281—294、295、299、
 305—308、311—317、319—326、
 337、348、349、368、377、403—404、

- 407—411、419、422—429、436、
439、444—449、453—457、461、
462、465—469、473—476、482、
487、492—493、503、513、516—
518、520、584、587、620—625、
628—632、637—639、653、670—
676、682—685、702、703、714、723—
727、732、734。
- 大诺夫哥罗德 16、262。
- 大西洋 90、211、279。
- 大运河 119。
- 丹麦 100—106、184、271、273—
280、379、402、501—503、516、
520—525。
- 但泽(今格但斯克) 20、330、355。
- 德比 512。
- 德比郡 384。
- 德布勒森 40。
- 德干高原 137。
- 德国 16、32、49、51、77—86、88、92、
123、128、276、313、329、333、338、
424、458、582—586、588、593、595、
635、674、717。
- 德黑兰 17、123、282、419。
- 德累斯顿 123、329。
- 德里 134、223、367。
- 德梅拉拉州 428。
- 德涅斯特河 9、16。
- 的里雅斯特 20、325、425。
- 蒂尔西特(今苏维埃斯克) 5、106。
- 蒂斯河 515。
- 底格里斯河 17。
- 第聂伯河 16、552。
- 地中海 19—20、30、233、239、
278—279、460。
- 东方 139、278、279、281、308、322、
326、482、592、618。
- 东方的罗马——见君士坦丁堡
- 东吁 328。
- 都拉斯 20。
- 都灵 481。
- 杜布诺 496。
- 杜罗河 438。
- 杜塞尔多夫 264。
- 顿河 16。
- 多勃洛尔山口 390。
- 多布罗加-奥瓦西 339。
- 多瑙河 7、9、11、16、19、23、126、154、
208、235、282、325、339、340、370、
375、388—391、393、412、413、
458—464、466、480、495—499、
504、509、522、526—531、536、
550—554、599、605、608、611、620、
621、638、646、718。
- 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瓦拉几
亚) 18、121、156、158、179、191、
205、208、216、226、238、258、267、
268、273、275、278、281、282、300、
302、306、309、311—314、319—
322、325、337、359、361、363、374、
375、388、444、462、463、481、490、
496、509、531、536、551、614、620、
621、623、631、684。

E

俄国 8、10、13—31、38—42、77、
100、104、109—113、121—129、
154—159、165、178—192、205、
208、214—234、236—239、258—
263、267—271、274、276、279、
281—283、291、293、295—298、
299—301、305—317、321、322、
324、328、333—337、339、348、357、
360—363、369—376、385、388、393、
409—437、439—481、489—490、
503、504、507、508、512、520—525、
531—532、575、593、613、614、
618—625、627、632、638、641、
645—646、682—686、718、719、
727—732。

厄尔布鲁士山 459。

恩菲尔德 485。

F

法尔瓦尼(区) 98。

法国 5、23—27、29、35、38、92、109、
111、122—123、126、128、157、161、
181、182、192、214—217、228—
235、259、262、266、269、274、279、
286、291、295、298、299、301、303、
306—308、311—312、316、321、
330、337、338、354、358、368、393、
402、410、419、422、424、427、432、
445、448、452、466、482、491、517、
555、593、620、629—635、653、655、

673、682—706、712。

法兰克福——见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法属圭亚那 427。

范迪门地(今塔斯马尼亚岛) 348。

菲利普波利斯(今普罗夫迪夫)
390。

菲利普港 514。

费城 712。

佛兰德 139。

伏尔加河 16。

弗赖堡 98、108、125。

弗赖堡(布赖斯高) 593。

弗罗斯多夫 632。

G

盖拉赫斯海姆 594。

高加索 322、333、458—460、477、
502—505、507、531、532、552、555、
624、630、642。

高止山脉 248、367。

哥本哈根 77、270、275、401、501、
521。

哥得兰岛 520。

格奥尔基瓦(今戈尔戈瓦) 412。

格克恰——见塞凡湖

格拉斯哥 118、384、461、512。

格林斯费尔德 594。

格鲁吉亚 123、322、458、459、505、
509、531、623。

格伦加里 487。

格罗德诺 269。

格洛瑟普 366、615。

古巴 169。
古吉拉德 165。
古里亚——见斯万涅季亚
广州 18、119、513。

H

哈利法克斯 190、219。
哈利奇湾 110、149。
哈罗盖特 516。
哈姆 583。
海德 366、615。
海峡群岛 517。
海牙 77。
汉堡 42、330、570、581。
汉诺威 516、581。
汉普郡 493。
汉阳 115。
好望角 428。
荷尔斯泰因 100、276、501。
赫尔 255、350。
赫尔德瓦尔 249。
赫尔绍瓦 340、390、495、497、554。
赫尔辛格 19。
赫拉克利亚-本都卡(今埃雷利)
319。
赫拉特 520。
赫特福德郡 516。
黑格 523。
黑海 5、11、16—19、23、121、129、
154、159、216、229、259、261、267、
303、319、375、378、391、412、413、
424、446、458—461、465、466、

470—472、504—509、516、532、
621—625、629、631、642、643、732。
黑利伯里 200。
黑林山 16。
黑塞哥维那 8。
黑森 271、585。
黑山 13、22、89、299、389、393、522。
黑石山脊 147、186、189。
亨伯河 516。
恒河 366。
红村 269。
华沙 40、392、416—420、425、452、
481、496、502。
华盛顿 14、277、338、534。
滑铁卢 498。
霍尔本 255。
霍京 496。
霍姆斯 433。

J

基尔马诺克 384。
基德明斯特 184、512。
基辅 262、269。
基利亚 5。
基斯利 485。
吉尔福德 625。
加尔各答 134、164、246、249、366。
加拉茨 17、126、363、461、463、550。
加利福尼亚 114、116、378、571。
加利西亚 10、20、275、425。
加列戈 9。
加拿大 53、483、487、517。

加特契纳 269。
 迦南 708。
 剑桥 350。
 杰尔库姆-卡列 532。
 捷列克河 532。
 金角湾——见哈利奇湾
 久尔杰沃 526、528。
 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沙皇城、东方的
 罗马、斯坦布尔)(今伊斯坦布尔)
 9—12、16—21、29—32、38、41—
 43、77—86、104—105、109、110、
 123、149、155、158、178—179、
 215—218、229、239、259—263、
 267、273、278、281、295、299、300、
 305—311、317、319、320—321、
 325、337、339、358、362、369、376、
 390—393、432、433、438—444、
 454、457、468、475、477、480、498、
 509、527、531、534、553、613、619、
 625。

K

喀琅施塔得 337
 卡尔斯 121、506、531、532。
 卡尔斯多夫 572。
 卡拉法特 495、526、529、530、553、
 554、605、610、611、646。
 卡利卡特 367。
 卡姆奇亚河(卡姆奇克河) 497、
 498。
 卡纳蒂克 165。
 卡潘 411。

卡特加特海峡 521。
 卡特里克 515。
 卡宴 348。
 坎德什 247。
 坎特伯雷 350。
 考文垂 59。
 柯尼斯堡 330、355。
 柯尼希斯霍芬 594。
 科恩 485。
 科孚岛——见克基拉岛
 科夫诺(今考纳斯) 269。
 科林斯地峡 410。
 科隆 35、36、48、330、563、578、
 583—587、651、673。
 科尼亚(伊康尼) 263、433、436、
 440。
 克基拉岛(科孚岛) 348。
 克拉科夫 323、420—429、460、465、
 620。
 克拉约瓦 363、393、526、529、530、
 553、605。
 克莱尔蒙特 632。
 克里木 123、258、339、474。
 克利夫兰 515。
 克列茨克 215。
 克列西利亚——见贝卡谷地
 克罗地亚 11、502。
 肯宁顿 257。
 肯宁顿 257。
 肯辛顿 95。
 库班河 458、459、532。
 库楚克-凯纳吉 105、217、260、474、

489,619,621。
 库尔 548。
 库尔德斯坦 389。
 库尔兰 123。
 库拉河 505,645。
 库列夫察 7,391。

L

拉多加湖 19。
 拉合尔 367。
 拉芒什海峡 613。
 拉索瓦 527。
 拉韦纳 355。
 腊兹格勒 339,340。
 莱巴赫(今卢布尔雅那) 6,106。
 莱蒂岛 464。
 莱斯特 484,512。
 莱斯特郡 493。
 莱茵河 719。
 莱茵省 35,45,123,354,587。
 兰开夏郡 90,142,146,186,256、
 349,380,384,512,549,616,725。
 勒阿弗尔 42,635。
 黎巴嫩 7。
 黎凡特 425,437,455。
 里昂 635。
 里昂河 505。
 里海 16,411,458,504。
 里斯本 431。
 里斯孔图 501。
 里索文 331。
 利物浦 350。

利兹 407,484。
 联合王国——见大不列颠
 两公国——见多瑙河两公国
 列杜特-卡列 507,532。
 灵伍德 184。
 卢尼贾纳 594。
 卢森堡 432。
 鲁昂 635。
 鲁米利亚 278。
 鲁斯楚克(今鲁塞) 497,526—529、
 535,553,647。
 鲁斯内海尔(今拉杰默哈尔) 366。
 鹿特丹 330。
 伦巴第 94,137,330,355,382,502、
 529,536,595。
 伦敦 4,36—37,39,45,77,100、
 104,117,150,155,156,167,176、
 179,193,194,201,211,228,254—
 258,265,271,273,293,294,304、
 323,330,336,347,353,357,359、
 368,374,377,381,412,460,461、
 464,466,484,491,509,513,563—
 566,577—578,581—584,589、
 591,595,620,625,627,633,636、
 639,709,719,728。
 罗马 9,186,220,296,595,710,712、
 715,716。
 罗蒙门 99。
 罗瑟海特 95—96。
 罗森代尔 614。
 罗斯托克 330,355。
 罗滕斯托尔 511。

洛厄尔 715。

洛桑 98。

绿色的埃林——见爱尔兰

M

马德拉斯 136、164、240—242、251、367。

马尔卡河 502。

马耳他 5、20、121、158、301、444、517。

马格德堡 36、563。

马里查河 39。

马六甲 226。

马其顿 12、19、41、390、393、495。

马赛 159、366、635。

曼彻斯特 50、118、146、184、314、365、383、407、483—486、492、512、514、524、525、540、548、597、599、615。

曼达莱山 325。

梅德斯通 96。

梅克伦堡-什未林 516。

梅努斯 60。

美国(合众国、美利坚合众国) 90、114、169、193—194、238、263、270、277—279、296、310、316、332、338、353、378、545、568、578、596、652、713—715。

美索不达米亚 139、310。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51、583。

美洲 14、27、51、169、385、689、710。

门多赫 502。

孟加拉 135—137、142、165、225、226、240—242、251。

孟买 136、164、240—242、251、367。

米德 98。

米兰 20、88、92、416、594、595。

密卡岱——见曼达莱山

缅甸 225、325、493、734。

明格列利亚 123、458、645。

明乔河 529。

明斯克 269。

摩德纳 594。

摩尔多瓦 8、9、12、29、39、154、156、158、179、216—217、268、273、275、309、319—321、339、362、390、393、413、458、459、462、517、551、631。

摩尔多瓦—瓦拉几亚——见多瑙河两公国

摩拉瓦河 12。

摩里亚半岛(今伯罗奔尼撒半岛) 11、39、410、438。

摩洛哥 517。

莫甘 411。

莫吉廖夫 269。

莫斯科 11、126、718。

莫兹多克 459。

墨尔本 353、380、566。

墨西哥 427。

默钦 509、646。

N

纳沙泰尔 88、109。

纳瓦里诺(今皮洛斯) 29、39、409、

438、620、630。
 纳希切万 411。
 那波利(那不勒斯) 89、92、348、
 349、355、440、517、595。
 南安普敦 457。
 南京 119。
 南卡罗来纳 211。
 南喀尔巴阡山脉(特兰西瓦尼亚山
 脉) 529。
 南斯拉沃尼亚 42。
 尼德兰(荷兰) 32、100、118、346、
 402、427、428、482、517、714。
 尼科波尔 393、527、553
 尼尼微 205。
 尼什 321。
 涅瓦河 263、432。
 牛顿 615。
 牛津郡 515。
 纽彻奇 511、614—615。
 纽伦堡 4。
 纽约 18、193、264、635。
 挪威 516。
 诺丁汉 69、184、484、512。
 诺夫哥罗德——见大诺夫哥罗德
 诺里奇 512。
 诺瓦拉 536。
 诺伊德特 487。

O

欧提尼 98。

P

帕迪厄姆 511。

帕尔马 594。
 旁遮普 17、165、240、367、520。
 佩斯——见布达佩斯
 佩特拉 140。
 皮埃蒙特 108、496、536、594、595。
 品都斯山脉 31。
 品利科 97。
 葡萄牙 430、438、449、517。
 普多日 269。
 普法尔茨 570。
 普雷 98。
 普雷斯顿 366、383、484—486、511、
 522、523、539、548、599、615、725。
 普列文 340。
 普鲁士 20、34、44、88、92、123、181、
 215、259、267、297、337、338、356、
 359、420、421、424、426、502、516、
 583—587、592—600、618、654、
 685。
 普鲁特河 191、235、282、300、311、
 370、388、480、551、552、623。
 普纳 247、367。
 普斯科夫 269。
 普斯陶(匈牙利草原) 90。
 朴次茅斯 104、625、626。

Q

乔罗赫河 506。
 切尔克西亚 123、154、459、466—
 472、475、476、555、645、724。
 切尔西 632。
 切斯特 586。

屈塔希亚 439。

R

热那亚 714。

口德兰半岛 276。

日内瓦 90。

日乌河(希尔河) 527, 529。

瑞典 123, 312, 419, 516, 520。

瑞士 87—99, 107—112, 125, 338, 348, 458, 571。

S

萨尔赛达 138。

萨克森 581。

萨拉米斯 121, 156, 301。

萨瑟克 186。

萨韦河(萨瓦河) 7。

撒丁 92, 517, 595。

撒哈拉 139。

塞尔维亚 8, 12, 29, 41, 259—260, 261, 309, 320—321, 393, 495, 530, 535, 611, 614, 619, 621, 646。

塞凡湖(格克恰) 411。

塞雷特河 499, 528。

塞萨洛尼基(帖撒罗尼迦) 260。

塞瓦斯托波尔 5, 216, 357, 433, 467, 468, 552, 642, 643, 732。

色雷斯 12, 41。

色萨利区 10, 19。

瑟斯克 515。

沙恩福德 511。

沙皇城——见君士坦丁堡

上海 116—118, 513。

设菲尔德 340, 377。

设拉子 17。

舍夫卡捷尔——见圣尼古拉炮台

圣奥尔本斯 350。

圣彼得堡(彼得堡) 11, 12, 18, 22, 41, 125, 126, 156, 183, 191, 192, 207, 215, 217, 231, 259, 267, 268, 274, 275, 282, 291, 302, 305, 307, 311, 316, 317, 319, 337, 374, 419, 433, 444, 445, 460, 473, 522, 592, 631。

圣彼得区 522。

圣克卢 682。

圣尼古拉炮台(舍夫卡捷尔) 459, 645。

圣乔治河 459。

圣让达克 230, 278。

圣威廉堡 248。

圣约翰伍德 632。

施吕瑟尔堡(今彼得要塞) 333。

什鲁斯伯里 350。

石勒苏益格 276, 501。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100, 521。

士麦那(今伊兹密尔) 159, 216, 238, 260, 278, 279, 281, 299, 338, 339, 363, 444。

舒门(舒姆拉) 339, 340, 391—393, 496, 497—498, 527, 603, 646。

舒姆拉——见舒门

斯德丁(今什切青) 20, 330, 355。

斯德哥尔摩 123, 269, 419。

斯海尔德河 438。
 斯凯尔斯奥查德 383。
 斯坦的纳维亚 277。
 斯拉蒂纳 529、530、536。
 斯拉沃尼亚 11。
 斯利特 520。
 斯皮特尔菲尔兹 184。
 斯皮特黑德海峡 104。
 斯塔福德 377。
 斯泰利布里奇 366、485、614—615。
 斯坦布尔——见君士坦丁堡
 斯坦福 511。
 斯特拉斯堡 633、635。
 斯托克波特 146、184、353、485。
 斯托克斯利 515。
 斯万涅季亚(古里亚) 458、459。
 松德海峡 19、129、521。
 苏格兰 53、74、131、379、659、666。
 苏格兰高地 488。
 苏黎世 90、532。
 苏利纳河 207、325、464。
 苏茹克-卡列(今新罗西斯基)
 469—470、473。
 苏茹克-卡列湾 467、469—470、
 473。
 苏托林纳 215。
 苏伊土地峡 279。
 索安河 366。
 索非亚 390、393、495、527、534、553。

T

塔尔努夫 426。

塔甘罗格 17。
 塔古斯河 438。
 塔霍河——见塔古斯河
 塔雷什 411。
 塔纳 366。
 太巴列湖 230。
 太平洋 279。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 314、377。
 泰晤士河 255、331。
 泰辛 88、94、348
 泰辛河(提契诺河) 348。
 坦皮科港 469。
 特尔尼 355。
 特拉佩宗特 10、17、19、122、433、
 458、500、505、508、724。
 特拉斯泰韦雷 355
 特兰西瓦尼亚 9—10、275。
 特兰西瓦尼亚山脉——见南喀尔巴
 阡山脉
 特伦顿 384。
 梯弗里斯(今第比利斯) 459、505、
 531、532、645。
 帖萨利亚——见色萨利区
 帖撒罗尼迦——见塞萨洛尼基
 图尔克曼恰伊(今托尔卡曼) 411。
 图尔努(图尔努-默古雷莱) 526、
 528。
 图尔图凯(今图特拉坎) 535、550、
 551、603、606、610。
 图拉 269。
 图兰平原 16。
 图诺拿河——见朱木拿河

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帝国、土耳其行省) 3—33、43、100、105、111、121—124、126—127、128、145—160、178—206、214—224、227—230、238—239、259、262、268、272—274、278—283、291—292、295—318、320—322、357—361、368—380、388—394、409—419、432—436、440—449、453—455、459、463、465、469、470、473、489—494、495—500、502、504、517、613—617、618—624、629、630、678、723—724、730、732。

—土耳其欧洲部分 7、16、19、27、32、38—41、105、123、260、291、297、315、359、393、412、623。

—土耳其亚洲部分 7、17、19、123、412、506。

土库曼(突厥斯坦) 16、17。

土伦 5、25、301。

突厥斯坦——见土库曼

突尼斯 7、480。

托尔尼-勒格朗 98、99。

托里什韦德拉什 497。

托伦蒂诺 355。

托罗斯山脉 433。

托斯卡纳 517。

W

瓦尔纳 339、340、391、392、496、497、500、527。

瓦拉几亚 8、9、12、29、39、154、156、

158、179、216—217、268、273、275、309、319、330、339、362、390、393、413、458、459、462、499、517、522、529、534、535、551—554、610、631。

—小瓦拉几亚 522、527、530、553。

外高加索——见黑海

威尔士 326、331、523。

威根 383、510、511、520、522—523、599、725。

威尼斯 202、407、714。

威斯敏斯特 348、416。

威斯内尔 485。

维丁 340、495、509、522、526—530、539、550、551、605、611、646。

维尔纳(今维尔纽斯) 269。

维切布斯克 269。

维拉戈什(今希里亚) 575。

维罗纳 6、106、408、412。

维也纳 4、6、7、45、92、93、107、108、123、137、182、238、259、267、269、274、279、282、302、306、308、319、322、358、363、371、427、452、490、504、509、522、526、551、592、619、625、631、633、638、721、724。

温泉关 571。

温莎 452、631—632。

乌得勒支 427。

武昌 115。

伍尔弗汉普顿 384。

沃伦 269、522、552。

X

希尔河——见日乌河

希腊 9、17、20、23、28—31、87、93、
123、179、186、193、260、261、409、
411、413、430、517。
希瓦 17、520。
西班牙 9、124、193、408、410、430、
438、517。
西伯利亚 317。
西区 189、512。
西斯托夫(今斯维什托夫) 553。
西西里 137、348、517。
悉尼 18、380。
锡拉库萨——见叙拉古
锡兰岛(今斯里兰卡) 137。
锡利斯特里亚 261、340、390—393、
413、527、535、646—647。
锡诺普(锡诺帕) 629、630、641—
644。
喜马拉雅山脉 137、254。
厦门 513。
威海 520。
小亚细亚 7、115、122、261、310、
438、439、733。
欣德利 511。
辛辛那提 566。
新奥尔良 635、715。
新加坡 226。
新英格兰 711。
信德 17、165。
匈牙利 11、16—17、20、217、261、
275、311—314、348、382、457、502、
574、575、620、632、655、721—722、
730。

叙拉古 279。
叙利亚 229、278—279、433、438、
439、517、531。

Y

雅典 708。
雅尔塔 603。
雅西 126、268、274、275、496。
亚得里亚海 9、20、261、277、425。
亚历山大里亚(今亚历山大) 105、
439。
亚历山德拉炮台 474。
亚美尼亚 7、8、17、29、121、322、
412、504、505、644。
亚尼纳——见约阿尼纳
亚平宁山脉 137。
亚述 205。
亚速群岛 517。
亚速海 322。
耶路撒冷 105。
耶拿 529。
也门 140。
伊奥尼亚群岛 20、517。
伊庇鲁斯 10。
伊布勒伊拉——见布勒伊拉
伊康尼——见科尼亚
伊利里亚 8、11。
伊梅雷蒂亚 458、459。
伊普斯威奇 512。
伊萨克察(伊萨克切亚) 509。
伊什蒂曼山隘 390。
伊斯坦布尔——见君士坦丁堡

伊兹梅尔 392。

意大利 6、91—93、123、137、139、
262、270、277、313、354、517、595、
632、655、671、730。

印度 16、100—103、114、119、
132—135、137—141、145—153、
161、162—177、196—203、220—
227、235—252、254、265、325、
348、367、425、483、517、545。

印度斯坦 119、137、141、143、223、
245、367。

印度河 18、135。

英国(另见大不列颠) 17—18、53、
258、343、379、406、666、724。

攸克辛海——见黑海

幼发拉底河 17、504、505。

约阿尼纳(亚尼纳) 39。

约克郡 147、186、349、487、512、515。

Z

扎布利亚克 522。

泽姆林 159。

泽西岛 633。

直布罗陀海峡 19、517。

智利 169。

中国 113—120、167、240、326、425、
482、713。

中美洲 169。

朱木拿河(图诺拿河) 366。

爪哇(今印度尼西亚) 138。